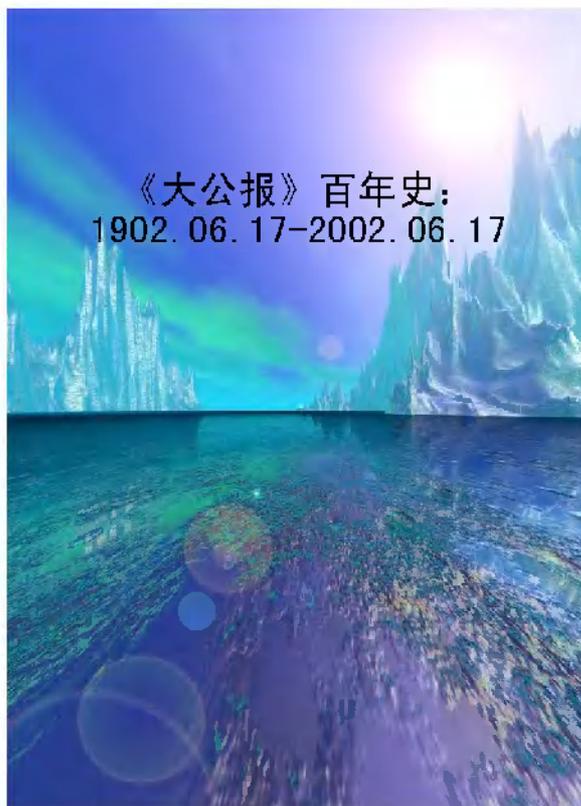


《大公报》百年史：
1902.06.17-2002.06.17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大公报》百年史

(1902-06-17—2002-06-17)

方汉奇 (主编)
吴廷俊 徐光晋
陈昌凤 王 鹏
吴 葆 彭 兰
陈彤旭 史媛媛
宋 辉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方汉奇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300-05231-2

I. 大...

II. 方...

III. 大公报—新闻事业史—1902—2002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0938号

《大公报》百年史

(1902-06-17—2002-06-17)

方汉奇 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82501765(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版 次 2004年7月第1版
印 张 17.625 插页 2 印 次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489 000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DAGONGBAO BAINIANSHI

前言：再论大公报的 历史地位*

□ 方汉奇

(一)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到2002年的6月17日，已经出满了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是全世界惊涛骇浪变化多端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历尽艰辛、摆脱屈辱和贫困、寻求发展和振兴道路的一百年。在这个极不寻常的一百年中，

*2000年为纪念《大公报》创刊98周年，曾写过一篇3000字左右的短文，题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这篇文章是在上述的那篇短文的基础上重写的。篇幅为前文的五倍，题目也另定为《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

《大公报》经历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个历史时期。几番浮沉，数易其主，却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由僻处华北一隅之地的报纸，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报。在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间，她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记录了世纪的风云，记录了民族的苦难，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积极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她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惟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

在中国的报坛上，《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惟一一名来自中国的记者，中苏建交后第一个奉派到苏联采访苏联建设情况的中国记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一个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报道有关情况的内地记者，都来自《大公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始至终派有记者长驻欧洲报道各方面情况的中国报纸，只有《大公报》一家。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向香港同胞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也是《大公报》。1991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不仅为《大公报》设了专门的词条，还为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12位《大公报》人设了专门的人物词条。近代以来，中国涌现过数以千计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有幸作为人物辞条入选这部国家级百科全书的只有108人，《大公报》竟占了其中的九分之一，可见其受重视之一斑。

《大公报》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她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从英敛之时代起，《大公报》就是一份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主办的报纸。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接办以后，更时刻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文人论政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从两汉、宋代的太学生，明代的东林党，清季讲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和经

世致用之学的魏源、薛福成、冯桂芬，到戊戌维新前后从事办报活动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不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所谓的水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在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论政难免有忠君的思想，但也会有扶正去邪、反对奸佞、固本富国、与民休息等内容，代表的是封建社会中的健康力量。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论政既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也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既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也要求当政者广开言路，俯顺舆情，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大公报》的水人论政主要属于后者。一个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报纸，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声誉，摒弃低级趣味，重视社会效益，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

《大公报》之所以受重视，还因为她是一个重视报格、严于律己的正派的报纸。《大公报》名称中的“大”和“公”两个字，就是这种报格的具体体现。英敛之对这两个字的解释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并以此作为办报的宗旨。这一宗旨，始终为各时期的《大公报》事业的继承者所服膺，薪火相传，坚持不懈。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后，又由张季鸾出面，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简称“四不”）的社训。据张季鸾自己的解释，所谓“不党”，指的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指的是“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所谓“不私”，指的是办报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指的是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此后不久，为约束报社工作者的行动，他还提出了以下四点作为补充，即：“不锦上添花，不落井下石，不与人共利害，不参与别人的秘密。”不论旧的“四不”还是新的“四不”，都是一个负责任的报纸的严格的自律行动。应该指出的有两点，即：（1）这些提法都是有针对性的。如所谓“不党”，从广

义来说，就是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所说的“君子不党”的那个“不党”。意思是坚持不结党营私和无所偏倚，能够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从狭义来说，则是对民国初年以来，一些报纸投靠国会中的某一个党团，或封建军阀中的某一个派系、靠津贴过日子，党同伐异，盲目吹捧，信口胡诌，造谣生事等种种行为的鄙夷和抵制。(2)他们确实是在身体力行的。同样以“不党”为例，在张季鸾等人主持时期，《大公报》始终是一个无党派的报纸。他们不仅自己不参加党派，也不允许报社内的工作人员参加任何党派，连参加一般的社会团体也在禁止之列。天津版外勤课主任汪松年曾一度被当地基督教青年会拉去担任征集新会员的征友队队长，胡政之知道后立即让他辞职，就是明显的一例。为了坚持以上的办报原则，《大公报》曾经多次被查禁而其志不改。这些，都说明《大公报》确实是一家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正派的报纸。

正因为如此，《大公报》从一创刊起，就受到了社会的瞩目和尊重，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和欢迎。这家报纸后来能够得到世界新闻界的承认和国际新闻学界的关注，被授予“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影响由国内及于国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惟一获得国际荣誉的报纸，也和她的上述特点不无关系。

(二)

周恩来总理 1958 年在和当时《大公报》的负责人费彝民谈到这家报纸的历史贡献时，曾经肯定了三。点。其中的第一、二点就是“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这两点其实是一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日”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检阅一百年来《大公报》的言论主张，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爱国思想始终是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不论是英敛之时期还是英敛之以后的各个时期，《大公报》的忧国忧民之心和强烈的爱国思想，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是满族人，和皇族还有一定的姻亲关系，而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这些都妨碍他是一个真正的爱

国者。他之所以要创办《大公报》这份报纸，也许有众多考虑，但企图以言论振兴中华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他支持维新变法，要求慈禧太后撤帘归政，要求发展经济，整顿吏治，这些都是他爱国的具体表现。他最初爱的也许只是“大清国”，因此力图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反对以暴力手段推翻爱新觉罗王朝，这是他的局限。但当时的“大清国”，是以汉满蒙回藏为首的众多民族和四万万同胞爱国思想的共同载体。在鼎革以前，爱大清就是爱自己的国家。两者之间并无矛盾。只要是真正的爱国者，其爱国的感情不会因为政治体制的改变和政权的更迭而有所轩轻的。英敛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主持下，不论是在清末的那段时期，还是在民国初年的那段时期，《大公报》的言论中始终都洋溢着爱国的感情。1903年，她反对沙俄军队强据我辽东半岛和觊觎我东北地区的筑路权。1904年，她强烈谴责英属南非当局虐待我华工。1905年，她积极参加由反美华工禁约引起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成为天津地区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1915年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她是坚决反对的。此后不久段祺瑞内阁以出卖主权为代价发动的满蒙五路对日借款，她也是坚决反对的。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大公报》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英敛之退出《大公报》以后，这家报纸一度为亲段的安福系财阀所控制。但在负责编辑和采访工作的总编辑胡政之的具体主持下，这家报纸仍然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中与帝国主义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所进行的抗争作了及时的报道，对“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在吴张胡主持的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她的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上。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个人都是留日学生，继张季鸾主持笔政的王芸生虽然没有留日的经历，但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中国觊觎和侵略的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发表过数以百万字计的有关中日交涉历史的专著。他们都是对日本情况十分了解的爱国知识分子。出于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估

计和对形势的分析，他们曾经有过“不轻于主战”和“缓抗”的主张。这些都属于对抗日时机和策略把握上的考虑。“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后，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立即成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公开主张“和日阋斯拼”，“打到使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变更国策，放弃侵略”，“不胜不止”（见胡政之为李纯青《日本春秋》一书所作的序）。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抗战到底的态度始终十分坚决，言论中没有一个字对抗战的前景发生动摇。1937年12月13日，占领上海的日军新闻检查机关发布通令，要求在租界出版的所有报纸自12月15日起将新闻小样送检。《大公报》上海版于前一天断然停刊，以示抵制，并发表社论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还说：“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香港版被迫停刊，胡政之在社论中引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以言志，并表示“我们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悲壮爱国之情，溢于言表。1944年日军发动湘桂黔战役，桂林沦陷，寇氛直逼贵州的独山，《大公报》又多次发表社论，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日和“以空间换时间”的说法表示了不满，并要求惩治御敌不力的将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为了共赴国难，曾经五次播迁，津、沪、汉、港、桂等馆的资财设备，全部委弃，荡然无存。工作人员则和难民们一起，辗转道路，流离失所，历尽艰险，逃回后方。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重庆版虽然相对稳定，但也曾遭到过敌机毁灭性的轰炸，被迫迁址重建。一家无权无勇没有得到过当局任何资助的民办报纸，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如此坚定地毁报抒难，如此执著地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坚持出报，克尽言责，为振奋抗日精神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舆论上的鼓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在张季鸾逝世后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曾经称赞张“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这既是对张个人抗日言行的肯定，也

是对《大公报》整个报纸的抗日爱国思想的肯定。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之所以受到她的读者，特别是那些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喜爱和支持，和她的爱国宣传，和她在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等方面所起到的舆论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

1948年复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在20世纪的后半叶，继承了英敛之时期以来的《大公报》的爱国传统，使《大公报》爱国思想的这条主线，一直贯彻延续到今天。在香港和海内外读者的心目中，《大公报》始终是一份深受尊重和喜爱的爱国报纸。

（三）

周恩来总理对《大公报》的历史贡献特别肯定的还有一点，就是她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一点说得非常中肯。《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群英荟萃的一家报纸。她不仅集聚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人才。

《大公报》之注意人才，是有传统的。英敛之筹办《大公报》之初，首先考虑的就是人才。为了组织好办报的班子，他曾多次到报纸较多人才较为集中的上海，为即将创刊的这家报纸物色掌门人。他曾一度考虑把曾任《时务报》和《昌言报》主持人的汪康年请来当主笔，汪是当时中国新闻界极负声望赫赫有名的人物。只是双方的条件没有谈妥，才作罢。继英敛之之后接办《大公报》的王郅隆，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棋，就是抓住了胡政之。失去了胡政之这个人才，他的报纸也就难乎为继了。

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的新记公司成立后，不仅注意延揽人才，也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人才。在他们主持的时期，《大公报》群星璀璨，熠熠生辉，可以称得上是这家报纸人才辈出的鼎盛时期。

首先，这三个人，特别是其中的张季鸾、胡政之两个人，本身就是中国新闻界的杰出人才。张季鸾从晚清起就开始办报，民国成

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就是他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秘书的时候，从南京发给上海各报的。此后，他为多家报纸担任过主笔，写得一手好文章。曾经以文字贾祸，两入牢狱。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后，他“处处忙人事，时时念国忧”，潇洒，儒雅，宽厚，大度，才思敏捷，举重若轻，是富有民族感情的一代报人。他的文章风格，成为《大公报》的代表，不仅影响了他的前辈和他的后继者，也风靡了他所在的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周恩来总理在他逝世后给家属的唁电中，尊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毛泽东也曾经在和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们的谈话中，称赞他作为一家报纸总编辑，指挥若定游刃有余的风度和才华。胡政之则是一个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作为一个杰出的记者，他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的采访，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善于发现线索，捕捉战机，分析判断也很准确。作为一个熟练的编辑工作者，他对报纸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十分在行。各版新闻的编辑调度，各种栏目的组织策划，他都优为之。作为一个杰出的报刊政论家，他有很好的文史根底，笔力雄健，意简言赅。所写社论，因为不署名，和张季鸾的几乎难以分辨。担任《大公报》总经理后，工作重点转到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营销等方面，又充分地显示了他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大公报》的好几个版，特别是目前还在出版的香港版，都是在他的指挥擘画下创办起来的。其对《大公报》的贡献和在中国新闻界的影响，并不下于张季鸾。

其次，他们也十分注意延揽、吸纳和培养人才。继张季鸾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写得一手激情洋溢的好文章的王芸生，就是在和张季鸾打了一个时期的文字交道之后，被后者延揽到《大公报》来的。当时他是天津《商报》的总编辑。继王芸生之后被延揽进《大公报》的，还有原任天津《庸报》总编辑的张琴南，原任北平《晨报》编辑的许君远，原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的费彝民，原任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的蒋荫恩，以及原任北大助教的张佛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大公报》的方面大员和骨干力量。除了从同业中延揽人才外，他们也注意从社会上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和刚毕业

的青年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以练习生的名义，录取下来，加以培养。

张胡两人都很讲究用人之道。他们的用人之道，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不拘一格。王芸生出身茶叶铺学徒，没有多高的学历，陈纪滢出身邮局职员，没有多少新闻工作的经历，一旦被发现是人才，就都立即委以重任。二是不养圣（剩）人贤（闲）人。用人求精不求多。不称职的，立即解聘。三是不熬年头，不论资排辈。只要干得出色，就立即破格擢升。如徐铸成入社才三年，就由练习记者提拔为驻汉口的正式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也由30元猛增至150元，外加车马费50元。梁厚甫初当翻译时，月薪才60元，因为突击翻译希特勒的一篇演讲稿，任务完成得好，张季鸾立即下条子，把他的月薪调到100元。四是注意保护人才。文章成报道出了问题，当局者怪罪了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抵挡过去，主动承担责任。既避免了让第一线的人受到伤害，因而缩手缩脚，也使被保护者心生感激，更加发奋工作。五是注意教育和培养。每一个新手，都给他们提供条件和机会，在发挥他们的个人专长之余，要求他们能够掌握“写”、“跑”、“照”、“论”等各方面的技能，兼通经理、编辑两部门的业务，成为新闻事业的各方面的行家里手。这些用人之道，既有助于人才的成长，也增加了团体的凝聚力，使《大公报》始终拥有一支精干的团结的有着很强战斗力的队伍。

在张胡等人的提携和培养下，《大公报》为中国新闻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仅列名《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除吴、张、胡三人和前引的王芸生、张琴南、许君远、费彝民、徐铸成、梁厚甫、张佛泉等人外，还有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杜协民、汪松年、孔昭恺、何毓昌、杨历樵、赵恩源、李天织、马季廉、王文彬、张警吾、萧乾、艾秀峰、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李侠文、李纯青、徐盈、彭子冈、朱启平、曾敏之、谭文瑞、陆诒、唐振常、季崇威、吕德润、张高峰、严仁颖、李光诒、潘际垌、陈凡、黄克夫、马季良（唐纳）、陈文统（梁羽生）、查良

鏞（金庸）、严庆树（唐人）、高元礼、章丹枫、马廷栋、周雨、苏济生、王浩天、张契尼、戈衍棣、吴砚农、罗承勋、蒋逸霄、方蒙、左步青、沈春波、赵泽隆、寿充一、戴文葆、刘克林等60多人。他们都出于这一时期的《大公报》，都属于“国家级”的“新闻界名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有的是经验老到的编辑能手，有的是著名的政论家和名记者。其中范长江、杨刚、萧乾、彭子冈、朱启平、吕德润等人，早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蜚声于时。范长江采访西北地区的系列通讯以《中国的西北角》为名结集出版后，曾经七次再版。朱启平1945年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现场采写的著名通讯《落日》和1979年访问西欧四国时在戴高乐墓前采写的著名通讯《伟大的平凡》，都传诵一时，并被选人大学新闻系的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性篇章。

经过《大公报》提携和培养的上述人才中，有一些人不仅为《大公报》做出了贡献，离开《大公报》以后，在新闻界和其他领域仍然表现出色，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徐铸成接办了《文汇报》，并长期担任该报的领导工作，晚年著述等身，成为著名的老报人；许君远接任了重庆《益世报》的主笔，成为深受推重的办报能手；范长江创办了著名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解放后主传过《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后来又负责科委的工作，成为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管理部门的领导人；蒋荫恩担任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副系主任，成为著名的新闻教育家；梁厚甫长期为海外华文传媒撰写评论，成为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金庸长期在香港报刊上撰写连载小说，又长期主持香港著名报纸《明报》的笔政，成为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和报刊活动家；杨刚担任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主任秘书，成为周总理处理国内外大事的重要助手；刘克林参加了中宣部的工作，文字铿锵傲岸，成为“九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唐振常潜心于史学研究，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乾晚年致力于翻译工作，成了著名的翻译家，并荣任有“翰林院”之称的中央文史馆的馆长。他们的这些成就，固然由于个人

的努力，但也与他们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和《大公报》对他们的教育和熏陶有着一定的关系。他们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大公报》输送给其他报纸和其他行业的人才。

经过《大公报》教育和培养出来的新闻工作者，除了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业务能力之外，一般都还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敬业精神。“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这是朱启平1993年逝世前说过的话。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信念，也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共同的心声。它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敬业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的精神财富。

(四)

《大公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她为同时代的同业们和后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办报经验。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之初，这家报纸在天津人的心目中并无地位，发行数字也不高。由于他的努力，不到五年的功夫就使《大公报》成为天津地区举足轻重的大报，他自己也因而被推为当地报业公会的主席。吴、张、胡联合主持的新记公司成立后，这个报的发行量最初还不到2000份，每月亏损4000余元，一年后增至6000份，才闯出亏损关，取得收支平衡。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她已由天津一个版，扩充为天津、上海、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六个版。还得到过一次国际奖。抗日战争时期，她的重庆版曾经发行达97000份，创大后方一家报纸单独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抗战结束后，她的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版总发行量达20万份，总资产达到60多万美元。香港版还被当地《年鉴》推为“香港舆论的重镇”。这些都说明，她是中国新闻史上办得非常成功的一家报纸。

《大公报》之所以办得非常成功和受到读者的欢迎，除了前述的人才济济和经营得当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由于她在编排和内容上严肃认真，肯下功夫。

从版面的安排来看，《大公报》历来重视要闻版的编排。新闻

力求真实准确。标题字斟句酌，很能抓住中外新闻的重点。头版头条标题的制作尤为经心，每天都能给读者以深刻印象。其他新闻的重轻次序，也安排得比较妥当。

从内容看，《大公报》的社评、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副刊都极具特色，被称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

首先是社评。《大公报》既然以“文人论政”为标榜，代表报纸出来“论政”的“社评”，自然受到重视。新记公司以前的时期，通常都由报社主人和主持笔政的人亲自动手。英敛之、胡政之等，都曾为该报写过不少社评。新记公司接办初期，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都把社评的写作看做当天报纸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从题目到观点都经过共同商量，然后由其中一人动手，最后由担任总编辑的张季鸾定稿。吴鼎昌退出后，主要由张季鸾、胡政之两人执笔，以张写的居多。按照他们事先约定的“事业前进，个人后退”的原则，这些社评多不署名。这种做法，在张季鸾逝世后，曾经给编辑出版他的那部《季鸾文存》造成困难。因为三个人都接受过梁启超的影响，“笔锋常带感情”，文风非常接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张季鸾进入晚年，体弱多病，继承他的衣钵成为撰写《大公报》社评主力的是王芸生。王芸生深得张季鸾的真传，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社评写得有才气，有骨气，有锐气，激情洋溢，江河直泻，很能引人入胜。和王芸生同时期为《大公报》各版撰写社评的还有徐铸成、李纯青、李侠文、蒋荫恩等人，个个都是嫉恶如仇满腹经纶的好手，使得《大公报》的社评，从内容到文字，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受到读者的重视和称赞。

其次是星期论文。《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专栏起始于1934年1月，旨在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提供发表自己“评论”的园地。星期论文的内容不限于“论政”，也包括学者们有创获的学术研究成果。应邀为这个专栏撰稿的先后有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等名家，都是一时之选。该专栏极大地提高了《大公报》的文化内涵和知名度，成为《大公报》的一个名牌专栏。和星期论文相配合，《大公报》还有意识地开辟过一些供学者们发表学术文章的专

栏。钱钟书的《休谟的哲学》、《为什么人要穿衣》、费孝通的《重访英伦》、《乡土重建》等不少有分量的鸿篇巨构，就是在《大公报》所开辟的这些专栏上发表的。星期论文和这些学术专栏的出现，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读者，也提高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扩大了她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再次是新闻通讯。张胡等《大公报》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新闻报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多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包括张勋复辟、马厂誓师、巴黎和会、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救国会“六君子”被捕，以及徐州会战、中原重灾等，一旦发生，《大公报》都立即派出记者到现场采访。许多采访活动，都出于张胡的亲自指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胡政之接到张学良用暗语给他的电话通知后，立即派记者连夜搭车赴沈阳，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现场。1933年蒋介石由江西北上处理张学良下野问题，张季鸾得知后，立即派出记者持他写给蒋身边的秘书长杨永泰的亲笔信，在定县火车站等候蒋的专列，闯进车厢，跟踪采访。同年，商办的新绥长途汽车首次客车将由绥远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开往新疆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是当时最新最快的人疆路线和交通工具，张季鸾立即派记者随车同去，以便及时报道沿途运行情况和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的有关情况。在新闻报道上，《大公报》不吝重金不惜小费。为了萧乾去欧洲的采访活动能够成行，胡政之不惜出了双份的路费。第一份被萧不小心弄丢了，随即再补发一份。为了及时获得太平洋作战前线盟军军事进展的情况，《大公报》曾多次多渠道派出随军记者。从各个不同的路线随盟军进驻日本，参加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仅有的三个中国记者中，就有两个来自《大公报》。对于一些突发性新闻的报道，《大公报》主要利用专电。对一些持续时间较长的又需要有一定深度的报道，则主要利用新闻通讯。在张胡等领导的新记公司时期，新闻通讯成为《大公报》的一大特色，不少系列报道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重大战役或事件的新闻通讯，如曹谷冰采写的关于中苏建交后苏俄国内情况的系列通讯，陈纪滢采写的关于沦陷后的东

北地区的有关情况的系列通讯，范长江采写的有关红军长征和红军到达陕北地区后的有关情况的系列通讯，萧乾采写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局和战后国际关系问题的系列通讯，吕德润采写的随中国远征军人缅印地区作战情况的系列通讯，以及陈学昭的旅欧通讯，杨刚的旅美通讯等，都写得情文并茂，很有深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刊载这类通讯的专栏，也成为《大公报》的又一名牌专栏，受到读者的欢迎。

最后是副刊。从天津版起，《大公报》就十分注意副刊的编辑工作，沪港渝桂等版陆续创刊后，副刊尤其受到重视。在萧乾、杨刚等几位副刊主编的主持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小公园”发表过不少进步的文学作品，也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知名度的作家。陈白尘的著名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和《偶然论在上海》等曾经轰动一时的作品和文章，都是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的。杨绛的第一篇小说《璐璐你不要哭》，也是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的。这个副刊还设立过文艺奖金。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卢焚的《谷》，都曾在评选中得过奖。由于办得出色，她同样为《大公报》吸引了一大批读者，成为报纸众多版面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新闻史上继著名的“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后的又一个著名的报纸副刊。

此外，《大公报》还注意贴近读者，服务社会，热心公益事业，曾多次为各时期的重大自然灾害发起募捐。除办报外，还组建过以报纸名字命名的剧团和篮球队，举行过公演和参加过全国性的比赛，把报纸上发表过的有影响的社评、通讯、漫画作品和个人的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发行。在人事上执行编辑记者定期交换的制度和由编辑部出身的人担任经理的制度等等。这些做法，在当时都曾引起过轰动效应，都取得过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既提高了报纸的知名度和工作的效率，也有助于人才的成长。她在这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的办报经验，应该被视作中国新闻界共同的精神财富，

给以很好的总结，使后人得到学习和借鉴。

(五)

谈到《大公报》的历史的时候，需要订正一些不准确的提法，澄清一些不实之词。

(1) “大公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

这种说法，早在解放前就已喧腾于众口。解放后更成为人们批判《大公报》时的一大“罪状”。郭沫若所写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在指“斥”萧乾的时候，就使用过“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这样的提法。可见，所谓“政学系的机关报”云云，在解放前后一些人的心目中，早已成为共识。其实，政学系本身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被指为政学系首领之一的张群就曾经说过，所谓政学系，其实并没有组织，更没有纲领政策，只是几个人，行迹比较接近，就被人看成一系了。这是其一。其二，即使国民党内有这么一个政治派系，也和《大公报》毫无关系。《大公报》既没有拿过“政学系”的钱，没有接受过“政学系”派来的人，没有接受过来自“政学系”的任何指示，也从来没有宣传过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政学系”的政策纲领。《大公报》的所有言论，从英敛之到张季鸾，从王芸生、徐铸成到后来的李纯青、李侠文等，多数都是主笔人根据当天的要闻，自出机杼，自行发挥，少数由主笔政者出题或参与研究定题。虽然有各自的观点，但都与所谓的“政学系”绝无关系。

(2) 《大公报》“拥有官僚资本”，是“大资产阶级的报纸”。

这其实是解放后受“左”的思想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个别《大公报》人自己提出来的。《进步日报》发刊的时候提出来过，王芸生、曹谷冰等人写回忆录和自我批判文章的时候提出来过，是自我拔高和无限上纲的产物。英敛之自称“一介武夫”，“家世寒微”，办《大公报》之前，靠自学成才才当上了职员，连一数的资产阶级都算不上，更无论大资产阶级。他之得以创办《大公报》，靠的是各方面的集资，而且总数极其有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的时

候，惟一的资金是吴鼎昌提供的5万元，当时他是民办的盐业银行的经理，只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并未做官。做官后就辞去《大公报》社长的职务，不再过问《大公报》的事。新记公司《大公报》除了这5万元本钱之外，没有接受过任何方面的资助和津贴。大部分的资产，是靠经营得当不断增值积累起来的。战后出于增添设备的需要，接受过捐赠，但也属于侨资，而且数量极少。其间，为订购新式印刷机器，曾从国民党政府处购买过20万美金的官价外汇，因此遭到诟病，其实也是小题大做。首先，中国的报纸为购买国外的设备，申请一点官价外汇，这本是光明正大的事，其性质属于公事公办。其次，虽然官价低于市价，《大公报》因此得了点便宜，但毕竟要照价购买，不能等同于馈赠。再次，《大公报》并没有因此放弃既定的办报方针，接受控制，改变主张。就阶级性质来说，《大公报》一不拥有官僚资本，二不替官僚资产阶级说话。从资金来源，从言论主张，从这家报纸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等这些方面看，她都是一个纯粹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这也可以从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有关方面按类似付给“定息”的方式为胡张等几个大的《大公报》股份持有人的家属定期发放生活费这一点上得到证实。她得到的是类似《申报》一样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待遇。

(3) “小骂大帮忙”。

这是专就《大公报》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做出的一句带有概括性的话，是长期以来扣在《大公报》头上的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但同样是难以坐实的。

先说骂。《大公报》对国民党当局，不光是“小骂”，也有大骂，有时甚至是怒骂和痛骂。1941年12月22日发的那篇谴责国民党权贵及其家属用逃难的飞机从香港运回“箱笼洋狗”的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1943年2月2日发的那篇痛斥重庆达官贵人们灯红酒绿罔顾河南灾民疾苦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1944年12月19日发的那篇痛斥发国难财的赃官和奸商、悲愤地三呼“请你们饶了国家吧”的社评《为国家求饶》，同年12月24日发的那篇因日军逼近贵阳、要求“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

将以服军民之心”的社评《晁错与马谡》，1945年9月27日和10月24日发的谴责国民党军政官员利用战后的劫收发财的社评《莫失尽人心》、《为江浙人民呼吁》，以及1948年7月连续发表的反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和文化专制政策的一系列社评，就都不是小骂，而是大骂。而且是出自肺腑的真骂，不是假骂。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其中1943年的那一篇，还使报馆受到国民党当局罚令停刊三天的处分。因为1948年的那几篇，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点名攻击《大公报》主持言论工作的总编辑王芸生，对他个人进行所谓的“一查”、“二查”、“三查”，甚至攻击他为共产党“张目”，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对报刊言论的严厉限禁和迫害，考虑到连鲁迅那样的作家尚且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能够如此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不畏强御，不屈从于权势，铁骨铮铮，克尽言责，不但无可厚非，而且难能可贵。

《大公报》确实也骂过共产党。这是因为她是一份无党无派的报纸，又时时以“四不”为标榜，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个党派，都有所批评和指摘，是很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共产党的骂，多数情况下是骂错了。1936年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1941年写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1945年写的《质中共》，1946年写的《可耻的长春之战》等，就都骂错了。错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由于社评撰稿人的阶级和认识上的局限，有的是由于情况不明，有的是由于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误导。此外，在张季鸾生前，也还有张个人对蒋的礼遇有感恩图报的思想等等。《大公报》不是共产党的机关报，也并非左派报纸，这些社评的撰稿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要求他们完全接受共产党的观点和主张。不可能不出一二点差错。出了差错，受到了批评，认识了，改正了，就行了。应该给以宽容和谅解，不必死揪住不放。

同样是骂，两骂相比，《大公报》骂国民党的时候更多一点，也更经常一点。从1927年的《蒋介石的人生观》到1948年的《和平无望》，骂了足足21年。到了第22年，就不光是骂，而是对这

个党彻底失望，准备迎接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了。

再说帮忙。《大公报》确实给国民党帮过忙。从大革命后期帮起，“清共”和“分共”的时候帮过，攻打苏区的时候帮过，“九·一八”事变前后帮过，西安事变前后帮过，抗日战争时期帮过，解放战争开始的一段时期也帮过。一般来说，拥蒋反共就是帮国民党的忙。但也要作具体分析。有的忙肯定帮错了，该批评，也该认账。有的忙，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则是该帮的，不当视为罪状。例如，过去把《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内宣传过的“国家中心论”和“拥蒋”的言论都视为为国民党帮忙，这就不尽妥当。“国家中心论”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口号，和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有本质的区别，是有缺陷的。但在当时，不论是提“国家中心论”，还是提“拥蒋”，都是为了抗日的需要，都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所有抗日的力量都不能不拥有“拥蒋”的名义。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拿的就是国民党的番号。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结束前的告别宴会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见1945年10月9日《大公报》第二版的相关报道。同日《新华日报》的报道作“新中国万岁！蒋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并没有提出过倒蒋的口号。可见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提“国家中心论”和提“拥蒋”，都是大局。《大公报》的这方面的言论，如果是为了坚持抗战到底，就不能说是帮国民党的忙，而只能认为是在帮国家的忙。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大公报》不仅帮过国民党的忙，也大大地帮过共产党的忙。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采访、向中国读者介绍建设中的苏联真实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向全国人民报道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真实情况和边区建设情况的是《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报道，《大公报》始终尊重事实，不歪曲，不捏造，采取了客观或比较客观的态度。她向全国公众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进步业绩，改变了公众心目中被国民党御用媒体歪曲了的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帮助白区的读者了解了革

命的形势，知道了共产党的政策和言论主张。这是一。她为需要了解有关共产党和红军情况的人提供了大量正面、准确的信息。毛泽东就是因为看了《山西日报》和《大公报》有关刘志丹的报道，才决心率红军去陕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少在长征中掉了队的红军，也是在看了《大公报》的有关报道以后，知道了主力部队的去向，才跋山涉水，赶上队伍，重新归队的。这是二。她对国民党政府和权贵们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劫收过程中的贪污腐败的揭露和抨击，她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和谈、镇压学生运动及悍然发动内战的揭露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国统区公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和恶感，加强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亲和力和向心力。这是三。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时刻，她虽然支持过国民党的“清共”、“分共”和“反共”活动，但坚决反对屠杀共产党员。这些，都称得上是对共产党的极大的帮忙。《大公报》始终以无党派为标榜，报社内部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一旦发现某人有国民党方面的背景，立即开除。但是报社里确实确实有不少地下的共产党员。报社的领导层，对有些党员的身份十分清楚，却故作痴聋，不闻不问。新闻版面上，十分之六七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报道。据在《大公报》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回忆，当时报社内的外勤记者多数是左派，一部分居中，极少右派。编辑部内，从领导层到一般工作人员，对国民党持批判谴责态度的居多，说共产党坏话的很少。在国民党当局强迫国统区内的各种媒体称共产党为“共匪”的时代，只有《大公报》公然抗命，坚持称“中共”和“共军”。她只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不承认是什么“土匪”。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大公报》记者时说的“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看”，就是对《大公报》以上言论行动的肯定。这也是对共产党的一种帮忙。

《大公报》是一家无党派的报纸。如果说她对中国的某些党派有过所谓的“帮忙”的话，那么，她更多的是帮了共产党，而不是帮了国民党。而且是越来越多地在帮共产党，直至最后完全倒向共产党。这一点，国民党方面是心中有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头

头就曾经点着名地扬言要“枪毙”《大公报》的负责人，解放战争后期仅《大公报》重庆版一个版就曾经有七名记者被捕，有一名编辑部主任被关进“白公馆”。这些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大公报》的倾向和国民党对她的态度。

这里就涉及中国革命史上如何看待中间势力的问题。重视团结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点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①胡绳同志晚年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中间势力，从阶级看，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职业看，指的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他认为，从人数看，“国民党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中间势力占的是大多数”。他认为，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他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②。

上述这些观点，都有助于深化对《大公报》历史的认识。可以说，解放前的《大公报》，作为一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就是中间势力的舆论代表。中间势力所特有的“两面性”和“动摇”、“不断分化”等特点，在《大公报》的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大公报》之所以能够赢得那么众多的属于“中间势力”的读者和作者的喜爱和支持，正是因为她代表了他们的意志和声音。对《大公报》这一中间势力的舆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内，都十分重视，也都做过大量的工作。有批评，有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见《百年潮》，2001（5），《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一文。

“斗争”，也有“团结”。大量的工作是在争取和“团结”这方面。张季鸾逝世的消息发布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的不少高级领导人都发了唁电，给以很高评价。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公务十分繁剧的情况下，三次会见《大公报》的主要负责人。两次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办事处，一次在李子坝《大公报》报社，每次都作长谈。最后一次长谈后，还接受了《大公报》负责人在馆内的宴请，并为《大公报》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题词。周恩来在此期间，也曾亲到王芸生家探访，并以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相赠。重庆当时有十几家报纸，享有上述待遇的，似乎只有《大公报》一家。说明共产党领导人对这家报纸的重视。很明显，共产党领导人如此重视对《大公报》的工作，其目的在于争取更多的中间势力的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公报》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她确实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了更多的中间势力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公报》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其特殊的贡献。无论如何，再也不该把“小骂大帮忙”这个说法强加在她的头上了。

以上的一些不准确的提法，由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屡被拾起，作为批判的口实，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众口铄金，积重难返，影响了对《大公报》的正确评价。现在是到了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澄清的时候了。

(六)

《大公报》的过去一百年，经历了众多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那一段时期，时间有四十六七年，曾多次易手，又分属于不同的办报人或办报团体，是非功过，聚讼纷纭，褒贬评说，颇多歧义。因而历来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和文化史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新中国成立以后到现在的这一段时期，时间为五十三四年，占整个《大公报》百年历史的一半以上。但基本上分为两摊，即内地一摊，香港一摊，性质较为单一。分析评价，也容易取得共识，反而没有太多的歧义。

在内地出版的这一摊，曾分别在天津、重庆、上海、北京等地

出版。最后归结到北京。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北京版被迫停刊时止，历时17年。除了在天津出版的那一份，曾短时期改称《进步日报》外，其余各版仍沿用《大公报》这一老报名。惟一的变化是由综合性报纸转为以财贸金融方面的评论报道为主的专业化报纸；由原办报人重新组合集体合办的报纸，转为在党和政府部门领导下出版的社会主义报纸。内地的这几个版《大公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为党和国家各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和报道做出了贡献。在报纸所在地区的读者中，特别是在全国财贸战线的工作人员中，有很大的影响。

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起始于1938年8月13日，中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一度停刊。1948年3月15日复刊后，除了被港英当局迫停过一个很短的时期外，没有中断地连续出版到现在，累计出版时间达57年，是各版《大公报》中历史最长的一家。

香港《大公报》的发刊和复刊都是在新记公司主办时期完成的，胡政之为此作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冲刺，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从发刊之日起，香港《大公报》就受到当地读者的重视，曾被推崇为香港“舆论之领导”（见1947年版《香港年鉴》）。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大公报》重新成立了董事会，在李侠文、费彝民、杨奇、王国华等几任董事长、社长的努力下，锐意进取，苦心经营，在反映香港民情、表达社会舆论、团结海内外华人华侨和全世界进步人士等方面，为冲破国际反华舆论的包围、向全世界公正客观地介绍和报道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博得了广大香港同胞和海内外同胞的赞许，成为一家著名的爱国爱港的报纸。中英谈判就交回香港达成协议后，又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香港回归以后，《大公报》继续立足香港，放眼世界，为正确塑造祖国的形象，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既定方针的贯彻执行和香港特区的繁荣和发展，作了全面充分的舆论报道。在此前后，《大公报》还扩大了经营范围，增添了设备，加强了技术改造，先后创办了海外航空版、菲律宾版、电子版

和深圳印刷厂，并使用数码压缩技术传真版面，业务上有了很大改进。成为在香港特区和海内外华人华侨中有很高声望、很高品位的，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既严肃又充满活力的一家大型日报报纸。

不论是内地的那一摊，还是香港的这一摊，都是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事业的继承者，都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她们的每一个业绩，都是整个《大公报》业绩的组成部分、都将载入《〈大公报〉百年史》的史册。

《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的一家创刊逾百年的报纸。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同时也是中国新闻界中含氧量最高的唯一的世界级的品牌。爱护这个品牌，发展这个品牌，使她永葆青春，不断开拓前进，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目 录

第一章 《大公报》的创始时期	1
第一节 《大公报》的诞生	1
第二节 全力投入办报的 英敛之	12
第三节 典型的维新派报刊	26
第四节 以“敢言”著称的报纸 评论	39
第五节 灵活的版面，丰富的 栏目	48
第六节 颇有影响的“白话”	55
第七节 重视女性	58
第二章 辛亥革命后的《大公报》	72
第一节 辛亥革命期间的徘徊	72
第二节 “敢言”本色未变	80
第三节 宗教色彩的增重	88
第四节 英敛之时代后期的 《大公报》	96

第三章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	105
第一节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社会背景	106
第二节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经营管理	114
第三节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业务	140
第四节 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评价	166
第四章 涅槃后的新生	170
第一节 新记公司接办初期的《大公报》	170
第二节 新记公司《大公报》前十年的新闻 与言论	185
第三节 后期新记《大公报》的副刊与专刊	205
第四节 吴鼎昌及其办报思想	221
第五章 由地方报纸发展成全国性大报	226
第一节 向华东华南和西南发展	226
第二节 受到朝野关注的新闻与言论	239
第三节 琳琅满目的副刊与专刊	250
第四节 张季鸾和他的时事评论	261
第五节 获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最佳新闻 事业服务奖	274
第六章 后期的新记公司《大公报》	277
第一节 报馆的经营与事业的发展	277
第二节 后期新记《大公报》的新闻与言论	290
第三节 胡政之和他对《大公报》的贡献	308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出版的内地各版 《大公报》	321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民营报纸的整合和《大公报》 面临的新形势	321

第二节	重庆《大公报》与《重庆日报》	322
第三节	天津《大公报》与《进步日报》	325
第四节	上海《大公报》的新生	332
第五节	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的 合并	341
第六节	《大公报》在北京	345
第七节	北京《大公报》的最后阶段	351
第八章	复刊至“文化大革命”前的香港《大公报》	358
第一节	复刊初期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香港 传媒生态	358
第二节	这一时期《大公报》史上的著名事件	403
第三节	《新晚报》的变迁	413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公报》	418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香港左派传媒	418
第二节	远离香港现实的报道	424
第十章	香港回归过渡时期的《大公报》	437
第一节	新闻业务大有起色	437
第二节	重大事件中的《大公报》	449
第三节	90年代《大公报》的工作方针	464
第四节	《大公报》的经营管理	469
第十一章	走向新世纪	481
第一节	与时俱进 再写新篇	481
第二节	激流勇进 奋发图强	504
第三节	重塑形象 任重道远	523
后 记		534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章 《大公报》的 创始时期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一节 《大公报》的诞生

《大公报》于1902年7月12日创刊于天津。该报创刊不久，即声名鹊起，成为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大报。《大公报》的创始人是英敛之。这家报纸可以说是完全由英一手创办并奠定早期的基础的。

一、英敛之的早期经历

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满洲正红旗人，1867年生于北京。幼年家贫，自云“家世寒微，先代无达者。生长陋巷，耳

目所逮，罔非俗物” 据说他的父亲和长兄都是体力劳动者。因此，英敛之并没有受到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童年虽如学，而四书竟未卒業。”^① 迫不得已，先学武艺，因为八旗子弟习武后可以入军籍，能得到一份粮饷。他在少年时致友人的信函内写道：“予以家贫，亲老无以为养，兼之多事待了，债负满前，每以拙于生计为忧。故自挽弓操臂，俟挑入勇时，得补粮饷，尚为一线之路。所以不惮烦劳，每日挽六力弓逾百磅也。但祝彼苍，倘予苦心，曲赐矜全，则一枝有托，不复奢望矣。”^② 可见，英敛之早年之所以习武，是为生计所迫，是希望得到一个能维持生活的职业。

到20岁左右时，英敛之的学习、生活、思想都发生了重大转变。英在《也是集·自序》中说：“仆一介武夫，不屑于雕虫刻篆。顽石可搬三百斤，弓能挽十二力，马步之射十中其九，每借此自豪。然此等伎俩，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遂弃之，弱冠后知耽文学，则又以泛滥百家，浏览稗史侈渊博；甚至穷两月之目力，读《四库提要》一周，亦足见其涉猎之荒矣。”又自称：“仆弱冠前后，颇喜吟咏。”并在其述志诗中讲：“弱冠事漫游。”^③ 在《金锡侯君年谱叙》中，他又说：“迨弱冠前后，交结多穷苦无聊辈，酒酣耳热，相与抵掌谈天下事。遇奸贪误国、豪暴虐民诸行为，未尝不发指眦裂、痛恨唾骂为之结蟻终宵也。”^④ 马相伯在为英敛之的《万松野入善言录》一书所写的序中也提到：“弱冠后，始得耶稣旧教之书而读之。读之既久且多，因多而疑、而问、而思、而辩、而谦、而信，信岂苟然已哉！”

可见，20岁前后，是英敛之人生中的一个大转折期。

首先是从习武转而学文，由一介武夫而成为文人。从英敛之个人的自述中不难看出，这一段时期是他求知欲最旺的时期。他涉猎

① 《英敛之先生传记资料》，6页，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

② 转引自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3页。

③ 《英敛之先生传记资料》，7页。

④ 英敛之：《金锡侯君年谱叙》，载《大公报》，1908-06-04。

极广，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无不浏览，且“敏而好问，虽未受正式学校教育，而能博学多闻”^①。后来他之所以能诗善文，从事笔墨生涯，主要得力于这时期的刻苦自学。

其次，由于贫困坎坷的生活影响，以及今古群书的熏陶，他目睹当时的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很早就“酿成第二天性”：“愤世嫉俗”。对“奸贪误国、豪暴虐民”的“达官显爵”，尤为痛恨。^②严复曾送他一副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③颇能道出他的襟怀。他本人矢志终身不做官。而对于所谓“忠臣肝胆、侠士心肠诸美德”，则“浸灌脑囊，低徊仰止，一往情深”^④，表现出对腐败政治、黑暗现实的痛恨，以及积极抗争的精神。可以说，英敛之从这个时期起，就在努力探索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并逐渐成为—一个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再次，也是在这个时期，英敛之最终确立了其宗教信仰，成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在博览群书，探索人生真谛的过程中，英氏“尤爱哲学之探究，故虽为青年，而能广涉佛、道、回诸家诸教之书”^⑤。此后，研读了天主教教士汤若望所著的《主制群微》等书，终于在22岁，受洗为天主教教徒。英敛之在信奉了天主教后，自学了法文（当时的天主教中国教区属法国管），从此和天主教以及一些外国神父发生交往，并得交社会名士。此后，其思想和行为总是与天主教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

从总体上来看，这三点转变，促成了英敛之思想境界与社会地位的提高，无意中为其创办《大公报》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1893年，年仅27岁的英敛之突患半身不遂症。次年，中日甲午战起，清军大败。英敛之作有《久病吟》称：“病在肌肤未之忧，病人膏肓复何求！折肱折臂茫无省，一败涂地方知警……庸医杀人

①② 《英敛之先生传记资料》，1页。

③④ 参见英敛之：《金谏笑群潜叙》，载《大公报》，1908-06-04。

⑤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21页。

如儿戏，况复讳疾尤医忌，天下事理古今同，徒薪曲突不为功。”^①在这里，英敛之一方面叹息自身之病苦，一方面感慨国家之积弱难返，一时陷入了悲观失望的境地。

1895年，清廷与日本议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同年5月，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大声疾呼“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很快，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声浪遍及全国，形成了维新运动的高潮。1898年4月，32岁的英敛之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议论国事。文中将北京谚语所说“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发挥，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深表赞佩，说：“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徇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② 这年秋，百日维新失败。康、梁亡命国外，光绪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英敛之恐被株连，离京潜往外地。在去上海的轮船上，巧遇康有为，曾作交谈，但不知姓名。可见，他和康、梁维新派并无联系。他流离颠沛，艰苦备尝，但仍然坚持维新变法的思想。1899年7月，他在维新派在澳门的机关报《知新报》上，发表了《党祸余言》一文，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表示“感痛郁结，情不能已”；对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重新擅权表示愤愤不平。^③

在此期间，英敛之携家带口，颠沛流离，生活十分困难。他在1900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米完柴罄，只余三洋元，每日五口用度，倘事不足，后此实难办理也。”^④ 不得已，这年3月，他去了云南蒙自法国领事馆做文案工作。在他到来以前，蒙自曾发生烧教堂打神父的反洋教事件；英敛之到后又风闻当地群众将继续闹事。随后传来义和团在北方起义以及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北京的消息。

① 英敛之：《也是集·安妻诗存》，大公报馆1967年印。

②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4页。

③ 参见何炳然：《大公报》，见《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介绍》，第5辑，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④ 《英敛之日记遗稿》，12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于是，英敛之便离滇北返，于当年8月回到八国联军占领下的满目疮痍的天津。他在天津困住了一个多月，“目击神伤，不能自己。洋兵骄肆酗酒、盲凌人夺物，日有所闻，更为痛心疾首”^①。在天津一时找不到工作，津京交通又因战祸不畅通，英敛之便携妻带子，于10月中旬借法国“白神父”南行之便，同船到了上海。在上海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英敛之只好给三个外国人做汉语家庭教师，以每月所得“束脩”数十元度日，生活很不安定。六个月后，又离沪返津。

1901年4月，英敛之回到天津。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提议集资开办报馆，邀英敛之主持其事。这样，才开始了他的创办《大公报》的生涯。

二、《大公报》的筹办过程

从上文所述中可以看到，《大公报》的创办虽与英敛之的早期经历有关，但并不是他最初的志向。一直贫、病交加的英敛之，汲汲追求的首先是“一枝所托”，即职业和生活的问题，他并没有想到要办报。反倒是柴天宠的提议，成为《大公报》得以问世的直接原因。柴天宠，字敷霖，是英敛之的天主教教友，资本家。一说柴是一个盐商，还兼营瓦木包工，在天津小洋货街开设建筑材料店，并在西郊设有织布工厂等，经营多种工商业。并且，当时紫竹林教堂的产业和对外事务等也都由他经营管理。因此，柴天宠的财力雄厚，办报集资主要由柴承担。1904年4月26日，即回津的第三天，英敛之见到了柴天宠。柴提出“愿设报馆”，并告知已“集股本逾万元”，承诺“甘为赔垫”^②，约英主持其事，并让英放手去干，不必顾虑赔赚。经过短暂商量之后，英敛之很快就接受了此事，开始了草拟章程、吸资纳股等筹办报纸的活动。

资金来源除柴天宠外，另有一大股东是王郅隆，王字祝三，天

① 《英敛之日记遗稿》，186页。

② 同上书，242页。

津东大沽人。当时他经营元庆木号兼做包工，与柴天宠常有来往。他对这次办报活动也很支持。入股的还有天主教徒、天津法国领事馆高级翻译李敬宇，维新派人士、著名文人严复也入股千元。^①另外，在英敛之日记中有这样一些记载：

1901年5月31日：“柴先生云：股本大局可定。”^②但不久，办报又困难丛生。

6月18日记曰：“予见报馆事难成，欲归去。”^③越两日，办报又有了转机。而这个转机是来自于教堂的支持。

6月20日记：“刘铎云：此事甚佳，我等亦望其成，堂中亦可入股。”^④

6月24日：“晚见刘铎及樊公，说章程，主教允出10股。”^⑤

可见，初期《大公报》实有天主教教堂和主教的股本。到1901年9月9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时，所收股本已经超过了最初所定的万元目标。英敛之在该日的日记中写道：“柴先生言此次股友不意十分踊跃如此，现已收逾万元之数，尚有许多欲入者。保安处连觅数次，至其家，伊母云：亦愿入股。”从以上资料来看，《大公报》是合股经营的。在其筹办时期的资金中，既有一般人的股本，也有不少教堂、主教等的股本。总体上，入股的大多数是天主教教徒。需要点明的是：身为《大公报》创始人的英敛之，当时并无财力入股。在1902年9月25日（阴历八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记有：“柴话股份事，欲代予入五股。”由此可知，英敛之最初连一股也没有。

因当时京、津地区的天主教受法国的控制，所以在报纸筹办过程中还出现了法国政治势力企图插足的一幕。1901年8月4日，英敛之在日记中写道：“遇樊主教，云：……法钦使亦愿入报馆股，

① 参见《英敛之日记遗稿》，512、738页。

② 同上书，236页。

③ 同上书，262页。

④ 同上书，264页。

⑤ 同上书，265页。

但愿开于京中。余思有法钦使，规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觉灵通。但天津诸友，必以为不便设于京中，恐多不愿入股，俟后商之可耳。”^①显然，以“法钦使”为代表的法国政治势力意欲通过入股的方式，来实现插足未来的《大公报》、控制该报的目的。8月9日：“又见主教，据云：报馆在津在京，俟后再议。先于汪公处得柴先生信一函，云：设报馆无论京、津、津友皆愿，但求毋拒我等入股本为幸。”^②8月20日：“见林主教，又见樊主教，云：当速办，现已令梅绘房样。始知欲设堂中，恐大不便。然未遽驳，俟商之津友。”^③可见当时的林、樊两个法国主教很想置《大公报》于教会控制之下，把报馆设在北京天主教堂内。随后，英敛之接连向柴天宠发了两次信函，“询立京堂中，众人愿否”？同时遍商津友。对此事，英敛之的内心显然很是矛盾，既想借助法国政治势力以及教堂的支持，又不愿受其控制；既想拒绝，又不敢直截了当地说不，显得有点软弱。直到8月27日：“李镜宇、柴先生各来信一函，皆云：不可设堂中，以诸多疑难，不能畅行故。遂……复见主教，蒙示以现与钦使商妥，立于津上为便。予即云：此事已定，愈速愈妙，现即备去申购办机器等事。”^④看来是法钦使和主教的思想转变，解了英敛之等人的思想负担。英敛之开始张罗为报馆选房、选主笔、选翻译等具体事宜，并决定到上海去订购机器，聘请主笔。

9月21日，英敛之便携款来到上海，开始操作订购机器、聘请主笔事宜。当时报馆实行主笔制，负编务全责。先拟聘请由上海《中外日报》的汪康年推荐的蒋心斋出任主笔。10月5日（阴历8月23日）晚，汪康年在四马路万年青饭店设宴介绍英、蒋见面。同席的有杭辛斋、汪建斋（汪康年的族弟）等。席间证实了当时

① 《英敛之日记遗稿》，286页。

② 同上书，288页。

③ 同上书，293页。

④ 同上书，298页。

《大公报》的确接受了洋款。因此，“穰及建斋与蒋向予力陈入洋股之弊”。三人极力劝英办报不要有外国人人股参与，话不投机。英敛之在次日的日记中说：“书致穰卿一函，告其不能却洋款情由。”这样，聘主笔的事就有了波折。英在同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写：“晤蒋心斋，询其愿否北上？答云：恐难得昌言之权，故不愿去。予乃告以‘论说’准各具名，不相混淆。俟后再议。”蒋心斋担心言论受钳制，就谢绝了英的邀请。英敛之为此整夜“卧不能寐”。

忽然，汪康年本人主动提出任其主笔，这可谓异峰突起。英敛之10月13日（阴历九月初二日）的日记说：“是日得志尧函云：汪穰卿毛遂自荐，愿去本馆，明日可将合同示予。予得信甚为诧异，意其别有隐衷。日前力阻予，万不可入洋股，谓定受压制。今反欲就，何也？然予以为苟有益于报事，不妨曲从之。因其交游博、声誉隆，况消息灵通，复销售宽广。虽月用百金以上，犹为得也。岂不较碌碌凡庸远过十倍哉？”可见，英敛之对此既心有疑问，又大喜过望，颇愿此事能成。三天后，汪康年将合同寄来。薪水只要“五十元”，但欲“独揽大权”。英敛之是夜又是“卧不成寐”，“挑灯作复穰卿信，并酌改合同。但其与设报宗旨不背，一切小节，予颇可曲从。因开创需人，伊又为老手故也”^①。然而，10月23日，汪又来信表示不干了。理由是：“所议不符初约，深恐不易措手，只得敬谢不敏。”^②虽然汪康年已经明白谢绝了，但英敛之仍不死心。在该日日记中又续写道：“予见其前日晤商情形，似有成议。意其今故作波澜，以要挟大权独握也。”28日，英敛之干脆到汪康年家中面商，商谈的结果是“以索薪水太昂，故不能延至”^③。这样，汪又以索高薪的办法回绝了英敛之。

英在欲聘蒋、汪二人失败后，转而求助于天主教人士马相伯。马相伯曾请张元济推荐人选，张因不愿给满洲旗人办的报纸推荐主

① 《英敛之日记遗稿》，335、336页。

② 同上书，342页。

③ 同上书，347页。

笔，婉言谢绝。这样，英在上海聘请主笔之事毫无结果。他在订购机器和铅字后，便于11月3日登上了回天津的轮船。英在船上阅读《天演论》，心情烦闷。他在11月7日（阴历9月27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心境：“竟日卧，头闷，大不快，甚悔此次之行为大寻苦恼。”

11月底，英敛之再次来到上海，仍请汪康年、马相伯等人帮助解决主笔问题。这次，汪康年推荐了方守六。双方见面、提条件、订合同，很快就谈妥了，方守六算是帮助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的第一位主笔。不过，英敛之对此人并不满意，这在无意中迫使英敛之自己担当起主笔的重任。在其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12月4日（阴历十月二十四日）：“晤汪穰卿，伊忙甚，与之略语，请伊代约方某。”

6日：“七点，穰卿偕方守六同至，饭时言报事。令方自写一合同权限。”

7日：“晤方守六，谈少时，伊告数日后订一合同相商。”

11日（阴历十一月初一日）：“得香港胡翼南函，主笔实难其选。”

13日（阴历十一月初三日）：“是晨，接邓嘉生农部信，言现代荐一主笔，群空西北，美尽东南，惟未言谁何耳。”

16日：“张菊生至，与之话，示其各信。伊云：现仍未觅有堪膺主笔之任者。”

1902年1月2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过汪穰卿馆，谈方事，告以权不能独操，薪水月出五十两。”

8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得汪穰卿函云：方守六愿去津，亦无成见，但以薪水月五十两恐不敷开销。”

次日，英敛之见汪康年，“谈方事，予告以现可姑定五十金，俟后报务畅兴，定多为加酬”。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三点：

第一，当时选聘一合适之主笔是件相当艰难的事。英敛之两下上海，意欲寻觅一个像蒋智由、汪康年一样有知名度、有办报经验

的人，充任新《大公报》的主笔。他遍求马相伯、张元济、汪康年等名人推荐，但始终没有找到合格的主笔。

第二，对汪康年推荐的方守六，英敛之并不看好。在汪康年让两人见面后，是英敛之“令”其写合同。“令”字中透漏着居高临下的权威，这与英敛之逢汪必用“请”字截然不同；随后，在谈薪水时，英敛之将此人的身价定死在“薪水月五十两”，并明讲不许其独揽大权，可见此人资历很浅。就在两人协商合同期间，英敛之仍请他人推荐主笔人选，这本身就说明英敛之对方守六能否担起主笔重任很是怀疑，进而，英干脆借张元济之口，断定此人不“堪膺主笔之任”。

第三，方守六是英敛之无可奈何的选择。报纸必须有一主笔之人！在“可曲从”之而聘汪康年不得的背景下，英敛之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方守六做了《大公报》的首任主笔。1902年4月上旬，英借方守六乘船回天津。方守六虽是《大公报》的第一位主笔，但他并没有充分地履行其职责，以至于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之际，发出了“人皆外行，中用者太少”的慨叹。因而，报纸创刊后，一直由英自任总理兼撰述和编辑，总揽言论和经营之全权，报纸的重要言论都出自其手。后来担任主笔的还有在天津聘请的刘孟扬、王瀛洲、郭定森、樊子容、唐梦幻等，也都未能取代英敛之的实际作用。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事实，那就是：在民国之前十年间，《大公报》实际上的总主笔就是英敛之本人。这一事实与英敛之苦寻主笔的经历相映成趣：“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实际上的主笔却是他自己！

三、《大公报》的创刊及其宗旨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筹划，《大公报》终于要而世了。从1902年6月初开始，《大公报》进入了试印、准备正式出报阶段。英敛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6月9日（阴历五月初四日）：“是日试印各件”。

10日：“早校各件，忙碌甚。大概初十日（阳历六月十五日）

仍不能出报。”

13日：“原定初十日出报，因各项天齐，拟改十二日。”

16日（阴历五月十一日）：“备明日出第一号报……照料各事如穿梭。九点大风雨，稿犹不齐，甚急。近两点，折报，粘邮票。缘人皆外行，中用者太少，故甚操劳也。共印二千八百分，午始印毕。午后稍卧……夜十二点，版尚未妥，甚焦急。”

此后几日的日记所记的都是“竟日忙忙”、“昨夜未卧”、“天明始卧”等了了数字，可见当时英敛之等人的紧张与劳累。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就在这一片忙乱中间世了。为了引人注目，创刊时赠阅七天。社址在天津法国租界内的哈尔滨大道上。

该报创刊时，竹纸印，书版式，直排，细线版框，日出8面16版块。每天除报头、广告占三面外，大约刊登各种消息、文章一万多字。它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国外如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都有代销点。开始时，日印3800份，三个月后，增至5000份，成为当时华北地区一份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版面、栏目的安排是：第一版是报头占半边，“大公报”三字为隶书，直排，其上方有法文名字“L'Impartial”（意译为“无私”）。报头两边刊有中西历年月日。报头左边的半版初登《本报代派处》，以后多是登广告。从第二版往后，依次刊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路透电报、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译件、附件、广告等栏目。

在创刊号的《大公报序》中，就报名的释意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并要“扩大公无我之怀”，“移风易俗，民富国强”。

至于该报的宗旨，英敛之在《大公报序》中说：“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申言：“其他乖谬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褻、琐屑之事，在所摈焉。”^①他

^① 《再讲看报的好处》，载《大公报》，1902-06-23。

主张多登“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①的文字和议论。

在《大公报千号祝词》中，英敛之再次提出《大公报》的宗旨是：“开风气，膺民智，通上下之情，作四民之气”，并揭示其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救危亡，消祸患，兴利除弊，力图富强”。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二节 全力投入办报的英敛之

1901年6月15日，即柴天宠提议办报后不到两个月，英敛之又得知北京天主教北堂请他去“办理紧要文件，薪水从丰”的信息，他推辞说：“此间报馆事已有头绪，中辍颇为可惜。”可见，当时经济并不宽裕的英敛之最感兴趣的已经不是丰厚的薪水，而是办报了。英敛之本无意于办报，但当他接受了柴天宠的提议后，显然激发了他办报的激情，因而他才不辞辛苦，为《大公报》的出版与发展呕心沥血、百折不挠。

一、度过创业艰辛，奠定“大公”风格

在创刊后一二年内的创始时期，《大公报》是在内外交困中度过过的。从创刊之日起，《大公报》即积极宣传反帝爱国、维新变革，反对封建专制、强权，抨击官僚腐败、风气堕落……这些无疑都在触怒当道，自然而然地遭到了封建官僚、租界当局乃至《大公报》内部某些人的强烈不满。英敛之面对诸多压力，虽然频生去意，但始终不为所屈，从没改变过办报初衷。在与方方面面压力的抗击中，形成了《大公报》特有的敢言、爱国、严肃等良好风格，并以此著称于时。

1902年8月27日，《大公报》在“中外近事”栏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纪大私报》，内称：“《大公报》开创以来，甫及两

^① 英敛之：《大公报序》，载《大公报》，1902-06-17。

月，一纸风行，颇蒙海内推许。销路之畅，进步之速，初非本馆同人始愿所及。惟公论所在，不敢稍涉循隐。致有某数巨公颇滋不悦。每与人论及本报，辄易其名曰大私报……至有为本报解者曰：公者见之谓之公，私者见之谓之私。则未免反置太过，直令其某诸公无容身之地，非本报馆所敢闻命矣！”同日，英敛之在日记中写道：“是早，律师林文德来，以一书代为胡侍郎辩白，嘱登报。意胡见本报揭其短后，经营一月之久，始得此法。”随后，在28日和29日，又连续两日在报首的《本馆特白》中进一步指出：“乃忌者不解以正理相胜，而设法诬毁。影响之谈，不值识者一笑！”这是在《大公报》创刊未及三个月时，该报受到所谓“忌者”和“某某数巨公”毁谤后进行的公开驳斥。看来，该报经常讥讽时弊、痛斥豪暴，的确得罪了很多“巨公”，因此，来自清廷官方和权贵的压力一定不小。

与此同时，当初汪康年所谓的“入洋股之弊”“谓其定受压制”等预言也开始应验了。《大公报》从创刊之日起，就是既反奸官误国，又反帝国主义入侵，始终以爱国主义作为自己办报的主旋律。对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进行揭露，很快遭到了该报洋股东们的压制。阴历7月18日，即《大公报》出版两个月后，英敛之在日记中道：“晤林主教，嘱以报上不合诸端。”20日又说：“予因外来种种阻滞，甚不快。帮忙人无有，指摘人何其多也！”22日记有：“发朱致尧一函，略告其近日内阻各情。”次日则曰：“连日大不快，投务颇有起色，而阻挠纷来，未出所料也。”后又提到：“时时担虑领事官之诘责，殊可叹也。”^①此类责难，不仅有来自法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1903年1月15日，英敛之记道：“柴先生言报上德人搅扰事，领事官询问。”事隔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大公报》代法国人德木兰所办的报纸印报，法领事官极力反对，却又大耍两面派，使英敛之既愤慨又无奈。1904年2月1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柴先生来，告

① 《英敛之日记遗稿》，586页。

以北京法钦差有信至北堂，不准与德木兰代印报章。如印，则将予押监，并罚法郎数千云云。何其可笑之甚！法人印报，而法官府不能阻止，当且以好言谏之，而背地则恫吓中国人如此！何其无理若此！中国人当此积弱之余，公理昏昧之日，为其国民者，复何能为力哉！”次日，德木兰仍催工人为他再印一次。英敛之不愿冒险触怒“法钦差”，只好“暗令工人避去”，他自己也“出游，避之”。从这些记录上可以看出，当时报馆设在租界，又有洋人和教堂的股份，因而不可避免地有来自洋人和教堂的诸多压力和干扰。

在此期间，报馆内部的纷争也接连不断。1902年7月9日，英敛之在日记中说：“早，柴先生来，言张寿峰以不用其所荐人，怒甚，欲将其股份提出，语多极可笑者。”报纸创刊四个月后，报馆在行政和经营方面也开始暴露出问题来。当年阴历九月二十日记有：“饭后拟馆中整顿事，刻下非大加裁减不可！”同月26日记：“每日所出之报，不敷纸价”。不久，又出现了排字工人集体“不辞而去”并损坏机器的事件……在内外交困中，有不少股东不安其位，威胁到了报纸的继续生存。其时，最为支持英敛之的是王郅隆和柴天宠。在1902年阴历八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记有王郅隆的话说：“他股友有懈怠，皆无关紧要，独我一人再出一二万金，亦甚愿也。”同月22日，柴天宠亦增股3500元，并招他人入股。两天后即24日，柴天宠想调整一下股本的情况，并想为英敛之代人五股。英表示：“予意实不在此。如有能者，甚愿让此席。”柴随即说：“此后万不可作此语。再作此想，如害我命！”在报纸人不敷出之际，“柴先生……告以自管放心，断不能一时中止。”这些都见于当日的日记。

虽有朋友的一再鼓励，英敛之在“劳心劳力受苦，而入不谓然”的情形下，很容易“心灰意懒，颓思他去”。但在众多压力与干扰之下，英敛之即使有“去意颇笃”之心，也不曾曲意逢迎这些施压者。从这两年的报纸版面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公报》始终保持了创刊时所奠定的特色。英敛之将此时的艰难困苦都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在行动上则坚定地把握报纸的方向，而不为压力

所改变。

如果说，在《大公报》创办之前，英敛之无意于办报的话，那么，《大公报》创办后，英敛之却是在全力以赴地办报，从此，《大公报》与英敛之一起声名鹊起。一方面，《大公报》为英敛之提供了一个发挥自己独特的办报才能的舞台，使之蜚声海内外，成为近代中国新闻事业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另一方面，英敛之始终把握、坚持《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与方向，从经营、管理以及言论等各个方面奠定了《大公报》独立于世的基础，并迅速形成了以敢言、严肃、热心公益等著称的资产阶级大报，名重一时，在中国清末的政治、文化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三次考察，四篇游记

从1905年到1908年，英敛之曾经三次出外考察，写了四篇游记。这是英敛之报刊生涯中比较重大的事情，对其思想观点以及报刊实践都产生过影响。

第一次是1905年东游日本。这年的4月23日，英敛之应邀去日本考察，于7月2日回国，历时两个多月。他本想回国后将所写游记编一本《借镜录》，作为日后“考镜之资”。旋以“琐务纠缠”，把它搁置下了。事过境迁，书稿也都“尘封蚀蠹”，只留下《西京游记》和《日光游记》二文，从1906年8月5日起，在《大公报》“论说”栏中连载。

西京又名京都，公元794年到1869年为日本首都，历史悠久，文物鼎盛。英敛之在这里参观了大悲阁、天魔观、博览会、帝国大学等。虽然只是“小留数日，匆匆一观”，但感触颇多：“街市之整齐，人民之乐利，奇不欺诈，人无游惰”，几乎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地步。特别使他感到惊奇的是，那时日俄战争打得正酣，没到日本的人，必以为“国内骚扰，民不聊生”，及至入其市，“熙攘如故也”，游其野，则“晏恬如故也”，似乎根本不知道本国正在与别国打仗。但当你向他们问到国家大事时，“则又言东三省事甚详。非麻木痿痹，冥顽无灵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

们达到了如此文明的境地呢？英敛之说：“日本之有今日效果，固收获于西法，尤在善能舍短取长，实事求是。而教育普及，实植其基焉。”

日本不仅社会文明，景致也绝佳。英敛之在游日光时曾随吟一绝：“笑我身非归隐辈，乍临奇境触幽怀；无多清福难奢望，但愿偷闲岁一来。”留恋之情溢于笔端。

基于对日本由衷的好感，英敛之很自然地在《西京游记》中积极呼吁：“中日两国诚有唇齿辅车之势，合之两美，离之两伤”，“和亲辑睦之不可缓”。英敛之自日本归来后，《大公报》赞同日本的言论的确是明显增多了。与此同时，英敛之与法国的关系在疏远。1906年3月，柴天宠告诉英敛之法国人要收回《大公报》的“馆房”，请大公报馆搬家。同时，法国领事馆翻译李敬宇也要撤股。^①随后，英敛之借款万元，在日本租界内的四面钟对过自建馆房。到9月5日，《大公报》由法租界迁到了日本租界新址。就此，前入一般把英敛之游日作为《大公报》“由亲法到亲日”的标志。^②

其实，《大公报》在对待法国方面，由最初的亲近到1906年后的疏远是实。但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并非是由“讥讽”转变为亲近，与日本的“亲近的关系”，也不是如王芸生所说的“开始于1905年4月”，而是创刊之初就有所表现。《大公报》初创之际，就有来自日本人的祝贺，却未见来自法国人的祝贺。创刊号上，刊在英敛之《大公报序》后的有一篇《祝辞》，署名为“瀛客收卷次郎”。他在演绎《大公报》之宗旨时，在“通上下之气、拓见闻”之外，多了一个“去畛域之私，存是非之公”的解释，无非是希望中国人不要敌视日本。创刊后，在《大公报》的“译件代论”和“译件”中，经常可以看到日文报纸关于中国的文章和评论。在对

^① 参见《英敛之日记遗稿》，1018页。

^② 参见于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31页。

待日俄问题上，确如王芸生所言，英敛之和《大公报》一贯反俄而亲日。另外，英敛之本人与个别日本人也确实有私交。这在他的日记中记载得很清楚，英敛之有一个至交方药雨，此人是日本在天津开办的《日日新闻》报的社长兼主笔。英敛之的这次日本之行，就是经由此人牵线搭桥得以实现的。

英敛之去日本的背景是：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很大进展，已是胜券在握。这时，《大公报》在北方舆论界的声望已经很高了。日本人看到了这一点，想拉拢她，就不断对她表示友好。1905年4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英敛之在日记中写道：“闻是高尾亨及小村俊三郎（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两个高级官员）连访二次，且邀神户馆晚餐。七点至彼……席间高尾、小村力劝予游日本，并言内田公使、伊集院总领事为予作函介绍。十二点散归。”他们这次宴会座谈，达五小时之久。4月5日（三月初一日），日记又云：“昨午后至日本领事馆，晤高尾、小村，仍力劝予必须于月中去彼国一考查。政界意旨，日俄战后，中东必须联盟，整顿东三省事宜。予系北方清议之望，较他报不同，此行于两国实有所关云云。”说明日本方面对英敛之和《大公报》都十分看重。当然，英敛之与《大公报》一贯的亲日倾向，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是日本人极力促成此行的前提因素。

1906年6月27日，英敛之联合在天津出版的3家日本人在天津所办报纸的发行人是立传一郎（《北洋日报》）、木村笃（《北支那每日新闻报》）、方药雨、津村宣光（《天津日日新闻》）等，倡议在天津成立“报馆俱乐部”，以作为“研究报务，交换知识”及“燕息欢娱”之地，并于7月1日，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了《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一文，宣称：“事务之理，待纷争而始明；社会之事，赖合群而始成。报馆一业，何独不然？……在东西文明之国，莫不有报馆俱乐部之设，以为集思广益之地。犹中国各帮中皆有公所，各业皆有会馆，各报主笔及办事之人，以时齐集，研究报务交换知识之余，诗酒征逐，尔汝欢洽；平生辩难攻击如水火者，握手拍肩，情如兄弟，共化党同之见，而去门户之异……某等近有所感

于时局，拟于天津纠集同业，开设俱乐部，以为燕息欢娱地。”在此文登出的当天下午6时，天津报馆俱乐部即在天津日本租界旭街芙蓉馆举行第一次集会，宣布该俱乐部正式成立。会上决定以后每月开会一次，下次集会由英敛之等负责召集。这样，英敛之又首倡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天津的“报馆俱乐部”，并称：“中东两邦，兄弟之国也。现遇西力东渐之机，风潮日迫，旦不计夕。两邦报馆处此际，宜如何提倡极论以联两国之欢，而塞异种之覬覦。”这说明，英敛之还想运用他在舆论界的声望，积极促进中日两国的邦交。

1907年冬，英敛之回到北京做了视察，并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北京视察识小录》，在11月26日、27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一个月后，12月25日，他又发表了《续北京识小录》。他自谦说：皆是“琐碎无关紧要之谈”。其实，言虽小，可以喻大。它的特点是，不为“夸言空论”，但记社会中急需改良的“最近事实”，把它公布于众，希望引起广泛的注意。因写实性强，生动形象，发人警醒，所以颇受读者欢迎。

当时，清政府已经实行“新政”多年，并于1905年宣布要仿行“立宪”。而究其实，朝野上下，偷惰苟安，泄泄沓沓，一仍从前之旧习，毫无更改于其间。这一点从“识小录”中看得很清楚。清政府从《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丧权赔款，国破民穷，而高官大吏们，荒嬉如旧。英敛之在《饭馆之发达》一文中揭露道：南城外酒楼饭馆，每到晚间，车马盈门，几无插足之地。听仆从之喧呼，“非某新衙门之某大人，即某新部之某老爷”，而这些人所津津乐道者，“非戏园之品评，即娼寮之谈判”。英敛之慨叹道：“不图大创奇辱后，而骄奢淫逸之景象，竟如此其速复！”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风气一样地败坏。当时上自“王公贵官”，下至“走卒乞丐”，莫不人手一烟枪，以鸣得意。一天晚上，英敛之行经某街转弯处时，忽见星火磷磷，红成一片，仔细一看，“则行路者十数人，人衔一烟，蠕蠕以步也”。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甚至五六岁之“童男童女”，“亦翘首衔烟，喷云吐雾”。英敛之讽刺道：“此即中国变法

之现相，而跨灶突前，各国亦未能比其勇猛精进也。”

“识小录”见报后，读者反映强烈。有人还仿效英敛之，写了《天津观察识小录》和《续北京观察识小录》，寄给该报发表。

英敛之的第三次出外考察，是1908年冬到东北去了一趟，写了《关外旅行小记》，从11月28日到12月8日在《大公报》上连载。这次考察历时不到半个月，所见所闻“不过什一于千百”，但使他“伤心”、“痛哭”的事却很多很多。

原来，英敛之想从塘沽坐船去营口，但见“鸠形菜色”之男女，舱内外皆满，拥挤不堪，几无插足之地。坐在船舱里的人毫无遮避，遇风雨只能任其吹淋。听说不久前遇大风，被浪卷入海中者七八人。如是已不止一次。英敛之不胜感伤地说：“呜呼，中国人命之贱，乃若是乎。往年读《黑奴吁天录》，至其形容惨苦之状，每泣不可抑。今日目击而身遇之矣。呜呼，安得我贤明长官，于夙夜勤劳之外，一察及此，为约束限制之，以保我民命哉！”鉴于这种糟糕的情况，英敛之决定弃船，改乘火车去营口。

在考察完东北回天津的火车上，所见种种更令英敛之“气闷”。从沈阳到营口，中国和日本的铁路各一。他把二者做了比较：日本之车极洁净，中国之车极污秽；日本车有暖管，中国车有炉无火，乃空设；日本三等客多时，则添车，中国三等客位，待之不如“猪狗”。

英敛之从火车想到邮政，从邮政想到电报、银行等，均与日本人所办各项业务相比，“莫不条条相反，大相径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英敛之说：“中外政治之异点，于根源处迥不相谋。一则用人行政，量才称能，顾惜舆论，自不得不以国利民福为目的。一则用人行政，情面贿赂，不恤人言，良资本之多寡，视情面之轻重，以为相当之补偿……呜呼，一国而演成此鬼蜮世界，人人自私，同群相贼，欲竞争列强，生存大地，得乎！”

总之，日本之行，英敛之目睹了资本主义改革给日本带来的繁荣昌盛的生动局面，而北京、东北之行，则使他切实体会到了中国受封建主义的禁锢所形成的残败落后，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

使英敛之更加渴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走一条君主立宪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英敛之在政治观点上始终坚持两点：一是中国必须进行变法维新，反对封建专制；二是主张君主立宪、和平改革、反对暴力革命。

三、新闻思想及经营特色

英敛之认为，报纸乃“近世文明之原动力也。其笔锋之所至，则有利用人类所禀有之喜怒哀乐爱憎，以左右之……其记述之所及，则有陶冶国家所固有之政治、风俗、人情，以转移之”。其影响力之大，是宗教、权势等也不能比及的。“凡势力所能及、感化所能到者，皆莫非新闻纸活动范围之内。”^①因此，英敛之格外积极地提倡多开报馆。他认为，报馆之多少，关系国民之智慧，国家之强弱。报馆多，国必强；报纸畅，民必智。五百年中，东西大事，几若借报纸为转移者。《大公报》创刊后第六天就发表了《原报》，历述中外报纸之源流、意义、作用以及东西各国报馆林立，人民“视报纸竟如性命，若与水火饮食同为养生之具者”。文章最后，在具体介绍了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人力车夫踊跃读报的感人场景之后，说：“吾国士大夫曾一日本苦力之若；夫亦可以自返矣。”为此，该报反反复复宣传读报的好处，说：“惟彼报纸，纪事物之蕃变，而不胶一格，言天下之至动，而不主故常。读之者既能增拓见闻，感发志气，外以观物，内以自审。浸淫久之，遂有无数新智识、新理想出于其中。然后思想之力恢张于无穷，而将来之结果，必且超越乎古今，笼盖乎中外焉。”因此，它大声疾呼：希望兵士、农工商贾、妇人孺子，“莫不能阅报，莫不视报为三字经、为百家姓、为感应篇、为阴饗文、为聊斋志异、为三国演义。世有以予言为然者乎，请以阅报人数之多寡与报馆之有无推广卜之也”^②。

^① 《论新闻纸之势力》，载《大公报》，1908-08-24。

^② 《论阅报之益》，载《大公报》，1902-07-07。

英敛之强调，报纸的责任“一为国民的向导，一为政府的监督”。如何做国民的向导？“国民的智识未开，报可以开智识；国民的见闻未广，报可以广见闻。”如何做政府的监督？“政府有不对的事，报可以驳论之，政府有没有见到的事，报可以提醒之。可是有一节，遇见国家有当跟外国争回国权的事，如果国家的理直，我们也当帮着政府说话，不可一味的总挑国家的错儿，架着炮往里打。”^①

英敛之强烈反对清政府压制言论的做法，一再发表文字，争取新闻自由。

1902年冬，某道员条陈“严设报律，以肃视听”，反对报纸监督政府。对此，《大公报》连连发表文章表示反对，并逐个批驳了条陈中所提出的各种借口和理由，指出清政府之所以急于定报律，目的在于“售阻挠之术，以图博顽固之快”^②；在于“借此以钳制天下人之口，以遂其一二人之私”；在于借口“仿照外国之例，趁此严加束缚，使业报者渐即消亡，而不敢大张旗鼓”^③。

1906年10月，清政府警部公布了《报馆应守规则九条》。1907年1月，两广总督周馥又颁发暂行报律“三条”。《大公报》指出，这些报律“其最为缺点之处曰笼统，曰含浑”：“如该律所云毁谤国家与议论政治之类是也。例如说政府之腐败，论倚托之非人，此议论政治之事也。然深文而周内之，即以为毁谤国家，抑又何辞以解。欲加之罪，不患无词。况界于几希疑似之间乎！”“总之，笼统与含浑，二者实官场殃民之不二法门，而商业家之阱陷罟获也。”^④

1907年6月，清廷参劾枢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明诏查办。《大公报》转载了《顺天时报》的《论参劾枢臣暗通报馆事》，并加

① 《说国家思想》，载《大公报》，1904-09-01

② 《严设报律问题》，载《大公报》，1902-11-23

③ 《论中国定报律》，载《大公报》，1903-10-31

④ 《粤督周玉加所颁报律书后》，载《大公报》，1907-01-26。

《本馆附志》，说：“恭绎报馆之宠被纶音，自戊戌至今，盖经三次。初则曰斯文败类，是其流品久经明定之矣。再则曰报馆文章，是其芜杂已为昭揭之矣；今则曰暗通报馆，一似报馆为藏垢纳污、巨奸大滑之渊藪矣。然今之四字，固非较前有所增损，特犹是前此一贯而下之看待也。”^①

1907年8月26日，清政府民政部责令不久前在北京创刊的《京报》“停止出版”。28日，《大公报》以《纪停刊京报》为题作了报道，并加按语说：“该报自出版以来，多就事实著论，不为张大其词，颇称日报体裁。乃刊行未久，遽予停止。其个中原因，本报虽无从摸索，然今日报界，为人所大好之者，即为官场大恶之；为人所小好之者，亦即为官场小恶之，是其比例也。呜呼，预备立宪之效果，如是如是。”次日，又发闲评：“《京报》之停版，为出人意意外乎？曰否否……该报蛰于鞞毂之下，以匹夫之贱，而敢对于朝贵权要漫相呵责，日事吹求，其蓄怨而招忌也固矣。”此报能无所畏惧，“有傲骨，无媚舌，难乎免宁今之世矣。呜呼，悠悠苍天，茫茫前路，吾不能无兔死之悲！”当时，上海有许多报馆，“皆议朝政，指摘官邪，连篇累牍，不惮烦言”，却很少遭到封闭。有人解答说：“上海各报馆，多挂洋商旗号，恃有西人为护符，故当道敢怒不敢言，示以特别之优待。”对此，该报不胜感慨地说：“噫，信如此说，则是假手外族，转得万全，托足中邦，终必一败。引斯民以离心之渐，开通国以解休之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其流弊尚有极哉。初不料预备立宪之时，乃竟有是倒行逆施之举！”^②

1909年以后，清政府大肆封禁报刊。这一年的9月15日，仅一天之内，就封闭了《北京国报》和《大同日报》两家报刊。9月17日，《大公报》连续发表《呜呼北京之报界》（要闻）、《怪哉一日而封两报馆》（闲评）、《哀哉今日之报界！》（言论）。9月和

① 《论参劾枢臣暗通报馆事》，载《大公报》，1907-06-23。

② 《论京师封禁报馆》，载《大公报》，1907-09-18。

11月，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于右任办的《民呼》、《民吁》二报连遭封闭。它的闲评说：“去《民呼》封禁时，为时不过两月余。夫呼之为言，曰大声疾呼，其扰人清睡，封之犹可言也。至于吁，仅吁嘘喘息而已。哀哉，吾民吁亦不准吁耶！”^①

但是，当时的新闻界，有的“不但不能开通民智，且于愚民所迷信之邪说异端而推波助澜，津津乐道”^②；有的“以卑鄙龌龊之身，滥厕笔削清议之席；恩怨偏私，糊涂满纸；恫吓敲诈，拉杂成篇”^③；有的“主持笔政者，聋其耳、瞽其目而盲其心……问其宗旨，则曰兴利除弊也。而其见诸报纸之宗旨，则为诱嫖海淫，直等于俗所谓妖狐之献媚”^④。对于这种状况，英敛之明确表示：“栏有瘟牛，群牛皆病；邻有疯犬，村犬皆灾。不灭星星之火，燎原堪虞，不塞涓涓细流，溃堤必见。是消灾弭患者，尤在杜渐防微也……今予婆心不死，敢为我同胞正告一言曰：君子为善日休，小人作恶日拙。尚望我同胞猛著先鞭，力反恶习旧染污俗，咸与维新。”^⑤因此，英敛之在大声疾呼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公开痛斥那些不良报纸，报人和报风，提倡新闻道德。

英敛之在《保存国粹》一文中说道：“至于报馆掌文职、国民之向导，启迪诱掖，影响于社会者，甚速且大。居斯席者，虽不必淹贯中西，然见识亦须加人一等，或烛事于几无，或消患于萌始，不能同流合污，取媚俗人。倘滥厕匪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则贻害于社会者曷极？或有学识，碎欠开通，心术尚颇诚恳，有时偶涉错误，犹可冀其改过，则不失为善补过之君子；独至一等依阿趋附之辈，故为反对真理，呵垢新学，以自鸣其保存国粹之心，揣其意，未尝不知西学之利实用，中学之逞空谈也，以为不如是，则不得上宪之欢心，无以谋其升斗，而阉隔风气，闭塞民智，非所计

① 《闲评一》，载《大公报》，1909-11-23。

② 《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载《大公报》，1903-09-12。

③ 《说报》，载《大公报》，1904-01-06。

④ 《论今日中国之三大怪相》，载《大公报》，1904-03-03。

⑤ 《说报》，载《大公报》，1904-01-06。

也。此辈直无是非之心，而惟以上宪之还恶为是非，水母日虾，可伶孰甚！”可见，英敛之认为，在当时维新变法之际，报纸可以作为最有效之工具，但也可以成为进步之阻力。

英敛之又在《说报》一文中极言国家需要正当之言论：“西国誉报章为政府监督，中国晋主笔为斯文败类。夫报者，诚一国之代表者也。国民程度高下，智识之闭塞，风俗之美恶，要以报馆之多寡，销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微之。西国之所以监督之者，中国之所以败类之者，推求其故，莫不皆有致之原因。有人焉古今成绩之得失，中西政治之优劣！全局在胸，了若观火；陈一义也，而天下莫不或谣；发一言也，而是非因之以定，彰善殛恶，激浊扬清，心如鉴衡，目同秋水，夫安得不政府监督？……人乐放僻邪侈也，而后助纣为虐；民信异端邪说也，而更推波助澜，鄙俚无词，互相标榜，狎褻丑态，自鸣得意，夫安得而不斯文败类！”

早在1902年，英敛之就注意到了英国《泰晤士报》的办报经验，很钦羡地说：“观该报之所以刊报章登报纸者，皆备弥求备，精益求精。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文甫脱稿，电已飞驰。一日而籀读者三十万。此西人所以智识日开，学向日进，阅历愈广，技艺益精者，报之功也。”^①1908年，《大公报》又着重介绍英国报纸对新闻报道的三大特色说：“一日真实，二日正直，三日公平，而且具有教训的性质。故英人称之为国民教化之大机关。”^②英敛之希望中国报纸也能完备如斯，担起重任。

1912年前的《大公报》的经营管理工作，也都是由英敛之独力承担的。在其经理下，《大公报》很快成熟起来，业务不断扩大，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大公报》的发行是订阅与零售并重的，这在每年的催交报资

^① 《拟仿英国泰晤士日报例各省户蒙设官司报局以开风气说》，载《大公报》，1902-12-22。

^② 《论新闻纸之势力》，载《大公报》，1908-04-25。

的告白中，以及各阅报处、报摊零售处的广告中，清晰可见。其发行量一直保持着蒸蒸日上的趋势，最初日印3800份，三个月后，增加到5000份，成为当时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1909年7月29日，该报曾自称：“若说舆论是多数，然则本报销行，实算是京津第一。”

《大公报》的读者范围遍及全国，这在登读者回信的“来函”中能够体现，但范围主要在京津地区，因此，其报纸代派处多在此处。另外，从其广告客户所在地来看，也多是在京津地区的工商业者。因该报在北方报界中的声誉旺盛，所以当时京津地区新出版的报纸大都选择在该报上登载创刊广告。这样，在无意中，该报的报纸创刊广告，还反应了当时京津地区的报业发展状况。

民国前的《大公报》，几乎每年都举行“有奖征文”活动。征文由《大公报》命题，在报上刊出，让读者广泛参与，各抒己见，然后，在所交征文中选出获奖者，分别出一二三等，给予不同的奖金，并有选择地在报上刊登这些文章。从英敛之日记中可以看出，至少《大公报》创刊后五年内的征文活动都是英敛之一手策划的，从选题到阅读、挑选、分等级，他都事必躬亲。因此，从某个角度上讲，这些征文反映的是英敛之的思想。获奖者中，有来自河南的，还有来自湖北的，可见当时读者参与此活动是广泛而热烈的。并且，这种活动在当时报界并不多见，按英敛之自己所说是“绝无仅有”。所以，该报是开了中国报纸此类活动的先河。

除了出版《大公报》、偶尔为他报代印报章外，英敛之还善于利用《大公报》的机器设备等条件进行多种经营活动。从其经常出现“本报特白”和天天附于报首下方的广告中可以看出，出售纸张、文具，代印名片、告白、银票等是其常年的内容，偶尔也出售各类书籍、刊物等，出版“一切华洋书籍”也在其经营范围。根据《大公报》报上所显示的信息，至少，《大公报》社曾经印刷出版过《新政铨解》、《吕氏三姐妹集》、《敝帚千金》，英敛之本人的《也是集》、《劝学罪言》，宣扬天主教的《主制群微》、《辩学遗牍》等书籍，在社会上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节 典型的维新派报刊

王芸生曾经撰文道：“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就说：‘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旧大公报主张君主立宪，大体上赞同维新，重视西洋科学知识，这些都和《新民丛报》气味相投。”^①《大公报》具有那个时期维新派报纸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是一张典型的维新派报纸。

一、提倡爱国图强，反对列强侵略

《大公报》首先是一份爱国主义的报纸。从创刊时起，就经常发表文论，分析中国当时为列强所虎视的危机局面，呼吁救亡图存，变法自强。

针对社会民众不关心国家，麻木不仁的现象，该报屡屡撰文，或比喻、或痛斥，以期唤醒大家的爱国热情。英敛之有一文讲爱国心，直言当时中国人之缺乏爱国心，乃由于专制政体。“国者何？民众团体之所由成也。爱国心者何？思所以固结团体，保持爱护之也。保持爱护者何？不使异族侵害我之自由，致失其权利也。谁人当具爱国心？凡属人类，无不当有之也。爱国心公乎？私乎？曰：爱国心纯全出于自私自利，而非矫揉强勉，使之生发者也。然则我中国人爱国心，何以若是其弱薄？曰：以国家为一人之私物，难责以人人真爱之；以国家为公共物，则人人不得不爱之。西儒谓专制之国，爱其国者，只有一人，其是之谓也。”

与其他报刊所不同的是，该报还把爱国心的缺乏与宗教相联系，认为是“无纯正宗教”来维系人心的结果。英敛之在《有无

^①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39页。

爱国心之派别》中说：“夫政尚压制，则迫民无爱国心；官贪吏横，则驱民无爱国心；无纯正宗教，则民昏昧涣散，而不能有爱国心。”

《大公报》是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以后不久创刊的。那时，清政府实际上成了“洋人的朝廷”，因此，宣传救亡图存，成为提倡爱国图强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课题，对此，《大公报》做了不少工作。它反对沙俄长期侵占我国东三省，谴责英属南非当局虐待华工暴行，特别是坚决支持反美华工拒约运动。此外，该报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方面，言辞激烈，发人深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掠夺从商品输出迅速过渡为资本输出，一是通过投资，直接在我国经营厂矿企业；二是通过有息贷款，间接控制我国的路权、矿权，所以，这个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在收回利权问题上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非常尖锐。

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以路权斗争为最激烈，它最早发生在粤汉铁路。《大公报》从1904年11月9日起，连续五天转载了《中外日报》的《详志粤汉铁路废约始末》。后来，又一再发表粤、湘、鄂等省绅商和留日学生的公启、函件等，坚决要求清政府把路权从美国人手中赎回来。此外，该报还经常发表评论、文章，积极支持浙江、江苏、直隶、山西、云南、四川等省人民收回苏杭、津镇、同蒲、浦蜀等路权的斗争。1908年，清政府借“官办”、“国有”之名，大行拍卖路权之实，对此，该报极力表示反对。8月13日、14日，连续发表长文：《论官办铁路之恶结果、忠告邮部警醒国民》，历述了林渝、京津等八条铁路的“官办”史，尖锐地指出，“此八路者，除粤汉绞尽志士脑血，糜千余万巨款，始挽狂澜于既倒外，他如林渝、京津、卢保、淞沪、沪宁，则由官办而变为借款承办；大冶则由官办而变为华洋合办；龙州则由官办而变为外国自办。官办铁路乎、官办铁路乎！自吾观之，与其谓为官办铁路，毋宁谓为官卖铁路之为当也。”“综观以往，默计将来，凡官办铁路，无一不与外人有密切之因缘，即无一不得丧权失利之恶果。吾言至

此，吾不禁愈为伤心。盖政府以畏惧外人为天职，以压制国民为万能者也……呜呼，官办铁路欤，官卖铁路欤！”这篇评论发表不久，上海《东方杂志》（五卷八期）就把它转载流播，受到了南北舆论界的广泛注意。

该报还极力反对清政府借债筑路。早在1907年，它就发表评论，反对借债修建苏杭甬铁路；1908年，它又反对张之洞推行“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杜内资”的反动政策。特别是1911年，盛宣怀一意孤行，借“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商办的一些铁路干线作抵押，与列强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对此，该报指名道姓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盛宣怀就位邮部以来，对邮、电、船、路四政，不闻有若何扩张整理计划，而首以借外债为惟一宗旨，是盛氏宛为借债而来也。”^①

该报也很支持各地收回矿权的斗争。帝国主义在哪里攫取矿权，就在哪里圈划势力范围，最后连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中国老百姓使用土法开采，也被堵死禁绝。这种强盗行径，经常激起中国绅商士民各阶层的公愤。1904年12月23日，该报发表《论商部宜赞成绅商开矿》，说：“宁使矿产为民间所私有，必不使一金滓、一块煤落于外人之手。外人有指索矿产者，必据理驳之。宁伤睦谊，毋稍迁就。”1905年，山西人民展开收回英国福公司掠夺矿权的斗争，1908年终于收回自办。对此，该报于1907年接连发“代论”《北京全晋商界呈请都察院代奏收回矿务稿》和《附录上海时报论山西福公司案原义》等，力促清政府“据理力争，俾晋民得自行开采，以拒外患，而收公益”。1909年，该报又不断发表评论、消息，积极支持安徽人民收回铜官山矿权和河南人民收回怀庆矿权的斗争等。

该报还经常发表文章，积极提倡兴办民族工商业。它认为，中国备受外族欺凌，原因就在于“农工商诸务”不发达。因此，它提出，必须举办六件事：许专利、立公司、严保护、译新书、设专

^① 载《大公报》，1911-05-05。

官、重赛会。^①

关于商业，它主张首先要联合起来，组织商会。所谓“民与民群则国立，士与士群则国强，商与商群则国富”^②。它用许多篇幅译载了美国旧金山和纽约的“商业会议所章程及现状”，以供立商会者“考证”和“取法”。它希望中国资本家，“诚能放远其眼光，充其能力之所至，以斥智学，以联商业，以助志士，以扶国民，由合财以联群，由联群以自立，足以建一民族主义最适于天演之国家必不难焉”^③。

该报更积极主张兴办实业。它说：“无商业之竞争，国必不能富，无工业之竞争，商必不能兴。故欲求富国，必先求商业之发达，而欲求商业之发达，尤必先求工业之精良。盖商者以营运货品博取厚利，而货品实赖工业而成。是工实为商之本，工不振则商必无功。”^④所以，它十分强调：“居今日而言行新政，第一先从实业上作起，而其余一切皆后也。”^⑤

针对清政府执行的一系列“诱商”、“愚商”而不“保商”的错误政策，该报非常愤慨。它在《呜呼商困》一文中痛诉：“吾国今日商业之现象如一囚徒，然寸寸受缚，欲动不得，长坝黑牢不见天门。吾中国货物与各国货物相遇之现象，如一群缚倒之羊而遇出柙之虎，岂第商人独承其祸哉！凡内国之农产品、工艺品，无一不被一种不规则之方法一网所打尽。此不规则之方法何物乎？曰中国现行之税法是也。”它愤愤不平地说：“各国货物之入吾口岸也，征税一回，得飞行遍吾国各地，关卡不敢向之阻扰矣！”“对于出口土货，不惟不保护之、扶植之，且困之以无限之重税。”最后，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今日现行之税法，乃反主为客、反主为奴之

① 参见《来稿代论》，载《大公报》，1902-10-03。

② 《设商部宜先立商会说》，载《大公报》，1902-11-16。

③ 《商业会议所章程及现状》，载《大公报》，1904-08-11、1904-08-12、1904-08-13和1904-10-05、1904-10-06、1904-10-07。

④ 《论天津考工》，载《大公报》，1904-11-16。

⑤ 《中国宜广设工艺厂说》，载《大公报》，1903-09-13。

税法也。此不合理之税法一旦存留，即吾国商业一日无生气，吾国商业无生气，即吾国农产工艺之发展永远绝望，而吾国长此不国矣！”^①

为了给发展民族工商业创造良好的条件，该报建议：在国外，应于通商各国“推广公司，运销华货，扩大商权”^②。在国内，要广设工艺厂，多开博览会、劝业会等，以提高产品质量，活跃市场，疏通渠道。

该报还呼吁提高工商业者在政治上的地位。1909年12月15日，它在《为农工商界悲》一文中说：“立宪国中最占政治上之势力者，莫如农工商界”。但是，“我国近数年来，新政繁兴，百端俱举，预备立宪之声，通于朝野。然其间食宪政之福，蒙宪政之利者，绅界也，学界也，而农工商界无与焉！……自有学校以来，农工商界但有出捐之义务；自有新政以来，农工商界但有纳税之义务；而其充学校职员、为新政领袖者，大半出之绅学两界”。咨议局成立以后，“起视各局之议员，仍属绅学两界居多，而农工商界寥寥无几”！“呜呼悲哉！我预备立宪时代之咨议局，我预备立宪时代之农工商”！

二、坚持立宪改良，反对共和革命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的天津，这年是庚子义和团起事后的第三年，辛丑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当时天津还被八国联军占领，由八国联军组织的天津临时政府“督统衙门”统治着。《大公报》是在国破民奴的时刻诞生的。这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但是，戊戌变法的思想仍然影响着知识分子。《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和康、梁等人并没有联系，但他目睹朝政腐败，外患严重，中华民族的灾难空前加深，广大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从而接受了“维新”思

① 《呜呼商同》，载《大公报》，1911-09-27 1911-09-28

② 《论运销华货，宜在通商各国推广公司》，载《大公报》，1907-01-22。

想。也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公报》坚决主张保皇和维新变法,竭力促进君主立宪政治的实现。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同时,该报也坚决反对种族革命论和暴力革命论。

与康、梁此时的维新见解相同,英敛之和《大公报》要求慈禧归政,主张效法英国和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因此一面保皇,一面要求立宪。每年阴历六月二十六日,是光绪皇帝的生日,该报必有庆贺的表示。一般都要在报头旁边登载庆贺广告:“恭贺大清国大皇帝万寿圣节:一人有庆,万寿无疆!”等字样,并围绕以花边,很是醒目。同时在“言论”栏中,往往有贺词。1903年8月18日,是农历六月二十六日,乃光绪皇帝之生日。该日之论说《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先将光绪帝极力颂祷了一番,之后,又对共和革命论者进行了驳斥,曰:“当世维新诸少年,往往本其偏浅之见,逞其骄矜之气,以发为危险怪僻之词,污蔑今上,扰乱和平。其无乃大不敬乎!而况筹国事者,宜顺民情。今国民所公认者,为君主。而吾独号于众曰:共和、共和。不但有拂乎民情之公,而且徒逞空言,决不见诸于事实。盖政体之沿革,由君主而立宪,由立宪而民主。阶级秩然,莫能陵踏。我中国之政体,不改良则已,欲改良,惟有立宪。”而且,文中还很有把握地讲:“吾甘与维新诸少年作反对、偏尊崇我皇上,偏属望我皇上。我皇上将来必可以立宪法,以救我国民四百兆生灵之众,以奠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

对于革命派中的种族革命论者,英敛之颇不以为然:“比者以彼二三失意、愤激、狭隘者流,号召党徒,张皇词说,事种族主义,而不知其徒取纷扰,自促灭亡也”^①。1906年6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论革命军必不能达其目的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的言论,阐明其反对革命的理由是担心外来干涉。“试问革命兵起,能保外人不干预乎?试问革命兵力,能保外人不破坏乎?试问革命排满,即使排尽满族,所谓支那者,果能人汉人之手乎?不能人汉人之手,而使支那沦亡于白种人之掌中,则所谓排满革命者,乃自

① 《大同日报发刊祝词》,载《大公报》,1908-03-25。

排，所谓革命者乃革汉命也。呜呼！革命排满之目的在保全支那之主权，乃夺之于黄种人之手，而纳之于白种人囊橐之中。其主义，其宗旨，其意识，其希望，不亦千悖万谬而无丝毫纤微之当哉！”

该报反对封建专制，但不赞成在中国实行共和政体，1903年10月8日，它在《说公》中说：“夫共和之政体，固属极公。若国民之程度低浅，一经改立共和之政，则极公可变为极私。试以美、法南肉而易以我中国之人，不旋踵而国基必坏矣。故君今日而图改良中国之政体，以求化其私而合乎公，则唯有立宪乎！”1905年4月，该报出了1000号征文，题目是：“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在应征的文章中，有的说：“居今日而欲振兴中国，采五大洲之良规，剔四千年之积弊，贫一变而为富，弱一变而为强；其必以君主之国而行立宪之法，最为当务之急。”^①有的说：“暗无天日，未有如专制之烈者。若辈不去，而思变法以强国，是豺狼当道而问狐狸也。总之，振兴中国，变专制为立宪，实为当务之急。”^②有的说：“救亡之道必先保我生机”，因此，“实业及教育为今日最急之务”。对于这个意见，该报加按语表示赞成，但认为，“政体不改善，根本不坚，教育、实业虽兴，其如上下之隔阂如故、官场沓泄如故何！”^③

其实，自1905年以后，《大公报》举行的每一次纪念性征文活动，都以立宪为题目。1908年2月10日，该报公布的2000号征文题目是“实现立宪之政体如何？”1910年11月30日，《大公报》3000号公布的征文题目是：“立宪国之要素，一曰国会，一曰宪法，然当预备立宪之时，究应先开国会而后定宪法欤？抑应先颁宪法而后开国会欤？”该报想通过积极宣传立宪，在舆论上造成强大的声势，迫使清政府以和平方式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使中国成为一个虚君共和的国家，并避免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发生。

① 史彬：《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载《大公报》，1905-04-13。

② 何瑞堂：《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载《大公报》，1905-04-21。

③ 大悲：《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载《大公报》，1905-04-27。

三、“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大公报》在呼唤救亡图存的同时，还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在文化思想方面，该报倾向“西学”，反对保存“国粹”；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办新学堂，反对科举制度；主张多立报馆，反对思想专制。在当时，做了许多具体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工作。

该报创刊不久，就用三天时间，连载了严复的一篇长文《主客平议》^①，申述了它对中西学的观点。文章开头，是新、旧二客进行对谈和讨论，最后，“大公主”起而“解两家之难”，曰：“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今使其人目略识旁行之文，足稍涉欧美之地，则闻闻见见将无所遇而不然……主生今日，使朝廷禁其读西书、治新学，则亦已矣。若必读西书、治新学，而乃取前数者之说而绝之曰：此非西土之言也，直康、梁之余唾耳。此何异以六经四子授人，乃大怪其言仁义曰：此非孔孟之说也，直杨、墨之唾余耳。公等有不大笑轩渠乎！……顾不佞所以为天下告者：中国以一统之局为其旧者三千余年于兹矣，乃今开关以与五洲之人类见，则本屈伸相酬，无往不复之理，吾策新机之动，将必有不可思议者见于方来，公等惧其过而为祸烈欤，则莫若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争之犹可，若乃握一时之国柄，而逞其禁錮剿绝之淫威，则无异持丸泥以塞孟津，势将处于必不可胜，而后此流滔天之祸，有其尸之者矣，咎不必尽在新者徒也。吾所为旧言者于此尔。”接着，“大公主”对新者说：“夫中国亲亲贵贵之治，用之者数千年矣。此中之文物典章与一切之谣俗，皆缘此义而后立。其人于吾民之心脑者最深而坚，非有大力之震撼与甚久之渐摩，无由变也……昔英之革命也，实当胜代之季；法之革命

^① 此文刊1902年6月26日、27、28日《大公报》，1904年4月，“以海内外索此稿者甚众，但余报存已无多，不能应命”，又于4月4日、5日、6日、7日、8日，将全文再登一遍，以饯读者。

也，近在乾嘉之间，至今考其国史，其酝酿之也，皆百余年。而事后之创夷，国之念咿呻吟者，又百余岁，夫而后文明之终福获焉，则其难有如此者……公等试思四万万者为何如民乎，而期其朝倡而夕喻也。嗟乎，傲旧俗之余劲与沮文明之潮力，二者贤不肖异，而皆不祥之金也，以其皆长杀机而拂天演之自然故也。”文中的“大公主人”，是一个经历了戊戌政变的维新志士。他同情“新者”的“皇皇”求治之心，但又感叹“新者”之“独弦哀歌”、“孤唱寡和”，因而只能“特望新者”，“忍之而已”！

此后若干年，该报对于中西、新旧等问题，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篇文章中的思路进行宣传阐释的。它批评顽固守旧者：“乃欲闭关自守，绝五洲万国而不通，鄙良法美意而不学。侈然自尊曰：吾自有古法在。是何不变书契而复结绳，变音乐而复黄土，变烹饪而复饮血，变宫室而复巢窟也！耻孰甚焉，迂孰甚焉！”^① 它指出：“尤足悲者，莫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二语。此之二语为普通学堂中之宗旨，亦宗旨中之澜言。顽固大臣所深喜，贤督抚有司莫敢或逆也。绎其语意，若一习西学，便倡言民权、自由、革命、流血，极至无父无君而后已。中学则最纯最正。敦品励行犹其小焉，极其功用，仁义礼智可为甲冑、可为干櫓，格有苗而仪凤凰。”^② 它唾骂这些人是“守旧狗”，是“顽固之魔鬼”，认为只有到了“十数年、数十年后，秉权之魔日渐消亡，我黄炎之民族仍能鼓其活动力，以光莹于东半球之世界”^③。

《大公报》还将社会主义朦胧地介绍给读者。说：“于二十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发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则社会主义是也。”这段话见于1903年3月31日刊出的《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这篇论说还对社会主义作了如下的介绍：“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

① 《运会说》，载《大公报》，1902-07-08。

②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辨》，载《大公报》，1902-07-08。

③ 《妨害新政之魔鬼》，载《大公报》，1903-03-21。

成一切平等之世界。其手段则欲变少数（人）之国家为多数（人）之国家；变海路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正其偏僻之爱国心也；以科学的平和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布拉沙哈德之世界主义而扫荡刘除其侵略的帝国主义也。”在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介绍之后，对其是否能实现则持怀疑态度：“然则社会主义者，亦乌托邦之主义焉耳。”

该报发现，维新有真假，效西法也有利弊。于是，它又以“新旧两党论”为题，征文进行讨论。有人说：“旧党之诋新党曰：此汉奸也。新党之诋旧党曰：此顽固也。吾谓顽固未必尽旧党，凡自私自利，无国家思想者，皆顽固也；汉奸未必尽新党，凡为鬼为蜮以倾轧种类者，皆汉奸也。”^① 1903年2月17日，该报发表了《书守旧维新之真伪论后》，指出：“苟欲求强国保种之道：第一当化其新旧之见，但问其能实心爱国、实力办事与否。无所谓守旧，无所谓维新，直除去新旧之名称可也。其次或兴利除弊，公而忘私，提倡中国固有之精神，恢复中国已伤之元气，为一真守旧家可也。或改良进步，锐意图强，尽除中国之弊政，输入泰西之文明，不尚空谈不存偏见，为一真维新家亦可也。不然，此击彼攻，各逞私意，守旧伪，维新亦伪，又安能发爱力，合大群，以同御此万国竞争之风潮哉！”

1906年前后，一些官僚大吏、“旧学宿儒”见“新理奇说，竟充斥于学界”，乃“奔走喘汗而相告”曰：“吾圣道其坠哉，吾国粹其亡哉！是不可不急图挽救颓波，而遏狂澜之道也。于是噤噤然塞于途、盈于耳者，无不曰：保存国粹，保存国粹！”他们的口头禅、门面语是所谓“治国必本经义”，“叛圣离经，即种灭国亡之渐”^②，如此等等。针对这些论调，该报于1906年7月6日至8日连续发表《论保存国粹》，予以痛驳，说：“我以四五千年开化

① 林砥中：《新旧两党论》，载《大公报》，1902-08-25。

② 《论保存国粹》，载《大公报》，1906-07-06、1906-07-07。

最早之古国，非无精粹完美者存。但与今之矫捷强悍、时时翻新之辈遇，即勇猛精进，尚瞠乎其后，况退守数千年以前之古义，而欲与之并驾齐驱得乎！”文章尖锐地指出：“岂有号称宿学，自命通才者，竟取吾国之蛮风陋俗，久为各国所齿冷者，矜为国粹。

一而称道之，倘非盲心病脑之辈，断不忍出此也。使果推彼所论，凡相传最古，为外国所无者，不问事之损益，理之是非，皆称国粹，则缠足一事，实为吾国独擅之长，各国诧为奇特者也……嗟乎，使若辈保存国粹者，果得达其目的，底厥成功，吾恐粹虽保而国不存。”

后来，又有人提倡“尊经复古”，说什么“风俗人心之坏，由乎经学衰微，人情厌古喜新。袭外人之皮毛，弃祖国之本实。惟有尊经尚孔，亟以诗书道义范围而防闲之，庶犹足以挽弊救偏”。针对这种观点，该报又在1908年2月10日2000号祝典增刊中，发表了潘氏的《今日所为尊经复古果否能挽风俗正人心且征其往效》，指出：“今日风俗人心之患，正不在乎经之尊不尊耳。政体专制，百弊丛兴。权豪横行于上，民怨沸腾于下。于是求逞之徒，乃得树其反对之帜，布其说以风行天下，为世局之隐忧。果能革专制，去弊政，分上下之权限，定宪政之实行，使地方有自治之能力，人人具爱国之心思，则所以为风俗人心忧者，将不禁而自戢。”“乃计不出此……而谓聚百十生徒，讽诵一堂，则古称先，遂足以感召天和息邪说而弭内祸；是犹巨族世家之裔，门户日落，宵小窥伺，而主人翁感其旧日之全盛，方率其子弟，高悬其先代之家训，高曾之遗像，馨香而祷祝之，谓可以靖家难于无形也。岂不慎哉！”

与所有的维新派报刊一样，该报也反对科举制度，主张兴办新式教育。该报的许多文章认为，“中国的大局”常常坏在“两等人”手里：一等是书生，一等是少爷。它以科举为例，说：“每年总有七十多万童生，乡会殿试，统共也拔不出百分之一去。下剩的老秀才老童生，每年常占八十万人。八股是空谈，策论也不是实学。身无一技之长，把幼年中年有用的精神，全用于无用之地。改业已

晚，追悔无及。这半世功夫，果然讲求实业，何事不成！”^① 1903年10月24日，该报发表了《论科举》，说：“西国学校以教育为主义，无人不当教育，故无人不当人学……中国学校以科举为主义，故无志于公卿大夫者，虽不识一丁亦可；有志于公卿大夫者，必取空而不实、缺而不全之书籍，伏案而诵之，学成而应试……呜呼，自学之所以并荒，人心之日即于苟且。非科举之毒不至此。吾故深恶而痛绝之，不愿我少年之再受其毒也。科举之与学校无并立之理。”后来，其御史上条陈，主张对学习政法工商诸科留学毕业生，经考试后，给以举人进士头衔，优加任用。该报指出，其结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今日之留学毕业生，又成当年举人进士之变相矣”^②。1909年2月，御史李灼华诬称：兴办学堂以后，“国文将废，中学将湮”，又奏请规复乡试、会试。该报著论痛斥说：“若于学堂大兴之际，骤复岁科两试，势必驱全国之学生，相率而入童子之场，举一线开明之机，遮尽断绝，而复变为黑暗世界，其为害尚忍言耶！”^③

该报也十分强调发展教育、兴办学堂的重要性。1902年11月7日发表的论说《论中国教育当定宗旨》说：“夫教育者，所以提振国民之精神，感发国民之志气，使人人得成为国民之资格，能担当国家之责任者也。国之有教育，犹蒸汽锅之有火，火力旺者，则水热而汽足。教育盛者，则民智而国强。旷观五洲，横览数十国，凡其国之强与不强，恒视其国之教育为比例。”后来，它又刊登一份明治三十五年调查的《日本学校总数表》，说：“日本以弹丸小国，称雄亚洲，岂有他术哉！不过视学校为性命，深知夫万种生机，皆由此出。合全国男女少壮之精神皆贯注于学界中耳。”^④ 而当时的中国，“说是匹万万人，到底能读书识字的，没有百分之一。

① 《笨老婆养成孩子》，载《大公报》，1906-10-22。

② 《论考试留学毕业生事》，载《大公报》，190-07-08。

③ 《论李灼华之荒谬》，载《大公报》，1909-02-13。

④ 林翰：《书日本学校总数表后》，载《大公报》，1904-09-04。

就是有多半人读书，请问所学的有用处没有？能够强国保种不能？那愚民不用论了，单看那中过举人，点过翰林，作了大官的，多不懂得什么叫地球，什么叫五洲，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宪政的。从前有个二品大员，问日本人说：到贵国里去，要坐火车，可以走几天？你说可笑不可笑”^①。

要废科举、兴学校，首先要广立小学校，普及国民教育。1903年10月9日，该报的《论造就国民为富国之本》说：“人民程度之高下，国家随以为盛衰……故今日不欲振兴中国俾抵富厚则已。如其热心国家，殷情社会，非广立小学校以造就国民，万无富厚之希望。”该报注意到，在普及国民教育中，有一种现象十分严重，那就是上学的儿童很少。有人于乡间游时，见上悬初等小学匾额，人而视之，空空如也。“怪而问之，则曰：教习至此月余，村中无一人入学者，教习遂归矣。而其余之有教习在者，亦不过仅仅守生徒二三，此初等小学之现象也。至高等小学内之学生，不过仅二十余人，甚或有不足十人者。”^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应推行“强迫教育”^③；有人则强调“普及教育必先筹及贫民”，理由是：“一国之民，贫富不能一致。富者需乎教育，而贫者之需教育更甚于富者。以社会中之罪恶起自贫乏者占大部分。举凡杀人、行劫、诓骗之事皆是也。若贫者有其常业，则社会上之罪恶必减少一半。”

该报也很注意传播科学知识，反对封建迷信。它认为：“庙宇跟学堂、香火跟教育，是万不能两立的。”它列举了许多事例，说明中国信鬼神的风俗相当严重而盛行：“河运官拜蛇，说他是河神，称为金龙四大王；行河海的拜天后神……小孩子出天然痘，等到落痂之后，也都往天后宫许愿去，说是天后神也管小孩子出花儿。越闹越奇，不值一笑……又如作官的每逢初一、十五到城隍庙拈香，

① 《有权位者请再看》，载《大公报》，1904-09-08。

② 刘宝环：《论普及教育必先筹及贫民》，载《大公报》，1908-08-08。

③ 陈清震：《强迫教育私议》，载《大公报》，1906-12-29。

又有祭门、祭库、用兵时祭旗等等礼节。”^①该报还发表了大量科普类文章，讲彗星、地球、月亮、风、雨、雷、光、声等等，用科学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破除社会的迷信认识。

总之，该报在政治上主张保皇立宪，在思想上积极传播西学，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等等，这些都是这个时期的维新派报刊的典型特征。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可以说是一张不折不扣的维新、立宪派报刊。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四节 “以敢言”著称的报纸评论

创刊后第二天，《大公报》就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大力揭露了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腐败朝政和他们搞的假变法活动。说：“盱衡时事者谓此次变法。虽曰力祛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于其间。恐泄泄沓沓，仍沿从前之陋习。既未将旧日之熏染，一一痛加滌洗；又未将旧日之秕政，凡可以涣吾民心阻我进步者，一一锄之务尽，咸与维新。亦不过稍涉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文章明确表示：它要“知无不言”，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更不“意存规避，拗曲作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顾天下后世之唾骂”。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它敢于指斥权贵、指斥当道、指斥朝廷弊政，逐步形成了该报评论的一大特点——“敢言”。

一、对权贵的鞭挞

该报创刊后第五天，就发表《论归政之利》，开始在慈禧头上动土。文章强调，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

^① 《学校与鬼神不能两立》，载《大公报》，1904-07-14。

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它还指名道姓痛骂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为“国贼”，斥其祸国殃民，对受宠任的张之洞、盛宣怀等大臣，也经常遇事讥评，给予警告和抨击。

应该指出，该报对慈禧的批评是有一定限度的。它所要求于慈禧的只是撤帘归政，而不是要打倒她。它的批评锋芒，主要针对的是刚毅、荣禄之流和以他们为代表的枢要部门的权奸旧党和各级衙署的贪官污吏。

清末官场魑魅魍魉，乌烟瘴气。该报把他们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蚕之毒、如无知之偶、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谷木之蠹虫。这是形象的描绘，也是真实的写照。

最初，该报还想用所谓“开官智”、“清宦途”等办法，进行修缺补漏的工作。后来，看到“新政”败坏，江河日下，连清政府的最高层衙门也腐败不堪。《忧俗篇》说：“夫政务处者，为办理新政而特设者也，今且以不办事为宗旨矣。军机处者，枢要之地也，今且以交情之厚薄、行贿之多寡为用人之权衡矣。”^①上层如此，下层怎样？1904年1月16日，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东陵苛政》，说：有某君游历遵化，至热河，“突见一带居民纷纷逃避，东陵派队搜山，驱逐山内之人，以致数县百姓惶惶大丧。某君颇涉疑惑。虚心采访始悉，乃守陵官员，因后陵风水地方，有附近愚民盗伐木植，派队剿捕。惟查东陵在遵化，何至搜至热河所属黑水峪一带？彼此相隔四百余里，岂尚为东陵风水地乎？况细询多系民地民居民植之物，该兵队亦指为官地。更奇而惨者，凡民间居内若有寿材木料等类，皆指为盗伐之物，苛索滋扰，山居之民比户震惊。以此首善之地，竟有如是之苛禁，致使无辜被累，亦可悲矣！”鉴于以上种种，该报对于1905年以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更政官制

^① 《忧俗篇》，载《大公报》，1902-08-04。

等，越来越感到失望，而用三个字把它概括，叫做“变戏法”^①。

更严重的是，这种弄虚作假、衰败腐烂的现象，不仅从上到下，而且东西南北中，遍及全中国。所谓“今岌岌之势，日蹙一日。综观二十行省之中，均现黯败之色，无一毫活动之生机”^②。

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4月29日，该报在《说妖孽》中有两段精彩的议论和描绘，可见清廷覆亡前夕官场腐败之一斑：

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领也。聚三五衰朽于一堂，旅而进焉，旅而退焉。聆彼口头禅，未尝不私忧窃叹云：大局之陆危，救国之不容稍缓。然而呈之于事实者，无一不颠倒错乱为图危困亡之谋。以言内政：则一面言预备立宪，一面仍拥护专制也；一面言严禁苛敛，一面仍搜括民财也；一面言发扬民气，一面仍堵塞官权也。以言外交：则一面言自保主权，一面又曲徇要求也；一面虑外资充斥，一面又恣借洋债也；一面言慎重领土，一面又断送山河也。对于内，则为滑稽之政府；对于外，则为柔媚之政府。其变态之灵便，虽狐鼠不能喻其神。外比，则惟是揽权瓢法，罔上营私。声色宴游为平章军国之重事，子女玉帛乃进退人才之权衡。既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为民之念，曾未尝一动于中。靡论其识之不济也，就令有一事焉，明明知为国利民福，然或以不便于己之故，从而阻挠之。且不肯显言破坏，必出以旁敲侧击。或嫉他人之争论，而阴为主持；或托慎重之常谈，而徐图销灭。己不居反对之名，而实较反对者之阻力为尤烈。衮衮诸公，所持为惟一之方针者，如是焉耳矣。此妖孽中势力最大之一种也。

仕宦之场，一妖孽荟萃之区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自卿相之尊，下逮一命之士，何尝有丝毫图治之心。其所以孽孽矻矻，漏尽钟鸣而不肯暂止者，无非

① 参见《闲评》，载《大公报》，1907-11-06。

② 《保定之四现象》，载《大公报》，1907-04-13。

为保利禄长子孙计耳。自破格用人之说起，而官吏之流品杂，自卖差鬻缺之风盛，而官吏之心理变。以奴颜婢膝为手段，以白璧黄金为代价。在上之权贵，更依托之以为招徕之术，且美其名曰运动。遂令热中者流，载宝而朝，擎金而市，昏皇皇焉以为进身之媒。人才之长保以此也，卓异之荐荐以此也。有若金店、有若妓寮、有若饭庄、有若寺观、有若膏董鬼、有若娼媼仆妾。举万有不齐之人类，悉变为官吏投资之场。甚至公署堂皇，大庭广众，昌言评鹭曰：某也，运动某大老而得之；某也，运动某贵人而得之。对于运动而已得者，则群羨其能；对于运动而无效者，则竟笑其拙。万其人一其心，百其途一其准。斜封墨敕，大开幸进之门；红粉朱提，尽是显场之具。纷纷扰扰，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及其既得，乃不得不谋利市三倍之赢。于是喜民贼出其中，卖国奴出其中。互相倾轧、互相朋比之事，无一不出其中。鬼耶、贼耶、罗刹耶、灵狐耶，吾又何从而定之！此妖孽中蕃衍最盛之一种也。

在对权贵的痛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报与袁世凯整整顶撞了十年，不屈不挠，直声满天下。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做直隶总督，而《大公报》压根儿不买账，经常点名批评天津秕政。尤其是在1905年，它热烈响应反美华工拒约运动，积极鼓动天津人民抵制美货。这年8月，袁世凯通过天津巡警总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这在《大公报》的历史上写下了壮烈的一笔。

1905年春，美国强迫清政府续订限禁华工新约。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首先要求清政府“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5月21日，《大公报》也在“时事要闻”栏以《外部连接要电》为题，报道了上海、广东、美国等地的中国商民千余人，接连电致清朝外务部，提出“华工禁约一事所关者大，万不可轻易画押”。5月26日，全文转载了上海人镜学社关于抵制美货的传单，后来又连续刊登《上海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愤怒地指出：“古今各国，均无此等禁约”，“彼来受我保护，我往乃受彼苛禁虐待，天下

不平事，孰有逾此！”6月15日以后，反美斗争进入高潮，该报又专辟“抵制美约要闻”栏，连续发表了《论益闻西报之华工禁约观》、《本报记者与益闻西报书》、《各人全要发起爱国的热心》、《檀香山华人被虐惨状记》、《抵制美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等文，批驳《益闻西报》造谣中伤的澜言，揭露美国虐待华工、焚烧唐人街等暴行，介绍中国人民抵制美货运动，已使“地球诸国，咸瞪目结舌相奔告曰：中国不可侮，中国不可侮！”鼓励大家只要“实行而坚持之，不及半年，凯歌之来，吾操胜券以俟也”。8月6日，一个自称“古燕平心子”者，寄来一篇《中国现今大势论》，极力反对抵制美货。该报加按语说：“此稿由某某寄来，其中词旨，本馆不任其责。”8月13日、14日，该报连续发表了《驳古燕平心子中国现今大势论》，历数美国是一贯对中国华工实行侵压欺凌政策的；痛斥“古燕平心子”，“侨同立异，于异族，则扬之惟恐不高；于同侪，则抑之惟恐不至，是真败类之尤也”。8月17日，当袁世凯对该报进行迫害时，它声明：“抵制美约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无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直到11月12日，它还发表《论驻粤美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严正表示办报人“执笔之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者也。”与此同时，该报拒登美商广告，还将美货标识刊登在广告栏中，让大家拒买美货，积极鼓动天津人民抵制美货。

这件事大大触怒了袁世凯。1905年8月，袁世凯通过天津巡警总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8月17日，英敛之与主笔刘孟扬在该报一版头条位置，联名发表《特白》，说明该报因抵制美约，“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那么，这个“当道”是谁呢？“实为我最有权力之长官”，即指当时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同一天，英敛之还发表了《说官》一文，含沙射影地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要“拔凶邪，登俊良”，“洗涤刮磨”那些当权的大官，否则，就“永无改革之望”，就“永无起死回生之一日”。接着，该

报又连续两天既发表“论说”，又发表“附件”，表示一定要发扬“诸葛孔明坚卓不挠的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08年，该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犹忆记乙巳（1905年）之秋被禁之时期，而售报转增，其多数置之死地而后生，天下事大抵然矣。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金石，虽万劫千魔、酷暑毒疔，而不能损害其丝毫者也。当飞沙昼冥，怒涛山立，正不知危险奚似，犹有风静潮平，安致今此之一日！”^①后来，袁见用强力迫害无效，几次想以利诱办法收买，但都被英敛之拒绝了。1908年11月，摄政王载洋执政，袁世凯被开缺回籍。该报历数其罪责：“戊戌政变，袁世凯之获罪于景皇帝深矣……设非袁世凯节变于中途，则中国今日当为世界上第一等国矣。今中国之不能与各国比肩，袁世凯迟之也。景皇帝之忧郁终身不得行其志，袁世凯致之也。”^②后来，那桐说袁世凯“办理外交，有功北洋”，力保再用。该报又针锋相对，发表评论说：“据吾人所见，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权利未必多授外人；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财政未必如此困难；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冗员未必如此之多；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民气未必如此之缓。”^③该报如此坚决、长期反对骄横不可一世之袁世凯，在当时舆论界，可称首屈一指。

二、抨击封建专制，痛斥假立宪

针对清廷顽固地坚持封建专制的做法，《大公报》毫不畏惧地予以抨击。该报的“敢言”还表现在大胆反对清廷株连党祸、惨杀党人的种种暴行，痛斥政府在立宪运动中的种种悖逆行径。

1903年，新闻记者沈荃在报上公开揭露了“中俄密约”的内容。7月17日沈荃被捕，31日慈禧下令将沈荃“立毙杖下”。8月2日该报全文刊录了沈荃临刑绝命词四章；9月16日又续刊：“探

① 《本报二千号征文广告》，载《大公报》，1908-01-21。

② 《对于政府退袁官保之确评》，载《大公报》，1909-01-16。

③ 《袁世凯之保语》，载《大公报》，1909-09-11。

闻刑部司官，自杖毙沈荃后，托故告假者颇多。皆以杖毙之惨，不忍过其地。出而述其始末，照录于后，以补各报之缺。当杖毙时，先派壮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终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均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堂司无法，如其言，两绞而死。”沈荃惨案传出后，中外震惊，“西人闻之皆胆寒”。这件惨案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若大公愤、若大影响，与该报连续绘声绘色地报道、评述有着密切的关系。

1907年7月，清廷先后杀害了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7月30日，该报发表《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说：“近自皖抚被刺案出，警电纷驰，南北大吏咸有戒心。而一般趋承小人，邀宠冒功，多方株连。风声鹤唳，举国骚然……乃不旋踵而女教习秋瑾以正法闻，旬日间各处以捕获余党闻。风之所靡，波及全国。来轸方遘，正不知其所底止！”对于徐锡麟，文章说：“乃既杀而剖割其心，啖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对于秋瑾，文章说：“以一女子身，有何能力，有何设施，而谓为党于革命，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次日，又在“附件”栏中刊登了《吴芝瑛女士纪秋女侠遗事》，文章生动地讲述了秋瑾东渡求学事，以及其言论主张，进而请求当道，“保全无辜，勿再罗织成此莫须有之狱诬”。翌年，清政府御史常徽奏请平毁秋瑾墓，并要“查办葬秋之人”，该报又连连发表评论表示反对。

载沣执权后，有人提出应开放党禁，宽赦戊戌时期的维新党人。该报则更进一步主张连革命党人也一起大赦。1909年1月30日，该报发表了《论宽赦党人之利害》，对此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阐释，“夫所谓党人者，有二种之派别。其一为革命党，其二为立宪党也。”两党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与国体为敌”，后者是“与政体为敌”。该报认为，既然“今日既在预备立宪之际”，就应该宽赦党人。首先是“大赦立宪党，不论首从，概予宽免。且使之扶助宪政，以为效力。”其次，“对于革命党也，则不妨解散其协从、严诛首要”，“待其穷途末路、匿迹销声，始一举而大赦之”。

该报认为这才是“弭乱之道”。它还为革命党人辩解道：革命党人之所以“甘心为乱者”，也是由于“激于恶政之潮流”。并且，“二党中人，大半遁居异域”，清政府根本就无可奈何之。如其“树此大敌”，“留无穷之隐患”，还不如一概大赦之。该报还一再发表评论，指责主张严惩党人的大臣，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身膺重寄的张之洞，称之为“某相国”，痛斥他“历仕三朝，身负天下之重望，而其所私心忿恨，日日落井下石者，乃在党人……假令八年以后，宪政风行，党人群起效用，恐阁下虽可为专制时代之功臣，而亦不免为立宪时代之罪人矣！”^①

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了一道“变法”上谕，开始实施所谓的“新政”。“新政”不过是一场假变法。该报一面积极要求祛除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一面对有名无实的假变法予以痛斥。1903年3月28日，该报发表《论中外强弱不同之大原》，说：“我中国日言学西法，而徒慕其表面之形式，而不取其里面之精神”，“上以权力制国民，下以狡诈伤同类”。“故不欲振兴中国则已，如欲振兴中国，第一当去其压制之手段”。

1905年7月，清廷宣布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该报对此提出了质疑：“虽诸公携有译才，其果为学贯中西，识超庸众否，恐难见信于国人也。”^②

1906年9月，清廷应载泽等人的奏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并“更定官制”。围绕这两件事，清政府上下、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

1907年1月，该报发表了一批议论更改官制的征文。有的说：“举凡阁部司曹、衙门别号，不过改头换面，仍属依样画葫芦。”^③有的说：“如此之变官制，有百弊而无一利，转不若不改之为愈

^① 《异哉某相国》，载《大公报》，1909-07-19。

^② 《论出洋考求政治要在得人》，载《大公报》，1905-08-10。

^③ 焦琴山人：《内官改制之利弊平议》，载《大公报》，1907-01-31。

也。”^①过了几个月，该报发表《论责望政府》，表示了三大失望：“我国民近来最大之希望，无如立宪。然自预备立宪宣布以来，事事适得其反，北辙求南，愈趋愈远，失望一。”“内官官制，改头换面，犹以为未足，不数月而已萌悔志。我国之昏天黑地，盖将长此终古矣，失望二。”“外官官制，反复电商者数月，属望正殷，划然中止。并所谓慰情胜无，改头换面者亦不可得，失望三。”^②

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批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以九年为期召开国会的方案。同时，又发上谕说：“如有不靖之徒，附会名义，藉端构煽或躁妄生事，紊乱秩序，朝廷惟有执法严徼，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③意欲阻止敦促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9月18日，该报发表了《论国会请愿之无效》，指出：“吾人观于东西各国立宪之陈迹，殊有大不然者。在君主立宪之国，未尝不用协定之宪法；即在钦定宪法之国，亦未尝不容人民之要求。如以为一有人民之请愿，必有损于君主之大权，是不过保存专制之见，究于立宪前途有何补哉！”

1910年1月、6月和10月，各地立宪派人上先后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每次都得到了《大公报》的舆论支持。在此期间，该报还发表了《三次国会请愿之感言》、《驳江督反对国会与责任内阁之电文》、《请速开国会以释群疑》和《庚戌年之大纪念》等文，大声疾呼：“还月以来，日日震颠于我耳鼓者何乎？曰国会国会；日日闪烁于我眼帘者何乎？曰国会国会；日日涌现于我脑海者何乎？曰国会国会。”^④“乃曾不几时，第四次请愿之风潮相继涌现，朝廷乃改其宗旨，变其方针，迭出其钳制之手段以对付人民。东三省之代表，则被驱逐矣，天津学界之发起人，则遭罪谴矣；而各省督抚之为民请命者，政府又从而禁阻之，而民气乃为之

① 乾寿氏：《内官改制之利弊平议》，载《大公报》，1907-01-25。

② 《论责望政府》，载《大公报》，1907-06-08、1907-06-09。

③ 《上谕》，载《大公报》，1908-08-29。

④ 《三次国会请愿之感言》，载《大公报》，1910-10-19。

大缩，殊令人追念及此而尚有余痛者也。虽转瞬三年，朝廷未必反汗，然造因如此，则国会将来之效果，不卜可知！”^①表示了对于清廷伪言立宪、出尔反尔的无比伤痛和愤懑。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五节 灵活的版面，丰富的栏目

一、清新、多变的版面

创刊时的《大公报》为书版式，用国产毛边纸单面印刷，日出八个小版块。与同期的其他大报相比，《大公报》的版面具有眉目清晰的特点：每个版块都有边框、书口，在书口内有“大公报”报名和报纸顺序编号以及版块序号，全部直排。与同期报纸相比，书口的使用使该报的书册模样做的最为彻底，也可以说是最为接近当时读书人的习惯。据《大公报》的调查与分析，当时读报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旧式文人，这样做倒也是迎合了读者的口味。细观报面，该报各栏目都是以稍大字号的黑体印出，使得各栏目之间区分清晰。“论说”与“附件”一般都有独立标题，其中，“论说”的标题都是以与栏目名称一样的黑体大号字印刷，颇为醒目。

每天的《大公报》的栏目都不尽相同。除了“邸抄”、“上谕”、“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等栏目每天都有外，其他如“附件”、“录件”、“译件”、“杂俎”等栏目则不定期交叉出现，这样使得版面丰满、灵活。

所谓多变是指在英敛之主持的这十几年中，《大公报》屡次改版，力图“精益求精”。该报平日是栏目的套换，而过不多久则有技术革新、新栏目的补充和旧栏目的革新等措施出台。既保持了基本风格式样的本质不变，以给人以固定的品牌形象，同时，又不断地改变版面，给人以新鲜感和积极进取的旺盛发展的印象。这样，

^① 《庚戌年之大纪念》，载《大公报》，1911-01-25。

既能维持已有的读者群，同时又能吸引更多的新读者。

单就1905年而言，该报就有过大小两次版面改革。这年的8月21日，《大公报》宣布“本报体例亦由今日改良”。这次改良其实是栏目的调整，原“论说”改为“言论”，原“时事要闻”改为“要闻”，原“中外近事”改为“时事”，同时新增加了“杂志”、“公牋”、“奏议”等栏目，版面总体变化不大。同年10月26日，该报又登出了“本报大改良广告”，云：“添铸新字，增拓篇幅，新闻议论精益求精，更多译要件，详演白话，总以开通风气、裨益见闻为目的”。因要拓展业务，12月8日，英敛之又在报上具名发了“添清访事”的广告。12月27日该报正式改版，“本报现一律改换新字以期豁人心目，并从今日起，增加新闻两版、用括篇幅。此后逐渐改良，精益求精”。这次改良幅度比较大，不仅添加了新闻含量，新闻版由原来的五个版增加到七个版，而且“添聘海内名流，并电传新闻”，大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时效，并且设备也同时更新，使报纸版面更为清晰、醒目。

1908年9月24日起，该报开始增张，由原来的两大张改为“每日共出三张，不加分文”。

1916年元旦开始，《大公报》版面有了重大改变，那就是使用白报纸两面印刷，虽仍然保留了书版式，但毕竟向现代报刊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二、栏目的特色

（一）代表报纸风格的评论

《大公报》从一开始就很重视评论工作。创刊第二天的《大公报出版弁言》就明确表示：“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该报的评论形式有多种，如“言论”、“附件”、“闲评”等等，其中以“论说”最为重要，它相当于今日的“社论”，是当时所流行的政论文章。该报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对人物与事件的评价等，均主要是通过此栏目展现的，是该报的旗帜。综观民国以前的

十年间，凡属该报的重要主张，如对于君主立宪的鼓吹、变法图强的宣传，对于贪官污吏、封建顽固势力的抨击，对于民众疾苦的反映、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呼吁，对于社会各种腐败堕落现象的痛斥等，都是通过“论说”来公之于众的。该栏目创刊头两天未见，第三天即以来稿代“论说”，发表了《论中国人人有救亡之责》。此后几乎每天都有“论说”见报，其位置固定在第一页的“邸抄”、“上谕”之后，“时事要闻”之前，偶尔在该位置刊登科举发榜名录、重要行政文件等，没有“论说”发表。这样，总体上平均一个月有25篇左右的“论说”。以1908年底为界，前后相比较而言，此前的“论说”中，该报自己撰写的不多，经常以“来稿代论”、“选论”、“要件代论”、“译稿代论”等形式间接地发表意见和建议。该报还选用一些有奖征文活动中的稿件在“论说”位置刊出，这样，就有了一个题目多次出现的现象——因作者的角度、思路不同，内容会有差异，但根本的立场、观点是与《大公报》相一致的。从1909年以后，《大公报》每日“论说”基本上都是该报自己撰写的，并增加了两篇“闲评”。这表明，从这时起，该报的评论工作大大加强了。民国前，该报未署名的自写“论说”大多出自英敛之之手，出自其他编辑之手的多有署名。

该报的“闲评”栏目是1907年6月21日开始增辟的。最初为不定期栏目，几天登一篇，从1909年6月18日以后，每天都发两篇，“闲评一”固定刊登在“论说”栏之后；“闲评二”固定在第二张的头条位置。其特点是简洁、短小，一般都是一事一议，长则二三百字，短则几十个字，标题时有时无。因其针对性、时效性较强，能及时配合新闻或联系政治与社会诸现象发议论，加上文字简约，一针见血，很受读者欢迎，后来该栏目被长期保留下来。

“附件”是该报特有的一个新闻评论栏目，从创刊之日起就有，它位于正张最后广告栏前，是不定期栏目。1905年8月20日该报改版时，限于正张的篇幅，“附件”改在附张中刊登。1908年2月7日以后，该栏目改名为“白话”，又恢复在正张中刊登。该栏目是针对文化水平不高的社会受众而开办的，为的是让“妇女、小

孩、略识几个字的，也可以看看”。因此，它通篇都用白话文写作，句与句之间，以空格代句逗。与“论说”的评论方式不同，“附件”所论主要是社会上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事件等，通过一个故事、一则寓言等，借题发挥，以小喻大展开论述。诸如反对妇女缠足、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知识、提倡卫生习惯、改良社会习俗等，都是写作、议论的主题。

除了这些固定的评论栏目外，该报还经常通过给新闻、译文、来函、来稿等加“编者按”、“本馆附志”的形式，表示编者的意见与观点，使评论与新闻报道和各类见报的稿件相结合。

总之，《大公报》非常重视评论工作，几乎每期都有此类文章发表，并且形式多样。

（二）真正的新闻纸

作为日报，《大公报》很注重新闻报道。该报有固定不变的新闻栏目，能比较及时地传递新闻，内容基本囊括了当时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内容庞杂、形式多样，所占版面仅次于广告，是名副其实的“新闻纸”。

民国前，《大公报》报头后一般依次刊登的是“邸抄”、“上谕”等新闻栏目，然后才是“论说”。创刊初期，该报还在附张中设“京报”一栏，大量摘录报房《京报》的内容。这三项恰是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一贯内容——《大公报》总是很迎合当时知识分子读书看报的传统习惯。从1902年6月26日起，该报在“论说”前开始用“路透电报”报道国外消息。

该报的“时事要闻”和“中外近事”栏目是其每日进行新闻报道的核心栏目，位于“论说”之后，约占两个版左右。前者载重大新闻，后者载全国各地新闻，偶尔有外国新闻。这两个栏目的新闻均有标题，以“O”与正文分开。所不同的是，“时事要闻”栏目的标题是对新闻内容的概括，如《官保南下确闻》、《鲁府奏设陆军小学》；“中外近事”栏目的标题，仅是简约分类而已，并不能说明新闻内容，如《喜事不喜》、《车站记事》等，并且，“中外近事”的标题一般都是四个字。1905年以后，“中外近事”改为“时事”，

标题逐渐打破四字传统，以短语的形式出现。这两个栏目的新闻特色是：首先是简短。往往仅有几句话，少则一行，多则三行，如遇有长篇记事则例外。那些类似新闻通讯的内容，主要辑录转载上海的报刊材料，其标题多为《记……事》或《详志……事》。其次是覆盖面广，信息量大。“中外近事”栏目又分为“北京”、“本埠”、“东三省”、“河南”、“广东”、“香港”等分栏目，其新闻涉及全国各地的人和事，该栏目每日登载新闻在三四十条左右，当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基本上都能涵盖。《大公报》创刊后一直有一个惯例，即在每年年终的“论说”中，刊载一篇该年的“小史”，以编年体记录该年度发生的重大历史史实，其所使用的材料来源均是该年内《大公报》所发布的新闻。查看这些“小史”，重大事件条条在录，尤其是一些震动朝野的时事，该报常常会追踪、连续报道。如1904年4月28日到5月4日，该报在“时事要闻”栏目中持续七日对“王照要案”进行了系列追踪报道，与此同时，配发评论和专稿。5月9日，又录《中外日报》对该案的评述代“论说”，形成了强劲的舆论声势。第三是新闻内容与写作严肃。该报新闻以宫廷、官场动态为主，有时也刊少量社会新闻。新闻无论大小，其报道角度均在反映社会民生，注意“从大处落笔”，没有诲淫诲盗性文字。在创刊号的《本馆告白》中，该报宣布“本馆以开风气、膺民智为上义。凡偏谬、惯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因此，《大公报》的言论是以“敢言”著称，其新闻则以“严肃”著称，始终保持着干净、纯洁的品格，使之与同期的其他知名商业大报相区别。

此外，该报还有不定期的“录件”、“译件”等栏目，用以刊登其他中外报刊的文稿。内容多是新闻，也有少量论说。“文牋”、“专件”等是用以刊登文告类新闻的。

该报很注重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稿一般都是该报记者采写所得。在1904年11月14日的“本馆特白”中有一段声明：“本馆定例，凡一切新闻，若非由本馆访事员采访而来，概不滥登。”即使来函，其内容也要核实。一旦新闻有失实现象，该报便在“告白”

或“来函”中予以更正。

（三）广告也严肃

报刊广告，当时亦称“告白”，是当时商业性报刊发展所依赖的主要经济支柱。因此，一些资产阶级大报均拿出大半个报纸版面，用于刊登广告，如《申报》、《新闻报》等。早期《大公报》的广告始终保持在版面的二分之一左右，这与沪上大报相比是少了些，这主要与当时北方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够繁荣有关。这一时期京津地区报纸的广告数量通常不如沪港，其原因，据《大公报》的分析，在于“商业不振，告白不多，徒依销数，朝办夕停”。可见当时《大公报》能有50%的版面刊登广告，在京津地区已经是佼佼者了。当时报纸上的广告以医疗、药品方面的居多，以至于《大公报》曾经就此撰文慨叹中国当时的病弱。1909年10月25日的“闲评二”云：“一方报纸上之告白，可以窥一方实业之兴衰。津沪各报之告白，争奇角异，三分之二皆属大药房，若者大医士。甚矣，中国人病者之多也！”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5月20日，该报在“闲评”中讽刺那些《奇怪之广告》，说某些产品为迎合立宪运动之风，竟“有所谓立宪牙粉是也”！可见，当时的有些产品为了追风潮、借声势，竟将时事做品牌，名实不符，令人啼笑皆非。

《大公报》所刊广告，手法比较简单。一般没有特殊的广告词，只有对宣传对象的简介而已。为了醒目，有些广告围绕以花边，有的则加有图片。广告栏内的字体、字号变换幅度很大，出广告的单位往往用空心字体刊出。广告版一般是整张通张印刷，打破了新闻版的书册式模式，版面要比正文显得灵活、多样、多变。广告栏在每张内都有，都占全张的一半面积。在广告比较多时，一张中，各版块之间的报缝里也登广告。

尽管“告白不多”影响报纸生存，但是，《大公报》的广告也始终是干净的，不曾登载不健康的内容。

（四）副刊与小说

该报从创刊之日起，即设“杂俎”栏目，用以刊登诗词歌赋等消闲文字。清末女词人吕碧城的诗词作品，最初就是在这个栏目内

世的。从1904年3月31日起，在该报的附张上增辟了“笑林”栏，刊登一些幽默短文。在该年6月20日的附张上，又有“游戏文章”一栏，刊登了《药名尺牒（骈体）》，此后，该栏目偶尔出现过，内容均是当时旧式文人舞文弄墨的游戏之作。1909年4月28日，该报又有“滑稽谈”栏目问世，刊登一些描写人世百态的文章，如“科举人物”、“相声演员”等。这些副刊性栏目时有时无，均是不定期出现，带有一定的补白性质。

该报很重视小说的作用，经常连载小说。这大概与英敛之本人爱读小说有关。英敛之常常“披阅小说至天明”，他在（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日记中曾有表白：“予素最嗜阅西洋各种说部，以其思想新、章法妙，每出一种必购阅之。”当时《大公报》所连载的小说，大多是英敛之自己所喜爱和推崇的。从英敛之日记中，还可以看到，他经常阅读梁启超办的《新小说》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在这两个报上都发表过不少文章，强调小说的重要性，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并认为“小说有助于革新”。这些观点都对英敛之有很大影响，并充分地体现在他的办报活动之中。除连载小说外，《大公报》还发表过一些有关小说有助于开民智的文论，应重视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应在国学教育中“设小说专科”等之类的呼吁和建议。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梁启超的思想是相通的。

早在1904年下半年，《大公报》即在“附件”栏中，刊登一些“泰西小说”，如《乐师》、《猫鼠成亲》等，都是一些短篇，可连载两三次而已。1909年2月17日，该报开始连续刊登《本报增刊小说广告》，文中首先阐明了小说对于文明进化的重要性：“一国之中所赖以维风俗、正人心、扶持道德于不敝者，除学堂教育而外，莫如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之中尤以小说之功居多。论者谓一国善良之习惯，多由一代之小说家造就之。无怪欧西人十，以小说一门为专门名家之学也。或言政治，或言学术，或言发明新理，或描写人

情，虽旨趣各有不同，类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且善足为劝恶……其转移社会之力极大。”于是，该报决定专设“小说”一栏，“由二月初一日（阳历二月二十日）起，每日随报附送一版，蝉联而下，以便阅报诸君惠存装订。”从该日起，该报在最后一版开始连载一些长、中篇小说，如《尼罗河同再记事》、《饮刃缘》、《梨园娱老集》等。其篇幅比其他版面略小，书版式，居报尾，方便读者裁减、装订成册。每当一部小说连载完毕时，大公报馆往往会刻印成书，单独发行。

DAGONGBAO BIANSHI

第六节 颇有影响的“白话”

一、独特的白话文

《大公报》还积极倡导使用白话文。该报对白话文的认识，超出当时一般人的见解，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字与口语的分离给社会文化带来的障碍，因而大力提倡白话文。并且，从创刊时就开始用白话文写思想评论性文字，将之上升到了和文言文相当的地位。这在当时极为难得，因而有人说该报的这种做法具有开创性质。

该报第一期没有“论说”，但有“附件”，题目是《戒缠足说》，全是白话。随后，在第六期的“附件”处，有该报的一段启事，对“附件”一栏的设置作了简单的交代。其文曰：“近有许多西友囑本馆演一段白话，附在报上，为便文理不深之人观看，未尝非化俗美意。本馆不嫌烦琐，得便即用官话写出几条。”该期此栏的题目就是《讲看报的好处》，文中说“看报的大好处还不单单知道天下事。更能够长人的见识，增人的学问。哪一样好，哪一样歹，往大里说，治国安邦；往小里说，养家费己，各事都可以比较比较、考察考察。人的见识越经历越高；人的能干，越磨练越大。最苦的是我们中国文字眼儿难懂，所以有许多明白人，如今开了许多白话报馆。为的是教识字不深的人，也能明白。有人劝我，在《大公报》

上也要添上点儿白话。我不敢偷闲躲懒，以后得了工夫，就写几句。这是我们开导人的一片苦心。”

可见，设置此栏目的目的是“与开民智大有关”！在1904年4月16日该报刊登的英敛之所写《敝帚千金自序》中，讲到该栏目不仅有“很多人喜欢看”，而且“别家的报，常有抄我们白话的，也有在各报上附一段白话的”。此举引得报界纷纷效仿，其社会效应很大。在该文中，英敛之还提到，该栏目的作品“十分七八”是他本人，“其余长篇大论，多是竹园主人，及清醒居士所作”。其实，民国以前，这个栏目的作者主要是英敛之，其他编辑之作或来稿，只是偶尔有之。

1908年2月7日以后，该栏目干脆直接改名为“白话”，此栏目白话虽没有标点，但有空格断句。1910年5月9日，该报在“言论”中探讨中国当时报业困难的诸多原因时，提到“文字之高下”是“最大之原因焉”：“各国报纸之所以风行全国者，以其言文一致。凡曾受初等教育之人，其学力即可以阅报……吾国言文隔绝若天渊，非有数十年读书论文之功候不能阅普通之报纸。”这样，虽然“报纸者，开通文明之利器，而社会之教科书也”，终因“人民程度不足，读书识字者太少，而阅报之人无多也。报纸虽为开通文明之利器，然自今日我国言之，只能行销于上流社会，非一般普通人民所能过问也”。可见，英敛之是意识到当时民众文化程度普遍低下，是“开民智”的一大障碍，是报纸不能普及的一大障碍，针对这种情况，才特写白话，意欲使该报能为大众所接受。尤其是当时妇女认读水平不高，而提高妇女的社会意识，是该报的办报目的之一，为了妇女能读报，也是该报设白话一栏的原因。因此，“白话”一栏目的对象自然而然地瞄准了妇女和社会下层劳动人民。这是很值得称道的，这说明，在促进中国报刊的大众化方面，《大公报》是做出过贡献的。

二、连续再版的专刊《敝帚千金》

1904年年初，基于“白话”一栏目在社会上有极大的良好影

响,《大公报》决定趁热打铁,结集出书。从2月份开始,就在告白中预告:将出版白话文集《敝帚千金》,于“明春出售”。此广告反复刊出,以造声势。4月,该报按计划将“从前报上所登的”白话,“另印成一本书,共分五类,一开智、二辟邪、三合群、四劝戒缠足、五寓言,起个名字叫《敝帚千金》,贱价发卖”。4月22日,该报报头左侧首条登的是《京话〈敝帚千金〉第一本出书》的广告,围绕以花边,煞是醒目。此书出版后,仅用了半个月,就已“售罄”^①。到6月8日,该报告白称:“《敝帚千金》二册已出第二批”。出售仅一个多月,即再版,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高。

《敝帚千金》的热销,给了《大公报》极大的鼓舞,于是决定新辟“敝帚千金”栏目,与“附件”并行,以满足读者的喜好。1905年8月20日,《大公报》刊登一则“本馆特白”,云:“中国华文之报附以官话一门者,实自大公报创其例。以其说理平浅,最易开下等人之知识。故各报从而效之者日众……今同人议定,由本月二十一日起,于附张中纯用官话印成书式四板。阅者可汇存装订。其宗旨以无背真理、普及国民为标准。其名称……‘敝帚千金’。”次日,《大公报》宣布“体例由今日改良”,正式增加“敝帚千金”栏目,在附张中出版。到1906年年初时,该报不断有《敝帚千金》之六、七、八、九册续出的消息,并且是多处代售。该系列丛书销量之巨、影响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敝帚千金》版是每日都有,“随报附送,不取分文”。这样,等于平白地增加了每日3000多字白话文写编印的工作量,忙得英敛之连习惯成性的日记也一时顾不上记了。也许是基于成本和劳动量的考虑,到1908年时,该报决定取消此版,集中力量办好“白话”。这年的2月7日,“本馆广告”中讲:“本报自出版以来,即附以白话一门,实开各报之先声,久为社会所欢迎。明达嘉许,亦积至三十册。除附报奉送外,另行装订销售者,亦至数万册之多。”

^① (告白),载《大公报》,1904-05-09。

基于如此蒙受欢迎，该报决意“不停刊”，继续办下去。“此后，专择言近旨远、饶有趣味者，不拘多寡，附于正版，一如旧例”。此后，将“敝帚千金”版和“附件”栏目取消，改出“白话”。“白话”实际上是“敝帚千金”的继续，其宗旨与内容均保持了一致性和连续性，新出的“白话”结集出版时仍以《敝帚千金》为名。这样，直到民国前，《大公报》上不断地有续出或再版《敝帚千金》的消息。

DAGONGBAO BANIANSHI

第七节 重视女性

一、唤醒“国母”

《大公报》创刊后，坚持不懈地提倡女学，反对妇女缠足，十几年如一日。这既是清末该报的一个特色，也是该报对社会所做诸多贡献中比较显著的一个方面。

该报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取决于母亲的素养。“女子要是不明白事理的人，糊糊涂涂的管教子女，不是任意纵容，就是朝打暮骂。他还能够管教出来好孩子吗？”所以，“女子有了好智识，不愁将来的国民，没有家庭的好教育”。该报指出：兴女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盛，“这件事，往大处说，关乎国家的强弱兴衰；往小里说，也关乎风俗人心”。因此，它强调“讲究强国的法子，先由女子教育人手”^①。一旦“我国家果能大兴女学，尽脱却女子之羁绊，扫除世俗之谬解，行见国无愚蠢之妇女”，那么，不仅是“家有庭训之良师，国民文明之进步，必有异常勇猛者”，并且，“全国之教化亦可从此而兴盛，其程度将建于最高点”^②。

^① 《国民之母》，载《大公报》，1908-09-21。

^② 《读碧城女史诗词有感》，载《大公报》，1904-05-11。

针对当时社会上忽视女子教育的陈规陋习，该报曾反复予以批驳。在《大公报》出版一周时，英敛之写了一篇《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批评中国有两句最坏的古语：一句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说女子认字命苦。英敛之反问道：难道许多做太太的，都是不识字的？受穷苦当乞丐的女人，都是文人学士？常见许多外国妇女，比中国许多男人还“出色”，岂不都是从念书认字里得来的好处？^①后来，该报还通过文章特意指出：“女学之兴，有协力合群之效，有强国强种之益，有助于国家，无害于男子。”^②

在这种思想促进下，该报积极提倡女学。它创刊不久，就在附件栏目连连发表文章，强调兴办女学的重要意义：“开智强国之策，在乎广设大小学堂，以立之基；尤宜广设女学，以正其本，使通国之人，耳目一新。无论男女，皆奋然向学，有特立之志。”^③它认为女学不兴的病原有四，守旧与维新，各占两个。守旧的病原是，“事事因循，得过且过，得了且了”；维新的病原是，“事事浮嚣，一举一动，不待理不审势”。它强调：“女学既立了，千万要责实效用实功。妇德、妇言、针黹、烹调之外，总以工艺制造为要……可千万别上书呆子的当，专讲博学多闻，越博越不专精，可就坐了空谈无补、能说不能办的毛病了。将来也不过多出几十万女秀才、女翰林、女洋学生，于事仍无补救的。”^④1906年2月，该报用八天时间，连载了吕碧城的《兴女学议》，它认为：“今日女子之教育，必授以世界普通知识，使对于家不失为完全之个人，对于国不失为完全之国民而已。”文章最后指出：“今日之教育，播种而待结实者也，非分株而栽植也；教一人而得为大多数人之用，非仅为个人之用也。顾欲令学者尽教育义务于将来，则必培植初级师范之材于现在……果卒业者，皆出而任教育之事，则十年之后，教

① 参见《讲女学堂是大有关系的》，载《大公报》，1902·06-24。

② 《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载《大公报》，1904-05-20。

③ 璩寿：《兴女学议》，载《大公报》，1902-08-12。

④ 《就中国现势筹划女学初起办法》，载《大公报》，1902-10-12、1902-10-17。

育真普及矣！”

1907年，有人对于兴办女学，“日就消极”，有人提出“慎防流弊”，有人甚至主张“暂行缓办，先致力于家庭教育”等。该报发表了《女子教育平议》，指出当时最重要、争论最多的是兴办女学究应“造成何等之女子”？它主张：“我们今日暂勿求平权男子之女子，宜先求不累男子之女子；暂勿求超越社会之女子，宜先求裨益社会之女子；暂勿求具大学识之女子，宜先求粗受教育之女子。约而言之，不外所谓造成他日之良妻贤母者为近是。”文章最后强调：“贤母良妻者，为女子惟一之天职，即女子所待为自完其人格之具。人格既高，则一切慎防流弊之说，自无庸施其束缚。而一群人之对于女学也，知女子人格系天赋固有之事，非附属于男子之事。而女子之自待也，知贤母良妻者，为其天职上负责任之事，非对于男子而荷义务之事。主旨既清，百绪就理……近之不触庸耳俗目之所忌，远之不貽人心风俗之隐忧。则今之持消极主义者，其芥蒂亦当涣然冰释，而女学之前途乃不可限量尔。”^①后来，该报甚至认为：“吾敢干冒时讳，勉进忠言于我国女子之前曰：女学固今日中国之急务，而女权实今日世界之缓图。”

民众素质是一项综合指标，它不仅包括知识能力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包括体魄的强健。因此，这期间的禁缠足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在社会上展开，民间纷纷成立不缠足会、制定不缠足章程等。该报一贯坚决反对妇女缠足，它不仅仅对各地出现的不缠足会给予及时报道，不惜篇幅地登载“不缠足会章程”或演说，同时还从舆论上宣传缠足的危害。创刊号的“附件”栏目，首先就发表了《戒缠足说》，指出缠足有三大害处：一伤身体，二操作不便，三于生育受害不浅。它还从古今中外、天理人情等多方面，长期反复地说明革除这个恶习陋俗，是“去害强种的第一件要紧事”^②，否则，“家家是一座刑部”，“自初裹至裹成，不知害了多少良女子”。缠足不

① 《女子教育平议》，载《大公报》，1907-07-08。

② 《也算自强的一件大事》，载《大公报》，1902-11-02。

仅害己，并且害国，是为外国人所不齿的陋习，与烟枪一样，已成为外国人嘲笑中国的笑柄。

在各种新思想广为传播的背景下，女性的素养提高以及放足等，不仅改变了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也必然带来了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的变革。对此，《大公报》不仅给予肯定，还积极促进新的婚姻、家庭模式的形成。

传统婚姻是由媒人牵线，父母做主，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父母同意，婚姻大事就算敲定，而父母并不以是否合自己儿女的心意作为选择的标准，实际上，当事人的意愿通常是忽略不计的。新式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也就是要寻求志同道合者一起来组建新家庭。而摆脱原有羁绊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征婚广告来寻觅自己的理想对象。《大公报》是这一做法的开拓者。

1902年6月26日，《大公报》刊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内容如下：“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人，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信面写AAA，托天津《大公报》馆或青年会二处代收。”

征婚者摒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通过广告寻求佳偶，实为求婚方式的创举。而他的择偶标准，无疑也遥领时代之潮流，反映了当时的先进人士对理想女性的看法。第一条是在生理上的自然、健康；第二条则是知识方面的要求，几乎与当时先进之男性的水平无异。至于民族、门第、年龄、外貌等反倒没有特别的期望。征婚者在结婚礼仪上也提出要废除旧俗，“照文明通例”。此文明通例之义，有参照西方风俗的意思，经过近一个世纪对西方的认识，人们已将西方看做先进与文明的象征。

同样，传统的中国婚礼讲求各种繁文缛节，令人不堪应付，自

然也就成了婚姻变革中的一项内容。相比照而言，西方人的婚礼则是简洁和愉快的。西式婚礼最大的特点是体现新郎新娘的意志，双方父母居于次要位置。这与中国传统婚礼完全由父母做主，一对新人像木偶一样任人牵弄不同。西式婚礼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但没有形成什么气候。1905年左右，由于其形式颇合主张婚姻自由人士的口味，一时间实行者大有人在，报刊的报道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在一些大城市成为时尚。

《大公报》于1910年以《文明结婚》为题报道了一场婚礼实况，我们从中可体会一下当时西式婚礼的场面。所谓“文明结婚”，实际上是一场中西合璧的婚礼。从形式上看，保留了一些传统婚礼的成分：叩谒家长，体现了对家长的尊重；宴饮欢聚，是传统婚礼的必备程序；两新人相向两揖一节，也明显是从传统婚礼移植过来的。介绍人对于自由结婚来说，本是可有可无的，也在新式婚礼上出现，颇有深意。一对新人都是学生身份，说明带头实行新式婚礼的人士有一定的教育背景。演说是当时新式婚礼所特有的，多半是针对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发表一番言论，有作为一种新事物鸣锣开道的意思。因此，演说者都是当时说话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名流。这场婚礼上的演说者，为该报的创办人英敛之。演说词中有“夫妇之道，最重爱情。有此种真精神以固于其间，则百年和合，永无反目之虞。我国数千年来，婚姻一事，专听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其祸之烈，不可胜言……且我国结婚一事，繁文缛节，虚浮滥费，举皆无益……”。在这则报道中，还专门记录了新郎新娘互戴结婚戒指的细节：“仿泰西通俗，互将戒指戴于手上”。大概中国人在婚礼上互戴结婚戒指的仪式是从那时开始的。

二、女性与《大公报》的新闻传播

《大公报》对女性的重视，并不只停留在舆论呼吁上，而更注重通过新闻报道，来直接促进女性素养的提高和女学的发达。因此，在言论上倡导女学、放足的同时，《大公报》在新闻报道上也注重对当时各地女学、女校办学情况的及时报道。无论大江南

北，凡是有关办女学的信息，该报都仔细收集，予以报道。同时，对西方文化女性的介绍也自然成为该报的一项经常内容，如关于美国女律师、女医生等的报道与赞扬等。在提倡废缠足的同时，该报还报道了各地办戒缠足会的消息，以及女子放足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大公报》上俯拾即是，其中很值得一提的是，该报针对杭州惠兴女杰以身殉学事及其影响进行了长期跟踪报道，以借机推动女学的普及。

1905年，杭州贞文女学校的创办人惠兴女士，因办女学款绌，学校难以为继，而在12月21日于杭州家中服毒自尽，以身殉学。她留有遗书上当道，请拨常年经费以维持女学。

惠兴死后，在社会上，尤其是事发所在地的南方地区，并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当消息传到北方时，则迅速震动了舆论界。得知消息的《北京女报》主人张筠蓁很快即在陶然亭为之开会追悼。《大公报》对此事的关注也是从此开始的。1906年2月4日，该报有《女追悼会》消息一则：“日前，女报馆张太夫人在陶然亭为杭州女士开追悼会”。

此后，惠兴的生平事迹也很快成为各报关注的热点。《大公报》则先于3月14日发表了浙江武备学堂总办三多的《记惠兴女杰为学殉身事》，对该事的起因、经过等进行了详细报道，并附了“记者识”。在追溯惠兴之死的意义与表彰北京伶界义演助学的义举时，作者连续使用了几个“呜呼”，以表达心中郁积的感慨。它一面赞扬北京伶人“悯女杰之殉身，慨学界之寡助，大动感情，担任义务”，一面又慨叹此事的发生：“呜呼！江浙为财赋之区，以区区之女学，竟不能成立，致令惠兴女杰愤懑忧伤，牺牲性命，以身殉学，以冀人之一悟，闻之兴起”，由此逼出如下的责难：“岂其长江流域之士夫，不若大河流域之俳優欤”？进而，该报将江南绅学对惠兴的普遍冷淡归因为“乡间之子，见闻之孤陋，意识之狭隘”^①。

7月19日该报又载录了满族著名文人、内阁中书金梁的《拟

① 《记惠兴女杰为学殉身事》之记者识语，载《大公报》，1906-03-14。

请代奏为惠兴女士请旌摺稿》。这些作者无一例外地均将最高的赞美词献给了惠兴，称之为“女杰”，称赞她是“以一死收功于将来”，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伟伟须眉尚难其人，遑论巾帼”。经过《大公报》的如此宣传，惠兴的义烈行事遂在北方广为人知。

不只是报界与学界闻风而动，为感动大众，捐款助学，戏曲界实际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1906年3月13日的《大公报》已预告：“都下鞠部代表因浙杭惠兴女士之问题，大动感情，稟请官府，定于三月初五、初八、十二计三日内，在湖广会馆演戏，所收戏价，悉数汇寄杭州贞文女学校，以资经费。”记者不禁赞叹伶人“热心学界，一至于此，庶可为士大夫之向导乎”^①。其中，北京玉成班班主、京戏名演员田际云，表现尤为出色。他参与发起创办了“妇女医学会”，而且将惠兴事迹直接搬上了舞台。上述三天的演出活动，便是妇女医学会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大公报》在1906年3月24日的《记妇女医学会》中，对此予以充分报道。随后，1906年4月1日、2日，由田氏担任主角的《惠兴女士传》也首次在福寿堂开演，每次先有演说员对众演说。以后，此戏又移至广德楼上演。5月26日开戏之前，也安排了三位志士讲演，内中一人演说的题目即是“惠兴女士全传”，《大公报》称之为是“演说创举”^②。

《大公报》注意到，这种演戏加演说的方式，因鼓动性强，在当年颇能产生感发观众的效力。5月27日的戏园中便出现了“忽闻哭声起于南楼之下”，且“大号不止，警兵闻知，即前去劝解，方始停哭”的一幕，而“细询原由，实因观剧触发感情之故”。于是，该报评论说：“北京戏园二百余年，此乃感动之第一声也”^③。由于受到欢迎，反响强烈，天津天仙茶园老板赵广顺也专程赴京，“特约田际云将所有演《惠兴女士》原戏角色至津演唱”，“并请学界诸公人座观剧”。该戏于8月28日至29日在天津连演两天，亦

① 《敬寄兴学》，载《大公报》，1906-03-13。

② 《演说创举》，载《大公报》，1906-05-30。

③ 《文明戏剧之感动力》，载《大公报》，1906-06-04。

大获成功。《大公报》则以《新戏来津》、《名优爱国》为题，分别在8月27日、9月13日的新闻中给以关注。

报刊上连篇累牍的宣传，直接刺激了社会各界。《大公报》还及时报道了大家纷纷捐款的生动局面，该报提到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单是其夫人向妇女匡学会认捐就有二百两之多。^①私人捐资，加上官府拨款，该校在1906年4月就得以重新开学，并“更贞文之名，为惠兴女学堂，以志不忘”（即现在的杭州惠兴中学）。王多在《记惠兴女杰为学殉身事》一文结尾有云：“呜呼！学校成矣乎？曰成矣。学校成而女杰死。呜呼！女杰死矣乎？曰死矣。女杰死而学校兴。学校兴，女杰虽死犹生”。可谓定评。

而此事的影响并非到此为止。自1904年开始在北京出现的女子教育萌芽，经过大张旗鼓地为贞文女学校募捐，表演、宣传惠兴事迹，日益赢得社会各界的理解与同情，至1906年便推演形成了兴办女学的高潮。这一年的《大公报》，对有关京师新办女校的动态作了连续报道，并有过如下的评论：“自惠兴女士一死，北京女学逐渐发达。如江亢虎所设之女学传习所，大公主之译艺女学堂，近者设如女匡学会，虽优伶歌妓，亦动热诚……风气之开，进而愈上，不禁为我中国前途贺也。”^②

该报不仅在新闻报道中突出女性，作为《大公报》主人的英敛之还积极主动地吸纳和延揽知识女性参加新闻工作，最早为《大公报》采写新闻的女性应该是英敛之的夫人。1895年，29岁的英敛之与皇族爱新觉罗·淑仲结婚，淑仲颇有文化教养，能诗会文，因是皇族，她常和宫廷来往，“时侍慈禧太后，屡为《大公报》写宫廷通信，颇为精彩”^③。早期《大公报》上那些有关宫廷动态方面的惟妙惟肖的生动报道，应该出自英淑仲之手。现有资料表明，加入《大公报》的第一位正式女新闻工作者是吕碧城。她于1904年

① 参见《惠兴女学捐款之踊跃》，载《大公报》，1906-05-11。

② 《女学发达》，载《大公报》，1906-04-03。

③ 张莲舟：《大公报大事记（1902—1966）》，载《新闻研究资料》，第7辑。

4月至9月间，受聘做该报的编辑，曾为该报撰写了一系列兴女权、女学的文论和诗词，在当时京津地区曾经产生过极大的社会影响。为《大公报》撰稿的女性，除了英淑仲和吕氏三姐妹外，还有“女教员陈作新”、“紫英女史”、“英秋女史”等。

三、吕氏三姐妹与《大公报》

清末，安徽旌德出了吕氏四姐妹，都以诗文见长。她们的父亲吕凤歧，是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及第，家学渊源。四姐妹中以三妹吕碧城声誉最隆，她擅长声律，雅爱诗词，后来成为“南社”的成员，柳亚子评为“足以担当女诗人之名而无愧”。四姐妹中，除四妹声名稍逊外，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眉生都表现出色，有“淮南三吕，天下知名”的美誉。而这三个姐妹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则得力于《大公报》及其主人英敛之的揄扬。

吕碧城，又名“兰清”，年仅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经颇为可观。当时有才子美称的樊樊山是她父亲吕凤歧的翰林同年，读了吕碧城的诗词，不禁拍案叫绝。这年，其父亡，两年后，其母送她远赴天津，投靠时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并在当地接受现代教育。1904年春，20岁的吕碧城与舅舅意见不合，负气出走，在赴津的列车中，遇到了一位好心人佛照楼主妇（不知真实姓名为何），将其携往寓中住下。当她得知舅父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住在《大公报》社时，便驰函畅诉来津种种。函为英敛之所见，大加赞赏，亲自前往邀吕到报馆内居住，并聘其为助理编辑。从此，吕碧城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吕碧城后来在《予之宗教观》一文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是这样写的：“塘沽距津近。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欲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愤甚，决与脱离。翌日逃登火车。车中偶遇佛照楼主妇，挈往津寓。予不惟旅费，即行装亦无之。年幼气盛，铤而走险。知方夫人寓大公报馆，乃驰函畅诉。函为该报总理英君所见，大加叹赏，亲谒，邀与方夫人同居，

且委襄编辑。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可见她获知于英敛之的最初这段过程，是颇有点传奇色彩的。

英敛之结识吕碧城之后，颇为她的才华所倾倒，不仅立即聘她为《大公报》的编辑，并且逢人介绍，引见京、津名士与之结交，进而在《大公报》上频登吕之诗词、文章，展示一代才女之风采。

吕是1904年5月8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来《大公报》馆的。英敛之在该日的日记中写道：“接得吕清扬女史一束，予随至同升栈邀其去戏园……晚，吕女史移住馆中，与方夫人同住，予宿楼上。灯下闲谈，十二点少秋去。碧城女史书襄作‘满江红’词一阙，极佳，附录于后：‘晦暗神州，听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匡挥涕发狂言，君休讶！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阁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达，情空惹！’”两天后，5月10日，这首令英敛之敬佩不已的词就登在了《大公报》的“杂俎”栏目中，落款是“碧城女史”；诗后有编者的附注，给以揄扬。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次日，《大公报》特在“论说”中刊登了《读碧城女史诗词有感》一文，对吕公开称赞，颇为醒目，并继续在“杂俎”栏目中登载《碧城女史诗词一首》。随后，吕碧城曾经短暂回过塘沽。从5月20日到月底，《大公报》对吕碧城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20日、21日的《大公报》在“论说”栏目中，以“来稿代论”的方式，连续刊登了署“碧城女史吕兰清稿”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22日的“论说”是对上文的回应，题目是《读碧城女史提倡女学之宗旨书后》，24日的“论说”又是吕碧城所做的《敬告中国女同胞》，25日《大公报》的“杂俎”栏目中是“碧城诗一首”，27日的“杂俎”是《碧城词一首》，28日和29日“杂俎”登的是和碧城诗词，其中，28日的那一部分几乎占了一个版的篇幅。31日的“代论”则是吕碧城所写的《远征赋有序》。至此，在短短的时间里，《大公报》的“论说”有四天登的是吕碧城的文章，有一天是对其文章

的读后感。“论说”栏目是《大公报》的旗帜，如此密集地在最重要最醒目的位置登刊的文章，《大公报》这种做法本身就明显地在推介吕碧城，加上与之相关的诗词多首，“吕碧城”的名字几乎天天醒目地在《大公报》上出现，真正是“唱和无虚日”了。此后，《大公报》上经常见到她发表的文章，各种艺文聚会的新闻报道中也常常能看到她的芳踪。

凭借着本身的才情和英敛之等人的揄扬，没有多久，年仅20岁的吕碧城在京津一带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闺媛才女了，京津名士慕名而访者众多。著名的女资产阶级革命家秋瑾与吴芝瑛与她一见倾心，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发刊词就是吕碧城的手笔。而吕与秋瑾的初晤是在《大公报》馆进行的，整个过程在英敛之的日记中有所记录。

1904年5月18日，即吕碧城回塘沽的次日（阴历四月初四日），英敛之在日记中云：“道恒由京来，谈及北京亦有一碧城女史，乃姓秋，适王氏者也。”5月28日再记：“润沅由京来函，秋碧城女史十六日来津，为会吕碧城。”此后没有提到秋瑾来访事，直到6月10日，“十点，秋闰瑾由京来……饭后，秋留馆……秋与碧同屋宿”。

吕碧城在《予之宗教观》文中，对此经过有栩栩如生的记述：“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竟慨然取消其号，因予名已大著，故让避也。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闰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眠朦胧，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鞋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皮小奁敷粉于鼻……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行进，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这些与英敛之所记相吻合不悖。

在短暂回塘沽时，吕碧城发现舅父严凤笙已撤任记过，自己

“非南归不可”。这是吕碧城无论如何都不情愿的，情急之下，她一日两函致英敛之，“托代伊觅学堂。伊颇不欲回乡，寂寞黑暗世界也。情颇怅悒”（见英敛之四月初六日日记）。英敛之马上与多人计划吕碧城读书事。但吕之国学根底已深，实无可进之学校。于是，英敛之转而想由她来办一女学。从此，英敛之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北洋女学”的筹划事宜，从“写女学开创章程”到寻校舍、糠糲、置办家具无不躬亲其事。在女学的筹划过程中，得到了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支持。在7月18日（阴历六月初六日）的日记中，英敛之写道：“晚间润沅来，言袁督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有了这两位当权者的支持，女学事比较顺利地办了下來。1904年9月，在英敛之日记中被称为“天津公立女学堂”的“北洋女子公学”成立，吕碧城任总教习。两年后，“公学”改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提任23岁的吕碧城为学校的监督（校长）。于是，吕碧城在这所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一呆就是七八年。她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又将中国的传统学问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公学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到1909年，第一期师范科毕业的仅10人，其中有颇受袁世凯敬重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二人都曾在这里亲聆吕碧城授课。

然而，英敛之与吕碧城在此期间开始失和，英频频表现出对吕的不满。女学已成，为之鞍前马后奔波的英敛之却辞去董事之职，“告以此后我等不再干预”。其原因，在两个当事人的记述中并没有直接的表露。英在1908年10月7日（阴历九月十三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言。此后遂永不来馆。”吕碧城曾经由英敛之介绍，师从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学名学，为严复的女弟子。严复评论吕碧城“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

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他认为：“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中之故。英敛之、傅向沅所以毁谤者，亦是因渠不佩服此二人也”^①。这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与此同时，吕碧城的两位姐姐吕惠如和吕眉生（又名清扬）相继来到天津，最初都是与英敛之夫妇同住在大公报馆。英敛之同样为这两姐妹的才华所倾倒，并且印象始终极佳，友谊保持终生。不像对吕碧城，初时好得无以复加，后来坏到痛心疾首，几至绝交。尽管英敛之当时对吕碧城已有所不满，但仍敬重三姐妹之才情，积极地筹编《吕氏三姊妹集》。

根据英敛之日记所记，《吕氏三姊妹集》应该是在1905年4月中旬出版的，英敛之为之做了序和跋。在此书的序文中，英敛之详细地讲述了他们夫妇二人结交三姊妹的经过，以及对其诗文的评价：“予因得读两君诗及词。惠如则典胆风华，匠心独运。碧城则清新俊逸，生面别开。乃摘其佳者，登之《大公报》中，一时中外名流，投诗词鸣钦佩者，纷纷不绝。诚以我国女学废绝已久，间有能披阅史书，从事吟哦者，即目为硕果晨星，群相惊讶。况碧城能开新理想，思破旧锢蔽，欲拯二万万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为完整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惠如诗词，缠绵悱恻，怨而不怒，深合古风人之旨；其命意之高，琢句之雅，足徵其蕴蓄之所存……予久蓄兴女学之志，惟苦于师范无人，不克开办，今得天倾之便，乃奔走组织，获诸君于力，为天津公立女学堂。是年秋，予偕内子赴沪。值碧城次姊眉生适欲游津……偕航海北上……乃叹其家学渊源，有由来矣。眉生性豪爽，有古侠士风，言吐慷慨，气度光昌，素不屑弄事词翰；然落笔清灵，极挥洒之致，亦颇与乃姊乃妹并驾齐驱，各树一帜。何天地灵淑之气独钟于吕氏一门？！予夫妇既以获交三姊妹为荣幸，乃各录其稿若干刊行于世，俾我国女界中，得有所观感兴起。”

1905年4月13日，在《大公报》第一千号的“杂俎”栏目

^① 《与甥女何纫兰书》，见《严复集》，第3册，8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中，刊登了英敛之署名的《跋吕氏三姊妹集》以及英夫人淑仲和三姐妹署名的诗文。这些诗文占了一个版的篇幅，甚是醒目。在该跋文中，英敛之在强调了女子教育在当时的重要性之后，提到了出此文集的初衷：“近者，吾国废科举、兴学堂，亦稍知所步武矣，独于女学尚缺焉。弗讲寥落如晨星。而吕氏三姊妹承渊源家学，值过渡时代，擅旧词华、具新理想，为我国女学之先导，树吾国女界之标的。循华求实，由筌得鱼，未始无响影于社会，未始非民群进化之一阶。此则予刊行是集之微意也。”

可见，英敛之以及《大公报》对吕氏三姊妹如此爱重与推崇，不仅仅是由于才女难得，更在于三姊妹对清末国民教育中的女学教育的榜样作用，对整个国民素质提高的积极意义。

此后，大姐吕惠如做了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二姐吕眉生做了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四妹则做了女学教师。吕氏四姐妹同事女子教育，三位姐姐都担任校长，此道风景，在清末亦传为美谈。三姊妹与英敛之保持着长期联系，并时有诗词、论说在《大公报》上发表，即使是身居异域时，也函寄英敛之，嘱登报。从1906年2月18日起，《大公报》连续七天在“言论”栏中刊登吕碧城写的《兴女学议》。1907年6月至10月间，《大公报》的三篇“言论”用的是吕眉生、清扬女士稿，当时她人已在奉天。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卷 辛亥革命后的 《大公报》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一节 辛亥革命期间的徘徊

一、由观望到失望

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一直是惧怕暴力革命的，惟恐动荡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辛亥革命前，它一面是力促政府进行立宪政治改良，一面同情革命者，劝其放弃暴力。而谁都没有料到，中国推翻旧王朝的辛亥革命竟然不期而至，在一夜之间爆发了。该报并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而放弃固有的君主立宪主张，更不情愿面对清王朝大势已去的事实，对这场摧枯拉朽的大革命

采取的是一种观望的态度，直到无可奈何地看着大清王朝最终灭亡。而大清王朝的终结，意味着该报所致力政治维新失去了对象。因而，对这次革命的结局，该报及其创办人英敛之不免表现出深深的失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南方的舆论、尤其是上海的报纸，反应十分强烈：“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外，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探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极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砸碎，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①北方则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所在，情况大不一样，反应普遍不够热烈。天津地近京畿，加之《大公报》一贯的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最初有些不以为然。10月12日，《大公报》刊布了清廷的一道“电旨”，称“瑞澂电奏，探知革党潜匿武昌，定期十九日夜闻起事……该督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办理尚属迅速。”文中将此次起义称为“鄂乱”，将革命党人称为“革匪”、“匪目”、“匪党”，此种蔑视的称呼一直为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所沿用。次日，该报在“闲评一”中将这次革命、乃至作为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统统视为动乱，意欲劝止：“吁嗟！革命。吁嗟！川乱。何苦以满腔颈血，为肉食者升官发财之资料乎！噫，可以休矣！”文中认为，此次“鄂乱之终局，以一件黄马褂，一张大保案了之”。10月14日，京津一带都已知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该报仍发表言论说：“就现势而论，革党将虞不敌……政府苟幡然悔悟，实力改革，与国民相见以诚，俾知朝廷奋发有为，凡立宪国民应享之权利，不难安坐而获。则夺去革党之标帜，而弥天大祸或可挽回。”10月下旬，在一些文字中开始用“革命军”一词代替“革匪”等蔑称。对于武昌起义，则一直到了11月17日，它在《论排满排汉之谬见》一文中才改称“革命”，

^①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辑，65页。

不再称“鄂乱”。18日，它发表了《论今日政体上之解决》，提出“仍以帝统归之朝廷，改为中华联邦帝国。由各联邦公举代表，晋京组织联邦国会，改造联邦。皇帝除代表国际外，所有外交、军事、财政、交通诸大端，均由国会议决，政府执行。既可达人民之志愿，仍不失皇室之尊严，而万世一系之基，因之而固，种族相仇之祸，因之而消。”在革命之势如破竹，无可阻挡之际，该报所提供的仍然是一个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

11月1日，清廷不得已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开始了所谓“停战议和”。该报连连发表文章，积极支持。该报虽然衷心希望和谈能够成功，尽快实现国家的和平与安宁，但对曾经出卖过维新派的袁世凯却时刻保持着警惕。因此，它不仅随时报道和谈的进展情况，还及时发表评论，引起国人的关注。尤其是后来，袁世凯亟亟向帝国主义求援时，该报就一再发出警告，说：“自外人居间调停，南北两方，已由主位而移人客位，而外交团则以客位而竟居主位。南北两方之主张，非经外交团之承认，即不能成立。试观昨日袁世凯与伍廷芳，彼此以违反停战条约之说，互电话让，英使即喷有烦言。谓彼既出而调停，两方即不得直接交涉。聆其口吻，俨然以盟主自居，欲莅两造而执牛耳……窃愿双方以国家为前提……毋以阉墙始以破家终，则庶几我中国之主权，不致尽为外人所左右乎！”^①

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该报显然对这位曾经倡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领袖不感兴趣。对于孙中山的当选，它只在30日发了一条短讯，标题为《南京又开选举大总统会》。此后，该报又陆续报道了外交团和民军内部造谣污蔑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流言蜚语。1912年1月18日，在《论大总统应兼具破坏建设之能力》一文中如是说：“今南京组织共和政府，第一任总统，首举孙文。夫孙固以洪秀全第二自命者，历年飘泊外洋，屡起屡颠，是其才尚不足言破坏，何论建设！观其受任之始，首以排满为惟一目的，以改历为伟大之政策，仍不脱易姓改

^① 《闲评一》，载《大公报》，1911-12-29。

元之旧知识，谓其无帝王思想，吾不信也。”不久，在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挤压逼迫下，孙中山辞职。15日，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代之。

该报对袁世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恨之人骨，并不以为他会比孙中山更好，但又无可奈何。辛亥革命进展之神速及其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结局，都是出乎《大公报》及英敛之所预料的。“居然以最短促之时期，最诙谐之政策，推翻帝制，改建共和。非但旷古所未闻，抑亦全球所仅见。”^①虽属意外，但大清王朝毕竟已成为历史，中国不可逆转地迈入了民主共和的门槛。英敛之和他主持下的《大公报》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

1912年2月23日，农历新年伊始，该报版面做了大调整。第一版报头右边改为大中华民国纪年，第二版或第三版改为首刊新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布告、命令等，代替原来的“邸抄”、“谕旨”栏目；“要闻”栏目改为报道袁大总统和南北临时政府、各党派的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这天起，刊登了“大公报馆”的一则告白，说：“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如是一连登了十二天。此后，英敛之即退隐北京香山静宜园，从事教育、慈善、宗教等方面的工作。该报笔政改由樊子燊、唐梦幻等主持。^②

综上所述，武昌起义以后，该报一直在观望游移。它并不希望清王朝被推翻，但事与愿违，革命势力不可阻挡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既不坚定不移地支持某种政治势力，也不完全反对任何一种力量。但应该指出的是，该报始终没有诋毁革命之意图，即使是在针对革命期间造成的各种破坏的报道上，该报也都是从战争危害社会民生的角度进行的。

二、无所适从的版面

态度上的观望、游移，反应在版面上，这个时间的《大公报》

^① 《论我国今日不可再乱不能再乱之理由》，载《大公报》，1913-05-13。

^② 参见张薰舟：《大公报大事记》，载《新闻研究资料》，第7辑，192页。

显得无所适从。

作为“新闻纸”，该报对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及时而又忠实的报道。武昌起义是10月10日爆发的，该报对此进行的最早报道是在10月12日，刊布了清廷的一道“电旨”，内容是时任湖广总督瑞澂虚报的平定武昌乱事。次日又在“谕旨”中，刊登了朝廷对瑞澂办事不利所做的警告：“著即行革职，带罪图功”，“以观后效！”在“要闻”栏目中，则有《武昌革党起事之警电》，报道了此次“鄂乱”前，从官府的角度获得的某些相关信息，占了半个版面。关于此次起义的报道比重明显增加了。14日在“要闻”栏目中，则开始设有《武昌乱事近闻一束》，此后经常刊登。其内容是关于武昌起义中的所见所闻，一般都是比较详细的通讯报道，如新军盘查某坐轿女人等细节的描述。与此同时，在“湖北”栏的地方新闻中，几乎都是关于武昌起义的报道，如《十八（日）夜革党起事之详情》等。这些报道从起义前官府所察觉的一些迹象、新军的密谋，到起义进展情况、官兵与新军士兵的所作所为等都有比较详尽的报道，为世人保留了不少有关此次起义的珍贵资料，真正可以说是在“见证历史”了。随后，各地纷纷响应起义。对于一贯重视新闻报道的《大公报》来讲，这些信息又必然地成了报道的重点。此类报道比较早见到的是15日该报的“四川”栏中报道了《革党入川之消息》。随后，在新闻栏中，某地“失守”的消息俯拾即是。此外，该报还绘声绘色地报道了上海等大城市中金融、商业等受武昌起义之影响而带来的恐慌，以及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秩序混乱等情况。这些信息综合成了一幅清王朝不堪一击的图景，革命之势不可挡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从这些报道中，也不难得出大清封建王朝气数已尽的必然结论。但该报并不情愿如此，在言论上发表了一些语无伦次、前后矛盾、掩耳盗铃的分析。

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随后一呼百应，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整个大清朝廷上下顿时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早在10月15日的《大公报》要闻中，朝廷又是通电各省军警戒严，“慎防匪党，以备不虞”，又是“禁止报登鄂省军情”。这些为人们勾勒出

一幅幅活生生的清廷腐败无能、惊恐无措的画面。《大公报》一面进行忠实报道，一面怒骂失职的官员、将领为“脓包”，同时一再高呼“镇定！”“镇定！”似乎“镇定”了就能反败为胜，挽大厦于将倾。

10月18日，该报在“闲评一”中描写了帝都官员的惊慌：“近闻京官之财多而胆小者，纷纷购买金磅；或竟送眷南下。以致金价骤见高涨，海轮倍形拥挤。”该报认为“此等举动最足以摇惑人心”，建议朝廷“设法禁阻、定罪罚庶，为杜渐防微之至计”。21日，该报又在“闲评一”中疾呼：“大凡兵乱之时，未乱之地方宜持之镇定。而尤宜镇定者，则惟京师。京师为全国所观瞻，一露慌张，人民即倍加惶急。”它安慰当局说：“鄂乱仅一隅之乱耳”。进而强调：“镇定乎，此正今日安危治乱之符矣。”在同日的“白话”中，它又告诫民众“不可妄信谣言，自相扰乱”。对于这次武昌起义中一呼百应的局势，它做了如下的分析：“他们用种族的问题作根本，用赃官污吏的苦害民为借口”，然而这些都是“毫无价值可言”的货色。“不过仍是以暴易暴，反更加上杀戮之惨。不过多涂炭些个黎民百姓完了。”并且，“凡是乱党，都是利用谣言，编造出种种叫人担惊害怕的事来，编造出种种似是而非的事来”。因此，它劝百姓们不要轻信“谣言”，“把一个无事的地方，变成一个惊慌离乱的地方”。

在一片嘈杂的惊叫声中，《大公报》的几句“闲评”看来是不足以让人镇静下来的。26日，该报干脆在“言论”中细数《受鄂乱之影响者》，将京师的惊慌放在第一位来讲。“乱事之初起也，京师得信最早、戒备最严，而慌张亦最甚。无端而罢秋操，无端而停邮电……且东调西征，如逢大敌；朝令暮改，靡所适从。”这样无疑使“乱党之势力未能骚扰全国，而政府先自骚扰也；乱党之气焰未能慑天下人之心，而政府反助之扩张也。政府其将为革党树之先声乎？！”这些呼吁在革命军迅猛取胜的背景下显得相当苍白无力，很快“人心浮动，各省靡不皆然”。

该报一面呼吁“镇静、镇静”，一面慌慌张张地为当局献计献

策：一是“各地亟宜组织民团”，以保护地方治安，其方略之细致，连“操练”都一一讲明；一是快行立宪政治，“革党既斤斤以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自辩矣”，那么快行立宪政治，足以断其借口，祸乱自然可以消弭。

10月16日，当闻知朝廷有起用袁世凯以平定“鄂乱”之议时，该报一面发表文论，希望袁能为朝廷解忧济困，一面又对袁很不信任，16日的“闲评二”中提到：“川乱，急起用岑；鄂乱，急起用袁。不意岑、袁起用之机竟与乱事相须！”二人此前都是被闲置不用的，“若岑、袁者，真可谓治世之弃物，乱时之能臣”。该报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呜呼！时势既造出英雄矣。此果时势之幸乎？抑岂英雄之幸乎？！”因此，此后有关袁世凯的大量报道中，该报忽而称颂“袁内阁英才夙望，海内久仰其风采”，对其代表朝廷进行的“议和”是极力支持，忽而对袁疑虑重重，提醒国人警惕其行径。

武昌起义后，“沿江上下相继不守，西北山陕诸省闻风响应”，清军要么是反戈一击，要么是兵败如山倒。该报在对此进行分析时，提到清廷失军心、民心已久，“非一朝一夕矣”。既然是不得军心、民心已久，那么清廷走向灭亡之路已确实无可挽回了。但该报还能突发奇想，认为《大乱是现在的祸害，也许是将来的幸福》，幻想政府从此能“改弦更张”，痛行立宪政治，那倒是“小民无量的幸福”了。至于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性，该报则只能说三个字：“等着吧！”

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排满”作为救国的“起死回生之绝妙药”来看待的，因此，“排满”（驱除鞑虏）就成了革命派进行政治革命与建立新民族国家的起点，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当此革命爆发之时，该报再次大倡“民族调和论”，试图以具体的“融化满汉”的方案，来消除革命者的仇视，以躲过这一劫难。它说：“比年以来，不逞之徒倡导革命，以标识仇满为惟一之目的。”它辩护道：“满族、汉族，名虽分界，实则同胞”，“普天率土，一视同仁”。既然是如此，那为什么“朝廷以融和满汉

为心，而革党反得日肆排击者”呢？它认为，“以满汉形式区分互视几同异族故也”。既然是形式上出了问题，那么“欲化满汉之界，非亟改除形式不可”。随后，罗列了一系列包括改满族姓名为汉族姓名的方案，并强调“居今日而谋弥乱之方，盖急莫急于此者”。其实，这些临时抱佛脚的建议是根本不足以收买久失的人心，反倒显示了作者的焦虑与慌张。

该报认为朝廷的假立宪是造成革命的根本原因，因此，一面痛骂朝廷，敦促其快行立宪以求自保；一面又以爱国爱民为由，极力劝解革命者适可而止。在1912年1月10日的“来稿”中，借所谓“京师学界一分子”之名说道：朝廷能“开诚布公，不忍人民涂炭，恐召外人干涉，下诏罪己，改建内阁，协定宪法，开除党禁，停战议和，凡人民奔走呼号数年而不得者，一日逾量以偿”，革命党人就该知足了。

当袁世凯借革命势力逼迫清帝退位时，该报极力反对。从11月20日开始，连登“征文小启”，以《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为题，进行其一贯的有奖征文活动。因形势紧急，这次征文限期十日。这次活动的目的显然是想集思广益，为君主立宪的实现寻求广泛的理论以及舆论依据。十多天后，该报对征文评出了三等若干获奖者，将其文章陆续在“言论”栏目中刊出。这些文章所论各有不同，但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君主立宪政治是中国最明智的选择。此外，该报还采用直接撰写言论、选登“来稿”、“录稿”等多种形式，竭力宣扬中国只可立宪，不能共和。其依据主要有二：首先是共和政体本身并不完美，存在着诸多弊端。如该报12月份发表的言论《共和独立之研究》以及“录稿”《论美国共和政体之流弊》等。其次，共和政体不符合中国国情，必招致亡国之祸。原因是中国国力贫弱、民众智识低下、民族众多，共和政治必使中国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最终为虎视中国的外国侵略者所灭亡。所谓“中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人民程度，绝不宜于共和”！该报在12月和来年元月刊登了诸如《中国存亡问题系于民族之离合》、《论共和主义实召亡国之祸，哀恳全国志士维持现状意见书》等大

量文章，连篇累牍地强调君主制是中国保国、存种之道。

《大公报》在清廷已无力把握局势、革命者志在必得的背景下，仍幻想实现君主立宪，可以说是对它的主持人“明知事之不可为而为之”那种心态的最好注解。

DAGONGBAO BAIWANSHI

第二节 “敢言”本色未变

一、对袁世凯的抵制和谴责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起一个代表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央政府，使中国近代历史进入了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具体而言，从民国初期到1916年6月，是袁世凯统治时期，同时也是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后期阶段。英敛之虽然退隐香山，但他所奠定的《大公报》的风格基本没变。此后，它对飞扬跋扈的袁记政府有扬有抑，亦疑亦惧。在正面抨击上，虽不得不有所顾忌，但以各种形式对之冷嘲热讽，却是无日无之。针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该报仍然进行了强有力的抵制与谴责，始终保持了其特有的“敢言”本色。

1912年，袁世凯在代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3月1日，该报发表了《论袁项城被选总统》，将袁氏几十年驾驭权术、翻云覆雨的“生平行迹”分为几大“时代”，希望“论世者”对他进行“研究”。文章说：“项城者，才足以济变，识足以通时……其知人不在曾湘乡之下，而得人尤在李合肥之上。至其不避毁谤，不恤人言，虽以政学淹贯、负海内重望之张南皮，亦且不能及……顾尤所难者，孙中山则谓其熟有政法经验，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黎宋卿则谓其化干戈而讲挹让，大功所在，同人称道不置；黄克强则谓其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实不可没。嗟乎，孙、黎、黄者，

一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为民国临时副总统，一为民国临时陆军部长，皆为革命中之元勋，民国中之功首，其软服项城且如此，则项城真能操纵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人又无不为其操纵。其雄才大略，真二十世纪中东亚第一等人物矣！虽然，或以项城为魏武、新莽，或以项城为华盛顿、拿破仑，为私为公，须听自择。”

袁氏篡权以后，厚植私党，以达到其建立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有人说，他网罗的“人才”都是“北洋旧属”，有的说“公署之中，无非前清之龌龊官吏。议会之内，无非前清之走狗议员”^①。3月12日，该报发表《时事痛言》说：“今何如乎？利国福民者其口，徇私专制者其心。凡诸设施，好人所恶，恶人所好，无一不以亡清之覆辙，为前事之师，不过稍变其名目而已。以内阁总理之重任，而授之于出尔反尔之唐绍仪。郑五作相，时事可知！”后此时间不到半年，内阁总理换了三个。其下国务员“合全阁人物而观，泰半皆前在北洋时，钻营容悦于大总统，而为大总统之牛瘦马勃，以备不时之需者……则内阁既成为大总统之内阁；参议院亦不过大总统之参议院焉耳。于共和国家何与！于共和国民何与！”^②

此外，袁世凯从上台之初就非常注意控制舆论，他先后颁布了《报纸条例》、《出版法》等一系列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法令，并不惜动用暴力来压制、迫害异己的报纸和报人。进而在1913年，借武力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之机，发动了一场大量封报捕人的“癸丑报灾”。此后，新闻言论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压制。1915年12月4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报纸之责任与价值》（署名“迂叟”），对报纸不能实现“监督政府，改良社会”的理想表示失望，对袁世凯政府的禁锢言论行为表示愤慨，有“万能之政府，决不须报纸之监督，万恶之社会，又决非报纸之绵力所能改良”，“夫报纸因责任而有价值者也，既不能不丧失其价值，责任价值均不足惜，所难堪者，从事斯事业之人日日执笔磨墨……以做此无价值之生活，对于

① 《闲评一》，载《大公报》，1912-03-16。

② 《其斯以为人才内属乎？》，载《大公报》，1912-09-25。

社会仅有要求原谅之一法，而不得不出于此，为可悲耳”等语。

袁世凯在成功地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亟亟进行解散国会、毁弃约法、改元建号等一系列复辟帝制的活动。1914年1月13日，该报发表“闲评”说：“资遣议员案，已奉大总统命令施行矣”，“增修约法案，亦奉大总统命令施行矣”，“国会会长已矣，约法断根也！”5月1日，袁世凯一手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终于出笼。

根据这个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后来又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案》。袁世凯确立了自己终身大总统的地位，离称帝仅有一步之遥了。该报嘲讽说：“今大总统既能上契天心，下乎众望，不妨一连任再连任，十连百连，乃至无疆连。连至不高兴更连时，但由现总统指定一人以继其任。盖三之数虽少，尚不免有得失之争。定之于—，何等简捷，何等光明。若总统肯效法祁奚，内举不避亲，尤可杜绝野心家覬覦，而免运动竞争之怪剧！”^①

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准备活动相配合，在这期间，文化思想领域随之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什么“孔教会”、“尊孔会”纷纷出笼，遍于国中。陈焕章等人甚至带头要在宪法上明定“以孔教为国教”。对此，该报连连发表评论，表示反对。理由是：第一，“孔子非宗教家”^②；第二，“中国五大民族，回、蒙、藏都不奉孔教”^③；第三，请定国教之代表首列人物如严复等，对于孔教问题，“今昔主张矛盾，不能自圆其说”^④。此外，与其他反对定国教的主张所不同的是，该报还从违背信仰自由的角度，对尊孔谬论进行了批驳。

随着尊孔复古逆流出现的，就是一系列借尸还魂的“规复”活动：“文则祀孔，武则祀关，道教则张天师已复位，更进一步，势

① 《闲评一》，载《大公报》，1914-12-29。

② 《证明孔子非宗教家》，载《大公报》，1913-12-15。

③ 《拟天主教全体公民请愿信教自由不定国教，上参众两院书》，载《大公报》，1913-09-26。

④ 《闲评一》，载《大公报》，1913-10-01。

必释家之佛菩萨，医学之吕纯阳，星命家之严子平、鬼谷子，一一援例要求，列诸国家祀典。遍国中香烟缭绕，百灵呵护。有名无实之民国，乃进化而为志心朝礼之神国鬼国！”^① 劳乃宣声嘶力竭要复辟清帝；有人则自封“忠烈定国王”，力主“兴复”后清。

1915年，袁世凯为了尽快达到黄袍加身的目的，死心塌地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宣布：“今日国家外交以近交政策为要，其第一即为亲日”^②，意欲获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日人洞烛其奸，即乘机于这年1月向他提出“二十一条”，并且暗示：“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③。至5月，袁氏基本上全部接受这一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该报发表评论加以嘲讽，说：“中日交涉，已完全和平解决，种东亚之幸福，遗万世以安宁。吾外交当局忠于谋国如是，已出吾民意料之外，又复亲劳玉趾，将承认书双双恭贺至日使馆。似此鞠躬尽瘁之忠良，求诸中外古今，除五代冯氏，汉末谯氏，三韩李氏外，有几人哉。”^④

从8月起，袁世凯的党徒们有的成立“筹安会”，有的组织“请愿团”，有的捧出“推戴书”，有的呈上“劝进表”，紧锣密鼓地上演着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其中以杨度的“筹安会”最为臭名昭著，影响最坏，它标榜是所谓的私人“学术团体”。该报为此提出质问说：为什么“近在都城之下，居然有私人团体之集会？居然有关系治安私人团体之集会？居然有名为私人团体与政府无关系、而实则皆政局中之人物之集会？”^⑤ 并明确指出，所谓的“筹安会”实际上是主张“变更国体”，推戴“袁大总统为皇帝”的急先锋。^⑥ 9月12日，该报又发表了《对于国体问题之预测》，揭露说：“观于发起人方面，而预测其必得美满结果也。发起此问题者，非腹心

① 《闲评一》，载《大公报》，1914-11-03。

② 《远生遗著》，3册，81页。

③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290页。

④ 《闲评一》，载《大公报》，1915-05-11。

⑤ 《闲评一》，载《大公报》，1915-08-18。

⑥ 参见《闲评一》，载《大公报》，1915-09-20。

之故旧，即佐命之元勋。其姓名夙震寰区，学识又超侪辈。一言之重，九鼎奚殊。既敢倡非常之议，自必能行非常之事，以建非常之勋劳，而博非常之酬报。且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悍然以发难，聪明伶俐如六君子，岂敢无所恃而冒昧尝试者！……读前日大总统之宣言，固已许法外施仁，不加干涉，则此层更无足虑。二三子前程远大，后顾之忧。冯长乐草劝进之书，华龙头袖登极之诏。好自为之，贯彻其耿耿孤忠，为期当不远矣。”事情果不出所料。官僚、政客在前台演戏，军界长官、流氓宪警在幕后护卫。经过两个多月的撮合，全国各省袁记“国民代表大会”就纷纷进行所谓“国体投票”。11月20日，一致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次日，袁世凯终于亲自发布命令，正式接受帝制，并下令将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在此情况下，该报仍然在29日以“代论”刊登了梁启超的《国体问题与五国警告》，继续反对复辟帝制。

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不仅《大公报》频频发表文论进行驳斥，英敛之本人也用一些个人的方式表露其反对意见。据陈垣先生讲：“1915年底，袁世凯预备称帝，曾利用宗教界为之捧场。当时天主教徒办有一种《益世报》。事前不敢让敛之知道，事后，竟发表附和帝制的言论。大为敛之所不满。敛之袁疾视袁世凯，又深恶当时《益世报》某教士左右的天主教徒种种污秽，特写信与某教士严斥之。信上说：‘《益世报》之创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某亦何苦妄加干涉。然早断其必无好果矣，因靛缸不能出白布也。乃报纸即出，果污词秽语，不一而足。以教会教友之资本作相反道理之提倡，已为不合，乃愈出愈奇……今者若更穷促无归，势迫利使，遽变宗旨，丑态百出，犯社会之公愤，南北各报排斥之来者，已不一见矣……以无端之邪火百般谄媚，胁逼要挟，情形显然，无怪人言之啧啧也。’”^①

虽然袁世凯终于坐上了皇帝宝座，但好景不长。接受推戴不过十天，云南将军唐继尧、蔡锷等，即驰电坚决反对，并于12月25

^① 陈垣：《天主教徒英敛之的爱国思想》，载《光明日报》，1951-04-02。

日宣告云南独立，公开声讨袁世凯。随后，各地纷纷响应。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并于6月6日结束了其一生。7日，《大公报》对他盖棺论定说：“综计袁总统之官运，国家每经一次危劫，彼即高升一步。盖始终逢凶得吉、遇难成祥者。屈指回溯，甲午战败议和，实为袁氏发轫之始；戊戌之变，于是乎一高升；庚子之役，于是乎再高升；及辛亥大革命，于是乎大高升。总统之位既固，皇帝之瘾忽发，于是乎惹起全国唾骂，引动遍地干戈，生灵涂炭，国是阽危，至不可收拾之下，及以一瞑不视了之。虽亦由命尽禄绝，然神龙见首不见尾，其解决大局之手段，亦狡狴矣哉！……然而今日之事，已成不可解决之势，毅然以一死解决之，快刀乱丝，一朝断决，论其一死之有功民国。殆较四年余之辛苦经营，盖尤万倍也。吾闻京电，敬为袁公吊。且为民国贺！”

二、依旧是“民之口舌”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面对北洋军阀政府的专横、残暴统治，许多报刊敢怒不敢言，惟恐以言贾祸，以致出现了中国报刊政论的衰退。言论“在报上所占篇幅剧减，有的报纸为摆样子，还发几篇四平八稳的社论。有的则只点缀一两篇不痛不痒的短评”^①。

《大公报》则不然，不但原来的一篇“言论”、两篇“闲评”的评论模式被保持下来，基本上每天都有，并且，依旧是敢于反映民生疾苦、敢于抨击政府、敢于为民请命，的确起到了“民之口舌”的作用。在那种恶劣的形势下，《大公报》仍然坚持“敢言”作风，确属难能可贵。

进入民国后，中国人民不但没有享受到民主、共和带来的文明与进步，反而受到了封建军阀翻云覆雨的蹂躏，中国陷于国将不国的险境。1915年9月11日，该报在“闲评一”中表达了民众对时局的强烈不满：“呜呼！吾观于今日之时局，而益古人造字，其取义之精之博之巧妙矣。有如‘国’字，曷为而于四方之中，嵌一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5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或’字。‘或’者，无定之谓。明明示国之为国，乃一无定之物。可随人心之所欲，爱什么样便什么样者也！是故国之主体，或君王，或民主，或共和，或立宪，或专制，无不可也。居是国者，或为总统，或为帝王，或为大官，或为平民，或为奸盗，无不可也。或行仁义道德，或作鼠窃狗偷，或装神弄鬼，或拍马吹牛，无不可也。或说人话，或放狗屁，或做狮子吼，或发豺声，或效狐媚子，均无不可也。‘或’之时义大矣哉。此国之所以不妨由人撮弄、由人颠倒、由人随意变化欤！”

在这种时局下的民国政府，根本无意于国计民生的筹划，一味地敷衍塞责。1915年7月7日“闲评二”说：政府“就其日日会议以观，谓政府非励精图治不可；就其会议结果之一无成效以观，谓政府非空言塞责不可！”民国政府非但不能励精图治，连为民做主的基本责任都不顾，在对待外国人与本国人问题上竟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但不能维护本国人之利益，竟“以中国人而贱视中国人”，实为洋人之奴隶！该报对此议论道：“均是人也，视外国人之名誉财产生命，何以如是之贵？视本国人之名誉财产生命，何以如是之贱？”该报愤慨地指出：“如谓今日为强权时代，我之势力不如外国人，则屈服之。我之势力胜于本国人，则凌压之。以受之于外国人者，还而施之于本国人，适合情理之平！然则我国人自今以往，在共和政府势力之下，而欲护其名誉、保其财产、全其生命者，与其假充中国之主人，不如竟作外人之奴隶！”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战乱频仍，形成了极为沉重的社会负担，而所有这些重负最终都由官府巧立名目，以捐税的形式落到了人民头上。《大公报》说：“近来中国之捐税名目，不可以数指计。有印花税、有屠宰捐、有房铺税，此外尚有种种，皆近年所增加者也。”而无论以何名目收纳的捐税，“一言以蔽之，皆人民之脂膏血汗而已”。统治者虽然调整过一些捐税，但根本就于事无补。该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讲道：“以国家之名义，吸收人民之脂膏血汗，用处果尽当、办理果尽善，无论用何等名目取之，人民断无怨言。用处尽不当、办理尽不善，无论去何等名目、留何等名目，殆犹五

十步与百步耳!”^①

那么，不能为民众谋福利，反陷之于水火之中的政府，必然是专制的反动的政府。该报曾以铁的事实、严密的逻辑推导出这一本质：虽然民国后，当权者屡屡以民主、共和相标榜，但却是在进行专制主义统治。该报撰文提到，按袁世凯政府所颁布的《报纸条例》，凡是刊登了足以“淆乱政体”的言论，必处以“禁止其发行；没收其报纸及营业器具；发行人编辑人以四等或五等有期徒刑。若是乎政府对于政体之言论，可谓深恶而严禁之矣”。该报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如此行为的实质，“是限制言论自由之手续”！并进一步由此推论道：“夫淆乱政体且然，况淆乱国体乎！报纸仅纸上空谈，深恶而严禁且然，况其为类此之实在举动乎？！据理以推，今设有人焉，公然号召，非特欲淆乱政体，甚且淆乱国体。吾知政府一闻其事，其欲处之也，必较报纸条例所规定，而益加严矣。”以此揭露政府名为民主而行专制之实质。

此外，该报对民国官场上的种种颀顽腐败之情状，仍能做出无情的剖析，反映了民众对囊国害民的官吏们的痛恨。该报将当时“中国官吏之特征”概括为两个：“第一的特征，是善于奔走运动；第二的特征，是善于营私舞弊。”民国后在官吏选用方面，虽然颁布了《考试知事章程》，“法良意美”，然而“孰知一面考试，一面保免”，结果是“合计全国做被保免的知事，何止数万人！比较考试中选者，多及两三倍。且中选者又皆出于请托运动者，十居八九”。可见“中国官吏善于奔走运动，世界所未有，普通人民所不及！”官吏不仅来历不正，且多是置国难于不顾，急于中饱私囊、监守自盗。“现在国步艰难，正赖大宗进款，以挽救国家的危亡。孰知此种官吏，竟毫无心肝，发生这种流弊。稍有天良者，谁能去做呢！”该报还进一步将之与清朝相比，发出了警告：“前清之亡，不亡于君主，不亡于人民，实亡于一般官吏。所以亡于一般官吏的原因，就是亡于‘奔走运动、营私舞弊’这八个字。现在虽然民

^① 《闲评二》，载《大公报》，1915-12-20。

国，号称共和。究其实际，有名无实，不成为国家。而一般官吏们，又人人具备这两种特征，不能化除。国能不亡，种能不灭吗?!”篇尾连着两遍发出了“言之可不痛心!”的慨叹，爱国忧民之情感人至深。^①

对当局中炙手可热的一些人物，该报仍能做嬉笑怒骂的抨击。黎元洪身为副总统，却无所作为。“自民国时代”，“除坐镇江汉外，厥惟以排难解纷为最者”，每遇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党内与党外等处有争执时，黎氏“则调和之”。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根本上之解决”，而仅仅是“粉刷成功矣”!“仅为皮毛上之敷衍”，“不过偷安一时”而已，实“不足以挽回浩劫”。看似痛哭流涕、竭尽全力的调和，实为敷衍塞责之行为。如此评论，可谓一针见血!^②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节 宗教色彩的增重

一、英敛之与天主教

英敛之 22 岁时就写信天主教，受洗礼。与一般信徒不同的是，英敛之是经历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真正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坚定不移地去信奉的。其宗教思想即是其哲学思想，直接指导着英敛之在现实生活中的言行，包括其办报实践。

事实上，英敛之入教时，正是天主教在中国最受诟病的时候。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人侵而出现的，是中国开始沦落为半殖民地的一个标志。传教本身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经常用来控制中国的三大武器之一，自然而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抵制，因此，各地经常发生天主教教案，

^① 参见《中国官吏之特征》，载《大公报》，1915-07-09。

^② 参见《闲评一》，载《大公报》，1913-05-13。

且华北尤多于华南。一时间，“市井小人，借教而欺邻里；不良教友，则借教而报教外之仇”等等，不一而足，天主教遂为士大夫所不齿。英敛之乃于此时信天主教，且极虔诚，可知并不是盲目的。英敛之曾经研读过佛教、道教、基督新教等方面的书，阅后都不怎么信服，直到读了明代天主教传教士所著书籍，特别是汤若望所著的《主制群微》一书以后，才使他受到了感悟，并终于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成为天主教徒。

英敛之曾在他本人所著的《万松野人言善录》一书中表述过他的心路历程。他说：“野人虽不材，然而自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知道笃好理学，临莅日久，玩味愈深，觉得实与世间词章、考据、名物、象数诸学，乃天渊之别；所谓身心性命之源、诚正修整之本，实在是不错的。每见世人舍其根本，务其枝叶，未尝不深加痛恻，故此时时妄不自揣，对人总要供其献曝愚忱，提撕警戒，以尽与人为善之义。虽至见憎触忌，也总不以为辱。到了弱冠后，出而应世，交游日广，阅历时增，后又南北奔驰，屡作万里之游。四十后倦鸟归来，书生结习，仍然是向故纸堆里讨生活。然而三十年间，自始至终，情境虽是屡有变迁，到底那一段关心社会、注重人群的念头，总是抛舍不了去。”

正是将“与人为善”的宗教精神化作了“关心社会、注重人群的念头”，英敛之主办下的《大公报》才有勇气去直面人生、社会，鞭挞丑恶，主张进步，同时积极参加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如1907年广东水灾时，《大公报》发起募捐，英敛之搞起了书画慈善会，他个人也参加写字义卖，赈济灾民。其实，《大公报》严肃的报风，对妇女解放、文明生活等的呼吁，乃至贴近民众的做法，都是英敛之所接受的宗教精神的具体体现。

民国以后，英敛之脱离了《大公报》每日具体的报务工作，将主要精力放在宗教事务与教育事业上。他认为教育问题才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急务，于是，1913年在北京香山创办了辅仁社，又名国学专修科，专收教内青年子弟，研习中国学术文化。该社全靠英氏独力支持，到1918年，终因经济和其他困难而告关门。与此同

时，英敛之坚持不懈地上书罗马教廷，要求在北京设立天主教大学，以提高中国教徒与教士的文化水平，并有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推进工作。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辅仁大学的成立。

在辅仁大学的原始档案中，有如下记载：“民国元年丹徒马相伯、北平英敛之二君为振兴公教教育，上书罗马教廷，请派高才硕德之教士来华创设公教大学，发展中国固有之文化，介绍世界科学新知识，以示公教之公。旋经欧战事，遂停顿。民国八年，罗马教宗派员来华，巡视各省公教状况。报告亦以公教高等教育机关，尚属缺乏。因是教廷确悉中国公教设立大学为刻不容缓之事。次年，美国公教同铎奥图尔博士来华调查教育，审查社会所需要与人民所缺乏。乃商之英敛之君。二人所谈对于公教兴学一事极相契合。乃赴罗马谒教宗，陈述情形……（遂于民国十四年七月成立“辅仁大学”，当时）取名‘辅仁社’，以英君为长。英君自创办以来尽瘁鞠躬，不意奖掖。”^① 辅仁大学的成立是与英敛之不遗余力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该校的第一任校长。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英敛之治下的《大公报》，在宣传宗教的同时，也积极提倡中国人“自开教会”。该报在《中国图治之三要策》中说：“今议由国家自开教会以传教。内地繁要之区，各立教堂。请教皇并升授华人主教，削去平民教民之称，应得之功名，应享之利益，一切共之。”^② 这里又体现了该报在宗教问题上的爱国色彩。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与英敛之的思想认识有密切的联系。

据陈垣先生介绍，英敛之很早就要进行“天主教革新运动”。1912年，他曾上书罗马教会，指控洋教士不学无术，“专欲愚民”。那时，北京是法国传教区，教权教务都由法国“神长”控制。英敛之“极力运动天主教脱离法国羁绊”，提出今后传教应“不限定一国，不限定一会”，并主张“养成中国籍传教士，俾得自传”。他在

^① 摘自《私立北平辅仁大学设立缘起及目的》，见《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档案》，现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室。

^② 《中国图治之三要策》，载《大公报》，1903-04-07。

上罗马教会书中说：“以北京而论，我教不独无大学、无中学，并高等小学而无之，只有一法文小学。学费之巨，只可招教外人来学。学成之后，只可依法国人谋生……一国之广扬，以往例今，端恃本国之有神品者继承不绝。譬如一家之内，贵能自食其力，万不能专恃外债生存！”为了提高广大中国教民的爱国意识，英敛之发愤撰写了《劝学罪言》，大声疾呼不做洋人“附属品”，不做“永世奴隶”。他还把《劝学罪言》译成法文，寄给在比利时的儿子，要他在海外广为宣传。《劝学罪言》一书出版后，教中大为震动。英敛之不仅受到法国“神长”的警告，有的朋友也劝他忍耐。为此，他又发表《覆友人驳劝学罪言书》，痛陈：“反对学问之事，吾处自上至下几有一德同风之慨。缘居上峰者既非本国人，脑中每横亘一中国野蛮之见。既属野蛮，安有学问之可言！”“总之，此辈所挟持者，惟一势力权位之见。竟有明目张胆向华铎宣言者云：‘若无我等，尔辈皆饿死矣。’所以华铎蹙曲如辕下驹，恹恹如丧家犬。忍气吞声，震慑失措者，比比然也。总之，绝无公理之可言。谁使吾国不能强盛乎！然则圣教会果有因势盛衰、种族强弱之别乎？此吾所以竟敢以公理为争，而绝不认吾辈生就永当居于奴隶地位也。”^①从上面这些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英敛之既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也是一个爱国者。陈垣先生说：“敛之以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发愤著书，提倡爱国，受到外籍教士种种之恐吓、威胁，而无一点惧心，真可谓‘豪杰之士’了！”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二、报纸言论中的宗教色彩

早期的《大公报》及其创办人英敛之，既与天主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报纸染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进民国以来，尤其是1915年后，该报的宗教色彩在明显增重，并与民国前的表现有了质的不同。

前面已经提到，英敛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个首先发起要办

^① 陈垣：《天主教徒英敛之的爱国思想》，载《光明日报》，1951-04-02。

《大公报》的柴天宠，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总管”兼资本家。该报初办时股东之一、北京法国传教区主教樊国梁，还想把这个报馆设在北京天主教堂里。这些情况表明，当时该报与天主教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每年“复活节”和“圣诞节”时，该报都要休刊放假一天，以从教俗。再从该报宣传的内容看，宗教的色彩也十分明显。它经常通过“言论”、“附件”等栏目，鼓吹中国只有“择定一个至为堂正的宗教”才能“维持人心”，“转移风俗”，才能使国家兴旺。并且，极力宣扬宗教自由，为天主教辩护，宗教的氛围比较浓厚。

该报创刊没多久，就开始在言论上显示出宗教色彩。1902年7月20日，该报在进行第一次有奖征文活动的出题中，列出了“和民教策”和“信教自由”两个主张自由传教、信教的题目。8月18日，该报的“论说”即采用“热心热血生稿”的《和民教策》，主张自由传教，反对迷信，反对官方压制。该月底，又在“来函”中讲外国传教士传教之艰辛，希望世人能体谅。五天后即9月5日再次以“和民教策”为题发表了“清醒居士稿”，为改善“洋教”在中国的困境献了五策：“改刑律”、“设陪审”、“息邪说”、“兴新学”、“定出教之例”。该报则以逐段加议论的形式予以附和，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1903年3月17日的“论说”发表了《以宗教救中国说》一文，文中写道：“中国之衰弱如斯，究而论之，是无中国也。何以无中国？中国国魂散失也。国魂胡以散失？民群无爱国思想也。民群胡以无爱国思想？自锢其灵魂未尝释放也。灵魂何以不能释放？无文明教化也。何谓无文明教化？宗教是也。”这样层层类推，最终将国弱与无国教联系在一起，接下来就自然而然地为传教士作辩护：“外人之来我中国宣布教宗者，所在多有，文明曷尝不及于中华？曰教士之力有限，不能普及于国民，是以能得其释放者只有此数耳。”进而宣扬大办洋教：“莫如我全国国民同认文明教化为一己应有之教化，全国大立教会，各省遍立教堂。”

1903年4月7日的“论说”题为《中国图治之三要素》，其中

之一就是“自开教会”：“西人来华传教，不惟无害，且有大益。何则？宗教者所以养人德性，束人身心；国政之所不及者，宗教可以隐济之于无形也。”

1904年2月10日的“附件”栏目中发表了《年终赠言》一文，文章把当时中国的糟糕情景渲染了一番，然后对黎民百姓大做文章：“这黎民百姓，自幼就没受过教化，长大了又没有一定的职业。耳所听的，眼所见的，没有真理正道，他怎么能好的了呢？”那么没有教化，社会败坏的总根源是什么呢？“总而言之，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的恶俗，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能败坏到这个样儿。这总的根源是没有真正的宗教、没有纯善的教化，没有完全的法律。”既然总的根源是“没有真正的宗教”、“没有完全的法律”，那么解决社会败坏的药方自然就是传洋教、立宪法了。这既反映了英敛之的政治思想，又反映了其宗教救国的思想。

进民国之后，《大公报》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浓。1913年10月21日，在“来稿”中刊登了《中国基督徒上英皇禁烟请愿书》，向英皇痛陈英国的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灭国灭种”之危害，那是“撒旦之香饵，借以钩人之身与灵”，试图利用宗教力量影响皇帝陛下，禁绝鸦片贸易。在1915年7月底前后，该报还发表了《攻击圣堂与司铎之战》等文，猛烈抨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兵侵犯教堂、诋毁教士的言行，在报刊舆论上给远在欧洲的教会与教友以支持。

从1915年下半年开始，《大公报》不惜版面，连续刊载了一些天主教书籍。从1915年6月10日起重刊汤若望著的《主制群微》；11月25日起连续刊载《天学初函》中的《辩学遗牍》；12月4日起刊登英敛之本人所写的《万松野人言善录》；1916年1月27日起又刊登《大西利先生塞玛传》。除了英敛之本人的著作是在“著作”栏目中刊登外，其他书籍都是使用单独的版块，以书册式印刷，清晰而又方便读者汇订成册。这些书后来都发了单行本，由大公报社印刷出版。

1915年8月18日，《大公报》在“言论”栏目中刊登了英敛

之撰写的《重刊〈主制群微〉序》。文中提到：“天主教之见仇触忌于世也，地无间中外，人无分文野，莫不支离附会，各陈其故实，以明仇忌之有因。”就中国当时的社会认知而言，“今信教自由时代，而有关‘天主教’三字，无论士夫，甚者倘若九世之仇，次者亦避之若浼。而自号文明者流，则以迷信目之。至于同源异流自居新教徒者，则尤多方指摘，任意讥呵。凡此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不失之茫昧诬枉者概寡。”英敛之面对世人对天主教的诸多责难，毅然指出“仆敢以三十年之阅历，悍然断之曰：仇忌天主教者，无他。私欲而已矣！诬枉而已矣！”这样，将对天主教所有的指责统统斥之为莫须有，都是人心私欲所幻出的“诬枉”，极力为天主教辩解。观其目的，首先是想改变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天主教排斥、敌视的态度，吸收和发展教徒则在其次。

在该书出版前后，英敛之令辅仁社弟子各写序言，在《大公报》的“言论”栏目中发表，以此让世人了解汤若望其人其事，并进而了解天主教。其中一篇有这样一段文字：“吾师安塞先生，素喜此书辩论有序。如剥葱笋，如析直薪，推勘到底。将拟重刊，以明邪正面告同胞也。故令社友各为一序以见志……钦公之学。既 not 避艰险，九死一生，而布道是邦。又广著书说，发明真理，俾人得识至道之所在。是仆得以倾心向主，而于大父母前不致背违者，皆公之赐也。是以略序公之始末以告同胞。愿皆得归根返本，以无负公牺牲救人之志愿也可。”^①可见，此书曾经对英敛之等人产生过巨大的震撼力。英敛之重刊此书的目的，无非是想光大其说服力，引导更多的人“归根返本”，“倾心向主”。

英敛之本人撰写的《万松野人言善录》，是一部反映他晚年人生哲学和道德、宗教观的著作。他从1912年退隐北京香山以后，日居松林之中，自号“万松野人”，自称拥有古今书“万卷”，终日里“披阅把玩”，“悠然自得”，从而“静极生明，豁然有悟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古今中外哲理名言，大有归于一炉而冶之之

^① 《主制群微序言》，载《大公报》，1915-09-11。

乐”。他感慨世人“名缰利锁，谋虚逐妄，颠倒迷离，沉沦于私欲，陷溺于罪恶，到头辛苦一场空，不冤枉做个邪僻小人，可怜可痛。”因此，他极愿将自己“所见之善言，所发之善念”，一一写于纸上，“使人共见，互相磋磨，互相勉励”。这就是他著述此书的“一片苦心”。

在反对尊孔运动中，《大公报》表现积极，与同期的其他报刊重点在反专制、反复辟有所不同的是，该报侧重于从信仰自由的角度加以反对，同时借机为天主教辩护。这样，它一面坚持原来的宗教救国说，仍主张有一个全民普遍信仰之宗教；一面大谈宗教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信仰的限制，尤其是当尊孔说危及到天主教时，更是不能答应。因此，在这场运动中，该报之所以反对尊孔，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传教利害的考虑，具体地说，就是惟恐妨碍了天主教的发展。1913年9月24日起，该报在“言论”中，连续四天刊登了《拟天主教全体公民请愿信教自由、不定国教上参众两院书》，指出：民国后，“约法宣布信教自由”。然而，“有所谓孔教会者，复生独擅特权之野心，破坏共和平等之大局，而欲定其教为国教”，这实质上是在搞“宗教专制”。此文借机表白道：天主教乃“道贯中西、风行六洲之圣教。对于不足完全宗教资格之孔教，固不多让也”。尽管如此，“吾人决不为一教之私，而出请定国教之非分之于求”。进而，从国民拥有平等自由权利的角度加以阐释道：“吾人，国民也；他教同胞，国民也。吾人爱自由，他教同胞亦爱自由；吾人爱宗教，他教同胞亦爱宗教。吾何人斯？敢思凌驾同胞之上、而破坏平等耶？！”因此，该教会坚决“主张信教自由、不定国教者也”。

在此前后，该报还刊登了道教等宗教派别反对立孔教为国教的上书，同时还从法律、国体等角度论证不应该立什么国教。随后，10月18日，该报还选登了《论美（国）宪法中之宗教》一文。文章讲道：“虽然基督教为美国通行之宗教”，但是“凡托足于美利坚国境以内者，无论为本国人、为外国人，均得随在直任其所信之宗教，而无庸讳饰。此其权利，乃法律所保障者也”。美国这样做，

是因为“教会与国家为完全之划分。宗教信仰之表示与宗教仪式之奉行，有完全之自由”，“故对于人民，不得强令其奉行异教之仪式，亦不得干碍其信从本教之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乃是“合众国之通例”。该报以美国为例，借以证明一个真正民主共和的国家，是应该保护人民的信仰自由，而不是限制宗教信仰。它认为，确定一教为国教实质上是对人类信仰自由权利的粗暴践踏。

总之，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以民国肇始为界，前后又有所不同。清末，该报所突出的是宗教救国论，是泛论宗教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并不刻意宣传天主教教义。到了民国初期，该报则毫不掩饰其对天主教的偏袒与虔诚，以天主教教徒的视觉来观察世间万物，并发表文论，直接阐发天主教义。这样，该报的宗教色彩呈现出逐渐浓化和支持天主教的立场逐渐清晰化的趋势。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变化并不足以改变该报的商业报刊性质，它始终保持了商业资本独立运作的基本模式。与宗教报刊不同，该报并不以对天主教的说教为目的，而是将宗教观化在对人生与社会的分析中。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四节 英敛之时代后期的《大公报》

一、新形势下出现的众多困难

进入民国后的《大公报》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

第一是英敛之对报务的逐渐淡出。

从1902年到1912年，整整十年间，英敛之对该报的笔政与经营事必躬亲，这不仅奠定了该报的基本风格，也保持了言论主张的始终如一。因此，该报虽然在这十年间频易主笔，但是对报刊发展确是毫发未损。反过来讲，英敛之在《大公报》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总理”作用，是他在把握着该报的总体发展方向。民国后，英敛之的退出，无疑使《大公报》缺少了一位能兼顾言论与经营的核心

人物。

有人说，民国后英敛之的不再办报是健康不佳的原因，这一点很难成立。因为，早在《大公报》的初创时期，英敛之就屡屡受到疾病的困扰，但他并没有退意。并且，英敛之这次病在辛亥，民国时已经痊愈。“辛亥之岁，患病于津门，约两月之久，未尝下楼。日惟以披玩各帖作消遣。”此时的所谓因病而“不得不停报事”完全是托词。

民国元年春，英敛之曾作奉天之行。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仆向不能作联语。壬子春偶于奉天道上成一联。云：‘何必嗟困穷，但看眼前温饱，犹多不及我；无须伤老大，莫论身后生存，尚作未亡人。’”英敛之竟以“未亡人”自况，可见其心灰意冷之至。也正是在这一年，“由喀拉沁王福晋及英淑仲女士等向皇室请领香山静宜园保存，借以兴办女学、女工。蒙前隆裕皇太后慨然付畀，众乃推英华经理其事”^①。在那里，英氏创办了静宜中学——北京第一个女子中学，以及培根小学、辅仁社等，还帮助经营香山慈幼院等慈善机构。以此为契机，英敛之开始将注意力逐步转移向了教育和宗教事业。这期间，英氏“还把《大公报》的部分印刷设备运回了北京，开办了北京第一个现代印刷厂——‘公济’印刷厂，也就是现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前身”^②。

对于《大公报》的报务工作，身为总理的英敛之只是遥领而已，该报的笔政改由樊子熔、唐梦幻等具体主持。这样一来，一方面，《大公报》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英敛之的办报思想，如标有“辅仁社课”的文章仍然连篇累牍地在该报的“言论”栏目中照常刊出，该报“敢言”和严肃的风格仍然得以保持等。另一方面，《大公报》在发展方向上缺少了一个直接的把舵人，不可避免地陷于游移、迷茫境地。英敛之人居北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报务事无巨细地实施管理，至少不可能进行直接的报刊经营，这些具体工作必然地分散始其他人来做。但在民国初期的这四年间，《大

①② 英若诚：《纪念我的祖父英敛之》，载《大公报》，2002-05-06。

公报》始终没有一个像英敛之一样的得力人物出现。缺少了像英敛之这样一位得力的人物在第一线运作，《大公报》的工作是注定不可能有大起色了。

第二是对民国政治的失望。

该报是以注重时政而著称的，素有主持“北方清议之机关”之美名。清末时，办报人力主君主立宪，走维新变法道路，议论和建言都不少，也很积极。民国后，君主退位，国体更迭，原有的主张失去了依托对象，一时间感到无所适从。

而民国初期的所谓民主政治，又使办报人极为失望。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后的民国，寄托了人民的各种美好愿望。但民国初期政坛的黑暗与混乱，使人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1913年，中华民国成立一周年之际，该报在1月14日的“言论”中，对一年来的民主政治进行了总结，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失望情绪。“共和国成立既一年，举凡吾民所企踵延颈，以为政治当修明、法律当完备、财政基础当稳固、外交交涉当胜利，数者皆不有功。而国民之民德乃日趋于亡国之途！横流滔滔，江河日下，所谓日暮途远、倒行逆施者非耶？选举之怪象……呜呼，纲纪凌乱，廉耻丧尽，百王以来，于今为极！”

1915年7月27日，“闲评一”说：“（与前清相比）改革之谓何？”“一代不如一代！观于今日官场欺蒙之积习，吾亦云然！”

该报看到的是民初政治上混乱、社会上的动前，所谓“政府之忽忽悠悠，两院之纷纷扰扰”；“今日某省以兵变闻，明日某处以匪乱闻”。该报看不到中国的前途何在，发问道：“岂中国之大，除三数私人外，即无能肩天下之重任，为国民谋共和之乐利者乎？”就当时之乱象，该报也只能是“不得不为中国前途痛哭矣！”^①

该报始终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作为报刊的天职。既是监督，只要有一个政府，它就只想改良之，而不想推翻之，哪怕是该报所反对而不赞成的。而民国初期政坛上的一番乱象，足以令人无

^① 《平乱微言》，载《大公报》，1913-08-12。

从“监督”。相应地，“向导国民”也就失去了方向。

总之，在“清议”问题上，它表现得比较消极。

第三是对袁世凯的敌视和对国民党的怀疑。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和由原来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化而来的国民党，是两支左右民国初期政局的主要政治力量。对袁世凯，该报早就有看法，袁世凯的结党营私、恃势揽权和政治上的野心，彰彰在人耳目。对国民党，该报也不寄什么希望。在该报看来，国民党在民国初期的政坛上，也与其他政治派系一样追逐名利，忘掉了“主义”之所在，而为人所诟病，更令人失望。总的来看，该报对活跃于民国初期政坛上的各种政治派系都看不上，也就找不到它认为可以支持的对象。因此，它在政治上感到迷惘，感到无从置喙，也失去了议论的动力和方向。

应该指出的是，该报惧怕社会动荡，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他担心社会的动荡只能使已处风雨飘摇之中的国家更加雪上加霜，不堪一击，最终招致列强入侵，亡国灭种。它发文章痛陈：民国一年来，中国不但没有转机，反而是“民生凋敝，财政恐慌，礼教沦亡，廉耻道丧。外之则强邻狡逞，内之则暴党横行。政府粉饰于上，将帅跋扈于下”，倒是一片匡将不国的景象。在这种状况下，该报大声疾呼“我国今日不可再乱”！其理由是：“以对外言，我国数十年历史，内乱一次，外交必失败一次。满清覆辙、蒙藏前车，可为殷鉴。然枝叶虽损，根本未摇，犹可以为善国也。今则财政债权，凡一国之命脉所在，尽归外人掌握之中，而列强眈眈虎视者，更将乘机伺隙，以实行其兼并之谋！一旦有乱，不但海疆商埠，彼之军队，得以出入无阻，行动自由，即内地国产之有关抵押者，皆得借保护资本为名，派兵占据。势力所及，土地人民随之，顾我国不乱则已，乱则瓜分之祸，近在眉睫！”“以对内言，军兴以后，民生困瘁、商业凋残、元气大伤，至今未复，即使休养生息，抚辑流亡，犹非数年所能奏效。设若乱机四发，势必致弱者饥饿，强者为盗贼……恐一省之中，不至四分五裂不止。我先自分裂，而他人复从而分裂，如是而欲望国之不亡，乌可得乎！”

第四是言论环境的严酷，迫使该报言论不得不委曲求全，不能畅所欲言。

袁世凯极力压制报刊言论。报刊动辄得咎，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大公报》为保持自身起见，很注意言论策略，尽量不授人以柄，必要的时候还要屈就于时局。

在袁世凯积极准备复辟帝制期间，该报先是连续六天在“来件”中刊登了杨度鼓吹复辟的《君宪救国论》。杨文刚刚刊完，又立即在1915年9月9日和10日的“录件”栏目中连载了梁启超坚决反对帝制的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这种兼收并蓄两面兼顾的做法，说明该报既反对帝制，又不敢顶撞当局，对支持后者的帝制派，不得不有所敷衍。同样，迫于袁世凯的淫威，1916年年初，《大公报》开始使用“洪宪元年”年号，直到3月24日袁世凯取消帝制，该报才随之取消了其年号，又改用中华民国纪年。

每年新春伊始，该报按惯例总是要在“言论”或“白话”栏目中发一篇“新年祝词”类的文字。1916年2月9日，该报在“白话”《新年第一个梦》中提到言论写作之难：“打算讥消官府几句罢，恐怕惹祸招灾；要是颂扬官府几句呢，恐怕人家骂我丧心病狂！”“我打算警告同胞几句呀”，又怕扫大家的兴。这可以说是这个时期该报言论难做的表露。

袁世凯取消帝制，但中国的局势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进。该报从共和派那里也看不到希望。1916年3月30日，该报在“闲评一”中将帝制派与非帝制派人物皆斥为“出风头人物”，“面其所以出风头者，非为国家，非为政府。只为一己之功名富贵计，则面两派人物之所同也”！袁世凯死后，政权仍然为封建军阀所把持。于是，6月23日，该报发表“言论”《论军人政治之足以亡国》，深入地分析了军阀政治对国家、民族的灾难性危害。此后，中国局势却不可逆转地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境之中。对此，该报既提不出好的对策，也开不出好的药方，“清议”云云，只不过是填充版而应付门面而已。

总之，民国后的《大公报》面对如此众多的困难，明显地感到迷惘和不知所措。为了适应生存、发展的需要，该报被迫作了一些改变。

二、最后的努力

民国后的《大公报》在报刊言论、新闻业务以及报刊经营上，都发生了一些与清末时期所不同的大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说是该报适应新形势的必然结果，也是英敛之主持该报所做的最后努力。

在报刊言论方面，基于上文所指出的诸多困难，该报在策略与内容上作了一些调整，如议论空泛，对所批评的对象不点名，不确指；冷嘲热讽多，正面抨击少，等等。这些比起清末时的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痛快淋漓的做法，是显得含混、模糊了些，但却可以避免授人口实，引火烧身。在言论内容上开始更多地游离于现实政治谈一点倡导社会革新、发展社会生产力等之类的问题。

1915年后，该报在言论中明显地侧重于谈实业救国、探讨民生问题，以及抽象的道德说教。

该报继续批评国民性低下，呼吁提高个人素质，把个人素质的提高当做社会进步的基础，认为“非发达家庭教育不能焕发国家精神”。进而批判各种传统陋习，指出“多妻为堕落国力之第一原因”，主张“戒早婚”等。

该报还把民国后的各种败坏归咎于社会道德的沦丧，以为“道德是国民的根本，国民不可一日无道德”^①。并发表了大量的言论，谈公德、私德、妇德、民德、商德……还就《文明与道德》展开长篇讨论，将责任心与道德相提并论。这些议论，无形中给人们以这样一种认识：国民若能独善其身、个个道德完美，那么社会自然清明、国家自然进步、政治自然民主。

同时，该报积极倡导发展实业。关于农业方面，该报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即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模式，是国民经济

^① 《白话》，载《大公报》，1915-07-15。

的基础所在，因此，它大力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改良农作物，“治河道、兴水利”，曾先后发表了《劝农说》、《劝种棉说》等。此外，它还比较有先见地提出中国有广阔的海域，应该发展海洋渔业。关于商业方面，该报呼吁中国应该“发挥重商主义”，打破轻视商业的传统观念，发展商业贸易，主张参与国际竞争。它认为“商哉商哉，固竞争世界立国之要素哉”，中国的被动挨打就是“重商主义磅礴于全欧”造成的。因此，“我之商力愈堕败，则异日之战祸愈剧烈”，欲与之相抗衡，则必须“奋发商业”^①。该报还极力批评中国商人在对外贸易中没有“商德”，不注重信誉，尖锐地指出不讲信誉的商业行为是自取灭亡，不仅害己，并且害国。

该报还专门撰写文章探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报不无担忧地指出，一旦战争停止，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必然会加重对中国的剥削，中国应该乘机发展经济，使国力强大，以抵制外来侵略。应该承认，这一方面的议论还不无远见。

在新闻业务方面，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有比较大的加强，副刊内容也有所发展，这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同业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民国初期的四年间，国内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国际上又遇世界大战，为了及时报道军政消息，该报的电讯比重大增加了。电讯多时可以有二三十条，占到一个半板块的面积，它开辟有“专电”、“译电”、“特约路透电”、“特约德华电”等多种电讯形式，报道国际国内的重大军事、政治新闻。此外，以“要闻一”、“要闻二”为标志的消息含量也大幅度增加了。该报在民国后逐渐扩版为每日三大张，合计为24个版块，除了有约13个版面刊登广告外，在其余的11个版面中，有7个左右的版块是用来登“要闻”消息的。在“要闻”栏目中，该报还特意增设了“国外新闻”专栏，并且在“言论”中评述国际关系以及各国军政要事的内容明显增加，再加上电讯中的国际消息内容，这样一来，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也在加强。在副刊方面，该报逐渐增设了“游记”、“文苑”、“杂记”

^① 《论今日商战之世界》，载《大公报》，1916-01-20。

等栏目，几乎每天都有副刊消闲类文字出现。

在报刊经营方面，从版面上所反映出的经营状况来看，似乎并没有因为战乱和时局动荡等因素而受损。具体的表现是广告篇幅在增加，由原来的二分之一版面发展到五分之三左右，一直到1916年易手时都保持着这种比例。并且，民国期间的该报在夹缝中基本上都充满了广告，可见其广告来源是比较丰富的。1915年该报“改换厚纸，篇幅扩充”，1916年初改版为白报纸两面印刷，这些显示出它在向现代化报刊迈进。

为了让读者尽快看到报纸，以提高报纸的时效性，该报还不断更新通讯交通手段。该报读者以京津地区为主，天津是该报的出版地，当天就能看到。为了让北京地区的受众也能及时看到报纸，该报利用京津之间的夜班火车来运报，这件事见于1915年11月中旬的“本馆紧要启示”。“启示”说：“本报自出版以来，颇蒙各界欢迎，销路日增一日。而在北京销数尤多。先自本年阳历三月起，京奉路由津至京每日增加夜车。本报当晚即由该次夜车邮寄到京。每日准九点钟，即可派送北京。”两个月后，当有更提前一些的火车班次时，该报再次调整，搭乘早夜车送报，使北京地区“每日准六点钟即可派送”，时效又提高了至少三个小时。

《大公报》上述的这些变化，与这一时期我国报刊总体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同步的。尤其是新闻业务的转变，完全是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内外军政形势的多变和受众对新闻的需求不断增长的结果，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较大发展的结果。

在适应环境有所改变的同时，《大公报》还有所不变，那就是在极端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仍然保持了比较严肃的报风和比较纯洁的报格。它虽然受到过当局者的压制，但绝不随声附和，发违心之论，为不义屈。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此外还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该报虽然由于主办人的关系带有某种宗教的色彩，并且刊载过宣扬和支持天主教的文字，但从总体上来看，它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份宗教性的报刊。即使

在民国以后，也没有迹象显示要往宗教报刊的方向上转变。

《大公报》自创刊以来所形成的以“敢言”和严肃为特征的特色，在民国初期的混乱局面中，基本上得到保持，并且相对稳定，这使它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声誉，拥有一定数量的稳定的受众，能够扎实地立足于当时中国的报坛。

从总体上来看，面对民国初期极端恶劣的政治条件和主办人心态和行动上的变化，《大公报》在各方面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倒退和萎缩。通过各种努力，该报还是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如果单纯从报纸生存这个角度来讲，该报完全可以在英敛之的遥控之下维持现状，继续存在下去。然而，英敛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无意于办报了，因此，《大公报》的转手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勉强支撑了四年之后，《大公报》将面临第一次易主。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卷 王郅隆时期的 《大公报》

一位著名的大公报人曾经这样评价新记公司之前的《大公报》：“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大公报，其一也……民国后，英君渐老，社务中衰，民国六七年，曾经整理，营业再振，复因顿挫，至十四年冬而休刊。”^①1902年至1925年的《大公报》被统称为旧《大公报》，以示与新记《大公报》相区别。而在这“旧”的阶段中，1916年至1925年王郅隆控制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大公报》最平庸的一段，因此，研究的人不多，甚至可以说

^①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见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1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

至今“还是一个空白”。^①其实,王郅隆时期自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因为缺失与辉煌比起来,同样也有探讨的必要。而且这一段的《大公报》可以充分反映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报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

这个阶段的《大公报》之所以中落,既有政治气候的外在原因,也有报纸本身在新闻报道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内在原因,所以可以借此总结出些教训来。以这段的“专制”反衬新记时期的“独立”,以这段的萧条反衬后来的繁荣,更能够令人明白《大公报》后来为什么会提出“四不主义”,也更有助于今天的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大公报》一百年来的曲折与辉煌。

1916年《大公报》由王郅隆买下,结束了英敛之的创业时期。几经挫折后,又于1925年停刊。这9年当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6年10月至1920年8月12日,以王郅隆为后台老板,由胡政之担任总编辑,业务上的成就比较高,在政治上与安福系军阀关系紧密,被视为安福系的机关报;1920年8月20日至1925年11月,以王郅隆的儿子为后台老板,雷行、翁湛之等任总编辑,业务水平不高,由于安福系失势,《大公报》与其已基本脱离关系。

成为两个阶段之间分水岭的是1920年8月,是月王郅隆和胡政之同时离开《大公报》,宣布停刊;一个星期后,又宣布复刊,但人员更替,编辑方针也迥异。

DAGONGBAO BAIJIANSHI

第一节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 的社会背景

一、这一时期天津的政治、经济背景

天津是清末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20世纪初,以轻工业为主

^① 曹世瑛:《〈《大公报》天津版〉一文的订正和补充》,载《新闻史料》,天津,第20辑,天津日报社,27页。

的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02年至1913年，民族资本在天津新建的工厂，其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约有32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杀，“一时无暇东顾”^①，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暂时放松，中国民族工业由此获得发展的有利时机。在天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等轻工业发展尤其迅速。

天津附近有丰富的盐业资源。自古以来，我国盐业经营都由某些商人垄断，因此尽管加工贩运盐有利可图，利润丰厚，但并不是谁都能涉足这一行。盐商一般财雄势大，由于盐业经营的特殊性，盐商与其他的商人不同，天然地与官方有密切关系。

天津是北洋军阀的“老巢”，许多军阀把搜刮来的巨大财富积存在天津。看到天津的面粉、制盐等行业有利可图，军阀纷纷投资。1914年至1925年，北洋军阀在天津轻工业中一共投资1572万元，占当时全市轻工业投资总额的51.9%，其中倪嗣冲投资最多，他一个人的投资就将近800万元。^②

《大公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悄悄地发生了变革，从天主教徒创办的有改良民主倾向的报纸变为军阀势力控制的报纸。倪嗣冲和王郅隆都是英敛之时代《大公报》的主要股东，而他们不仅投资报业，更投资其他产业，是当时天津著名的商人，同时也是军阀集团中的重要一分子。当《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对办报的兴趣转淡，很自然地就由其他的大股东得到报馆的控制权，而不是由外人夺取，王郅隆也算近水楼台先得月。换个角度讲，《大公报》落入军阀兼财阀手里，并非偶然，因为先前的不少股份已经属于这些人所有。从资本局部被控制到全部被控制，或许只有几步之遥。后来新记《大公报》重新开张之际，提出不吸收任何外来资金的原则，或许就是吸取了这一段的教训。事实上资金来源复杂，确有相当的危险性。

^① 万新平、濮文起：《天津史话》，1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参见上书，124页。

二、这一时期天津的报业概况

天津报业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北方来说，除了北京之外，天津是最重要的报业中心。“1860年天津开埠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亦传入天津，在全国成为近代出版事业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1902年成立的北洋官报局，印刷机械全部从日本购入，职工达150余人，具有较强的印刷能力，除出版官书官报外，还印行图书。”^①

但与南方的报业中心上海相比，天津仍较落后，这是因为在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天津远远不如上海，报纸的广告收入自然也比不上上海。而从政治的控制来讲，天津虽比北京好些，与政治中心保持着一定距离，但与商业氛围极重的上海相比，它却又是军阀官宦的聚集地，得意时进京做官，失意时留在天津做寓公，与政治有脱不掉的干系。所以有人说，“近代报刊在天津出版，不但时间上比较迟，由于北京近在咫尺，压力较大，在数量上也比较少”^②。

在天津报业结构当中，有如下几个部分：（1）天津最早的由外国人办的报纸，如《时报》，1886年创刊，由英籍德人德璀琳创办，这是天津第一张中文报纸；还有德国人汉纳根办的中文报《直报》，1895年创刊。外国人还在天津办了外文报纸，如《京津泰晤士报》（英文，1894年创刊）。（2）继外国人办报之后，民间报纸也相继崛起，《国闻报》1897年创刊，《大公报》1902年创刊。（3）官报也是天津报业的一部分，《北洋官报》1902年创刊。（4）另外还有政党报纸，如《民意报》1911年创刊，是同盟会的报纸，《国风报》是国民党的报纸。（5）商报兴起也是天津报业的重要现象，由于天津是商埠，商报出现较早。《天津商报》作为天津商务总会的机关报于1905年创刊。（6）天津还有白话报和画报，1905年《敝帚千金》随《大公报》出版，是中国较早的白话报之一；《醒俗画报》1907年创刊，是天津最早的画报。所以说：“天津在

^①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简志》，105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② 《辛亥革命前天津报刊考》，载《新闻史料》，第14辑，44页。

全国的新闻事业地位重要。电报传递新闻是从天津开始的。《北洋官报》创办为官办之首，《大公报》附刊《敲帚千金》全用白话，比五四提倡白话文早十几年。胡适说：“中国之舆论中心在天津。”^①

有人这样归纳，自《时报》开始，近现代的天津报业经历了三个时期：启动时期（1886—1911），发育时期（1911—1927），繁荣时期（1928—1937）。^②

我们可以看到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1916—1925）正处在发育时期，研究者或又称之为“突飞猛进时期”：“辛亥革命后，经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天津新闻报刊是突飞猛进时期。据现掌握的材料，自1886年至1911年，天津有（存佚）报纸55种（包括中外文），1912年至1937年6月有（存佚）报纸125种，后者为前者的一倍多。另据近代报刊史称，1912年2月以后，半年内新创办的报纸，北京50多种，最高，上海有40多种，次之，天津35种，为第三。这一时期，报刊出版发达的原因：一、辛亥革命后暂时的言论自由政策的鼓舞；二、天津有租界为依托，一些清朝的遗老遗少纷纷前来天津做寓公，加上一批文人墨客也聚居天津，所以就有一批报纸出现；三、由于军阀混战，一些军阀政客走马灯似的在京津两地来回走串，一旦上台，北京做官，一旦下台，到天津避难，而社会上一些人各找后台，为造舆论，也纷纷办报；四、这一时期更大一部分报纸以营利为目的，出现一大批商业性的报纸。所以，这一时期天津报刊呈现下列一些情况：一、虽然报刊名目繁多，但办得有特色，在全国有影响的不多；二、有的报纸，办的时期很短，一年半载者有，几个月的也有，有的因为后台倒台，有的是赢利不多或亏本，只能停刊；三、一些报纸的政治立场多变，今天拥护直系，过几天又拥护奉系，再过几天又拥护皖

① 刘永泽：《辛亥革命前天津新闻史编年》，载《新闻史料》，第31辑，20页。

② 参见邹仆：《解放前天津市新闻事业发展概要》，载《新闻史料》，第29辑，18页。

系。北京政坛走马灯似的转，天津的报纸在变戏法；四、还有的报纸由于种种原因，办一个时期就改一个名字，只要后台老板换了，就改一下名字。”^①

这段分析说明，辛亥革命以后天津报业表面上很繁荣，报纸数量众多，但表面的繁荣下蕴藏着不稳定的因素：天津的报纸与政治关系密切，容易受政局波动的影响。天津报业的这个特点对于我们认识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理解《大公报》何以在这一时期堕落为专制者的传声筒，后再转为独立的舆论机构，这段历史背景是不可忽略的。

1916年至1925年的天津不只有军阀的阴影，也有积极的亮色。“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天津的出版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宣传反帝爱国的进步期刊大量涌现。影响比较大的，如《觉悟》《平民》《新生命》等。”^② 民营的《益世报》等也顺应时势，支持爱国运动，反对军阀，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如果没有这些亮色的映衬，《大公报》在万马齐暗的时代里或许只是浊流中的一分子，不会因落伍显得刺目。但是毕竟一切都在进步，惟有《大公报》老气横秋、踽踽独行，就不免相形见绌了。

研究者这样评价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辛亥革命后，《大公报》因为英华的离去，就走上下坡路……一段有所起色，但胡政之很快离去。《大公报》越办越无特色，加上亲日色彩浓，销路更加不畅。”^③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正处在中国一个空前的变革时期，新的思潮激荡着知识分子，报业中增加了一些进步的元素。1920年9月15日，出身于南开学校的几位著名进步知识分子时子周、马千里、孟震侯、夏琴西创办了《新民意报》，以新闻和时评为主。这份报纸态度鲜明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呼吁新文化，提倡民主。反

① 郅仆：《解放前天津市新闻事业发展概要》，载《新闻史料》，第29辑，26页。

②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简志》，1051页。

③ 郅仆：《解放前天津市新闻事业发展概要》，26页。

对封建。《大公报》平日也有过一些反映帝国主义侵略的报道，但与《新民意报》这些尖锐的社论（如《中日不能亲善》、《拙笨的日本当局》、《觉悟呀、督军们》、《告诫军人政客》）比起来^①，就显得过于温和了。

所以，孤立地看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表现，不足以对它的立场进行恰当的判断，只有了解当时别的报纸普遍的舆论调子是什么，才能够确认《大公报》的政治色彩。《大公报》以支持的态度报道过“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连续刊载过反映抵制“二十一条”活动的新闻、言论以及漫画等，在1925年全国反帝的活动热潮中，《大公报》也作过不少报道，反映了当时全国各地罢工罢市的情况，对这个爱国运动也持比较赞同的态度。但是在当时其他报纸、尤其是进步报纸的参照下，这一时期《大公报》的态度就算不上非常积极了，报道的力度也远远不够。

在20年代初期，号称天津第一大报的是《益世报》，日销量在5000份，每日出刊三张。1915年11月7日创刊，由比利时籍传教士雷鸣远创办。这张报纸虽然是天主教传教士所办，但刊登政治新闻也很多。“积极支持天津人民反对法人侵占老西开的爱国运动，因此受到天津人民的欢迎，销路日增。另外，该报在发行上另辟新路，以彩票法招徕读者，凡订阅一年者，皆有中彩千元之希望，一时订阅者甚多。接着五四运动爆发，《益世报》支持学生立场，攻击安福系，又一次争取了天津读者。”^② 这张报纸是《大公报》长期的有力竞争对手。《益世报》对各派军阀基本上都持反对态度，报道站在比较客观中立的立场。因为这张报纸有宗教背景，常常登与慈善事业有关的报道，比如捐款、红十字会的活动等等。

天津老报人吴云心^③回忆说：“抗日战争以前，天津新闻纸影

① 参见刘嘉骏：《回忆〈新民意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37页。

② 邹仆：《解放前天津新闻事业发展概要》，28页。

③ 吴为天津老报人，原为《益世晚报》主编，1989年去世。他晚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文章。吴在《益世报》长期工作，回忆中不排除有“偏袒”《益世报》贬低《大公报》的成分，这点是后来的研究者应当注意到的。

响最大的是《大公报》和《益世报》。两个报在一定时期内互为消长。其盛衰之迹，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政治情况和社会情况，也反映了一个时期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大公报》开办之初，以反对慈禧同情光绪，获得了群众。但在五四运动时，它的态度倾向安福系，背离了人民，使得报纸声誉一落千丈，实际上到了寿终的地步。一九一八年左右，天津街头卖报者只是叫卖《益世报》、《泰晤士报》……接着五四运动爆发，《益世报》支持学生立场，攻击安福系，又一次争取了天津群众……当时，总编辑唐梦幻虽然无张季鸾之才，但在五四上支持学生运动表现得很坚决……在五四运动的报道上，《益世报》颇受周恩来同志之重视。”^①

周恩来于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应《益世报》的约请，写了大量旅欧通讯，介绍欧洲各国政治动态和海外留学生的生活状况。从1921年到1922年在《益世报》上共刊登56篇。^②站在军阀一边的《大公报》显然没有得到学生运动领袖的欣赏。周恩来1915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曾写过一篇专论报纸的作文，名为《说报纸之利益》。虽是习作，但所阐发的观点十分鲜明，他写道：“盖报纸本集多数人之意见，发为公正之言论，确当之事实，非漫骂揭私可比。而今日之报纸，多党同伐异，挟仇寻私，互相嘲笑，风谣传事，骇人听闻，肆其煽惑之手段，鼓其扰乱之心理，致人民有相戒不看报之语。”^③从周恩来对当时报纸的激烈批评，可以看到他对当时报纸的看法，他所反感的正是“四不主义”的对立面：“党”“卖”“私”“盲”。这也正是王郅隆时期《大公报》最突出的弊端。

20年代，天津的报纸普遍资金短缺，而且人才流动频繁，广告来源不稳定。许多报纸自己无力印刷，要找他人代印，付每月几

① 董效舒、吴云心：《七七前夕的天津（益世报）》，见《新闻史料》，第2辑，65页。

② 参见俞志摩：《天津〈益世报〉概述》，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78页。

③ 崔国良、张世甲主编：《南开新闻出版史料》，7-8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百元的印刷费。一旦收入不景气，就裁员减薪，压缩报纸篇幅。《华北新闻》的情况就是一例。1921年4月，投入资本两万元、由名报人包天笑为总编辑、副评家马二先生为撰稿人的《华北新闻》创刊，可谓阵容强大。《华北新闻》日出三张，创刊之初销量就达到3000份，令《益世报》感到有竞争压力，于是增出半张，达到三张半的篇幅。^①但《华北新闻》后来人事更迭，经济紧张，销量下滑到1000多份，只好压缩篇幅，变为日出两大张。

天津“报界公会”是天津新闻界的组织，英敛之曾任“报界公会”主席。王郅隆时期，《大公报》依旧参与“报界公会”的活动，数次在显要位置刊登“报界公会”的启事。

当时报纸的发行情况又如何呢？“1949年以前，天津市的报纸由私营派报社包销，杂志由书店代销。”^②天津各报中除少数报纸有相当数量的固定订户外，大部分报纸均靠零售。“派报社是把报纸从报馆中拿来，再分配给报贩，报贩再沿街叫卖，或者由报贩分送给各订户。利益则是从报馆得相当的折扣。这些派报社当时大都设在车站及南市各处。”^③

清末开始，天津出现了宣讲处及阅报处。宣讲处是通俗演讲的会场，1905年至1906年开设；阅报处是供读者阅览报纸、杂志的地方，也是1905年至1906年设立的，有人场券方可进入阅览，如有重大事件发生、阅报者增多，就在门外张贴报纸。阅报处主要是为识字不多的平民服务，若阅报者“遇有难解的文字，管理人员可尽解释之责。该处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发风气，增进人们的知识，并通晓时务等等”^④。《大公报》也曾通过这样的方式与读者见面。

此外还有专门发行进步书刊的机构，“1919年成立的南开书报贩卖团，1922年开办的五五书报代买社，是天津最早传播民主和革命

① 参见周拂尘：《我和〈华北新闻〉》，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56页。

②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简志》，663页。

③ 邹仆：《解放前天津市新闻事业发展概要》，32页。

④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载《新闻史料》，第27辑，50页，天津日报社。

新思潮的据点；其后的天津书局，也以销售新思潮书刊著称^①。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二节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 的经营管理

一、投资人及其对报馆的控制

1916年9月，《大公报》从英敛之转到王郅隆手中，1926年又从王郅隆的儿子转到新记公司手中。王郅隆是1916年至1926年这一时期《大公报》的主要投资人。

（一）投资背景与王郅隆其人

王郅隆，字祝三，天津人，原是粮店伙计，后来从事面粉等生意成为富商。他认为军人是当时社会上最有势力的阶层，所以刻意结交军阀倪嗣冲，与之结为密友。1913年被倪任命为安武军后路局总办，帮倪采买军用物资，渐渐与徐树铮、曹毓英等后来安福系的骨干人物熟识。1918年新国会成立，王郅隆任参议院议员。他擅长筹措资金，被视为安福系这个组织的“财神爷”。作为靠政界、军界起家的新财阀，他与天津的商人世家不同，在时局动荡的年代能够呼风唤雨，大大超过一般商人的政治能量。然而与军阀结盟的风险也大，1920年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失势，王郅隆名列安福系“十大祸首”（又称“安福十凶”）之一，被通缉后逃亡日本。1923年9月，日本发生大地震，房倒屋塌，王郅隆被砸致死。

王郅隆卒于1923年9月是无疑的，但对他的出生年份史家曾有争议。不少文献都称王郅隆生于1888年，周雨的《大公报史》即持这种说法，天津《新闻史料》第26辑登载的《天津市新闻名人简介》也是如此。但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②，认为如果王生于

①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简志》，1052页。

② 吴廷俊：《〈大公报史〉史实考订》，载《新闻春秋》，42页，1994-02。

1888年，那么他在1902年《大公报》创办时仅是十几岁的少年，怎么可能成为大股东？

面对这样的争议，把王郅隆的生卒年份考订清楚是必要的，以免今后的著作以讹传讹。笔者在披阅《大公报》和有关文献后，认为可以确定王郅隆生于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63年9月7日，卒于1923年9月1日，死时60岁，根据是王家后人为王郅隆登的讣告。1923年9月底至10月初，《大公报》连续10天刊出这篇讣告。全文如下：“不孝宝鑫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清授资政大夫晋封光禄大夫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二等文虎章大总统府咨议国务院顾问花翎二品衔候选道候选知府分省同知国学生祝三府君痛于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一日即夏历癸亥年七月二十一日午时寿终于日本横滨旅次距生于同治癸亥年七月二十五日寅时享年六十有一不孝等闻耗匍匐奔往扶柩回津遵礼成服择吉安葬叨在友世贤乡戚谊哀此讣闻谨择于阴历八月廿四五日送路阳历十月四五日修经”，署名是子“宝鑫”、“宝生”及孙侄等人。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后辈不能擅称先人的名讳，只能尊称字或号。这则讣告的称谓是“祝三府君”。通过讣告，我们可以获知许多重要的信息：（1）王的具体生卒时间：王生于同治癸亥年，即公元1863年的9月7日，死于1923年9月1日。死时60岁，按旧时的习惯算法虚岁61岁。（2）王的死亡地点：日本横滨。一般文献只说王死于东京大地震，似乎是死在东京的。但从讣告中我们可以确切知道他不是死在东京，而是死在横滨。（3）王生前的职务与头衔：在王的字“祝三”之前，竟有一大串新旧杂陈的官衔，清已经灭亡12年了，王家还把那些“花翎二品”之类估计是捐来的清朝头衔郑重写上，这或许能说明商人阶层对官职的热衷。在封建社会，官员或其妻子死后，家族中人可向皇帝申请给死者一个封号，甚至一个生前并不曾担任过的官职。王郅隆名前的“候选知府”之类官衔，应是生前捐来的虚名。属于民国的那些官衔，可以说明王生前的职务。文献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担任过财政总长，有的说他运动该职位未成，从讣告中看应是没有担任过。

因为如果王曾经任过财政总长这样的重要职务，讣告中不会不写出来。(4)王家处理丧事的情况：从讣告的文字看，王郅隆于9月1日在日本横滨丧生，家人赴日托遗体运回天津，并在9月末通知亲友，办理丧事。丧仪在10月4日和5日举行，讣告提前10天刊登，到6日仪式结束，也就不再刊登了。在此期间，《大公报》除了讣告，并未登对王的纪念文章，大概因为王是政府通缉的人物，且人早已失势，所以不便张扬。

在英敛之时代，王郅隆就是《大公报》的股东之一。1916年，他从已无意办报的英氏手中收购了《大公报》。1920年他遭到通缉之后，被迫出国，对《大公报》的业务不再过问，但《大公报》的资本控制权还在他和他的儿子手里。1925年，报纸因不景气而停刊。次年，由其子卖给新记《大公报》公司。

王郅隆介入《大公报》绝非偶然。这是在北方新闻界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大环境中出现的必然结果。王郅隆隶属的政治集团需要一张报纸为他们鼓与呼，他自己也有建立舆论阵地的需要，所以即使不收购《大公报》，他和他所属的政治集团也会占据另外一个什么报纸。而《大公报》自英敛之创办以来，有良好的声誉，领先的业务水平，可观的发行量，是天津报界之翘楚。能购得这样一张老牌报纸，对于精明的商人兼政客王郅隆来说，是一桩十分合算的买卖。

王郅隆在投资报业之前曾经与新闻界发生过一次冲突。1916年5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出现危机，暂停兑现。面对银行可能倒闭、“纸币存于商民则为废纸”的紧急情况，中央政府令各埠筹设保市银行。天津当局特发函要王郅隆经办此事。公函中说筹办保市银行“维持国家，便利地方”，“此举于地方金融极有关系”^①。然而没过几天，正在筹措此事的王郅隆竟看到天津商会的机关报《商报》在批评自己，他深感委屈，向商会致函：“准国务卿艳电，

^① 《直隶巡按使朱家宝为筹设保市银行邀集各绅商与王郅隆受筹办法事伤津商会》（1916年5月30日），见《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306页、30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筹设保市银行纯用商股，发行纸币，呼收现款，流通市面，活动金融，由贵会邀集绅商会同筹办等语。郅隆闻命之下，奔走经营，不遗余力，屡经会议，多表赞成，组织手续，粗有端倪……郅隆情关桑梓，谊不容辞……不意本月5日，商报时评以保市为掩饰之谋，以郅隆为万矢之的……惟商报乃贵会之机关，事之真相岂有不知，理之是非安能附和，且贵会赞成之举，该报出而反对，殊属不解。况肆口谩骂损人名誉，尤为报律所不许。郅隆对于保市银行，无非为公益起见，可行可止。无端遭此横逆未免不平。尚祈贵会彻底查究，该商报是否为人主使，严加取缔，以免淆乱而重名誉，幸甚幸甚……”^①在王委屈地抗议后，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向天津商会发函，斥责《商报》之“肆意毁谤”王郅隆：“……查商报乃商会之言论机关，该商会既一致赞同，该商报何无端反对，且以维持会之中止，贻祸于保市银行，居心叵测，显系有意破坏。值兹时事多艰，人心易惑，该商报不顾大局，信口雌黄，影响所及、为害匪浅。敬恳飭知商会，查明该商报对于保市银行何以妄加评论，损人名誉，抑系有人主使，彻底根究，严加取缔，以维公益而免阻挠等情。据此，除禀批示外，合亟飭行该会，迅速查复，以凭核办，此飭。”^②

虽然说直隶巡按使为王郅隆出了气，但从上文可以看到，王对有关自己的负面言论反应激烈。他经过此事，一定强烈地意识到舆论工具的重要性。就在是年秋天，王郅隆从英敛之后人手中收购了《大公报》。

以往的研究者普遍认为王郅隆只是代表安福系买下《大公报》，使之成为安福系的机关报。但笔者以为，王郅隆亦官亦商，与政界关系密切，很容易招惹是非。他涉足报业，不排除有为个人占据舆

^① 《王郅隆为筹设保市银行遭商报时评肆口谩骂事致津商会函》（1916年6月10日），见《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308页。

^② 《直隶巡按使朱家宝为商报时评毁谤王郅隆筹设保市银行事飭津商会》（1916年6月16日），见《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309页。

论阵地的意图。

王郅隆曾于1922年10月4日在《大公报》上刊登《王郅隆启事》，文曰：“敬启者，鄙人在津经商垂四十年，首创实业艰苦备尝，无非为桑梓谋利益，为人民广生计，苦心孤诣，人所共知，民国七年，以商界上之资望，被选为参议员，原非本愿，经辞不获，故虽滥竽充数，仅于要案出席数次，随同画诺，仍然肆力工商，未尝干预政事，直皖之役，不幸竟因误会，致被株连，恐惧以来，已逾两载，虽法律检查无据，而误会迄未谅解，年老多病，精力日衰，近更加剧，几废食眠，迫不得已，乘机离京择地就医，静待昭雪，誓不再闻世事，亲友中如有枉顾者，恕不接待，承惠函件，亦不作复，谨此声明，诸乞鉴原是幸。”这则启事表面上是在流亡日本期间所写的谢绝亲友信件的一般通告，其实用心良苦，主要目的是为自己辩白。王郅隆把他个人苦心经营、追逐权力说成是“为桑梓谋利益，为人民广生计”，“未尝干预政事”，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但了解其经历的读者怎会轻信这种故作姿态的虚伪文字？

其时，王郅隆作为通缉犯已经流亡海外，何以敢在报上公开登这种启事？恐怕是因为事过境迁，形势没有1920年那么紧张，一些安福系要人又露面了，王郅隆在日本仿佛看到了希望，于是在自家控制的报纸上造造舆论，试探一下社会的反应。文中的所谓“静待昭雪”说得已经很明显，他一心盼望的就是重回故里，重登政治舞台。如果不是1923年死于地震，王郅隆很可能如其所愿，避过风头后再度长袖善舞于政界、商界。毕竟当时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失意者暂时退隐而后伺机再起的事例屡见不鲜，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谋略。可以说，不到最后，就没有绝对的失败者。但王郅隆没有等到“昭雪”的那一天。不久以后，安福系再度失势，就此一蹶不振，一败涂地了。

这则虚伪得有点可笑的启事倒是能说明《大公报》在1922年还是掌握在王家手中，还能为王郅隆制造舆论发挥作用，也说明《大公报》不仅是安福系军阀的舆论阵地，还长期是王氏家族的舆论阵地。

（二）与皖系军阀的关系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成也军阀，败也军阀。如果没有一派军阀势力的支持，它不可能有短暂的繁荣，而军阀势力更替之后，另一派视其为眼中钉，限制其发展。

中国 20 世纪最初的 30 年，“军阀”是解读历史的关键词。“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同时又是一个拥有地方或中央政权，控制一定区域的政治实体，各派军阀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必然结成一定的地缘关系。”^①皖系虽以安徽籍军人政客为主，大本营却在京津地区。

“安福系”的名称始自 1917 年冬天，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期间，皖系的段琪瑞一派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布置了一所房舍，作为接近他们的议员聚会之所，性质类似于俱乐部，设有棋具、麻将牌等娱乐用品，无固定的组织，也无领导，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团体，但是成员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被称为“安福俱乐部”，或安福系。段琪瑞是这一派的幕后领袖，王揖唐、徐树铮等是其中的骨干人物。安福系操纵中央政权两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②王郅隆作为安福系的“财神爷”，购进《大公报》后，使之成为安福系的喉舌，为段政权宣传鼓吹。黎元洪是段的政治对手，所以《大公报》的报道就很少提黎元洪。

李思浩先后任段琪瑞内阁的财政次长、总长，曾被列入通缉的安福系“十大祸首”之一。他曾经在回忆录里面讲到给过胡政之和王时期的《大公报》津贴：“在（任财长）这期间，要结交几个新闻界的朋友，也要应付一般新闻界的需索，给他们一点津贴。在朋友中，胡政之和段芝泉、徐义铮关系很深，和我们都很熟，自非一般可比，可以说是我们团体中的一员。除《大公报》（当时由王郅

^① 王明德：《北洋政府时期军阀间的地缘关系及其影响》，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2（6），31页。

^② 参见刘振生：《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见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隆出面主办)以及胡后来办的《新社会报》要给相当数目的资助外,对胡本人,我记得在我当财部总、次长的几年间,每月送他三四百元,从未间断过。”^①

《国闻周报》第2卷20期(1925年5月31日)“名人录”栏目曾经刊登过李思浩的照片,并刊登了该人的简历:他是1916年5月20日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1919年12月任财政总长,直皖战争后去职,1924年11月执政府成立,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

从1916年到1925年,李长期担任财政次长、总长。在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是否得到政府恩惠的问题上,他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尽管胡政之和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拿过津贴,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当时北方的报纸多靠津贴生存,而且拿了津贴不一定就替出钱者说话,所以对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

从版面内容看,《大公报》固定刊登政府“命令”,不惜大量篇幅;常为政府大员歌功颂德,不吝华丽辞藻,甚至为高官的母亲连登讣告。喜丧二事作为个人分类广告刊登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第一张(实际上的新闻头版)连日刊登,就有些刺眼了。如皖系大将徐树铮的母亲去世后不久,《大公报》即连续多日在重要位置刊登讣告及“设奠领帖”的消息。

《大公报》在1920年之前处于当权的皖系庇佑之下,1921年之后,随着安福系失势,《大公报》的地位也开始下降,1924年受到当局的“禁止寄递”处分。下面的档案记载了这一事件的原委——《天津警察厅为禁止寄递〈新中华报〉及〈大公报〉事致直隶邮务管理局函》(1924年9月18日):

“径启者,案准天津临时戒严司令部来函内开。径启者,兹查有《新中华报》及《大公报》所载消息,言论悖谬,迹近造谣。戒严期内,未免感动观听。相应函请贵厅飭警禁止各派报所派售以及

^① 徐铸成:《李思浩生前谈北洋财政和金法郎案》,见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233页。

送报人分送，并停止邮局寄递，以清乱源。即希查照切实禁止实为公便。此致等因。准此，除令行城乡各警区署及特别一、二、三区一体认真查禁派售，并不许其粘贴，并令饬邮政检查员认真检扣暨函复外，相应函致贵局，即希查照，转饬各分局并京奉津浦各路邮车协助办理，所有出口之《新中华报》及《大公报》一律扣留，是为至荷。此致直隶邮务管理局，天津警察厅启。”^①

英敛之时期，《大公报》曾经遭到袁世凯的“禁止寄递”处罚，使报纸的发行范围限制在租界。“禁止寄递”看似并没勒令停刊，其实是一种很严厉的处罚。因为《大公报》位于日租界内，“禁止寄递”封住了报纸发行的三种渠道：一是派报所派售（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报纸批发处，即报纸零售渠道），二是送报人分送（即订阅的送报上门渠道），三是邮局寄递（即外地和国外的发行渠道）。

表 3—1 的数据说明天津的租界区人口远远少于非租界区的人口，而《大公报》在皖系失势后，被新政府禁止寄递，即只许在租界区发行，这无疑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虽不是勒令停刊，但扼住发行渠道，无异于扼住生存命脉了。

表 3—1 民国时期的天津人口统计数据（1912—1936）^②

年份	合计		非租界区		租界区		资料来源
	户	人	户	人	户	人	
1917	124 120	719 896	100 510	600 746	23 610	119 150	《中华民国省区全志》
1921		775 014		750 000	6 866	25 014	《中国年鉴》1924 年
1925	176 772	1 072 691	139 010	843 677	37 762	229 014	《北京天津案内》

同在天津的《益世报》的一次经历可以作为对照，说明“禁止寄递”这种处分的严重性。1934 年，《益世报》因言论得罪当局，被处以停邮处分，“断绝了报社的新闻来源，切断报纸的对外运销，使《益世报》无法销行于意租界之外。报纸虽仍出刊，但不能运出

① 天津市档案馆编辑，《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50、51 页。

② 参见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天津简志》，1168 页。

界外，堆积如山，造成极大损失，只得自行停刊”^①。上海的《申报》在史量才时期，因得罪蒋介石，也曾被勒令只能在租界内发行，这对面面向全国发行的《申报》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惩罚。

为什么《大公报》会遭到处分呢？从时间线索上查找，就在受处分的当天，即1924年9月18日，该报第3版上刊登了《段合肥对于时局之通电》，内有痛骂当局的字句：“痛国事日非，生灵涂炭，维持拯救，用全力以尽职责……年来政治，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上林已作污秽之场，中枢俨成赃私之肆。不知国家人民为何物，礼义廉耻为何事。”段合肥即段祺瑞，他1920年下台，1924年11月才又组织执政府上台。9月发表这篇文字时，段还在下野期间。所以政治对头一方自然要迁怒发表其文的《大公报》。

《大公报》被处分“禁止寄递”，源于北洋军阀派别之间的深刻矛盾。被政治背景所累，处以禁止寄递的处分，几乎等于宣判了报纸的死刑。且不说《大公报》本身已经不景气，即使是好端端的报纸，如果封住了发行渠道，恐怕也要关门。

但段的执政府在1924年11月上台后，为何不扶持《大公报》呢？分析一下，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经历1920年安福系倒台的挫折后，《大公报》人才流失，报纸质量下降明显，在读者中已无威望，很难重振旗鼓；其次，段虽然上台，但自身地位并不稳固，四面是敌，哪里顾得上办报？一年之后，段就又下台了，安福系军阀彻底失败，与之始终摆脱不了关系的《大公报》也停刊。

总的来说，《大公报》是在恶劣的环境下难以维持，被迫停刊的。但是为什么在1925年11月底停刊，也还值得我们探究一番。因为从报纸停刊前几个月的版面看，是表现比较平稳的，版面固定在8个版，广告照常刊登，栏目也没有缩减。尽管与鼎盛的1920年之前比，的确是萧条了许多，版面内容缩水，栏目质量下降，但这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多年来逐渐衰落的。如果没有突发的事情，《大公报》也许还可以“惨淡”地维持下去。那么到底发生

^① 俞志厚：《天津〈益世报〉概述》，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81页。

了什么事件，使《大公报》突然停刊呢？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发生在1925年冬天的冯玉祥和奉系直隶保安司令李景林之间争夺天津的战争应该是促使《大公报》不得不停刊的直接原因。11月2日，《大公报》发表消息《本埠已宣布戒严》。1925年12月25日，《东方杂志》上发表《内外时评》，指出“半月以来，北方战事已变成一个新局面……因张作霖失败，北京的政治发言权完全操于冯玉祥方面，且加以国民革命运动的倒段示威，安福要人的突被拒捕，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愈觉有‘不可终日’的样子”^①。天津发生的这场战争，即使在战乱频繁的20年代也是规模比较大的。全国性的《东方杂志》在次年1月，专门刊发了一组照片《兵燹中之天津》，留下了一个个战争的瞬间，有占领天津的“国民军”骑马进城的姿态，有华界租界交界处日本军人荷枪实弹、建筑防御工事的紧张状况。^②

《东方杂志》有一个栏目“时事日志”，定期记录全国范围内的重要事件。关于1925年12月26日，有这样一条记载：“段执政因其亲信曾毓雋为警卫司令所捕，接近奉天之安福要人多逃避使馆界，召特别会议解决去留问题，结果电冯玉祥来京面商政局办法，并派黄郛赴张家口迎冯。”^③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天津时局的紧张混乱程度。事实上随后几天，又有段氏亲信被捕，而民众也有游行要求段祺瑞下台的举动。当时的形势对安福系人物是极不利的。尽管王郅隆几年前已经在日本去世，但是《大公报》一直被认为是亲段的安福系报纸，在此时很可能受到某种形式的压力。《大公报》的衰落已经有数年了，呈线性渐变的趋势，停刊也是大势所趋，但是具体在何时停刊，不排除有非线性的造成突变的因素。与停刊时间对应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这一场发生在1925年冬天的冯李之战。

① 《内外时评》，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二十四号（1925年12月），1~2页。

② 参见《兵燹中之天津》，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二号（1926年1月）。

③ 《时事日志》，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219页。

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造成《大公报》停刊的重要原因。也许是王郅隆的后代去避难，躲避战乱对市面的冲击，或者是来自警方的对安福系成员的追捕。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证明停刊前《大公报》的老板和员工在做什么，但有证据表明，当时天津正常的商业活动和居民生活确实被打乱，安福系的成员也确有避难之举。《大公报》的停刊是内力与外力、积累因素与突变因素产生合作用力导致的结果。内力是内部人才流失，外力是外在的政府限制，加上日积月累的颓势和突发的战争灾祸，《大公报》走到1925年11月27日，终于不得不停刊了。

（三）与银行界的密切关系

王郅隆在官场和商场之间周旋，在当时是影响颇大的一个人物。对他来说，商人必须寻求权力的庇佑，而政界军界也离不开商人。王郅隆不但与皖系军阀关系密切，还与银行界关系非同寻常。他是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的第一总董事，投资最多，为55万元。^①该银行的主要投资人还有安徽督军倪嗣冲，周作民任总经理。金城银行成立后，充分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仅仅经过3年时间，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三家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金城银行通过大量购入北洋政府公债、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度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

王郅隆还是盐业银行的董事^②，1919年王又创办了边业银行。^③身为多家银行的大股东，王郅隆与金融界关系非浅。在当时，“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总称“北四行”，与南方被称为“南四行”的“上海、新华、浙江兴业、浙江实业”四家银行遥相对峙。“北四行”是依靠军阀发展起来的，在北方金融工商

^① 参见詹效存、杨固之：《周作民与金城银行》，载《天津文史资料》，第13辑，105页。

^② 参见张伯驹：《盐业银行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权》，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75页。

^③ 参见《天津近代人物录》，29页。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1987。

界有相当的影响力。^①

把天津的两家著名报纸《益世报》与《大公报》做个对比会发现，《益世报》有且多而《大公报》却没有的是关于天主教会的消息，《大公报》有且多而《益世报》却几乎没有的是关于银行界的消息和评论。由此可见两报馆各自之背景：《大公报》背后是政界商界，《益世报》背后是外国天主教会。

要想知道《大公报》怎样体现投资人的利益，可以看它哪些报道的位置比较突出。《大公报》自从转入王郅隆手中之后，用大量篇幅刊登有关银行界的新闻、评论和广告。

从1917年1月开始，《大公报》关于银行界的新闻报道明显增多。以1917年1月28日为例，当日第一张第二页（这是实际上的新闻头版）共刊登了24条新闻，其中两条是关于交通银行的，一为《交通银行决定改良》，二为《中交两行将有督会办出现》。言论栏目“冷观小言”（冷观是胡政之的笔名）也是关于银行界的：“交通银行借款，世人颇多非难，其实借款条件尚无过甚之处，交行现既陷于困难，舍此又何术自救。吾意国会所应注意督促政府者，第一，宜令交行成为纯粹商业银行，勿保留其官私不明之性质，第二，宜将政府积欠银行之款确定清偿办法，勿因仍不理致贻纠葛，至于交通银行本身则宜藉外人之助力切实改良，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此至善之计也。然政府方有派中交两行督会办之议而望断佳音之沈老先生，亦居然有会办之望，其视交通银行不知是何地位，亦一不可解之事。”1917年1月28日是正月初六，这份报纸是该年正月里出版的第一份报纸，当日报纸右上角还有“恭贺新禧！本报同人鞠躬”字样。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节庆日子，《大公报》不惜版面，大登关于交行的言论、新闻，如此突出处理，确与投资人和银行界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

从1917年开始，《大公报》刊登的银行广告篇幅也大量增加，既有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天津殖边银行等与王郅隆关系密切的银

^① 参见《北四行资料》，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68页。

行，也有中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其他银行的广告。仅1917年10月2日这一天，就登了8个银行的广告，占据第1版的醒目位置，内容主要是推介存款、买卖金银等业务。

到1919年，常常第2版的上半部分全都是广告（包括商品广告和商业机构的通告），而这当中，银行的通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包括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等。由于第2版是实际上的新闻头版（因为第1版只登广告，不登新闻），所以在第2版上登广告的效果尤为突出醒目。

在新闻、言论、广告等诸方面，都可以看到《大公报》此时与银行界的密切关系。

（四）与日本方面的关系

有的学者说《大公报》在1924年前后表现得亲日倾向明显，令读者反感，这是旧《大公报》倒台换上新《大公报》的重要原因。不过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公报》与日本的渊源非浅，非一日之寒。

《大公报》创刊之初落脚于法租界，与法国政府关系密切，后来有了矛盾，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就搬到日租界。从英敛之时代的后期，《大公报》就表现出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多年都是如此。^①胡政之主持时期也是这样。胡是日本留学生，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多受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大公报》常在副刊上刊登日本人的文章，介绍日本政治、社会的情况等等。

《大公报》在天津的社址位于日租界内四面钟，属日方管辖，所以《大公报》上除了中华民国纪年，还长期印着“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一日第三种郵便物認可”的字样，说明《大公报》拿的是日本当局的许可证。不过近代以来有很多中国报纸辘身租界，寻求租界方面的庇护，避免中国政府的压制迫害。还有的报纸甚至假托外国人为发行人，所谓“洋旗报”指的就是这一种现象。对于租界里挂

^① 参见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6页。

洋旗的中国报纸，不能简单的视为投靠某国的报纸。判断一张报纸的性质，主要是看它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倾向。

在近代以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联系频密的大背景下，《大公报》对涉及日本的问题确实比较关注。曾连续刊载日本作者的文章，如交通部顾问中山龙次的《实业专纪》、日本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中国之财政问题》^①，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情况时有报道，但对日本涉及我山东领土问题的举措，则有抵制情绪。

1923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大公报》曾以大量篇幅进行报道，并呼吁读者捐款。该年9月21日，《大公报》刊登了《报界公会紧要启事》，大意为救国运动与为日本赈灾是两回事，表示报界公会作为“舆论代表”，既认同“中日亲善”，以“同情”的态度支持赈灾，又不希望因为赈灾活动而停止救国运动。

二、报馆的建筑与设施

（一）报馆的建筑

本章笔者曾对《大公报》旧址作过实地考察。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社的旧址在今天津的和平路169—1号。当年的大公报馆看起来在这条繁华的布满老建筑的街上是比较普通的，不算高大，只有两层，占地也不十分开阔，现为一家大型眼镜店——“永真眼镜”。与当年《大公报》的老照片比较，建筑依旧，只是窗帘、门前的装饰灯没有了。外立面的墙面经过重新粉刷，在墙上挂着一块纪念的标牌，上书：

大公报社旧址

大公报是我国历史最久的报纸之一，由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创办。社址原设于法租界，1906年迁入日租界现址。

^① 《大公报》，1917-02-04。

该楼为砖混、二层，入口为券形洞门。排版印刷均在楼内。

天津市文物局

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

二〇〇二年三月

昔日的日租界——和平路一带的旧式建筑保存比较完好。有办公楼，有住宅，有相当一些是三四层高，而以浙江兴业银行、交通银行的大楼最为壮观。寓公们的住宅也很是考究。大公报馆旧址与这些豪华的建筑比起来，是比较平实的。

在大公报馆旧址的对过，现在是一家西餐厅，也是旧建筑，房顶有一座钟，四面都有刻度指针，这个立体的钟就是“四面钟”，“四面钟”的地名也由此而来。这座钟的原物现仅存钟座，钟而是新制的。当年，“四面钟”所在的建筑坐落在两条街交叉的路口，隔着一条不算宽的马路，对而就是大公报馆。《大公报》报头写的报馆地址“日租界四面钟”，就是这么来的。

“四面钟”所在的街道是天津最繁华的地方之一，现在被命名为“金街”，如同当代北京人把王府井命名为“金街”一样，都是客流稠密、商业价值可观的集旅游与购物一体的步行街。

从大公报馆旧址周围的环境看，这里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是很繁华的地段，紧邻银行、洋行，仅隔一条街的多伦路又是当年文化人常聚会的地方。所以说，当年《大公报》买下的日租界社址是相当优越的，既有商业上的便利，又有文化交往上的方便，这是运用一些特权才得到的地盘。《大公报》最初创刊时设在法租界，借以寻求庇护，但后来英敛之与法国人产生矛盾，房东也要收回该馆建筑，在这种情形下不能不另觅新址。而此时日本人表现出想拉拢英敛之的愿望，不但请他去日本考察，还提供了建新馆的地皮：“1906年初，英敛之……租用日租界‘东京建物株式会社’在四面钟对过的地皮，自建两层楼房。同年9月5日迁到新址。”^①

^① 曹世瑛：《〈大公报〉的发祥地——当年在租界选址迁址的经过》，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234~236页。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曾经因遭遇水灾一度迁移到北京出版。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首先，表明天津《大公报》与北京城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在北京铁老鹳庙设有分销处，辟有“北京特约通信”栏目，并且在发大水时编辑部临时转移到北京。毕竟天津与北京地理位置接近，联系方便，关系密切也是很自然的。

其次，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报纸面对意外——水灾时的应对方式，不是长期停刊，而是异地出版。1917年10月2日刊登《本报特别启事》，告知读者：“本报因被水害，不得已于九月二十六日暂行停刊，兹以水退无期，未便久停。爰暂移至北京出版。”编辑处设在宣武门外椿树下头条十二号，发行处在琉璃厂铁老鹳庙协通印字馆内聚兴报房。因系借用“友馆”的印刷机器临时出版，“为简便起见”，篇幅不得不缩减为一张半。印好报纸，每日赶第一班火车运往天津。

关于1917年的水灾，史书是这样记载的：“从这年7月起至第二年4月，天津被淹达十个月之久，市区内自河北至南开一带水深四五尺，有若干街道都是水上行船。”^①“1900年以后到1948年，天津发生大水6次……其中以1917年和1939年为最严重。1917年大水遍及京津及河北省101个县，天津市区西南郊全部淹没……今和平路水深1米左右。”^②是年10月12日，《大公报》刊出一张名为《呜呼天津之大水》的照片，说明文字为：“日本租界四面钟本报馆门前之状况”。照片上街遭水位甚高，报馆门前有人在撑船。

在这场百年难遇的水患中，《大公报》人表现出与天灾抗争的可嘉精神。9月26日暂时停刊，10月2日即在北京恢复出版，10月11日又把编辑印刷两部门迁回天津。几经波折，在大水灾中还坚持与读者见面。迁回天津次日，胡政之发表论评，讲述在大水包围之中《大公报》如何“勉力出版”，直至被迫暂时停刊，又如何

① 《天津简史》，25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② 天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津简志》，72、73页。

在北京“勉强维持”，最后“觅地迁移”回津。他写道：“溯自本报发刊十余年，与专制政府战，与暴民政治战，屡经奋斗，以成今日之历史。每年除照报界公例停刊外，中间未尝有一日之间断。此次不幸，以不可抗力之天灾，使本报停止出版者七日。此固本报之奇殃，同人等实引为深疚，不得不更励其奋斗之精神，以与自然力相抗。此半月以来，所为辗转京津，不遑宁处，卒于本日复其原状也，同人等以却余之身念过去与现在之痛苦，益用兢兢于民生问题之不可忽。自今以往，更当努力于斯。”^①

（二）通讯及印刷设施

天津是中国最早建立电报、电话通信的城市之一。1879年，李鸿章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自天津直隶总督行署至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之间架设电线，试遑军报，这是继台湾之后的第二条有线电报线路。1881年12月，津沪电报线路全线竣工，12月28日正式营业，使用莫尔斯人工收发报机收发公私电报。这是中国建立电报事业的开始。京津塘电话线是我国第一条长途电话线路。1914年，4000门共电式人工电话交换机正式开通。

据天津老报人的回忆，电话在报馆的日常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电话是三十年代以前天津报纸的重要新闻来源，那时北京是政治中心，天津比较大的报纸，必须在北京约一个特约记者，或是派专人驻京。他们要在夜间向天津传递消息，惟一的通讯工具便是电话。接北京电话，在天津报纸编辑中也是一个辛苦的工作。许多练习编辑，常常是要经过接电话这一关。那时北京发话时间，一般要在深夜两三点钟，通话时间不长，一般新闻，北京的记者只是简单说大意，要接电话的人随听随编。最不好办的是念通电。要一句句地念，一句句地写……接北京电话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快。京津电话线路当时是不多的，因此电话局时间掌握得很严，三分钟一次逼得说话的人简单明快，听电话的人耳手并用。难在边听边写，一般是用文言文。有的编辑一边接电话便一张一张地发稿

^① 冷观：《敬告读者》，载《大公报》，1917-10-12。

子，这时往往是要闻版责任编辑亲自接电话了，因为时间不允许练习编辑接完整理再文稿发排，而是要随接随排。京津电话费是很贵的，拖一点时间就是浪费一笔钱的！”^①这里讲的虽然是《益世报》的情况，但应也同样适用于《大公报》。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电话是传播新闻稿件的主要通讯手段，并且口头传播作为文字传播的一种辅助手段应用于报纸编辑的日常工作。

印刷设施的情况如何呢？“《益世报》的机器设备，在二十年代，可说是天津最先进的。当时天津各报使用的都是十六页平版机，虽然有的报社也打纸版（用刷子手工打版），浇铸铅版，但其印刷速度每架机器每小时也不过千余份。《益世报》已使用平版印刷机，自动裁叠，速度非一般平版机可以相比……后来《大公报》有了轮转机，印刷质量高《益世报》一头。”^②这段记载说明，在新记《大公报》添置高速轮转机之前，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用的是一般平版印刷机，在天津报业中不算先进。

三、报馆的经营

（一）发行与经营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发行量的最高记录，是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由于报道中肯准确，口碑提高，“从三千增至逾万”^③。但多数时候发行量不高，只有几百份。最后落到只有十几份，贴贴报牌，或送人，没有读者愿意订阅。这当中除了政府禁止寄递的限制，也有自身经营不善的原因。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一度经营比较积极，常常加刊出附张。比如1919年5月7日出“大公报特别附张”。但是报纸的篇幅变动频繁，不景气时，就有所编减，情况好转就增加。由篇幅可以看出

^① 吴云心：《一九三〇年前编报杂忆》，载《新闻史料》，第7辑，87、88页。

^② 董效舒、吴云心：《七七前夕的天津〈益世报〉》，载《新闻史料》，第2卷，66页。

^③ 《大公报小故事》，114页，香港大公报。

报馆经营的情况。

1919年5月20日,《大公报》在第一张上刊出《本报扩充篇幅通告》:“本报前因纸价飞涨,不堪赔累,暂行减出半张。新闻统排五号,内容虽未缺少,而篇幅减缩,同人等终抱歉憾。现纸价稍平,告白又极拥挤,新闻稿件每苦纸短文长,勉强割弃,殊为可惜。兹准自五月二十一日起,恢复三大张原状,将‘本省要闻’‘本埠琐纪’移入第三张。报费仍旧并不增加。藉以飨爱读本报诸君之雅望。特先布告,幸注意焉。”(标点为笔者所加)

一大张等于4个版,少出半张等于少出2个版。三大张是12个版,而缩减篇幅时的两张半相当于10个版。1919年的《大公报》看来还比较有朝气,一旦经济状况好转,就恢复到三大张。事实上,1919年至1920年间基本都是三大张12个版。但后来经营情况日益衰落,王郅隆逃亡之后,王家家道衰落,政治上的靠山安福系也失败了,没人拨款给报馆,所以报纸资金紧张,经营乏力。1924年到1925年停刊前夕,由于紧缩成本,已经只有固定的两大张,即仅仅8个版。

数年中,《大公报》版面一再缩减,可见经营不景气。但报价在九年间变动不大,1919年零售价为每份铜元四枚,订价本埠每月大洋七角,1924年零售价为铜元六枚,1925年订价为本埠每月大洋八角。

可以把《大公报》的报价与《益世报》的进行对比:1916年《益世报》是零售铜子三枚半,12个版;1919年价格和版数依旧。同在1919年,《大公报》零售价四枚,略高于《益世报》。两报篇幅相同,版面、格局、新闻内容分布颇为类似,都以外交、政局、学生运动为主要报道内容。《益世报》的社论观点更鲜明,胜过《大公报》,但外交报道靠译电,不如胡政之的亲自采访报道。

1925年两报差距拉大,《益世报》进步明显,版面扩增到四大张16个版,零售每份仅为大洋四分。而此时《大公报》仅有8个版,报价却高于前者。

这与两报受到的待遇不同有关。1925年《益世报》上标注着:

“中华民国邮务总局特准挂号立券之邮件”及“中华民国邮务总局特准挂号按照总包特别优益寄送之邮件”的字样。《大公报》上则没有这种字样。后台倒掉后，当局剥夺了《大公报》作为邮件在邮局系统发行的权利，禁止它寄递。这两家报纸，昔日是竞争对手，你追我赶，到了1925年，命运迥异，一个蒸蒸日上，一个日薄西山，已经谈不上竞争了。

像上海的《申报》兼营画刊、印书等业务一样，《大公报》也有“副业”。首先是专设售书处经销图书。1916年10月1日在头版刊发《本馆通告》，说“现今秋季开学在即，敝馆特运到各级学校应用之书籍”，从历史地理到算术水彩，一应俱全，还有学生常用的字典、政治法律书籍等，均以优惠价出售。1925年7月1日的第三版刊登了《本馆寄售刊物启事》：“最后之良心内容丰富名人著作铜版非常美观出书无多购者从速每本售大洋二角”。7月16日又在第三版上刊登《本馆寄售》启事，推销“重返故乡战功合编特刊”。除此之外，当月还连续刊登“本馆寄售”新印《红楼梦》的启事，以及由《大公报》代理发行的一种新杂志的广告。可见，《大公报》馆代销的书刊种类还不少。

还有一种重要的业务是代印业务，即代社会印刷书刊出版物。天津报馆素有印书的传统。“从发展上来说，这应该是一种过渡形式，即专业出版社尚未独立存在之前，图书出版暂时附属于报馆这一母体，即便有时不得不在组织机构上附加一个‘出版部’的名义。在天津，报馆印书始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主要出版力量，由此也足以说明专业出版社力量的薄弱。出书最多的是大公报馆。”^①30年代是天津报馆印刷出版书籍格外活跃的时期，但印书并非自30年代始，20年代《大公报》已经有此项业务。出书庞杂，有小说，有诗词，有时事读物，并无一定宗旨。着眼点主要是集约利用报馆资源，不使印刷机器闲置，尽量创造一点经济效益。

^① 杨大辛、张守谦：《天津出版史概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22页。

《大公报》停刊前曾经长期刊登《本馆营业部广告》：“本馆专印各种期刊杂志、华洋书籍、支票、股票、仿单、银行账簿、学校讲义、中外名片以及五彩石印等件，均能定期交活，决不误事，至于工作精良，价值公道过（各）种的好处很多，凡已印种（过）活件的无不称许。倘蒙赐顾，请驾临敝馆接洽，无任欢迎。”^①可为有代印业务之证明。

尽管《大公报》的业务项目丰富，但能否赚钱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拿当时天津一个只存在了仅仅四年半的报纸《新民意报》作个参照物。《新民意报》努力扩大业务范围，竭力想使报馆经济宽裕，它代印书刊杂志，出版剧本，甚至还开办了一个新教育书社，专门编辑出版给小学生看的通俗小册子等等。最初营业兴旺，后来“资本周转不灵，开支过大”，渐渐衰落，不但不赚钱，反倒成了报馆的负担。^②从民国时期报业的普遍情况看，有读者捧场不是成功的惟一因素，经营有方也不是惟一因素，资本是否雄厚却是十分关键的。像《新民意报》创刊时只有本金500元，后来陆续筹集了5000元，才能自己印报，资金相当困窘，根本无法维持报馆庞大的开支。后来的新记《大公报》人很明白这个道理：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敢独立办报，不依赖任何人。

（二）广告业务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广告收入怎样呢？虽然它的篇幅中有一半是广告，不过可以肯定广告并没有给它带来十分丰厚的收入。北方工商业不发达，多数报纸依靠政治“津贴”生存。广告收入十分菲薄，不足以支撑一家报纸走上独立的道路。这一点不像上海的报纸一样，可以依靠广告获得丰厚收入。天津在20年代初的经济规模远远不如上海，比武汉、广州也弱得多。

天津20年代有些广告社，承办各报广告，不论大小广告，均可代办，手续也简单。在20年代的《益世报》上常可以见到广告

^① 《大公报》，1925-11-08。

^② 参见刘嘉猷：《回忆〈新民意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46页。

社招徕生意的广告。^① 据记载,《大公报》的广告也与当时新兴的广告社有密切关系,是由广告社承办的。天津《新民意报》的广告部主任李散人,熟悉广告业务,后来进入《益世报》和《大公报》,承包了两版广告业务,不久成立了天津第一家广告社——新中国广告社。^②

由于《大公报》投资人的背景与银行业关系密切,所以在它还有后台的阶段,银行广告特别多。后来衰落了,但银行广告也有一些。因为银行业在当时是财力最雄厚的行业之一,愿意做广告。

《大公报》曾经采用过附送单页广告的方式。1919年5月5日,报上登出这样的内容:“今日本报在京津随报附送同仁医院传单一纸。如无,请向送报人索取。”

1916年10月《益世报》的广告,从第1版到第12版,主要是医药、补药、盐、酒、书籍、煤油等商品的广告,也有天津电话局、保险公司、铁路局的公告,但绝少见银行广告(偶尔也有两则,比如登过中南银行的广告),这与同时期的《大公报》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大公报》连篇累牍刊登各银行的广告。

到了1925年11月,两报广告已没有这种明显的差异,《益世报》也登了不少银行广告。同时《益世报》所登载的广告,有一些还是《大公报》上没有的,如“百龄机”(一种上海产补品)。补品、药品是当时的广告大户,喜欢在广告费上投入。这些上海的广告大户不在《大公报》上做广告,却在《益世报》上大做广告,不外乎两个可能:一是《益世报》的销量比《大公报》多;二是《益世报》的广告业务工作比《大公报》出色。

《大公报》当时的广告设计水准一般。多数广告单纯用文字表现,有些是文字与图画的组合,但是还没有开始使用照片。由于广告画笔致粗糙,所以不甚美观。但这种情况并非《大公报》一家如此,而是20年代中国报纸普遍存在的情况。中国报纸的广告水平

① 参见邹伟:《解放前天津市新闻事业发展概要》,载《新闻史料》,第29辑,32页。

② 参见刘嘉猷:《回忆〈新民意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47页。

提高是在30年代，广告画变得细致秀丽，广告文字也懂得突出广告口号了。^① 广告设计的发展是与经济的繁荣、消费者的成熟密不可分的。显然，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广告还处在比较不发达的阶段。

四、人事更迭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总编辑，首任是最有名的胡政之（1916年至1920年主持馆务），其后是雷行、翁慎之。胡政之的继任者们才干不及他，声名也并不显赫，因而事迹在文献中难以查考。要想让《大公报》的这段历史链条清晰起来，只能在报纸上寻觅他们的作为。

巴黎和会期间，胡政之身在外国。他离开中国时间颇久，远在他乡，只能通过电报与国内联系，要遥控指挥报馆业务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段期间谁主持大公报呢？主持报务的有可能是一个笔名“斐”的人，因为这一时期他的时评经常发在显要位置上，而这个位置是以前胡政之写“冷观小语”的地方。旧中国的报馆总编辑即报馆主笔，主持编务的同时，还是报馆一枝笔，天天写社评的角色基本由主笔担任。按这个道理推演，“斐”应就是《大公报》的代理总编辑。

1920年胡政之离开《大公报》，由雷行继任。

1922年至1925年，直到《大公报》停刊，可能是翁湛之主持馆务。此人观点陈腐，反俄反共。翁湛之曾经发表一篇社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他这样写到：“自俄罗斯神圣不可侵犯之‘沙’失位以后，过激派邪说横行，虚无党与社会党，级啾叫嚣，恣肆无忌，而昔日横绝欧亚为列国所畏惮之俄罗斯，遂分崩离析，糜烂至于不可收拾。全国人民，胥不能安其居而乐其业。”^②

《大公报》临停刊前的1925年11月24日，在第3版上发表了一则《翁湛之启事》：“鄙人自欧游归后，因各务纠纷，对于馆事殊

^① 参见陈彤旭：《出奇制胜——旧中国的民间报业经营》，159、16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② 湛之：《对待俄侨问题》，载《大公报》，1922-10-02。

有难以兼顾之势，诚恐精神不及，或有贻误。兹特郑重声明凡关馆中各事，不经鄙人画押盖章者概不承认负责，特此声明。”这粗体浓黑大字的声明语气严肃，两日后《大公报》就停刊了。从语气看，《大公报》后来不但不景气，内部也有矛盾，以至于总编辑要在报上做这种声明。

天津各报馆之间存在着人才流动的现象。1916年《益世报》的社评作者为“梦幻”，即唐梦幻，任《益世报》主笔，而他原来是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主笔。^①《大公报》的广告部负责人李敬人，原为《新民意报》和《益世报》工作。^②

关于人员规模和结构，《大公报》设置有“法律顾问”。1925年7月17日起刊登《本社启事》：“本社聘任律师李景光在司法界执行推事检察官职务多年事务所京东城马大人胡同二十七号津寓日租界德义楼饭店六号”。看来，这个法律顾问是工作于京津两地的。

关于薪酬和福利制度，虽然无直接证据可以查考，估计薪水是不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新记《大公报》成立时，胡政之留任了许多前一时期《大公报》的老职工。不过留任的很可能是技术工人，如排版、印刷工，因为当时工人薪水低，很不好找。而新记《大公报》的著名编辑记者很少是王郅隆时代的老员工，多是1926年后培养起来的，或来自《国闻周报》。恐怕在王郅隆及其家族主持《大公报》的这一段时期，能干的记者、编辑人才早流失殆尽。王佩芝或许是个例外，有文献提到他是胡政之的业务助手，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经理，从英敛之时代开始就为《大公报》工作了。^③

五、最后的衰落及停刊

《大公报》在1925年时已经业务衰落。与同在天津的其他报纸

^① 参见姚福申、史和、叶翠娟：《晚清天津报刊录》，载《新闻史料》，第2辑，62页。

^② 参见刘嘉俊：《回忆（新民意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47页。

^③ 参见陈纪莲：《忆胡政之》，见王通、胡政编：《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159页。

比较，差距十分明显。《益世报》在1925年11月至12月间，是16个版，四大张，还不断发出征稿启事，征求新闻报道和质量高的小说，呈蒸蒸日上之势，与萎靡的《大公报》形成鲜明对比。

1925年冬天，安福系要人已彻底失势，曾经资助过《大公报》的李思浩等都已经下台。《大公报》此时版面单薄，没有生气。而《益世报》却在这时局紧张的时候，积极报道新闻。当时《益世报》的优点在于要闻突出，围绕当时读者最关心的战争局势，报道量大，版面处理集中。与《大公报》当时版面上充斥的各类“通电”相比，《益世报》的报道及言论透彻痛快，《大公报》却是不痛不痒。比较起来，高下立现。

以是年11月25日为例，《益世报》的新闻版上集聚15条消息，统在“要闻”栏目的一个大标题《时局严重中之各方军讯》之下，按顺序从右至左，版面竖排——（1）《张宗昌决不抛弃山东》；（2）《宋大需旅将调往徐州》；（3）《晋军已与国民军合作》；（4）《奉张严电攻击冯玉祥》；（5）《张培荣已被褚部扣留》；（6）《奉方又运地雷赴马厂》；等等。^①而同日，《大公报》的新闻版，只有一些电稿和政府命令等。

在王记《大公报》停刊前后，《益世报》的表现是耐人寻味的。11月28日11版刊登了《安福要人纷纷来津》：“此次大局变化，现政府已无可维持，冯玉祥已将卖国祸首安福系政学系列名通缉者二十余人，除曾毓隽已被捕获外，其余各祸首，亦在被拿之列，以致安福要人，大为恐慌，纷纷向天津逃避，其重要卖国祸首，恐欲逃而不可得，势难漏网云。”

11月29日第10版发表时评《冰山倒矣》（作者“寒蝉”），写道：“易国以来，政局靡定，甲乙代兴，前仆后继，中央则等于虚设。强藩则跋扈专恣，凡登内阁之台，均为军阀背影，每一军阀势败，则政局亦必临之改组。十四年来，固无时无日，不在此循环报复中也。夙称智囊，号称安福首领，交道系者，一次奉直之战，即

^① 参见《益世报》，1925-11-25。

为彼辈而起，迨至去岁战役，彼辈乘机活跃，分据要津，或掌交通，或掌财政，日惟迎合军阀之意旨，保全一己之禄位，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曾几何时，彼辈所恃军阀，萧墙祸起，众叛亲离，消息传来，动心惊魄，是不得不急流勇退矣。政局起伏，如转环然，已往之冰山，今已倒矣，未来之冰山又安足恃，世之不图自立，惟以他人势力消长为转移者，亦可以休矣。”

这篇时评指出了《大公报》结局的警示意义：不图自立，惟以他人势力消长为转移者，可以休矣！报纸往往依附于政客军阀，但所恃军阀，看似强大，其实不过冰山而已，安能长久依靠？后来的新记《大公报》正是吸取了这样的教训，从而提出“四不方针”。

《益世报》在12月1日第10版又发表《日租界保护界内要人》：“自时局变化后，各派失意政客官僚，纷纷潜逃来津。匿居各国租界，现日租界当局，特派员多人，调查界内各旅馆栈房，凡有政界要人，在界内居住者，均加以特别保护云。”12月1日第13版在副刊的“谐文”栏目发表《安福派属于福者致属于安者书》（作者“侠魂”）：“属于安者诸公均鉴。吾等本系一家。今竟分为两院，亦如查店之循环簿，本无分拆之理，而循环簿偏各抱一支也。虽然，吾等之老巢，因地命名，称为安福俱乐部。俱乐者，同乐也，顾名思义，实恐苦乐之不均。盖公等固欲求安，我辈亦思享福，安于泰山。公等固常殷祷告，福如东海，我辈亦不断祈求……”这篇文章假托安福系中人的口吻，语含讥讽，讽刺曾经如日中天的安福系落得既不“安”又不“福”的下场。

在这段时间里，《益世报》多次报道报界的一些新闻，但从未直接报道《大公报》停刊的内幕。11月30日第3版发表《北京报馆之厄运》，报道晨报馆被烧，黄报、社会报馆被查封的事件。12月1日发表《晨报馆被焚详志》，对北京晨报馆被烧一事详细报道，而对同处一地的《大公报》停刊始终没有做正面报道，只有含蓄的评论。也许是两家昔日为竞争对手的报馆关系微妙的缘故。

《大公报》停刊，确有其自身业务衰落的原因。看《大公报》1925年11月的文章，感觉语气陈腐，与时代脱节。11月23日第

6版上，有署名“孔宝骥”的《旅行吉林方面琐记》，与胡政之当年的同类文章水准相差甚远。11月23日第5版刊登新闻《严禁谣言之布告》、《李督办宽恕煽惑犯》，第4版刊登《苏俄诱唐努图屏之诡计》等，从标题就可看出谄媚政府、反共反俄的倾向。

停刊是年，由奉系军阀李景林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此人“横征暴敛，民怨沸腾”^①。曾与冯玉祥订约合作，后又背约，激怒了冯。1925年11月，冯玉祥进军天津，11月底正是冯李之战最激烈之际，《大公报》就在这纷繁的战乱中停刊。12月，李景林被冯部驱逐出天津。

《益世报》在1925年11月27日第6版发表题为《时局前途》（作者“慎之”）的“时评”，写道：“时局前途，甚难揣测，飘忽不定，不可捉摸。离奇之事变，随处皆可发生，所为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足论，昔人之诗，早已言之，分合无定，原不足怪。相几风从，一若故为。”这篇时评语气沧桑，应是人们对变换莫定之时局的共同感慨。在这样的时势里，一家报纸的命运如同惊涛里的小舟，被卷入浪中也没什么奇怪的了。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节 王邦隆时期《大公报》 的新闻业务

一、新闻报道业务的成就与偏差

（一）杰出记者胡政之

胡政之，名霖，字政之，笔名冷观，四川人，生于1889年。^②少年时期跟随父亲游宦安徽，先是读私塾，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后入安徽省高等学堂，接触了近代西方社会思潮以及先进的自

^① 周佛尘：《我和《华北新闻》》，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63页。

^② 参见吴廷俊：《〈大公报史〉史实考订》，载《新闻春秋》，42页，1994-02。

然科学观。17岁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专业。^①1911年回国，先是在几所大学教书，1912年起担任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日文翻译。后来又从事本行，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1913年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1915年任吉林巡按使王揖唐的秘书长，从此进入政界，也为日后进入《大公报》和去巴黎采访打下伏笔。王揖唐是安福系一员，所以举荐胡去《大公报》，去巴黎和会的采访经费也是王提供的。1916年王调任内务总长，胡担任内务部参事。这一年，王郅隆购进《大公报》，经人举荐，请做过报纸总编辑又与安福系有关系的胡政之担任报馆经理兼总编辑。^②王揖唐是安福系的骨干，胡政之与皖系人物多有接触，但他并不是安福系的成员。胡政之的父亲曾在安徽做官，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结识了皖籍的政界人物。^③

胡政之的经历很丰富，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在政界和报界都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后来他对政治失望，不愿沉浮宦海，所以投身报界，认真地做起了报人。1916年至1920年，胡政之在《大公报》任总编辑的几年，是《大公报》王郅隆时期最兴旺的几年，新闻报道和评论均受到社会的欢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因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胡政之亲往采访。然后又去英国、德国、瑞士诸国考察政治经济一年之久，收获颇多。虽然这次报道非常出色，但总编辑长期不在国内，对报馆业务无从顾及。1920年他结束欧洲之行回国，本想重振旗鼓，对《大公报》进行一番改革，但改革的檄文刚发出去一个月，“直皖战争”爆发，后台安福系落了下风，老板王郅隆被通缉，他作为总编辑也不得不辞去职务。

离开天津，胡加入北京的《新社会报》，与著名报人林白水共

^① 参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64、6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② 参见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15页。

^③ 参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66页。

事，不久因意见不合离开。1922年，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之民营通信社”^①。随即创办《国闻周报》。

和后来创办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情况不一样，王郅隆时期的胡政之虽然一度总揽全局，但主要从事的是记者工作，经常外出旅行采访写报道，是中国最早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也是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很能打动人的一枝笔杆，所写的评论简明清晰，这些才干在他人生的后期由于报馆的分工不同，几乎被人忽略了。但是，这些作为记者的才华，以及作为总编辑的运筹帷幄能力，其实是在1916年就显现出来了。

胡政之离开王郅隆办的《大公报》后，曾担任《国闻周报》的总编辑。《国闻周报》是杂志，并非报纸，从形式到内容都与《大公报》不同，但是依然能从中看出胡政之一贯的编辑思想：一是重新闻，《国闻周报》有一个栏目“一周间国内外大事纪”；二是重视国际时事报道；三是重独家采访。《国闻周报》在第三卷第六期（1926年2月7日）的第10页上发表预告：“本报记者政之君近自北京旅行汉口、南京、上海、大连、奉天、天津等处考察政治情况，拟就观察所及，以通信体裁详细记载，夹叙夹议，即在下期本报发表。”可见他长期从事一线新闻采访，是个勤奋工作的报人，从不远离实践。

有人认为，胡政之的一生追求，可以用“法治”与“民主”二词尽之。^②这种进步的积极思想，不但在后来的新记《大公报》的“四不主义”中体现出来，在1916年至1920年间的《大公报》采访报道中也有体现。

（二）重大事件报道

胡政之主持《大公报》馆务后不久，在1917年1月3日的元旦寄语《本报之新希望》中，集中阐述了他对于新闻报道的要求与理想：“本报之历史，一奋斗之历史也。不慧主斯报方三阅月，窃

^①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4页。

^② 参见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5页。

不自量其绵薄，欲举吾报奋斗之历史而光大之，以应时世之潮流，以求长足之进步。”“顾吾以为新闻事业之天职有二，一在报道真确公正之新闻，一在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而二者相较，前者尤重。盖新闻不真确、不公正，则稳健切实之舆论无所根据也。吾国政治席专制之余毒，好以诡秘相尚，而政治无一定轨道，虽极推理作用亦往往不能与实际相合，新闻家探访新闻，因是乃大窘苦，而恶德之新闻记者乃不得不出于伪造之一途。”他批评当时一些记者不深入采访，随意胡编乱造的恶劣作风，指出“新闻者，天下之公器，非记者一二人所可私，亦非一党一派所得而私。不慧自入报界，以不攻击私德不偏袒一党，自誓更不愿以过激之言词欺世而盗名。故本报向来报道多而主张少，今后亦当如此，盖记者之愚以为今日新闻界非先从改良新闻记事、博得社会信用入手，不足以言发表言论。即发表言论，亦不足以言铸造舆论也。要之，本报之新希望在乘其奋斗之精神，益益改良新闻记事，以为铸造健全舆论之基础。”他在接手《大公报》之初，就提出以“改良新闻记事”为基础，可见其对采访报道的重视。

五四运动前后，天津先后办起了十几家通讯社：平民通讯社、世界通讯社等等……有的机构充实，设备齐全，有的机构简单，设备也简陋。^①通讯社稿件是《大公报》的稿源之一，但是这种稿件质量参差不齐，真正使一家报纸形成自己特色的还是独家报道。胡政之开始担任总编辑之后，要求记者亲自去新闻发生的现场采访，反对东抄西抄、转载其他报纸的新闻。

《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包括本地、全国以及国际题材的报道。对天津本地新闻事件的报道，是《大公报》的重要方面。1917年天津水灾期间，《大公报》用大量篇幅报道有关灾情及社会各界救灾赈灾的情况，几乎无日不报道，还向社会各界征集水灾报告。^②

1916年，法国人想扩大租界，强占属于中国的老西开，遭到

^① 参见邹仆：《解放前天津市新闻事业发展概要》，载《新闻史料》，第29辑，32页。

^② 参见《大水灾之要闻丛志》，载《大公报》，1917-09-02。

天津人民的极力反对。这就是天津著名的“老西开”事件，此事被《大公报》连日重点报道，胡政之还曾写过一篇《关于老西开交涉之研究》，强调老西开是中国的领土。《大公报》的这组报道与评论具有爱国的积极意义。

五四运动是1919年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对此，《大公报》是如何进行报道的呢？从报纸版面看，5月初的几天，未直接报道学生活动，但用大量篇幅报道国际时事。5月7日，出“大公报特别附张”，以有别于平日大字号登出的“东方通信社电报”、“特约路透社”、“紧要纪事”等等。这里要注意的是，东方通信社是日本人办的通讯社，路透社是英国的通讯社，刊登这些电稿，虽然从数量上看很丰富，但反映的是外国人的观点，不能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看新闻。

要考察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益世报》是个很重要的对比物。作为《大公报》的主要竞争对手，《益世报》在天津影响深远，从舆论影响力、销路、人才力量、印刷设施等各个方面相比，都有可比性。

关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报道，《大公报》可以与《益世报》做个比较。《益世报》于1919年5月5日（2版）即“五四”的次日，在最醒目的位置——版面下方四分之一位置，刊登了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主标题为《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用大号字体突出，下列数个副标题，“学生三千余人”、“高举白旗”、“与卖国贼拼命”、“打倒章宗祥败类”、“焚毁曹汝霖住宅”，正文为：“昨日下午四钟，接北京电话云，北京学界因青岛问题失败，非常愤恨，由北京大学发起，召集各高等专门学校学生，有谢君当场破指大书曰“还我青岛”四字，演说均极沉痛……（此处用大号黑体字，浓墨重彩）”这篇报道长约八百余字，有细节，生动可读。关于学生齐集操场，在旗帜上写字等等的动作、言语描摹细腻，如“一生以砖头击章首，血流被面”。《益世报》的这篇报道不但可读性强，而且反映现实及时，时效性强。

《益世报》在5月8日第2版又刊登一组关于学生活动的新闻，

计8条。虽然只占版面的四分之一，但其余版面多是广告，所以新闻的位置是相当突出的。这8条新闻从右至左标题依次为：《学生出狱之欢迎》、《总统无谓之防患》、《章宗祥死多活少》、《外交协会之被阻》、《拼命开会之情形》、《口人汉奸之刺探》、《天津各方之电争》、《上海开会之响应》。这些报道都有热情、鲜明的态度。

其中《拼命开会之情形》报道如下：“夜十钟又接北京电话云，中央公园因军警密布，不容开会。各界均集于天安门前，人数至不可数，警察极力驱逐，后剩二百余人，皆坐树下，警察仍驱之。此二百余人同声呼曰：汝等纵将我辈打死，亦不离开一步。警察亦无如何，于是此二百余人遂在天安门前开会演说。人民远远围观，为警察拦阻，不得前进，然四围人数约计不下十万人。亦可见北京人民有拼命爱国之气象，其程度甚可钦佩也。”（这段为大号黑体字，以示突出）

《益世报》不但报道集中，而且言论态度鲜明。1919年6月1日发表《时评》（6版，作者“悲时”）：“此次学生罢课风潮，不旬日几遍全国。而究其所以，无非痛外交之失败，挽国家于将亡。期惩国贼，唤醒同胞而已。惟此种罢课举动，若在畴昔无事之时，为之校长者，自应担负完全责任，若此次发生之事，纯系学生等激于爱国热诚，且非一校或一部分一省为然，则为之校长者既不可以强力压制，自无获罪之可言。又何必从中破坏，为讨好上峰地耶。乃日昨本馆接到负责任之签字函件，内云某某两校长（姑隐其名），竟欲破坏学生团体，诚不知其心肝何若。岂亡国之后，该校长独可幸免耶？寄语某校长，速即痛改前非，或可保全名誉，不然者恐将与卖国贼三字作一例书也。况我国一线生机，仅系诸民气，而民气之中，又以莘莘学子为尤盛。稍有心肝者，视此英气勃勃之少年，莫不敬之爱之怜悯之不暇，又何忍出此卑鄙险恶之手段，以致激起众怒哉？寄语某校长，可以休矣！”

这篇时评极热情地支持学生，批评反对学生运动的校长。难怪这一时期的《益世报》受到周恩来的赞赏。《大公报》对五四运动也有一些报道，5月5日即在头版发表《北京学界之大举动》，基

本客观地报道了事件经过。态度并非不支持，但比较一下报道的篇幅以及语气，就可看出的确不如《益世报》有激情。《大公报》虽然承认学生的行为是爱国的，但站在当局的立场，反对暴力行为，如1919年5月6日的一则报道这样写道：“政府方面，对于学生行动既闹出如此惊天动地事件，虽鉴于各学生爱国之忧，然暴动行为则所不许。昨日午后，大总统会邀教育傅总长交通曹总长等在集灵囿会议办法。”其时正是皖系政府当政，《大公报》当然要站在政府的角度说话，不免就令学生失望了。

总之，20年代前后，各报常常报道的都是一些相同的题材，如南北时局的变化、外交大事等等。各家报纸的独家新闻是不多的，可以较量的是报道质量和处理方法。

《大公报》虽然在学生运动的报道上热情不高，但有些方面却积极性很高，水平也出色。比如国际新闻以及旅游通讯，胡政之的东北游记和欧洲游记都相当不错。旅游通讯这种体裁在当时颇为流行，《益世报》登过《南游日记》，其他报也登过一些游记式报道，但胡政之的报道确是当时水平最高的之一。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虽然总体来说逊于后来的新记《大公报》，但有几次出色的报道，值得在新闻史上留下一笔。最出色的就是对巴黎和会的报道，还有对张勋复辟事件的报道，以及胡政之对东北（北满）的系列报道。

1917年张勋复辟时，安福系的首领段祺瑞讨伐之，《大公报》为段张目，此时的宣传“有声有色”^①，胡政之自己回忆说：“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纪事，翕合人心，销路大涨，一时有辛亥年上海民立报之目。”^②

随后有旅游通讯体裁的东北系列报道。1918年9月中旬，《大公报》连续发表《本报特告》：“德势东侵，联军西发，中日军约实行，北海风云方急，本报关于此等消息记载向极周详。惟国际关系

① 王芸生、谷冰：《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15页。

② 胡政之：《回首三十七年》，载《大公报》（上海版），1945-04-15。

至为复杂，军事情态尤多变化，事实真相不易明了，本报记者胡冷观君有鉴于此，特于12日出发，为北满之游，将以该方面各种情形，举其调查所得，通缄本报，告之国人，特此广告，请留心时事者拭目俟之可也。本报启。”这就是关于胡政之要赴“北满”（东北）采访的通告，这是巴黎和会前胡政之一次成功的采访。何以有东北之游？一是东北具有重要的军事政治意义；二是胡在吉林做过官，对当地情况有所了解。9月17日，即登出《旅游漫记》之一《汽车之客》，胡政之写道，他出行目的就是要研究日本对于中国“是祸是福”的问题。因报馆职务“天便久旷”，所以只能做短期旅行采访，但总胜过“闭户空谈”。次日登出之二《奉天至吉林》，写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胡注意到在东北的铁路日本人和俄国人都很多，但日本人多乘头等车厢，暗示着日本在东北势力日渐壮大。胡政之还考察了南满铁路的运营情况，采访了一些政治人物，甚至在9月22日访问了日本军总司令部。从下列几则报道的标题即可见他访问对象之广泛：《中东路之过去与现在》（发表于9月22日）、《西伯利亚政府首领之访问》（发表于9月23日）、《捷克军总司令部之访问》（发表于10月4日）、《领船与军舰》（发表于10月6日）。

从9月17日至10月14日，《大公报》共刊载胡政之的东北系列报道十六篇，每篇至少在五六百字左右。通过实地采访，胡政之对东北局势得出了自己的认识。他的旅游通讯描摹生动，有自己的亲身见闻，有与大人物的对话。不论大事小事，均言之有物，绝无空洞的感慨和无谓的形容。由文章可见其人的务实作风，也体现了现代记者客观求实的职业精神。

（三）国际报道 —— 有关巴黎和会的系列报道

英国最大的通讯社——路透社从近代起在中国的大城市里设有多个分支机构，提供中英文稿件。路透社天津分社就设在《京津泰晤士报》的楼里。^①路透社的电稿除售给各报馆外，还自行出版。

① 参见涂培元：《集少豪与〈京津泰晤士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2-6页。

供私人订阅。为保证这项业务的收费，路透社要求凡是订阅它电稿的报馆，不得与路透社同日刊出，必须“隔日”。如果违反此项规定，或在电稿上不注路透社之名，该通讯社就会“停止送报”^①。购买路透社等国外电讯是要有所开支的，所以当时天津一些经费不充裕的报纸不订购路透社的电讯，而是自己翻译外国报纸上的要闻。^②不管是购买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还是自己翻译，都非亲自采访，等于用外国记者的眼睛看世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的遗憾。当时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中国报纸独立采访国际新闻的重要性，胡政之更是亲力亲为，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欧洲采访之旅。

巴黎和会召开后，引起国内的极大关注。知识青年反应强烈，“五四”运动即是以此为契机。胡政之赴和会采访，大量报道登在《大公报》上的“巴黎特约通信”以及“巴黎专电”栏目。这是胡政之作为记者的代表作，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这次采访的来由，据毛芸生、曹谷冰的《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③所述，胡政之是在1918年欧洲大战结束后，得到王揖唐的资助，代表大公报采访了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是巴黎和会中惟一的中国记者。巴黎和会后，他继续留欧，游历诸国，于1920年回国。

这个资助胡的王揖唐是什么人呢？他是胡政之的老上司。王揖唐1915年任吉林巡按使时，胡为秘书长；1916年王调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胡又任内务部参事，胡由此与安福系有了关系。就在1916年，王揖唐接手《大公报》，胡政之成为经理兼总编辑。^④而王揖唐正是巴黎和会的总代表^⑤，所以胡政之才能以他的关系去采访和会。

胡政之关于巴黎和会的这组报道很有名，既有短而快捷的“巴黎专电”，又有长篇而细腻的“巴黎特约通信”，两种体裁各有所长。

① 《本报敬覆路透电报公司》，载《大公报》，1918-10-09。

② 参见刘真毅：《回忆〈新民意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37页。

③④ 参见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15页。

⑤ 参见《大公报一百年（上）》，219页，香港，香港大公报出版有限公司，2002。

“巴黎专电”长处在于具备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即很职业，言简意赅，客观，通过连续不断的消息（每则一般在八九十字左右），报道巴黎和会的进展。如果按新闻报道的时效性要求来衡量，胡的这些报道还算不上及时，因为从国外发回来，一般需要少则四天多则六天的时间，有时消息到了国内，已是明日黄花。当时《大公报》上刊载“特约路透电”，还有“北京特约通信”，路透社的消息常常比胡的报道快，而且从北京来的消息多有外交使团发给国内政府的电报，应该说三者都是电报的途径，为什么胡的要慢一些呢？这有几种可能：一是胡以民间报纸记者的身份出国，发电报没有什么特权，所以要慢于政府代表团的电报，也比路透社这种国际著名通讯社机构的电报要慢；另外就是胡的经费有限，选择的发报方式是慢一些的。

既然外国通讯社和国内的一些消息渠道都比胡的及时，那为什么人们对胡的报道评价如此之高呢？路透社的视角是外国的视角，不能体现中国人关心的东西；而从北京来的政府内部消息毕竟不是记者的报道。

关于路透社的电报，有文献可以证明其存在不客观不公正的弊端。1919年吴梯青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主管无线电信工作，1924年12月起任天津电话局局长。^①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到：“当时有关和会的消息，要通过英国、丹麦设立的大东、大北水线和美国的太平洋水线传递，并由英国的路透社垄断发布。路透社因偏袒日本，往往擅自改动电文或故意延搁。我国当时因无远程无线电收音设备，以致任人操纵。”^②于是，我国交通部门在北京东便门外临时架设三公里长的天线一条，“指向巴黎，以备收听”，主要是收听世界各国电台所发布的有关和会的消息以及其他新闻。收到消息后，交由法商那世宝通讯社发布。

① 参见天津市档案馆编辑：《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114页。

② 吴梯青：《有关北洋时期电信事业的几件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147页。

正因为外国通讯社的不可靠，胡政之的“巴黎专电”显得尤其宝贵。让我们来看几篇稿件：

(1) 1919年4月18日专电，注明“本报记者胡冷观于本月十五日上午五点自巴黎发，十七日下午一点到”，全文90字，报道和会进展情况。

4月27日又发表一篇，但文后加的说明改为“本社胡政之君于本月二十五日上午四点自巴黎发，二十六日到”。以后每次发表专电时的说明都改称“本社胡政之君”，而不是“本报记者胡冷观”。

(2) 1919年5月7日发表专电：“德国属地声明抛弃已列着意二十八日英法美三国会议令日本国于得胶州湾后以各国公认之条件归还我国二十九日开会邀日本人到会未邀我国代表”。（发于4月29日）

(3) 1919年5月11日发表专电：“三国会议。昨英外部通知中国代表云，胶州湾案决定政治权由日本还中国，经济权移交日本国，青岛日本军队撤退，设日本国租界。铁路尚属用华人，政策官准。日本人干涉三日，以放弃人种问题为交换条件，英法极力助日本国。陆使已电达政府辞职，改正关税及撤驻兵政租界各案迄未提出，即使提出，亦难有济。二日。”（发于5月2日）

(4) 1919年5月15日发表专电。篇幅较平日为长，约542字。内容为5月10日中国代表为青岛问题发表的宣言，抗议列国拿中国的主权做交易，无异“弱肉强食”。（发于5月10日）

(5) 1919年5月20日发表专电：“……据顾公使云，草约规定胶州湾档案移交日本国，无异移交土地，断难照办，如果不能声明将该案留存另订，则应拒绝签字。”（略，全文80字，发于13日）

(6) 1919年5月24日发表专电：“十日和平会，招德国代表到会，交付和约。协约国以中国未实力参战，原议屏除我国代表列席。旋经顾维钧商请美国主持公道，始允许陆王两使出席。予闻顾使维钧有与曹汝霖提议缔婚之说。然据顾面告云，绝无是事。”（发

于5月16日)

(7) 1919年5月28日发表专电：“我国提议之二十一条各案，和平会拒绝不理，令将来自行提交较为得力。关于联盟案各款，据各专使对于签字意见亦不一致，惟现在已成五强国专制之局，恐难容我国抗拒。”（发于5月20日）

此后还有多则，不一一赘述。

这些专电客观报道了事态的进展，反映的是国内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记者本人心态的变化，一开始还对列强国抱着幻想，以为外国舆论会支持中国，会有外国帮中国主持公道，后来就越来越失望。从5月28日一直到6月9日，都无“巴黎专电”，6月10日《大公报》终于刊出胡的“巴黎专电”，只有极简短的38个字：“各专使议定和约签字惟德国答复后美国报纸载英国主持改轻法国仍坚持苛刻签字尚无期”（发于6月5日）。

胡政之发电报有时比较频繁，每天都发，有时隔许多天才发一封。从4月中旬到6月初，他共发回“巴黎专电”10篇，“巴黎特约通信”3篇。“通信”都篇幅颇长，连载多日，有4月21日开始发表的《平和会议之光景》，5月11日开始发表的《中国代表为青岛问题向平和会议提出之说帖》，以及5月17日开始发表的《外交人物之写真》。

6月上旬中断了一阵，月底才又恢复发电，但只发了几封即停止。7月3日的“专电”说：“法总理派外交总长劝我国代表无条件签字，美总统劝签字后再声明不满意，二十七日夜代表……”（6月28日发）大意是讲中国公使不愿迁就外国意愿，不肯签字。全文共80个字，五字从缺。这则电报后编辑注道：“此电用新十码拍发，辗转托人译出，其中不明之码只可从缺，以致文意不明了，殊为可惜。”这几日是形势最为紧张的，国人迫切想知道中国代表团到底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了没有，从本日的“巴黎专电”上得不到确切答案。而同日的“北京特约通信”栏目内却是一篇醒目的《欧约我国果未签字》，讲“陆征祥二十八两电已到”。可见，“巴黎专电”比“北京特约通信”慢，但有第一手材料，二者可互为补充。

6月28日正是和约最后签字的紧要关头，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的消息传回国内，民众才松了一口气。这则电报胡政之可能是在28日签字之前去拍发的，所以发报时还不知结果。而随后结果就出来了，国内报纸通过其他渠道获知了这个消息。胡政之是在下一则“巴黎专电”中详细报道了中国公使如何拒绝签字的经过，再登出来已经是7月5日了。

胡政之的专电从巴黎发到国内，最初的两篇很快，仅仅用了一两天就到了，但后来就费时颇多，少则4天，多则8天，平均都在6天左右。以致传播时效比“路透社专电”要慢，甚至比“北京特约通信”都慢。即使《大公报》每次在收到电报的次日就赶紧登出，也难弥补报道时效的滞后。也许胡政之最初找到了便捷迅速发报的方法，但后来因为什么原因，不得不改用更慢的方法。从胡在通信里对外交官员们的大胆批评里或许可以看到端倪：胡没有借外交官们的光发电报，《大公报》曾在“北京特约通信”里提到使团已经给北京发来电报，云云，而关于同一件事胡的消息几天后才到。

除了“巴黎专电”，胡政之还陆续发回“巴黎特约通信”，更充分地报道新闻事实真相，尽管要慢一些，但叙述更加详实细腻。因为通信篇幅长，所以经常是连载刊出。比如5月中旬就陆续几日刊出胡政之发回的《中国代表为青岛问题向平和会议提出之说帖》。

胡也有为数不多的人物通讯。1919年5月17日发表了《外交人物之写真》，副标题很生动：“五专使之人物评·两公使之俭德纪·顾维钧争席斗气·唐在礼妙语解纷·受刺激陆使辞职·走瑞士魏朱劝驾”。这是胡政之少见的纵论人物的写真报道。该通讯连载多日，下面仅引5月17日第一次登出的部分：

此次欧洲议和大会为世界空前之举，吾国因参战之故亦得与于末席。当此时机，实为外交人物大展抱负之会。我国政府所派五专使，固极一时外交人才之选，然陆征祥谦逊和平而拙于才断，王正廷悃悃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

理。以人物言，皆不能无言比。其活动之成绩，自亦无大可观。且和会纯由五强把持，二三等国家代表不但无由发挥意见、实行主张，即欲一探五强会议之内容，亦不可得。我国以三等国之资格，重以大势如此，虽有能者，亦难施展手腕，斯亦只好付之一叹而已。

此次和会英法美意日五国派代表五人，二等国之比利时巴西塞尔维亚派代表三人，中国则不过与葡萄牙希腊等国相等仅能出代表二人。以中国之地位言，本不应受如此待遇，然卒不能免于三等国之列者，实平时外交活动力太少之故。此则非今次所派各专使之咎，而数年来驻英驻法之公使不能无罪焉。方予在北京时，屡闻驻外各使馆之腐败，此次到欧躬自考查，始信所闻之不诬。即以驻法胡使维德言之，彼驻法五年余，平日以见外人为惧，丝毫不与外人交际，使馆除每年匡庆日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外，绝未宴请外人。彼既持如此态度，故外人亦鲜与往还。公使有事赴法国外部，大抵与寻常科员接洽，欲求见司长科长已非易事，总次长更不待论。至外部以外之其他官署或一般社会则更为隔绝，胡驻法数年，法国报界中人犹有不能举其名者，其闭关自守不与入接之程度可见。据彼曹个中人言，公使如此做法，每年可余十万法郎，驻英施使肇基亦同一做法，要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在彼等个人诚为得计，而国事之受害乃在于无形。譬如此次欧战，华工之为协约国助者不下十万人，何尝无功绩可言？西伯利亚乱事中国出兵海参崴，又保护中东路，何尝无所活动？以视日本，又岂无多少相同？乃日本之功绩，欧人人人承认之，独中国之事，则湮没无闻。不特此也，即平常关于中国之事，欧洲人亦茫然无知。此无他，驻外公使既与外人隔绝，则外人自无可解之机会也。今次之所以被列三等国者，此实一大原因。罪责所在，国民不可不知之也。^①

^① 载《大公报》，1919-05-17。

这篇通讯是上佳之作，语言流畅辛辣，人物栩栩如生，个性鲜明，尖锐地批评了外交官员之腐败无能，堪与黄远生之通讯媲美。黄远生之写外交部，还有隐约影射之嫌，而胡之通讯报道，采访深入，资料详实，更为可信，更有职业记者的客观精神。

在这篇人物报道里不客气地写到了顾维钧，当时他肯定没想到后来会与顾家结上亲戚。胡政之晚年丧偶，续娶顾维钧的侄女顾俊琦为妻，成了顾的侄女婿。^①

胡政之在巴黎和会之后周游欧洲，写了一些旅游通讯或者说是风貌通讯，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他对比比利时、瑞士等国的报道稿件，常常配有照片，有些是他与当地人士的合影，有的是当地风光。这种图文并茂的旅游通讯报道形式一定会令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

胡政之的欧洲通讯如同“巴黎专电”一样，格外关注与中国人有关的事务。在比利时，胡政之路遇一群为数约 500 人的华工，通过采访，了解到他们跟随英国军队，“战时以掘战壕安铁网为事，现则以捡拾炮弹为职”，虽然这些华工不是正式的军人，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了贡献。^②

胡政之的国际报道，历来得到的评价都比较高。它在当时的年代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了解这一点，首先要明白我国的国际报道在 20 世纪初还处在十分落后的水平。报纸杂志没有对国际时事做充分的报道，国民也未能由此得知充分的国际时事信息，整个国家还处在对外国愚昧无知的程度。尽管我们知道自从 19 世纪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就到外国留学，回国后从事翻译著述，但是不能由此高估了一般人的世界知识水平。那些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毕竟占总人口的极少数，而即使是他们，在回国后要想及时了解世界时事，也必须依赖新闻媒体，至于一般人，视野就更有限了。因此，当时新闻媒体所做的国际报道，对于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全体国民在多大程度上能了解国际时事，发挥著相当关键的作用。

① 参见王芸生、曹谷冰：《1926 至 1949 年的旧大公报》，23 页。

② 参见胡政之：《比利时纪游》，载《大公报》，1919-08-22。

著名的政论家胡愈之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国民外交与国际时事研究》，集中阐述了国际时事报道之于国家外交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的国际报道水平与国外新闻机构的差距，最后还提出了在改进报纸国际报道方面的希望。他这样写道：

我国向来处于屈辱的地位，自然大半由于政治腐败，工商不振的缘故，而对外的隔膜和蒙昧，未始不是一个重要的根源……所谓国民外交，枪法太乱，能力太弱，都只因为国民蒙昧于国际事势的缘故……在近代国家，对于国际事势调查研究报告的机关是非常完备的。日报大都派有国外访员，国际通信社如路透社、联合通信社、东方通信社等，在全世界各地都派有通信员，无论天边地角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在几小时内就能传达于本国……中国国民国际智识的蒙昧，新闻编辑家逃不了这个重大的责任。报纸在社会教育中占最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普通人对于本国以及外国的时事智识，全是从新闻杂志中得来，中国报纸的编辑法，至今还夫曾脱去幼稚的面目。尤其是对于国外新闻的编辑，太辜负了新闻家的天职。欧美日本的日报，都聘有国际问题的专家担任国外新闻的编辑。除本国通信社供给材料外，在各重要国家的大都会，都直接派有访员，发电通信。此外又延请专门家撰述论文，所以材料的来源非常丰富。但我国的报纸，外国新闻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外人组织的通信社送来的电稿。假如外国通信社如路透社、联合通信社、东方通信社、电通社一旦联合停止送稿，中国报纸上就不会发现外国新闻。国门以外，任凭有天翻地覆的重大事变，也不会给中国人知道。外人的通信社，大都系其本国政府经营，或政府授意经营，所以从这些机关里得来的新闻，多少带一点宣传的色彩，失去事实的真相（我们所希望的是）……（二）给一般人阅读的新闻杂志上面应该尽量扩充地位，登载关于国际事情的记述及评论，使国际智识得以普及于一般民众。报纸国外新闻栏的编辑法，更应根本改革，使一般读者引起研究的兴

味。(三)国内各大日报馆应添派驻外通信员,随时以重要消息报告本国,最好是新闻界联合起来组织一大国际通信社,以免国外新闻专门依赖外国通信社的供给。^①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于中国报纸的国际报道所抱的希望,以及对现状的不满和批评。胡愈之所指出的是当时报纸普遍存在的问题——国际报道力量薄弱,稿件来源依赖外国通讯社。尤其后者更是致命伤,因为它妨碍了中国人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正是由于当时报纸在国际报道方面的薄弱,胡政之的巴黎和会系列报道才显得格外重要、格外有价值,它打破了外国通讯社的垄断,是中国记者独立报道重大国际事件的开始。并在这个过程中,根据中国读者的需要,重点报道与中国利益有关的新闻事件。尽管胡的报道时效性不如外国通讯社,从绝对的报道量上讲也不能算很多,但是报道的质量高弥补了这些遗憾。

胡政之对巴黎和会的报道,具有爱国的积极意义,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拒签凡尔赛和约,除少数人如曹、陆、章一派外,是全国人民,包括群众、学生、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统治者或曾充过统治者的一些人的爱国思想和力量联合起来所造成的结果。”^②

二、编辑业务的成就与遗憾

在王郅隆接手《大公报》后,从1916到1925年又经历了两个时期。以1920年8月为转折点,这之前以王郅隆为投资人,以胡政之为总编辑;这之后,王和胡都退出《大公报》,以王的儿子作后台老板,另外聘请了总编辑。

胡政之在编辑方面的成就,第一是重视对报道的组织。他作为总编辑,要求记者一定要去一线采访,不惟“路透社”为权威,重视自采的“北京特约通信”。他自己也亲力亲为,多次去外地甚至

^① 胡愈之:《国民外交与国际时事研究》,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23~27页。

^②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53页。

外国采访，代表作是东北通讯和“巴黎专电”及“巴黎特约通信”。他所写的报道，往往以系列报道形式发表，系统而深入，知识性强。在报道发表之前，在报上做郑重的预告，显示了作为编辑的运作策略，熟悉并能适应读者心理，造成读者对报道的期待。

第二是视野开阔，重视国际新闻报道和国际知识的介绍。

第三是注重版面形式的美化。胡政之多次改版，使报纸版式更易读，增加图案和照片，使版面更美观，把单行题变为多行题，重视栏目的设置与固定化。这些都表明胡政之使《大公报》向现代化报纸迈进了一大步。

第四是适时改革，与时代一起进步。胡政之将清末的书版改成报版，又提倡新式标点符号，提出增加关于新文化的栏目。这些措施使《大公报》不落伍于时代潮流，尽管时有反复。

直皖战争后，胡政之无奈地离开《大公报》。“尽管胡政之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但并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是安福系机关报的本质。”^①在告别启事里，胡政之这样写道：“余自欧洲返国，仍主持大公报社务，原欲以最新智识唤醒国人迷梦，今见社会空气愈益恶浊，断非一时……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与大公报完全脱离关系，特此声明。”^②同日，《大公报》宣布休刊。

1920年8月20日，休刊数日的《大公报》宣布“改组”。这一天，报上登出社论、启事以及同行的祝词，宣告《大公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天，《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登天津报界同仁的贺词。五家报馆及通信社或赞颂“报界泰斗，社会导师，重见天日，组织新奇”（《警言报》），或恭祝“改组进步”（《益世报》），善颂善祷，极力捧场。

当日社论《本报今后之主张》，署名“雷行”，写道：“天地间运转之理，不外除旧而布新，人事应之，舍其旧而新是谋。一转移

^① 王芝琛：《大公报史略》，见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11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② 《胡政之启事》，载《大公报》，1920-08-12。

间，化腐臭为神奇，厥效至捷。本报不幸短命，殆天予以革新之机欤。呜呼，沧桑饱阅，慨世变之靡常，陵谷虽迁，幸人心之未死。此本报所以有改组出版之举。将重奋其枯管秃笔，勉竭觉世警人之力，以与社会诸君子续文字缘也。今日为本报复活之第一日。”接下来阐述了办报主张，一是“对于政治”，“本报今后一切成见，对于政治之评判，以行政之善不善为标准，贡献其所知，务使政治之进行渐趋于正轨，蔚成真正法治之国家。若夫官僚之把持舞弄，政客之眩张为幻，军阀之拥兵于政，则不敢不持严词正论，相与周旋，以冀其最后之觉悟”。二是“对于社会”，“报纸者，即提倡教育鼓励实业之武器，亦即促进自治劝导慈善之良师也……本报以后，当尽力于此”。

通观这篇改组宣言，虽然充满革新的激情，阐述的主张似乎也是合乎民意的，但从行文看，迂腐浮华，文字冗长（一日刊登不完，还要连载）。依照常例，撰写社评的“雷行”应该就是新任总编辑。如果文如其人，这位保守、爱排场的总编辑对于《大公报》也许不是什么好兆头。新任总编辑取代了胡政之的职位，从他的行文以及对版面的安排看，可以说，才华、魄力以及办报的水准都大不如胡政之。

一般的说法是胡政之自国外回来后，就离开《大公报》，去了北京林白水的《新社会报》，其实这中间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1920年7月1日，《大公报》上刊登了社论《本报改造之旨趣》，署名“政之”，无疑是胡政之所写。从内容看，完全是充满希望地要改造《大公报》。并且就是从这一天起，《大公报》上的所有文章都开始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确是气象一新。然而仅仅时隔一个半月，8月20日，《大公报》就宣布彻底改组，总编辑易人，版面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基本取消了新式标点，只在个别文章中使用。

这相距甚短的两次动作说明了什么？胡政之并不是自欧洲回来就打算离开《大公报》，他曾经试图改革，但是由于时局的变化，以及老板王郅隆失势，最后不得不离开。如果说，胡政之是抱着这种遗憾、无奈的心情离开，这就更能解释为什么1925年《大公报》

停刊后，他会与朋友们非常热心地买回《大公报》，并重新开张营业，或许是有补偿的心理作用在其中。

这并不是无端的揣测，试想在总编辑的位置上，胡政之刚刚在7月还兴致勃勃地发布改革宣言，要做一番事业，却在8月遽而辞职。如果说是受了一点挫折就逃避，这不符合胡的性格特点——从各种文献关于他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胡是一个坚定、实干的人。肯定是大势难以挽回，他才不得不万般遗憾地离去。另外，胡政之去了《新社会报》，并没有干长，不久就辞职了。这也说明，他放弃《大公报》而投《新社会报》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决定，而是仓促的无奈之举。

（一）数次改版——从书版到报版

胡政之将《大公报》数次改版。从创刊伊始，《大公报》就是书册式，整版直排，但这渐渐已不能适应读者的需要。胡改版后，由两栏而至四栏，而至六栏，最后改为八栏，中间不留白，成为适应时代潮流的现代化报纸。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1916年至1925年），恰逢“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闻界风气大变，南北各报在新闻业务，尤其编辑方面颇多进步。分析这个时期的《大公报》，有助于了解当时报纸的情况，也能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大公报》一百年来的历史。

第一次改版是从书版到报版，也是最为著名的一次，是在王接手后的1916年11月10日，版面从单调的上下两栏变为四栏，新闻标题从单纯的一行题变为多行题。这次改版是比较本质的。有的大公报人认为“1916年12月1日，《大公报》改书版式为报版式，日出三大张”^①，这是不确的。1916年的《大公报》在11月9日之前，一直是书册式的，即书版式样。从1916年11月10日起，版面上就出现了变化。占一半篇幅的广告版面没有变化，变化出现在

^① 参见张蓬舟：《大公报大事记（1902—1966）》，载《新闻研究资料》，第7卷，192页。

新闻版中。

第一，由上下两栏变为四栏，中间只用细线隔开，不留白。

第二，标题由单纯的一行题变为多行题，在视觉上错落有致，更加活泼，而且由分行产生的留白自然隔开各条信息，而非生硬地划线。如11月10日第二页（第一张）的头条论评即为多行题，即主题加副题式的，主标题为《关于老西开交涉之研究》，副标题从右至左，依次为“法国要求之无理”、“政府对待之失当”、“三国干涉之索隐”、“国民注意之要点”。标题如此处理，既美观，又清楚地提示了读者需要注意的内容，简明而清晰。在当日的所有新闻中，“多行题”形式的为5条，在标题总量中，比例不算高，占多数的还是单行题。同时，在为数不多的多行题中，又以两行题为主，极少参差错落、漂亮的多行题。

第三，从11月10日起，版面变得“图文并茂”。所谓“图文并茂”，并非指新闻照片。尽管1906年中国的报纸上已经开始出现新闻照片，但因为技术水平的限制，直到20年代全国报纸才广泛地应用。是什么令版面生动起来了呢？是“版花”，即配在标题旁边的图案。这样一是美化了版面，令阅读元素更加丰富；二是强化了栏目的概念；三是所配之图案都能与栏目主旨相协调，互相呼应，寓意隽永。如当日第二页之“论评”栏目，配“松石流水图”，寓意居高望远，观点高超；“命令专电”栏目，配两小童摇铃吹号图，寓意号令响亮，传之天下；“北京快信”栏目，配邮差送信图画，寓意消息传递迅捷。另外，版花的画笔细腻秀丽，装饰性强。如“特约路透社”配的图就是纯粹装饰性的梅花云纹条屏图案，有中国特色，颇为讲究。栏目所配“版花”在一段时间内基本是固定的，这合乎读者心理，便于给人留下固定的印象。另外，每版配图不超过三个，故不显得花哨杂乱。

第四，每版所用字号也比以前丰富了。新闻版以前只用两种大小字号的字，把标题与正文区别开来。而改版后，当新闻专电十分重要时，全文都用大字号，以突出其重要性，可见观念上有了突破。如同日的“蔡松坡”（蔡锷）讣告即用大黑字体：

蔡松坡在日本福岡医院养病已经两月。政府昨得福岡来电，言蔡于八日午后四钟在院病逝。今上午十钟入殓。政府已电驻日童使办理丧事，给治丧费二万元。参众两院今日（九日）休会一日，以志哀悼。

第五，在报道编排上，新闻报道和言论相配合，显得丰富充实。如同日有关于“老西开事件”的评论，还有新闻两条，以及反映社会上对该事件反响的述评。

与《大公报》相比，同时期的天津《益世报》也是报版，标题也有大小字号之分，有黑体之分，每日都有漫画，但无标题参差错落，无文间插花，栏目周围无装饰。可以说，《大公报》改版前不如《益世报》，改版后则要胜出一筹。

《大公报》的第二次改版从1917年1月28日开始，版式由原来的一版四栏变为六栏，看起来栏目所占的空间更小，风格更显细腻；而且从该日起，栏目的编排有参差错落，而不是齐刷刷的整齐划一。这又是一次显著的进步。

同时，短新闻增多，内容也更丰富了。是日版面上刊登了一幅照片，这次刊登的照片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文章《军民分治与军民合治》的作者李经羲的照片。这是一个“特别记载”栏目，主要是发表人物的观点，并附有作者的小照。次日（1月29日）又登一照，是驻华日本公使林权助的；30日是梁启超小照。

（二）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版面编辑的发展

《大公报》的版面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不是马上就发生的，而是延迟了一段时间，而且是间断性的发展。

《大公报》上开始全面启用新式的标点符号是在1920年7月。促使发生这一变化的是总编辑胡政之的锐意革新。不过，由于报馆的人事变故，版面仅仅过了一个半月就又退回到当初的老样子，不用新式标点了。

1920年7月1日，《大公报》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社评《本报改造之旨趣》，提出了全面的改造思路，录于下：

社会事物，变迁无极。所谓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是也。凡吾人所认为不满意之现象，皆可努力改造之。世界问题如是，个人问题亦如是，东西各国如是，中国亦如是……新闻为社会之缩影。吾国社会所最缺者，为世界智识……报纸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一党所得而私。吾人业新闻者，当竭其智力，为公共谋利益。本报入世十七年，兢兢以不负大公之名是勉。今后当益坚此念，作社会之公仆。小广告之设，所以便利平民。而社会之声一栏，更愿为公众发表意见之机关。

胡政之此时刚刚从欧洲回来，他曾专门考察过西方新闻事业的面貌^①，于是想把《大公报》改造一番。1919年后，国内报纸在迅速地发生变革。新文化运动对知识界的影响可谓摧枯拉朽，在东西方思想的碰撞中，在“五四”进步潮流的推动下，《大公报》提出让平民在显著位置登小广告，避免大企业的垄断，增加国际知识栏目，扩大读者视野，并且使用新式标点。这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大公报》发生的积极变化。

1920年6月23日，《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出《注意本报之大改良》：“本报从七月一号起，融合世界各国报纸特色，将内容完全改造。除开办小广告另栏披露外，兹将改造办法略记于下，幸阅者注意：（一）系统的记叙世界最新潮流，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二）聘请专门家担任各门通信，确有指导社会的能力，并由本报记者以最新智识撰述论文，指示社会改造的正鹄；（三）特辟思潮栏提倡新文化；（四）特辟社会之声一栏，为社会公共发表意见之机关；（五）注重社会新闻，供给社会改良家的参考资料；（六）特立新刊批评一门，延聘专门家批评新版书籍，俾读书界知所别择。此外尚有种种改良计划统容随时公布。”

胡政之的这个宣言，最可贵的地方在于提倡“世界潮流”，提倡“新文化”，要为公众发言提供阵地。这个改良宣言可视为胡政

^① 参见周太玄：《悼念胡政之先生》，见王瑾、胡政编：《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14页。

之新闻思想的系统展现，虽然没有实现，但它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改革纲领，表明《大公报》本来可以跟上“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潮流，面向已经变化的读者群，适应时代变革。但1920年8月，《大公报》为军阀背景所累，突然失去后台的庇佑，总编辑被迫辞职，这一次跃跃欲试的改革也只得终止，遗憾地使《大公报》失去了一次发展机会，其后的几年都停滞不前。虽然到1924年前后，《大公报》还是大量使用了新式标点，但比起走在时代前端的那些报纸，要算是落后的了。

胡政之于1920年阐发的这些理想，最终在以后的新记《大公报》中得以实现。比如此次提出“专门家”写稿的想法，后来新记《大公报》开辟有著名的“星期论文”栏目；此次提出设置“书评”栏目的想法，后来新记《大公报》培育了多种出色的副刊，对中国的知识界、文学界影响深远。

三、落后于时代的副刊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有固定的副刊。上面设置有许多栏目，几经改版，屡次发生变动，但基本都是小说、诗歌、散文几类，有文言文、有白话文。以当时的时代潮流来讲，绝算不上先进，是当时比较保守的副刊类型。

1918年9月16日，该报刊登《欢迎投稿》的启事，写道：“本报自扩张篇幅后，材料务取丰美，文字力求新颖，除小说已聘定专任撰述外，凡关于谐文、丛谈、笔记等类，如有大稿惠寄，本报无任欢迎。”从这则启事可以看出，编者在副刊方面的取向，比较偏向于连载小说和谐文、笔记体文章。

以1919年6月18日的副刊版面为例，有如下栏目：“小说”（正连载《剑钗双侠记》）、“笔记”、“文苑”（刊登诗歌）、“译丛”（刊登短篇译文），均以文言文为主。

1920年7月一度尝试改革，增加新栏目，可惜月余就告失败。

1922年，副刊有所改观，栏目增多，版面有插图，比较美观些。以1922年10月4日这一天的副刊为例，栏目共有七个：“小

言”、“文苑”、“谈荟”、“说林”、“剧谈”、“谐藪”、“杂俎”、“里乘”，分别刊载杂文、诗歌、小说等等。栏目名称虽古雅，但是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看，这样的风格未免显得过时。五四运动以后，视野开阔的报刊都致力于译介新思想或促进新诗歌新小说的创作，只刊登旧诗歌、笔记体小说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大公报》副刊上还刊登过白话小说，不无讽喻意义。1922年10月4日刊登的《怎么还是梦呢》，颇具讽刺意味地写一个男子恍惚见美女萦绕，闹人登门，又说是总统请他去北京做总理，又说打算去天津开信托公司，去上海办交易所，正不知所措的，忽然醒来，发现竟是南柯一梦。同日刊登的一组笔记小说则比较陈旧，神异志怪色彩浓厚。标题虽工整，都是四字词组，“雷文志异”、“无票游园”、“棋逢对手”、“和尚无理”等，但很是缺乏时代气息，编排也比较呆板。

四、讽喻时事的漫画

《大公报》曾长期刊登漫画，准确地说是“时事漫画”，因为绝大多数漫画的题材都与时事有关。登载漫画是在这一时期《大公报》还比较景气的两年，漫画的水准相当不错，即使与同时代的《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及后来的新记《大公报》的时事漫画相比，也不逊色。

1916年，《益世报》刊有时事漫画时，《大公报》还没有。1919年开始，两报都登载讽喻时事的漫画，可见这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体裁。但两报的漫画作者显然不是同一人，因为《益世报》的风格粗犷写意，而《大公报》的漫画风格细腻工整。

下面列举一些漫画的刊登时间与标题，由此可一窥漫画的选题与时事的关系：

1919年3月3日，刊登一则新闻《势将破裂之和会消息》，而3月11日的漫画题目恰恰是《势将破裂》，十分能说明新闻漫画及时反映时事；

1919年5月10日，《五湖四海起风波》，紧扣时事，反应外交

问题引起的学潮、罢市潮等；

11日，《各埠商家爱国热 闭门休息似过年》（天津商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纷纷罢市）；

15日，《旧议员之目的物》（讽刺腐败的官员）；

16日，《坚不退让》（反映民众坚决不放弃青岛主权的决心，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逼迫中国放弃青岛）；

19日，《崂山下呼声震天 全岛上日月无光》；

20日，《一时二用朝三暮四 左五右六七颠八倒》；

21日，《身在危崖思乐土 渡舟离岸尚遥遥》；

25日，《闭门拒客胡贪误国》（讽刺外交官的无能）；

29日，《一蟹不如一蟹》（嘲讽政府更迭）。

这一时期《大公报》时事漫画的特点是：

（1）固定刊登。每天都登一幅，固定发表在副刊版面上。由于天天有漫画，所以发表的作品数量相当大。

（2）作者相对固定。这么多的漫画，1919年作者只有三个，“守佛”、“笑吾”和“三石”（“三石”署名后注“不受酬”），前两个作者虽然署名不同，但画风惊人相似，也许就是同一个人。1918年，漫画则署名“愁雾”或“多恨”，与“守佛”、“笑吾”的风格一致，或许也都是同一个画家的不同笔名。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画家连续数年发表时事漫画几百幅，也算得上高产画家了。

（3）题材以讽喻时事为主。典型的如1919年3月1日的《国内和平之状况》；5月24日的《手腕外向坐失断送》，画中人左手将“矿山”、右手将“铁路”送与外人，而一只穿西装者的手拿“鲁岛”（即青岛）来换，还是反映人们对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的担忧与愤慨。

（4）反映时事、社会及时快捷。画家画得很快，在新闻发生后不久就能脱稿，这是与一般漫画的不同。有时反映一个新闻事件，有时反映社会情绪，但是都很及时。作为漫画来讲，时效性相当强。

（5）绘画手法是传统的白描（线描），而且多以中国民间传统

故事和传说入画，隐喻时事时人，手法含蓄，有民族风格，与《益世报》漫画之粗犷画风截然不同。论艺术水准与视觉的可观，还是细腻优美的《大公报》漫画更胜一筹。

举二例：1919年5月12日的《会短离长》，以牛郎织女天河配进行讽喻；1919年5月18日的《别时容易见时难》，以《西游记》中的人物唐僧和猪八戒师徒进行讽喻。

画家的笔触也有各自的个性。“守佛”、“笑吾”的漫画风格简洁清爽，比较淡雅；“三石”的则凝重繁复些。

《大公报》自1921年走向衰落后，就不再刊载时事漫画了。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四节 对王郅隆时期《大公报》 的评价

《大公报》在1916年至1925年期间有功有过，要客观地认识它，离不开社会历史的大背景。《大公报》在王郅隆时期，正处在内忧外患严重的时刻，剧烈的矛盾冲突造就了《大公报》的面貌。

由于《大公报》的资金来自安福系军阀，而该派军阀一度执掌中央政权，所以《大公报》不可避免地成为当权者的代言人。当这军阀政府压制学生运动，《大公报》就说学生虽爱国，但不该暴动；当军阀政府支持收复国土，《大公报》也热情呼吁保卫国土，“老西开事件”即是一例；当遇到和后台集团利益发生冲突的事件，《大公报》必然站在它的后台老板们一边，在不触犯军阀集团利益时，它也会站在民众一边说话。

《大公报》有强大后台支撑的时间并不长久，只有不到四年。1920年8月以后，它不再具有安福系言论阵地的性质，但是还不能与安福系彻底脱离关系，因为老板还是王郅隆父子。这以后的一段期间，《大公报》苟延残喘，一边受到直系奉系军阀的压制，限

制其发行，限制其发展，但它又不敢得罪当局，在报道里常讲李景林等军阀的好话。但顺从并没给它带来好运，最后还是停刊了。

《大公报》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它告诉人们，一家老牌的知名大报，其声誉多么容易被损害。它的结局还告诉人们，报纸依赖军阀财阀势力是多么的靠不住，即便暂时得到些恩惠，长远来看，后患却是无穷。

对于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将它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条：

(1)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是专制政治的舆论工具。

王郅隆最初接手时期的《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机关报”，但是在安福系失势之后，《大公报》已经不再具有“机关报”的身份了。所谓机关报，只是后人的一种称谓，当时并没有正式的命名。而且连安福系本身都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没有固定的地位，所谓机关报也就没有明确的宗旨，倾向上是动摇的，时而倾向这一派，时而倾向那一派，哪派当权就倾向哪派。但是，当时不同时期掌握政权的都是军阀集团，它们在政治上都是专制的，在历史上看是反动落后的统治群体。

《大公报》从能代表民意的站在时代前沿的进步报纸，堕落为某一派军阀的舆论工具，这种转变对于原有的优秀传统是一种破坏，使得英敛之开创的《大公报》不再为社会之公器。在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大公报》为军阀政府辩护，或为日本政府辩护，与大多数民众的立场矛盾，令读者对其产生反感。

但从另一方面看，若说转手后的《大公报》对于军阀发挥了多大的宣传作用，也可存疑。从报纸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看：第一，《大公报》转手给安福系方面的人之后，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报宗旨，虽几次提出办报主张，但并未实施，与实际的做法有很大距离。第二，没有为军阀宣传的明确传播策略，报道及宣传的手法粗糙简单，缺乏技巧，对于军阀或者直截了当地吹捧，或者不吝篇幅地大做私人广告。在日常报道方面，并未有计划地进行统筹，系统地宣传对军阀集团有利的主张，或者有组织地进行对其有益的报道。这样，宣传效果自然不会深入人心，徒然令读者反感。第

三，早期，总编辑胡政之虽然与某些政要关系密切，还曾代报纸接受津贴，但他本人的思想是比较倾向民主的，所以对为军阀宣传并不十分热衷，报道重心也没有放在这上面。

财力雄厚的军阀、财阀们买下了《大公报》，损害了它的民主传统，但是军阀和财阀们不谙办报之道，也并不能够充分地利用报纸的传播功能。王郅隆虽会用人，找到胡政之这位办报能手，但是胡最突出的业绩恰恰是中立客观的报道，与某派某人无关，读者欣赏的也只是《大公报》独家新闻的价值，而不是它的背景。从这点来说，军阀和财阀们对《大公报》的掌握是有限度的。在安福系落败的紧要关头，这张报纸对于他们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实际上，在近代新闻史上还有此类事例：1908年，《申报》曾经为上海道蔡乃煌所夺取，变为“官民合股”，损害了它作为民间大报的声誉，但该官员不懂办报，并未能真正控制《申报》，最后只能在舆论的压力下退出，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①当权者可能觊觎并夺取有声望的民间报纸，但夺取之后，报纸的影响力及传播效果并不容易控制。往往著名的民间大报易主后声誉大跌，读者也流失。

纵观近代新闻史，当时的民间报纸自有官方报纸不可替代的存在理由。

(2)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大公报》在胡政之的倡导下，于1920年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并曾试图增设介绍新文化的栏目，这都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结果。虽然有些措施未能实行，使《大公报》在五四运动后崛起的新兴报刊中绝对算不上先进，但也多少跟上一些时代的步伐。

(3)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在新闻业务上有一些突出成就。

《大公报》最突出的成就是国际新闻报道，在当时全国的报纸中都处于领先地位。胡政之是我国最早采访国际会议的记者，而且他的报道准确客观，具有记者的职业精神，对外交事务的报道不停

^① 参见陈彤旭：《出奇制胜——旧中国的民间报业经营》，10页。

留于表面，有深度。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各种新闻体裁的认识清晰，消息与通讯、报道与评论的界限分明。消息（专电）简洁明快，不掺杂个人意见；通讯（通信）描摹生动，详细深入；评论则立场鲜明，不凸显个人情感，而是代表报馆发言。他以报纸为社会之公器，这种思想在新闻业务中是贯彻始终的。

《大公报》在对“老西丑事件”的报道中，体现了爱国的立场，对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承认其爱国的性质。尽管与当时进步的报纸比起来，它的报道态度显得有点消极。这也许和总编辑胡政之受命出访、报社内部失去了灵魂和统帅有一定的关系。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在《大公报》百年发展的历程中，是最缺乏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时期，既无英敛之时期的锐气，又无新记公司时期的独立。同时也是经营管理的低谷，创下发行量最低的纪录。但是，这个阶段的《大公报》在《大公报》的百年历史中是一脉相承的。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以其为基础重组新记《大公报》，从报名、馆址到职工，都沿用原来的一切，人才也接续上。胡政之继续在新记《大公报》里实现他当年未竟的理想，直到把《大公报》打造成中国民间第一大报，一座中国新闻史上新的丰碑。

DAGONGBAO BAINIANSHI

1926 混战后的新生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一节 新记公司接办初期的 《大公报》

一、新记公司的成立与《大公报》的续刊
公元 1926 年。

中国现代史上的“南北朝演义”到了它的尾声。

在南方，1924 年 5 月黄埔军校成立后，广东革命政权的腰杆子迅速硬朗起来，在连续平定了商团叛乱、陈炯明叛乱、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之后，广东革命政权得到初步巩固。1925 年 7 月 1 日，

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8月，国民政府所辖的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9日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并判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先以主力指向两湖战场，并派两支部队警戒闽、赣；待主力消灭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后，再集中兵力攻占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控制长江下游；最后向北推进，消灭张作霖。

在北方，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北洋军阀各派系为争夺地盘，开展了一系列的混战。1925年，段祺瑞政府被推翻，皖系瓦解，北方各省陷入奉直军阀割据的局面，北京政权由奉系操纵。为了守住北洋政府的老巢，吴佩孚、张作霖又在“讨赤”的旗号下联合起来，准备抵御国民革命军的进攻。

就在国民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作最后决战的时候，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始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恰巧都在天津。

三人之中，胡政之与《大公报》的关系最深。十年前，1916年9月，《大公报》的创始者英敛之将报馆盘售给安福系财阀王揖唐，王自任董事长，聘胡政之为经理兼总编辑。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胡政之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赴巴黎采访巴黎和会，成为中国记者采访国际会议的第一人。1920年5月回国，7月返回大公报馆，旋即于8月离开。这些情况，前章已有详细叙述，此处不赘。胡政之离开《大公报》后，到北京林白水主持的《新社会报》任总编辑，因与林白水政见不合，不久离去，于1921年8月到上海进入国闻通讯社。

国闻通讯社与安福系有密切关系。在1920年直皖战争中失败的安福系为了东山再起，就与南方的国民政府和北方的奉系军阀结成一个临时性的反直联盟，中心设在上海。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决定成立一个宣传机构，于是国闻通讯社应运而生。由于这个反直组织是以安福系为主体，所以国闻通讯社由安福系推荐主持人。再说，胡政之早在1916年随安福系的头目王揖唐到北京，出任北洋

政府内务部参事时就与安福系发生了关系，加之他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闻活动，就成了国闻通讯社主持人的最佳人选。但是由于国闻通讯社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浙江军阀卢永祥，因此经理部由卢的亲信石小川主持，胡政之只负责编辑部的工作。为了扩大业务，胡政之又先后在北京、汉口设立分社。然而，通讯社只能给各报社供稿，而自己不能发表言论，胡政之感到用武之地不大，于是于1924年8月在上海创办《国闻周刊》作为国闻通讯社的附属事业。这年9月，卢永祥在齐（燮元）卢（永祥）战争中失败，国闻通讯社失去经济来源，石小川等与卢永祥有关的人员都自动离开，胡政之因此完全掌握了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刊》。1925年胡政之因经营国闻通讯社之故，移居北京，常在京津来往。次年夏天，他来到天津，往日租界熙来饭店。

张季鸾与胡政之两人不仅年龄相近，而且人生经历也十分相似。张季鸾，名炽章，字季鸾，笔名一苇、榆民、记者、老兵等，1888年出生，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张季鸾到日本后，先入东京经纬学堂补习日语，旋即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1911年学成回国。

时值武昌起义爆发，于右任先生创办的《民立报》正办得红红火火。张季鸾一到上海，便应邀到《民立报》工作，成了于右任之臂助。1912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在于右任的举荐下，张季鸾到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秘书，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的起草工作。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张季鸾也离开了总统府。此后，张季鸾进行了一连串的新闻活动：1913年初，与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同袁世凯进行尖锐的斗争，7月北京《民立报》被查封，曹成甫、张季鸾被捕入狱。不久，曹成甫瘐死狱中，张季鸾经康心如等人多方营救出狱。1915年张季鸾与康心如在上海创办《民心日报》，继续反袁斗争，不久因经费困难停刊。1916年，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张季鸾和康心如到北京，进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张任总编辑，康任经理。1918年，《中华新报》因发表段祺瑞政府满蒙四路

中日借款的消息，被京师警察厅以“破坏邦交，扰乱秩序，颠覆政府”等罪名查封，张季鸾和康心如被捕入狱，后经营救出狱。张季鸾于1919年回到上海，任政学会上海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4年，上海《中华新报》因经营不善而停刊。胡政之曾邀请张季鸾到他自己经营的《国闻周报》主持笔政，但张季鸾认为周报笔政一周写一篇文章，不过瘾，于是于1925年春天又到北京，经人介绍出任陇海铁路会办。闲散惯了的张季鸾十分不习惯机关生活，上任不久就辞职了。

1926年，张季鸾为了觅职来到天津，住息游别墅，无固定工作，间或访些新闻、写点稿子，投到上海报社。

过去，张季鸾与胡政之两人虽彼此认识，数次共事，但在思想上并未完全走到一起。现在，他们都已在政治风浪中挣扎了多年，思想更趋成熟。天津重逢，又使他们有了交流的机会。由于熙来饭店与息游别墅相去不远，胡、张二人几乎天天相会，每每于茶余饭后不免海阔天空地高谈一番。回想十几年来奔波奋斗的经历，两人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并且在思想上也大大地靠近了。

胡政之、张季鸾1926年的天津重逢，除了思想上增进理解外，还促成了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他们终于在沉寂多年之后，碰到了真正能使自己施展才华、大干一番事业的绝好机遇。

胡政之6年前离开的《大公报》随着安福系的倒台而于1925年11月停刊了。胡政之、张季鸾此时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当然是这份过去曾彰显一时而现在却无人问津的《大公报》。熙来饭店和息游别墅都离位于日租界旭街21号的大公报馆不远，胡、张二人每日出入必从日租界旭街21号门前经过。看到大公报馆大门紧闭的萧条景象，两人不禁感慨万端。有意重办这家报纸，拖展一番，但又缺乏资金，才想到了当时也在天津的吴鼎昌。

吴鼎昌，字达诠，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沉浮于财政两界，与张季鸾、胡政之等都是老相识，张季鸾对他的印象也不错，认为他有主见，讲义气。当胡政之提议找吴鼎昌商讨盘接《大公报》的事

宜，张季鸾当然赞成。

此时，吴鼎昌正以在野之身独居天津，除任盐业银行总经理一职外，无他事可干。胡政之、张季鸾的来到使难耐寂寞的吴鼎昌很是高兴。而当胡、张说明来意后，吴鼎昌更是喜出望外，因为这时的他正思考着如何搭桥，重登政坛。可以说，出资办报他早有此意。在这个问题上，吴、胡、张可谓“三人同心”，决定把《大公报》从房产、设备到招牌全部盘接过来，由他们续办。

在往后的日子里，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就办报的具体事宜进行了磋商。据胡政之在为纪念《大公报》续刊17周年及张季鸾逝世两周年而写的《回首一十七年》中讲，当时主要约定五事：

“其一，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吴鼎昌在总结了民国以来报界情况后认为，报纸要想独立健康地发展，首先必须要自筹足够的资金。他商量于“四行储备会”，从“经济研究经费”中拿出5万元，以供续刊《大公报》之用。经营得好，扩展事业；经营不好，赔光完事，不以营利为目的。

“其二，我等三人专心办报，在三年之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这就是说，办报的人要专心办报，要把报纸当做一项事业来做。为保证胡政之、张季鸾专心办报，吴鼎昌提议，他自己有资产，不在报馆支月薪；胡政之、张季鸾每人每月领薪水300元。

“其三，我和张先生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这就决定了吴、胡、张三人合作经营的大公报馆具有股份公司性质，吴鼎昌以金钱入股，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三人还商定，公司的名字叫作“大公报社新记公司”。

“其四，吴先生任社长，我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先生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这是根据各人的特长而定的。

“其五，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正之责，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不同时从张先生。”

胡政之在记述了这五件事后，强调说：“这差不多是我们创业

时的宪法”^①。

“大公报社新记公司”成立的时间大约在1926年6月间，具体日期已不可考。公司成立后，《大公报》续刊的准备工作便紧张地开始了。吴鼎昌负责筹措的5万元到位后，胡政之即着手盘购原《大公报》。他亲自出面与旧股东王景衍接洽。王景衍系王郅隆之子，其父于1923年在东京大地震中死去后，王景衍接管《大公报》，由于报纸的亲日色彩，致使声名狼藉。眼下，报馆已经关门，王景衍已无意再行经营，因此，胡政之没费多少口舌，便以1万元成交，购下了《大公报》的产权及报名。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组织班子。胡政之首先找到原大公报馆副经理王佩之，诚聘他为新记大公报馆的副经理，并委托他召集原有职员曹乃武、陈树桐等人分任筹备。工厂的人员几乎全是原《大公报》的一套人马，而编、经两部的骨干主要从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抽调。新记公司成立后，胡政之麾下的原“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便成为了《大公报》的附属机构。国闻通讯社总部、国闻日报社也由上海迁到天津，与《大公报》统一办公，所有人员由胡政之统一调动，统筹安排。驻外地机构都是三块牌子，一班人马，一人负责，全权管理。创业之初，除组建天津总部外，还加强了上海、北京两个办事处，李子宽、金诚夫分任两处主任。李、金二人都是胡政之的老部下，过去都曾在国闻通讯社工作过。

李子宽与胡政之的关系极深。早在1920年胡政之在北京主持《新社会报》编辑部工作时，李子宽就是他的部下。胡政之离开《新社会报》南下上海，李子宽也追随到了上海，并成为国闻通讯社的元老。后来，李子宽建议胡政之创办《国闻周报》作为国闻通讯社的附属，使胡政之有了一个发表文章的阵地。1924年卢永祥战败，国闻通讯社失去经济来源，是李子宽建议增设广告部代理报纸招揽广告，以折扣补充国闻通讯社的经费亏空，使国闻通讯社渡过难关。金诚夫是李子宽中学和大学的同学，由李子宽介绍进《新

^① 胡政之：《回首一十七年》，载《大公报》，1949-04-15。

社会报》编辑部，后与李子宽一道随胡政之南下，到上海后，金诚夫在胡政之的推荐下到《新申报》任编辑，1925年进国闻通讯社，任北京办事处主任。

为了组成编辑部，胡政之还从上海调来了何心冷，从北京调来了杜协民。

何心冷是1922年进国闻通讯社的老人，他头脑清晰，手笔敏捷，而且记忆力极好，采访不用笔记，回来后一挥而就，为国闻通讯社的开创出力甚大；后又为《国闻周报》的创办立下汗马功劳。新记公司成立后，胡政之认为办报可以充分发挥何心冷的特长，于是将他从上海调到天津，帮助续刊的准备工作。新记《大公报》创刊出版后，何心冷负责本市新闻、副刊兼采访部主任。

杜协民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著名经济学家何廉的学生，经人介绍进北京国闻通讯社。新记公司成立后，杜协民被调到天津参加《大公报》续刊的准备工作，报纸出版后，杜协民负责经济新闻与体育新闻。

新记《大公报》创刊之初，编辑部就只有张季鸾、何心冷和杜协民三个人。

新记《大公报》的续刊初期，队伍十分精干，除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个老板之外，王佩之、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杜协民便是所谓的“开国五虎大将”。这五人中，何心冷于1933年英年早逝；杜协民于1936年离开了《大公报》，代张季鸾出任《国民公报》总编辑，抗战后期从政了；王佩之在抗战爆发、天津馆关闭时离开了《大公报》；金诚夫被1935年8月出任实业部长的吴鼎昌带走，担任秘书，1938年，《大公报》在香港创办时，又回报馆，历任港馆、桂馆、体馆经理，总管理处副总经理；李子宽一直在《大公报》馆服务，历任沪馆经理、董监事联合办事处总书记等。

在组织班子的同时，公司还增添了一些必要的设备、器材，如安装电力马达，添加铜模新字等，此外还购买了一批白报纸。购买白报纸一事，吴鼎昌最为在行。“吴鼎昌原习商业，又是银行老板，对世界贸易和金融市场的情况较胡政之、张季鸾等熟悉。怎样购储

外币，何时向银行结汇，都由吴考虑决定，也从来未失败过。”^①当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参与筹备的编、经两部同仁于8月25日集会于旭街21号二层楼办公室，再次检查各项筹备工作的落实情况，并着重就续刊出版事宜集思广益。会议由胡政之、张季鸾主持，与会人员踊跃发言，很多建议被胡、张采纳。

1926年9月1日，这一天在《大公报》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了！续刊第一天的报纸署号8316号，报头仍用《大公报》三个字，其下特意标明“本馆创始自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以表明该报的历史。续刊号出两大张8个版。第1版上半部刊登《本报启事》、《大公报续刊辞》和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撰写的《本社同人之志趣》。《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是新记《大公报》第一篇论述办报思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该报同仁志趣归纳为“四不”，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就是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

第2版在《两湖战事牵动东南》的大标题下，汇集9则“本报特讯”，报道武岳战事，其中有胡政之以“冷观”为笔名写的“北京特讯”《武汉警告中之大局写真》。第2版下和第3版上为国内外短讯，下为广告。第4版为《经济与商情》专版。

第二张的第5版是广告专版；第6版是各地通讯；第7版上为“本埠新闻”，下为广告；第8版上为文艺副刊，下为广告。总之，新记《大公报》一出版，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印象，不仅内容丰富、言论犀利、新闻快捷，而且版式活泼、字体多样。为了赢得受众，该报在京津地区送阅两天，广征意见，从第二天起收费订阅。

二、《大公报》发满一万号

20世纪30年代，天津人曾自豪地称：“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大公报》所以能在30年代成为“天津三宝”

^①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37页。

之一，是因为20年代后几年，它的基础奠得扎实。

在该报发展的这最初几年中，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确实如他们当初约定的那样：“专心办报”，尤其是胡、张二人，真可谓全身心地投入。胡政之身为报馆经理，一手负责编、经两部的人事进退及日常工作的安排。张季鸾则广会友客，捕捉新闻线索，把握时事动态。每天下午4时至5时，张季鸾在编辑部主持编辑会议，与胡政之一起给编辑人员分配工作，安排当天报纸版面的基本轮廓。晚上8时许，吴、胡、张三人都到编辑部集合，共同分析时局，讨论社评写作。9时，上夜班的人员都准点到岗，编辑部旋即进入紧张状态。四面八方的电稿纷纷飞来，各编辑按照下午编辑会议的精神进行处理。吴、胡、张三人或写社评，或指导处理稿件，或考虑重要新闻的标题。12时，报馆免费供应夜宵。夜宵后，吴、胡离去，张季鸾一人留下继续修改社评，最后还要审阅几个重要版面的大样、小样，直到拼版付印。创业初期，《大公报》的社评基本上由张季鸾及胡政之、吴鼎昌“承包”。社评初称“论评”，署名，从1926年9月9日起改称“社评”，仍署名，当年11月7日起取消署名，社评代表报社观点。

为了适应日益扩展的业务，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十分注重引进人才，建设队伍，健全机构。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人馆的重要骨干有许葑伯、杨历樵、曹谷冰、曹世瑛、孙昭恺、李清芳、袁光中、王文耀、王芸生、徐铸成、赵恩源、费彝民等。

许葑伯与李子宽、金诚夫是北京大学同学，由金介绍进北京国闻通讯社，当记者，1928年调天津大公报馆，做要闻版编辑。许葑伯心细绵密，沉默谦和，文笔至佳，1929年3月升任编辑主任，1935年改任报馆副经理，历任津馆经理、汉馆经理、港馆经理兼编辑主任，1938年因喉结核症在香港逝世，年43岁。

杨历樵，圣约翰大学毕业，英文功底极好，1927年4月进《大公报》任英文翻译。其中文也很有根基，1931年“九一八”以后，开始执笔写一些国际问题的社评，成为第一个打破社评由吴、胡、张三人“包办”局面的人。杨历樵长期担任翻译主任，在津

馆、沪馆、港馆、桂馆、渝馆工作过；1948年，随胡政之恢复港版，后病逝于香港。

曹谷冰，张季鸾老友曹成甫之子。1913年，张季鸾与曹成甫在北京创办《民立报》，进行反袁斗争，二人被捕，曹死狱中，张被营救出狱。张季鸾将曹谷冰抚养长成。曹谷冰自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1923年又到德国留学，1927年进大公报馆。曹谷冰后来成为了该报第二代的领头人，历任汉馆经理、渝馆经理，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代总经理、总经理。

曹世英、孔昭恺是1928年9月《大公报》第一次招考练习生被录用人馆的，此后，两人一直在《大公报》工作。曹历任津馆、沪馆、港馆、桂馆、渝馆的编辑、记者，抗战胜利后，回天津馆任外勤科主任；孔历任津馆、沪馆、汉馆、渝馆编辑、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津馆编辑主任、副总编辑、驻南京办事处主任。

李清芳于1927年进馆，袁光中、王文耀是1928年进馆，三人都是经理部的重要骨干，一直服务于大公报馆，辗转于津、沪、汉、港、桂、渝各馆，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成绩弥著。

王芸生，原名王德鹏，1901年生于天津，家境贫寒，自学成才。1926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出任天津《商报》总编辑，因屡次撰文评论《大公报》社评的观点，为张季鸾看中而揽入《大公报》，历任津版编辑、编辑主任，沪版、汉版、渝版编辑主任，1941年张季鸾病逝后，接任总编辑之职，与曹谷冰一道成为新记《大公报》第二代领班人。

徐铸成，1927年底进北京国闻通讯社，1929年11月调天津《大公报》，历任编辑、外勤记者、驻汉特派员、沪版编辑、港版编辑主任、桂版总编辑、渝馆《大公晚报》主编，抗战胜利后，任沪版总编辑。

赵思源，1930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即进入大公报馆，成为该报第一个新闻科班出身的报人，历任津版、汉版、渝版编辑，抗战胜利后，任津版编辑主任。忠实勤劳，始终如一。

费彝民，1930年进入大公报馆，“九一八”事变后，任驻沈阳

记者站记者，1932年回天津，任津馆总稽核，后调任沪版社评委员。抗战期间一度离开大公报馆，滞留上海。1948年回《大公报》，并随胡政之到香港参与复刊《大公报》港版的工作，被任命为社长。

随着人员的增加，机构设置也在逐步走向完善。这一时期，报社的组织机构大体上是社长之下设经理和总编辑，经理分管经理部和各办事处，总编辑负责编辑部和特派记者。报社一般在编辑部选用骨干到经理部工作，经理有人事权、财务权和经营权。在驻外办事处的设置上，除原有的北京、上海、汉口外，1927年又增设沈阳、哈尔滨两处。同时还在不少地方设立分销处。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率先垂范，编、经两部同仁齐心协力，新记《大公报》发展十分迅速。续刊之初，报纸销售不足2000份，广告收入每月仅200元左右，每月结算亏损三四千元。次年4月，报纸销数增至5800多份，广告收入增至每月2200元上下，赔累之数逐月减少。5月，增加报价，收支平衡；8月起，月有盈余；年底，销数达1.2万份，广告收入达每月3200元。从1928年元旦起，报纸扩充篇幅，每天出两张半10个版；9月1日起，每天出3大张12个版，销数达1.3万份左右。1929年月，报社印刷厂告别了平板印报机，改用进口的轮转印报机。当年报纸销数增至2万多份，广告收入每月6000多元。由于印刷设备的改进，先是营业部扩大营业范围，对外承印各种印件，后于年底成立“出版部”，出版书籍。是年3月，南京办事处设立。

进入30年代后，《大公报》发展更快。1930年6月，印刷厂改用新字排版，减少篇幅而不减少内容。年底报纸销数最高达3万份，全国有代销点293个，广告收入每月八九千元。1931年2月，报馆买进德国制造的高速轮转印刷机一部，并采用铸双版付印，报纸销数达5万份，广告收入每月过万元。就在事业蓬勃发展之时，这年5月，《大公报》迎来了它创刊以来的空前盛典——发满一万号。为了推进事业更进一步发展，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为扩大《大公报》的影响大大地做一下文章。

早在年初，报社就开始向海内外征文。从3月起，各类纪念文章、贺辞、贺诗纷纷寄到。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出版“一万号”，增刊3大张登载纪念文章，共出6大张24个版。

在第1版上半版，刊登张季鸾撰写的社评《本报一万号纪念辞》，回首30年的刊行历程，不禁感慨万端，“诉诸全国读者诸君”三点：其一，重申同仁办报的宗旨在“言论报国”；其二，重申同仁志趣仍为“四不”；其三，希望得到全国读者的合作、同情和援助。下半版刊登长篇纪念文章《从一号到一万号》，为《大公报》30年发展的简史，第2版一整版，在《从一号到一万号大公报之缩图》的标题下，刊登照片17张。上半部有《过去之主办人英敛之、王祝三、柴敷霖》照片，及《现在之主办人吴达淦、胡政之、张季鸾》照片；下半部为各时期的工作照片。

《大公报》发满一万号纪念征文所收到的贺信与文章，不仅数量最多，而且级别高。从国内看，有国民政府主席蒋中王的文章，有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的文章，有监察院长于右任的文章、代理立法院长邵元冲的文章、胡汉民的题词以及司法部长王宠惠、外交部长王正廷、交通部长王伯群的文章，有驻美公使伍朝枢、驻德公使蒋作宾等人的文章，有著名教授、学者胡适、陈振先、蒋廷黻、郭定森、杨振声、陈衡哲、凌叔华的文章，有社会名流梅兰芳、程砚秋的文章。从国际来看，有比利时总理亨利·嘎斯，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大藏大臣宇垣一成，德国外交总长库尔修斯，法国前总理赫里欧，美国远东司司长韩倍克，美国密苏里大学校长威廉等人的文章和贺信。

在国内征文方面，胡适出力不少。他不仅自己撰文，还四处为《大公报》作介绍。在《后生可畏》一文中，胡适肯定了《大公报》的成就，并提出用白话文办报的希望，说：“在这个二十世纪里，还有哪个文明国家用绝大多数人民不懂的古文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①对胡适的批评，张季鸾在当日发表的《一万号编辑余谈》

^① 载《大公报》，1931-05-22。

中谦虚地接受，说：“适之先生嫌我们不用白话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用白话文。”3年后，《大公报》约请专家学者写“星期论文”，第一篇就是胡适写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可以说，胡适为《大公报》语言文体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增刊上除了刊登国内外重要人物的题词和文章外，还在《读者批评与希望》的大标题下，用近7个版面的篇幅选登读者的贺信约250篇。

《大公报》一万号的发行数比平日猛增几倍，单在天津市面上零售的数量就高达4600多份。

22日正午，大公报馆全体同仁在国民饭店举行发满一万号纪念聚餐会。聚餐会上充满着成功的喜庆气氛，全馆职员工友200余人，坐了20多桌。聚餐会由胡政之主持，他首先举杯，对同仁的辛劳表示慰问，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这天最高兴的要算吴鼎昌，因为《大公报》发满一万号的纪念日恰巧是他48岁生日。他激动地高声朗诵自己写的一首七绝：“已过光阴不计年，无端文字著因缘。今朝正是予初度，一纸题签满十千。”诵毕，胡政之、张季鸾率全体同仁向吴鼎昌敬酒，祝他生日快乐，事业发达。

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队伍壮大和人的兴旺。在纪念报纸刊行一万号之际，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面对这支规模不算太大，但能量很大、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一万号编辑余谈》中，张季鸾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介绍报馆内部的人员和工作情况，对经编两部同仁的敬业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特别表扬了许宣伯、曹谷冰、杜协民、王芸生、金诚夫、李子宽等人。

纪念《大公报》发满一万号的聚餐会，是该报自创刊以来前所未有的盛会。报人们何曾想到，盛会之后，一场严峻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

三、从日租界迁至法租界

就在《大公报》发满一万号、事业突飞猛进发展之时，震惊中外的“沈阳事变”发生了，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国家遭难之日，新记《大公报》也承受了它续刊之后的第一场灾难。“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感到报馆继续留在日租界迟早会出事，便立即着手另觅新址。正当他们在法租界电灯房后面找到一个纺织厂的旧厂房，准备打打修葺之时，“天津事变”爆发了。在日本特务土肥原的策动下，汉奸张璧、李际春组织便衣队于1931年11月8日晚从日租界冲向华界的天津市面，四处骚扰，寻衅闹事。

便衣队枪一响，日本军随即出动，妄图一举占领天津市。大公报馆所在的旭街一带成了日本军队的警备区域，沙包高垒、铁网四布，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来往巡逻，空气十分紧张。

当晚，胡政之、张季鸾和内外勤记者、工厂工人都守在报馆里。11月的天津，气温已经相当低了。窗外寒风凛冽刺骨，屋内人群心急火燎，有的在抓紧处理手头的工作，有的在想方设法打听外面的消息。

二楼经理室内，此时倒显得过分的安静。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只有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个人。这天晚上，吴鼎昌因事没来报馆，胡政之、张季鸾处理完一些日常事务后，便先后来到经理室。楼上楼下两部电话响个不停，不是探询消息就是报告新闻，这更增添了馆内紧张的气氛。

天明，9日的报纸已经付印。四面八方都被铁网封锁着，外面的报差进不来，里面的报纸送不出。胡、张两人看到在旭街继续编辑出版报纸已不可能，遂决定撤离，于是找来王佩之、许萱伯等主要骨干，请他们分头通知经、编两部及印刷厂工友，做好撤离准备。

王佩之、许萱伯组织队伍，收检要件，安排重要职员撤离顺序。胡政之、张季鸾出面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联络，请求发放通行证。好在胡、张二人都曾是留日学生，不仅日语精通，而且领事馆也有熟人，所以通行证很快就送来了。下午4时许，馆中人员差不多全部安全撤离，然而机器铅字、铜模纸张等等，一点都没有运出来。无奈只好决定停版几天，全力以赴组织搬家。

自1905年9月5日从法租界狄总领事路迁到旭街算起，《大公报》在这里经营已经25年，新记公司接办也已5年，要将25年的事业在三五天内完全平安迁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胡政之对全体同仁作了动员后，搬迁工作从11日正式开始。胡政之全面指挥；张季鸾不顾体弱多病，积极参与；吴鼎昌每晚亦必到现场。每天趁上午8时到下午4时日本租界凭通行证可以通行的时间，员工们驾着两部汽车，推着五辆板车来往于旭街、秋山街与法租界新馆之间，不停歇地搬运物资。从11日上午至15日，整整搬了4个昼夜。

社会各界对于大公报馆搬迁给予了积极支持。搬迁开始的第一天，电话局就来接通了电话；第二天，供电局又来接通了电灯。

1931年11月16日，《大公报》在法租界30号路161号新址出版了！由于轮转机尚未安装竣工，续刊之始，只能暂时用平板印报机印刷，出报速度大减，只得缩小篇幅，暂出一大张4个版。这一天，在第2版刊登的《本报历史的一页》写道：“这次搬家，是本报历史中重要的一页”。29年前，英敛之创刊《大公报》时，本在法租界6号路，4年后迁至日租界旭街，现在又迁回法租界。29年的历史画了一个圆，其中的坎坷沉浮令人回味。

忙碌整整持续了3个月。1932年2月11日，新购机器装配就绪，所有事务恢复常态。

法租界30号路的大公报新馆比起日租界旭街的旧馆，门面屋舍要宽敞得多。办报条件改善了，《大公报》的发展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933年2月，报馆购进德制新式轮转印报机，员工增至300余人。1934年伊始，又一创举出台了。元旦当天的《大公报》在要闻版的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别启事》，说：“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位先生如下（以姓氏笔画多寡为序）：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

生。”1月7日,《大公报》刊登第一篇“星期论文”,是胡适写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从此,《大公报》的社评由浅近文言文改用白话文。随着时间推移,“星期论文”的作者队伍不断扩大。据统计,从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的作者有200多人,共发表文章750余篇。发表10篇以上的作者有胡适、傅斯年、黄炎培、费孝通等人。这支作者队伍多为社会名流、军政显要和知名教授、学者,因而论文涉及面宽,发表后产生的社会影响很大。“星期论文”是新记《大公报》的独创,且延续15年之久,为加强报纸与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联系、实行言论开放以形成社会舆论起到了重大作用。

DAGONGBAO BIANWANSHI

第二节 新记公司《大公报》前 十年的新闻与言论

一、在政治漩涡中巧妙周旋

(一) 从反对北伐到赞扬孙中山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在北方续刊《大公报》与南方国民政府准备北伐几乎是同步进行。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的这一天,正好赶上北伐军兵分三路向武汉逼近。对于一份刚刚续刊出版的报纸来说,碰到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机遇,也是挑战。由于对交战双方的了解和认识还不够深入,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大公报》一开始表现出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其言论尽量避免明显的偏向,只是对战争本身表示笼统的反对,呼吁双方停火。1926年9月2日,吴鼎昌撰写的社评《战卜》指出,多年来的军阀混战麻木了人们的神经,“无论谁何之胜负,概熟悉无睹”。文章认为北伐战争“战亦如是,不战亦如是……战胜亦如是,战败亦如是”,所以不如双方停火,平息战端。新记《大公报》这样做,

一方面当然是对交战双方都不满意，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种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军阀连年混战，遭殃的是老百姓。因此《大公报》呼吁停战，很大程度上喊出了饱尝战乱之苦的下层人民的心声。张季鸾发表于9月2日的社评《劝南北猛醒》就明确指出：“西北一役，黄河流域之精华，荡然以尽，直鲁豫陕晋甘察绥八省区，皆已惨不可闻，今武汉告警，东南战事又起，岂南北诸将，欲拼尽全国面后已耶？”请求交战双方体恤民艰。

初看起来，《大公报》关心民瘼，反对战乱，而往深处看，《大公报》是对改组后的国民党有看法，反对“赤化”！9月2日，张季鸾在评论《嘉使团中立》中，一方面赞扬外国驻北京公使团电令各国驻汉领事，对湘鄂战争严守中立立场，一方面批评赤俄不行法制，不遵守国际公法。9月4日的社评《回头是岸》正式亮出了“反对赤化”的底牌，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国民党之标明‘以党治国’，以国际共产党之入党，与夫亲俄色彩之浓，宣传工潮学潮之烈，此皆吾人所反对者”。接下来，9月5日吴鼎昌以“前撰”为笔名写的《注意国内与国际之变化》的论评，9月13日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写的社评《时局杂感》，11月22日发表的社评《汉口制造工潮之危机》等三篇文章，给“赤化”加上了三条罪名：一是引来外国干涉；二是导致一党专政；三是制造工潮，破坏生产。1927年1月6日，张季鸾在社评《明耻》中甚至说“中国有赤化问题之发生，中国之耻也”。文章最后提出“雪耻之道”，在于“速举国一致，共为新中国建设之奋斗。对外求独立平等，对内实行法治，则赤化之问题自消”。即用资本主义抵制共产主义，在中国建设资本主义社会。这篇社评可以看成是张季鸾对《大公报》前一段反对赤化做的一个小结。

然而，随着北伐的进展和政局的变化，《大公报》对待北伐军、对待国民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昌，吴佩孚主力被消灭。1927年元旦，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旧历新年初，胡政之南游汉、沪，亲自考察了“饮马长江”的北伐军和北迁武汉的国民政府，回津后，于3月6日至9日在报上连续

发表了一组题为《南行视察记》的通讯。在这组通讯中，胡政之详细报道了沿途的见闻，对北伐军的英勇善战以及南方国民政府在设计、军事、外交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较高评价。说北伐军不仅善于打仗，而且善于政治宣传，效果极佳；说北伐军控制的武汉，中国人扬眉吐气，“在汉口最痛快的是英租界工部局插上青天白日旗，中国士兵在各租界可以武装行走”；说国民政府的官员勤劳辛苦，工作有规律，生活简单；说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等等。

以《南行视察记》通讯的发表为标志，《大公报》的言论立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旗帜鲜明地痛斥旧军阀，赞扬孙中山。

1926年12月4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跋霸》，为直系军阀送终。文章说：“吴氏所恃者惟其本身或其一系之武力，又除武力外，更无所事……综观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

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发动武装起义，遭到孙传芳的残酷镇压。对孙的暴行，《大公报》予以了严厉谴责。2月23日的社评《毋嗜杀》指出，像孙传芳这样“割据称兵”的军阀的所作所为，“既叛圣贤之训，又背宪政之理”，“肆行威福，蹂躏人权，嗜杀为快”，不会有好的下场。3月5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评《北洋系之末路》，给整个北洋军阀宣判了死刑。文章说，北洋系发端于李鸿章，始大于袁世凯，袁死，系内自相残杀，吴佩孚、孙传芳为北洋系仅存的两支派系，及吴败于武汉，孙丢了杭州，北洋系末日至矣。并指出：“彼北洋系者，以军队供其私利之用，其不能自存也固宜。”

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赞扬孙中山，说“他宽厚博爱的性格，艰苦卓绝的精神，高远敏锐的眼光，都不失为为人之特征，又为后人景仰之模范。最可令人想念者，便是他四十多年前后一贯努力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点。”这篇社评出自胡政之之手，以后经常用来作为《大公报》“敢言”的例证。这篇社评，固然赞扬了

孙中山，也赞成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但是对“中山联俄”作了曲解，认为“中山联俄”仅仅是利用俄国扶助弱小民族独立的政策，将“联俄”与“联共”、“扶助农工”割裂开来，为以后的“反共”立场埋下了伏笔。

（二）从“骂蒋”到“拥蒋”

对蒋介石，张季鸾和《大公报》有一个从“臭骂”到“拥护”再到“亲热”的过程。

众所周知，1927年1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针对蒋介石和宋美龄婚事而作的、题为《蒋介石之人生观》的社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之后，于1927年9月来到日本，一方面研究日本国情及对华政策，以争取日本政府支持他重新上台，一方面到马温泉晋见在那里疗养的宋太夫人，请求允诺与宋美龄的婚事。蒋介石迎娶宋美龄，使得他成为了孙中山和孔祥熙的连襟、宋子文的妹夫，很明显，这是一场政治联姻。11月30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今日》的文章，说他今日与宋美龄结婚后，就可以安心尽革命责任；还说，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大公报》没有看到蒋宋联姻的政治意义，在《蒋介石之人生观》中，从人生观入手，将蒋介石臭骂了一顿。

首先，文章单刀直入，批判蒋介石的恋爱观：“恋爱者，人生之一部分耳。若谓恋爱不成，则人生一切无意义，是乃专崇拜本能，而抹杀人类文明进步后之一切高尚观念。”再分析人生的意义：“夫文明人所认为人生意义，一言蔽之，曰利他而已。盖人生至短，忽忽数十春秋，与草木同腐。以视宇宙悠久，不啻白驹过隙。然而犹值得生存者，则个人虽死，大众不死故。所以古今志士仁人所奋斗者，惟在如何用有涯之生，作利人之事，而前仆后继，世代相承，以为建筑文明改善人类环境尽力。行此义者，为人生活；不然，为动物生活。”最后从革命者的人生意义上批判蒋介石的人生观：“吾人所万不能缄默者，则蒋谓有美满姻缘始能为革命工作。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

人？——呜呼！尝忆蒋氏演说有云‘出兵以来，死伤者不下五万人。’为问蒋氏，此辈所谓武装同志，缘有美满姻缘乎？抑无之乎？其有之耶，何以撤散其姻缘？其无之耶，岂不虚生了一世？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淡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

这里，我们还要提及《大公报》在1927年11月4日发表过一篇骂汪精卫的文章——《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揭露汪精卫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实质是强烈的“领袖欲”在作祟，指出：“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过而已。”

对蒋介石、汪精卫的人生观和人品的不满，并不影响《大公报》对蒋、汪二人“清共”、“分共”政治立场的拥护。

国共联合进行的北伐战争，在广大民众的支持和配合下，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国民政府北迁武汉。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严重地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它们运用各种手段，在革命阵线内部进行分化。于是1927年4月和7月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改变，进行“清共”、“分共”活动，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严重地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对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清共”、“分共”行为，《大公报》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在总体上表示赞同，前一阶段的“反对赤化”很自然地演化成反对共产党。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乱反共之后，《大公报》每天在报上刊登“上海专电”，报道“上海事变”的消息。4月18日，发表社评《沪商与时局》，借商团之口，表示其拥蒋反共的态度。《大公报》认为，共产党，这个名称就不好，被人解释为“夺人之产”、“共人之妻”，“常人闻之，如洪水猛兽”。又说，共产党提出打倒资本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共产革命条件不成熟。

但作为一份言论独立的报纸，《大公报》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蒋、汪的政治见解。首先，反对屠杀共产党员。4月29日的社评

《党祸》指出：“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到，则对于各方杀机之斥，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南方所谓领袖人物，首应切悔。”7月30日的社评《党治与人权》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也对“军治杀人”予以了谴责：“上海、广州大清党之时，杀人殊多……长此用军治杀人，必陷于专制政治之道。”其次，《大公报》认为反共必须深入了解共产主义。11月8日的社评《中国与俄国》指出：“反赤化者”出以“高压猛烈之手段”，大事杀戮，颇有不当，建议政府对于共产主义“必须有深切之研究”。11月27日的社评《反共须知》更是明确主张：反共必须研究“马学”。文章以英、日为例，说明政府对于有碍的思想，不能以高压简单禁止，而应提倡“主义之思想讨论”，以“期是非之明确，免社会之盲从也”。再次，《大公报》提出反共的第一条件是改良政治。该报认为，共产主义所以能在中国迅猛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不能“从事实上消除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病因”^①。7月8日的社评《联俄与反共》更明确指出，近年来“赤化运动”“能引起无数青年之合作”，都因为中国的“政治不良，经济困难”，因此“反共第一条件，在于改善社会环境”。

（三）从反对国民党到拥护国民党

新记《大公报》自1926年9月1日创刊出版以来，每天都在显著位置报道国内外重大新闻，并发表对这些重大新闻的评论，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1928年到来之际，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人认为，是公开表明本报的政治态度的时候了。于是在新年元旦，《大公报》发表了《岁首辞》。《岁首辞》明确地宣布了“吾人之根本旨趣”：“夫中国改革既有绝对之必要，而改革之大义曰解放创造，非复古，亦非俄化，则大体之国是可定矣。此无他，对内厉行民主政治，提倡国民经济，采欧美宪政之长，而去其资本家专制之短；大兴教育以唤起民众，争回税权以发达产业；对

^① 社评：《如何对付这个世界的捣乱鬼》，载《大公报》，1927-05-09。

内务求长治久安之规模，对外必脱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①可见，《大公报》的政治主张既“非复古，亦非俄化”，而是效法欧美宪政，在中国建立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政治态度的表明，为它往后的言论立下了一个标准，凡符合自由资本主义的就赞成，否则就反对。

这一点，首先在对待国民党态度的变化上得到了印证。

如前所说，北伐时期，国民党执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显示出相当的革命性，《大公报》对它不感兴趣，给它加上种种罪名。蒋、汪“分共”之后，国民党的性质起了本质性的变化，由一个革命的党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党。而对国民党这样的变化，《大公报》是表示欢迎的。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闭幕，发表《全党宣言》。《大公报》在9日的社评《宁会宣言之感想》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宣言》“完全抛弃联俄、容共后之一切理论，而归予原始的三民主义之下”。可以说，《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态度，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迅速转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言论倾向也更加明显。

1928年6月初，国民革命军逼近京、津，东北军由关内撤退，京、津为国民党和平接收。对于北方政权的此番更替，《大公报》以相当活跃的言论，巧妙地送走了旧统治者，热情地迎来了新当权人。

6月1日，胡政之由津至京，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活动，相继发表了《北都易帜记》（1928年6月10日）、《第三集团军人京记》（1928年6月10日）、《阎白访问记》（1928年6月14日）、《再度访阎记》（1928年6月15日）等通讯，对国民党军队及其将领大加赞扬。6月12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次日，《大公报》还特别发表社评《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对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表示欢迎。6月16日，胡政之回到天津，17日在报上发表题为《从北京到天津的印象》的文章，又一次对国民革命军及其将

^① 载《大公报》，1928-01-10。

领们进行吹捧。

胡政之回津后，传来蒋介石要北上的消息。为了了解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以确定今后的方针，张季鸾亲自出马。张先到北京，然后赶往百泉见冯玉祥。7月1日，蒋介石的北上专列途经郑州，张随冯到郑州迎接。由冯玉祥介绍，张季鸾初识蒋介石，并随蒋的专列一同回京。7月3日，专列进京，《大公报》发表社评《欢迎与期望》，颂扬蒋介石的“为功之大”：“蒋君自清季献身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到底不懈”，称其为“大义大勇”的“革命英雄”。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党政军要员云集南京。张季鸾利用这个机会与各方要人广泛接触，并于8月27日至9月3日连续发表6篇《新都观政记》和3篇《京沪杂记》。至此，《大公报》完全奠定了今后拥护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基础。

1928年9月1日，是新记《大公报》续刊二周年纪念日，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借机发表社评向南京国民政府表态：“盖本报公共机关也，同人普通公民也，今后惟当就人民之立场，以拥护与赞助国民政府之建设。”

1928年12月，东三省易帜，国民党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随着旧军阀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各派新军阀的矛盾迅速暴露和激化起来，酿成了一连串的混战。

这场新军阀的混战，对于《大公报》来说是一场新的考验。此时，这张资产阶级报纸完完全全处于“民间”状态：安福系倒台后，吴鼎昌已是多年的在野之身，与新的政治关系还没有挂上钩；胡政之虽然与东北军有联系，但张学良到底是长期归蒋，还是要另起炉灶，尚不得而知；张季鸾同西北军关系较深，但他又结识了蒋介石，而蒋又处处以“正统”形象出现——关系深的非“正统”，“正统”的关系尚不深；此外，吴、胡、张三人都与阎锡山没有什么交情，但大公报馆地处阎所管辖的天津；再说，蒋、冯、阎、桂的角逐，最终谁胜谁负，还是个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报纸的新闻与言论更加需要报馆主持人、尤其是笔政主持人的独立思考精神和灵活变通能力。综观《大公报》在新军阀混战时期发表的消息、

通讯和社评，其言论立场既有为使民众免除痛苦而反对战乱的一面，也有为使自身免受迫害而敷衍局面的一面，更有为使国家免遭分裂而拥护正统的一面。

“蒋桂战争”是新军阀混战的开始。战争正式爆发前，蒋介石与李宗仁为争夺湖南，发生了所谓“湘案”。《大公报》于1929年3月18日发表社评《湖南善后问题》，称蒋介石为“党国当局”，为中央。由于蒋介石采取武力和收买两手，桂系的何健、李明瑞及武汉驻军要员纷纷倒戈，蒋介石“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大公报》于4月6日发表社评《武汉收复与永久和平》，提出了摧毁军阀政治以维护永久和平的命题，但是未将蒋介石派系纳入军阀之列，而作为“政府”对待。当日要闻版，头条专电称桂系为叛逆，李宗仁为“阀魁”，而称蒋系为“党国”，蒋介石为“主帅”，态度立场十分鲜明。

由于阎锡山从中动作，“蒋冯战争”很快以蒋介石的胜利、冯玉祥的失败而告结束。1929年12月26日，《大公报》发表题为《未来军事善后如何》的社评，完全站在南京政府方面讲话，并向政府和民众各提出一点建议。第一，“克望政府当局，不惟注意战时，并须预计善后，对于扩张军队编制事，迅速截止”。第二，“愿诉诸全国舆论，凡国民各界，应以种种有形无形之方法，援助态度坚决、行动一贯、有爱国诚意之人，而反对投机取巧言行矛盾之分子”。“投机取巧”和“言行矛盾”的人，显然是指阎锡山和冯玉祥。

1930年一开春，中原大地就充满了火药味，更大规模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战争正式爆发前，《大公报》发表一系列的文章，讨伐军阀政治，尤其是3月11日的社评《军国下之呻吟》更对军阀政治罪恶批判得痛快淋漓：“中国现状，事实上军国也，非民国也。国家一切收入，用于军队，一切权力，握于军队。”并且“有若干之人者，以军队为资本，以政局做交易，翻云覆雨，玩弄其间，朝秦暮楚，莫知究竟，于是政局常不定，战乱常不息。四万万人民所托命之国家，竟陷于潮流汹涌之中，潮之所趋，一切随

之。国民毫不能自主，全国百业之人，只是日瞻军人颜色，窥其喜怒，察其动静，研究其言论，揣度其行为，以卜国家地方一时之安危。”4月初，阎、冯、李通电讨蒋，4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时局揭幕后的不明点》，完全站在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立场上质问阎、冯、李、白。后来由于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市长张荫梧的警告，说《大公报》接受了蒋之贿赂，言论记载均偏袒蒋介石，才有所收敛。《大公报》于25日专门发表社评《诉之公众》，重申“四不”办报方针。因报馆地处阎锡山的管辖范围，《大公报》从此减少了南京方面的新闻，增加了关于阎、冯活动的报道。从数量上看，《大公报》对于反蒋活动的报道虽然有所增加，但就语气而言，基本上是些应付之作。

1930年9月18日，东北张学良通电拥蒋，表示“一切静候中央措置”。旋兵分三路入关，21日占领天津，26日占领北平，中原大战急转直下，蒋介石在混战中以胜利告终。10月3日，蒋电请南京政府遵循古训“以德服人”，大赦政治犯、军事犯。《大公报》随即响应，于6日发表题为《论以德服人》的社评，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诉说衷肠，并贡献一套治国之策。

总之，续刊后的《大公报》在政治旋涡中一方面灵活应对，巧妙周旋，较好地处理了各种难题，为日后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同时，拥护正统的态度和钟情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也逐渐明确，奠定了往后记事立言的准则。

二、在抗日救亡中“明耻教战”

就在《大公报》努力应付于国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之时，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日本侵华野心的大暴露，也是对《大公报》的一次更加严峻的考验。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都曾是留日学生，与日本各界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对日本人民是有感情的；但日本军阀以侵华为既定方针，从20年代后期以来，蓄意制造一连串的侵略事件，为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这是《大公

报》面临的一对矛盾。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为了自身的利益，势必要站到抗日救亡的阵线上来；但他们心目中的“正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在“九一八”事变后坚持“不抵抗主义”，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是《大公报》面临的又一对矛盾。在这两对矛盾中，《大公报》将何以自处？通过这一时期《大公报》上发表的消息、通讯和社评，可以明确看出，《大公报》用以指导其新闻与言论的主题思想应该概括为三句话：宣传“救亡图存”，主张“明耻教战”，谴责“上层误国”。

（一）积极宣传救亡图存

所谓“救亡图存”，是指《大公报》在外族侵略者面前主张积极抵抗，主张誓守疆土。早在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事变”时，《大公报》就多次发表社评提出强烈抗议。“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各报对所谓“满蒙政策”甚为拥护，鼓吹向朝鲜增兵。《大公报》于1931年7月1日发表社评认为，这些动向表明日本政府的“举止有异于前”，提请政府和国人注意。次日，“万宝山事件”发生，《大公报》于5日发表社评《万宝山事件之严重化》，指出日本外相币喜重郎为了迎合一部分激进政客之心理而“行动脱线”了。事态发展到日阀策动朝鲜暴动，大肆杀戮华侨。《大公报》于8日发表社评《朝鲜之暴动惨案》，就此事向日方提出抗议。9月，“中村事件”发生了，《大公报》于10日发表社评《中村事件》，质向日方：“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日方不待华方正式调查答复，已盛传用兵之声……是岂非恃强凌弱，逸失国际常轨者乎？”这些表明，《大公报》对日阀的侵略阴谋是早有警惕的，并且尽到报纸的责任，及时提请政府和人民注意，不可掉以轻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政之正在北平。他于19日晨到协和医院访问正在那里休养的张学良。胡政之是事变发生后第一个见到张学良的新闻记者。20日，《大公报》要闻版在《本报记者谒张谈话》的标题下发表了张的谈话，并于同日刊登了张学良的19日通电：“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

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正式揭出了东北军事当局对事变的态度。9月23日，《大公报》要闻版头条报道了蒋介石的演说：“暂忍痛含愤待国际公理判断，如至最后地步已有最后决心”，从而揭出中国最高当局的态度：暂不抵抗，诉诸国联。

然而，国联出面劝告日本退兵，日本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攻占吉林。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发表题为《国联发言后辽吉被占事件》的社评，对蒋介石的“暂不抵抗，诉诸国联”的方针提出异议。文章在嘲笑了国联的无能、公约的儿戏、日本的无赖后，重点论述了中国所应抱持的态度：“夫养兵百余万，而外患之来，专以不抵抗为标榜，世界自有历史以来，应断无如此无耻之国民。且不抵抗云云，究以何时为止，限度如何？充不抵抗主义之解释，凡日军所到，即我国所失，是最后只有双手奉送全国而后已。”文章接着向政府进言三点：“其一，应向全世界明白宣言，中国有自卫其领土之决心，倘此外任何地点再受侵犯，当取自卫手段……其二，对世界宣言，在日本不回复中国领土之完整，使辽吉两省行政机构得以自由行使以前，两国政府无从开始交涉。其三，如果日本能即时回复到条约所许之原态，则中国中央政府有与商量解决东北中日间种种悬案之准备，至于关于本案直接、间接之种种损失，当然保留其要求赔偿之权。”文章最后说：“吾人之意，请国联主持正义，应为国联一分子正当要求，同时对于国家领土之保持，权利之恢复，应有最后之决心，必要之准备。”^①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公报》对那些有民族气节、英勇抗战的民族英雄予以高度赞扬，对他们的抗战事迹大力宣传。1931年11月，日军向黑龙江进犯时，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奋起抵抗，重创日军。11月19日，《大公报》以《最后消息》为题予以报道，并发表社评《马占山教忠》，对马给予了崇高评价：“夫忠节之义，为任何时代政体下立国图存之所必需，不守此义，民族必衰以亡。中国之坐受凌辱，使国

^① 载《大公报》，1931-09-24。

家人格横遭蹂躏者，在忠节之大义不彰，故人得玩弄轻视之，尚不全因国力之弱……若中国忠节之大义，由此复兴……四万万人皆能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则中国必有大兴之日！”相反，对于那些民族败类、汉奸国贼，《大公报》则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的过程中，大肆网罗汉奸，拼凑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伪政权出台前，《大公报》就曾于1932年1月19日发表社评，对溥仪等人进行警告：“今日者，论三省为存亡歧路，论个人则人禽关头！”如果出卖良心，出卖民族利益，便禽兽不如，“一朝受污，万代唾骂”！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3月8日，溥仪在日军的扶持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大公报》当日又发表社评指出，溥仪为了一己一家之私利，“扭扭怩怩匍匐于日本军人之剑下，求帝不成，退而就一执政，岂以亡一大清帝国不足，更愿作双料亡国之元首”，“甚矣其愚也”！

（二）坚决主张“明耻教战”

所谓“明耻教战”，是《大公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方针，即真切了解国家之环境，弄清国耻之由来，实际研究雪耻之方案，坚决立下雪耻之大志，并以卧薪尝胆之精神，发愤图强，最终将敌人驱逐出去。《大公报》是一份负责任的严肃报纸，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是三位负责的爱国报人，无论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还是从他们自身阶级利益出发，他们都力主抗战，力主救亡。然而面临的敌人相当强大，其势正涵。而中国呢？虚弱到了极点。连年军阀混战，国力、民力、财力丧失殆尽；加上水旱灾害肆虐，全国饿殍遍地，死气袭人，人民求生存尚不可得，哪来的力量抵抗强敌？且全国上下，一盘散沙，有钱阶层醉生梦死，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大公报》在题为《本报救灾日之辞》（1931年9月1日）的社评中指出：“全国社会，彻上彻下，自利自私。昔庚子之变，联军入北京，而上海依然笙歌彻夜，论者耻之，然近日亦夫如是。当江淮大灾，数千万同胞无食无家之时，而上海北平之跳舞场，红灯绿酒，拥抱为欢，听爵士乐，作狐步舞者，亦固皆中国人也。”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大公报》

在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中更明确地请求国人记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夙无国防布置，东北素鲜自卫组织”。因此，《大公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很希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次在社评中诉诸日本有识之士，希望他们以中日两国友谊为重，劝说日阀停止侵华战争，同时劝告本国国人以静制动，勿感情用事。“中村事件”发生后，《大公报》在发表于1931年9月10日的社评《中村事件》中说道：“夫中国于此天灾兵祸惨极人寰之时，凡我官民尤应隐忍自重，共支危局”，希望“全国一致，彻上彻下，永持忍辱负重的精神，从各方面积极地为增高国力而奋斗是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公报》9月21日的社评《救灾救国》更是系统地论述了其“挽救国难之道”。归纳起来，这“挽救国难之道”的主要内容是：在物质势力暂时不足御侮的情况下，应以精神势力为第一义，全国上下，忍辱奋发，众志成城，百折不挠，化悲痛为力量，沉着顽强，勤俭建国，以图他年之伸。简言之，就是要为御辱而忍辱，为雪耻而明耻。

1931年9月28日，南京发生学生攒殴外长事件，表明全国民气激昂达于顶点。平、津、沪各地都有不少报纸积极支持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的行动，有的报纸甚至主张立即对日宣战。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大公报》该怎么办呢？据一些《大公报》老人回忆，10月上旬的一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了编辑会议，经过研究，确定了“明耻教战”为今后挽救国难的宣传方针。并以《明耻教战》为题发表社评，正式揭载了这一方针。文章在赞扬了青年学生因辽吉事变而群情激愤，“蜂起组织”，甚至停课以就“兵操”的壮烈气概后，进而言道：“尤有一重要工作，谓宜全国上下，彻底明夫国耻之由来，真切了解国家之环境，实际研讨雪耻之方案。易言之，昔人所谓明耻教战者，今则明耻更较教战为尤亟。”接下来，文章历数了“自前清海通以还，门户洞开，迭遭外侮”的事实，并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果真奋发，岂少机会？乃一人民国，国耻愈多，兴奋一时，酣嬉永岁……究其原因，实由国人知耻不深，觉

悟不诚。”因此认为：“盖宜唤起其知耻之念，较之青年之军事训练，尤为急迫之需要……盖能知新旧国家耻辱之症结，洞察夫今昔彼长我短之所在，即可立雪耻之大志，定应敌之方策。”^①

1931年11月8日，日本方面唆使便衣队从事捣乱的“天津事变”发生。《大公报》毅然搬出日租界后，仍然坚持宣传“明耻更较教战为尤亟”的观点。国际联盟曾于10月24日通过决议，督促日本从中国撤兵。然而日本军调置若罔闻，侵略愈加扩大，而国联反而转向退缩，仅以派遣调查团敷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在11月22日的社评《国家真到了严重关头》中仍然说：“在今日而号召宣战，却适中日阉之陷阱……为自卫计，须普遍地唤起人民之觉悟与认识，痛念祖国时时可陷于危亡，加紧的由军事上、财政上、工业上准备守势国防，同时求友于世界。”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反对“一战”以求痛快，主张普遍唤起人民的觉悟，加紧国防建设以求自卫。这篇社评发表后，引起读者的不满，纷纷投函抗议和辩论。读者赵默佑来长函一篇，向《大公报》主笔先生谈了五点问题：一、批驳“不抵抗主义”；二、认为中国对日本迟早必战，应早下决心；三、说“战乃图存，不战必亡”；四、指明勿以“国宝偏论”麻痹青年；五、提出勿以“危邦弱国之外交”论鼓动政府一味哀求国联。11月26日，《大公报》在第4版全文刊载了赵函，并就此发表了题为《转祸为福在共同努力》的社评，借回答赵函之机申论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由，提出了“备战”的途径和应付当前紧要局势的态度。文章首先说：“吾人愿全国亲爱同胞注意者，此‘一战’二字之观念，须亟纠正。现代战争，其发动为全国之动员，其目的为最后之胜利。故一宣战，须战之最后，须决心战一二年或数年。‘一战’二字不能适用。如此大战，当然须准备。既未准备于事前，当然亟须准备于事发之后。吾人前论谓今日不可宣战者，指此而言也。”据此，文章接着说到“备战”：“然则备战之道若何？曰：第一在消除内忧，唤起民众。”文章最后谈到应付当前紧要局

^① 载《大公报》，1931-10-07。

势的态度：“中国必由自卫中求出路，能自卫而后能得兴国，而后能求胜利。然同时自卫之实行，则不能不出于整个的政略，知彼知己知世界，军事战与外交战，须同发挥最大效能，缓急进退之间，皆以军事的原则支配之，然后能持久，能转危为安。”这篇出自张季鸾之手的社评写得言辞恳切，语重心长，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全文观点除了个别地方有明显的“排共”提法外，都是言之成理的。

为了“明耻教战”宣传的需要，张季鸾、胡政之还采取了相应举措，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其一，指派汪松年、王芸生负责编纂甲午以来日本侵华史和中国对日屈辱史，让民众从近代史上了解外侮之由来，即使国人“明耻”。这项工作的直接成果便是王芸生独立完成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该文从1932年1月11日起在《大公报》第3版“本报特辑”专栏连载，后结集出版。张季鸾在出版序言中写道：“撰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欲使本报读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

其二，从1931年12月4日至9日，每天在第2版、第3版刊登熊佛西撰写的剧本《卧薪尝胆》。将本应在副刊连载的剧本提到社评版、要闻版发表，其用心不谓不明。

其三，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主编增辟的《军事周刊》，专门刊登军事知识，以向国民“教战”。

通过社评的多次申述，通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文章的作用与影响，张季鸾、胡政之的良苦用心，《大公报》主张“明耻教战”的“救国之道”、“自卫之策”才慢慢为人民群众所理解。虽然在当时群情激昂的氛围中，《大公报》的这一主张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大公报》“明耻教战”论中不宜过早宣战、应全力以赴备战的“缓抗”主张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中心思想是“攘外必先安内”，“共匪未灭，何言抗日”。《大公报》的“缓抗”则是根据中日两国实力悬殊太大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其中心思想是忍辱发

愤，建国图强，尔后宣战，战则到底。从根本上讲，《大公报》的抗战之策乃是句践御侮之策。由于“明耻教战”是《大公报》这一时期在对待外患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所以了解这一提法的内涵，对于理解这一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与言论是必需的。

（三）强烈谴责“上层误国”

日本侵略者刚占东三省，又来攻我上海滩。1932年一开年，日本侵略者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英勇奋起抗战，在中国军队抗击外敌侵略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章。然而，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却与此相反，“九一八”之后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后来又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在全国抗日救亡怒潮的冲击下和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告下野。“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发表要与“暴日相周旋”的通电后，重新上台。蒋介石上台后，一方面抵抗，一方面与日交涉，淞沪停战后，蒋介石又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国策”，致使日军气焰日渐嚣张。《大公报》一方面鼓励军民“死里求生”，一方面谴责当局“上层误国”。

日军袭击上海，再次暴露了它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欲壑难填，它不以占领东三省为满足，它要将整个中国据为己有；再者，“九一八”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国际联盟在法西斯面前软弱无力，既不能主持正义，又不能使侵略者撤兵，因此，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里求生”！1932年2月1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全国同胞只有一条路》的社评，分析了这种严峻的形势：“时至今日，已无所谓局部问题之解决。我全国同胞从此只有一条——死里求生！”在此后的整整两个月时间里，《大公报》要闻版几乎全部是关于淞沪抗战的专电，同时还配发多篇社评、短评，对抗敌英雄予以高度评价。

“淞沪抗战”以中日签订可耻的“淞沪协定”而告一段落。对此，《大公报》十分恼火。协定签字的隔天，发长篇社评《愿全体国人清夜自问》称：“何以四万万之国，竟成一等弱国？30年来志

士仁人，倡导革命，然革命何以无成？半个世纪以来，渐行欧化，然何以得其粗而遗其精，师其恶而弃其善？何以产生东方伟大文明之宗帮，而其后裔卑俗不肖至此？政府对自己的致命症，何以熟视无睹？”最后归纳说：“夫中国应自问自责之点甚多，要之，可得一个总的答案曰：皆少数上层社会之罪。”^①《大公报》的矛头所向是准确的。

“淞沪协定”墨迹未干，日寇又犯我山海关。中国军队英勇还击，但是由于当局继续坚持“不抵抗主义”，致使前方战事失利。1933年元旦，《大公报》在《迎民国二十二年元旦》的社评中，对误战误国的当局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吾人只责问中央当局及北方地方当局，是如何抗战？其他各方当局是如何接济？”“只责问中央当局及地方当局，究竟贪官污吏，办了几人？私人亲戚，换了几个？苛税恶捐，裁了几种？地方土匪，肃清了几处？剿匪善后，办了几事？党部整理了若干？工潮减了几何？交通便利了几许？”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破榆城并占领山海关。《大公报》于1月6日发表慷慨激扬的社评，敦促政府表示最后决心，“存亡已迫眉睫，责任必须自负！”1月23日、24日连续发表社评，督促政府赶紧考虑长城抗战的第二步计划，但政府置若罔闻。2月下旬，热河战起，张学良以无准备之师仓促应战，南京政府不予支持，战争一败涂地。《大公报》3月5日发表题为《当局误国至何地步！》的社评，指着南京政府的鼻子责问道：“热河发动一星期，而承德失守，此暴露军事腐败至何种程度，不得委责于国力问题。”长城抗战以《塘沽协定》的签字告一段落。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即6月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中日停战协定痛言》，对此丧权辱国的协定表示了极度不满，号召国民认识丧权辱国之由来，奋发图强，洗涤国耻！

（四）发表范长江的“西北通讯”

《塘沽协定》的条款并没有填满日寇的欲壑，从1935年5月起，又在华北挑起了一连串的事端，到12月完全控制我华北，史

^① 载《大公报》，1932-05-07。

称“华北事变”。由于客观原因,《大公报》对整个“华北事变”采取了淡化的处理方式,而不惜篇幅刊登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1933年起先后为天津各报撰稿,1935年5月与《大公报》约定,以该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到川南、西北旅行采访,1936年春被任命为特派员,6月回上海正式进大公报馆,升为通信科主任,抗战爆发后,任通勤科主任,负责战地采访。1938年10月离开《大公报》。

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采访从1935年5月开始到1936年6月,总共13个月。从塘沽到川南是序幕,从成都到包头是正戏,序幕和正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整个采访过程中,范长江把考察得到的材料写成“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从1935年5月10日起,《大公报》在第10版刊登署名“长江”的旅行通讯。是日的《编者按》说:“长江君由津赴川南旅行,与本报约定沿途撰写通讯,寄本报发表,自本日起继续刊登。”

范长江从天津到成都的旅行采访过程中,在《大公报》上共发表21篇通讯。这21篇通讯主要是反映“正沉沦于破落与痛苦的阶段”的“现实的中国”,到处充满“无限的痛苦与辛酸”。

范长江的西北采访路线很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兰之行。1935年7月14日从成都出发,经江油、平武、松潘、南坪、西固、岷县、洮州、拉卜楞(夏河)、临夏各地,9月2日到达兰州,历时50天。第一阶段,范长江在报纸上发表《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两篇通讯。前一篇刊登在1935年9月13日《大公报》第3版,这篇通讯首次以比较客观的立场,对红军长征的过程和今后动向作了记叙和推断。《成兰纪行》为一组通讯,共18篇,发表在1935年9月20日至11月2日的天津《大公报》。这组通讯记叙了从成都到兰州的沿途见闻,报道了在反动统治下当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悲惨遭遇。

第二阶段:陕甘穿梭。1935年9月下旬到12月中旬,范长江从兰州到西安,或经平凉、庆阳,或经天水,往来穿梭两个来回。第二阶段,范长江共写通讯11篇:

- (1) 《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9月30日写于平凉。
- (2) 《长安之警》，11月2日写于（彬）州。
- (3) 《红军之分裂》，11月5日写于庆阳。
- (4) 《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11月6日写于庆阳。
- (5) 《陕北共魁刘志丹的生平》，11月8日写于庆阳。
- (6) 《陕北甘东边境上》，11月9日写于庆阳。
- (7) 《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11月13日写于平凉。
- (8) 《松潘战争之前后》，12月10日写于天水。
- (9) 《对于西南公路之观感》，12月15日写于兰州。
- (10) 《兰州印象记》，12月16日写于兰州。
- (11) 《渭水上游——空中观察陕甘地区》，12月16日写于兰州。

这一阶段，范长江的采访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追逐长征中的红军。所写的11篇通讯中，专门直接写红军的有6篇，从篇数讲占55%；11篇通讯共3万字，直接描写红军的共2.2万字，从篇幅讲占73%。

第三阶段：翻越祁连山。12月17日从兰州出发到西宁，越祁连，走酒泉，出嘉峪，至敦煌，又过张掖，走武威，3月11日返回兰州，历时3个月。第三阶段写了三篇“本报特派员西北观察记”：《伟大的青海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支撑点》，《弱水三千之“河西”》，《祁连山南的旅行》。后来，范长江到了包头，又将这时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了长篇通讯《祁连山北的旅行》。

第四阶段：纵横贺兰山。1936年4月20日离开兰州，纵横贺兰山，5月31日到达西北旅行的最后一站——包头。6月初到归绥，随即回天津，到上海，6月19日完成西北采访的最后一篇通讯《贺兰山的四边》。该篇通讯共9节，记述从兰州到包头的见闻，《大公报》到7月31日连载毕。

范长江的西北采访一结束，《大公报》出版部就将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成兰纪行》、《祁连山南北的旅行》、《贺兰山的四边》等通讯编辑成集，附上地图，插入照片，以《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发行，

连续重印，十分畅销。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节 后期新记《大公报》的副刊与专刊

一、何心冷与《小公园》

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的第一天，该报便在第8版上半版创设综合性文艺副刊《艺林》，由何心冷主编。在《艺林》第1期上，刊登了何心冷撰写的文章《我们说些什么》，谈到《艺林》的内容，何心冷说：“除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有趣味的诗词、笔记、戏剧、电影的评论、奇奇怪怪的消息外，还加些流行的时装，或是社会写真……国家大事固然要说，就是里巷间的歪事，免不了要说上几句，这么着，读者看了既觉得报纸的确和自身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说的也觉得有些意思，不至于白费了。”一个月后，应读者的要求，《艺林》的篇幅由半版扩展为一整版。

1927年3月7日，另一个综合性副刊《铜锣》在第8版创刊，亦由何心冷主编，《艺林》则移至第5版。在《铜锣》的第1期上，何心冷撰写的《第一下》说：“大家打盹的打盹，睡觉的睡觉，木铎声音太低，惊不醒他们，我们只好在他们耳朵旁边打铜锣，难道还能装睡？”意即希望读者大众不要对国事麻木不仁。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一周年之际，《艺林》改称《副刊一》，《铜锣》改称《副刊二》，仍皆由何心冷主持。同时，两个副刊的内容作了适当的分工：《副刊一》偏重文艺性，专载含有意味之小说、诗文，还另辟《谈话室》专栏，刊载隽永的小品文字；《副刊二》偏重综合性，开辟各种专栏近10个，专载含有新闻趣味之稿件。

1928年元旦，何心冷将原《副刊一》、《副刊二》合并创办《小公园》。《小公园》是新记《大公报》连续出版时间最长、在读者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综合性文艺副刊。在第1号上，何心冷以“园丁”为笔名发表题为《我们的公园》的文章说：“我们的公园，没

有杰阁崇楼，只有几间茅屋。没有嶙峋怪石，只有几块破砖。没有飞瀑流水，只有一湾活水。没有珍禽异兽，只有在天空里飞翔着的鸟儿。大人先生们有的是大厦高堂，一瞧见这园门以内一片茂草，早就不屑一顾。但是，我们本来也不敢屈驾，生怕滑滑的泥会玷污您的白底鞋，乱草里的荆棘会碰疼了您的嫩皮肉，反而弄成个恭敬不足，得罪有余。”这番话的意思旨在表明，此副刊不是面向“大人先生们”创设的。该文还说：“我们的公园，本来是为需要精神上得到安慰的人们而设的，‘门虽设而常开’，爱什么时候进来都行，只要能使大家安安静静的领略一些自然的趣味，不求其他。”该副刊直到1935年8月31日终刊，历时7年又8个月。

7年多时间内，《小公园》的主编几经变化：1931年1月5日，何心冷因要专心处理《摩登》周刊的稿件，改由徐凌霄兼编。1932年4月，何心冷又一度重接《小公园》的编辑工作，因身体不支，胡政之指派曹世瑛协助。次年2月，《小公园》完全由曹世瑛独立主持。此后不久，曹被调至《大公报》北平办事处，依次接编《小公园》的人是吴砚农、陈纪澄、冯叔鸾和萧乾。

尽管在《小公园》的发展历程中，很多人都曾贡献过自己的力量，但何心冷作为这一副刊的首任主编，其对于新记《大公报》综合性文艺副刊的开拓之功却是无人能够取代的。何心冷天资聪颖，多才多艺，是一个编辑报纸副刊的好材料。他曾经追随胡政之干过追讯社、编过杂志，都难以发挥他的才干；而编辑报纸副刊，却如鱼得水，如虎进山。他作为新记《大公报》综合性文艺副刊的创始人和开拓者，育《艺林》，敲《铜锣》，耕耘《小公园》，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副刊园地里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何心冷成了天津的名人。前天津《商报》编辑吴云心曹说：“天津市民尽有人不知道《大公报》有张季鸾，但不知何心冷者甚少。”^①

何心冷所以能在报纸副刊上做出这样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就

^① 曹世瑛：《从练习生到外勤课主任》，见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12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是他对副刊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认为，编辑副刊最重要的是要突出趣味性。在《艺林》发刊辞《我们说些什么》中，何心冷强调，本刊刊登的诗词、笔记、戏剧电影批评、奇奇怪怪的消息都要“有趣味”。后《艺林》改称《副刊一》，专载小说、诗文，何心冷更强调“体裁不论新旧，趣味务求浓郁”。《铜锣》改称《副刊二》后，虽专载具有新闻性的稿件，亦强调其趣味性。而在《小公园》创刊时，何心冷再次声明：《小公园》的稿件“第一要紧的是有趣味”。的确，打开《大公报》，看何心冷编辑的副刊，真是多姿多彩，妙趣横生。本来，趣味性是报纸副刊的基本要求，而何心冷所营造的趣味性却独具一格，与众不同。它能在轻松的趣味中，酸甜苦辣俱全，嬉笑怒骂并用，喜爱憎恶齐发。在追求趣味性方面，何心冷做出过很多有益的尝试。

首先是设立趣味性栏目。在这一点上，单看《铜锣》改《副刊二》后所设栏目，便可见一斑：“渤海波光”专载天津富有趣味性之轶闻纪事；“世界珍闻”搜集各国奇闻异事；“科学谈话”专载关于科学之小新闻；“趣话”搜集各种诙谐笑谈；“运动”记体育界之消息；“电影消息”介绍国内外的电影情况；“游艺消息”专载各学校团体游艺纪事；“戏剧”专载关于戏剧之介绍与批评。相比之下，何心冷在《小公园》上开辟的小品文栏目更有意思：“蜂尾”（1928.6）、“镰刀”（1928.7）、“仙人掌”（1928.8）、“三言两语”（1928.9）、“园丁的话”（1932.5）、“马后炮”（1932.6）、“吗啡针”（1932.7）、“冷话”（1932.8）、“闲话”（1932.9）、“发牢骚”（1932.10）等。这些栏目内，每天一则小品文，短短几句俏皮话，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他去世后徐洵在悼念文章中所讲到的：“说来我与何君是尚未见过面的朋友，可是在精神上我早已认为他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了，这不消说，因为他的‘马后炮’放得震天响，‘吗啡针’扎得痛入，‘冷话’说得俏皮，……这是这几年来读过《小公园》的人常有的同样的感触。”^①

^① 载《大公报》，1933-10-31。

其次，何心冷在设立趣味性栏目的基础上，十分注意文章本身的趣味。1928年8月1日的《小公园》上有一则“仙人掌”：

只要提到“外国人”，什么都是好的。没有知识的这样想，有知识的也这样想，所以中国人办的报上真实消息倒没有注意，而外国人的报上的谣言，却信以为真，一般民众如此，所谓官也者，也是如此。

明明是中国人，而坐的汽车硬扯上外国旗，招摇过市，自己以为是莫大的光荣似的。这种事情那天都能碰到几个。

这种观念不革除，那么你索性自己承认是个猴子，随人家的便去耍着玩吧。

这则讽刺崇洋媚外的“仙人掌”，今天读起来，仍觉有新意。其实，这种风格的文章，在何心冷主编的《小公园》上常有，这正是《小公园》能够长期受到读者关注的一个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何心冷主编的副刊的趣味性，并不是一味插科打诨的庸俗的低级趣味。孟超在谈到报纸副刊的趣味性时曾指出：“我深以为副刊应该注重趣味，同时却又感到趣味与无聊的不同。”^①曾编辑过《小公园》的陈纪滢更明确地说，《小公园》既注重文艺性，更注重综合性，既有为专门家预备的，更有为一般读者预备的，“它是大多数读者兴趣（非低级的）的所在，谁也可以看得懂，并且人人需要它”^②。这是对《小公园》的特点的概括，也是对何心冷副刊编辑特色的中肯评价。何心冷编辑副刊，文章体裁不论新旧，既讲文采，又讲趣味。旧体文章以趣味为主，或以小见大，或意在言外，每于笑谈中有发人深省的妙趣；而新体文章又多以写实和阐发义理为主，一语中的，尽情写来，使人读后自然产生某种感想。

正是在何心冷的苦心耕耘下，《小公园》在新记《大公报》的创业时期呈现出一派生意盎然的景象。不幸的是，何心冷于1933年英年早逝。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小公园》在其他几位

① 王文彬：《中国报纸的福利》，3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② 同上书，38页。

“园丁”的经营下，依然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副刊。然而到了国难深重的30年代中期，这种以趣味性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副刊就显得与时代不大合拍了；尤其是《小公园》在冯叔鸾接编后，更是每况愈下，逐渐失去了当年的活力，不仅内容较为陈旧，版面也显得呆板。面对这种情况，胡政之深感不安，他急需物色一位有才干的年轻人来接替冯叔鸾主持《小公园》。他通过杨振声、沈从文找到了萧乾。

萧乾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于1935年7月1日进入大公报馆。这时的《小公园》已成为一个以传统戏曲和旧闻掌故为主要内容的副刊，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广告，从航空彩券到火车时刻表，什么都有。萧乾感到这种现状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于是着手对《小公园》进行大规模的改版。7月4日，《小公园》的《园例》栏中刊登了一封题为《致文艺生产者》的长信。在信中，萧乾对投稿者讲明了本刊的取稿标准：“好的文章，像一切好看的艺术品一样，一看便能辨认得出。像尊名窑出的瓷器，好的文章有一种光泽；也许是思维的透彻，也许是想像力的奔放，文字间焕发着光彩。”次日，萧乾刊布了改版《计划》，告诉读者已筹备的三个专栏，即《书报简评》、《文艺新闻》和《读者与编者》。可见，萧乾改版的方向是变综合性为文艺性，他“决心要让手里这《小公园》成为千千万万个文艺青年自己的园地”^①。8月5日，萧乾又在《计划》中说，拟再开设三个专栏：《文艺通讯》、《名著介绍》、《文艺短论》。

《小公园》的改版，在社会上得到了一大批名作家的支持。诸如叶圣陶、冰心、巴金、朱光潜、李健吾等人都纷纷向《小公园》赐稿，从而使这个改版不久的副刊身价倍增。

在改版后的《小公园》中，最早开设且最为活跃的专栏是《读者与编者》。栏目开办之初，萧乾就特别强调不要让它成为编者的独白：“这是个圆桌，不是个讲台……这是个苦闷年头，谁没有一

① 萧乾：《我与大公报》，见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169页。

肚子委屈，这栏一开，我相信年轻朋友们将争先递给编辑他们的‘公开状’。”果如萧乾所料，专栏开后，读者来信十分踊跃，讨论的范围也相当广泛。萧乾则有稿必阅读，退稿必回信，以敬业的表现赢得了读者的信赖。《小公园》中另一个颇受欢迎的栏目是《书报简评》。萧乾认为，书评是当时文化界有待填补的空白：“当千万册书每天由印刷机搬到书籍市场去的时候，读者们是多么需要在购买和阅读上的指导啊……目前，买书者除听凭广告上的吹嘘和一点直觉的判断外，中国读书人几乎成为全然无助的了。”^① 设立了《书报简评》专栏后，萧乾便开始大张旗鼓地搞起“书评”来。他自己曾回忆道：“老舍的《离婚》出版后，没多久我们就评价了。尤其对外国人以中国的题材所写的书，我们一定要评论，要表示态度。像赛珍珠《流犯》(Exile)出版后，李影心立即作了评论……此外，还为曹禺的《日出》及孙毓棠的《宝马》举办过‘集体评论’。后来在上海，还连出了几个整版特辑：《作家论书评》、《读者论书评》、《出版家论书评》以至《书评家论书评》。”^②此外，《文艺新闻》主要报道国内各地的文艺活动，还聘请清华大学的毕树棠、南开大学的刘荣恩二人负责报道海外文艺新闻。而《名著介绍》则是力求引导文艺青年阅读过去的、有定评的名作，以提高其文学素养。该栏目要求学者及作家们把他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哈代、高尔基之后的心得写出来，供广大青年分享。

《小公园》的改版，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证明获得了成功。从此，这个副刊恢复了从前活跃的面貌，而且性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由过去的综合性副刊变成了一个专门性的文艺副刊。这种性质一直保持到1935年8月31日的最后一期。可以说，《小公园》作为新记《大公报》声名最著的副刊之一，其发展得益于《大公报》诸多同仁的努力，特别是何心冷，他的作用和贡献尤其值得后人缅怀。

^{①②} 萧乾：《我与大公报》，见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172页。

二、各种专业性副刊

新记《大公报》这个时期专业性副刊的发展以1928年年底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 前一阶段的专业性副刊

《白雪》是新记《大公报》的第一个专业性副刊。该副刊于1927年元旦创刊、为周刊，每逢周六出刊，由“白雪文艺协会”编辑。编者在第1期上《发刊辞》中说：“严冬的夜里，北风呼呼的刮着，洁白的雪花，纤纤下落，仿佛要遮盖这醉恶的世界。”“四五个朋友”，“生活在民不聊生的中国”，感到了“人民的悲哀”，于是做个“效颦的东施”，成立了“白雪文艺协会”，借《大公报》一块地方，办一个文学刊物，做一点于国家有利的工作。“白雪文艺协会”是几个有正义感的文学青年成立的一个临时性的小团体，其创办《白雪》周刊的宗旨是积极的，意在用文学来抨击黑暗的社会，反映民众的悲哀，同时表达他们美好的向往，希望有朝一日像“白雪”一样纯净的社会会降临人间。“白雪文艺协会”的成员多迷于编剧，因此《白雪》上发表的作品以剧本为主，体裁比较局限；加之《白雪》一般只限于发表协会成员的作品，无稿酬，所以只出36期便停刊了。《白雪》虽然出版时间不长，影响不大，但它为新记《大公报》创设专业性副刊开了先河。

1927年2月11日，第二个专业性副刊《家庭与妇女》创刊，由蒋逸霄主编。蒋于1927年初进报馆，是当时报社内惟一的一名女记者。她在该副刊第1期上发表《我们的旨趣》说：“我们觉得在现代社会中，有多数人感觉到家庭间精神上的痛苦，我们又感觉到有多数的女子太不担负家庭的责任。因此造成许多难于申诉的家庭的隐痛……我们觉得在这样枯寂的社会里，足以安慰我们的，只有美满的家庭。那么家庭中应该怎样的造成一个美满的环境呢？”《家庭与妇女》正是希望在这方面“尽一份绵薄的力量，向每个家庭贡献一些小小的意见”。这个专刊开始为半月刊，1928年1月起改为周刊，1930年9月一度停刊，1933年9月起又复刊。

《电影》是新记《大公报》创办的第三个专业性副刊，于1927

年2月15日创刊，由何心冷兼编。该副刊第1期上刊登《编者敬告读者与作者》说：“（一）我们看见天津一般社会对于电影的狂热，所以有《电影》之刊……（二）我们这小小的《电影》，是想给电影观众一些辨别电影好坏的帮助，所以希望作者多赐些不舍‘捧’的性质的稿子。”《电影》始为旬刊，9月起改为周刊。

新记《大公报》的第四个专业性副刊是《戏剧》，于1927年9月13日创刊，始为不定期刊，次年元旦改为周刊，由徐凌霄在北京把稿子编好后寄到天津刊发。

《儿童》是新记《大公报》的第五个专业副刊，于1927年11月9日创刊。该副刊第1期上刊出《起头的几句话》说：“现在的小孩子，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儿童教育，是怎样要紧的事，东西洋各国对于这个问题，是怎样的注意，又是怎样的完全。提起了我们中国，真叫人短气！叹息！”文章在列举了中国在儿童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后说：“本社几个大孩子因见到这个地方，遂大胆的、赶忙的来办这个《儿童》特刊，供给他们些校外读物。第一目的，先引起小孩子看报的兴趣。”《儿童》始为不定期刊，次年元月改为周刊。该周刊从1928年5月起由何心冷兼编，30年代初由何心冷之妻李鏊冰女士编辑，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专业性副刊之一。

1928年1月2日，《文学副刊》创刊出版。该副刊由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吴宓主编，故编辑部通讯处设于北平清华大学内，每期稿件在北平编好后再寄往报社。该副刊是新记《大公报》惟一个具有浓厚学院气息的副刊，每期一整版，多为文学界大师们的宏论。该副刊直到1934年元旦出至313期才停刊。

1928年1月6日，《大公报》又创办了《体育》周刊。该周刊第1期上发表的《本刊的旨趣》说，中国育年的体质比外国的差太多了，“外国——尤其是欧战以后，无一不极力提倡体育……我们设这个体育周刊，盼望能多少增加青年对体育的兴趣……盼望凡看大公报的诸君，都成了运动家，都养成健美的身体，都成就伟大的事业”。

1928年3月3日，《艺术周刊》创刊。该刊第1期上发表的

《本刊缘起与宗旨》说：“本刊最要紧的宗旨，是从根本上去整理，切切实实地下一番功夫去研究，把高尚的、优美的提倡起来，使一般人确实知道真善美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把卑劣的丑恶的消灭下去，不使它们遗毒社会，堕落人心，引导公众的眼光到高尚的道路上去。”《艺术周刊》由萨空了主编。萨当时正任北平《世界日报》编辑，故每期稿件亦在北平编好后寄回报社刊发。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新记《大公报》的专业性副刊已粗具规模。除《白雪》已于1927年2月19日停刊之外，其余的七个副刊，均以周刊的形式固定下来——每周固定时间，固定版面，每个副刊出版一期。顺序如次：

周一，《文学副刊》；周二，《电影》周刊；周三，《戏剧》周刊；周四，《家庭与妇女》周刊；周五，《体育》周刊；周六，《艺术周刊》；周日，《儿童》周刊。

综观新记《大公报》这一时期的专业性副刊，可以发现，无论是社内编辑的，还是约请社外人士编辑的，都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大众性与知识性。

所谓大众性，一是指读者面宽，二是指读者偏于中下层。新记《大公报》初步创设的七个专业性副刊的受众群从儿童到成年人，从男性到女性，从文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到电影爱好者、戏剧爱好者、体育爱好者等等。七个专业性副刊中，除《文学副刊》学院气比较浓、以刊登长篇大论为主外，其他的都属普及型，都是为一般读者预备的。这些副刊注重文章的短小、语言的通俗，有些如《儿童》、《家庭与妇女》简直就是口语化的文学，使文化水平很低的人也能读懂。

所谓知识性，即指内容而言，每个副刊上的文章大都是面向广大读者或特定读者传播他们所需要的、感兴趣的知识，有些文章甚至全然就是“讲义”式的：

《电影》周刊上，何心冷举办《电影常识》讲座，进行《好影片与好音乐》的讨论，建议新开影院该如何建设，并作国外影星介绍、“名作介绍”、“影评”。

《戏剧》周刊上，徐凌霄向广大戏迷介绍京剧各派特点，讲解戏剧的有关掌故与欣赏戏剧的必备知识，并刊登一些短小有趣的戏剧作品。

《家庭与妇女》的“知识性”特征更为突出。每一期上，几乎整版都是有关妇女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小常识，如“产妇的调养法”、“婚后须知”、“如何教育子女”、“煤气中毒之人工解救法”、“烹饪常识”以及“发型”、“时装”等。

《体育》周刊上也多为运动知识介绍，经常请来体育专家讲解“游泳术”、“溜冰术”、“骑车术”、“射击术”、“台球术”以及体育馆的建筑、体育设施的配备等。

应该说，新记《大公报》专业性副刊的这两个特点，其境界不算很高。在当时那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年代里，在广大劳苦大众生活困窘的岁月里，这些副刊的立足点尚没有放到引导读者关心国家危亡、关心社会进步上来，而只是局限于一般知识的传播，并且其传播对象多为处于城市中等生活水平以上的读者和家庭。譬如，在《家庭与妇女》中，时有诸如《猫狗卫生法及其疾病的治疗法》、《短毛猫之分类及其比较点》等文章，其读者对象多半就是贵妇人了。《家庭与妇女》还曾发表文章说，有知识、有能力、有精神，可以从事“妇女运动”的妇女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妇女把家庭管好就行了，教育好子女，照顾好丈夫，不让他们染上坏毛病，营造一个美满的家庭环境，就算尽到责任了。其他副刊的宗旨也基本上都是停留在“修身”、“养性”、“长知识”这样一个水平上。

虽然如此，与同时代南方一些大报的副刊比较起来，《大公报》的副刊办得还算是不错的。20年代末，上海几家大报的情况并不理想。《申报》由史量才购下后，与《新闻报》一道，靠念生意求生存、图发展，因此其副刊也完全以招徕读者、扩大销数为目的，一度成为鸳鸯蝴蝶派的领地。《时事新报》为吸引读者，甚至让一些凶杀、性爱、绑票的文字充斥版面。相比之下，《大公报》的副刊，无论是综合性的还是专业性的，起码来说是“干净”的，

是有益无害的。

新记《大公报》专业性副刊的这两个特点，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当时，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军阀政府的斗争处于最后关头，为了维系自身生存，《大公报》在正张上巧妙地送往迎来，在副刊上也只能是少谈时局，多谈生活，尽可能地开设一些离政局远一点的专业性副刊，刊登一些知识性的文章。再者，报纸刚刚续刊，经济不厚，销数不多，根基不牢，腰杆不硬，出于发展的需要，《大公报》必须尽量少惹麻烦，正张上要骂人，也只是拣“死老虎”（如吴佩孚）骂，拣那些离得远的、“吃不着我”的“老虎”（如汪精卫）骂，副刊上也只能围绕民众的生活问题打转转，这样，读者高兴，报纸也不会有什么风险。同时，作为报馆所在地和报纸主要发行地的京、津、华北，没有上海和南方地区的那种商业气，相对来说，文化氛围要浓厚一些，因此像《文学副刊》、《艺术周刊》上一些高雅的文章也有读者，而《电影》、《戏剧》则更受戏迷、影迷们的欢迎。可以认为，副刊为新记《大公报》续刊后打开局面确实出力不少。正如曹世瑛所说的：“新记大公报只用了两年时间就站稳脚跟，原因很多。它的专电、通讯、社评、标题、拼版，以及医学、戏剧、艺术、妇女、儿童等周刊，都是重要的原因，副刊《小公园》也起了重要作用。”^①

（二）后一阶段的专业性副刊

1929年元旦以后，新记《大公报》的专业性副刊有了新的发展，到1936年9月复刊10周年，这8年间，新记《大公报》又先后创办了二十多个专业性副刊：《科学周刊》、《市政周刊》、《社会研究》、《医学周刊》、《政治副刊》、《读者论坛》、《社会科学》、《现代思潮》、《世界思潮》、《社会问题》、《经济周刊》、《军事周刊》、《文艺副刊》、《明日之教育》、《乡村建设》、《图书周刊》、《史地周刊》、《艺术周刊》、《县政建设》等等。择其要者述评如下：

1. 《科学周刊》、《市政周刊》与《医学周刊》

^① 曹世瑛：《从练习生到外勤课主任》，见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128页。

这三个专业性副刊都是1929年创设的。1928年12月，东北易帜，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大公报》与其他一些资产阶级所办报刊一样，以为国家马上可以走入和平建设的轨道。“关内肃清，关外合作，全国军事似可告一段落；五院成立，训政开始，全国政治亦似可树一起点。今后内外上下，得专从事建设事业。新国家之前途，若将有无穷之希望矣。”^①故这三个专业性副刊可以视作《大公报》渴望和平建国的产物。

关于《科学周刊》。开始，《科学周刊》由清华大学教授夏坚白等人编辑，1929年1月9日创刊。第1期刊登的《发刊词》写道：“政治革命已告一段落，以后建设事业百端待举，但最重要的是增进我们国力。要不遗余力地提倡物质文明——要自己创造物质文明，就非从根本上下手，我们要提倡科学。”并引用科学家易斯笃的话为刊首语：“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是国家兴盛的灵魂，各种进展的有生命的渊源——真正领导我们前进的，只有科学和发明和应用。”因此，该周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科学的普及，《发刊词》中，编辑明确提出了“以普及科学为主”的办刊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该刊用较大篇幅开设《读者问答》和《科学小问题》两个专栏；二是注重刊登翻译的西方科学理论文章。

夏编《科学周刊》到1930年5月28日，出版第65期后，无疾而终。6月28日，吴鼎昌在南开大学演讲时说：“科学权威不振乃是我们真正的国耻，通俗的话说，‘不学无术’四个字是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入真正的耻辱”，因此，要努力提倡科学，学习科学。经过多方努力，1933年3月3日，“二二社”（国立北平研究院）和“三三社”（天津国立北洋工学院）在《大公报》上创办《科学周刊》，由雷孝实主编。雷编《科学周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国内科学家自己的实验成果的公布与交流，因而论文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对增进社会对科学的兴趣起到了较大的作用。雷编《科学周刊》于1934年9月14日出版第80期后停刊了。

^① 社译：《经济政策与建设事业》，载《大公报》，1928-09-23。

重编《科学周刊》停刊后，张季鸾十分着急。1936年上半年，张季鸾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说：“现今世界为科学世界，此无疑之理也。吾人试一考国际动态，无论为军事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无一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受科学权力之支配。眼下外族入侵，国难当头，处兹突变时代，生存竞争，至为激烈，以个人论，苟无丰富之科学知识，即不免为时代落伍者，就国家论，无发皇之科学，则不足以立国。然我国科学起步晚，现状落后；强邻发达，我则任凭宰割，至可痛心。”^①胡政之接着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他希望克服“文人不谙科学”的困难，自己动手编辑科学周刊。经过紧张筹备，《大公报》自己编辑的《科学副刊》于1936年7月1日创刊出版了。第1期刊登的《发刊旨趣》在论述创刊目的和编辑方针时说：“本刊主要目的，在灌输科学知识于一般民众，因势利导，俾养成人民崇好科学之心理，于潜移默化之中，增进国人之科学修养，以补社会教育之不足。系为大众着想，非为专家而设。”因此，自编《科学副刊》比前两个《科学周刊》更注重科学普及。

关于《市政周刊》与《医学周刊》。《市政周刊》于1929年1月12日创刊，是新记《大公报》创设的第一个直接有关建设的专门性副刊。该周刊的旨趣，一是讨论市政建设的计划，凡有利于市民、有利于国家的务竭力促其成功；一是向市民报告一切关系市政的法令规程。由于无论是南京中央政府还是各市地方政府，其精力和财力都没有用于市政建设上来，《市政周刊》关注的人不多，所起的作用也不大，创刊半年，由周刊改为《市政月刊》，不久停刊。

与《市政周刊》相反，《医学周刊》越办越火。《医学周刊》于1929年7月3日创刊，始为半月刊，4个月后即从第9期起改为周刊，直到抗战爆发，因报纸减少篇幅与其他专业性副刊一道停刊，共出版406期，是抗战前《大公报》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个专业性副刊。

《医学周刊》由丙寅医学社编辑。丙寅医学社编辑的医学副刊，

^① 载《大公报》，1936-07-01。

始而《世界日报》，后到《新中华报》，现转移到《大公报》。该《医学副刊》之所以受读者欢迎，主要有三大特点：其一，重视医学知识的普及；其二，除以主要篇幅刊登介绍医学知识的文章、报道有关医学界的新闻外，还经常发表言论；其三，充满时代气息，充满强烈的爱国感情。

2. 《摩登》周刊

长时期的战乱，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战乱和动荡中呻吟；混沌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陷于苦闷和彷徨之中，由失望发展到绝望。《大公报》敏感地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必须创办一个专刊对青年的思想加以引导。于是，1930年11月30日，《摩登》周刊创刊出版了。在第1期的《开场引子》说明了创刊宗旨：“本来，‘摩登’就是‘时髦’之谓，再说详细些是要合乎时代的潮流。”“我们这个‘摩登’周刊，并不是提倡奢华，指道青年们怎样的去享乐。不过想尽一点微薄的力量，为已经受到苦闷烦恼的青年男女寻一条正当的出路；报纸与社会息息相关，虽说专管人家的闲事，其实也是尽我们的职责。”1931年5月10日，在第23期上，有一篇《摩登字解》进一步明确地申述了这一宗旨：“本社‘摩登’栏的宗旨，是为用诚恳的态度，公开讨论现代青年个别的——也是全体的一些苦闷的问题。”

《摩登》周刊的编辑方式主要是答复青年读者的投函，回答问题的范围很广，恋爱、婚姻、家庭、择业、交友、求学、求医、生子、购物，以及寡妇改嫁、鳏夫再娶、遗产继承等等，无所不有，主要是前而6方面的问题。

对于读者提出的问题，除了主要由“记者”出面答复外，为了增强权威性，还请社会名人写文章予以回答。《摩登》共出版了42期，原文发表信函并详细予以答复的问题计266个，《简短答复》栏中所回答的问题600多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空前，摩登主持人认为，摩登青年的第一特色是应该有救国救民族的至诚，锻炼一副沉着的精神，丰富的技能，致密的知识，个个能担任一些公共的责任。并鼓励青年人抛弃一切个人烦闷，投身到救国

家、救民族的潮流中去。加上报社工作增多,《摩登》便暂行废止。

《大公报》在报纸上创设专刊,专门解答青年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开中国报纸社会服务版的先河。继《大公报》创办《摩登》周刊后,天津《益世报》、南京《大华晚报》、济南《通俗日报》、安徽《皖北日报》、上海《大美晚报》等纷纷效尤,开设社会服务版。

3. 《社会科学》、《现代思潮》和《世界思潮》

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先后开展过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的论战。《大公报》的这三个周刊就是以此为背景创办出版的。

《社会科学》于1930年6月3日创刊,为周二刊。当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进行之际,通电漫天飞,政局一片混乱。中华民国建立快20年了,但“民国”的影子何在?“宪政”的影子何在?军阀混战,战乱不断,建设失败,政治财政、民生“山穷水尽”。《社会科学》创刊词说:“我们中国现在政治基础尚未稳固,经济制度尚未建立,社会秩序尚未确立,其原因固然问题很多,然一般国人对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科学过于忽视,未能出面贡献个人对于巩固政治基础、建立经济制度及社会秩序之意见,不能不算问题中之最大者。本报同人鉴于现在的中国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应急于普及地灌输与介绍,故特创设《社会科学》副刊。”《社会科学》的基本内容是两项:一是剖析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现状,二是介绍外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

《社会科学》于1930年底停刊,共刊出61期。

《现代思潮》在1931年9月4日创刊,创刊号上刊登的《发刊词》首先总结了中国向外国学习的历史,指出其“在理论上是不成功的,因为只是整个地搬用旁人的东西”。《现代思潮》提出了学习哲学的任务,说现在是时候了,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由社会科学转向哲学——也就是思想的研究。这就是《现代思潮》创刊的动机。《现代思潮》主要是刊登介绍现代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的文章,1932年6月25日停刊,计出版40期。

这年9月3日,《大公报》又创刊了《世界思潮》,特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申府先生主编,每期分“论述”、“翻译”、“消息”、

“书评”、“通讯”5个门类。主编张申府认为，一个民族得以站起来的东西，是从外面万万介绍不进来的，必须从本民族找，必须从自己的历史上找，从自身的历史上揭示出中国民族可以自立的东西。因此，《世界思潮》一方面介绍世界主要是西方的哲学思想和流派，一方面发表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文章。

《世界思潮》于1934年12月27日停刊，共出版88期。

4. 《军事周刊》、《经济周刊》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国家遭受空前外患，《大公报》在正刊上明确提出了“明耻教战”、“强国御侮”的救国之策，副刊也紧密配合，《军事周刊》和《经济周刊》是宣传这一救国之策的举措。

《军事周刊》是约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主编的，1932年1月8日创刊。创刊号上刊登的《本刊的旨趣》首先说：“国家受了重大外患，被人占领了三省，做报人的，这时候才开始纸上谈兵，犹如亡了羊，才来议论补牢的方法，还说不到补牢，根本上是增加国耻的一件事。”接着分析了在御侮斗争中增加国民军事常识的重要性和本刊用意：“我们想借这个周刊使军界以外的各界人士，很容易的得到军事知识，感觉国防必要，好一齐努力向光明的出路迈进！”

《军事周刊》以刊登军事专家们研究军事的学术论文为主。论文涉及面很广，有战略方面的，战术方面的，有兵器研究方面的，有战时病疫防治、战地食料、防化防空知识等等；另外有一些文章介绍外国，主要是美、苏两国加强军事、国防的经验。

《军事周刊》在1933年12月30出版第89期后停刊。

《经济周刊》是约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廉博士主编的，1933年3月1日创刊。创刊号上刊登的《本刊之旨趣》写道：“我们现在不但有政治的国难，还有经济的国难。政治的国难大家都感觉到：国土给敌人强占着，人民给敌人屠杀着，国家的主权给敌人蹂躏着。但经济的国难却没有这样的为大家深切地注意到。”本刊就是通过讨论我国的经济状况，使大家感受到这一点。

《经济周刊》主要刊登三类文章：一类是经济研究论文，一类

是经济调查通讯，一类是经济书刊批评。《经济周刊》于1937年7月21日停刊，共出版227期。

DAGONGBAO BANIANSHI

第四节 吴鼎昌及其办报思想

一、吴鼎昌其人

吴鼎昌（1884—1950），字达谗，笔名前溪，祖籍浙江吴兴，188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03年吴鼎昌获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预备学堂修业，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在日留学期间，吴鼎昌领头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加入过同盟会，不久退出，一心研究经济理论，闲暇时练习书法，精于小楷。

1910年6月，吴鼎昌学成回国。是年秋，以“最优等游学毕业生”资格在京考试，得学部赏给商科进士出身。次年参加廷试，授予翰林院检讨，进北京政法学堂任教习。后经人介绍，先后出任东三省总督署度支、交涉两司顾问，本溪湖矿务局总办。1911年8月，出任大清银行总务科长、大清银行江西省分行监督。

民国后，吴鼎昌参与了中国银行筹备事务，并被任命为该行正监督，主持拟订中国银行条例，在任期间，中国银行发行了第一批钞票。因与财政总长周学熙意见不和，1913年吴鼎昌离开了中国银行。

袁世凯时代，吴鼎昌与研究系拉上了关系。熊希龄组织“人才内阁”，进步党人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推荐下，吴鼎昌出任进步党党务部财政科主任。1914年，梁启超担任币制局总裁，吴鼎昌被任命为天津造币厂厂长。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政府清理盐业银行，任吴鼎昌为该行总经理；次年，吴又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厂长。1920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吴鼎昌从此失去政治靠山。次年，他考察欧美得到启示，萌生了几家银行联合经营的念头。回国后，于1922年发起成立“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

会，吴被推举为会长。此外，他还想建设一家现代化的大饭店，以取代上海外商饭店。后来，他动用四行储蓄会的资金建成了24层高的上海国际饭店。

沉浮于财政两界的吴鼎昌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还喜欢时不时地在报刊上发表点经济方面的文章。1924年，胡政之刚刚独立经营《国闻周报》，资金短缺，几乎停刊，正巧吴鼎昌来上海扩展业务，听说此事，便慷慨解囊，每月资助400元。从此《国闻周报》上可以经常见到吴鼎昌以“前溪”为笔名撰写的文章。张季鸾初识吴鼎昌就是在国闻周报社。

吴鼎昌曾对人讲，他生平要做三件事：办一家大银行，造一座大饭店，开一家大报馆。正巧，他的两位朋友、酷爱新闻工作面又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胡政之、张季鸾1926年正在天津，并也正在为盘接《大公报》没有资金而犯愁。如前所述，对于接办《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一拍即合，吴鼎昌出资5万元，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组成新记公司，出版新记公司《大公报》，三人同心协力，使新记《大公报》很快大获成功，成为名噪一时的舆论重镇。

就在《大公报》以其强劲的势头迅猛发展之际，吴鼎昌决定辞去社长一职，商开了《大公报》。这两者看起来不可理解，实际上里面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

吴鼎昌一生倾心仕途，所以出资办报，意在为重返仕途搭桥。进入30年代后，他认为自己重返政坛的时机逐渐成熟了。一方面，《大公报》续刊几年，事业上奠定了基础，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越来越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和重视。另一方面，时局形势迅速变化，“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众抗日热情天天高涨。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吴鼎昌也被卷入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之中，他由此遇到了施展政治才干的环境。1932年4月25日，吴鼎昌到南京，采访汪精卫、蒋介石、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等政要，5月4日到上海。次日，正是中日停战协定签字的日子，妥协的“淞沪协定”引起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强烈不

满，史量才领导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活动也正火热。吴鼎昌应邀到维持会作演讲，俨然以“废止内战”运动领导人的形象出现在社会上。

吴鼎昌越来越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注意。1932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约见吴鼎昌，并进行了多次晤谈，蒋介石对吴鼎昌的许多观点很赏识。11月，吴鼎昌以金融界企业家的身份进入蒋介石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更加严重的民族矛盾，蒋介石决定亲任行政院长，组织“人才内阁”，内定吴鼎昌为实业部长。内阁之前，吴鼎昌组织了一个“赴日经济考察团”，自任团长。回国不久，便于12月12日坐上了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宝座。

抗战爆发后，吴鼎昌一度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主持京沪企业的内迁事宜。1937年11月，吴鼎昌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12月又兼任贵州省保安司令，并参加国民党。在滇为官七年，他努力发展经济，发展教育，提倡讲卫生，禁绝种植鸦片和吸毒等陋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44年，吴鼎昌奉调重庆，担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次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抗战胜利后，吴鼎昌向蒋介石出谋划策：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他又起草了给毛泽东的“寒电”。同年9月，吴鼎昌一度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1948年4月，蒋介石被“国民大会”选为总统，吴鼎昌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吴鼎昌顺势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蒋介石准备逃离大陆时，吴鼎昌背着第17号战犯的罪名逃到香港，1950年8月22日在香港病逝，终年66岁。

二、吴鼎昌的办报思想

吴鼎昌的办报合伙人、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934年

曾经说：“达铨于新闻事业，见解独卓，兴趣亦厚。”^①这就是说，作为当时财政两界风云人物的吴鼎昌，对于办报，不仅有浓厚的兴趣，出色的实绩，而且有独特、卓越的思想。

吴鼎昌卓越的办报思想的内涵有哪些？张季鸾接着说：“（达铨）以为须有独立资本，集中人才，全力以赴，方可成功。”^②在经济学家的吴鼎昌看来，报纸要办成功，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独立的资本。有了独立的资本，才有可能“集中人才，全力以赴”，否则，办一张有报格的报纸就是一句空话。他在总结了民国以来报界不振、报纸办不好的情况后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本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③所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请一位总经理和一位总编辑，每人月薪三百元，预备好这两个人三年的薪水，叫他们不兼其他职务，不拿其他的钱。”^④新记《大公报》的续刊，完全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吴鼎昌筹措5万元钱，以胡政之为总经理、张季鸾为总编辑，每人月薪300元，相约专心办报，不兼他职。1944年6月4日，吴鼎昌在重庆对《大公报》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办报是为新闻的——我们办的这张报纸是毫无目标，如果说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是为了某一派别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整体的利益而办报。”^⑤

完全可以这样说，吴鼎昌“资本独立”、“不拉政治关系”、“不兼外职”和“做人民的喉舌”等思想是新记《大公报》续刊并获得成功的思想基础。如前所述，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1926年磋商续刊《大公报》时约定的五件事，其中的一、二、四就是吴鼎昌

①② 张季鸾：《国闻周报十周年纪念感言》，载《国闻周报》，1934-12-10。

③④ 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年旧大公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44页。

⑤ 《大公报历史人物》，64页，香港，香港大公报社出版，2002。

以上思想的具体化：其一讲的是资本独立，不拉关系，不收外股；其二讲的是专心办报，不兼外职；其四讲的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的分工。其余两条是两点具体规定：其三是“大公报新记公司”的股份构成，其五是社评委员会的工作原则。据胡政之后来讲，这“五事”“差不多是我们创业时的宪法”。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宪法”，并且大家都遵守这个“宪法”，所以事业才成功，才发达。

也可以这样说，吴鼎昌的以上思想构成了新记《大公报》“四不”办报方针的核心。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续刊出版的第一天刊登的《本社同人之志趣》郑重其事地宣布，本社同仁的志趣为“四不”，并对这“四不”进行了阐述：

“第一不党。”“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而已——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可见，“不党”的核心思想是吴鼎昌“不拉政治关系”的主张；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做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不卖”的核心是资本独立，不收外股，不拉政治关系，使报纸的言论独立得以保证。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私”的核心是做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就是对问题独立思考，对事理洞悉透彻，遇事变头脑冷静，辨是非实事求是，达到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这是在前三点基础上的提升，是办报论政的最高境界。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办报方针虽然是“本社同人之志趣”，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个人共同商讨、相互补充的产物，但核心思想是吴鼎昌首先提出来的几个观点。

新记《大公报》的成功，吴鼎昌不仅贡献了资金，使报纸的盘购和出版有了资金保障，而且贡献了思想，使报纸在当时脱颖而出。

对于新记《大公报》的出版，吴鼎昌功不可没！

由地方报纸发展成全国性大报

第一节 向华中华南和西南发展

一、创业上海

在报馆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续刊后的《大公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迅速成为平、津及华北地区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

严峻的政治局势迫使《大公报》不得有丝毫的满足，必须再接再厉，更图新的发展。1935年2月，张季鸾首先向吴鼎昌、胡政之提出了创设上海馆的建议。张季鸾认为，“沈阳事变”之后，四省沦陷，日寇的侵华野心有增无减。1934年年底，

冈田内阁制定了新的侵华政策，即以扩张日本在华的经济权益为基本宗旨，以扶植地方的反国民政府势力为扩张手段。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采用经济渗透、军事压迫、政治阴谋等伎俩，张牙舞爪地正向我华北猛扑过来。平津不保已成为早晚的事，故须早作打算，以备非常。对于华北局势的发展趋向，胡政之同意张季鸾的分析，但他认为，《大公报》为北方报纸，要挤进上海滩，跟当地老牌的《申报》、《新闻报》抢码头，恐怕困难重重，很难立足。因此，胡政之的看法是，创设沪馆一事，尚须从长计议，不可轻举妄动。吴鼎昌则认为他们二人的意见都有道理，但在无绝对把握之前，暂不宜采取行动。

这是新记公司成立以来，胡、张二人之间第一次发生较大的意见分歧。张季鸾在愤懑之余，甚至想离开《大公报》另谋出路。为了让张散散心，吴鼎昌与之相约同游四川。吴先到青岛游崂山，再到上海处理有关事宜；张到汉口候吴，准备一同入川。张季鸾抵汉后，接到吴鼎昌的电报，得知他在青岛逗留时间过长，不能如期赴约，于是只好独自先行。张季鸾到重庆后，受到老友康心之的热情欢迎。互叙阔别之情后，应康之邀，张季鸾谈了他对形势的看法：日本军阀贪欲无厌，从关外向关内步步紧逼，全面抗战于近年内必将爆发，而以我国目前国力，尚不足与日阀抗衡。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首都必然会由南京西迁重庆，到那时，四川将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成为举世瞩目之所在。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能在重庆创办一张抗战的报纸，那是很能有所作为的。谈话之中，张季鸾略微透露了一些他与胡政之之间的分歧和自己的打算，希望康心之能效法吴鼎昌出资办一份《国民公报》，自任社长，他愿意西来主持笔政。对于张季鸾的提议，康心之积极响应，慷慨应允。另谋出路有了眉目，张季鸾的心情似乎好多了。在康心之的陪同下，张飞抵成都，登青城，游缙云。回到重庆后，张季鸾恰逢张学良，二人一同赴黔。在贵阳，蒋介石接见了张季鸾，并与他就时局的发展交换了看法。张季鸾结束贵阳之行后即返回重庆，然后由渝返汉。离渝时，康心之告诉张，筹办《国民公报》一事已经开始进行。

张季鸾在汉口小住两天，便乘船东下上海。在上海见到吴鼎昌后，张季鸾详叙了四川之行的经过，复又重申创办《大公报》沪馆的理由，希望吴鼎昌支持他的意见。吴鼎昌一方面惋惜没能如期游川，一方面安慰张，说张关于创办沪馆的提议是正确的，当然，至于何时着手，尚需进一步商讨。吴还说，按原计划，胡政之在5月中旬有一次日本之行，所以张须尽早返汉。于是张季鸾于5月2日回抵津沽。

再说胡政之。自从张季鸾离津入川后，他一方面忙于处理馆务，一方面思考张季鸾的建议，既认为张的说法有道理，又感到闯入上海无把握。他在上海办过《大共和日报》、办过国闻通讯社、办过《国闻周报》，其中艰辛，亦已饱尝。如果《大公报》重心南移，万一有什么不测，后果将很难设想——胡政之的心情十分矛盾。张季鸾回馆后，两人就创办沪馆事宜又一次交换了看法，但意见仍然无法统一。5月中旬，胡政之率队赴日考察，观摩日本报业的组织机构、工厂设施和经营管理。6月中旬，胡政之回国，在是否入沪的问题上仍举棋不定。

张季鸾又一次陷入烦恼之中，于是7月上旬再度离津，往西北息游。在太原，张季鸾会晤了阎锡山及政界要人，重点询问了陕北问题，后于月底返津。

吴鼎昌此时也已回到天津。8月，吴、胡、张三人就创办沪馆一事进行了多次磋商，并最终统一了意见：开设上海大公报馆，并立即着手筹建。此次意见的敲定，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客观形势急剧变化，《何梅协定》签订后，整个华北名存实亡，要在天津租界苟安，维持一张独立的民间报纸，已成为不可能；其二是吴鼎昌进入蒋介石的“人才内阁”已基本确定，《大公报》重心南移刻不容缓。

意见统一后，胡政之马上电囑驻沪办事处主任李子宽立即着手准备。1936年1月，通知驻汉特派员徐铸成东下，参与沪馆的筹备工作，并派汪松年南下接替徐铸成的职务。张季鸾则修书康心之，说明情况有所变化，不能履约出任《国民公报》总编，表示歉

意，并举荐杜协民以代。

李子宽经营《大公报》上海办事处有年，各方人事较熟，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胡政之、张季鸾认为，打进上海滩将是一场硬仗，必须全力以赴。于是他们决定除留少数人维护天津总部的日常工作外，其余人员均挥师南下。1936年2月初，胡政之、张季鸾率领大批人马抵达上海，沪馆筹建工作全面展开。

《大公报》总代办部先于2月上旬在上海福州路436号开始营业。当月下旬，《国闻周报》移沪出版。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创刊出版。

在沪版创刊号上，张季鸾发表了题为《今后之大公报》的社评。社评指出：“此次本报津沪两地同刊之计划，既非扩张事业，亦非避北就南，徒迫于时势迫切之需要，欲更沟通南北新闻，便利全国读者，而姑为此非常之一试是也……本报同人认识祖国目前之危机异常重大，忧伤在抱，刻不容纾……本报同人自惭谫陋，徒切悲悚，惟于萦心焦虑之余，以为挽回时局之道，仍在吾全国各界之智慧与决心。因而痛感只有沟通国民思想感情责任之言论界此时须善尽其使命。”文章最后申述了天津续刊时宣布的办报宗旨及对内对外的基本方针与立场。

《大公报》沪馆的全盘工作由胡政之、张季鸾亲自指挥。主要人员安排为：经理李子宽，编辑主任张琴南，要闻版编辑徐铸成、许君远，各地版编辑吴砚农，本市版编辑兼外勤课主任王文彬，副刊编辑萧乾。

张琴南、许君远20年代在北京《晨报》工作，《晨报》停刊后，到天津《庸报》，30年代，被胡政之揽入《大公报》，成为骨干。

吴砚农，早在1928年《大公报》第一次招考练习生时，就与孔昭恺、曹世英一道进入《大公报》，“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散发抗日救亡的传单被发现，为避祸事，被胡政之送到日本留学，沪馆创设后，回报馆工作。

王文彬，1935年进入天津大公报馆，接替张逊之担任平津版

编辑兼外勤课主任，遂成为骨干。

萧乾，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大公报》，成为优秀的副刊编辑。

沪版创刊后，果真如胡政之所顾虑的那样，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报纸发行头三天，全市各报摊天天无存货，但读者却纷纷来电说根本没有看到《大公报》。原来，每天发行的报纸都被“地头蛇”收去了。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好比演员登场，大幕拉开，台下全是空座，票是卖出去了，只是没有一张落到观众手里，而全被“把头”截取了。鉴于这种局面，胡政之只得大张筵席，请帮会头面人物杜月笙出面调停。席上，杜对上海几家大报的老板们说：“《大公报》已经在上海出版了，有不周之处，请各位多多包涵。”一局饭后，双方和解。《大公报》上海版发刊后，很受读者欢迎，当年底发行量就超过5万份。

沪馆创设后，津馆只有少数人坚守，许萱伯为经理，王芸生为编辑主任。1936年下半年，王芸生与张琴南对调。

从此，《大公报》在津、沪两地同时刊行，真正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报。

二、南下武汉

《大公报》所以大动干戈地创设沪馆，基本上是由日军侵华的逼迫所致。事实证明，张季鸾对于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于7月28日晚大举进攻平津，天津对外交通断绝，《大公报》天津版只能在市内发行。7月30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题为《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的社评，说明天津以外订户的报纸改寄上海版，同时指出三点，其中第二点为：“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之合法的统治同其命运，义不受非法统治之干涉。万一津市合法官厅有中断之日，则不论其为外国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非法的中国人之机关，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待国家合法的统治恢复之日，再继续出版。”也就是这一天，日军猛攻天津，中国守军奉命撤退，天津陷入敌手。《大公报》天津版

在苦苦挣扎了四天之后，于8月5日毅然停刊。

《大公报》天津版停刊后，根据胡政之的指示，编、经两部同仁中的部分员工就地遣散，少数编辑调往上海，经理许葺伯暂留天津，一方面处理遗留问题，一方面等待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日寇占领天津后，野心不减，旋又谋霸上海。1937年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战争一触即发。胡政之、张季鸾敏锐地感到“上海非可久守”，并断定“沪版必将继津版而牺牲”，于是决定立即创办《大公报》汉口版，以从事抗日救国之宣传。

8月14日，即“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的第二天，胡政之一方面电告《大公报》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曹谷冰火速赶往武汉，着手筹备汉馆事宜，一方面电告原津馆经理许葺伯率原津馆部分员工南下武汉。8月17日，张季鸾亲率编辑部的孔昭恺、经理部的李清芳等人由上海启程奔赴武汉。

张季鸾等人一路颠簸，于9月初到达武汉。张抵汉时，曹谷冰筹建汉馆之事已基本就绪。汉馆筹备如此顺利，其功劳仍在胡政之多年的经营。早在1934年张学良于武汉出任“鄂豫皖剿匪副司令”时，哈尔滨原《国际日报》流落到关内的一批报人，想在武汉创办《大光报》，负责筹备工作的是该报原经理赵惜梦。赵曾兼任过国闻通讯社哈尔滨办事处主任，算是胡政之的老部属。赵来江城办报，人生地不熟，于是求助于胡。胡政之答应帮其在关内重建基业，并派王佩之、徐铸成等人予以协助。《大光报》刊行不久，抗战爆发。赵惜梦不想支撑下去，自愿将生财房屋全部盘给《大公报》。上海抗战打响后，胡政之、张季鸾所以很快决定创设汉馆，除平津沦陷后，武汉一时成了抗战中心外，有现成的房屋设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曹谷冰到汉之前，胡政之已经从赵惜梦手中接买了《大光报》的全部资产。而在《大公报》汉馆创设后，赵惜梦则索性进该报当了一名记者，抗战期间，写下了许多优秀的战地通讯。

1937年9月18日，即“国耻”六周年纪念日，《大公报》汉口版创刊出版了。汉馆的馆址为汉口特三区湖北街宝利润里二号。创刊之初，汉馆由张季鸾主持，许葺伯任经理。次年6月，许赴港

治病，曹谷冰继任。此外，要闻版编辑为孔昭恺；编辑主任始缺，1938年1月由王芸生由上海来就任此职。

《大公报》汉口版创刊号继用天津版停刊时的编号，为“12262号”。张季鸾在当日社评《本报在汉出版的声明》中说：“我们原是天津报，从去年四月在津沪两地发行。十余年来，承全国同胞的厚爱，得以成长发达。此次平津沦陷，我们在天津停版了，接着上海战起，上海本报，也邮递困难。在这国家兴亡的关头，我们的报，竟不能与全国多数省区的读者诸君相见，这是我们同人非常惭愧的……因此我们决定一面维持沪版，一面在汉口出版，从今天起，在沪汉两地发行。汉口版的号数，是接续天津上月五日停版的号数。”^①

《大公报》汉口版的创刊，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收到了康心之、汪孝慈、于右任、冯治安、刘汝明、张伯苓等人的贺电及祝辞。于右任在祝辞中写道：“当我忠勇将士为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浴血苦战，以抗暴敌之际，诸君为国服务，于汉市分社发行新刊，坚举国作战之心，壮前方杀敌之气，至佩至佩……诸君为转战南北之论坛宿将，炳灵江汉，构成新垒，一心一德，再接再厉，必将与前方将士同时挺进，共建不世之勋业也。”^②

《大公报》汉口版从创刊到停刊历时仅一年零一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张季鸾率领全体同仁勤奋工作，使该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曹谷冰、金诚夫在写于1946年的《大公报八年来的社难》一文中曾这样说道：“汉版发刊之始，人员极少，社评仅季鸾先生一人执笔。除阐述战事性质，为争取国族生存，不断鼓舞军心民气外，余更强调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必要，长期抗战遂成国是，并有次年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之召集。迨淞沪及首都相继撤守，上海本报自动停刊，王芸生兄于二十七年春偕沪馆一部分同人经香港抵汉，汉馆人力因以充实。乃于经常业务之外，发起救济受伤将士运动，并代收捐款，随时转送红十字会应用，一面在报端披露微信。

^{①②} 载《大公报》（汉口版），1937-09-18。

是年夏，又主办《中国万岁》话剧之公演，售票所入，全部拨作救济受伤将士之需。是时本报以得社会之同情与信任，销数竟达53 000余份，创武汉报业史上发行最高之纪录。”^①

《大公报》汉口馆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就是范长江的离开。关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范长江于1937年年初采访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回来后与持拥蒋态度的总编辑发生冲突，自动离开；一种是说范长江恃才傲物，不耐烦值夜班，认为值夜班是“出卖健康”，与张季鸾起冲突，被张季鸾辞退。不论什么原因，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对于双方来说都非明智之举，都是一种损失。

三、进发香港

正当张季鸾在武汉为《大公报》继薪传火的时候，胡政之却在上海“料理毁灭的事”。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在付出了重大牺牲后奉命撤离上海，中国这个最大的城市开始了它的“孤岛”时期。12月13日，即南京沦陷当日，日本占领军通知上海租界各家中文报纸，自15日起须送小样检查。接到日寇新闻检查的通知后，胡政之心情沉痛。当晚，他把王芸生、张琴南、李子宽等主要干部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表示，宁肯停版，决不接受检查。次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两篇社评，一篇是《暂别上海读者》，另一篇为《不投降论》。在《暂别上海读者》中，王芸生总结了自日军占领上海后《大公报》刊行一个月来的原则、经过和停版的原因。《不投降论》则更是表达了大公报人对国家的诚挚情感：“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大公报》上海版停刊后的第二天，胡政之决定，工厂暂时维持；王芸生率编辑部少数同仁赴汉，充实汉口版的力量；战地采访

^① 载《大公报》（上海版），1946-07-07。

的外勤人员归汉馆指挥；其余员工除留一部分清理善后工作外，一律遣散，每人发给三个月的薪水。

国难一天天加重，报馆一个接一个毁灭。作为报社主要领导人的胡政之也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明白，无论是从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从抗战的需要出发，还是从私人利益着想，从个人安身立命的需要出发，他都必须另辟蹊径，创建新的基业。从前者说，当时《大公报》虽然有汉口版在刊行，但武汉亦非久守之地，报馆再度搬迁在所难免。面对抗战救国的大业，胡政之理应在新闻舆论战线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从后者讲，胡政之看到，是张季鸾首倡创建沪馆，及时实行《大公报》重心南移，一来避免了损失，二来争取了主动。上海战起，张季鸾又一次亲赴武汉，创建汉馆，此后还必将随国民党政府西迁而创建渝馆——在应变时势、呼救国难、追随政府而实现报社基业转移方面，虽然胡政之也是全力以赴，并在具体工作中表现出了出色的指挥才能，但是在整体战略的宏观决策上，却比张季鸾要略逊一筹。这一点，在胡政之思想上引起的反应是十分微妙而复杂的。他一方面支持张季鸾所经营的汉馆，一方面决心创建一个由自己全面主持的报馆，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新的基业建于何处？胡政之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将目光转向了华南。恰好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交通阻隔，《大公报》有一批从国外订购的卷筒白纸积压在广州、香港。于是，胡政之派张蓬舟南下香港，一方面负责卷筒纸的转运，一方面顺便了解一下香港中文报纸的发行情况。张蓬舟到港后，很快完成了胡政之交办的任务。不久，胡政之、张季鸾相继飞港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在港办报的可能性予以了论证：香港地处南疆，环境生疏，适应困难，营业上没有把握，亏损在所难免；但它属英国统治，只要英、日不宣战，香港暂时会是一块净土。斟酌再三，胡政之、张季鸾最终还是决定在香港创建《大公报》新的基业。决策之后，张蓬舟留港着手港馆的筹备工作。

根据胡政之的要求，张蓬舟首先办理了立案手续，然后租定了

馆所。但由于受到英国法律的牵绊，筹备工作进展仍较迟缓。1938年3月，胡政之率领杨历樵、李纯青等人赶赴香港，亲自领导港馆的建设。

1938年8月13日，即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大公报》香港版终于与港粤人士见面了，编号继沪版。港馆地址为香港皇后大道中33号三楼。人员设置为：胡政之主事，许萱伯任经理兼编辑主任，杨历樵任翻译主任，李纯青任日文翻译兼写社评，萧乾任副刊主编。

《大公报》香港版创刊号上发表两篇社评。一篇题为《八·一三一周年的》，另一篇是胡政之撰写的《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声明》说道：“我们是天津报。十几年来，华南同胞，本来给过我们不少援助……自今天起，我们兼发行香港版……我们此举，纯因广东地位异常重要，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华南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们便参加到粤港同业的队伍里面来，想特别对于港粤及两广各地的同胞，与南洋同胞，服务效劳，做一点言论工作。”

港馆初创，筚路蓝缕。许萱伯本是来港治病，还勉为其难，出任编、经两部要职，劳疾交加，在港版创刊仅一个半月就病逝了——报馆干部奇缺，可见一斑。为了事业发展，胡政之千方百计地网罗人才、组建队伍。他一方面从各处召回金诚夫、徐铸成、章丹枫、许君远、蒋荫恩、曹世瑛等旧部，一方面吸收李侠文、马廷栋、杨刚等新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港馆的骨干，为《大公报》在香港的早期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金诚夫和徐铸成两人回来后，一人任经理，一人任编辑主任。

虽然胡政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把港馆办成他事业的基地，众多同仁也大力协助。张季鸾每年总要住港数月，指点言论，襄赞馆务。但是《大公报》港馆的事业始终不够兴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香港是一个商业城市，在这里穿梭往来的中外人士，大都怀有商业的目的，对各种新闻，尤其是商业新闻感兴趣。这种情

形决定了《大公报》这张文人办的报纸在这样的环境中难以发挥它的优势、特别是它的社评在这里打不开局面。直到1940年1月22日,《大公报》独家登载口汪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并发表社评《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日阀的毒辣汪兆铭的万恶》之后,报纸在港的发行量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其二,香港报界情况特殊,报纸的售价和广告刊登费都很低廉。《大公报》香港版每天出两大张共8个版,后来又增出《大公报晚报》,每天午后亦出两大张。日报与晚报的零售价是港洋三仙,每月六毫,包括邮费在内,国内每月法币一元三角,国外每月港币八毫,邮费港币一元五毫。这样,发行收入既不足以抵偿出报成本,广告收入也不足以应付各项开支。因此,《大公报》在香港的营业始终亏损。

鉴于此种情况,胡政之在港期间,也不如从前那样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了。他整天泡在家里,深居简出,权力“下放”,编、经两部的工作基本交给徐铸成和金诚夫处理。为了节省开支,1940年胡政之又决定将报馆从热闹的皇后大道中搬至利源东街一幢三层的陈旧木房里。

尽管如此,胡政之创设《大公报》港馆仍不失为英明之举。可以说,港馆的创设对于《大公报》甚至对于整个中国报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在港馆的创设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可贵的队伍,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报人。其次,港馆的创设扩大了《大公报》在海外的影响,正如金诚夫在回忆中所说:“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使领馆、中华会馆和中华学校的地方,几乎没有一处不是本报港版的直接订户。这种情况,为国内任何地点办报所未有。”^①

四、四迁重庆

随着《大公报》津馆、沪馆的相继关闭,汉馆成为了该报惟一本营。然而日军的侵略仍在扩大——1938年中秋以后,日军逼

^① 载《大公报》(上海版),1946-07-07。

近武汉。武汉会战刚一打响，当局即命令在汉报刊立刻撤离。所有人心中都明白，武汉地处平原，无险可守，更兼九省通衢，给日军的进攻提供了路线上的方便，照此情形发展下去，三镇亦不免沦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大公报》汉馆对于撤离一事早有准备。1937年除夕，曹谷冰、李清芳先后奉命赴重庆筹备渝馆。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建馆事宜基本就绪。按照原计划，《大公报》将在武汉撤守前于汉、渝两地同时出版；但鉴于人力财力有限，只好从1938年9月9日起发行重庆航空版，并在重庆下城新丰街19号设立办事处，等待汉馆西迁。10月17日，《大公报》汉口版出版了最后一号，并发表社评《本报移渝出版》，宣布该报将于次日停刊，迁往重庆。

西迁工作紧张而艰难。报馆大部分设备提前装船由李清芳先行押运到宜昌，然后转运入川。10月18日，王芸生率领全馆人员乘船溯江而上。张季鸾一人于21日飞渝。曹谷冰留下处理善后，并于24日搭乘最后离汉的飞机赶往成都。

坐飞机的人比较顺利，坐船的人却遇到了大麻烦。武汉撤退时，汉渝之间的交通异常困难。装运报馆设备的船只行至宜昌时遭敌机轰炸，造成巨大损失。王芸生等人滞留宜昌，而《大公报》重庆版的创刊亦因此而延缓。后来几经周折弄到两张10月27日飞渝的机票，遂让王芸生、孔昭恺二人先行，其余人员及设备延至11月中旬才陆续抵达重庆。

《大公报》渝馆的地址为重庆下城新丰街19号，即原先的汉版航空版办事处的所在。渝馆由张季鸾主持，经理曹谷冰，总编辑王芸生——分馆有总编辑之设，始于渝馆。此外，经理部主要成员有李清芳、袁光中等；编辑部主要成员有孔昭恺、赵恩源等；外勤记者主要有徐盈、子冈等。

1938年1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创刊出版，编号继汉版。当天发表题为《本报在渝出版》的社评说：“我们的报、在津在沪，经多年经营，有相当基础；但自暴敌进攻，我们的事业财产，已大抵随国权以俱沦。所以报纸出版，实际上只有几个人，此外毫无所

有。而这些人之可能贡献国家者，只有几支笔与几条命。我们这一年多实在无成绩，但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为最有效率的使用。这种决心，以前如此，现在还是这样。我们这一群人，这几支笔，这一张纸，谨在抗战大旗之下，努力到底，以尽言论界一兵卒之任务。”

《大公报》重庆版创刊不久，正碰上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大公报馆地处新丰街闹市区，敌机投弹，首当其冲，在1939年5月3日、5月4日两次大轰炸中，损失惨重。5月3日轰炸后，《大公报》只得借用《国民公报》的编辑部办公，并在该社工厂代印报纸。5月4日照常出报，只是减少篇幅，仅出半张。当日社评《血火中奋斗》说：“我们虽遭受了损失，但在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照常出版，以表示我们不折不挠奋斗不屈的精神。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社内外朋友的救助。在烟火弥漫之中，我们的社员工友都以异常的勇敢，抢救社产，那种忠勇精神，真令人感激落泪。尤其可感的，是社外朋友更表现了‘被发缨冠’的义侠精神……血火中的奋斗，最足锻炼钢铁的意志；危难中的友情，更表现同胞爱的伟大。”5月4日，敌机又来空袭，重庆报业遭受损失者十之有九。鉴于这种情况，军事委员会下令，重庆损失最严重的十家报纸（《时事新报》、《大公报》、《新蜀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西南日报》）自5月5日起改出联合版，组织联合委员会主持其事。

8月13日，联合版停止发行，各报先后恢复单独出报，停刊已百天的《大公报》于当日复刊。停刊期间，《大公报》渝馆抓紧时间，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在近郊的李子坝建造新馆，筹备复刊事宜。其时，胡政之正在重庆，故能亲自主持新馆的筹划，使《大公报》的复刊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大公报》搬至李子坝新馆后，于1940年8月30日、9月15日又两次遭到空袭。1941年7月10日，敌机再次轰炸李子坝，报馆经理部大楼直接中弹，半遭焚毁，而编辑部大楼也因震动过猛，屋顶裂开。时逢大雨，全体员工在雨中露宿两夜，但依然利用简陋

的设备，在防空洞中坚持出报。

虽遭敌机反复轰炸，馆舍多次被毁，财产屡受损失，但一则因为重庆是抗战首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二则由于《大公报》在国内早已久负盛名，所以《大公报》重庆版一创刊，就马上获得了成功。在重庆各报当中，《大公报》的发行量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当时抗战大后方一面耀人眼目的舆论旗帜。

DAQONGBAO BAIJIANSHI

第二节 受到朝野关注的新闻与言论

一、西安事变时高唱“国家中心”论

(一) 为营救蒋介石而呼喊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骤的加快，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这段日子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时局瞬息万变。

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在全国各界产生了强烈影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深入人心。1936年6月初，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呈文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此时，国民党驻陕西“剿共”军队——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由“剿共”转变为“联共”。然而，蒋介石不顾大敌当前，仍要加紧对共产党进行军事围剿，并且于12月4日飞抵西安，亲自“督剿”，从而于1936年12月12日激起“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举国震动，局面更加复杂。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调兵遣将，以“讨逆”为名，欲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亲美派，反对以武力讨伐，主张用和平手段营救蒋介石；各地方实力派从自身利益出发，或支持张、杨抗蒋，或谴责张、杨犯上；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出于激愤，要求杀掉蒋

介石。中共中央仔细分析了这种复杂形势，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对于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大公报》的新闻与言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以恢复蒋介石的自由为“第一义”。12月14日，《大公报》关于“西安事变”的第一篇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发表，开宗明义地提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社评的执笔者张季鸾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必须拥戴领袖；而蒋介石正是经过多年风雨考验的领袖，故必须首先恢复蒋的自由。16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再论西安事变》的社评，补充前日所论而阐述了三方面的问题，其中第三点是希望各方人士发挥作用，促使变事的和平解决。然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却于当日决定推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下达了对张学良的讨伐令。17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讨伐令下之后》，一方面表示对即将发生的战事无可奈何，一方面要求张学良在这最后关头“迅速向蒋委员长陈谢，即日送其离开西安”。

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了这一时期的言论代表作《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文章首先论断张学良及东北军发动事变是“完全错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接下来颂扬蒋介石，文章说：“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的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在论及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时，文章对张、杨说：“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这篇出自张季鸾之手的社评深得宋美龄重视，指示将当日《大公报》刊登社评的第2版加印数万份，由飞机散发到西安。

在中共与国际和平势力的斡旋下，蒋介石接受了张、杨的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等八项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

京。《大公报》看到事变终得和平解决，兴奋之情，溢于言表。26日，《大公报》要闻版头条便是《蒋委员长脱险飞洛，全国民众欢跃若狂》，同日发表的社评《国民良知的大胜利》说：“这一胜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国确是统一的国民，确有领导全国的领袖，使得我全体国民无论文武，无论何种职业者，今后更增强了爱国卫国的自信，因而精神上事实上更增进了团结。”

蒋介石回南京后，自食其言，一面扣押张学良，一面以大军压迫西安。对此，《大公报》不但不责备蒋介石的寡信，反而说张学良犯了弥天大罪，理应受罚。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发表于1937年1月22日的题为《对西安负责者之最后警告》的社评中。文章以“全局关键在彼等能否自省其犯罪”等语“警告”张学良，并要求杨虎城“悔过自新”，接受政府处分。论者在斥责张、杨的同时，也不忘打共产党的板子：“最后论共党。共党于陕变有密切关系，现时更成共同负责之势，然则请觉其迷而期其悟……其不然者，无论标榜如何，政府必贯彻其十年讨伐之方针而已。”

总之，西安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将“拥蒋”的论调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其看来，蒋介石是中国不可或缺的领袖，领导全国人民救国建国运动的重任“非蒋莫属”。《大公报》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该报言论主持者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的因素，有他们鲜明的资产阶级立场的因素，有他们只重个人作用、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力量的唯心史观的因素，也有他们担心国家分裂、拥护团结抗战的爱国情感的因素。

（二）高唱“国家中心”论

《大公报》在西安事变中的言论表现进一步拉近了它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从而为稍后高唱“国家中心”论拉开了序幕。

《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是其主办者“言论报国”的办报宗旨的产物。从形式上看，“国家中心”论似乎无可指责，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必须有一个中心。问题是《大公报》长期以来把蒋介石作为“国家中心”来拥护——这是其“国家中心”论的本质所在。所以有人认为，《大公报》的“国

家中心”论的要害就是“拥蒋反共”。

事实上，《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最初并非专为对付共产党而设：考其历史，可以发现，这一论点提出于新军阀混战期间，酝酿于抗日救亡之际，形成于西安事变之后，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发展成为其拿来压制共产党服从蒋介石的“令箭”。

早在1928年9月至1930年底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大公报》就表现出了明显的正统观念，即认为蒋介石是值得拥戴的国家领袖，而桂、冯、阎则是叛逆，应加以诛讨。中原大战结束后，获得胜利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在《大公报》心目中的地位更加巩固。1931年元旦，《大公报》发表《民国二十年元旦祝辞》说：“现在负责之政府当局，既表示戡乱之能力，且现露求治之热心，过去无论已，今后已有努力进步之希望。当民国扰攘十九年之后，全国国民无论何人，应不放过此机会，应决心自此树立通常之政轨，应拥护现在已成之政治中心，而监督责备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难当头，《大公报》提出要稳定中枢，集中民意，各方协调，统一指挥，某个地区、派别和个人不应有“单独行动”。“一·二八”事变后，《大公报》呼吁，维持国家地位与民族自由，必须依赖统一的民族精神，尤其要“迅速确立军事中心”，以便全局掌握，统筹安排。《大公报》所说的“现在负责之政府当局”和“政治中心”是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说的“稳定中枢”和“确立军事中心”就是保持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稳定，要全国各种军事力量都服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军事指挥。

西安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将蒋介石抬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国家中心”论的正式提出作了牢固的铺垫。蒋介石西安生还后，《大公报》便连续发表社评，煞有介事地提出了“国家中心”论。

在1936年12月27日的社评《迎蒋委员长入京》中，《大公报》指出，检讨国家潜在的病根并加以治疗，从而“使全国在蒋先生领导之下，确实完成和平统一，这大概是今后最紧要的一件事”。

在1937年1月1日的《辞岁之辞》中，《大公报》提出，今后整个国家必须在“政府领袖领导之下，为救国工作。凡爱国人士，俱

宜奋勇参加，岂容别有号召”，而“国防及外交，则吾人以为蒋委员长执行之方针，完全适当，惟望全国同胞，无条件的信任拥护”。

1月7日的社评《国人应有坚确的信念》说：“十年以来，事宜迭乘，国难严重，幸而政府已有基础，国家已有领袖，此种局面，真不知经过多少牺牲，出过多少代价，无论如何，国民应出全力，维持此局，不容以任何理由，根本推翻。盖以国家外患之严重，与夫人民望治之切，绝对不堪再乱，更绝对不能再胜任另造领袖之负担。吾人于此，决非无条件主张维持现状，惟认为政府果有缺陷，领袖果有可议，尽可以和平方法，促进改良，不宜出以暴烈手段，一发而不可收拾。”

1月20日的社评《再度诉诸常识与良心》提醒国民三点：“第一，吾人以为中国今日只有整个的国家民族路线，而不容有其他路线……第二，既以救亡图存为亟务，则首须认清国家环境困难至此，非维持全国政治统一军事统一，绝对不足以适应方兴未艾之国难……第三，欲求国家民族之生存，必须保持统一之规模，而利用统一形态策进国力，凡在于物质心理之双方建设。”总之，路线统一，政治统一，军事统一，规模统一，形态统一，统一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领导之下。

6月11日的社评《沈钧儒等一案公判》又提出“意见统一”，说：“总之，本案在今日着重在定是非，明利害，以便促进全国之精诚团结，意见一致。”文章认为，各党派不可能是平等的联合，而都必须处于蒋介石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否则就是违反国家利益，不利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6月23日的社评《对于国事之共同认识》呼吁全国各界人士一致确立两点认识，其中第一点便是：“愿一致认识拥护国家中心组织为建国御侮之前提条件。故一切思想行动，凡增加向心力者为是，凡促进离心力者为非。”文章主张要御侮，要救国，要建国，就必须拥护蒋介石这个国家中心。至此，《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正式形成。此时距芦沟桥事变只有半个月，《大公报》便带着“国家中心”论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在八年抗战中，这个“国家

中心”论又不断有所发展。在解放战争中，它仍然顽固地发挥作用，直到蒋介石这个“国家中心”被彻底摧垮。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主张“一心抗战”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从此时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的一年多时间，为抗战的防御阶段。在此阶段，日本凭借强大的国力，继续对我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占领了我大片领土；而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奋起反击，全民族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随着形势的演变，《大公报》的新闻与言论以南京保卫战为界，前后有明显变化。南京战前，《大公报》虽也鼓励抗战，但仍对“谋求和平”抱有希望。1937年7月17日，张季鸾发表题为《对时局真相的解释》的社评，谈了对当前形势的四点看法，其中心思想便是“谋求和平”。19日、20日及21日的三篇社评《时局到最紧关头》、《我们的坚决立场》、《国民应有之觉悟》的基本论点也都是“我们政府方针是求和，不求战”，“在最后一分钟间，亦不放弃其经由正当外交机关觅求和平解决希望”。

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公报》鼓吹“谋求和平”，相较于它自身在绥远抗战时形成的“无条件抗战”论是一个倒退。在这一点上，《大公报》所奉行的“国家中心”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仍然谋求以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日本侵华问题，而《大公报》既以南京政府为“国家中心”，便因“服从国策”之故，进行“谋求和平”之宣传。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军事进攻有增无减，中国的外交运用适得其反，国际的调解效果微乎其微。日军占领上海后，随即兵分三路，会攻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宣布移都重庆。25日，德国大使陶德曼接到柏林关于调解中日战事的命令，随后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会晤。应蒋之邀，张季鸾由武汉赴南京参与商议。然而，陶德曼带来的日方条件异常苛刻，蒋介石难以接受，调解破产。德国人的这次斡旋，本来就无诚意，其作用非但未能缓

和局势，反而使和谈谣言一时大起，对中国战局影响甚坏——南京守军以为中日要和解了，心存侥幸，疏于防备，结果是南京保卫战打得一塌糊涂，军民伤亡惨重。

张季鸾于“蒋陶会谈”后赶回武汉。12月5日，即南京保卫战开始之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德国调解之声》。文章指出：“中区的立场，是从不拒绝国际调解，所以也不拒绝德国调解。但是事实上，这调解必无希望，因为日本必无诚意，现在竟悍然攻我首都，就是决不中止侵略之最大证明。中国抗战为保卫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决不为屈辱丧权的议和……全国军人一致的在蒋委员长统率之下，一心抗战，不知其他。后方大家，不要听谣传，不可乱揣测。”这篇意在辟谣的社评，提出了“一心抗战，不知其他”的重要观点，为此后的言论定下了基调。12月6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评《国家主权与国际信义》，对“国家主权”和“国际信义”都作了必要的论述。关于“国家主权”，社评说：“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拥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关于“国际信义”，社评说：“中国信守国际信义。中国是和平国家，在国际上负有种种条约上之义务，而对于这些义务，无论国步怎样艰难，一定信守不渝。”说“中苏定有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在事实上精神上，就一定遵守。无论日本如何压迫中国，中国一定不会附和日本。”最后指出：“德国有愿意出面调停之初步表示，在德国固然是好意，但我们从敌人过去的政策及现在加紧进攻的情形来看，就可判断任何调解之无望。”这是要国人对德国调停不要抱有幻想。

此时，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在武汉组织了一个“低调俱乐部”，散布“抗战必亡”的悲观论调。为了粉碎和谣，坚定广大军民的抗战信念，《大公报》于12月8日发表了由张季鸾撰写的著名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文章指出：“我们首都，已不幸在敌人围攻中……敌人所谓调解……只是庆祝胜利后的纳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统政府肯接受他占领我首都后之所谓和议……我们的境遇现在很艰难，但不可以自己更增加其艰难。敌人的进攻已经够猛烈了，不可以再加上一个‘自溃’……我们当此危急存亡之

日，请求全国军队全国各界共同维护住我卫国抗战的最高统帅部之大旗，共同拥护蒋委员长于千辛万苦之中贯彻迭经声明之国策！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我们应弥补所有政治上军事上的缺陷，大家诚意扶助领袖，在三民主义之下，不分党派，共同奋斗。”这篇文章写得很悲壮，说理透彻，对打击投降派驳斥和谣，坚持军民的抗战立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之后，《大公报》又连续发表多篇社评，不断申述其“一心抗战，不知其他”的观点：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大公报》于16日发表社评《诉诸全国军民各界》说：“凡一切有爱国意识的人们，必须知道：现时以集中全国力量，拥护政府抗战，为惟一的救国方法。”

1937年12月下旬，杭州、济南相继沦陷。《大公报》于29日发表社评《杭州济南之失陷》说：“现在事实上，是敌人赤裸裸的进行征服全中国，因此中国的决心，只有两点，受征服或抗战，这期间，绝无中间性的存在。现在问每一个中国人，一定反对受征服，那么结论只有抗战，一切悲苦，一切牺牲，须绝对豫期，不容瞻顾。”

1938年1月11日，日本举行御前会议，并于16日发表继续侵华的宣言。面对日寇的强盗行径，《大公报》于18日发表社评《东京的强暴宣言》说：“军阀日本要不战而胜中国，中国政府及国民则以武力捍卫其国家。军阀日本要以较小的军力使中国‘屈膝’，中国政府及国民全面抗战。军阀日本希望国民政府接受它的亡国条件，中国政府及国民则誓不屈服。”

3月24日，《大公报》在题为《注意人的问题》的社评中说：“这次抗战，是一个全面的持久战，绝非短时所能结束。在这全面的持久战中，最应注意的是人的问题，最要紧的也是人的问题。”以这篇社评的发表为标志，《大公报》高举起了“全面持久抗战”的旗帜，为此竭力宣传，尽声呐喊……

从2月下旬至3月中旬，庞炳勋、张自忠两部在临沂与敌血战，重创日军。《大公报》于3月19日、20日连续在要闻版的头条位置报道了“鲁南大捷”的消息，并在21日的社评《临沂之战》

中指出：“临沂之胜，是抗战开始以来可特书大书的一件事……八一二以来，无论南北战线，我们主要的念头，是坚守，是撑持……殆有不易克服的一种观念，是因火力悬殊之故，我们只能牺牲，只能拼命，不容易胜利。这些观念，到现在确实推翻了，这就是临沂胜利的最大收获。”

从3月下旬至4月上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台儿庄聚部围击日军，歼敌1.1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破除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战役打响到结束，《大公报》连篇累牍地在要闻版头条发表来自台儿庄前线的消息，并在4月8日的社评《台儿庄胜利以后》中说：“经此一战，证明我们军队，如运用好，决心坚，便充分可以战胜暴寇。”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如《大公报》预期的那样好——1938年5月徐州会战失利，广州、武汉又于10月相继沦陷，举国的悲观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亲日派重新弹起“议和”的老调。针对这种情况，《大公报》于12月2日发表了题为《抗战大局》的社评。文章指出：“谈到当前的国家大计，最不可想象的是议和……这个中华民族的死敌，与我们业已到了彼此不并存的关头！我们中国人如果不甘于子子孙孙做日寇的奴隶，便惟有忍受一切苦难，不怕一切牺牲，战下去！战下去！战下去！……我们要彻底觉悟，现在中国只有战斗求生的一条路，绝对绝对没有和平！”此后，《大公报》还于12月3日、9日、19日、23日相继发表了《国际大势》、《论吃苦战斗》（共三篇）等社评，以求“一心抗战”的观念能够深入人心。

三、相持阶段中对“卖国投降”言行的抨击

1938年10月，以广州、武汉的沦陷为界标，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侵略方针有所变化，即由过去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在新的侵华方针指导下，日本近卫内阁于1938年11月3日、12月22日连续两次发表所谓《近卫声明》，一改从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论调，公开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这一做法的直接结果，便是促成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叛国投敌。

汪精卫是一个老牌的投降派。在抗战的第一阶段中，他就极力反对对日用兵，大肆宣扬“抗战必亡”的失败主义论调。广州、武汉沦陷后，他对战争前途更加悲观失望，于是产生了投敌的念头。1938年11月，汪指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科长梅思平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楨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秘密会谈，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华协议记录》。12月18日，汪精卫率其党羽秘密离开重庆，飞往昆明，次日又潜入越南河内。按照预谋，日本近卫内阁于22日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三项原则。29日，汪精卫发出“艳电”，对日方声明表示响应，呼吁国民政府接受有关建议。至此，汪的汉奸面目暴露无遗。

汪精卫的“艳电”发出之前，《大公报》考虑到事关重大，在言论的措辞上尚持审慎态度。当得知汪潜出重庆，张季鸾虽然气愤，但因不知详情，故未发消息。直到掌握了可靠的信息后，《大公报》才于12月24日刊登了题为《汪副总裁出国，现抵河内就医》的一则新闻，并配发社评《辟近卫之谰言》说：“我们声明：中国的国策绝不动摇，暴日若不放弃其亡华霸亚的野心，我们的抗战绝不停止，近卫再有千万篇声明，只有更坚固中国的决心！”26日，蒋介石发表讲话，驳斥近卫声明。次日，《大公报》在社评《蒋委员长的重大表示》中指出：“委员长痛斥了近卫的声明，代表全中华民族揭破了敌人的野心。”

汪精卫发出“艳电”后，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次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发表题为《汪兆铭违法乱纪案》的社评，辩证地对汪精卫投敌事件进行了论述：“新年中有一极可痛面亦可喜之事，便是汪兆铭氏的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案。第一，可痛的是：在如此紧急的抗战关头，以汪氏这样有历史地位的人，竟有这样的举动，无论如何，均是极可痛惜的事……第二，可喜的是：此事是在致欲毕露、国策人心均极坚定之时爆发，不致撼

动大局。(一)中央将汪氏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处分得迅速而严明,党纪国法两俱昭然……(二)汪氏中途脱离抗战营垒,在客观上,毋宁收澄清内部之效。”

1939年3月,高宗武受汪精卫的指派在东京频繁活动,并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汪平沼协定》。《大公报》于4月5日在要闻版头条位置披露了这一消息,并发表社评《汪精卫的大阴谋》,指出:“汪氏的阴谋,既策动如此之久,且是有组织的行动,蛛丝马迹,布满沪渝,中央当早有所闻。当汪氏未离重庆之先,疏于防范,已是憾事。艳电发表之后,中央只予除籍撤职的处分,并未发动国法,对于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事至今日,中央再不容姑息,应速查明事实,发动国法,各治应待之罪。”

1939年底,汪精卫又与日本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次年初,曾作为汪精卫投敌活动主要策划人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带着《要纲》秘密来港,并将其密约全文交《大公报》发表。1940年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版在要闻版头条位置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独家新闻《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精卫卖国条件全文》。次日,《大公报》香港版又发表陶希圣撰写的《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揭露日、汪勾结内幕。同日,《大公报》重庆版发表社评《敌汪阴谋的大暴露》说:“全国同胞应该彻底明了:敌人的野心阴谋是如此的深刻狠毒……汪精卫的所谓‘和平救国’,就是整个的亡国。这完全说明了一个绝对的真理,就是:与日本军阀做对手,只有打仗,讲‘和平’就只有亡国。”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手导演下,1940年3月30日,汪记“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大公报》于当日发表题为《汪贼傀儡登场》的社评。文章说:“有人问:‘汪傀儡登场以后对抗战是否有影响呢?’我说:‘没有影响,也有影响’……怎么说没有影响呢?自从汪贼逃出抗战的营垒,发表所谓艳电,以响应近卫的亡华声明,他就失掉了中国人的立场,以后他又到上海,到东京,受敌人豢养,为敌人当特务,杀爱国同胞,更与敌寇签订亡华条约,他就已从祖国的怀抱中死去。除了与他同流合污的一群败类而外,再没

有人承认他是中国人而听他诱惑的了。在日寇的亡华企图下，汪贼不登场我们固然抗战，汪贼登场我们更要抗战，所以是丝毫没有影响……怎么说也有影响呢？的确有影响，但那是对我们有利的……可以消除日寇对国民政府的分化与诱惑……今天南京的一幕剧，毕竟是我们抗战史上的丑事。南京是我们沦陷了的首都，敌人在那里曾大举屠杀我们的同胞，仅经红十字会掩埋的尸体就有二十三万具，而我们的妇女同胞受敌人的奸淫蹂躏，更是我们的千秋万世之羞。这报仇重耻，我们还未曾报雪，而汪贼群奸竟在同胞的血尸之上，敌人的刺刀之下，扮演傀儡丑剧，真是丧尽了天良！报仇雪耻，抗敌诛奸，这责任完全负在我们全国同胞的肩上。”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承认了它一手扶植起来的汪伪政权，并公布了日汪之间签订的《日本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其《附属议定书》与《日满华共同宣言》，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彻底灭亡中国的重要步骤。《大公报》于12月1日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发表题为《斥敌伪丑剧，并勸我军民同胞》的社评。文章说道：“这是继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日汪密约，今年三月三十日的日汪傀儡登场的三部曲。至此，暴日已完成自选傀儡而自行承认的步骤，至此，暴日已充分暴露宰割中国奴役中国的毒意，其结果却是徒暴其丑而毫无收获。”社评最后以充满自信的语气指出，暴日的丑剧是其“黔驴技穷”的表现，是其“和平攻势”的失败，也正是我们中国坚决走上战以求胜之路的明证。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二节 琳琅满目的副刊与专刊

一、萧乾、杨刚与《文艺》

（一）萧乾把《文艺》引上战场

《文艺》副刊是由萧乾1935年9月1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创刊的。

萧乾自1935年7月燕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大公报馆接编副刊《小公园》。但此时的《小公园》已经大大落伍，老气横秋，仿佛“只是编给那些提笼架鸟的老头们看的”，与时代极不合拍。在胡政之的支持下，萧乾对《小公园》进行了改版，使之在内容上变得活跃了，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性质，由一个综合性副刊变为一个纯文艺性副刊，与杨振声、沈从文先生编辑的《文艺副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

于是，从9月1日起，《文艺副刊》和改版后的《小公园》合并创办《文艺》副刊，由萧乾主编，周一、三、五出版的《文艺》一般刊登一些短小的作品，开设各种专栏，保持原《小公园》的风貌；周日出版的《文艺》则主要刊登名人作品，办为特刊——如“诗歌特刊”、“艺术特刊”、“翻译特刊”、“教育特刊”等等，基本上保持原《文艺副刊》的特色。

《文艺》副刊的出版，不仅是《大公报》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当时文艺界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在萧乾的主持下，《文艺》副刊完全改变了冯叔鸾编辑的《小公园》那种老气横秋的面貌，而被赋予了较强的时代气息，不仅发表著名作家的作品，并且还刊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的处女作，因此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八一三”上海战起，《大公报》上海版压缩版面，《文艺》副刊在裁减之列。这样一来，作为该刊主编的萧乾等于丢了饭碗，于是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拿了报馆发给的三个月薪水，自谋生路去了。

萧乾离开上海，经香港、广州，于1937年9月到了武汉。此时，《大公报》汉口版已经创刊，而《战线》副刊已有陈纪滢主持。萧乾只好流浪到昆明。不久，胡政之函告萧乾，说《文艺》副刊曾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影响，许多读者要求复刊，请他在昆明遥编，在汉口版刊行。1937年10月3日，《文艺》在《大公报》汉口版恢复。汉口版上的《文艺》为周刊，至1938年3月6日为止，共出版23期。

1938年夏天，萧乾突然收到胡政之电汇来的旅费和一封信。

信中对上海遣散一事深表歉疚，并说今后再不能使同仁星散了，同时希望萧乾立即到大公报港馆重整旗鼓。于是，萧乾于8月初到了香港，参加港馆最后一个阶段的筹备工作。“八一三”，《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文艺》也随之正式复刊。

如果说《文艺》副刊在创办之初即赢得了读者的赞誉，那么，它在成为《大公报》香港版的主要副刊后，更是进入了最光辉的一个时期——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它都表现出了鲜明的进步性和战斗性。

《文艺》复刊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寻找以前的作者。萧乾在副刊上刊出题为《寻找朋友，并为〈文艺〉索文》的公开信，向过去经常为《文艺》撰稿的作家朋友发出呼唤：“两周前，我由西南一座山城来到了香港，今后，我将有一个较为固定的住址了。同时，三年来你们所爱护支持的那个刊物——《文艺》，已于八一三周年日在港版大公报上复刊了，想来必是你们所乐闻的罢……这刊物在太平年月，它载的是坚实健康作品，在战时，它自然也得积极参与全国文化的总动员，展示新的姿态……但这只是我的愿望。实现这愿望，还得靠你们和各地的朋友们。同时，我也在盼着你们的来信。”^①在这里，萧乾对《文艺》今后的发展，明确表示了两点：一是鉴于抗战的新形势，准备引导《文艺》参加全国文化抗战的行列，并在抗战宣传中展示其新的姿态；二是希望《文艺》的老作者们对此予以理解，予以支持。

最先给萧乾来信的是严文井。1938年10月12日，萧乾在《文艺》上发表了严文井的这封陕北来信。信中主要介绍了延安“鲁艺”的情况，还谈到住窑洞、吃小米的特别滋味。该信刊出后，各地作家诸如姚雪垠、吴伯箫、丁玲、刘白羽等纷纷来信，一时盛况空前。为了及时刊登来稿，萧乾在《文艺》上专辟“作家行踪”一栏，借信件报道了活跃在抗战各地的大量作家的近况，其中尤以延安作家居多。与此同时，一些流亡到大后方的作者朋友也陆续来

① 载《大公报》（香港版），1938-08-13。

信与萧乾取得了联系。《文艺》在《大公报》香港版上复刊后的第一个任务——找寻作者——顺利完成了。

萧乾同各地作家尤其是延安作家取得联系之后，为《文艺》副刊“展示新的姿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刊登这些“投笔从戎”的作家寄来的文章，是《文艺》展示的第一个新姿。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在《文艺》上发表的来自延安的作品共计44篇。这些反映延安和各根据地人民斗争生活的文艺作品，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乏上乘佳作。陆荆、陈璞、陈远高、野火等人集体创作，野火执笔的《抗大生活》（发表于1938年2月23日、24日），裴琴的《两个日本青年朋友》（发表于1939年3月20日），刘白羽的《蓝河上》（发表于1939年4月5日至7日、11日至14日、18日至19日、24日至28日、5月3日），吴伯箫的《潞安风物》（发表于1939年6月至7月），黄钢的《两个除夕》（发表于1939年8月4日），欧利文的《延安的月色》（发表于1939年8月16日），黑丁的《我怀念吕梁山》（发表于1939年8月18日）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经萧乾之手发表于《文艺》上的力作。

《大公报》香港版的《文艺》副刊所展示的第二个新姿便是创办《文艺》的综合版。关于创办综合版的原因，萧乾曾作过解释。他认为，报纸副刊的读者所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的专家肯动手写点大众化的东西，它的前途必是无限量。这实际上是要充分发挥副刊读者面广的优势，利用副刊加强对民众的引导。

《文艺》综合版于每周日刊行。在这一版上，凡是具有鼓舞抗战士气之效的文章，无论题材如何，都可以发表；而揭露日本政治的黑暗、抨击日本军阀的罪恶，更是综合版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些在当时引起过较大反响的作品，如下村千秋撰著、高行翻译的《狐狸精附了体——战时日本童工的剪影》（发表于1939年3月11日），《死亡线上战栗着的日本大学生》（发表于1939年4月1日）等，最初都是在《文艺》综合版上发表的。

总之，为了把《文艺》办成宣传抗战的阵地，萧乾苦心孤诣，义无反顾。杨刚在《重申〈文艺〉意旨》一文中曾说，《文艺》副

刊“从七七事变那天起，就披上了战袍，换上了甲冑”，在抗战这面大旗之下，“站住了它两年多以来的岗位”。这可视为对萧乾于抗战爆发后在《大公报》香港版上恢复《文艺》并使之走向抗战宣传前沿所做贡献的中肯评价。

（二）杨刚使《文艺》成为勇士

杨刚能进《大公报》并得以成为复刊后的《文艺》副刊的第二任编者，全赖萧乾的举荐。

萧乾于1939年赴英之前向胡政之推介杨刚来接替自己。开始，胡政之不同意，说杨刚是赤色分子，担心日后给报纸带来麻烦。萧乾坚持说，他与杨刚认识十年了，杨刚思想进步，爱国，笔头快，判断力强。萧乾说服胡政之同意后，便与杨刚联络。

的确，萧乾与杨刚相识已经十年了。他们二人是燕京大学的同学，1929年相识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相识后，过从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杨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性格刚烈，1932年毕业离校前与党小组长发生争执被开除党籍；1933春到上海，参加“左翼”的活动，一年后又回北平，进行文学创作，1936年起担任通俗读物编辑社创办的《大众知识》半月刊的编辑；抗战爆发后，毅然走出小家庭，于1938年到达“孤岛”上海，经组织审查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塔斯社，做英文翻译，以此安全的环境，完成党组织分配的革命工作。

杨刚接到萧乾的电报，自然高兴。她知道，《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在社会上早已美名远播；而她本人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伟大》也是在《文艺》上连载的。在请示党组织批准之后，杨刚于1939年8月下旬抵达香港，接替萧乾成为《文艺》主编。

进入《大公报》后，杨刚仔细研究了《大公报》的整体办报思路以及其副刊的一贯特色。通过分析，杨刚认为，《大公报》虽有亲蒋抑共的阶级倾向，但其鲜明的爱国主义态度和坚定的抗战立场却令人感佩，而且《文艺》在《大公报》香港版上复刊后已经表现出重大进步，成为了抗战宣传不可多得的阵地。鉴于此，杨刚决定在萧乾所做工作的基础上，把《文艺》的进步性和战斗性再向前推

进一步：

在萧乾告别后的第四天，杨刚在《文艺》上发表了《重申〈文艺〉意旨》一文，宣布了今后的编辑方针：“一切有心滚进这个大时代的人，他既肯把耳鼓贴在地层上听见战马的蹄骤，又听见了大地的暗语，就让他把这些语言有心地写出来……总之，凡可称为文章的东西，在《文艺》的哨位上应该是一位击不倒的勇士。他可以明攻，暗袭，奇劫，击中要害。《文艺》在抗战上没有躲避宣传，今天也无所谓标榜。”^①可以说，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为标志，《文艺》副刊的抗战宣传力度进一步得到强化。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文艺》在杨刚的主持下，有如一位跨上战马的勇士，驰骋于广阔的战场，洋溢着蓬勃的生机。这一时期《文艺》在抗战宣传上的具体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增加发表延安作品及敌后游击区作品，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军民的抗战业绩。据统计，《大公报》香港版的《文艺》副刊共发表延安作品118篇，其中，萧乾主持期间发表44篇，剩余74篇都是由杨刚编辑发表的。这些作品中，较为著名的有沙汀的《贺龙将军》（发表于1939年12月13日）、吴伯箫的《沁洲行》（发表于1940年2月）、庄栋的《记延安文协代表大会》（发表于1940年3月17日）、丁玲的《我是怎样来陕北的》（发表于1940年6月6日）、何其芳的《我们的历史在奔跳着》（发表于1940年11月23日）、黄钢的《刘呐鸥之路》（发表于1941年1月27日至2月7日）等。

第二，开展文艺问题的公开讨论，引导战时文艺发展的方向，同时使得《文艺》或为了战时文艺运动的前哨。1939年10月，《文艺》借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之机，在香港文艺界发起了关于“民族文艺”问题的讨论。在由《文艺》出面召集的座谈会上，众多作家踊跃发言，纷纷结合抗战的现实，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其对“民族文艺”的理解。座谈会纪要在《文艺》上发表后，引起了强

^① 载《大公报》（香港版），1939-09-01。

烈反响，“民族文艺”一时成为香港文艺界的中心议题，这对于香港文艺朝着抗日救亡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1940年10月，《文艺》又发起了一场“反对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针对当时盛行于香港文坛的萎靡之风，杨刚在《反对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1940年10月1日）一文中指出：“这类文章除了对祖国的呼唤在某方面能够引起相当的共鸣而比较有意义外，别的都可以风花雪月的自我娱乐概尽。风花雪月，怜我怜卿，正是这类文章的根底。不过改了新的样子，故统名之曰‘新式风花雪月’。”杨刚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香港文坛立即做出反应。在近三个月的讨论中，香港有10余家报纸参加，共刊载90多篇文章。很显然，这场讨论对于推动广大香港青年跳出个人感情的小圈子、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时代主潮中去，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大公报》香港版停刊。杨刚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意见，来到《大公报》桂馆，继续主持《文艺》的编辑工作。1943年10月，杨刚奉调到重庆，主编《大公报》渝、桂两地的《文艺》副刊。由于这一时期杨刚兼任外交记者，分身无术，加上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日益复杂，故《文艺》副刊较之从前，规模有所缩小，影响有所下降。

二、陈纪滢与《战线》

《战线》是新记《大公报》办得比较有生气的文艺性副刊，1937年9月18日在《大公报》汉口版上创刊，后随汉口版撤至重庆，在《大公报》重庆版上继续刊行，至1943年10月31日停刊。6年多的时间里，共出版996期。

《战线》副刊自始至终由陈纪滢主编。陈纪滢虽不是《大公报》的“专职报人”，但与《大公报》关系至深。“九一八”事变之前，陈纪滢先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后又成为该报的兼职工作人员。那时，《大公报》在东北销数达3.5万份，相当于当地一家大报的总发行量，这其中陈纪滢出力不小。东北沦陷后，他利用在邮局工作之便，为《大公报》采写了许多独家新闻。1932年秋，陈

纪澄流落天津，适逢《大公报》副刊编辑缺人，他便进馆帮忙干活。从这时起，陈纪澄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以邮政工作者的身份“客串”《大公报》记者、编辑的生涯，其间主编《战线》六年之久，成为《大公报》历史上连续主编一个副刊时间最长的人。

《大公报》汉口版创刊之时，战事频仍，故汉口版的篇幅较之天津版和上海版大为减少。虽然依旧保持副刊的版面，但毕竟由于篇幅紧张，原来天津版上的专门性副刊基本全部停办，仅出版《战线》这一个文艺副刊。谈到《战线》创刊时的情形，陈纪澄追忆道：“当本报在汉口发行时（二十六年九一八），当时的武汉报纸已受战事的影响，把篇幅由三大张缩为一大张，素被人轻视的报屁股自然在淘汰之列。固然这是一种变态，是不得已的情况……本报发刊以前，我就向馆方建议，应该有一种文艺副刊，而且为了希望多刊载一些具有战斗性的文章和吸引大部分青年作家起见，特把本刊取名《战线》。”^①

陈纪澄认为，报纸的新闻版是读者关心的所在，而副刊则是读者灵魂寄托的所在。因此他主张文艺副刊上的稿件要具有深度，要具有时代意义。并解释说，所谓时代意义，就是写实，就是反对开倒车和做出世的想像，就是作者用文艺的笔写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战线》正是他的这种办刊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对《战线》的作者们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遭受敌人摧残之时，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走出亭子间，以笔为刀枪，写出富有时代感的文艺作品，鼓励军民抗击侵略者的勇气和争取胜利的信心。在《战线》创刊号上，陈纪澄在《我们的信念和态度》一文中写道：“自从十九世纪产生了一个‘为文艺而文艺’的口号，一些从事文艺的作家们，便拿它当成金科玉律。一方面显示自己的超然，一方面又把文艺变成了特殊阶级的专利品……这种不正确的文艺观，依然跟着时代的尾巴残留着……现在我们眼巴巴地瞅着敌人的炮火摧毁我们的文化机关，灭绝我们的文化命脉，我们是不是还躲在亭子间写些丢开时

^① 陈纪澄：《迎春，并答读者、作者》，载《大公报》（重庆版），1940-01-03。

代，凭着天才幻想出来的不关痛痒的文艺作品呢？我们是不是还以特殊阶级自居而卖弄风雅呢？决不！我们不能逃避这时代，我们决不再梦呓、再幻想、再以超人自居，我们无论在前方在后方，都被反抗的战神主宰了我们的灵魂。我们每个人实际已踏进了战时的生活境域。所以我们随地都可以发现我们的文艺资料，不但可以击破患着‘色盲’症者的迷梦，而且更一步的使每个战斗员加强了反抗侵略的勇气，这是我们惟一的信念和使命！也可以说是起码的一个希望。”^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战线》的突出特色就是强烈的时代感。

《战线》的时代感，首先表现在它所发表的作品全是以抗战为题材。翻开将近一千期的《战线》，可以发现，这里的文艺作品，没有消极，没有颓废，无不是在配合正张做抗战的“打气”工作——

1937年10月底，上海抗战进入最后阶段。为掩护大部队撤离，八十八师谢晋元团奉命断后。在断壁残垣之上，八百壮士死守四行货栈，写下了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对此，《战线》大量登载文艺作品，不遗余力地进行热情的讴歌和赞美。这其中，可以被视为代表的是于11月1日发表的高兰的诗歌《向八百壮士致敬礼》：“八百壮士！你们是正义！你们是真理！你们是祖国的灵魂！你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如果说颂扬中国人民的牺牲精神是《战线》宣传的一个重点，那么揭露日本军阀的残暴行径则是另一要务。这一方面的代表作首推布德的两篇报告文学，即《第三百零三个》和《第十一及第一》。前者发表于1938年8月23日、24日，讲述了一个日本妇女被征做军妓而受尽凌辱的故事；后者发表于1939年4月17日、18日、20日，描写的是一个伪军不堪敌人的压迫而弃暗投明的经过。这些作品的刊登，对于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 载《大公报》（汉口版），1937-09-18。

《战线》的时代感还体现在作品语言的通俗化上。陈纪滢在谈到如何体现报纸副刊的时代意义时曾说：“文艺作品特别需要深入浅出。我们过去的洋化文艺作品，已经过时了，新文言体的小说也不时兴了。今后必须要趋向口语化，写大众‘喜闻乐见’而且容易懂得的文字，才能适应和领导新闻的文化运动，尤其是报纸副刊上的文字，必须这样才能夺取非文艺爱好者的读者。”^①事实上，《战线》上发表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如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特写、戏剧等，无不达到了语言通俗化的要求。为了使诸多作者明白抗战文艺通俗化的重要性，陈纪滢还数次刊发《战线》的“通俗文艺特辑”，以作示范。譬如，1939年10月2日，《战线》第382号被编为“通俗诗歌特辑”，陈纪滢在该号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很注意‘文艺通俗化’这一问题。我们曾为文提倡，也曾刊布过一些文章，但未免太少，尤其是在几个专门刊载通俗文艺刊物不能普遍地散布到前方和后方的今日，需要我们担当起这个任务。所以本刊预备今后每月至少有一两次关于这类文章特辑，盼各方好友赐稿。”这一期上，刊登了老向的“民众读物诗歌”《讨汪》以及李健章、罗四维的《抗战歌谣》等生动活泼的通俗文艺作品。

虽然为《战线》撰稿的作者很多，但陈纪滢仍然十分注意开发稿源，尤其注意向前方将士和后方支前人员约稿。《战线》创刊之初，陈纪滢就在报上发出邀请，希望那些浴血奋战的士兵和参加救护、运输、慰劳的人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希望广大无名的作家都来为抗战宣传尽心出力。在陈纪滢的努力下，《战线》周围最终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这些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尤其是西南联大和西北大学的师生。西南联大教授沈从文就是《战线》最大的稿源之一，他寄来的大批稿件，都是他的学生和朋友托付与他的。后来沈从文也亲自为

^① 转引自王文彬：《中国报纸的副刊》，37、3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战线》写些东西。

其二是战区作家和文艺青年。抗战时期，众多爱国的文化人怀着满腔激情，奔赴各战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这些人里面，相当一部分成为了《战线》的作者，其中著名的有沙汀、黎烈文、臧克家、碧野、姚雪垠、刘白羽、光未然等。

其三是重庆作家。由于《战线》随《大公报》重庆版居渝多年，本地作者更是对之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诸如臧云远、方殷、高兰、王语今、李岳南、曹靖华、阳翰笙等人都曾在《战线》上发表过大量文章。

陈纪滢认为，要使报纸的文艺副刊真正担负起领导时代文化运动的使命，除了在实践中率先垂范外，还必须在理论上予以归纳和指引。为此，《战线》经常邀集作者座谈，就“文艺为抗战服务”这一中心议题进行讨论。1939年1月，陈纪滢邀请《大公报》香港版的《文艺》副刊的部分作者以及其他文艺界朋友来《战线》作客，围绕着“目前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的问题各抒己见。同年底，《战线》又约请几位著名作家撰写论文，对抗战文艺的发展现状提出批判和反思。诸如向林冰的《再论现阶段通俗艺术的缺陷及其克服》、陈烟桥的《论现阶段的木刻与漫画》、马彦祥的《抗战戏剧发展的检讨》、潘子农的《检讨过去一年间的抗战电影》等都是这一系列文章中的代表作。

由于抗战时期纸张和印刷的困难，《大公报》重庆版的《战线》副刊在出版篇幅与发行时间上均不能固定，从而变为了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为了尽量满足作者和读者的要求，陈纪滢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用以缓解《战线》版面窄小、出无定时与稿源旺盛之间的矛盾。这些临时性的举措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是在新闻版上刊登艺术作品。一般在新闻版发表的作品都是较有分量的名家之作，如冰心的《再寄小读者》、老舍的《不成问题的问题》等。其他如茅盾、郭沫若、胡风、萧军等人也都有作品在新闻版刊载。

其二是加张出副刊。加张的条件是有足够的广告。广告多，需

要加半张时，副刊便可有一版的篇幅。当时，《大公报》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广告经常拥挤不堪，这也为《战线》的出版提供了方便。

总之，《大公报》汉口版、重庆版上的文艺副刊《战线》，在编辑陈纪滢的苦心经营下，确实成为了中国抗战全局上的一条重要“战线”，为动员全民族救亡图存发挥了重要作用。

DAGONGBAO BIANIANSHI

第四节 张季鸾和他的时事评论

一、以“文章报国”自期的一代报人

正当《大公报》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1941年9月6日，该报的三位创办人之一，总编辑张季鸾在重庆病逝，年仅54岁。

男子刚知天命，正值中寿，是激扬文字、评鹭时政的大好年华，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中国报界的一代宗师从此搁笔。张季鸾的早逝，是《大公报》的塌天之祸，也是中国报界的重大损失。

张季鸾，原籍陕西榆林，出生地山东邹平。榆林地处陕北，风俗尚武，张氏先世亦皆为武官。张季鸾的父亲张楚林，字翘轩，少时弃武从文，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考取进士，成为榆林近百年历史上的破天荒。张楚林为感刘厚基和蔡兆槐的恩德，曾在家中设立两人牌位，令子孙后代祭祀。这种报恩思想对张季鸾的影响很深。张楚林虽中进士，但仕运不济，在山东做了几年知县，1901年病死济南时，家中一贫如洗。张楚林死时，张季鸾年仅13岁。其母王氏领着张季鸾兄妹三人扶柩归葬。王氏是一位善良而坚强的女性，一人承担艰难家计，令张季鸾早出游学。由于操劳过度，1904年便告别了人世，时年37岁。张季鸾年幼懂事，聪颖过人，延榆绥道陈兆璜爱其才，怜其贫，召入道署，令与子共读。1902年，又出资送至咸阳醴泉“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师刘古愚老先生，打下深厚的文史根基。

幼年时的生活经历，对张季鸾思想的影响很大。1934年9月，为纪念其父张楚林冥诞一百年，其母王氏忌辰三十年，张季鸾曾专程从天津回榆林扫墓、立碑。在《归乡记》一文中，张季鸾在叙述了上述经历后说：“我的家世，大概如此……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从报答亲恩，扩大为报答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①

张季鸾的这种报恩思想在以后的办报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以文章报国。

如果说幼时的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打下他爱国忧民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真正促使他走上“文章报国”道路的是辛亥革命的大潮。少年张季鸾留学日本，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经济理论，亲眼看到了日本的社会现实，打开了他的视野，开阔了他的眼界。此时，又适逢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利用报刊进行论战，张季鸾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论战，但从中受到了教育，接受了革命派的理论和主张。在日本，张季鸾参与编辑革命派的刊物《夏声》而开始其报人生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11年，学成回国，立即投身报刊活动，与报刊结缘一辈子。

“报恩主义”与“文章报国”是张季鸾为人与为文的思想主线，也是他一生的执著追求。

二、张季鸾的政论写作

从1911年张季鸾应于右任之邀，赴上海担任《民立报》编辑起，至1941年在主持《大公报》言论15年后病逝，30年间共撰写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绝大多数为社评。《大公报》在当时之所以成为“舆论重镇”，与张季鸾及其社评的作用及影响直接相关。

张季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及社论主笔的15年，中国内忧

^① 张季鸾：《归乡记》，载《国闻周报》，第20卷第1期，1935-01-01。

外患连绵不断，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先后爆发了“四一二”事变、“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

作为一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张季鸾在秉持中国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传承的同时，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并将这一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地位。胡政之在1944年出版的《季鸾文存》的序中提到：“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作为一名报人，张季鸾以“新闻救国”、“言论报国”为理想，凭借手中的笔，以报刊社论为载体，针砭时弊，议论国是，坦陈时政，分析变局，其言论不仅奠定和提高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也每每对当局或时局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一）张季鸾社评的写作原则

社论通常被看做报纸的灵魂，《大公报》是一张新闻纸，但由于其重视言论，特别是由于张季鸾主持的社评的鲜明特色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使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该报是一份政论性报纸。

《大公报》奉行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不仅是该报的办报宗旨和发行宗旨，也是张季鸾写作社评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指导原则在实行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

作为一张独立的民间报纸的社论主笔，张季鸾言论的“四不”原则首先表现为“立言为公”，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①；其次，表现为言论独立，即“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其三，表现为持论公正，即不随声附和，不一知半解，不感情用事；而是态度严

^①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载《大公报》，1931-05-22。

谨，分析客观，判断公正。

（二）张季鸾社评的选题范围及政治态度

虽然自1926年11月7日起，《大公报》社评取消了署名制，“若干重要文章且多系大家商讨后由一人执笔”^①。但在张季鸾担任总编辑的15年间，《大公报》绝大多数社评出自他手。由于兼具文人的深厚学养与报人的职业敏感，他的社评往往目光敏锐、视野开阔。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局的变动，其社评的选题范围和关注重点也不断拓展或转移：从百姓疾苦到政府腐败，从时局变化到前方战事，从国内事变到国际形势……凡属值得评价、需要议论之事，几乎均有涉及。

张季鸾社评的选题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揭露社会黑暗，抨击腐败政治

作为一名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报刊政论家，张季鸾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十分鲜明。其批评矛头所向，往往直指当权者，揭露其反动、虚伪的真面目。在他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兼社评主笔的初期，曾发表3篇斥责权贵、胆识过人的社评，即著名的“三骂”：一为《跌霸》（1926年12月4日），对曾“独霸一时”而今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之所以有今天的结局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该文也成为吴氏及直系军阀的送终之作。二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1927年11月4日），对忽而“联共”，忽而“清共”、“分共”的汪精卫之反复无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余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原因，是“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三为《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年12月2日），专门就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发表的声明进行了深刻而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不仅揭露了蒋介石的虚伪，还将蒋宋联姻放在大批兵士殉生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对照，表现出其社评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爱憎。

张季鸾出身寒微，多年形成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表现在其社评的

^① 胡政之：《季鸾文存·序》，大公报馆，1944。

选题上，是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关注，对吏治腐败的深恶痛绝。前一类代表性社评《中国的文明在哪里》（1930年11月2日），是《大公报》派遣记者到河北农村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后配发的，作者在文中对多重剥削之下生活悲惨的民众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对中国农村及农民现状表现出深切的忧虑。后一类的社评有《论建成廉洁有能之政府》（1930年11月14日）、《官吏不得经商投机》（1930年11月23日）、《刷新地方行政之亟务》（1930年11月28日）、《人民与政府》（1930年12月30日）等。其中，在《人民与政府》一文中，开篇即指出：“近代中国人民最普遍之政治观，为骂政府，若曰人民一切不幸，皆政府之不良致之。苟有良政府，则国家地位，人民境遇，必不如此。”揭示出当时国势衰微、民怨四起的根本原因。

2. 揭露日本野心，宣传抗日救国

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其主持《大公报》笔政的15年间，先有“九一八”事变，后有七七卢沟桥事变，他目睹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变为侵略行为的过程，直至他去世之时，抗日战争仍处于僵持阶段。因此，在张季鸾大量的时事型社评中，有关日本问题、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事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台湾学者陈纪滢曾说：“季鸾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就中日关系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之政论家。”^①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季鸾凭其对日本问题的关注与了解，已开始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1931年7月12日，他发表《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文中忧虑地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且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著名社评《国家真到危重关头》（1931年11月22日），对“九一八”后两个月间的国内、国际局势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醒政府和国民：“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三省，其

^① 陈纪滢：《报人张季鸾》，17页，台北，重光出版社，1971。

行动之范围，常以国际形势所许之最大限度为限度，而求以最小牺牲，得最大效果……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

此后张季鸾撰写的有关这方面内容的社评还有《愿日本国民反省》（1931年9月26日）、《望军政各方大觉悟》（1930年10月6日）、《马占山之教忠！》（1931年11月20日）、《救东三省避伪独立》（1931年12月10日）等，结合最新事态，从不同角度分析时局变化，警示提醒，告诫世人。

此后，张季鸾的社评重点放在宣传救亡图存、主张“明耻教战”和谴责“上层误国”上。“西安事变”中，他撰写的四篇社评，虽曾遭到疵议，但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季鸾有关抗日救国的社评所占的比重更大。如1937年“九一八”6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一组社评《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1937年9月18日）、《感谢卫国军人》（1937年9月19日）、《勉全国公务员工》（1937年9月22日）、《勉出川抗战各部队》（1937年9月30日）等，既有对抗战历程的反思，更有对民心士气的鼓舞。而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及其后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张季鸾撰写的社评无不体现出其强烈的爱国之情与坚定的抗战之志。其中《最低调的和战论》（1937年12月8日）是对时局的准确分析，《置之死地而后生》（1937年12月11日）是对民心军心的大力呼唤，《为匹夫匹妇复仇》（1937年12月28日）则是对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对侵略者兽行的强烈声讨。直至1941年9月去世前，对于战争局势的关注，对于政府和国人抗战精神的激励，一直是张季鸾社评的重要内容。

3. “反苏”“反共”，“骂蒋”“拥蒋”，坚守“国家中心论”

张季鸾的“报恩主义”，使其将报亲恩与报国恩联系起来，这既使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又使他坚定地抱持“国家中心论”，对于之有“知遇之恩”的蒋介石有骂有帮，先骂后帮。面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政治理想是建立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对于共产党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抱有

相当的成见和天然的戒心。表现在其评论的内容上，则是有相当的文章与“反苏”、“反共”及“骂蒋”、“拥蒋”有关。

其中，在《明耻》（1927年1月6日）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国有赤化问题之发生，中国之耻也。”表现出明显的反共倾向。即使在国共合作、共御外侮的抗日战争期间，在张季鸾的有关社评中仍可看到这种倾向。如1941年5月23日发表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中，虽然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等方面的努力，但对中共十年间对国家贡献的基本判断却是“负号的，不是正号的”。

在有关苏联的评论中，张季鸾既指出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又提出向苏联学习工业化、电气化的建设经验（见《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列宁逝世》等文），观点看似矛盾，其政治立场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这种政治立场的集中表现，就是对“国家中心论”的强力维护。无论是张季鸾早期在《蒋介石之人生观》中对蒋介石的“骂”，还是在有关“西安事变”中对蒋介石的“保”与“拥”，包括抗战爆发前夕对蒋介石政府“缓战”政策的支持，都是出于对国民党“正统”政府的承认与维护，对“国家中心论”的坚信与坚持。

4. 关注社会教育，开启民智民风

张季鸾“新闻救国”、“言论报国”思想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他的社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关心青年，关怀妇女，关注教育，以此来开启民智，倡导新风。

《大公报》1931年4月12日刊登的社评《青年思想的出路》，是张季鸾有关青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面对危机的国势，纷乱的世事，渺茫的前途，文章首先对青年普遍存在烦闷与彷徨心理表示理解，指出：“为思想的出路而感觉烦闷之青年，为社会最有用之一部分。人类之幸福，世界之进化，皆赖此辈求之。就中医论，亦只患青年无思想，并不患青年有烦闷。”在对青年的烦闷予以理解之后，文章更多的是为青年的发展提供中肯的建议：“其一，趋自然科学，加速度地学习西人所已能，更发明其所未能，求现代的利用

厚生之技术，以救中国同胞之穷；其二，则趋社会科学，根据外国学者研究结果为基础，再思索之，讨论之，以求真理最后之归宿，决中国永久之针路。”及至今日，这一建言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两个多月后，张季鸾在《中国青年》（1938年2月8日）一文中提出：“救亡建国的艰难重任，无疑在全国青年肩上。因为青年能刻苦，有勇气，可以做困难工作，可以克服逆境。特别是青年的荣誉感、责任心、正义心，都旺盛，可以将拥护中国独立自由的大业担负起来。”文中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青年，不仅指学校学生，也包括“广大的武装卫国的青年和有爱国心意识的一般青年民众”；不仅指男青年，也包括女性青年。呼吁他们在为同胞悲痛，为人类文明悲痛，为日本的堕落悲痛之余，“鼓励自己，坚决奋斗”。

刊载于“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日的社评《学生与政治》，不仅是应时之作，而且是应需之作。文章紧扣国难当头之际，青年学生如何处理学业与政治、学科与政治、人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议论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特别是在议论只讲专业不讲政治的危害时，就理工、文哲和经济各科可能出现何种于国有害的后果逐一述之，既切中青紫，又令人警醒。其中，自然科学教育“如不适合人民利益的进行，则技术人才有时反演助纣为虐之角色。如造械徒以杀人民，飞行亦足奖内乱是也，即不然，徒增长少数人利益。或甚而作国际资本之工具，以剥削其本国之财富，此技术万能之说不能成立也。”此番议论看似危言耸听，实则振聋发聩，即使今日读来，亦极具预见性与启迪性。

5. 申明办报宗旨，倡导新闻自由

新闻媒介之社论，不仅可以代表媒介发表对新闻事件及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可以代表媒介传播其办报宗旨及职业追求。

作为总编辑兼社评主笔的张季鸾，在其职业生涯中，不仅深感新闻自由之可贵，亦感新闻自由之必需。在其撰写的社评中，多次表达出对国民党政府控制舆论、限制新闻自由的不满，并在文中直

陈其危害。此类评论有《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29年12月26日），《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1936年4月2日）。而发表于1939年5月5日的《抗战与报人》，则直接联系到日本侵华对新闻自由的毁灭，议论“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谈不到言论自由。”作者将“新闻自由观”置于“国家观”之下进行新的考察，体现出作为职业报人的张季鸾对既有的“新闻自由观”新的思考与诠释。

《大公报》的社评，也是该报办报理念、办报宗旨的载体。自1926年新记大公报续刊至1941年张季鸾病逝，《大公报》每遇重大变动或重要纪念日，常有社评发表。如《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1931年5月22日）发于《大公报》出刊10000期之日；《今后之大公报》（1936年4月1日）发于新记大公报续刊10周年之际；《本报在汉出版的声明》（1937年9月18日）发于该报在沪汉两地同时发行之日；《本报迁渝出版》（1938年10月17日）则发于该报自汉迁渝后公开出版之日。这类由总编辑张季鸾亲笔撰写的社评，既表达了报馆对读者的尊重，更是媒介自身理念与追求的概括。

三、张季鸾的政论特色

张季鸾逝世后，周恩来同志在唁电中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则将其誉为“一代论宗”。亦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中国报刊政论自王韬始，经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发展传承，到张季鸾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张季鸾的社评已基本完成了从报刊政论向新闻评论的过渡，使这一历史悠久的文体，摆脱了“设言立说”和“坐而论道”，开始真正成为“对于新闻的评论”。除前文提到的选题范围的极大拓展外，在文体形式、论证方式及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张季鸾的社评都颇具特色。

（一）增强时效性，追求新闻价值基础上的评论价值

新闻应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评论也应是对新近发

生的事实的评论。但就中国的政论传统而言，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之说。自王韬 1874 年创办《循环日报》以来，突破了“桐城时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梁启超在继承和发展了王韬的政论风格的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时务文体”，在纵论时事之中感情充沛，文气跌宕，气势磅礴。但囿于文体的束缚，特别是囿于新闻传播技术的落后和信息传播途径的局限，在新闻的时效性难于保证的时期，遑论言论的时效性。

在张季鸾接掌《大公报》社论主笔之时，中国的新闻事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媒介的增多，信息的发达，使新闻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大大提高。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将社评的议论对象，更多地锁定于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在对由头或论据时间的表述上，也从“近日”、“日前”，逐渐变为“前日”、“昨日”。如 1931 年 11 月 20 日发表的《马占山之教忠！》，在开篇处介绍了新闻事实：“马占山将军与其所部诸将士，孤军守土，援绝弹尽，竟已于十八日撤退，昨夜日军占齐齐哈尔……”所依事实一为“前日”，一为“昨夜”，后者距报纸发排不过几个小时，其时效可见一斑。在 1937 年 12 月 11 日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中，由头是援引“昨天路透电，暴日五大臣会议，已决定攻占南京后，继续进攻，不到中国‘表示诚意’不止”。而是日距 12 月 13 日日军攻陷南京仅两天，足见所评事件之新鲜与重要。

张季鸾社评对新闻性的追求，不限于时效的把握，还注意时机的选择；不限于新闻价值的判断，还注重评论价值的判断。于《置之死地而后生》刊出的前三天，即 1937 年 12 月 8 日发表的名篇《最低调的和战论》，从两则“昨日东京电”中敏锐地捕捉到评论点——敌方消息的自相矛盾之处。这两则消息分别是：“敌外务省发言人说，欢迎第三者调解”；“东京已准备八十万人的游行庆祝，预备于占领我首都之日举行”。由此文章做出对敌方“欢迎调解”的判断——“只是庆祝胜利后的纳降”，并据此展开分析和议论。

张季鸾何以保证《大公报》社评时效性的实现？重要的做法之

一就是“看完大样写社评”。张季鸾在每晚9点审阅大样、小样和各类电讯，确定社评的依据。有时，在付印前传来值得评论的最新消息，他就更改社评内容，连夜赶写，几乎每晚都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季鸾对于社评时效性的追求，是其职业追求的具体体现。

（二）讲求预见性，洞悉时局与事态的本质及趋势

新闻评论是对新闻事实的一种判断，包括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因果判断、趋势判断等等。张季鸾的评论中，大量是对新近发生的新闻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但其作品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对一些重大新闻的因果判断和趋势判断；而其分析之独到，预测之准确，常常令人啧啧称奇。

以《中国之前途》（1936年11月30日）为例，在抗日战争尚未爆发，“西安事变”即将上演之际，文章对中日关系走势做出了明确的预测：虽然“时局紧张与重大”，但“前途光明有必然者”。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统一之凝固，自古以来，无如今日”；二是“在中国自力更生之过程中，国际大事如何，自亦与我有重大之影响，由此而论，亦与中国有利益。”“西安事变”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珍珠港事件”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形成，都印证了张季鸾在了解国内外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时局走势基本判断的准确性。

在淞沪抗战告一段落，十九路军退出闸北的第二天，张季鸾的社评《沪局与国民的觉悟》（1937年10月28日）发表。在上海市民乃至全国民众对上海沦陷深感不安之时，文章对未来形势做出五点说明，其中第一点即是“上海本不是中国对暴日之决战地，八一三以来之上海战，只是对日抗战的序幕”。文章在第五点中预测：“这一次，方式是长期抗战，结果是最后胜利”。虽然张季鸾本人未能亲眼见到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那一天，但他的基本估计和判断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张季鸾为一介书生，既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军事家，他对时局判断时常能有所预见，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长期积累和职业敏感。

而只有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之评论，才属上乘之作。

（三）注重逻辑性，文章结构严谨，论证缜密

与梁启超纵横捭阖、跌宕起伏的文风相比，张季鸾的社评更注意逻辑的严密与议论的严整。

《妇女与抗战》是发表在1938年“三八”妇女节次日的一篇社评，其直接的新闻由头是，前一天武汉妇女纪念“三八”节大会上发出《告全国妇女书》；而直接的新闻背景是，在两个多月前的南京大屠杀中，无数妇女遭蹂躏、被屠杀，日军暴行令人发指。文章开头部分说道：“此次敌寇在中国，罪恶万端，而特别是凌辱残害妇女，为其最大之罪状。”为何将其视为“最大之罪状”？文章提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保护女性”，“自古重视婚姻”，“严男女之别”，这也是中华民族形成伟大文明和最大民族的原因之一；但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的“贞操论”。对“贞操论”应怎么看？过去的看法虽与今日不合，但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以凌辱妇女为最大的罪恶——则永远不会变更”。

以上一个自然段的逻辑论证为基础，文章由古论今，分析男女平等的合法性，使保护妇女有了文化上、道德上以及法律上的依据。接着笔锋一转，提出：日本的人侵与占领，“使我们的文化，法律，善良风俗及传统信仰……立刻一切失其保障”。在列举日军暴行后，作者提出两点倡议：一为全国男子承担起保护妻儿姊妹的责任；二为妇女自保互保。光保护还不行，还要做实际的指导。而只有保护中国，才能保护妇女。全文立论与驳论相结合，结构严密，层层推进，不仅使道理越讲越明，也使话题越议越深。

张季鸾的其他作品，如前文中提到的“三骂”，“西安事变”中的四评，虽议论方式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其说服人、打动人的逻辑力量。

（四）走向通俗性，用平实畅达的语言叙事说理

张季鸾的社评有一个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和过渡的过程。在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初期，他所写的评论半文半白者居多，还带有明显的文言文的痕迹。对此，徐铸成的评价是：“张先生的白

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而到其任社论主笔的中后期，白话文运用得越来越多，而且，尽量使用平民的语言，议百姓关心的事情。

在《最低调的和战论》中，有这样一段议论：“这四个月来，以海陆空大军进攻中国南北省区，其直接加诸中国的军事的摧残不用说了，其在城市，在乡村，在陆，在海，以飞机，以炮火杀戮我们的平民，不知道多少千，多少万，焚烧摧毁我们平民的财产，又不知道是多少亿，多少兆，这都不用说了，而现在一面言欢迎调解，一面庆祝进攻我首都！”这段文字叙议结合，以叙为主；句式长短结合，以短为主；既像作者对读者诉说，又像一位劫后余生的难民在向世人控诉。文中“不用说了”、“这都不用说了”这类老百姓生活中的语言，用于社评之中，非但不显得浅白，反而给人以平易近人、深入浅出之感。

若把张季鸾社论写作的通俗性与同处一个时代的搔奋的小言论比较，后者则更为平易、平等，这既与报刊定位、体裁特点有关，也与个人风格有关。

（五）标榜公正性，在“客观”与“敢言”间寻求平衡

“四不”原则是《大公报》追求“公正性”的基石，虽然其“公正性”在报刊发展的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且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但与同时期的大多数报刊言论相比，张季鸾的社评还是力求表现出一种客观公正的取向。例如，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政治时，能够针对具体问题，做出客观的分析；在国难当头、抗战在即时，能够冷静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提出较为可行的建议；在抗战烽火正烈，全国军民共御外侮时，能够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相区别，不一概而论，统统加以声讨。

张季鸾1936年4月1日在《今后之大公报》中对该报“公正性”的解释是：“要求同人尽可能地剖析事实，衡量利害，不畏强权，不媚时尚，期以工整健实之主张，化全国各种感情思想上之歧异”。

《大公报》还素以“敢言”著称，这一点仍与“四不”原则相

关。无论是针砭时政，抨击权贵，还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张季鸾时期的《大公报》社论，都以鲜明的个性体现着这位“文人加报人”的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

DAGONGBAO BAIWANSHI

第五节 获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 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

正当《大公报》克服重重困难在重庆、香港和桂林惨淡经营、坚持出版之时，一个重大喜讯从天而降——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鉴于《大公报》的出色表现，决定授予该报1941年度最佳新闻事业服务荣誉奖章！这不仅对于《大公报》，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报界来说，确实是一项十分难得的殊荣。正如马星野在1941年4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撰文所说：“据作者的记忆，世界报纸受过密苏里荣誉奖，在英国有曼彻斯特卫报、伦敦泰晤士等报。在美国，得奖的较多，如纽约时报、布尔顿基督科学劝世报均在其列。在东方，日本人的朝日新闻同印度的泰晤士报，均曾与其荣；中国报纸之得到这个国际荣誉，在大公报是一个开端。”

1941年4月，胡政之收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务长马丁的信函，信中说：“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继续作特著之贡献，对于中国读者之服务，符合新闻学之信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有鉴及此，在教授会议中全体一致议决，将本学院今年颁赠外国报纸之荣誉奖章一枚赠予贵报，并囑鄙人将该决议案通知阁下，私衷良深庆幸。又本校此项荣誉奖章已定于本年五月十五在本校举行第三十三周年新闻周时颁赠，敬希派代表一人前来参加仪式。”^①胡政之同张季鸾商量后，决定请中央社驻美办事处主任卢祺新代为

^① 载《大公报》（重庆版），1941-04-18。

参加典礼并领奖。

5月15日，即密苏里奖章颁赠的日子，《大公报》渝、港、桂三馆内都充满了喜庆之气。因为重庆是战时首都，所以渝馆格外热闹。胡政之也特地由香港赶到重庆，主持各项庆典活动。一些知名人士、政府要员、社会团体、新闻界同仁也都发来了贺电、贺信。下午4时，中国新闻学会、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假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茶会，庆祝《大公报》荣获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到会的有蒋介石的代表贺耀组以及于右任、吴铁城、王世杰、陈立夫，何应钦的代表唐宇纵，美国大使馆秘书赛维思，英国大使馆新闻参赞郝戈登，苏联大使馆武官毕德列可夫，新闻专员科瓦列夫沙露若夫，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萧同兹，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总干事陈博生，以及中国新闻学会会员、各报社代表300余人，可谓盛况空前。

萧同兹主持大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于右任、吴铁城分别致贺辞，张季鸾代表《大公报》全体同仁郑重致谢。在对社会各界的祝贺表示感谢之后，张季鸾说道：“以大公报本身来说，我们根本不配接受这项奖章，因为论什么也不配。论危险不抵上海同业，他们为了伸张正义，已有多人遭受敌方拘捕，并有处死的；论辛劳，也不抵前线从事宣传的新闻界同人，他们昼伏夜动，在物质极艰困之中，努力岗位，我们自愧不如；但是我们觉得这是国际间重视中国新闻界的首次，我们审慎考虑再三，勉予接受，以开启外人重视中国新闻之始。而本报之所以受人重视，实在应归功于四年来为国家流血的无数战士，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斗牺牲，外国人绝对不会注意中国的报纸。”^①

当天晚上，渝馆同仁齐聚报馆，举杯互贺，尽兴而散。

这天《大公报》的版面上也洋溢着喜庆。除刊登贺电、贺信外，重庆、香港、桂林三版都发表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赠予《大公报》的《奖状全文》：“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

① 载《大公报》（重庆版），1941-05-16。

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该报之机器及内部人员，曾不顾重大之困难，自津迁沪抵汉以至渝港两地，实具有异常之勇气机智与魅力。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间仅停刊数日，实见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其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①

与此同时，胡政之、张季鸾分别以《大公报》总经理、总编辑的身份向美国公众发表了题为《自由与正义胜利万岁》的广播致辞，向美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报界的基本情况，并表达了中国人民抗击敌寇、维护主权的坚强决心。

《大公报》渝馆的庆祝活动告一段落后，胡政之先后飞赴港、桂两地主持了港馆和桂馆的庆祝活动。不久，密苏里新闻奖章寄到重庆报馆。依照张季鸾的指示，这枚奖章在摆放于经理部客厅中供同仁瞻赏几日后，便被悄无声息地收检起来，丝毫没有张扬之意。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报纸产生既晚，成长又慢，其时于国内尚无地位，遑论国际？然而新记《大公报》以其“四不”方针开辟了中国报纸发展的新途径，以其“言论报国”的宗旨定下了中国报人工作的新准绳，以其“经编并重”的管理确立了中国报业运作的新原则，更以其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和坚定不移的爱国立场为中国报纸在世界上争得了地位，赢得了荣誉——这是新记《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的光辉一页！

^① 载《大公报》（重庆版），1941-05-14。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六卷

后期的新记公司

《大公报》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一节 报馆的经营与事业的发展

一、《大公报》港版内撤

1941年3月15日，《大公报》在西南文化城桂林馆开张出报，这实际上是胡政之为《大公报》港馆一旦有事被迫内撤准备的退路。

早在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推行南进政策，企图向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扩张的时候，胡政之就断定，日寇南侵，香港必将不保，于是考虑要给《大公报》港馆找一个退路。是年冬，胡政之赴桂林考察，感到桂林已经成为西南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的中心，虽有敌机时来空袭，但近郊还较安全。于是他决定创办《大公报》桂林馆。

胡政之将筹建桂馆的具体事宜交给了以王文彬为主任的《大公报》桂林办事处。此时，桂林市郊比较安全而又近便的地方，已被许多单位占用一空。王文彬受命后碰到的第一个困难便是租用房地。幸好得到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将军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胡性安的热心相助，他答应将该处早已征用的一块地皮转让出来。这样，王文彬才得以在星子岩租定 37 亩荒地作为《大公报》桂馆的馆址。

接着，建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正当王文彬忙得不可开交之时，李清芳由重庆调至桂林，负责印刷器材的转运和采购。1941 年 1 月，蒋荫恩、李侠文、张蓬舟、何毓昌、李树藩等 40 余人奉命从香港启程抵达桂林。

随着馆舍落成，大批设备、器材从香港陆续运到。3 月初，胡政之飞抵桂林，看到馆舍已粗具规模，必要设备也已基本到位，他十分高兴，对王文彬等人称赞不已。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他将《大公报》桂林版创刊的时间定在 3 月 15 日，并公布了主要干部的分工：副经理王文彬、编辑主任蒋荫恩、会计李树藩、营业发行李清芳等。此时的编辑部，除主任蒋荫恩外，只有三个人——国内要闻版编辑何毓昌、国际要闻版编辑李侠文、地方版编辑兼外勤主任张蓬舟。经理部的人也不多，而且任务十分繁重，既要维持日常的营业，还要继续馆舍的建筑和装修工作。两年后，这一工程终告完成。办公室、工厂、仓库及部分员工宿舍，构成一个大的四合院，中间空地广植花木，蔚然成林，另外还修有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备有必要的运动器具，供员工们下班后锻炼身体之用。球场边，还辟有菜地，种植各种蔬菜，产品除供馆内同仁自食外，还略有剩余出售。昔日荒地，两年间变成小镇一般，《大公报》同仁的创业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解决人手紧张问题，桂林版在创刊之前，曾公开招考过两批职员，其中后来成为报馆骨干的有曾敏之、陈凡、罗承勋等。

《大公报》桂林版创刊后，销路甚佳，不到数月，其发行量便已跃居桂、粤、湘、黔诸省各报之首。随着桂林市面的逐渐繁荣，广告收入也不断增加，营业状况迅速好转——第一年勉能收支相抵，第二年下半年即大有起色，每月颇有盈余。

桂馆开张时，本馆同仁刊物《大公园地》同时创刊。这份刊物是同仁总结经验、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一个场所，稿源丰富，颇受欢迎。《大公园地》在桂林前后共出版8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3日，日军侵占九龙。《大公报》香港版于当日发表社评《暂别香港读者》，宣布停刊。25日，港英投降，胡政之等人被困，无法离开。次年1月7日，胡率领赵恩源等五人冒险乘舢板渡海，经惠州、韶关入桂。此后，港馆同仁金诚夫、徐铸成、杨刚等也分道陆续抵达桂林。他们与其他干部、职员、工友百余人，多数留在桂馆，只有赵恩源等少数人被派往渝馆。

1942年2月19日，《大公报》桂、渝两版同时刊登《本报港版停刊经过》，向国内读者表达了港馆同仁誓与祖国同命运的坚定决心：“我们对于港馆前途的危难，本早有预感，所以在一年半前便着手筹设桂馆，俾同人有机会继续为国服务之岗位；但同时，又因为香港为对外宣传之重点，非到最后，不能放弃，因此，我们明知港馆必遭毁灭，而不能不忍受牺牲，支撑到底。十二月八日，敌寇悍然发动太平洋大战，香港首当其冲，经十八天的抵抗后，终于沦陷！本报同人，与在港侨胞同历艰危困苦，幸而今日已先后脱离虎口，回到祖国怀抱来了，而本报的资产损失，则达二百万以上。”

港馆人员到来后，胡政之对桂馆的主要干部作了调整：金诚夫为经理，王文彬仍为副经理，徐铸成为总编辑，蒋荫恩被燕京大学聘为该校新闻系主任，其编辑主任一职由马廷栋接任。

由于人力增强，胡政之决定发行晚刊，定名《大公报》，桂林《大公报》于1942年4月1日创刊，由杨历樵主持编务。该报后于1944年6月27日停刊，历时两年有余。

二、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在渝成立

1941年9月6日，总编辑张季鸾病逝，这对于《大公报》的事业发展而言，不啻飞来横祸，对于新记公司《大公报》的历史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

9月初，张季鸾病情加重，胡政之即从桂林赶赴重庆，途经贵阳时，得知张季鸾病逝。为应对局面，决定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对《大公报》渝、港、桂三馆实行“集体领导”，由胡政之任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在9月15日举行的报馆同仁公祭张季鸾仪式上，胡政之宣布了《本报董事会决议案》：（1）设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2）以胡政之、李子宽、王芸生为董事，曹谷冰、金诚夫二监事为办事处委员，胡政之为主任委员；（3）由董监事联合办事处总揽全社事务，并正式成立社评委员会，以胡政之、王芸生、曹谷冰、李纯青、孔昭恺、赵恩源、金诚夫、徐铸成、杨历樵、蒋荫恩、王文彬为委员会委员，王芸生为主任委员。

9月16日，《大公报》重庆、香港、桂林三版同时发表题为《今后之大公报》的社评，对张季鸾逝世后报社内部机构重组一事予以说明：“本报乃是一个永久事业，季鸾先生生前已有不可人死报亡之诫，本报同人也感觉事业的神圣，怀此情绪，于昨日祭告季鸾先生之灵，宣布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总揽全社事务，期以协力同心共同负责的精神，经营本报的业务，善尽本报的使命。”

自从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于上海分手后，《大公报》便分化为了两个系统——张季鸾主持汉、渝二馆，胡政之主持港、桂二馆，虽然每遇重大问题仍要共同磋商，但在一般情况下，双方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张季鸾的逝世，使这种局面最终被改变了——以胡政之为主任委员的董监事联合办事处成立后，胡政之掌握了报社的全局，使两个系统在形式上得到了统一。

为了便于统一管理，董监事联合办事处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如1941年10月制定了《职员薪给规则》，规定了报社职员的月薪等级、年终酬金、生活津贴、年资薪的标准。

又如1942年重新修订了《大公报工友请假规则》、《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等。

为了使渝、港、桂三馆同仁保持联系、交流感情、增进了解、加强团结，《大公报》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决定于1943年5月在重庆复刊报社同仁读物《大公园地》。曹谷冰所写的《大公园地发刊词》在叙述了新记《大公报》自1926年天津续刊到抗战以来四处迁徙的经历后说：“以上经过，因为我同人之所熟知，兹琐琐述之者，亦以见抗战以来，本社事业牺牲之重大，与夫本社机构变动之剧烈，并见创办人诸公经历之艰辛，应付之匪易。而就我同人之关系言，由最初十年之‘有若家人’经近六年来之迭次搬迁，尤不禁有‘兄弟离散’之感，近年交通日益不便，一般情绪，又复迥异畴昔，欲如向日之保持密切联络，复不可得，是则藉本社内部读物《大公园地》刊行，以报道各馆之情况，并沟通同人之情愫，殆亦有其必要矣。”^①

1943年9月6日，即张季鸾逝世两周年忌日，《大公报》渝馆同仁在重庆李子坝季鸾堂举行社祭。胡政之于礼毕之后宣布了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四字为社训”，第四条规定“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为社庆日，纪念创办人吴达诠、胡政之、张季鸾三先生”。9月20日出版的第8期《大公园地》刊登了胡政之所写的《同人公约的要义》，对公约逐条作了解释。在谈到第一条时，胡政之这样说道：“我们的社训，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就是：‘不私不盲’。记得民国十五年九月一日本报的第一篇社评里，我们曾经说明本报的基本立场，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八个字。而现在我们的社训‘不私、不盲’，就是将以上八个字归纳起来说的——‘不党’可归纳入‘不私’，‘不卖’可归纳入‘不盲’。这‘不私不盲’四个字，一方面是本社的最高言论方针，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本报同人对人、对事的指导原则。”

^① 载《大公园地》（《大公报》内部刊物），复刊后第1期，1943-05。

为了改善和充实员工的生活，增强内部凝聚力，报社加强了员工的福利事业的建设。1943年10月，报社成立同仁福利委员会，并通过会章14条。在福利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孔昭恺作了题为《谈本馆福利事业》的报告。报告在回顾了《大公报》提倡同仁福利的历史后指出：“目前本报两馆福利设施，在曹经理金经理擘画之下，已颇见规模。就渝馆言，陆续举办的事项概如下述：一、员工医药费之补助……二、津沪籍之员工接济留居津沪眷属之汇款除原额外，其薪水汇水额由馆津贴一半……三、员工消费合作社于去年四月成立。四、体育会于前年成立……五、国剧研究社于去年春成立……六、工徒补习班，课本用具概由馆供给。七、淋浴，员工每人每日一次。”^①同时，福利委员会进修部、学术座谈会、俱乐部、福利部都制定了相应的简则。

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的成立，对于加强报社内部的统一管理，增进报社同仁之间的友谊和联系，促进报社事业的向前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大公报》复员沪津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入了最后的决战。年初，欧洲战局便已明朗，纳粹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

4月，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赴美国旧金山出席在这里举行的联合国创立大会。会议于6月26日闭幕，胡政之没有随代表团回国，又以《大公报》总经理的身份在美国逗留了一段时间，利用他向国民政府购买的20万美元的外汇向美国华德·史考脱厂购置3部轮转印报机和一些通讯器材、卷筒纸和其他办公用品，准备战后有更大的作为。

8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一周后，22日，《大公报》迎来了它自身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

^① 载《大公报》，复刊第10期，1943-10。

——发满15 000号的纪念日。当天下午，报社全体同仁举行纪念大会。胡政之因公滞美，会议由曹谷冰主持，创办人吴达谗出席大会并致辞。时值日本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会场上充满了空前喜悦的气氛，会后还表演了文艺节目。

《大公报》发满15 000号纪念庆典，既是对过去所取得成绩的总结，又是对战后发展的动员。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在筹备15 000号纪念庆典时，已根据胡政之年初离渝时留下的意见，决定派李子宽、徐铸成率员东下上海，曹谷冰、孔昭恺带队北上天津，去筹备恢复抗战前原有的事业。于是，纪念庆典刚一结束，李子宽、徐铸成便直飞上海，其他派往上海的编、经两部人员则乘船陆续抵沪。

《大公报》沪馆战前的财产全部损失。李子宽、徐铸成到沪后，只找到一架已经拆散的卷筒机，除了从重庆运来印报的机器外，其他办公设备都需要就地购买，李子宽、徐铸成费了很大气力才找到民国路261号作为编、经两部办公及印刷报纸的房屋。

《大公报》上海版于1945年11月1日复刊，李子宽任经理，徐铸成任总编辑，杨历樵任要闻版编辑兼翻译主任。复刊号上，发表了题为《重来上海》的长篇社评。文章首先说道：“今天，我们重来上海，和苦别八年的读者见面，不禁无限酸辛，涌上心头。”在就抗战胜利后的建国原则谈了四点看法后，文章接着说：“我们是一张民间报，自十五年改组复刊后，承全国各界的爱护，得有今日。二十年来，饱经忧患，同人等不揣鄙陋，始终固守‘不私、不盲’的社训，对建国大业，尽其平凡之努力。现在我们也随着国家复员而复员，上海版今日首先复刊，我们今后一本过去不畏强权、不媚时尚的传统，继续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对于言论记载，当力求翔实，以副国内外的热望。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上海各界贤达，像过去一样，随时爱护我们，鞭挞我们，更愿大家充分利用我们这张报纸，宣达民隐，诛恶扬善，以培养建国的风尚，奠定民主的基础。”

《大公报》上海版复刊之初，日出一大张，4版；从1946年4月28日起，改出一张半，6版；同年6月13日起，改出两大张，8版；9月18日起，又增为两张半，10版；10月11日又扩大为三

大张，12版；至1947年2月16日因受纸张进口的影响，被当局限令减为两张半。

再说，负责恢复上海版的李子宽、徐铸成等人从重庆出发后，恢复天津版的人马也分批启程。其中，孔昭恺、徐盈负责打前站，从重庆飞天津，办理旧产接收手续。子冈、曹世瑛等人则于1945年9月14日乘船东下，先到南京，然后设法赴津。曹世瑛等到津时，孔昭恺、徐盈因在渝等候飞机尚未到达。直到10月13日，孙、徐二人搭乘战后第一任天津市长张廷谔的专机飞抵津市。

孔昭恺、徐盈抵津后，立即以《大公报》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天津党政接收委员会进行交涉，接收四面钟对过的大公报社旧址（第一特区罗斯福路211号）。天津沦陷后，此处为日商昌和洋行占用。此次接收，进展顺利。两天后，手续办好。原法租界电灯房后的馆舍（第一区中经路二路161号）在1937年8月5日天津版停刊后，被原经理部少数人就地改为正文印刷局，故报馆的收回也不成问题。

房屋问题解决后，徐盈与子冈便进驻北平，立即着手恢复《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工作。此时的北平，仍然是华北政治、军事的中心，为全国各大报纸所关注。董监事联合办事处派徐盈为恢复津馆的先行，说明《大公报》的高层领导是将北平办事处与津馆事业一并考虑的。

1945年11月24日，曹谷冰抵达天津时，北平办事处已经开始工作，恢复津馆的事宜也已大体就绪。12月1日，《大公报》天津版复刊出版，曹谷冰任经理，孔昭恺任编辑主任，贺善徽任要闻版编辑，傅冬菊任副刊编辑，曹世瑛任外勤课主任。

《大公报》天津版的复刊号上发表了题为《重见北方父老》的社评。第2版还发表了《由抗战到胜利八年来之本报》，叙述了《大公报》在八年抗战中的主要经历。

四、《大公报》复刊港版

1945年11月3日，胡政之由美国返抵重庆。见到《大公报》

上海版已经恢复，天津版的复刊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胡政之欣喜万分。他不止一次地同王芸生、曹谷冰、金诚夫、李侠文等人畅叙他对战后《大公报》发展的设想。他打算撤销董监事联合办事处，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领导上海、天津、重庆三馆的业务，并且计划创办广州版，使《大公报》占据华东、华北、华西、华南四大据点，成为中国报界的盟主。

在胡政之的主持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于1946年元旦在上海南京东路212号宣布成立，这标志着《大公报》的管理中心移至上海；4月13日，王芸生率领部分同仁从重庆飞抵上海，至此，《大公报》的言论中心也移至上海。7月13日，董事会开会，通过了胡政之起草的《大公报总管理处规程》十五条，对《大公报》总管理处及其下属的上海、天津、重庆三馆和国内外各直辖办事处的机构设置、人员任用作了调整。胡政之要带领《大公报》以上海为中心大展宏图了。

然而，胡政之的构想虽然美妙，但却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对国共两党斗争形势的估计出现了重大偏差。抗战胜利后的短短两年内，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共产党已经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拥护。1946年11月《中美商约》签订后，国统区经济危机迅速加深；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将要转入战略反攻。蒋介石政权已呈瓦解之势，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指日可待。胡政之很快便发觉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大公报》发展的规划完全错误，于是赶紧采取紧缩措施，打消了创办广州版的计划，全力维持已有的津、沪、渝三馆。

此时，胡政之在政治上处于矛盾状态。他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必遭覆灭，而自己参加过“国民大会”，又不可能见谅于共产党。于是，胡政之将希望寄托在了“第三条道路”之上。

然而到了1947年底，鼓噪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彻底破产了。胡政之的幻想又一次破灭。但他仍不甘心，强烈的事业心依旧鼓动着理想的风帆。反复权衡之后，他的视线再一次投向了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以千金一掷的决心和气魄率领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王文耀等人奔赴香港，着手《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当时，恢复香港版最大的困难在于外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导致国统区经济陷于崩溃，于是发行金圆券搜掠金钞。报馆将所有的金钞献出，换来的却是一天天贬值的金圆券。为解燃眉之急，胡政之只得接受了港人王宽诚先生以美金两万元入股。胡政之率队来港后，再次租用战前租过的利源东街那家小印刷所的二楼，供编、经两部办公。

为了尽快恢复《大公报》香港版，胡政之带领同仁们埋头苦干，不知疲倦。经过5次试版，《大公报》香港版终于在1948年3月15日正式复刊了。那天，胡政之整夜没有合眼，一直等到拂晓开机。当他看到第一份报纸从印刷机上印出时，激动地连声说：“恭喜！恭喜！”在场同仁看了，无不为之动容。李侠文在其回忆文章中曾写道：“在他的鼓舞下，同人不怕环境恶劣，不怕工作繁重，把一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办到了，我从这里多少体会到什么叫做‘创业艰难’。”^①

《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号上发表了胡政之撰写的《大公报港版复刊词》。胡政之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谈了三个问题：其一是阐述该报的性质。文章说：“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现在总社在沪，天津、重庆均有分版，台湾，以上海纸版航空递寄，到台印行，连同香港本版，一共虽有五个单位，事业却是整体的……因为大公报是整体的，言论方针是各版一致的。”

其二是介绍该报的历史，尤其是八年抗战时期艰苦奋斗的历史。文章说：“我们在八年抗战中，事业由黄河流域而到长江流域，由长江流域而到珠江流域，一切都是团体行动，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我们之所以能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团结了同人，吸收了若干青年同事，就是我们不敢妄自菲薄，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

^① 李侠文：《我所认识的张季鸾、胡政之两先生》，见周雨主编：《大公报大忆旧》，266页。

点不屈不挠的正气……恢复港版，想要利用经济比较安定的环境，加强我们为国家和民族服务。”

其三是说明该报在港复刊的理由。文章说：“中国几千年来立国精神就是忠恕和平，与世无争，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民思想还是只求与人和平相处……所以我们愿意在中国的国门边上与世界爱好和平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这又是我们到香港来的理由。”^①

胡政之的这篇文章，虽有若干糊涂甚至错误的观点，但有几点含义是相当明确的：第一，《大公报》始终是民间报纸；第二，《大公报》坚持“以文章报国”的宗旨；第三，在两极政治斗争的格局中，《大公报》见难以容于内地，只能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区寻求发展。

香港版复刊后，新记公司《大公报》便拥有了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地方版，总销量每日高达20余万份。不仅如此，港版的复刊，使这张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人办的报纸能够一脉相承，绵延至今。

五、《大公报》宣布新生

正如胡政之自己所言，《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是其对事业的最后冲刺。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加之满怀的悲观与焦虑，胡政之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1948年4月24日夜，胡在港馆工作时，病症突发，日渐沉重，三日后，回沪治疗，经医治无效，于次年4月1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60岁整。

胡政之的病逝，意味着新记《大公报》第一代领导者主政时期的完结，也似乎暗示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果然，在胡逝世两个月后，即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大公报》从此“属于人民”。

胡政之病逝之时，身为《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不在上海。他到哪里去了？他何以会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呢？

^① 以上引文见《大公报》（香港版），1948-03-15。

王芸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报人，然而其政治道路却是曲折的。王芸生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五四”时期开始接触新思潮，在天津发起成立“天津洋务华员工会”，成为天津反帝活动的骨干分子。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次年与党失去联系。进入《大公报》后，王芸生受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的影响，把自己和蒋介石捆在一起，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为国民党帮过腔，曾一度被《新华日报》斥为“法西斯的有力帮凶”。

然而，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又促使王芸生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与腐败表示不满和憎恶，对战后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做法表示忧虑和谴责，对风起云涌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表示理解和同情，因而又被《中央日报》骂为“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1948年7月19日，《中央日报》发表题为《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论，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尤可发起三查运动来检讨王芸生君……我们等待着王芸生君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特别是铁托元帅的论文和通讯在大公报上发表，作为他效忠共产国际的证明。”

处于左右夹攻中的王芸生坐卧不安，陷入深深的苦闷与彷徨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反复思索《大公报》和他个人的出路。恰在这时，杨刚来了。在胡政之的帮助下，杨刚于1944年7月赴美读书，兼做《大公报》的驻美记者。1948年9月杨刚从美国回到香港，接受了党组织安排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推动《大公报》转向人民的阵营。于是，杨刚于10月回到上海，并找到了王芸生的公馆。

就在杨刚与王芸生接洽的同时，《大公报》同仁李纯青也开始找王芸生交谈。李纯青是大公报馆内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受上海地下党的委派，特来做王芸生的思想转化工作。当他向王芸生转达了毛泽东希望王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口头邀请后，王芸生感动不已，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此后，李纯青与王芸生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他们发出电报，通知在天津、重庆、香港的报馆同仁到上海参加会议，并决定由《大公报》香港版首先表态，然后逐步转为公开拥护共产党领导，反对

国民党政权。

随后，杨刚、李纯青、萧乾等人分批离沪赴港，王芸生也于11月8日经由台湾抵达香港。10日，《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抨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支持人民解放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以赢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社评发表后，港馆的绝大多数同仁都表示支持王芸生的立场，流亡香港的左派文人更是赞同《大公报》香港版言论倾向的转变，而内地各版却没有转载。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见报，还是引起了行将覆灭的国民党政权的极大震惊，于是对津、沪、渝三馆施加巨大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管理新闻出版的特务头子方治甚至以“枪毙”威胁曹谷冰。面对国民党的淫威，大公报人没有一个在威武面前屈服。

12月29日，吴鼎昌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声明自1949年元旦起辞去《大公报》董事职务。

1949年2月27日，王芸生与中国文化界的其他知名人士如柳亚子、叶圣陶、郑振铎、马寅初、曹禺等，在共产党有关组织安排下，从香港启程，乘船北归。3月18日，一行人到达北平。5月27日，王芸生和杨刚随同解放军进入上海。6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宣言》在阐述了上海解放的意义后，检讨了该报的历史：“大公报有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创办于清末开明贵族之手，民国初年曾落入安福系政客的掌握，一九二六年大革命开始之年续刊，一部分资本出于官僚，政治意识渊源于封建政客及新兴资产阶级。大公报的根源如此，它的政治属性自然不会跳出这个范畴……在过去二十几年的人民革命浪潮中，大公报虽然不断若隐若现地表露着某些进步的姿态，而细加分析，在每个大阶段，它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接着，又历数了该报各个大阶段“反动”的事例：大革命破裂后，跟着蒋介石喧嚷“剿匪”；“九一八”事变后，主张缓抗与攘外必先安内；抗战时期，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扬“国家中心论”，把蒋介石捧上独裁的宝座；抗战胜利之时，不赞成联合政府理论，想替国民党维持独霸局面；人民解放战争在东北打响后，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

评，为蒋介石撑腰；当反动势力摇摇欲坠之时，提倡所谓“自由主义”、“中间路线”等。社评特别强调指出：“要知道这绝不是偶然的，大公报基本上属于官僚资产阶级，与过去的反动政权是难以分离的，总的方向是跟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走的。其基本性格既然如此，因此在国际关系上，基本上是亲美反苏的。”文章最后说：“大公报是具有政治与文化两重机能的私营企业，它检讨过去，开拓未来，也正是扬弃旧污，开拓新生。大公报有一部分官僚资本，这留待人民政府清查处理。大公报同人对过去的错误，内心是愧疚的，今当新生，提高警惕，痛感责任，尾勉前进，努力为人民服务。从今天开始，上海大公报从机构到版面，都经过重大改革，内容固期焕然一新，机构也已民主化。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

应该说，《大公报新生宣言》的写作者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态度是诚恳严肃的，对未来的展望也是积极进取的。这篇宣言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它将《大公报》引入了全新的发展历程。当然，以今天的观点进行审视，这篇文章对以往错误的检讨有言过其实之嫌，对《大公报》性质的界定更是值得商榷，宣言认为该报“基本上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其实不然。事实上，无论是从经济背景还是从政治立场来看，新记《大公报》都属民族资产阶级无疑。宣言这番诚恳的但有几分言过其实的“自我讨伐”，成为了《大公报》日后承受不公正待遇的一个重要“口实”。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二节 后期新记《大公报》的新闻与言论

一、为争取抗战胜利而着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英美立即于次日对日宣战。9日，与日本交战已达4年之久的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欧亚美洲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从此，穷凶极恶的军阀日本“真正走上切腹之路”。

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根本转机并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的国统区却呈现出越来越不景气的局面，国民政府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作为一张爱国的、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希望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对此十分着急，为帮助国民党政府扭转这种局面，《大公报》做了很大的努力。

（一）提倡“紧缩通货”

抗战前，中国的垄断资本就已经垄断了金融业。抗战中后期，蒋介石政府以抗战为由，利用发行公债、增加税收、膨胀通货、管制外汇、买卖黄金、专卖制度、统购统销等手段，掠夺了巨额财富，使国家垄断资本更加膨胀起来。同时，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大官僚，凭借手中的权力，利用经办国家垄断资本企业的机会，聚敛财富，使私人官僚资本也迅速膨胀起来。这样，就大大打击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国统区的经济每况愈下。

无论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还是为抗战前途和整个民族利益着想，《大公报》对国民政府的官僚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垄断膨胀，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厌恶，尤其对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表示了担忧。

1940年夏天，四川粮价跳涨，民众怨声载道。王芸生曾于6月29日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天时人事之雨》，主张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价。到第二年，国统区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年底，《大公报》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不满情绪一股脑儿地都发泄出来了。

1941年12月2日的社评《收缩通货及信用之紧急处置》首先说：“现在物价飞涨，已明显地成为恶性循环。事势急迫，已需要政府及各界群策群力，用救急的手段来处置。我们觉得不应当再讳疾忌医，而应当大声疾呼，指明危机的根本在于通货及信用之膨

胀。”文章在分析了通货及信用膨胀的原因后说：“当前紧要的事情有两桩：一是收缩钞券，一是收缩信用，而根本便是收缩事业。”

3日的社评《市明年度的预算谈紧缩》进一步指出：“紧缩之政，要先从中央做起：一、莫设新机关；二、少办新事业；三、现有机关也要加以调整与紧缩。”文章列举了官吏兼差冗滥、机关庞大重叠的若干事例后，希望“政府一定要下大决心，来纠正这种风气，那不但节省国家的开支，同时也收到了修明政治之效。”文章最后说：“抗战已到决定阶段，军事稳，外交好，而较弱的一环是财政。我们为了撑过艰难的阶段，争取胜利的光明，要紧缩公私生活，乃是目前救国工作的第一义。”这是从争取抗战胜利的高度，提请政府下大决心实行紧缩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借机继续申论“紧缩”问题。12月13日发表了题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于我国经济财政的几点建议》的社评，认为制止通货膨胀，必须“彻底管理银行”。社评认为，“近来操纵物价的投机事业，大都是通过银行的金融资本，所以管理银行资本，乃是目前的最急务。”银行经营投机事业，“不仅商业银行有，就连国家银行也不免。”因此强调：“管理银行，国家银行也得管理，对商业银行的管理尤其要严格。老实说，现在的立法，需要和他们为难，就把现有的商业银行关掉一半，也不算多。”这篇社评，尤其是其中关于银行利用国库的钱以“信托部”、“公司”的名义经营投机事业的论述，正好触到了官僚资本操纵者的痛处。12月16日发表的社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中国财政经济》继续戳痛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有些商人预料各种消费品之类来源阻断，补充困难，于是抬高售价，“简直是趁火打劫”。指出：“我国要明白这种偷安发财的坏念头，其对中国抗战经济所给予的打击，比之敌人的轰炸更凶。敌人滥炸所破坏我们的财富，真是微不足道。我们现在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尽是我们自己想享乐发财这念头所造成的恶果。”

《大公报》这一系列论紧缩的社评发表后，得到许多人的同情和拥护，但也有不少人怀疑和反对。1942年一开年，《大公报》又

连续发表社评，从不同的角度，对“紧缩”的主张进行了申论。1月3日的社评《为什么要紧缩建设事业？》，从“军事统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国策”的高度论述了为何要紧缩建设事业。1月10日的社评《信用紧缩的着手处》认为，信用紧缩应该找到一个能把握工商企业的全貌，因而能间接支配一切事业与一切消费的枢机着手，这个枢机“只有金融业”。接着，1月12日的社评《信用统制的机构与技术》，便主张将四个国家银行合并成一个名实相符的中央银行，或者联合成为一个准备银行。1月20日的社评《通货收缩与预算平衡》主张从精简机构着手，达到“紧缩财政”的目的。现在“机关多而经费少，人员多而俸给少，着手的事业多而成功的少。为三‘少’之‘少’就是因为三‘多’之‘多’。痛快的裁机关，减人员，减事业，而同时增加每机关的经费，每一人员的俸给，其结果是办事效率增高，而成功可期”。1月26日的社评《申论紧缩》对宣传“紧缩论”以来的社会反应进行了归纳，并就要办的一部分紧缩工作的实行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作为此次宣传的小结。

操纵国民政府的“四大家族”以及大大小小的投机官商，正是要依靠膨胀政策来发展私人官僚资本，《大公报》紧缩政策论的宣传，只不过是空喊一阵而已，既不能解决重庆的物价问题，更不能解决国统区的经济腐败问题。虽然如此，《大公报》的这次宣传是成功的。连续发表10多篇社评，论述一个相同的观点，提倡一种相同的主张，在当时形成了一种舆论，社会谈“节约”成为一种时尚，就连蒋介石的文告、国民党会议的决议以及国民参政会的议案中，都曾出现了“节约”、“紧缩”一类的词语。

（二）主张“修明政治”

应该说，抗战初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治上还比较开明，文官忧国事，武将赴疆场，甚至慷慨就义壮烈殉国者不乏其人。但是到了抗战的中后期，在经济腐败的同时，政治腐败也日甚一日。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当官者以权谋私，结党营私，贪污腐化、草菅人命。这些人置民族利益、抗战前途于不顾，所考虑的只

是升官发财和个人的进退。

从维护民族利益的角度，《大公报》对国民党黑暗的官场表现出了相当的反感。早在张季鸾逝世之前，1940年8月20日就发表过一篇题为《如何达到清明政治？》的社评，对官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数落。这篇社评只是一般地罗列了一些现象，还没有往细处、深处说。1941年底，王芸生抓住了一根往细处、深处说的导火线——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胡政之陷于香港。12月9日由香港飞渝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珊瑚坝，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穿着男子西装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王芸生得报，甚是气愤。过了多日，仍无关于胡政之下落的消息。恰巧这时国民党在开五届九中全会，为缓和人民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厌恶情绪，于12月20日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抓住机会，借题发挥，于12月22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在拥护国民党决议案的口号下，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狠狠地抨击了一通。

社评首先说：“看政治现状，政府机构既缠夹不清，人事制度也形貌不全。稍负时望的人，因为负担太重，为兼差忙得要死，而做不成事；一些略有才具的人，正因为法多而疏，人杂情重，而公然作恶；至于一般挂名唱诺之辈，不负责，领干薪，开起会来，则人多嘴杂，莫衷一是。当然谈不到办法与效果。为今之计，所有政府机关，一要全部厘清其系统，二要逐个考核其执掌，系统紊乱或重复的，就毅然将其裁并，执掌空洞的，就决然把它撤销。”这里首先提出了裁并重复机关、裁减冗员的问题，接着提出了“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和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下了一所公馆。国家升平时代，为壮观瞻，原不妨为一部之长置备漂亮的宿舍，现

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踞办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受，于心怎安？……另闻此君子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这里不仅揭载了“飞机洋狗”事件，而且又亮出了一个私行不检、利用公款购置私宅的“某部长”。“某部长”者，外交部长郭泰祺是也。此人于1932年起出任中国驻英大使，1941年4月回国任外交部长。《大公报》这篇确有所指的社评发表后，社会上顿时沸沸扬扬。“飞机洋狗事件”和“某部长轶事丑闻”成为重庆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为了向国民有所交待，蒋介石在正在进行的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当即提议将郭泰祺撤职，以宋子文继任。另外，关于文中所说的“老妈洋狗”问题，交通部长张嘉璈出而于12月29日致函《大公报》进行了一番辩解。《大公报》将这封信标以《交通部来函》的五字标题，刊于12月30日第3版末。

1942年2月2日的社评《调整机构提高效率》指出了国民党政治机构的弊端：“我们考论中国政治组织，是衙门多而效率低，空的衙门多而做的衙门少。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上有三冗，冗事、冗官、冗衙门。而冗衙门，中央尤甚于地方。”

3月5日的社评《罢土木，汰冗滥》，根据“读者投书”反映巴县政府征工裹粮，误违农时，消耗民力，费糜国用而大修其衙门的情况，指出“中国历代衰敝之世，除天灾人祸外，往往有发自朝廷的两种浪费，一是兴土木，二是增冗员”，并着重分析了增冗员的危害：“仕途的冗滥，实有两种大害：一是扯低了行政效率，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了反倒不做事，二便是耗费国帑。”

8月19日的社评《从林世良案说起》，以中信局职员林世良贪污案为题，生发开来，指出国民党政府法律失灵，贪官污吏如百鬼昼行。

1942年夏秋，河南大灾，三千万同胞大都深陷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有人把妻子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1943年2月1日，《大公报》刊载了本报记者张高峰寄自河南叶县的通讯《豫灾实录》，对这种惨绝人寰的情

况作了详细报道。次日，发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说：“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说，征购情况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社评将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不管灾民死活，照样课税征粮的国民党官员比附为封建社会捉人、逼赋的“石壕吏”，倒也十分贴切。然而得罪了国民党蒋介石，这篇社论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便派人送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

尽管如此，《大公报》并没有屈服。“修明政治”的宣传一直持续到1944年年底。1944年12月19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为国家求饶》的社评，“向官僚及国难商人们，为国家有所请求”。社评先对“官僚”们说：“这些人，既无主义，又无理想，做官只为个人的利禄与妻妾子女的供奉。也谈不到操守，只要有钱可捞，什么坏事都敢做，他们做官的秘诀是‘推’、‘骗’，而归纳一个字，就是‘混’……我们抗战所以那么艰苦，现在还难关重重，一大部分原因，就因为这类官僚在那里鬼混的缘故。”社评再对“国难商人”说：“国难同人们，这几年财也发够了。他们囤货居奇，伤天害理，把物价拍得这么高，把后方经济搅得这么乱，国家吃他们的苦，一般军民同胞也都吃够了他们的苦，而他们穷奢极欲，挥金如土，只知一己的享乐，而把国家抗战却置诸脑后。现在，我们也要诚恳的乞求他们，时至今日，你们应该罢手了，请你们饶了国家吧！”最后指出，那些“非官非商、亦官亦商以及潜伏在大团体里的混食虫们”，“他们有的在机关，有的在军队，有的在社团，利用势力假公济私，把公款经商囤货，走私漏税，一般商人做不了的买卖他们都敢做，一般商人发不了的财他们都能发；他们也许嘴里还仁义道德，像个人样，而实际的罪恶暗无天日。”这篇社评写得十分沉重而又十分激愤，将国民党的官场和商场中的丑恶，将官商勾

结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

（三）发起“爱、恨、悔运动”

1942年下半年，重庆各界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发起劳军捐款活动。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和宣传，情绪虽然热烈，然捐款的数目实在寥寥，在甲第连云巨富丛集的陪都，才募资500万元，每名战士只能摊到一元钱。而那些有钱人，纵使煤炭贵如金，他们依然燃着熊熊的窑炉；纵使布帛稀如珍，他们也一样成匹成匹地抢购。面对这种情况，《大公报》12月28日发表题为《天寒岁暮念灾黎》的社评，大声疾呼，希望“唤出人类最本能的同情心”！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在抗战期间，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了呢？如何“砥砺一种刚健弘毅刻苦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代替现时一部分泄泄沓沓的人心”呢？《大公报》陷于深深的思考之中。

经过思考和研究，王芸生以为应该用一种哲学精神，才可以打动人心。于是，选定“爱”、“恨”、“悔”三个字来写文章。在他看来，耶稣济世是由于爱，马克思倡导社会革命是由于恨，佛陀普度众生是由于悔。爱、恨、悔都可以产生改造社会的力量。

3月29日，借黄花岗纪念日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开幕的日子，《大公报》上发表了王芸生写的题为《我们还需要加点劲！》的社评，作为发动爱恨悔运动的开场文章。社评说：“我们或许需要一种运动，把沉闷萎废的人心加以激荡，给要努力做事且要做好的人们加些勇力。”文章给运动提出“爱、恨、悔”三种精神元素，并具体解释说：“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的，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同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视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的过失！”3月31日，《大公报》又发表了王芸生写的题为《提高人的因素》的社评，以心物二元论来分析人生，归纳出

“提高人的因素”的命题。认为：“需要发挥爱、恨、悔三种精神元素，爱所当爱，恨所当恨，悔所应悔。由内心的爱，内心的恨，内心的悔，发为蓬勃热烈的运动，蔚成沛然莫御的风气；把人的因素提高了，将可冲破一切艰难坎坷，宏开无穷的国运！”

这篇社评发表后，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对，认为恨是马克思的学说，大公报有替共产党作宣传之嫌。并通过陈布雷示意大公报不要再发表这类文章。“爱、恨、悔运动”就这样夭折了。

（四）为胜利而着急

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连连胜利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是连连失利。对此，《大公报》更是满怀如焚的焦急，发出了“在大艰难中作大努力”的期望。

1944年5月下旬，日军聚集36万兵力与中国守军第九战区各部会战湖南。5月29日、30日两天，《大公报》连续在第2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湖南战况，并于6月2日发表社评《论渝湘战事》，鼓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争取胜利。

6月18日长沙失守后，衡阳保卫战旋即展开。8月4日，《大公报》发表题为《感激衡阳守军》的社评说：“我们真感谢衡阳守军！……他们以必死决心，作浴血战斗，抗住了敌人的凶锋，昂扬了国军的士气，安定了全国的人心，更坚定了上下一致的信念。”

8月8日衡阳沦陷后，桂柳会战开始。9月23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在大艰难中作大努力》的社评，希望各方齐心，共同奋斗，以扭转颓势，挽回败局。

11月10日、11日，桂林、柳州相继失守。20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军事与大局》说：“抗战必能胜利，这是大势的必然。但同是胜利，也可以胜利得很难看。若要胜利得像样子，就必须打得像样子。努力打仗，甚是要紧。”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在这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国民党军队却继续着战场上的溃败，从河南溃败到贵州后龟缩在川黔山地，不能参加对日寇的最后反攻，军事上的“惨胜”已成定局。6月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着急两点》，

对军事上的被动局面表示忧虑。13日,《大公报》又发表题为《胜利逼人》的社评,指出为了体面地迎接胜利,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准备军事力量,在自己战场上,到处作主力的反攻,就能加速敌人的崩溃,善收战果……第二,要切实掌握国家的统一与团结,才能使胜利不成空谈,使国家立于巩固的地位。”

虽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但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苦战,中国战场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已连成了一体,中国的抗战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迅速发展。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大时代展开了》,为胜利而欢呼。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大公报》发表题为《日本投降了》的社评说:“在八年苦战之余,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真是感激,在笑脸上淌下泪来!”可以说,这幸福的泪水,正是《大公报》用在争取抗战胜利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换来的。

二、为避免内战爆发而发出警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其主要矛盾已由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及其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鉴于两种政治势力的严峻对立,《大公报》早就预感到了内战的危机。为了避免内战爆发,《大公报》早在日寇投降之前就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国共争端的建议。抗战结束后,《大公报》的“息战”呼声更高,既瞩目“重庆谈判”,又欢迎“马帅调停”,也赞成“政治协商”。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如《大公报》所期望的那样。随着内战一天天地迫近,《大公报》焦虑不已,于是向各方发出了“警告”。

一方面,警告国民党“莫失尽人心”。1945年9月10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大公报》于当日发表社评《由抗战到建国》,提出了“谨防胜利到来后的人心大开闸”的惊世命题,分析说:抗战八年,“有不少人实在是‘混’胜了的。且有不少的人在

混浑了的水里摸着大鱼”。胜利后这些人还会“混”。因此提醒国人要防止社会风气与道德人心的颓废和堕落。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大公报》所料。国民党政府派往收复区的“接收大员”们涌向各地，广掠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大闹“五子登科”。面对这种情况，《大公报》于9月14日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文章在历数了国民党政府官员在收复工作中的种种“勾当”后警告说：“收复失土，接收敌伪所攫取的财产，迎接我们受苦的同胞，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起，登之衽席，这是抗战一项任务，既庄严，又神圣。肮脏的手，漆黑的心，都请远远离开，不要污染这一庄严神圣的任务！”27日，《大公报》又发表题为《莫失尽人心》的社评，进一步警告说：“在热烘烘乱嚷嚷中，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在十几天前我们就曾著文呼吁‘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现在我们要呼吁‘莫失尽人心’了。”

然而《大公报》的几句警告不足以惊醒如醉如狂的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们，各地的“劫收”浪潮仍是有增无减。《大公报》派往南京的特派员张鸿增根据采访所得，撰写一篇通讯《休说重庆来！》，记叙了复员到南京来的“重庆人”的胡作非为。《大公报》为使此问题能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9月24日在刊登这篇通讯的同时，还发表了王芸生写的题为《为浙江人民呼吁》的社评，指出，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使收复区的“极大部分的人受到了胜利的灾难”，“才只短短两个月，京沪一带人深深的由生活体味中厌恶了甚至憎恨由重庆去的人”。

更有甚者，国统区甚至还出现了特务殴打、绑架进步民主人士的事件。1945年发生于昆明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发生于重庆的较场口惨案以及南京的下关惨案等等，都是国民党特务所为。对此，《大公报》表示出极大的愤慨，认为这是一种最为卑鄙可耻的行径。下关惨案发生的次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反对干涉，拥护民主》的社评，严厉指出：“在政治的基本观念上，政府有一个原则错了……一个原则错了，满脑子是‘官’，又是管制，又是

教训，这样把国家带上与人民对立的封建专制的死路去了。我们希望政府憬然悔悟，放弃干涉政策，尊重四万万五千万的主人翁，给人民应有的自由，让民间生产发展，这样，才不致同归于尽！”^①“李、闻惨案”发生后，《大公报》于7月19日发表社评《李公朴、闻一多案感言》指出：“由于李公朴、闻一多两氏之死，使我们发生无限的感慨、暗杀，是人类一种最卑鄙最可耻的行为……李公朴、闻一多都是无拳无勇的文人，假如说两人本如鸿片之轻，而遭如此凶死，其意义却有如泰山之重。假如两氏之死是有政治背景，则前方兵争，后方暗杀，那岂不是国家大乱的象征？”

总之，为了避免内战爆发，《大公报》希望国民党政府廉洁自律，赢得人心。然而一切努力终归白费，国民党早已“失尽人心”了。

另一方面，警告共产党“勿以兵争”。应该承认，《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态度在抗战前后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抗战前，《大公报》坚决反对共产革命，主张取缔共产党、剿灭工农红军；抗战中，《大公报》开始在副刊上发表赞扬共产党的作品，并且在正张上也刊登了不少为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美言的文字；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承认共产党为中国最有力量之第二大党，并认为国家政局的好坏全在国共两党是否团结。但是，由于《大公报》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只是将其看做一般的“在野党”，而且从资产阶级宪政观点出发，认为党派不应有军队，所以它警告共产党，要其交出军队、勿以兵争，要求共产党像西方国家的在野党那样，走所谓堂堂政争的道路。1945年11月2日，《大公报》在题为《中国政治之路》的社评中谈到了对共产党领袖的要求：“假如我是毛先生……我早已经告诉国人，中国的革命还是国民革命，应该实行三民主义。我绝没有打碎国家的形式而组织一种类似苏维埃政权的野心……我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但并不必由共产党专政……我争党的地位公开，我争各种基本的人权自由。这一切，都是民主的

^① 载《大公报》（重庆版），1946-06-25。

原则，我都必争，我都不让。这一切得到保证，我即宣布取消边区政府，我即宣布改组我党的军队，使之—律国家化。”《大公报》哪里知道、如果真是这样，共产党便不成其为共产党了；它更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也决不可能让共产党存在下去了。

重庆谈判还在进行，蒋介石便急不可耐地要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故有10月中旬的上党、邯郸之战，结果是国民党军队大败而退。《大公报》不辩是非，于11月20日发表社评《质中共》，阐述了三个观点。第一点是说“今天的局而演成”，朱德于8月11日发布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得缴敌军之械，受敌军之降，编遣伪军”的命令“是一个根源”。第二点是说一个国家有两个系统的军队决不应该，并独独指责中共道：“看北方的战乱局面，很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是中共意欲凭它的力量，凭它的武力，做到‘会谈纪要’中所要求的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特殊化。”第三点是要中共放下军队：“我们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争政……为共产党计，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权，以争全国的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何如兵气销为日月光？”然而共产党决不可能如《大公报》所希望的那样，放下军队，走所谓“政争之路”；国民党也不会如《大公报》所希望的那样，实行民主政治，给共产党以“政争”的机会。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首先在东北动手，于1946年4月14日苏军撤离后与共产党在长春展开争夺。《大公报》于15日在要闻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题为《长春苏军昨已撤去，共军攻击接踵而来/国土既归来，还流同胞血》的消息，又于次日发表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说：“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且已攻入市区。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这显然是说，由于中共的军队四面八方打来，所以导致“还流同胞血”。社评还相信国民党方面制造的谣言，说中共军队“常常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

后面奋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

4月17日，《大公报》重庆版、天津版都刊登了《可耻的长春之战》这篇社评，使得本已愤怒的中共更加愤怒。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的社论，针锋相对地予以坚决反击：“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不但效劳而且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替刽子手当走狗。”《新华日报》用如此严厉的言辞回击“社论作者”王芸生，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三、内战爆发后由反共到拥共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以猛烈炮火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扬言要在“四十八小时内消灭李先念部”，创造“惊人的胜利与奇迹”，内战由此全面爆发。随着内战的进程，《大公报》的言论立场逐渐发生重大转变——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而与共产党的距离越靠越近。

这种转变从1946年“国民大会”召开期间显露端倪，到1949年6月《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完全显山露水，以1948年年中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反感国民党政权的所作所为。

1946年10月11日，即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坚决反对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民盟表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决不参加一党国大”；许多无党派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代表，也纷纷拒绝参加国大。如前所述，虽然胡政之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而出席了国大的开幕式，但《大公报》对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也颇为反感。10月14日的社评《为国民大会设想》就明确指出：“在政府方面，或者以为在这个军事优势下，则各党派容易就范，纵使各党派不来，则国大也照样

开，也能够到足开会人数。政府的看法假使是如此，则其结果，大概是其他党派不参加，到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开一个差不多没有反对意见的国民大会。果真如此，那个国民大会的结果及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对于《大公报》的这些意见，蒋介石没有理会，国民大会于是如期召开。

大会期间，国民党右翼顽固分子蓄意扰乱会场，反对政协决议的宪章原则，并与立法院一唱一和，大放厥词。对此，《大公报》于11月20日发表社评《一个可怕的概念》予以评驳。文章说：“某立法委员更讲出‘相信我们的主义，才能做我们的国民’的话。这话严重极了，这话就代表着一个很为可怕的概念。由此观念出发并发展，那就注定是一党力图独霸；而国家终于分裂。”25日，“国大”按照蒋介石的意思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后，宣布闭会。对于这部完全违背了制宪原则的宪法的出台，《大公报》在次日的社评《国民大会闭幕了》中予以了批评：“所产生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就文字与精神，在这时代，均不算十分理想……这部宪法的最大缺点，还不在于它的本身，而是这次的制宪国大缺少了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一个主要党派未参加，而半个中国还在打着内战，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这里所谓“一个主要党派”，指的是共产党。这表明《大公报》此时已经明确意识到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及其黑暗统治日益为人民所不满，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胜利，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以浩大的声势展开了。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中所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对于风起云涌的进步学生运动，《大公报》持明显的同情甚至支持的态度。1946年12月24日，北平“沈崇事件”发生后，《大公报》及时报道了学生们的示威活动，并发表社评《抗议美兵暴行》（1946年12月30日）以为对学生的声援：

“北平美兵对女生暴行事件，只有大学生起来抗议，这说明一般社会的沉默。然而世间本来也有沉默的抗议。至于学生，血是热的，其动机是单纯的。几个大学今日罢课一天表示抗议，这也是热血沸腾的证明。”

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特务同时在南京、北平和天津殴打、逮捕学生，酿成“五二〇血案”。《大公报》于次日发表题为《演变中的学潮》的社评，指出学生“争民主，争和平，已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成为全国人民普遍的呼声”，并希望政府“首须理解学生，须尊重学生的立场，持大体，尚容忍，而无取乎任何方式的干涉或压迫。因为干涉压迫的结果，只有使学潮激荡横决，以至不可收拾”^①。同时发表短评《离京的不幸事件》，指出“五二〇血案”完全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蓄意镇压所致。

1948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此时国共双方的军力对比及战争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面临全线崩溃。国民党在第一条战线上的失败，必然导致它在第二条战线上的疯狂。7月8日，国民党政府勒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南京《新民报》在抗战胜利后，以超党派的民间报自居，对国共和谈、中美关系、学生运动等刊出的消息和言论，大都违悖国民党政府的意旨，如果蒋介石的日子好过一点，对它尚能“宽大为怀”，留着它作为“民主”的装饰。眼下时局吃紧，战场连连溃败，于是，蒋介石便对它不客气了。《新民报》被查封，国民党《中央日报》等反动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叫嚷封得好，有的还说“封得太晚”。《大公报》等则与此相反，对蒋介石镇压民主、钳制自由的行为表示了应有的义愤。7月10日，《大公报》发表题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严厉指出：“这个法，是袁政府时代的产物，国民政府立法院虽略有修正，而大体仍因其旧，实是一件憾事……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人民可以公开抨

① 载《大公报》（上海版），1947-05-21。

击政府施政，在野党在宪政轨道中尤其以推翻政府为其能事，那非但不犯法，且是一种特权。”这篇措辞激烈的社评再次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中央日报》连发两篇社论向《大公报》开火。这说明国民党政府也已明确意识到《大公报》的言论立场正在发生着转变，并公开对其宣战了。

后一阶段，弃旧迎新。

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所致，1948年下半年后，《大公报》各馆之间彼此失去联络，总管理处对各分馆无法进行言论方针的指导，因而《大公报》这一时期的言论倾向没有过去那样而定统一。依照《大公报》以总编辑的言论为报纸言论的惯例，考察王芸生在这一年中的言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个中心思想——弃旧迎新。

先看“弃旧”。

以1948年11月10日《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为标志，《大公报》的言论立场发生了质变。至1949年2月，香港版在王芸生亲自主持下，发表了一连串文章，抨击国民党昏聩无能的统治。针对国统区经济总崩溃的现实，《大公报》香港版于1948年11月11日发表社评《这是通货膨胀的恶果》说：“坏局而一天天的加甚严重了……一种局面，迫得小民拿出最不得已的求生力量去拼命抢米，可说是不能再坏了。”13日的社评《政府宣告金圆券贬值》则指出：“币制改革之初，原定金圆券最高发行额为二十亿元，不得超过。现在才短短不足三个月，二十亿即已发足……这就是说，金圆券要在二十亿以上继续增长。中国的膨胀浩劫仍要继续扩大，人民的生活更要困苦，更要不安定。”

人民解放军发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的倒台已成定局。蒋介石迫于种种压力，宣布“引退”，安排李宗仁代理总统。对此，王芸生于1949年1月22日为《大公报》香港版撰写社评《蒋宣告引退》指出：“李宗仁氏暨孙科内阁应该了然，当前的事势，已到了国民党结束其政权之时。无论甘愿不甘愿，都非如此不可。速了，则可减少人民痛苦；迟延，则必更增个人罪戾。事势如

此，其间再无操纵运用之可能了。”这段话实际上是在敦促李宗仁、孙科向中共投降。为了进一步揭穿蒋介石的独夫面目，王芸生还于25日在《大公报》香港版上发表题为《蒋介石的襟度》的社评说：“蒋的襟度是：刚愎自用，惟我独尊，反民主，反自由，并且嫉视人民……他越是反民主，反自由，嫉视人民，结果他就失败在要民主争自由的人民手上！”

再看“迎新”。

时间进入到1949年，共产党与国民党、新与旧、光明与黑暗的决斗胜负已成定局。《大公报》弃暗投明、拥护共产党的态度也愈加明显。新年元旦，《大公报》香港版刊登了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展望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文章满怀激情地指出：“今天东方一亮，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就到了，三十七年就过去了。这到来的是新的到来，那过去的是旧的过去。新的应该发荣滋长，旧的应该是永远的过去。那过去的是战争的痛苦，人民的磨难；是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战争痛苦，两千多年专制封主高压下人民的磨难。这到来的应该是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业已过去了，一切可诅咒的旧东西都应该把它甩掉；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业已到来，我们要迎接一切新的光明。”

5月27日，王芸生回到解放了的上海。6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了王芸生执笔写的社评《大公报新生宣言》，表明该报最后“弃暗投明”的立场。7月7日，适值全面抗战爆发十二周年纪念之时，上海版发表题为《军容如山人如海，上海人民真喜欢》的社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盛赞解放军的威武整肃，表达上海群众欢庆解放的喜悦之情。9日，王芸生撰写社评《支援前线，慰劳解放军》，以人民报纸的身份号召后方人民努力做好支前工作，说：“我们要支援前线！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支援前线，使前线战士无所顾虑，无后顾之忧，放心去打仗！”8月26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王芸生为纪念上海解放三个月而撰写的社评《上海在新生》，对上海解放三个月以来的巨大变化予以了总结，进而指出，上海的变化是全国变化的缩影，上海在变，全国在变，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节 胡政之和他对《大公报》 的贡献

一、一个新闻事业的全才

1948年3月10日,胡政之在《大公报》香港版的编辑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说他已经60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他对事业的最后开创。胡政之的这番话主观上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悲观,没想到应验在他自己的生命上。在《大公报》香港版复刊一个多月后,4月24日夜,胡政之伏案工作时忽然病倒,鉴于他病情严重,港馆决定请他回沪治疗。4月27日,胡政之以沉疴之躯飞回上海,从此一病不起,于次年4月12日寂然逝世,享年61岁。

一个新闻事业的全才,就这样走了!

胡政之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不久就投身新闻界,如果从1913年受聘于上海《大共和日报》开始,到他生命的终结为止,除去1915下半年至1916年上半年大约一年的时间混迹政界外,胡政之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奋斗了35年。在这35年里,胡政之办过报纸,办过新闻期刊,办过通讯社;他在媒体担任过许多职务:翻译、编辑、主笔、总编辑、驻外记者、经理兼总编辑、经理兼副总编辑、董监事联合办事处主任、总经理等。曾经是胡政之部属的老报人徐铸成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功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①

^① 徐铸成:《报海旧闻》,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胡政之在担任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期间，厉行整顿，一手抓政治新闻的采集，一手抓报纸印刷质量，使《大公报》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及时报道中德绝交、中德宣战、张勋复辟、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特别是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胡政之亲自采访马厂誓师的消息，并发表了详细报道，胡政之和《大公报》一时间名声大振。事后，胡政之不无得意地回忆：“张勋复辟之役，本报言论记事，翕合人心，销路大涨，一时有辛亥年上海《民立报》之目。”^①

1919年初，胡政之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赴法国采访巴黎和会，成为到会采访的惟一中国记者。

1921年，胡政之到上海国闻通讯社担任总编辑，负责编辑和采访诸事。凡是重要政治新闻，他都要亲自采访、亲笔撰稿。后来，他感觉到办通讯社只能给各报供稿，不能发表言论，于是在1924年创办了《国闻周报》。胡政之在《国闻周报》上开辟了“一周简评”、“时事论文”、“外论介绍”、“文艺”、“书评”、“新闻图片”、“时人汇志”等栏目。可见，他不仅重视“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而且更重视言论的发表和权威舆论的养成，在《国闻周报》上，胡政之经常有重要通讯和言论的发表。1924年，他在题为《国民对于大局应取之态度》的时评中说，要想建立一个强大国家，首先国人要一洗平日漠视政治之积习，取研究国政之态度。“五卅”惨案发生后，胡政之在《国闻周报》第2卷第21期上发表了题为《南京路之血》的文章，为爱国的中国民众竭力辩护，向开枪屠杀民众的帝国主义者提出严厉批评和强烈抗议。

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创刊后，胡政之虽然任经理之职，全面主持报馆的经营管理工作，但是，他也没有忘记“副总编辑”的身份，还兼顾编辑业务。正如他在《回首一十七年》一文中所说：“创业之初，组织非常简单，我和张先生虽各司其职，

① 胡政之：《回首一十七年》，载《大公报》（上海版），1949-04-15。

但是写社评、访新闻，都共同负责。”^①

首先，胡政之作为社评委员会的成员，除了每天参与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外，有时还得亲笔撰写社评。

其次是碰到重要事件发生，他要亲自出访，采集新闻，撰写通讯。新记《大公报》的第一篇连载旅行通讯，就是胡政之1927年初南游汉、沪写的《南行观察记》；1928年5月底，国民革命军逼近京郊，6月1日胡政之由津至京，进行一系列采访活动，6月10日，发表著名的“北京特讯”《北都易帜记》、《阎白访问记》和《再度访问记》，完成“送往迎来”的任务。1928年9月至1929年9月，胡政之利用与东北军的特殊关系，三次出关采访，均有重大新闻见报和重要通讯发表。1928年9月，胡政之到东北，拜访张学良等人，采访到东北政局变化的新闻，撰写了9篇连载通讯《东北之游》；1929年7月，他再次出关，写了5篇连载通讯《再游东北》，及时报道了中东铁路纠纷；同年9月在蒋、冯、阎大战难解难分之际，胡政之三次出关受到张学良的单独会见，采访到张学良准备通电进关的独家新闻。

再次，亲自指挥外地记者的采访活动。新记开张之初，胡政之每天下午的主要工作就是详细阅读各地报纸，在与本地报纸的比较中发现新闻线索，然后发电报指示驻外记者，如何采访这些新闻。

二、胡政之对《大公报》的经营管理

虽然胡政之说《大公报》续刊后，“写社评、访新闻”，都是他和张季鸾两人“共同负责”，但是，胡政之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报馆的经营管理上，他对《大公报》的贡献，主要还在经营管理方面。正如王芸生、曹谷冰在《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一文中所说：“可以说，新记公司大公报是由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

^① 胡政之：《回首一十七年》，载《大公报》（上海版），1949-04-15。

的文章三者构成的。”又说：“经营用人之权全操于胡政之之手。”^①

事实上也是如此，胡政之主持新记《大公报》经营管理，对新记《大公报》的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组织建设

王芸生、曹谷冰在上文中接着说：“何谓胡政之的组织？胡政之属于王郅隆时期旧大公报的经理兼总编辑，他这时正经营着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新记公司接办旧大公报，编辑采访人员大部都是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的干部，经理部和印刷厂的职工大部是前大公报馆的人员，都是胡的旧部。”^②在新记大公报筹备之际，胡政之得心应手地召回和抽调了以上两部分人员，如召回原大公报馆副经理王佩之，原有职员曹乃武、陈树桐等；原《大公报》印刷厂一套人马；抽调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的骨干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杜协民等。

很快，胡政之就组建起了报馆的组织机构：



以后，陆续有上海馆、汉口馆、香港馆、重庆馆、桂林馆的建立，各馆的机构设置大体如此，略有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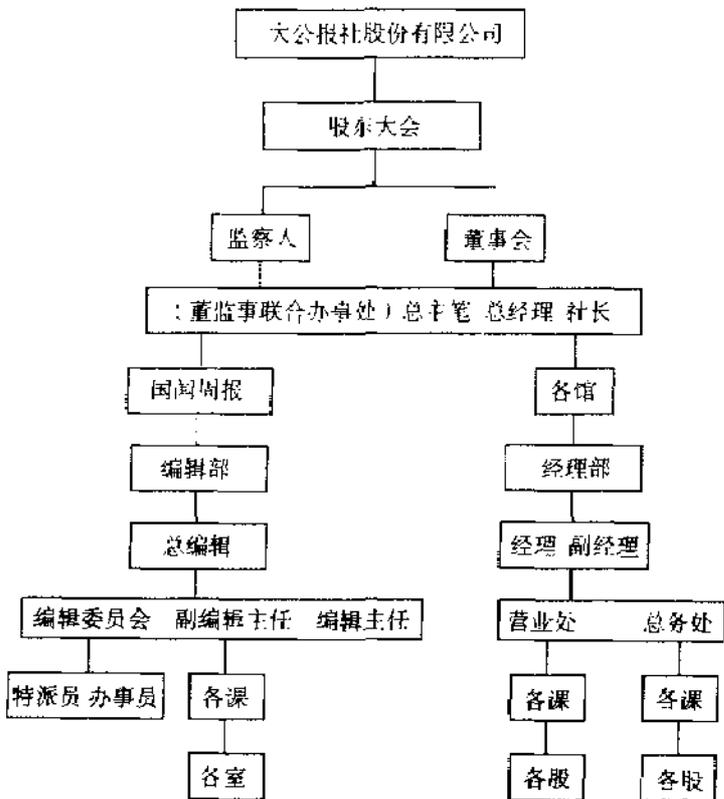
社长一职，自吴鼎昌 1935 年 12 月辞职之后，新记大公报馆，无论是总馆还是分馆再无此职务的设置；1937 年 7 月 15 日，依照当时国家公司法规定，正式成立“大公报社股份有限公司”，这时起有总经理之设，胡政之为总经理；各分馆只设经理、编辑主任，分馆设总编辑从重庆馆开始。胡政之、张季鸾分头坐镇，指挥各分馆的全盘工作，而他们俩人，穿梭往来，商量决定重大问题。这样

^{①②} 王芸生、曹谷冰：《新记公司大公报的经营》，见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3 页。

的情况，一直到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

张季鸾病逝后，胡政之到重庆宣布成立“大公报股份有限公司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对渝、港、桂三馆实行“集体领导”，并制定了《办事处规程》七条。规程写道：“董监联合办事处由董事会决议，推举董事3人、监察2人共同组织之。”9月15日，胡政之在本社同仁公祭张季鸾的仪式上宣布了《大公报董事会决议案》：（1）设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2）以胡政之、李子宽、王芸生三董事，曹谷冰、金诚夫二监事为委员，胡董事为主任委员；（3）由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综揽全社事务。

1942年4月6日，“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公布了大公报组织系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实力增强，组织系统也更加完善，更加细密庞大。1947年胡政之决定撤销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领导上海、天津、重庆三馆的工作。1946年7月13日，董事会通过了胡政之草拟的《大公报总管理处规章》，规定在上海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主要负责人除总经理胡政之之外，有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经理曹谷冰、金诚夫，副总编辑张琴南，总务部主任叶德真，业务部主任袁光中，编审部主任王芸生（兼），设计委员会主任费彝民，经济组主任方显廷等。

从以上组织结构的设置和变化来看，大公报社组织机构的设置是比较精干的，因此办事效率也比较高；同时还看到，胡政之一直处于领导机构的最核心位置，保证了对这个在全国设有分支机构的庞大的企业实行统一管理。

（二）队伍建设

胡政之认为，一张现代化的报纸不仅要有比较雄厚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因此，他精心罗织人才，精心培养，为《大公报》建立起了一支精干的队伍。

胡政之惟才是举，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除重用原来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的老人，还 very 注意发现新人，只要是他认为的有用之才，就立即揽进报社，委以重任。王芸生是同张季鸾打笔墨官司被看中引进报馆的；范长江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在平津各报上发表文章被胡政之看中的；徐盈、子冈、杜文思是从投稿者中被发现的……《大公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招考练习生。社会各界人士只要是想从事新闻工作的，都可以应考，一旦被录取，就进入报社进行培养，有不少人日后成为了骨干，如曹世瑛、孔昭恺、曾敏之、陈凡、罗承勋等。对于人才的使用上也是灵活多样，不拘陈法。如给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范长江以“旅行记者”的身份，支持他“西北采访”，一举成功；发给当时还是武汉大学学生的张高峰一个只有特派记者才能使用的“收报人付费新闻电报凭证”，证上注明“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字样，使其成为著名记者，等等。

由于注意人才的遴选、培养和使用，大公报馆人才辈出。《大公报》老人李纯青回忆说：“解放后，我好几次听见周恩来总理称赞道：‘大公报培养了很多人才。’‘大公报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事业心。’周恩来的过奖之言，大公报的人都十分感激。”^①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教授指出：“列入《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介绍’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累计达36人。被《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列为条目加以介绍的大公报编辑记者达12人，占全部人物条目108条的1/9。其中如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杨刚、子冈、徐盈、萧乾等，都有很大的知名度——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也长期为人们所称道。”^②

（三）制度建设

学法律出身的胡政之十分懂得规章制度对于管理好一个企业的重要性，尤其是随着《大公报》事业的逐步扩大，胡政之对制度建设抓得越来越紧。

新记《大公报》创办之初，报纸的发行数仅为1967份，年底也仅为3198份，广告收入为858元。据统计，创刊最初的三个月，每月累计亏损不少于三四千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胡政之建立了严格的财务核算制度，要求各分销处按时缴费，不得拖欠；同时建立严格的广告收费制度，即使是经理和总编辑为私事刊登广告，也必须照章缴费。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28年8月，报馆开始盈余；这年年底，报纸发行量达1.2万份，广告收入每月达3200元。

随着事业的发展，胡政之对大公报社整个事业发展的掌握，总是通过规章制度建设从宏观上进行管理。而在制度建设方面，重点是财务制度、内部分配制度和人员考核、任用制度，意在调动员工积极性，为《大公报》的事业发展做贡献。

天津时代，首先制定了《职工任用及考核规则》，其中规定六

^① 李纯青：《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载《大公报》（香港版），1986-03-15。

^②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2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项考核标准：“一、恪守规章，服从指导；二、珍惜公物，节省公费；三、勤奋好学，工作进步；四、勤劳敏捷，忠实服务；五、整洁精神，和睦有礼；六、其他有特殊辛劳者。”

1937年7月，“大公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吴鼎昌辞去社长职务，升任公司总经理的胡政之随即制定《大公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共七章三十四条，分总则、股本、股东会、董事及监察人、职员、会计、附则。

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为了加强内部管理，胡政之很快成立了“董监事联合办事处”，制定《董监事联合办事处规章》七条，对办事处的任务作了详细规定。

1942年4月6日，胡政之又指定和公布了《大公报各馆组织规则》，着重强调了经理部工作的重要性，对经理部的各项工作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并确定了二级财务核算的原则和办法；同时还公布了《大公报各馆采购材料规则》，此规则规定，内部开支由材料课、庶务课、出纳课三环相接，互相制约。可见胡政之是把严格开支、杜绝浪费作为强化经营管理的手段之一。

与此同时，制定了《大公报职员薪给规则》，“薪给”主要由五项构成：月薪、特别费、年终酬劳金、生活补贴、年资薪。其考核范围，除一般工作分量、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外，特别有一项“服务年资”。据说，这是胡政之借用日本企业的做法，意在鼓励员工终身为报馆服务。

特别值得书写的一笔，是大公报向有特殊劳绩的员工赠予本报劳绩股权。此项活动一共进行过4次，获此种股权者共27人。第一次有曹谷冰、金诚夫、许莹伯、李子宽、王佩之等5人，时间是1931年底；第二次有王芸生、杨历樵等2人，时间是1936年底；第三次有孔昭恺、袁光中、赵恩源、王文耀、王文彬、费彝民、萧乾、徐盈、李清芳、周绍周、黄钱发等11人，时间是1946年8月；第四次有张琴南、严仁颖、许君远、李纯青、叶德真、曹世瑛、左之蕃、樊庚生、于潼等9人，时间是1948年1月。胡政之此举的意义，在于它能够稳定骨干力量，鼓励青年人提高对报馆

事业发展的信心，从而形成安心工作、积极进取的局面。

（四）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胡政之等人常称，《大公报》是一个“公共机关”，说为社会服务是本报的“天职”。除了以文章报国、在版面上开辟各种为读者服务的专业性副刊以外，还经常开展各种社会服务活动。

其一，遇到全国性的灾难或地方性的不幸事件发生，发起募捐救助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至1936年的8年中，《大公报》发起的募捐服务活动有20多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为平津市郊贫民举行慈善演艺会（1929）、为陕灾赈款举行宣传周（1930）、为鄂皖水灾发起救灾日（1931）、为淞沪抗战募捐（1932）、为西安孤儿院代收捐款（1932）、代收天津地方协会捐款（1933）、为“中国华洋义赈会”代收黄河水灾农赈捐款（1933）、代收上海各界筹募各省旱灾义赈捐款（1934）、为江河水灾求赈（1935）等。

1937年以后，这种募捐活动更广泛，除了为灾民募捐，更要为劳军募捐。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大公报》发起劳军募金活动11次，赈灾募捐活动10次。为了使募捐活动收到好的效果，大公报馆常常带头出资，有时还要发表社评，论述意义，代为请求，言辞恳切，感人至深。

其二，在抗战期间，举办各种爱国宣传活动。最著名的有几次：

1938年6月，大公报汉口馆举行救伤义演。为了进行抗战宣传，大公报汉口馆组织了以马季良为首的剧团——“大公剧团”，自己出资，物色演员，自编剧本，排练三幕国防剧《中国万岁》，从6月16日到19日，4天共计演出7场。不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而且门票收入1.4万余元，全部购买药品分送给武汉各伤兵医院。另外，演出花费3000多元由报社捐助。

1939年，购买一架德制滑翔机，命名“大公报号”，献给国家，以此首倡中国的滑翔运动。早在1935年5月，胡政之赴日本考察新闻

事业时,得知日本新闻界提倡“飘翔”运动正热。胡政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想到,日后一旦与日本开战,空军力量举足轻重,而青少年的滑翔运动是发展空军的基础,于是,他详细询问了日本同业提倡滑翔运动的情形。回国后,胡政之随即请人做计划,请教练,准备在中国发起滑翔运动。由于在国外订购手续较繁,加之抗战爆发,运输困难,这架滑翔机直到1939年才运抵成都。是年10月20日举行“大公报号”滑翔机献机仪式暨试飞表演。

在《大公报》的热心提倡下,中国滑翔总会于1941年4月4日在重庆成立。为增进国民对滑翔运动的了解和普及滑翔知识,《大公报》还专门聘请中国滑翔出版社编辑创办《滑翔园地》专刊,从1941年9月5日起在渝版上刊行,直到1944年4月26日为止,共出版55期。

以上活动,也许不完全是出于胡政之的指示,但是其整体精神为他所倡导。

三、胡政之报馆经营管理的特色

胡政之对《大公报》的经营管理,不仅成效显著,而且特色突出。

第一、“营业与事业并行”的报业经营理念。1943年10月21日,胡政之在重庆大公报社编辑会议上有一段很精彩的话,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他的这种独特经营理念:“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与政治没有关系,且以不闻政治为标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自然与政治有了联系,为某党某派作宣传,但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的达到了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歇了。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之后,为中国报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起,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极点。但同时我们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

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之后，使报纸真正代表国民说话。”^① 1947年7月21日，胡政之对天津大公报编辑部同人讲话时，更明确地说：“一份理想的报纸，要兼顾营业与事业。营业能独立，始能站在超然地地位，不为他人所左右。”^② 他肯定地认为，新记《大公报》就是这样的一份报纸。

政党报纸旨在营政，一般不做营业，经费由政党津贴；商业报纸以不问政治为标榜，一门心思做营业，专门从生意上打算。胡政之的报业经营理念与上面二者都不相同。他明确地提出把报纸当营业做，这使得他对报纸的经营区别于政党报纸的经营；同时，他又强调，报纸必须与政治有联系，这又使得他对报纸的经营有别于商业报纸的经营。胡政之的报纸经营观可归纳为：营业不在营利，而在论政——经济独立，论政时才不被他人左右，保持言论独立；论政不为参政，而为国家利益，为代表民众讲话。营业是手段，论政、为民众讲话才是目的。要达到有效的论政和代言的目的，必须花气力做好营业，做到“营业与事业并行”。

第二，“重培养”的队伍建设做法。胡政之认为，已经成名的人，进来后很可能要一阵子就走，于事无补。所以他抓队伍建设，突出的一点，就是不用成名的大人物，而是注重选择有培养前途的新秀，给予充分的机会，让其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如前所说，《大公报》的一批鼎鼎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各个部门的管理干部，还是挑大梁的编辑记者，进《大公报》时，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进报馆后，在胡政之张季鸾等人的培养下，迅速成长起来。

胡政之在人才培养上也有很有特色，不是单打一地培养，而是综合培养，建设一支“编经通用”、“采编双精”的全才队伍。胡政之经常说，办好报馆，首先是编好报纸。但光有好的版面、好的内容，如果发行不力，广告很少，事业也无法维持。因此编辑、经理两部要紧密配合，相精相成，才能使馆务发达起来。他曾说，我们

^①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1页。

^② 载《大公报》，1947-08-05。

的报纸是文人论政的机关，“我们把经理部与编辑部打成一片，传统做法是，从编辑部选拔经理人才”^①。所以，《大公报》非常注意编辑部和经理部人员的打通使用，尤其是注重从编辑记者中选拔经营人员。《大公报》有一个传统做法，就是主管行政业务和经营工作的人，必须先到编辑部训练，必须先学习当编辑、记者，所以，它的经理、副经理都是选用编辑部的骨干担任。这样做可以沟通经两部，相互照顾，避免隔阂；使编辑部随时了解业务情况、经济情况，并使编辑部的意图在经营中得到贯彻。^②据一些老报人回忆说，从许萱伯、曹谷冰起，便立下了这个规矩。他们俩人都是在天津主编要闻版以后，升任经理部领导的。李子宽、金诚夫、王文彬、费彝民等，无一不是先在编辑部工作一个时期，而后调到经理部负责的。^③

即使对于采编人员的培养，《大公报》的做法也是采用内外互调的办法。人员进来后，先担任采访工作，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即安排做一般编辑工作；在编辑岗位上磨炼一个时期后，再外放各地做特派记者或特派员，工作取得成绩后，再调回编辑部任要闻编辑，并参与社评的写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当记者时明白什么是新闻，如何采访；再做编辑，就会知道做采访工作的甘苦，更能判断稿件的新闻价值，更好地处理新闻稿件。^④

第三，制度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内部管理。如前所说，胡政之为了管理好庞大的、曾经一时间有几家分馆的大公报馆，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并且很好地执行了这些规章制度。但是，同时胡政之也很注意对员工的关心和关怀，做到制度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这方面，有不少感动人的事例。

比如，《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规定：本社职工不得兼任社外有给职务。这一规定，由于胡政之、张季鸾等人带头遵守，所以一

① 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23页。

② 参见袁光中：《大公报的经营管理》，见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23页。

③④ 参见唐振常：《上海大公报忆旧》，见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199页。

直认真执行。徐铸成从北京调天津当一般编辑时，由于家庭一时困难，曾两度将采访到的新闻在传给报馆的同时打电话告诉汤修慧主办的北京《京报》，从而捞点外快。这显然违规了。后来，胡政之察觉了此事。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写到：“他（胡政之）一天找我个别谈话，很关切似地说：‘听说你夫人快要分娩了，家中开支要增加了。我已关照会计课，从本月起，你的薪水改为一百元。’他绝口不提《京报》的事。”徐铸成接着说：“我明明一再犯了这条戒律，这位铁面无私的老板却给我加了薪。”^①这次心照不宣的谈话，使徐铸成对胡政之和《大公报》感激之情倍增，在往后的日子努力工作，为《大公报》的发展贡献不小。

为了增强内部凝聚力，胡政之非常关心员工的生活，非常重视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天津时代，《大公报》员工的工资比较稳定，一般职员月工资30元左右，编辑一般100元左右，这在北方报馆中是比较高的。此外，报馆还规定，凡是职员父母整寿或丧亡，本人整寿、婚嫁及子女婚嫁，报馆都要赠送相当于本人两个月工资的赠金，其中一个月讲明代报馆同仁赠送，免得彼此酬酢造成负担。员工平时遇到生活困难，可以借钱，只要情况属实，胡政之从不拒借。一些老报人回忆说，胡政之精于筹算，但是很尊重人，对员工提出的要求，只要合理，都能满足。1929年初秋，徐铸成回江苏宜兴结婚，因经济拮据写信向胡政之告急，胡政之立即汇去100元，只是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盼兄以后多体物力之艰难。”^②

为了奖励员工创造性的工作，对有突出成绩的员工，胡政之还要发“红包”。此外，大公报社经常举行旨在提高员工参与集体活动、增进身心健康、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及业务进修活动。报馆还组织了同仁福利委员会、成立消费合作社，专门聘请了医药顾问，免费为员工及家属治病。报馆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老板为家长，上下之间，同事之间，和睦相处，都愿意为报馆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

^{①②} 徐铸成：《报海旧闻》，44页。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 出版的内地各版 《大公报》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民营报纸的 整合和《大公报》面临的 新形势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平津、沪宁等大批城市的解放，中国完成了对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清理，接管关闭了国民党党政军部门，官僚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政治力量经营的报业，并没收其一切设备资材，用于发展人民的新闻事业；但准许少量民间、党外的报纸继续出版。

在这种情况下，《大公报》面临着新的形势。

在解放战争期间,《大公报》以上海为总管理处,发行沪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报》。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对《大公报》的基本态度是,保留上海和重庆《大公报》,天津《大公报》改名后出版,香港《大公报》由于当地尚属英国方面管辖,不予干预。

DAGONGBAO BAINIANNSHI

第二节 重庆《大公报》与《重庆日报》

一、出版了74天的伪《大公报》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鉴于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遂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出面,于1949年8月15日电令西南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张群查封重庆《大公报》。

重庆《大公报》经理王文彬从西南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刘宗宽处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遣散职工,转移物资。重庆国民党当局眼见《大公报》要自动关门,就决定暂缓查封,转而强迫该报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王文彬没有理睬。9月1日,重庆《大公报》发表题为《信条与愿望》的社评,说:“消极方面,任何报人都应有起码的信条:①不作虚伪报道;②不因私害公;③不讳言错误;④不轻于毁誉;⑤不盲从人家;⑥不作违心之论”。并说:“积极方面:①坚持公是公非;②鼓励好人,制裁坏人;③表扬建设工作;④促进生产事业;⑤做到老,学到老”。

国民党重庆当局认为《大公报》社评这样的表态全是“废话”,利用不行,干脆派员“劫收”。9月17日,国民党重庆当局派彭革陈(曾任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长)为发行人兼社长、唐际清(曾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主任)为总编辑,强行占据《大公报》馆址,非法出版重庆《大公报》和《大公报晚报》。9月18日,重庆伪《大公报》和《大公报晚报》刊出一则“启事”:“本报紧急启事:本报与(设在上海的)总管理处关系早已隔绝,与其他各版言论编辑

违背创办宗旨者更渺不相涉。今后本报仍坚持民间报纸之立场，本‘不私不育’为社训，独立经营。兹经在渝董监会决定，正式宣布与总管理处脱离关系，并推定彭革陈先生为社长，继续努力，拥护国策，服务社会，尚希读者诸君不吝指教，为幸。”这则“启事”，以所谓“民间报纸”、“经济独立”、“不私不育”等虚伪标榜，借用“大公报”的“金字”招牌，企图欺骗读者。同日，还登有一则“王文彬启事”称：“文彬自9月18日起已辞去重庆《大公报》和《大公晚报》发行人兼经理职务，决偕眷赴北碚居住。在渝工作四年以来，多蒙各位长官指导，各界友好慨助，高谊隆情，铭感难忘。兹因临行匆促，未及一一走辞，敬乞，谅解！”

在彭革陈和唐际清主持《大公报》和《大公晚报》期间，这两家报纸的言论极力诋毁共产党，诋毁新中国的成立。因此，发行量一跌再跌，读者不愿问津。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彭革陈、唐际清等逃跑，出版了74天的重庆伪《大公报》和《大公晚报》自此终结。

二、回到人民手中的重庆《大公报》

1949年12月1日，王文彬返回报社，重庆《大公报》和《大公晚报》又回到人民手中。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大公报》继续出版，《大公晚报》停刊。

重庆解放初期，根据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对报纸的分工，重庆《大公报》着重团结工商界和知识界，该报的言论和管理工作仍由王文彬负责。重庆《大公报》在言论方面，积极配合军管会的工作，为稳定人心、恢复生产、社会治安等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50年4月4日，重庆《大公报》正式取得报纸杂志登记证，人民政府承认其为合法的民营报纸。王文彬专为此事撰写了一篇题为《本报今后努力的方向》的社评。社评说，本报向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收委员会申请登记，已获准发给报纸杂志登记证新

字第4号。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这次对于新闻杂志的登记，也采取了严格审查的慎重态度。本报获准登记，职工同仁甚为兴奋，深感今后任务的重大。其后，重庆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对市内各报（不论是党报还是民营报纸）一视同仁，提供采访便利。

三、重庆《大公报》的公私合营与新成立的《重庆日报》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中共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对《大公报》重庆版十分重视，支持其继续出版。

重庆解放后，中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渝出版，读者纷纷订阅党报，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太重视。因此，《大公报》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锐减。渝馆职工思想不稳定，认为党报工作有前途，有奔头，在私营报馆没有发展。王文彬回忆说：重庆市委书记曹获秋经常过问渝馆工作，得知业务收入减少，职工人数过多一事，市委领导立即表示：工人多好办，政府可以调走一部分。不久，根据重庆新华印刷厂的需要，第一次从《大公报》渝馆调走职工80多人。继因市邮局兼办报纸发行业务，又从渝馆调走熟悉发行业务的职工近20人。两次共减少职工约100人，加上当时自愿转业或回家的，大大减轻了职工工资福利等负担。其后，渝馆经济状况仍不乐观，继续维持有一定困难。王文彬派员到《大公报》上海总馆求援，并恳请公私合营。总馆本身只能勉强自负盈亏，无法接济渝馆。经王芸生的同意，总管理处派曹谷冰、李纯青到重庆，与中共西南局和中共重庆市委商议，设法解决报社的困难。这时的重庆，是中央直辖市，又是西南大区所在地，自《新华日报》逐渐面向西南全区，报道的领域扩大，版面并未增加，对重庆的报道亦相对有所减弱。重庆市委深感有创办一张机关报以指导工作的必要。商议结果是先将重庆《大公报》公私合营，仍用《大公报》名称继续出版，积极创造条件，待时机成熟后，转为市委机关报。

1951年12月1日，曹谷冰代表《大公报》总管理处宣布，从

即日起《大公报》渝馆与中共重庆市委联合经营。文化企业是公私合营的先行者。周恩来总理在中共西南局关于创办《重庆日报》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强调，“做好党外人士的安排工作，处理好私营《大公报》时期的财务账目”。1952年1月，重庆《大公报》改为公私合营。

1952年8月4日，重庆《大公报》停刊；8月5日，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在原重庆《大公报》的基础上正式创刊。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任社长，陈伯林任总编辑，王文彬任经理。

DAGONGBAO BAINIANSI

第三节 天津《大公报》与《进步日报》

一、天津解放初期《大公报》的暂时停刊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当天中午全市戒严，断绝交通，炮声隆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警备司令部连连中弹。张琴南、李光诒、于效谦、刘洪升等报馆同仁坚持继续编报，报道了天津解放的消息，张琴南还撰写了一篇庆祝解放的社评。印厂工人们用手揉平印机印报，一张张撤过……直至印完，天已被晓，15日的报纸出版了。清晨，市民涌上街头，而报童和报贩们却未出现。《大公报》职工拿着新印刷的报纸，在报社门前摆了一张张条案，充当临时报贩，当街叫卖起来。正在市民争购时，来了两位佩带军管会臂章的解放军同志，友善地劝告他们，在未获得军管会批准以前，暂停发售。这一天的报纸（15日）仅售出5881份。

二、酝酿改组和更名

早在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对于像《大公报》这样的

私营报纸，按照“决定”精神，“不得没收，亦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对报社人员“一般采取争取、团结与改造的方针，应以我们党员及进步分子为领导组织新闻团体，进行学习，改进工作与生活等方式，加强对他们的领导”^①。

中共中央对《大公报》的去向问题十分慎重，1948年冬，中央有关部门邀集曾在《大公报》工作过的杨刚、孟秋江等，在河北平山开会，研究迫在眉睫的天津解放后《大公报》的出版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对此有过具体的指示。当时研究决定的方针，概括起来有五点：第一，按私营企业对待《大公报》，政府不予接管；第二，发动《大公报》职工，对该报的错误进行批判；第三，在天津《大公报》的基础上，改组易名后继出版；第四，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由全体职工普选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第五，以全体职工同仁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新生。毛泽东亲自为易名后的报纸取名为《进步日报》，并说：“办报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就是进步。解放了，大家都要进步嘛！”天津《大公报》易名为《进步日报》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

天津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由于缺乏经验，决定将天津各报一律停刊。为此，中共中央曾于1949年1月19日和23日，分别致电中共天津市委，要求及时纠正了这一做法，并嘱咐要协助杨刚等同志妥善处理原天津《大公报》改组复刊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天津市委改而采取了“对停刊各报除已确定封闭者外，即以秩序恢复为理由，先令出版，待审查后再发许可证”的办法，以做补救。

天津解放以后，天津《大公报》处于停顿状态。张琴南等报社领导不知应该怎么办，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因都是单线联系，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具体指示，也不知该怎么办，而报社内200余名职工的生活因工作停顿而陷入困境。张琴南找到军管会，希望代印

^①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521～52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很快得到批准。报社职工都参加了折叠书页印张的装订劳动，维持了职工生活。但天津《大公报》还能不能出版，大家心里都没有底。这时，杨刚、孟秋江、宦乡受中共党组织的指派，一身戎装来到报社，其中杨刚、孟秋江大家并不陌生。杨刚是1928年参加共产党，并于1939年任《大公报》编辑、记者；孟秋江也曾是《大公报》战地记者。他们到报社后，马上联络了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杨邦祺（李定）、李光治、胡邦定、傅冬菊、刘桂果等，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天津《大公报》继续出版的决定，并立即投入了报社的改组工作。

从1949年2月3日开始，报社编辑人员分成小组，学习政策，检讨过去。许多人建议取消“大公报”三个字，改用新名继续出版。19日，报社召开临时职工大会，230余人参加。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第一，原津版《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向军管会申请登记，再行出版；第二，通过了《进步日报职工同仁宣言》；第三，通过了《进步日报暂行章程（草案）》；第四，选举了临时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管会”）的组成人选，张琴南、杨刚、宦乡、徐盈、孟秋江、李纯青、高集、李光治、彭子冈等9人为委员。20日，“临管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临管会”主任由宦乡担任，副主任由张琴南、徐盈担任；还决定了《进步日报》的领导人选：宦乡任总编辑，李纯青任副总编辑，杨刚任主笔，高集任新闻编辑部主任，孟秋江任采访通讯部主任，李光治任社会服务部主任，赵恩源任研究室主任，徐盈任经理，杨刚、宦乡、李纯青、张琴南、徐盈任社论委员会委员。同时，报社内的中共党组织也组建了，杨刚任党组书记，李光治任支部书记。

1949年2月21日，张琴南、徐盈、王秉衡代表原天津《大公报》全体职工来到军管会文教部，递交了申请出版《进步日报》的请示。请示说：天津《大公报》同仁一致决议停办天津《大公报》，联合愿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工作者，共同创办《进步日报》；当于本月19日举行临时全体职工大会，郑重通过职工同仁宣言与报社暂

行章程及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名单；次日，临时管委会举行会议，推定经理、编辑两部负责人员，着手筹备各项事务；现全体职工230余人均加紧工作，并渴望《进步日报》能得早日核准出版。2月26日，天津军管会发出由主任黄克诚、副主任黄敬签署的给《进步日报》社的通知。通知说：兹据天津《大公报》同仁代表张琴南等前来本会陈述该报同仁一致决议进行改革、出版《进步日报》；今后以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事新闻事业为宗旨，一切言论记事业务，均以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依归，并以民主集中制之原则进行内部组织与管理，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选定张琴南等人为委员，以宦乡为主任，张琴南、徐盈为副主任；经本会审查，认为尚属可行，准予登记出版。这样，《进步日报》就完成了全部出版登记手续。

经过“临委会”讨论，确定了《进步日报》的编辑出版方针：第一，读者对象应确定为初中以上的学生、教师、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职工、店员、一般市民以及一切政治上还未进步或开始进步的群众；第二，本报应反映上述各阶层人士的生活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从解释法令文告、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实践中给以教育帮助，使能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团结他们在政府周围；第三，本报坚决拥护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并应尽最大的努力，揭发敌人，孤立敌人，瓦解敌人，发动民众，热烈支持前线，促进革命战争迅速获得全国性胜利；第四，本报应为扩大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革命阶层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第五，本报同情并支持全世界反帝人民，特别是东方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独立的斗争，并反映其动态；第六，本报应反映、宣传、阐释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和行政措施，同时亦应根据具体真实的事实，对所有偏向或违反政策之行为，展开建设性的批评；第七，鉴于本市接收阶段似已大体上可告一段落，今后中心任务似将转入恢复与改造阶段，本报应配合此项转变，鼓励并协助人民组织起来，消灭反动残余，重建人民民主的经常秩序，系统地建设人民革命政权，推行新民主

主义政策。

三、《进步日报》问世

1949年2月27日，天津《进步日报》创刊。它是解放区新创办的第一张民营报纸，但情况极为特殊，报社内建有中共党组织，又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领任何方面的补助和津贴。它既不同于解放前的私营报纸，也不同于解放后的各级党组织的机关报。

在《进步日报》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两篇著名的文章：一篇是由张琴南、杨刚、徐盈、高集、彭子冈、赵恩源、李光诒等署名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另一篇是《〈进步日报〉是如何产生的——大变革中的一个故事》。

在“代发刊词”中，对解放前的《大公报》作了严厉的批判：“我们是前天津《大公报》社的从业人员，现在开始来办一个新的报纸——《进步日报》。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要向全国各界人士作下面这番自白……我们要说一说《大公报》的真实面目。大家知道，在北洋军阀时代，《大公报》是依附于军阀官僚买办统治集团而生长起来的。等到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卖国独裁的反动政权以后，它就很快的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并列举了在近二十年来每一重大政治事件中，《大公报》和蒋介石政权“分解不开”的事例。在谈到《大公报》主持人“善于在所谓的‘社评’宣传上运用狡诈手段”时，该文写道：“他们懂得如果完全正面为罪恶昭著的反动统治阶级说话，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他们总是竭力装成‘在野派’的身份，用‘在野派’的口气来说出官僚家要说而不便直说的话……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它所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喽啰，它所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统治国家地位的法西斯黑首，即其所谓‘国家中心’。长期处于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的读者，看了大公报的小骂，觉得很舒服，无形中却受了它的‘大捧’的麻痹。大公报以‘小骂’作为欺骗读者的资本，也以‘小骂’来

向他们的主人索要更多的代价……因此，大公报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同人宣言》还表示了决心：“现在，我们有机会永远脱离《大公报》这个丑恶的名义而工作了。我们利用天津《大公报》原有的物质基础，创办这张簇新的人民的报纸。如果我们在《大公报》中工作的期间也曾犯过对人民的过失，我们将以今后认真的工作自赎。而我们从来所自信的一片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诚心诚意，将能不受拘束地充分地发扬在工作上面，使我们不能不万分的兴奋鼓舞。”

这两篇文章经新华社播发通稿，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西方各大通讯社都作了报道，着重指出它是中国解放区出现的第一份民营报纸，并评论说，允许民营报纸在解放区创刊，标志着中共新闻政策在转变，同时预示着在经济政策上对私营企业在放宽。但港版《大公报》编辑萧乾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1949年2月27日晚，正当我轮值全面负责报纸版面时，忽然在刚送来的当晚新华社的电讯稿中，瞥见一条消息：‘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并转发了《进步日报》的两篇文章。这时，各版编辑统统放下工作，争相来看这篇晴天霹雳的新闻稿，各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那时，港版《大公报》接到新华社发来的电讯，只字不改，一律照登。萧乾拿着新华社的那篇电讯稿连同《进步日报》那篇“代发刊词”，他迟疑了，要不要把全文发到排字房？“也就是说，要不要第二天早晨在香港以及全国各地千千万万读者面前痛挝一通自己的嘴巴？”萧乾说：“感情上难以接受，而政治上我又担当不起这个扣发的重责。可惜当时杨刚和王芸生都已相继北上，不然的话，也轮不到我来值班负责全面。于是，我就过海去找住在九龙的夏衍——他那时代表中共地下党负责同港版《大公报》联系。从他翻阅新华社通讯稿时脸上呈现的茫然神色看，我估计天津的党组织在这个改名问题上，事先并没有同香港的党组织有过任何联系。夏公沉吟了好一阵子，然后咬咬下唇，果断地对我说，一字不改地照发。于是，港版《大公报》次晨就在世界新闻史上开创了一个绝无

仅有的新纪录：在自己的报纸上登出痛骂自己的社论。那天出版的港版《大公报》也应是收藏家们的一宗珍品。”^①

这两篇著名文章的观点，是明显有误的。正如当时参与“同人宣言”著名的李光诒（中共党员）所说：那篇宣言等于是一份宣判大公报死刑的判决书。对于这些明显有误的看法，当时的“临管会”成员之一的李纯青（中共党员）在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撰写的论文《抗战时期〈大公报〉》中，以其亲身经历和感受，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逐一批驳，力图以一个老大公报人的良心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来还其事物的本来面目。后来，毛泽东亲自决定保留沪版《大公报》和这个报纸的原名，实际上是对前述不实之词的否定。

《进步日报》出版发行一周后，3月7日，该报发表题为《新闻事业的新方向》的社论，畅谈了对新民主主义新闻事业的认识。社论说：“本报创刊已经一周。我们的态度和作风，读者大致都有了解。在这里，我们愿就自己所感觉的新闻事业的新方向提出来谈一谈……我们认为新闻事业首先是服从于经济政治的方向。它不是脱离了经济政治的事实而超然自在的东西。它一方面是剥削及压榨阶层控制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人民反抗剥削和压榨的武器。因此，新闻事业的方向就不能不有两种分歧。一个是压迫阶级的方向，另一个是人民的方向……我们以为解放了的新闻记者和读者，应该认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虽然太阳在它突破了乌云忽然出现的时候，是难以看清，似乎生疏的，但是热与光的吸引力却会使我们自动的欢迎它，跟随它。我们的新方向就是我们的太阳，它会引导我们走向更丰富更广阔的人民的世界。”

《进步日报》创刊后，由于领导和编辑力量强，宣传上很有生气。但不久，杨刚、李纯青调往上海《大公报》，宜乡调到外交部工作，领导力量出现“真空”。8月9日，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给中共天津市委并华北局暨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进步日报》存在

^① 《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220～2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的问题，特别是改变和充实组织机构的问题。经上级批准，《进步日报》领导机构和人选调整为：孟秋江任党组书记兼经理，张琴南为总编辑，徐盈任主笔，李光诒任副经理兼新闻编辑部、采访部、印刷部主任，胡邦定任社会服务部主任，赵恩源为研究部主任，彭子冈任采访部副主任。

这一时期，《进步日报》每天发行2万多份，收支平衡，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银行贷款也能按期归还。报社在经营方面，充分利用原有《大公报》管理经验，狠抓广告工作，除春药、迷信、反动、可疑的广告拒登外，积极拓展广告来源，在创刊半个多月后就在第一版用整版刊登广告，收入逐步增加。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对《进步日报》这期间的工作是满意的，曾有这样的评价：前《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以来，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在知识界、工商界中发挥了某种特殊的作用。例如，召开各种问题的座谈会，吸引党外人士发表对人民有利的言论；组织经济宣传，信实报道物价；出版“大众科学”副刊，团结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社会服务工作中，教育市民群众。尤其在新闻采访工作中的积极精神和谦逊态度，某些生动的特写，都是很好的表现。在经济方面，条件虽较薄弱，出刊时流动资金不足，但由于党员干部和党外人士埋头苦干，克勤克俭地经营事业，以少数人力进行繁重工作，苦撑至今，已勉可自给。这些都是应当加以表扬的。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四节 上海《大公报》的新生

一、《大公报新生宣言》

1948年10月底，《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到香港候船准备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此时，该报总经理胡政之已重病在身，卧床不起。11月初，王芸生离沪经台北

抵达香港候船，与众多的民主人士会合，准备北上解放区。上海《大公报》的言论暂由编辑主任孔昭恺主持，经营事务由代总经理曹谷冰统筹。1949年3月18日，王芸生来到解放后的北平，心情无比激动，惟有对于《大公报》能否继续存在心中无底，因为此时《大公报》天津版已改名为《进步日报》了。他找到周恩来，希望能够继续保留《大公报》的报名。周恩来对他说：“此事我们已请示过毛主席，《大公报》不必改名。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涉。”周恩来诚挚的话语，使王芸生深受感动，他意识到这是毛泽东挽救了《大公报》。

1949年5月27日，王芸生在杨刚（中共党员）的陪同下回到解放后的上海，《大公报》得以继续出版。1949年6月16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给《大公报》新字第八号《报纸杂志通讯社临时登记证》，登记证上写道：“兹据大公报社申请登记，经审查合格，准予出版发行。”6月17日由王芸生撰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宣布报纸归人民所有。《大公报新生宣言》中说：

上海业已完全解放了。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天中，上海六百万市民全体获得解放，他们不再受国民党匪帮压榨、剥削、抢掠、凌辱以及孤杀屠戮的恐怖，开始享受了自由，看见了天日。看了人民解放军的严明纪律，谁不衷心感叹这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军队；看了人民政府的朴素认真的作风，谁不衷心感叹这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一解放，要知道并不是上海一地目前一时的解放，这基本上是全中国解放的重要一环，更是三千年来的历史大解放。中国受了三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与剥削，近二十几年来尤其受着国民党匪帮官僚买办勾结帝国主义的联合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上海地方是个典型核心；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对象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都荟萃于上海。因此，上海的解放是大不寻常的。看国民党匪帮是怎样的舍不得离开上海，再

看国民党匪帮又是怎样的想在上海拖帝国主义者下水，梦想搞出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知道上海的解放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上海的解放，实际是国民党匪帮的反动政权彻头彻尾的灭亡，是全中国获得新生。在这重大时局，大公报也获得了新生。

大公报有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创办于清末开明贵族之手，民国初年曾落入安福系政客的掌握，1926年大革命开始之年续刊，一部资本出于官僚，政治意识渊源于封建政客及新兴资产阶级。大公报的报源如此，它的政治属性自然不会跳出这个范畴。蒋介石背叛了大革命，十足显现了买办资产阶级窃夺政权的本相，帝国主义向他垂青，官僚地主争相奔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间”、“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如此。但是，历史上所有改良主义者在实质上无不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帮闲甚至帮凶。在过去二十几年的人民革命浪潮中，大公报虽然不断若隐若现地表露着某些进步的姿态，而细加分析，在每个大阶段，它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在大革命破裂之后蒋介石的“剿匪”时代，大公报是跟着喧嚷“剿匪”的。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大公报是主张缓“抗”与“攘外必先安内”的。在对日抗战初期，大公报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为抗战尽了些力；但是由于它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力宣扬“国家中心论”，把蒋介石捧上独裁的宝座，经常宣传“军令政令统一”的说法，以压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因此，在抗战中期和后期，大公报的领导思想在抗日问题上有些动摇。到抗战已近胜利之时，大公报还不赞成联合政府的理论，而想替国民党维持独霸的局面。大公报曾赞成政协的决议，但到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决议时，大公报的负责人反而参加伪“国大”云制“宪”。蒋介石既撕毁政协决议，又勾结美帝发动“戡乱”内战，人民解放战争已于东北开始之时，大公报却发表了《可耻的长春之战》

社评，为蒋介石也即是为美帝撑腰。当人民革命浪潮已把反动势力震荡得摇摇欲坠之时，大公报又提倡所谓“自由主义”、“中间路线”，以冀别于反动统治阶级；其实人民与反人民之间绝无所谓“中”，而所谓“自由主义”既根源于买办资产阶级，这“金外絮中”的外衣更是混淆是非，起着麻痹人民的作用。

以上检讨，不过是荦荦大者，而一向看似开明进步的报纸，其内含竟尔如此。要知道这绝不是偶然的。大公报基本上属于官僚资产阶级，与过去的反动政权是难以分离的，总的方向是跟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走的。其基本性格既然如此，因此在国际关系上，基本上是亲美反苏的。无论在阶级感情上，或在政治观念上，大公报都属于亲美型，在抗战中尤其表现了这一特色。直到两年前他们亲眼看到了美帝是那样明目张胆地扶持日本反动势力，它才从民族观点上怀疑美帝，而致力于反美扶日运动。在抗战初期，大公报也曾有亲苏之名。但它的亲苏姿态，绝非发生于倾向社会主义的感情，尤其谈不到阶级的观点，而完全是基于纵横捭阖的强权政治的看法，要苏联牵制强敌，甚至更想借着亲苏的路线以压制中共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由于此故，大公报在基本感情上，非但不是亲苏，实际是反苏的。它还在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枪夺中东路时，也把苏联看做帝国主义者。尤其在近年的旅大问题上，弦外之音，也把苏联看成侵略者。殊不知苏联之借用旅顺港，正是防止这远东要隘落于美帝与蒋匪的联合阵营之手，这正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尤其符合于中国人民解放革命的利益。假使旅大与中长路落于美蒋联合的掌握，不用说中国东北人民暂时不易解放，整个人民解放战争都要遭逢大困难；而从太平洋全局看，日本、南韩、东北，全入美帝之手，形成对苏联的东方包围，世界和平将受更大的威胁。从此分析，并加深思，便知苏联之借用旅顺港，非但不是侵略，而且是一种和平的定力。这非但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从正确立场上看这问题，这非但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力量的运用，而

在民族立场上，这正是援助被压迫民族，以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反动势力的侵略与挑衅。但过去的大公报，却没有这样去了解，也不能有此理解的。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业已完全胜利，全中国业已基本上获得解放，帝国主义的势力就将退出中国，反动政权业已灭亡，官僚资本就要普遍没收，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诞生，旧的去，普遍新生。当此重大时代，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公报是具有政治与文化两重机能的私营企业，它检讨过去，开拓未来，也正是扬弃旧污，开拓新生。大公报有一部分官僚资本，这留待人民政府清查处理。大公报同人对过去的错误，内心是愧疚的，今当新生，提高警惕，痛感责任，笔勉前进，努力为人民服务。从今天开始，上海大公报从机构到版面，都经过重大改革，内容固期焕然一新，机构也已民主化。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大公报全体职工同人，业已郑重确定了工作态度：向人民负责。言论、记事、以至广告，都要向人民负责。一字之错，一语之非，都不许含糊，都要勤于检讨，勇于改过，尤其方向不许有错。我们必努力而小心地这样做，更诚恳请求广大读者给我们帮助，给我们督责。今后的大公报，已不是官僚资本的了，也不单是我们服务人员的，而确定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了。

这篇由老大公报人王芸生亲自撰写的《大公报新生宣言》，在《大公报》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不仅标志着《大公报》对中共和新生政权的态度，而且也表明了王芸生个人的政治态度。但是在今天看来，“宣言”中对《大公报》的评价不够客观，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免的。

上海解放后，《大公报》未做大的调整，计有484人，其中编辑部98人，经理部383人，另有管委会专职人员3人。在编辑方面，由王芸生任总编辑，杨刚、李纯青任副总编辑，孔昭恺任编辑主任，刘克林、戴文葆、俞振基为副编辑主任，刘北汜任副刊编辑

室主任，贺善徽任研究室主任，许君远任资料室主任，陈伟球任通讯课主任，魏绍文任社会服务课主任，周雨任采访课主任，魏守忠任摄影课主任，杨玉书任校对课主任；在经营方面，曹谷冰任管委会主任，金诚夫任管委会委员，费彝民、潘际炯任沪馆正副经理，袁光中任营业处主任，王文耀任总稽核，梅焕藻任总务处主任，苏济生任工务处主任，吴瑞云任财务处主任，傅德霖任文书课主任，张玉昆任会计课主任，陆联芳任出纳课主任，曹右新任发行课主任，张盛松任广告课代主任，顾联昌任材料课副主任，倪力新任庶务课主任。

二、继续出版的上海《大公报》

(一) 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25日，上海《大公报》报道了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消息《解放军进上海/昨晚十一时起陆续开入/今天可望控制整个市区》，刊登了解放军颁发的布告，宣布的约法八章，希望全体人民共同遵守。26日，上海《大公报》继续报道解放军入城的消息《大军继续肃清残敌/苏州河南全部解放/市民热烈欢迎自己的军队》，并发表题为《迎上海解放！》的社评。社评说：“上海解放了！上海人民翻身的日子到来了！……战事迫近市区之后，人民解放军没有向市区发炮，避免向市区射击，他们承当国民党的海陆空三面火力，将牺牲留给自己，把幸福带给人民。这种伟大英勇的精神是中国历来军队所没有的，同时也反证了国民党反动军队是如何的凶残恶毒！这样的军队经过彻夜战斗，进入市区以后，鸡犬不惊，片物未扰，不进民房，不拉民夫，躺在路边休息，绝不随便接受人民慰劳，而且市区真空时间极短，人民可说未受损失。这样的战士，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儿女，他们保持了并且发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品质，真令我们感激兴奋，我们欢呼万岁！……”27日，上海《大公报》刊登消息《苏州河北残敌肃清/上海市区全部解放》，并发表了《新中国之路，中共指示了里程碑》，向读者透露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以及建立新中国的基本方略。

（二）庆贺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日

在7月1日的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题为《庆贺七一，伟大的共产党的诞生！》的社评。社评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的舵手，新中国的灯塔。二十八年前是在这个日子诞生！欣逢这一天，正当解放的红旗在全上海乃至广大的中国飘扬，正当我们的敌人，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的联合统治奔亡流窜，即将完全消灭，正当全国被践、被奴役的广大人民都要昂首挺胸、抬头做人的时候，大家来庆祝我们的领导政党的生辰。我们心里的感觉是不能以言语形容的感谢、欢乐和光辉无窮的希望。”同时刊登了史倩之的文章《你是灯塔，你是舵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斯民的文章《三年来人民解放战争》，刊登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的照片，刊登了全国解放形势图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线图。7月31日，为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二周年，上海《大公报》邀请驻沪的解放军指战员与报社员工联欢，大家载歌载舞，尽情欢笑，热烈庆贺建军节。8月1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题为《庆祝解放军的生日》的社评：“庆祝解放军生日，感谢解放军解放上海。让我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向陈毅将军，向第二野战军全体将士，致以敬礼！”

（三）欢呼新政协会议的召开

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上海《大公报》把这一会议的召开作为报道重点，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编辑杨刚和李纯青等为此做了精心的筹划。王芸生、杨刚是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他们身临其境，报道起来更是有感而发，得心应手。9月5日，他们即离沪赴平，参与筹备工作。在22日的上海《大公报》上，报道了新政协会议开幕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毛主席致开幕词阐明大会任务》，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开幕词的全文，刊登了大会主席团名单和新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代表名单。27日，刊登了王芸生撰写的《中国人民大宪章的讨论》的专文。10月1日，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题为《庆祝人民政协胜利闭幕》的社评，进一步阐述了人民政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和深远的意义。2日,报道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的开国大典和30万人游行庆祝的盛况,刊登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沈钧儒、罗荣桓、林伯渠等人的照片。6日,刊登了王芸生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和杨刚撰写的《给上海人的一封信——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专文,他们用亲身感受,描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10月18日至11月3日连载了王芸生撰写的《人民政协随记》的长文,记述了新政协会议的全过程。

(四) 支持中共领导的镇反、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为巩固新生政权,打败国内外敌人的进攻,陆续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斗争。在这些关系新生政权命运的三大政治运动中,上海《大公报》积极配合,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宣传工作。1950年6月底,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7月1日王芸生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讨论》的专文,随后又对这部法案做了详尽的解释和说明。10月,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上海《大公报》连续发表《美帝在朝鲜的冒险》、《马立克主持下的安全理事会》、《从十三国提案谈起》、《美帝在成功湖的挣扎》、《美帝在狗咬狗中准备扩大侵略战争》、《狗咬狗是没有是非的》、《支援前线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等一系列文章,声援抗美援朝斗争。王芸生经常撰写时事问答,解说抗美援朝的进程,讴歌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上海《大公报》派遣记者刘北汜、王文西到朝鲜前线采访,撰写了大量的战地报道,受到读者的好评。1951年2月,党和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反革命运动统一计划,统一行动,更加健康稳定地发展。上海《大公报》曾连续发表多篇社评,从理论和法律上阐述和贯彻中央关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和具体政策,使之深入人心。

(五) 宣传报道增产节约和“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随着运动的深入,12月又做出了《关于实现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上

海《大公报》全力投入这场宣传报道工作，其做法是：第一，以突出地位报道有关消息。如1952年1月2日，报纸出一张半六版，每版的头条都是刊登增产节约和“三反”的消息。第二，重视言论。其中关于论述增产节约、开展“三反”运动的社评共17篇，言论密度之大，是以往不多见的。第三，综合性副刊“大公园地”也把主要篇幅用于宣传报道此次运动。

三、编辑业务的情况

上海《大公报》比较重视言论宣传，每周召开一次社评会议，检查过去一周的社评，准备下周社评的选题，临时发生的新闻随时配发社评；在编辑方面，编辑每晚工作前一小时召开碰头会，检查当天版面，准备第二天的版面；在采访方面，在采访课内分有财经、工运、文教、政法等四个小组，联系各机关和团体，并在北京、南京、汉口、广州驻有特派记者，在沪宁、沪杭线的若干地点有特约记者，另聘请通讯员300余人（有专人与他们联系）；在专刊、副刊方面，设有《青年群》（周日出版）、《科学广场》（周三出版）、《星期影剧》（周日出版）、《人民天地》（每周一次）等专刊，副刊有《大公园地》（除周日外，每天均有）。

四、经营上出现隐忧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各机关对以私营面目出现的《大公报》重视不够，记者的采访也受到限制。当时任该报采访部记者的唐振常回忆说：“当时，各机关多封锁新闻，对《大公报》尤甚。为此，杨刚还在上海的时候，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舒同，由军管会主任陈毅具名印了近乎命令式的介绍信，说明对《大公报》记者采访应予便利。记者持此信赴各机关采访，求见负责人被拒，由秘书接待，一问三不知，且态度傲慢。此后我持信再往该机关，以为可以顺利一些了。谁知还是那位秘书接待，他接信在手，不无讽刺地说：‘你拿这封信，还是我接待你。’对所提问题，仍是避而不答。这是当时一些机关对宣传的普遍态度，于非党报犹

然。”而一般读者主要阅读《人民日报》等几份中共机关报刊，上海《大公报》的发行量很快就已降至5.3万份，广告收入也急剧下降，经营出现滑坡。加之当时上海有五家综合性报纸（《大公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内容雷同，面孔单一；如果这五家报纸不能做到各有特色，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确也显得报纸过多。^①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报在读者的心目中有绝对的威信，而对党外报纸不屑一顾，因而报纸的销售量下降，广告收入骤减，报纸有些办不下去了。怎么办？王芸生不愿意向周恩来总理要钱。他的考虑是，政治的中心在北京，重要的信息来源于北京，一份全国性的大报，报社不设在北京恐怕不行。报社迁到北京，报纸的影响和销售量就有可能扩大。因此，他想到的出路是将报社迁京。

HAGONGBAO BAIWANSI

第五节 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的合并

一、王芸生上书毛泽东

经过反复思考，他感到此事必须惊动毛泽东了。于是，他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转交给毛泽东，希望党中央帮助解决报社的暂时困难以及去向问题。信发出仅仅一周时间，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王芸生立即进京，等候毛泽东的接见。王芸生到达北京的第三天，就由彭真、胡乔木陪同，到中南海见毛泽东。当他们来到丰泽园，刚刚游完泳的毛泽东招呼大家坐在藤椅上。毛泽东认真而仔细地听完王芸生的汇报，立即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址。报名仍叫《大公报》。

^① 参见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44页。

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两报合并迁京后，富余人员由津沪两地政府负责接收，安排适当的工作。”王芸生听罢愁云顿消，激动得说不出话。毛泽东见状便风趣地说：“大公报，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意思是说，原《大公报》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现在又恢复了原名，王芸生便是收复失地了。王芸生还担心两报合并后不好管理，更担心两报的编采人员不熟悉财经业务，怕承担不起这项重任，搞砸了。毛主席笑着鼓励他说：“你们两家本来是一家人嘛！《大公报》人才济济，团结起来，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吗！”

二、中共中央对《大公报》的决策

中央为什么要做出“两报合并后迁京”的决定？1949年以前的老《大公报》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大公报》天津版改名为《进步日报》后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都成了地方性的报纸。这次“两报合并后迁京”，《大公报》升格为中央一级的全国性大报，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过去做法的稍加修整。为什么把未来的北京《大公报》设计为只负责国际和财经新闻的报道呢？这一点中共中央是有认真考虑的。过去，老《大公报》在世界各地派驻有记者，素有“国际问题报道快捷”的美誉；前任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对日本问题有较深研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变幻，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常发表较深刻的评论，是老《大公报》的传统，负责国际问题的报道是责无旁贷的。鉴于当时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刚刚开始，国家急需一份财经方面的报纸，李富春、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也希望有一份这样的报纸，但重新办一份报纸需要很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恰在此时有一份现成的报纸，这一使命就落在北京《大公报》头上了。

三、津沪两报合并后迁京出版

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最大的困难是

两地人员的安置。毛主席曾经对王芸生说：“两地人员由你挑选，富余人员由当地政府安排。”为此，中宣部曾于1952年秋指派中共天津《进步日报》党组负责人孟秋江、李光治到上海，了解上海《大公报》的人员情况。是年底，孟秋江、李光治和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编辑李纯青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谷牧、副部长夏衍、姚溱共同议定了上海《大公报》人员去留的原则，决定编辑部人员基本北上，经理部和印刷厂人员根据需要择优录用，留沪人员由上海方面另行安排。随后，决定北迁的人员分批北上，立即开始筹备出版北京《大公报》。

1952年12月29日，《进步日报》刊登“启事”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为了加强力量，有效地在建设祖国、保卫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分担宣传报道任务，决定实行合并，于1953年元旦起在天津出版《大公报》。今后《大公报》的报道方针是：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传保卫世界和平。对国家财经工作，特别着重于贸易、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工商业等各个方面的报道及讨论；同时以较大篇幅，加强关于国际新闻的报道及讨论。为此敬告全国各地读者，并希多予指导与协助。”因国家正在北京为大公报社筹建新馆，该报暂时在天津出版。合并后的《大公报》，王芸生任社长，孟秋江、李纯青任副社长，张琴南任总编辑，李光治、孔昭恺、赵恩源任副总编辑，孟秋江任党组书记。1953年1月1日，《大公报》在天津出版，自此创办了三年零十一个月的《进步日报》终刊。

上海《大公报》未到天津的人员，上海方面根据中央“完全负责，妥善安排”的指示，先是组织他们在新闻学校学习，后陆续分配到市政府所属的商业局、建筑工程局、卫生局、文教委、文史馆等单位工作的有近百人。

国家计委、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人委对《大公报》在北京建设馆舍十分重视，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在宣武区永安路18号（后改为173号）建设总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馆舍，其中包括办公楼4000平方米、集体宿舍980平方米、地下室400

平方米、锅炉房 359 平方米、车库 200 平方米、印刷厂 2 649 平方米；同时还在新址的马路斜对面建造了职工宿舍（永安路南三楼）。新馆舍于 1955 年 8 月中旬开始施工，1956 年 8、9 月间北京《大公报》新馆舍落成。1956 年 10 月 1 日，《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王芸生继续担任社长，袁毓明担任总编辑（后由常芝青接替），曹谷冰担任经理。

中共中央对暂时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十分重视，曾于 1953 年 1 月 14 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市委，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重视运用《大公报》。“通知”说：“上海《大公报》已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以《大公报》名义于今年元旦在天津出版。为了适应今后国家建设事业的规模 and 发展的需要，《大公报》在改组之后，已按照中央意见，重新确定了编辑方针。即：除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外，确定以报道和讨论财经问题，特别是公私合营关系和劳资关系为主。各级党委应领导和督促各有关部门重视运用这份报纸，使之成为自己发表意见、解释政策、交流经验的工具。中央一级的财经工作部门，特别是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轻工业部、全国合作总社、人民银行、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劳动部等部门党组，应指定专人和《大公报》取得经常的联系，指导其编辑采访和评论工作。目前，中央宣传部正在审查《大公报》和有关机关联系的人员及记者的名单，各有关机关包括各地的有关机关在内，应给《大公报》经过正式介绍的工作人员以必要的帮助和便利，纠正过去有意无意加以排斥和冷遇的倾向。”1954 年 10 月 6 日，中央宣传部又下发了《关于〈大公报〉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说：（1）中央曾明确规定《大公报》以财政经济贸易方面的工作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其主要的宣传报道内容，并准备条件向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报纸的方向发展。此外，并可适当注意配合国际问题的宣传和报道。这一方针今后仍应继续贯彻执行。现在《大公报》实际已是党领导的公私合营的报纸，但为适应国内外的政治情况，目前对外仍保持私营的面目。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的党组织应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的精神对待

《大公报》，并予以应得的协助。(2)《大公报》编辑部的主要部分决定逐步由天津迁移北京，由中央宣传部通过该报的党组实现党的领导。但天津市委仍应负责领导和管理该报在天津部分的日常工作和党的生活，特别是要负责领导该报有关天津市的工作的宣传，包括财经贸易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面的宣传；并协助其逐步解决所需的工作干部，纯洁和整顿该报的编辑部。《大公报》企业经营方面的问题，应由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统一管理。(3)中央一级及各省财经工作部门的党组和党员负责人应切实执行中央关于重视运用《大公报》进行宣传报道的通知，对《大公报》的宣传报道工作予以指导和协助。例如，吸收他们的党员干部参加有关的会议、阅读有关的文件，指导《大公报》记者进行采访工作，审阅《大公报》有关的言论等。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六节 《大公报》在北京

一、北京《大公报》的情况

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后，编采发行人员干劲很高，都希望能把这份报纸办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到1956年底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从5.3万份猛增至28万份，不但不再向财政要钱，反而还上缴了30多万元，结束了亏损的局面。

(一) 毛泽东对北京《大公报》寄予希望

“两报合并后迁京”后，毛泽东对该报寄予很大期望，他有一次见到王芸生，还询问北京《大公报》的情况，并鼓励说，团结起来，钻进去，努力工作。“团结起来”，是希望两报合并后同事之间不要闹不团结，其实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希望新人老人、党内党外要真正合作共事；“钻进去”，是讲《大公报》从一份综合性的报纸变为具有相对专业化分工（报道国际和财经）的报纸，不熟悉专业面情况的编采人员要注意钻研业务，对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财经政策

的宣传，要“钻”进去，搞一些有深度的报道，真正把报纸办出特色；“努力工作”，是鼓励大家要保持已有的成绩，努力工作，继续前进。毛泽东主席的殷切期望，对北京《大公报》的全体员工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然而，在北京《大公报》中，一些同志始终对报纸的专业化分工有想法，认为财经报道枯燥无味，总想再办综合性的报纸。王芸生对中央确定的北京《大公报》的分工是贯彻执行的，始终没有动摇过，但他也在认真思考如何使报纸从形式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的问题。一次在接见外宾后，毛泽东主席与王芸生在会客室闲聊，王芸生主动向主席请教专业化的报纸与读者兴趣究竟如何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专业是一面，群众除了业务工作还有文化生活的一面。毛主席还说，报上不能天天尽是打气。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廓清了许多同志的迷惑认识，大家的眼界开阔了。副刊部的编辑立即着手改进副刊《大公园》的内容，扩大了版面，通过副刊联系知识分子，让读者有的看、喜欢看。

（二）在反右斗争中

1957年，短短几个月间，全国有50余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而以“敢言”著称的王芸生却得以幸免于难。当时，作为大公报社社长的王芸生已经受到严厉的批判，眼看就要被划成右派。一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打电话给中共《大公报》党组负责人说，不要给王芸生划右派了。《大公报》社内的一些激进群众听到此事后，还到中宣部去“抗议”，指责为什么不让给王芸生划右派。对此，王芸生也感到纳闷，不解其中原由。直到1960年，王芸生才从他的党内联系人杨东莼（曾任中央文史馆馆长）那里得知，当时是毛主席发了话，“《大公报》的王芸生就免了吧”，才使他免遭厄运。但在反右斗争中，北京《大公报》有20多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有报社党组书记、总编辑袁毓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调离报社；副总编辑赵恩源的右派结论是：在整风初期，召开民盟座谈会，煽风点火，并力图发展民盟组织，夺取领导权，斗争后态度一般，受到撤销全部职务、留用察看处分；记者朱启平的右派结论是：在鸣放初期，向党进攻十分嚣张，公开向党“将军”，

主张办一张“真正人民群众”的报纸，和党报唱对台戏，情节比较严重，受到留用察看处分；等等。

（三）突出财经报道的特色

除重视财经言论和通讯外，北京《大公报》还开辟了一个周刊和一个专栏，突出财经报道的特色。从1959年4月开始，开设《商品知识》专栏（周三刊），为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服务，也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内容照顾各方面读者的需要。例如，为了满足售货员、保管员、运输员、商品检验员的需要，专栏经常通俗地介绍一些商品的专门性知识，如《水泵常识讲话》、《谈谈温度计》、《润滑油》等；结合季节特点，介绍一些商品的保管办法；在农产品收购期间，发表了《烟叶的保管》、《麻纤维的质量鉴别》等；入冬以后则发表各种商品如何防寒的知识等。1963年，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报社准备增加经济评论方面的内容，拟增辟“经济评论”周刊，每周出版一次。为此，北京《大公报》于1963年11月1日专门向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请示，很快得到批准。1964年1月，毛泽东主席曾指示《人民日报》要写理论性文章。这对北京《大公报》筹备“经济周刊”是极大的鼓舞。为了保证“经济评论”周刊的质量，该报决定先行在内部出版赠阅版，以征求意见，积累经验、储备稿件。1964年2月4日，北京《大公报》“经济评论”周刊内部赠阅版出版，受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好评。1964年3月10日，中共北京《大公报》党组向国务院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请示，希望“经济评论”周刊能够在北京《大公报》上公开出版。为此，李先念同志于3月14日给毛主席写报告：“尚昆同志转主席：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写理论性文章。大公报是中宣部确定为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报纸，他们想出一个‘经济评论’专刊，似可同意，请主席批。”毛主席于3月21日批示：“此件送康生、吴冷西二同志阅后，退先念同志照办。”“经济评论”周刊的公开出版，就这样决定了。3月27日，北京《大公报》的第三版上，“经济评论”周刊的第一期正式与读者见面，受到好评。“经济评论”周刊确实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风格，在中国当代新闻史

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四）国际问题的报道

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中，积极宣传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反对美国称霸世界、反对制造“一中一台”等，报道是有一定特色的。特别是在言论方面，除发表社评、评论员文章、短评外，王芸生还撰写了大量署名文章，如《美苏对华外交比较观》、《看美帝国主义怎样？》、《再衰二竭的美帝国主义者》、《不要再说谎话吧！》、《鸭鸟怕见阳光》、《中国人民和全亚洲人民为什么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荒唐透顶的所谓对日和会》、《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日本人民不容许美日缔结军事同盟》、《谈谈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日本人民在斗争》、《美日反动派为自己做成一套绞索》、《美日反动派自掘坟墓》、《展望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等等。

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后，其上级的领导关系发生过几次变化。1953年至1957年归中共中央中宣部领导，1957年至1958年归国务院第五办公室领导，1958年至1960年归中共中央财贸部领导，1960年至1966年归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领导。

二、对原《大公报》股份的处理

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最大股东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总管柴天宠和粮商王郅隆，其他股东还有《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以及张连璧、李敬宇、朱志尧、樊匡梁等。《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后，由英敛之一人兼经理、撰述、编辑诸务，主笔聘方守六担任，馆务由英敛之的两个弟弟英实夫、英粹夫佐理。

1916年9月，英敛之因病辞去《大公报》社务，即由旧股东王郅隆全部接盘。王郅隆是个大财阀，独家经营，不收外股。

《大公报》从1926年到1949年，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大公报》的时期。他们以新记公司来经营《大公报》，其资金来源，是时任盐业银行行长的吴鼎昌拿了5万元，从王郅隆儿子王景珩的手里买下《大公报》全部资产。此时吴鼎昌是无官经商，

因此这5万元应算是民族资本。吴鼎昌自任社长，不支月薪；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月薪各支300元。

但是，吴鼎昌的这5万元的来历，是他商量于“四行储蓄会”，从“经济研究经费”中列支的。在旧《大公报》股东的名册上分列有：吴鼎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久大银行、永利银行、经济研究会；属个人名义的有范旭东、张伯苓、周作民。《大公报》同人曹谷冰曾回忆说：我在北京《大公报》看到一张红格纸写的股东名单，前面几名是周作民、王孟钟、王毅灵等，都是四行的首脑，但这些股东从未分过红息，也从未干涉过《大公报》的言论。因此说，续办天津《大公报》的资金来源，是比较简单的。

吴鼎昌独资经营天津《大公报》，是以新记公司的名义出现的。既然是独资经营，又何称为“公司”呢？就因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在续办之初曾经约定：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界年终，须由报馆送与相当股额之股票”。以吴鼎昌的资金股与胡政之、张季鸾的“劳力股”相合，成为这个企业的公司性质。1928年底，胡政之、张季鸾开始得到报社赠予的“劳力股”；1928年底又增设“荣誉股”，首次赠予“荣誉股”的有曹谷冰、金诚夫、许萱伯、李子宽、王佩之。李子宽因生活条件较好，用1000元现金入股，他是在《大公报》同仁中惟一以现金形式入股的人。这项“荣誉股”先后赠送过3次（共27人获得），陆续获得“荣誉股”的有王芸生、杨历樵、孔昭恺、费彝民、王文彬、王文耀、袁光中、赵恩源、王佩之、张琴南、李纯青、萧乾、许君远、严仁颖、徐盈、曹世瑛、李清芳、叶德真、樊更生、周绍周、黄钱发、于潼等人。据持有150股的李清芳说：“日本投降后，我在天津馆收到上海总管理处汇来的一笔股息，只值两个烧饼的钱。这还是惟一的一次。”^①

1945年4月，胡政之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

^① 载《新闻春秋》，1-2期合刊，12页，1996。

的成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会议之后，他又遍访美国各大城市，同时为战后《大公报》的发展选购新型轮转印报机。在定货时，因所带美元不够，不得已接受美国华侨首领李国钦的5万美元的入股。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的发展战略是，巩固重庆版，恢复天津版和上海版，选择时机恢复香港版。津版、沪版的恢复，耗尽了《大公报》的财力，1948年初在筹备恢复香港版时，资金吃紧，胡政之接受了王宽诚2万美元的入股投资。李国钦、王宽诚的入股，才实际打破了吴鼎昌独资经营的局面。

在1948年核定时，《大公报》股票共有6万股。在48位股东中，超过1000股的有：吴鼎昌9750股、胡政之7500股、张季鸾5000股、李国钦5000股、王芸生3000股、李子宽3000股、金诚夫3000股、曹谷冰2000股、王宽诚2000股、胡惠春1200股、黄浴沂1000股。另外，“四行储蓄会”的周作民1500股、王孟钟1200股、王毅灵500股。关于胡政之的股份还有一段插曲。在胡政之病重住院期间，胡前妻之女胡燕吵着要股份，胡只得在“大公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姓名暨股权清册”上留100股作为象征，而（续弦）妻子顾俊琦拥有6400股，胡燕拥有1000股。

解放初期，内地的《大公报》实行了公私合营，对于原有的股份也做了分析和处理。把6万股大致分成3种情况：（1）可确定为公股的有22000股。吴鼎昌的9500股没收后成为公股。（2）通过做工作，愿意交出“荣誉股”的有王芸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等，计有16900股。（3）在私股部分的19500股中，实际投资在海外的李国钦、王宽诚占7000股；胡政之、张季鸾占12500股。对李国钦、王宽诚的股权，在香港《大公报》股权未清理之前，暂不处理。胡政之、张季鸾的股权，由上海《大公报》每月给其家属生活补助费（胡政之女儿胡燕每月50元，张季鸾妻子每月160元）。

这样一来，解放初期的内地《大公报》实际已是国有企业了。

三、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有关《大公报》历史的几篇文章
在北京《大公报》期间，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及，这就是王芸

生、曹谷冰合写了《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刊登在全国政协编辑的，由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上，此后该书又多次再版。这两篇长文对原《大公报》历史的评价有失公允。

撰写原《大公报》的历史，是周恩来总理倡议的，他把任务交给了香港《大公报》的社长费彝民。费彝民在香港工作，地位超脱，顾虑可能要少一些。但因费彝民公务繁忙，无暇专心写作。他建议有关部门把撰史任务交给当时在北京《大公报》任职的老报人王芸生、曹谷冰去完成。

接到任务后，王芸生、曹谷冰十分为难。1965年底，老《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独子张士基专程从上海到北京看望王芸生，在谈到这两篇长文时，王芸生曾说：“这篇报史将来是要重写的。”

历史在发展，人们对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发展的，给老《大公报》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历史研究者的任务。现在，在香港仍有《大公报》存在，这份有着百年历史的报纸，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诞生和发展的过程，是值得认真探究的。这两篇长文虽然为研究原《大公报》的历史提供了比较翔实的素材和清晰的发展脉络，但分析评论未必允当。它是60年代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DAGONGZAO BANSHI

第七节 北京《大公报》的最后阶段

一、疾风骤雨中的北京《大公报》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出笼以后，各报纷纷转载。北京《大公报》未予转载。直到1966年4月3日和4日才分别转载了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关锋和杜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两文，4月7日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

《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到这时，北京《大公报》才出来表态，于4月8日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为革命写稿，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随后，连续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解放日报》的文章，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时还未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北京《大公报》在劫难逃。6月11日，陈伯达指派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3人工作小组进驻《大公报》，参加报社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王芸生、孔昭恺等党外人士马上就靠边站了。6月13日和22日，北京《大公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乘胜前进》、《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为“文化大革命”宣传。6月28日，报社党组成员李光治、胡邦定、姚仲文停职反省。原报社领导被迫无休止地写检查、挨批斗，报社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坏。中共北京《大公报》党组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于8月22日、25日给中央写信，反映报社的情况。最后，北京《大公报》于9月10日被迫停刊。

二、昙花一现的《前进报》

1966年7月27日，北京《大公报》负责人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反映了报社存在的问题。信中说：“最近一个月来，我们不断地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要求把《大公报》报名改掉，即使报名不改，也要把现有的三个报头字重新改换一个。关于要求改换报头字的意见，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就有过”。特别提到“‘大公报’三个字是创刊时的样子，是地地道道‘保皇派’的一个牌子，一直沿用至今，的确面目可憎。改报名问题，须请示中央和主席，当前是否可以考虑请示。至于改写报头，似乎可行。把《大公报》换个牌子，实在是时候了。我们请求康老给予支持。可否设法请主席便中写一个，这是广大读者的愿

望，也是我们自己最大最高的希望。办不到的话，是否请周总理写一个，或者请康老写一个。写好后就换，或者择期（例如国庆节）再换。”北京《大公报》用的“大公报”三个字的字体是1902年创刊时的报头，“大公报”三个字是严复先生题写的。

随后，康生的秘书给报社打电话，转达了康生的意见是可以先给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写报告。8月22日，报社负责人在给李先念的报告中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读者和报社革命职工纷纷来信或贴大字报，要求改换《大公报》报名，并提出将报名改为《东风日报》或《进步日报》等建议。近日来，首都许多革命学生又要求报纸限期改名，有些中学的红卫兵还向我们提出警告。”8月25日，报社党组又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报社内外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立即砸碎《大公报》这个旧招牌。此事不宜再拖，建议先把报名改掉。可否将原名改为《进步日报》。”毛主席把报告批转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处理。处理意见是：报名可用《前进报》，意思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只能出版对开小报，每周出版三期。

由于更改报名仓促，报头用字一直定不下来。直到临近创刊，报社领导多次询问，及至9月12日夜，李先念同志给报社写了一个字条：“刚才到总理处，总理指示，按鲁迅字先出版。”

在1966年9月5、6、7日的北京《大公报》上，刊登了《本报改名和改刊启事》：“本报根据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以及广大读者的要求和建议，并经上级批准，决定9月15日改出《前进报》。”在9月10日的北京《大公报》上刊登《启事》：“《大公报》今日终刊。《前进报》已定于本月15日创刊。原有9月份《大公报》订户，一律改送《前进报》至今年12月31日。”北京《大公报》从此被迫改名出版。

1966年9月15日《前进报》创刊，同时报社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创刊号的第1版上，刊载了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右上角刊登了毛主席语录：“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还发表了一个“告读者”。在“告读者”

上,《前进报》首先说明,它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中诞生的,是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四旧’立‘四新’大进军中的胜利产物”,其根本任务和读者对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及时、迅速、正确地把毛主席的指示,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去武装广大财贸职工群众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财贸工作以及同财贸有密切联系的轻工业、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它还为自己确定了“新思想、新报风、新风格”的办报方针:“(1)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具有鲜明的特色;(2)短小精悍,文字简明,善于运用群众语言,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前进报》创刊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和新华社等首都各新闻单位纷纷送来贺词,殷切期望把《前进报》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

《前进报》创刊后,紧跟“文化大革命”进程,大力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报道有五个特点:第一,大量刊登毛主席的照片;第二,大量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第三,发表社论,大力宣传“文化大革命”,如《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1966年9月27日)、《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1966年10月25日)、《学一辈子“老三篇”,改造一辈子世界观》(1966年11月22日)、《把毛泽东思想学好宣传好》(1966年12月8日)等;第四,突出宣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从9月17日至11月12日,分别报道了毛泽东第二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第五,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强调抓生产,如发表社论《突出政治,支援三秋》(1966年9月20日)、《做人民的税务员》(1966年10月6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1966年11月10日)、《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紧收购农副产品》(1966年12月1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就连《前进报》这样一份红彤彤的报纸,也感到处境困难。12月21日,报社负责人再次给中央写信,希望暂时停刊。信中说:“《前进报》社内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群众已把主要精力放在运动方面,维持正常编辑出版工作已

有困难，容易发生事故。另外，由大报改小报，由日刊改隔日刊，一般说基层财贸职工赞成出小报，但不赞成隔日刊。在编辑工作中，由于版面小、刊期长、重要消息一多，版面很不好安排，但在目前，又无力出日刊。因此，我们意见，目前暂时休刊，集中精力搞好报社内部的文化大革命。然后，建立一个革命化的编辑部，在复刊时即出日刊（一星期出六期）。经“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批准，《前进报》拟于1967年元旦暂时停刊。

但是，未及元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红卫兵冲进了前进报社。1966年12月29日，《前进报》没有出刊，却出版了一份类似“海报”的东西，正面印有“《前进报》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部《告读者书》”，背面印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撰写的《〈前进报〉被判以死刑》的“判决书”。

《告读者书》说：“《前进报》于1966年12月28日晚10时，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封闭了！封得对，封得好！我们《前进报》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坚决地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前进报》的前身《大公报》，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忠实地执行‘阎王殿’（旧中宣部）的黑指示，大搞知识性和趣味性，恶毒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前进报》出版后的三个月来……在宣传工作上，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搞得冷冷清清。”

《〈前进报〉被判死刑》说：“《前进报》于1966年12月28日晚10时被我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孙大圣’支队封闭了！所谓《前进报》，就是《大公报》，改头换面的《大公报》！这家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报纸，从今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是对把持《前进报》领导大权的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及其后台的当头一棒，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沉重打击，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得的新的重大胜利！”

“判决书”还列举了北京《大公报》的“六大罪状”：（1）“经

常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法抬高刘少奇，贬低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2)“在轰轰烈烈的学习雷锋的运动中，不予宣传，甚至拒不刊登雷锋日记”。(3)“在三年困难时期，鼓吹‘三和一少’，充当帝修反和国内牛鬼蛇神的应声虫”。(4)“精心炮制‘生意经’等许多毒草，宣扬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散布剥削阶级毒素，为修正主义传播种子，为资本主义制造温床”。(5)“1965年11月，在毛主席指示下，上海市委在报上发表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吹响了这场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大公报》预感到它的末日就要来临了。出于它反动本能，它极力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大公报》像黑暗动物害怕阳光一样，极端害怕真理，仇视革命，一直没有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其罕见的……《大公报》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手段，不是比前《北京日报》还恶毒吗？”(6)“《大公报》为了保住它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耍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改头换面，以《前进报》的面目出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大公报》改为《前进报》的‘改刊启事’中，竟只字不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提毛泽东思想，表现了《大公报》对毛泽东思想的刻骨仇恨。”它还列举了《前进报》的“两大罪状”：(1)“1966年10月1日出版的《前进报》登载了欢呼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记录电影的消息，新华社电讯强调指出，我国三次核试验的成功是‘在党中央，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这样的极端重要的一段话，《前进报》却把它删掉了。”(2)“《前进报》摆出一副超然的面孔，采取了所谓‘不介入’政策，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反映文化革命的情况，不报道红卫兵的动态，不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前进报》的所谓‘不介入’政策，实际上是自外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的折衷主义，超然两条路线斗争之外的姿态，实际表明它站在资产阶级阵线之内”。

在红卫兵的炮轰下，《前进报》仅仅存活105天（1966年9月

15日至12月28日)，就被迫停刊。至此，这份在当时已经有了64年历史的报纸，终于被迫在中国内地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的报纸纷纷复刊。一些老《大公报》人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恢复北京《大公报》。1978年，全国各行各业学大庆、学大寨，李先念副总理想办一张以财贸为主要宣传内容的报纸，他想起了北京《大公报》的旧部，调集原北京《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等8人进行筹备。这本是恢复内地版《大公报》的一个机会，但终因有不同意见，使这份报纸内地版复刊的愿望成了泡影。最后的结果是，出版了另一份报纸《财贸战线》。1981年1月1日，《财贸战线》改刊为《中国财贸报》；1983年1月1日，《中国财贸报》改刊为《经济日报》。这些报纸和原来的北京《大公报》已经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六卷 复刊至“文化大革命”前的香港《大公报》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一节 复刊初期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香港传媒生态

一、近代香港报业的产生和发展

(一) 香港新闻业的地位

百年《大公报》后五十多年的主要阵地在香港。

在中国文化传播史和中国新闻事业史中，香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发祥地之一。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化华文报刊，就是首先在香港出现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日报，有不少是

在香港创办的。香港的报业，开创了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商业化报纸的先河，为资产阶级商业报纸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印刷条件、技术装备、经营管理、报业理念等方面，在近代现代的多数时期，和內地的多数省市相比，常常处于领先地位。

香港新闻业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命运和民主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新闻史学家所言，香港曾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抗日救亡报刊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报刊的重要基地，是这些报刊和形形色色敌对力量报刊进行较量的战场。

香港新闻业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对香港报业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则给香港报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使香港的新闻业陷入空前黑暗时期。

战后，香港开始医治战争的创伤，社会环境逐渐安定，经济、人口得以恢复并逐步增长，战前停刊的主要报纸大多迅速复刊。报纸的数量和销量都不断增加，据统计，1945—1950年，香港有155家报刊注册。1950—1959年，香港新办报纸85家；1960—1969年，香港新办报纸108家。1960年前后，香港中英文报纸的总销量大致保持在50万份，1965年销量达90万份，并很快跃升至150万。采访、编辑、印刷等均有提高，同时更注重读者的参与意识，加强参与社会福利事业。而随着中国政治局势在1949年的确定，中国在香港的政治势力也开始泾渭分明，各种势力都布置了自己的宣传阵线，多数报纸都有较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香港政府制定了苛刻的报刊管制条例来管制新闻界，首当其冲的是左派爱国报纸。在1952年的“三一事件”中，《大公报》等三家报纸被指控，《大公报》并被迫停刊；1967年，在震动世界的“反英抗暴”事件中，3家侧面爱国报纸也被判停刊。这两起报纸官司成为香港新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虽然受到种种挫折，但《大公报》等左派爱国报纸在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之前，仍然发展较快。这时期右派报纸也有较强的竞争力，可以说左右派

报纸各有建树。五六十年代堪称是香港晚报的黄金时期，《大公报》的姊妹报《新晚报》以其独特的形象立于晚报之林。

60年代后期受国内“文化大革命”影响，左派报销量一落千丈。70年代，本土化的商业化报纸成为香港报业的主流。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以后，香港进入过渡时期，在新旧递嬗中，报纸的读者群和报业市场基本稳定，香港报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呈现着极其繁荣的局面。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回归祖国，香港新闻业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①

香港的新闻业是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发展的，对于爱国拥共的《大公报》而言，其发展变迁是与国家的命运、中国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的。它利用地处香港的优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为在国际上树立中国的正确形象，为中国冲破国际反华舆论的包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舆论桥梁作用。20世纪80年代，《大公报》又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为进一步扩大《大公报》在海外的影响，在坚持办好海外航空版的同时，1993年创办了《大公报》菲律宾版，是目前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1995年《大公报》登上国际互联网，为国际传播增添了新生力量。

从“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四不”办报方针，到“贴近时代、与时俱进”，《大公报》的发展之路，是几代《大公报》人的心血结晶。^②

（二）香港当代报业发展概况

战后香港报业迅速恢复并得以发展，数量和实力大增，编采手法得以提高，媒体都在扩版增容。70年代以后，香港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大众化报业非常兴盛。80年代进入过渡时期后，媒体市场竞争激烈，新闻事业在汰旧迎新中调整格局。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新闻事业仍然保持着自由繁荣的局面。

50年代、60年代，老报纸《华侨日报》、《成报》不断拓展业务。战后数年销量最大的《华侨日报》，1952年新建了5层的大

① 参见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② 参见王国华：《〈大公报〉100年》，载《北京青年报》，2002-06-07。

厦，添置了德国产的高速印报机，1964年首设无线电采访车队。《成报》1954年迁入北角英皇道7层自建的新厦，并安装了战后香港第一台进口轮转印刷机。该报60年代末期销量逾15万份。从1954年起20多年，《成报》销量居全港中文日报之首，其大众化办报路线为多家报纸仿效。由这些新老报纸的实力和竞争能力可以想见，当年《大公报》跻身香港传媒界是多么不易。

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条件，世界主要通讯社均在港设有分支机构，为港报提供了大量及时消息。各大报多设有电讯自动收报机，及时获得路透社、法新社、国际合众社、日本时事通讯社及香港政府新闻处的消息。香港政府新闻处是政府的重要喉舌和信息来源。各报并不断改进版面编排，增辟读者需要的新版面，如股市版、航讯版、儿童版、汽车版、旅行版、食经版、娱乐版、马经狗经版等。《大公报》是最早重视航讯版的报纸之一。在“本港新闻”方面，因为新市镇的建设，多家报纸新设“新界版”。在“中国新闻”方面，一些报纸注重华南新闻及内地新闻，走中间路线的报纸尤以《明报》为代表，热衷于报道内地新闻。亲台报章对台湾新闻有详尽报道。

从70年代初开始，由于香港经济已经起飞，社会稳定，人口激增，教育水平普遍提高，香港的传播事业特别是报业得以迅猛发展。伴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抬头及香港土生土长的第一代力量的强大，香港报纸的本土化意识明显增强，新闻视线从国共斗争和内地兴趣拉回到对香港本身的关注上。最突出的是出现了一批本地化的商业报纸，以市场为取向，崇尚本地意识、关心民生，走大众化路线面大获成功。这些报纸以《东方日报》、《成报》等为代表，成为报业的主流。新创办的财经媒体《信报》也开始创出自己的特色。这个时期原有的家族式办报模式受到极大冲击。有不少报纸实行股份制，实行企业化、多元化经营，有实力的大报如《南华早报》、《星岛日报》则相继集股上市，香港报业的经营和管理开始迈向了现代化。而政治倾向性鲜明的左派、右派报纸，跟不上新香港的变化，脱离香港读者的需要，逐渐滑向下坡路。《大公报》、《文汇报》

等左派报纸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一度出现滞后，直到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又显转机。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签署联合声明之后，香港进入了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香港报纸，开始探讨新形势下香港的发展及报业与社会适应的问题。这个时期中国因素与香港本地因素，在报纸上几乎水乳交融，平分秋色。中国新闻在香港报纸上得到了充分的报道。而港英当局在此期间也出台了一些被视为不利于新闻自由的法规、条例。同时，过渡时期香港报界开始重视对新闻自由的探讨。

（三）多元的香港报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报业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报纸种类很多。从出版时间上来说，曾经有早报、午报、日报、晚报、夜报之分。凌晨5时出早报，上午出口报，中午出午报，下午3时出晚报，然后出夜报。有的报业集团还统揽早、中、晚报。南华早报公司从1950年底开始，早晨出《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中午出《士蔑西报》（The Hong Kong Telegraph），下午出《德臣西报》（China Mail）。

从内容方面来说，除了综合性报纸外，香港的软性报刊自60年代以后发展很快，纯娱乐性报纸越办越多。战后初期的娱乐报纸，香港新闻和娱乐消息占有一定比重，主打则是“咸湿”（色情）内容，十分畅销。60年代香港工业有较大发展，一般市民的收入大大增加，读者开始注重享受和娱乐，对娱乐性信息的需求激增。一些报纸便走“纯”娱乐性路线来迎合读者。赛马报道是报纸娱乐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自从英国人占领香港，赛马就成为一项社会性娱乐项目，1884年香港赛马会成立后，赌马渐成风气。战后马会改建大厦，扩大规模，加上当局纵容外围的赛马组织，赛马开始使用中文马名和骑师中译制度，使赛马成为妇孺皆知的赌博。赛马文化成为香港的一大特色，在报纸上的表现尤为明显。赛马采用中文制度以后，中文报纸更可以大谈马经。1959年马会慈善公司成立，马会不仅成为香港最大的纳税人，更成为香港最大的慈善机

构。1960年马会还加上了“英皇御准”的头衔，以后马会又新添了几种博彩方法，赌马风更炽。^①60年代初，不少报纸扩大马经的报道，增加马经版面，一时成为风气。很快，专门报道马经新闻、并提供马迷“贴士”（tips，相当于预测）的马经报纸便大为风行。潘怀伟创办的《田卡日报》，即以刊登马经为主。麦炜明、胡棣周合资创办的《香港夜报》，也是只在马季出版的马经报纸。潘怀伟青年时曾参加过新四军，胡棣周曾任职《晶报》，二人在1967年“反英抗暴”中曾被港英囚禁。

从语言方面来说，这时不仅中文报业发达，英文报也异常活跃。《南华早报》在战后业务不断拓展，1950年收编4家英文日报。1949年星岛报系出版了英文《虎报》（Hong Kong Standard）。1965年，另一份英文晚报《星报》也加入了竞争的行列。4家每日出版的英文报实力雄厚，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销量近10万，广告额更是可观，在约70份报纸与200来份杂志中，其广告收入约占40%。此外，60年代初还出现过几张中、英文双语报，还有的中文报出版了英文版。《大公报》从1967年5月31日起，每逢周三、周六出英文版，中午发行。

由于各报的努力，以及读者消费水平的提高，人口识字率的增长，港报销量不断上升。据《香港年鉴》转载，1966年2月报纸上发表的统计数字表明，香港成年人中有70%的人识字。香港人口中，50%的人每日看报，从不读报者为31%。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家庭，91%看报。至60年代中期香港报纸总销量达150万份。按当时人口计算，1963年香港平均每百人拥有报纸量已达17份，翌年更达25份，在亚洲仅次于日本（40份），远远高出当时亚洲平均水平（每百人1份）。1964年，《成报》和《星岛晚报》的销量就超过10万（60年代末更超过15万），销量达5~10万的报纸也有二三家。读者入数就更多。据1969年9月中文大学集体通讯

^① 参见鲁言：《香港掌故》，第2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9；陈可昆：《港事港情》，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中心所做的一项调查，每份报纸有 5.6 人阅读。

销量大增的另一原因，是因为报纸的售价保持长期低廉。战后 20 多年里，香港中文报纸，就算出纸 7~8 大张，也仅卖 1 角。有的新出报纸甚至只卖 5 仙。即使港元追随英镑贬值的 1967 年（英镑贬值 14.3%），香港百物价涨，报纸还是保持原价。

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香港《大公报》在五六十年代得以良性运转，并且在激烈的竞争中励精图治。

（四）剪不断、理还乱：香港传媒的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一直是影响、制约、决定传媒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香港的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一方面，它要受制于国际政治局势、特别是受英国殖民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形势一直在香港社会有决定性影响。

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近 150 年中，港英政府一直垄断着香港的政治舞台，实行所谓“无民主，有自由”的制度。英国统治香港的宪制性文件是《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这两个文件贯穿着“香港主权在英国统治者手中”的殖民主义原则。香港的政治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两个文件之上。

除了英国的政治，早期香港受美国政治的影响颇深。由于商业利益，英国于 1950 年 1 月 6 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其外交上采取的是英美联盟的政策，对中国的政策一直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英国官员及外交人士将香港当做“东方的柏林”，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符号。当时英国正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共产党力量进行较量，所以他们把香港当成防御共产主义进入东南亚的一个重要阵线。

出于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和对未来共产党政权的“抵御”，港英政府从 1948 年底就开始采取行政及立法手段，加强对香港社会内部的控制。1948 年 10 月，港府制定了《公安条例》，严防“煽动叛乱”。1949 年 8 月，立法局通过了《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可采用简易的审讯方式判定“不良分子”，并可下令驱逐出境，其中包括所谓“有煽动本港内乱及危害本港治安嫌疑的人”。因此条

例，50年代初期工会工人被递解出境的事件时有发生。1952年1月10日清晨，有10位爱国工会会员及作家、电影工作者被驱逐离港，《大公报》等爱国报纸及工会、文艺团体提出强烈抗议，但港英政府置之不理，继续“递解不良分子”。港英政府于1950年开始还在新界很大范围的边境区实行宵禁，晚10时至晨6时，居民不准外出，否则就予拘捕。当时的宵禁，是“防范”新中国以武力解放香港，同时害怕香港本土的爱国力量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事后证明是庸人自扰。1949年港英政府还公布了《人口登记条例》，实行身份证制度，据研究主要也是出于上述原因。^①

英国及香港政府早年对爱国力量处处设防，惟恐其殖民统治受到挑战。在港督葛量洪的建议下，1949年5月，港英政府还制定了《社团条例》，规定在香港活动的一切社团都必须登记注册，以防范爱国力量的发展。为此，左派爱国报纸进行了斗争。新社团法三读通过（5月26日）后，《大公报》刊载新华社电，报道民主党派联合批评港府社团法例的声明，认为该法例剥夺香港中国人“结社集会与住屋的自由权”。6月23日，社团登记期限将满，《大公报》报道民主党派负责人送备忘录给港督，认为新例损害居民民主权利，并且妨碍中英两国人民友谊。次日，《大公报》又刊载新华社电：《港府查方方住宅中国人民极为关切》，指出：香港政府在颁布“社团注册条例”和搜查方方住宅事件，“预告着今后香港政府对于香港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中国居民自由权利的进攻将要变本加厉”。

当年11月，香港警务处注册官拒绝38个爱国社团注册。11月20日《大公报》港闻版头条刊登30多团体联合声明，据理争取合法地位，请港府尊重自由收回成命，并号召爱国同胞大力支援。12月26日，港闻版又刊头条，报道青年工友集会，支援38个受迫害社团，标题是《港九青年工人怒吼为争取生活自由奋斗到底》。这段期间，工潮迭起，电车、小轮、煤气、火柴、电力、邮政等等

^① 参见鲁言：《边境宵禁及非法移民政策的回顾》，见《香港掌故》，第3辑。

行业发生劳资纠纷，《大公报》每日报道有关新闻。

不过，随着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朝多元化发展，70年代以后各种利益团体相继出现，压力团体相当活跃，常常采取联合行动与港英政府交涉。

中国的政治局势，是战后影响香港报业布局与报纸内容的主要因素。香港的报业发展是与中国的政局演变相对应的。从1949年到1970年左右，香港新闻业发展的主线是“中国的”，是以国共在香港的斗争为焦点的。^①1949年以后，共产党和蒋介石国民党舆论斗争的阵地，主要转移到了香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在香港这样重要的地方拥有舆论力量。国民党败逃台湾前，也已在香港布置了宣传战线。香港的报业因此而出现了左右对峙、左中右三派并存的局面。

新中国一直重视香港问题，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相关政策，大致可以用周恩来所提出的几点来概括：（1）香港暂时不解放，也不撤出，等待历史创造条件来解决；（2）开展爱国主义宣传和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一项长期任务，而不是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3）要争取团结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要和不同意见的人交朋友。（4）要安心于寄身港英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要想去反对它或改变它。（5）全国胜利了，但在香港还要谦虚谨慎，对同胞要与人为善，对事情要兢兢业业。^②

在港英当局统治下的香港，没有任何政党可以公开活动，所以香港没有正式的作为“党的喉舌”的报纸。不同的报纸发表不同的言论，反映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观点。^③港英政府不允许中国设立官方的代表机构，怕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甚至提出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这样的无理要求。香港政府政治部早

^① 参见李金铨：《香港新闻界的左左右右》，见《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台北，圆神出版社，1989。

^② 参见金尧如：《毛、周的战略思想奠定“一国两制”基础》，见《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香港，田园书屋，1998。

^③ 参见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下卷），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2。

年侧重于侦查右派国民党在香港的地下活动，1967年发生“反英抗暴”事件以后，即转为着重调查左派爱国力量的活动。这与港英政府以共产党为假想敌有关。新华社早于1947年即在香港设立了分社，开展对外宣传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驻港代表，该分社由中共中央领导，5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设立了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有陈毅和廖承志。不过，长期以来香港的工作都是以半公开甚至地下的方式进行的。港英政府一直千方百计抑制新华分社的工作，1952年才承认其国家通讯社的地位。直到1983年中共中央委员许家屯出任社长，新华分社才正式走到香港政治的前台。

在香港这块土地上，爱国报纸的任务，用廖承志的说法，是“以爱国主义为方针的，教育侨胞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向企图颠覆祖国的反动派进攻”。“香港报纸必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爱看的报纸，这才真正能完成爱国主义宣传的任务。”他要求报纸的调子（包括标题）要面对港澳大多数群众，要让他们爱看，让他们看懂。^①香港的爱国报纸遵循早期的香港工作方针，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香港殖民政府与媒体之间基本上处于良性状态，政府对言论的控制向来较为宽松。香港政府成立后通过的第一个出版法（1844年第2号法令），对书刊报纸出版所作的规定，都是属于登记手续与程序方面的问题，对报刊内容并未涉及。媒体对政府一直可以自由监督和批评。有一段时间，港英政府对英文报刊揭露政府官员的做法十分恼火，1860年，港督罗便臣颁布了《修正报纸出版条例》，对办报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包括：办报者必须向香港最高法院立下保证书，并有两个担保人。报纸如果被断定出现诽谤文字，报纸发行人和担保人要分别承担罚款等责任。香港政府的高压手段使报界对政府官员的批评揭露有所减少。不过，香港越来越严的报刊出版法令，主要是维护政府的利益的，如果报刊的活动不抵

^① 参见廖承志：《廖承志文集》，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0。

触政府的利益，香港政府一般不会援引香港法令或英国法律来限制言论。也就是说，在不触及香港政府的情况下，报刊言论基本上可以畅所欲言。因此政治性报纸一直是香港繁荣报业的一部分，中国内地各种政治势力和党派在香港多办有自己的报刊。早在清朝末年，香港的政治性报纸就已十分兴旺，保皇党、革命党都在香港创建了舆论阵地。辛亥革命以后至抗战以前，国民党及其他政治派别也纷纷在香港创办报纸，1949年以后又形成了左右舆论自由争鸣的局面。

港英政府基本上让左右舆论自由发展，其中，或许有让左右势力互相抵消的用心，同时因为对于政治上的担心，还制定了《刊物管制综合条例》以加强对新闻业的控制。这项被公认为香港新闻史上最苛刻的法令，与英国本土所鼓吹的新闻自由背道而驰。首宗根据条例审判的案件，是1952年“三一事件”中的《大公报》案。事件中三家爱国报纸被指控，《大公报》被判停刊，成为香港新闻史上最首宗根据出版法强制停刊的案例。此后援引该项条例的案件，是1967年“反英抗暴”运动引起的“三报停刊案”，三家“外围爱国报纸”成为港府制裁对象，各被判停刊半年，主要负责人各被判入狱3年。这次事件给爱国新闻事业带来巨大冲击，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各报从此一蹶不振达十数年。

港英倾向于袒护右派，1956年10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曾指出，港英当局包庇纵容国民党特务分子利用港九作为对祖国大陆进行破坏工作的基地。1956年“九龙暴动事件”就是一例。“新义安”和“14K”都是香港著名黑社会组织，与台湾国民党关系密切。他们以庆祝“双十节”为名，强迫居民到处悬挂国民党党旗，造成一片旗山旗海的声势。1956年10月10日，他们借口某座墙壁上张贴的国民党党旗被人拆除，便掀起一场暴动，烧商店、汽车，打劫财物，连驻港的外事人员也不能幸免。瑞士驻港副领事夫妇被暴徒包围袭击，汽车被焚毁，司机当场毙命，副领事夫人死亡，副领事本人受重伤。每逢国庆节都会挂出五星红旗的《大公报》宿舍也经常是被袭击的目标，暴动期间，不少《大公报》的骨

干及其家属只好住到社长费彝民的亲戚家避祸。^①此次暴动持续3天，除九龙岛尖沙咀一处，其他地方全部惨遭袭击，死伤人数超过300人。暴动中，爱国报馆、商店、学校、工会是被集中破坏的目标。港英当局虽然称其拘捕6000人以上，其中1455人被控以违反戒严令之罪，737人被控以更严重之罪^②，但是左派人士认为对受害的爱国人士和财产保护不力。事件发生时，港督葛量洪正在东京，未经调查就断定事件一部分是流氓捣乱，一部分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事件，后来并暗示周恩来总理对事件所提出的严正抗议是“干涉香港内政”^③。在1957年1月1日发表的《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中，提到暴乱分子“似有国民党之信仰者与三合会党徒连结”，“暴徒大部分所袭击之物业，乃属于支持现在中国政府之人士（尤以十月一日悬挂共产党旗者为其）”，但左派爱国人士认为香港政府掩盖真相，不满于报告否认暴动“为国民党工作之特务所策划”一说，而“结论乃为九龙之暴动系不法之徒所煽动，乃属犯罪行为，而非政治及有其他作用者”。结论中还有“本港右翼及左翼工会之间，相争激烈，已有多数之事实，必须牢记。凡政治观念相反之工人，相并工作及相并居住……尤能产生特别强烈之感觉。在十月内庆祝两个国庆期间，形成强烈对敌，以前不时有暴行事件发行”^④，颇有各打50大板的意味。在言论宣传方面，港府偏向倾右的报纸。而态度偏右的报纸，也依仗港府的力量，注意与港府保持良好的关系。

港府也通过政府新闻处设定舆论方向。长期以来，政府公共关系办公室一直是政府新闻的重要喉舌和来源之一。1959年，公关办改称“政府新闻处”，扩大工作范围，给报社、广播电台提供有关政府的消息。

① 参见高洁：《〈大公报〉子弟解书香》，载《大公报》，2002-03-09。

② 参见《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香港政府，1957-01。

③ 参见《十年来葛量洪所走的道路》，载《大公报》，1957-12-31。

④ 引语皆出自《香港总督呈殖民地区部大臣函》及《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香港政府，1957-01。

（五）百废待兴：香港传媒的经济环境

战后初期，香港经济处在恢复时期，主要依靠对中国的转口贸易来带动经济恢复。当时中国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待解放地区，特别是华南地区的进出口货物，均以香港为主要转运站。这个时期香港经济得以迅速恢复，1946年至1949年香港进出口贸易每年均以30%以上的幅度增长。内地解放以后，继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大量物资仍经香港转口。1950年香港进出口贸易的增幅高达48%。相应地，这时香港年生产总值也在不断增长，以当年价格计算，1948年生产总值比上年增加达31.8%，1949年亦增加19.6%。^①

香港人口在战前的1939年已达160万人，但1945年人口仅有60万。战争结束后，一度外出避难的人口纷纷回流香港，人口迅速恢复，1947年人口已达175万，其后两年，香港人口以每年5万的正常状况上升。以当时的经济恢复速度，香港人均生产总值在1950年前基本是在递增中，市民消费水平也在增加。

经济复苏、人口数量及素质、社会状况等因素，对香港的报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统计，1945年到1950年，香港共有155家报刊（包括刊物）。^②但较之战前，报纸数量还是明显要少，各报出纸页数，并没有多少增加，出纸多至“各报不能及”的《星岛日报》，日出3大张，销量最大的《华侨日报》，每日销数是38000份。^③《大公报》此时日出2大张。而且在50年代中期以前，香港报业发展一直不稳定。究其原因，从小范围来说，是因为纸价上涨，印刷费用昂贵。1950年，闹了一场纸荒，纸价扶摇直上，比战前的1941年几乎高出10倍。

50年代初期，香港的经济发展缓慢下来，社会状况也受到国际形势和中国政局的影响。当时内地大量人口流入香港，香港人口

^① 参见香港经济导报编辑组：《香港经济年鉴1981-香港经济发展纵论》，香港，香港经济导报出版社。

^② 参见简丽冰、朱陈庆莲：《香港之报纸——1841—1979》，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

^③ 参见《香港年鉴》，华侨日报出版社编印，1947。

一年内激增了38万，达233万之多，并每年递增。而香港经济形势却很严峻，1951年联合国实行对华禁运政策，香港也执行了这个政策，因而香港转口贸易一落千丈。1952年以后，香港的进出口贸易连续三年下降，1954年的贸易额仅相当于1951年的63%。在这种状况下，香港经济不得不向加工贸易转变，相继建立起棉纺工业和其他一些以外销为主的轻工业。1955年以后，香港的出口、进口贸易额逐步回升。但在1957年至1958年西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香港的出口贸易又一次连续三年下降。直到1960年，香港的贸易额才恢复到1951年的水平。

50年代香港报业，受到这些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等多方面的影响。同时，香港政府加强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制，也限制了报业的发展。1951年出台的《刊物管制综合条例》，以条例形式对刊物的出版及内容、报刊、印刷品的印刷、出版、发售、发行、输入、统制、登记与领照营业等，都作了规定。这一法规最表面、最直接的影响是经济方面的，它规定报社需交10000元保证金（此前一直是3000元）。小规模的大报交这笔保证金已有困难，小报更感负担沉重而束手无策。

不过，50年代中期纸价回落，经济也因从转口贸易逐渐过渡到加工工业，才得以缓慢的发展，这时的报纸从数量来说，是有明显增加的。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大量外地流资集中到香港，股票市场交易频繁。加上美国股票、日本股票也投入香港市场，股市消息为更多人所关注，各报竞辟“股市版”。同时，香港逐渐成为国际航运和旅游中心，航运消息也变得更加重要，一股大报都扩大“航讯版”。《大公报》就是较早开辟航讯版的。同时，中国当时进行的国内战争，对许多来自内地的香港居民来说，影响较大。所以关于战争形势、中国政局的报道，也拓展了读者市场，使香港报坛从市面上看，显得颇有生气。

60年代香港工业有较大发展，从1960年至1969年，香港产品的出口值，从28.67亿港元增加到105.18亿港元，所以一般市

民的收入大大增加，报业也有条件不断革新。60年代是香港报业的“彩色革命”时代。1960年11月1日第一份用彩色印刷的《天天日报》创刊后，彩印便很快蔚然成风。同时各报也增加摄影、图片的比例。经济起飞也增加了报业的广告收入。60年代初，整版广告开始流行。报纸广告的总收入也有增加，60年代末，香港报纸杂志的广告收入，大约每年有1亿元（香港全部广告费约为5亿，约占市民年所得的1%）。销量较大的综合性报纸，广告版面约占总版面的50%至60%。

下列是港府编制的消费物价指数中家庭月开支标准数，从中可以看出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64年，家庭开支的标准是100~599元；

1974年，甲类标准是400~1500元，乙类是1500~3000元。（恒生银行稍后编制的高级生活水准的消费物价指数，以3000~9999元的家庭为计算标准。）

市民的消费能力增加，随之媒体的广告空间开始开阔，使一些新兴的报纸如《东方日报》、《信报》于70年代进入市场，并从一开始就走市场化之路。原有的报纸受到市场和新同行的巨大冲击和挑战。《大公报》等爱国媒体刚刚受过一次重大政治冲击，又要面对市场这一轮新的挑战，加上背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其发展的步伐是艰难的。

（六）因地制宜：香港传媒的人文社会环境

香港的人口构成，以内地移民为多，其中包括左右两派人员。1949年中国内地解放后，一些国民党溃兵及反共人员纷纷从内地迁到香港。据估计，从国民党崩溃开始的9个月内，从内地流入香港的人口约有75万。^①1950年，香港人口比上一年激增了38万，达233万之多。香港本土每千人的婴儿出生人数，50年代初是40个，50年代末降到35个，60年代下降到20个，70年代中期则为

^① 参见李宏：《香港大事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

19.5个。^①但总人口数却在激增，因为有不少从内地来的移民，所以在50年代的10年里，人口递增率为4.8%。1960年，香港人口增加到300万，1980年则达500万。

战后香港是以劳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50年代初进入香港的上百万人，主要是劳动人口，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如左派有左派工会，右派有右派工会。左派的香港工会联合会就是香港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1947年创办，1967年会员达近10万人，占香港劳动人口的近十分之一。早年这些劳动人口的文化素养较低，子女们也缺乏良好的教育条件，1950年全港有21800多名儿童失学，1956年失学儿童达五六万。60年代的高出生率及1962年内地灾荒时期的非法入境潮、“文化大革命”时的移民潮，也加重了香港教育的压力，减缓了人口素质的提高。战后香港政府的教育政策，已从原来的精英教育发展至普及化教育，五六十年代香港教育的重点是提供小学学位，1951年至1966年，香港小学生人数由15万人增至66万人。但直至1971年香港才实施小学义务教育，在70年代以前，教育并没有大的改观。与此同时，60年代香港的经济却得到了飞快发展。素质不太高而又有购买力的读者群的需求，以及只求有读者看报、以获取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的报老板的办报路线，造成了60年代香港报业的畸形繁荣。

战后二三十年里，香港的报纸面向劳工阶层，并逐渐形成以市场为取向的大众化媒体主流，与人口构成是密不可分的。这是造成包括《大公报》在内的严肃类媒体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香港的不少政策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1962年到1980年间，香港政府对于内地非法入境者实行两个重要政策：在边境地区捕获的非法入境者可以即捕即解；进入市区的则可获取身份证。这两项措施可以并行不悖，对香港经济颇为有用。到香港的这些难民，很多是壮年。港府可视劳动人口的需要而采取或宽或严的办法。60年代香港的经济结构已经由转口贸易转向工业，外销商品是以低工资低成本而

^① 参见鲁言：《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见《香港掌故》，第3集。

在国际市场上取胜的。那时不少工厂缺少劳动力，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正可以补市场之需。1962年5月，突然有数以万计的内地难民从新界各个边区，爬山越岭，剪开铁丝网，涌入香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不循正当途径涌入的移民。据记载，在难民潮到来的第一天，港英政府是表示欢迎的，第二天警察也是善待他们的，直到第七天港府才宣布拒绝后来者，并宣布凡成功进入市区的内地移民可领取身份证。但是从1978年到1980年，非法入境者越来越多，此时香港的工业已经转向高技术，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去竞争了，于是香港便立法改变原有的政策。^①

香港人无论是土生的或是从内地去的，多称自己是中国人。那时香港人的身份有些特别，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持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在英国却没有居留权，香港人也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50年代去香港的人，大部分都没有想过在香港长久居住，他们心系内地的家乡。所以，那时香港的媒体，基本上是以北望神州为主。这也是《大公报》、《文汇报》等左派报纸在“反英抗暴”（或“文化大革命”）以前能三分天下的重要原因。70年代以后，香港本土意识增强，曾经有人称香港的年轻一代是“无根的一代”，他们的父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但新一代却不认识自己的家乡。^②

香港的文化、价值观念早年都更倾向于中国传统。有人将1967年“反英抗暴”当做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香港是保守的、传统的。一般市民，按他们在中国内地的生活方式生活着。那时的报刊从内容到形态，都是适应这种社会文化和结构的。1967年的运动，让香港市民改变了对现实环境的看法，他们觉得香港的繁荣可能是短暂的，人生是无常的，所以会把握机会尽情享受。^③经过战后20多年的奋斗，香港人积累了一些财富，80年代贫困人口减

^① 参见鲁言：《边境宵禁及非法移民政策的回顾》，见《香港掌故》，第3集

^② 参见周永新：《归属感——从浮游到扎根》，见《见证香港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

^③ 参见周永新：《价值观念——从保守到开放》

少到总人口的5%以下。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内地“十年动乱”的负面影响等，在80年代，“香港人”一词似乎逐渐成为专有名词，颇有世界大都市人的优越感，有着可以炫耀的“香港意识”。有人撰文说：“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单关照中产阶级，亦照顾了普罗大众……和其他亚洲地区的亲友比较，他实在强多了……毫无疑问，朝早吃茶，饭后欣赏功夫电影，一星期赌两三次马，打二三场麻雀（麻将），这样的生活，很难不使人迷醉。”^①香港人比较务实。有人认为，香港不少大学生一毕业就会向现实环境妥协，接受令人迷醉的意识潮流和生活取向。因此80年代有人批评“香港人”不关心大社会，只注重享受个人生活，没有“社会意识”，也就没有“政治意识”，而抱有一种典型的殖民地意识。^②

香港人爱炫耀，也是有目共睹的。多个文献记载1973年股市狂升期间，有人以“鱼翅捞饭”相炫耀。香港人不再像60年代那么朴实，他们被批评为爱名牌、喜豪华、好炫耀。有香港学者说，香港人的嚣张跋扈令人反感，他们不可一世的态度，正表现出他们缺乏修养。^③这样的读者群体，也造就了那些重视感官刺激、喜浮华、轻文化的大众化报刊。战后风行一时的趣味不高的软性新闻、色情内容和揭秘新闻，到60年代以后渐呈泛滥之势。新闻品位不高与当时读者素质相关。60年代在香港市民中最畅销最流行的，是以刊载赛马经或纯娱乐及色情内容为主的小型报纸。这样的报纸仅出纸1~1.5张，靠发行赚钱，本小而利大。

五六十年代香港总体人口素养较低，加上香港报业从业员的待遇较低，新闻界也因此闹“人才荒”，人才一直十分缺乏。报上经常刊登招聘记者、编辑、翻译和排字工人的广告。60年代末，一般中文报的老总级的月薪约是1500~2000元，不如一位普通中学教师。编辑和记者的月薪是500~800元，不如商行的白领人员，

^{①②} 参见施达那：《香港人的社会意识》，见《香港社会前途论衡》，香港，大学出版社，1982。

^③ 参见周永新：《物质生活——从贫穷到富裕》，见《见证香港五十年》。

甚至不如一个中等人家的女佣，就是排字房的工人，工资也比他们高。为了生活，也因为报业人才不够，他们常常身兼数职，所以总体来说，那时的新闻质量是不高的。

（七）管制与自由：港英政府的报业政策

港英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权威，一方面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新闻管制条例，另一方面又秉承英国的新闻自由传统，实行“立法严、执法宽”的方针，让媒介享有较充分的新闻自由。香港政府从未使用行政手段去禁止报纸出版，也从未限制报刊出版的页数，更未对注册报刊的内容有什么规定。只要报刊不触犯英国皇室和港府利益，即可自由出版。同时，香港政府从70年代起在经济上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使市场力量在新闻企业中自由发挥，蓬勃发达的媒介市场更带旺了新闻自由。但香港的新闻自由又是在多种矛盾中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直到90年代临撤退，港英政府才通过了“人权法案”给新闻自由以法律地位。

香港没有一个明文的新闻法，新闻方面所沿用的是其他的成文法。在香港法例中，直接与传播事业相关的有31条，其中7条是有关传播事业的主要法例，包括《本地报刊注册条例》（1951年，1987年修改）、《管制色情及不雅物品条例》（1914年，1987年修改）、《电影检查条例》（1953年，1988年修改）、《广播事务管理条例》（1989年）、《电讯条例》（1894年，1962年修改）、《电视条例》（1964年）、《书籍注册条例》（1888年，1976年修改）。其中《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直接与报刊相关。

《本地报刊注册条例》的前身，是1951年的《刊物管制综合条例》，那是公认的香港新闻史上最严厉最苛刻的法令。这项条例由两大部分组成，其核心内容，是以条例形式对刊物的出版及内容作概括性规定，另以法规形式，对报刊、一般印刷品、新闻通讯社、印刷机器作具体规定。整项条例包括：《1951年刊物管制综合条例》（19条）、《1951年报刊登记与发行规例》（21条）、《1951年印刷机（执照经营）规例》（12条）、《1951年新闻通讯社注册规例》（18条）、《1951年印刷品（管制）规例》（14条）。

其中《刊物管制综合条例》是核心，它要求报刊必须向政府注册登记外，并规定港督有权根据他对媒介的社会效果的估量而决定接纳、保留或吊销报刊的注册。同时又规定：传播媒介不得刊登诱使他人犯罪的内容，包括诱使他人背叛英王或英政府、憎恨与蔑视英王或英政府及香港政府，发表任何煽动性言论等条款；不得刊登诱使他人参加香港以外的政党组织的内容，及不得恶意刊登足以惊骇民众视听或扰乱公众秩序的虚假新闻。主要内容如下^①：

1. 报刊内容的管制措施

(1) 管制诱使他人犯罪的内容

《刊物管制综合条例》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刊载意图诱使他人从事犯罪活动的行为。其中“犯罪”内容包括：1) 叛乱或叛乱重刑罪。诱使他人犯“叛乱罪”，是指诱使他人背叛英王或英政府；诱使他人犯“叛乱重刑罪”，是指诱使他人对英王、英政府或对香港法制产生憎恨与蔑视、以及促使市民之间的阶级憎恶与敌对。2) 引入1938年第13号法案《煽乱条例》(Sedition Ordinance)第4条所规定的内容，所指的“犯罪行为”包括：任何人从事或意图从事或准备从事或与任何人合谋从事有煽动性的行为；发表任何煽动性的言论；印刷、出版、出售、推销、分发或复印任何煽动性出版物；输入任何煽动性的出版物。3) 刑事诽谤罪。4) 蔑视法庭罪。5) 1918年第3号法案《不雅展示条例》(Indecent Exhibitions Ordinance)所规定的犯罪行为。除上述五项明确规定的內容之外，诱使他人犯其他罪行的行为，也一概禁止。

(2) 管制诱使他人参与非法社团的内容

法例明确规定禁止刊登诱使他人进入下列非法社团：三合会等黑社会；由境外所组织的政党或政治团体；由港督会同行政局依法宣布妨害香港治安、社会公共秩序或安全的团体组织。

(3) 管制虚假新闻内容。

^① 参见《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梁作贤、陈文敏主编：《传播法新论》，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

法例禁止报刊登载足以耸人视听或扰乱公共秩序的虚假新闻，有关内容经律政司书面许可便可提出控诉。

除上述三项管制内容外，《刊物管制综合条例》也禁止报刊刊登某种内容的外地刊物进口。有关具体内容授权港督会同行政局，视其是否足以构成妨害香港治安或影响香港公共秩序、安全、卫生或维持道德而酌情下达禁令。

2. 违法报刊的禁制措施

(1) 任何本地报刊一旦罪名成立，法庭可根据律政司的申请，勒令该报刊停刊半年或以下。即使案件仍在候审或审理过程中，裁判司也可以应律政司的申请而令报刊暂时停刊或不得刊载有关内容。对违反停刊令而继续印刷、售卖或发行有关被禁内容的刊物，警方可直接向裁判司申领没收充公令，将该报刊所有机器、铅字、用具、纸张、印刷原料、书写物件、书籍簿册、文件或书据等查封扣留。

(2) 外地报刊若被禁运进口，任何人在香港售卖、发行或持有该报刊，均作违法处理。

(3) 法例对藏有非法印刷品提供一般性禁制措施，并授权太平绅士签发搜查令予警方执行，另授权邮政处长、工商处长和警务处长拆验或扣留可疑的进口刊物。

该条例是港英政府惧怕共产党对其殖民统治形成威胁而制定的，其严厉苛刻与英国本土所鼓吹的新闻自由完全背道而驰，直到80年代末才撤消。80年代形势已经大变，中英关系已大为改善，香港将向“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前景发展，并且新闻自由带来的威胁或挑战，回归以后对港英政府将不复存在，倒是未来的特区政府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所以港英政府于1986年着手修改这项条例，撤消了对印刷媒体、采访及报道自由的各种限制，包括其中管制报刊内容及某些注册事项的条款，结果使《刊物管制综合条例》有名无实。1987年港府索性撤消整条条例，代之以《本地报刊注册条例》。

但是，《刊物管制综合条例》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的。

首先依据这项条例审判的案件，是1952年“三一事件”中的《大公报》被迫停刊案。1967年，在震动世界的“反英抗暴”事件中，3家“侧面爱国报纸”也被判停刊。这两起官司成为香港新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

（八）左右皆旺：20世纪50年代香港报业格局

6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政治因素在香港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爱国拥共和倾向台湾国民党的政治性报纸相当兴旺，香港报业由此形成了左右对峙、左中右并存的局面，其中中间报纸又分为中间偏左、中间偏右和中立三类倾向，所以当时报纸堪称五类并存。

左派报纸是指拥护新中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报纸，主要有《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等。这些报纸虽然在香港办得较晚，但发展较快。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英明政策，左派报纸在办报方针、手法等方面，适合了香港读者的口味，与中间偏左报纸一起，销量在香港中文报界几乎“三分天下”，部分报纸并销往内地。

左派爱国报纸早年按“港报港办”的原则，以当地民营报纸面目立于激烈的报业竞争市场，是爱国主义的报纸，其领导模式、管理架构、人事编制、新闻处理、人员培训等方面，都与内地的新闻事业相近。《大公报》和《文汇报》站在同一立场，内容上则各有侧重，或者说有所分工。《大公报》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以工商界人士为读者对象。《文汇报》则重在文教，读者对象以文员学生为主。香港是个商业社会，而不是文化科学中心，所以从内容方面来说，《大公报》更具优势。^①香港报纸数量繁多、种类各异，竞争对象不可能局限在同一派别的报纸之中，如果自己画地为牢，那么报纸的效果和影响都会大受局限。

《大公报》虽然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不过，因其灵活的办报手法，也拥有不少读者。该报着力经营副刊，而且创出了特色，并

① 参见杨生彦：《香港办报札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曾一度刊载市民喜闻乐见的武侠小说、马经等软性内容。1967年以前的《大公报》，基本上处于发展中，报社业务不断扩大。

1967年发生“反英抗暴”事件后，《大公报》与其他爱国拥共的报纸一道，受极左路线的影响，销路不广。1970年前后《大公报》销量仅维持10 000~25 000份。“文化大革命”初期，左派报纸上的新闻只有两条，登在国内版的一条是“反英新闻”，登在香港版的一条是“反英抗暴新闻”（当时尚未设国际版）因为极左思想的毒害，左派报纸由反英反帝而反“封资修”，有一段时间连报纸的副刊也被当做“封资修”而取消了，各报销量自然大受影响。

中间报纸在政治立场上处于中立，主要是商办报纸。其中倾向于爱国拥共的，是中间偏左报纸，主要有《田丰日报》、《香港夜报》、《新午报》等；倾向台湾国民党的，则是中间偏右报纸，较有代表性的是《华侨日报》、《星岛日报》，另外还有英文《虎报》、《红绿日报》、《超然报》、《真报》、《天下日报》、《新闻夜报》等。坚持中立、基本上不偏不倚的中间报纸，主要有《成报》等，只奉行其商业性宗旨。《明报》、《快报》、《天天日报》、《新报》等都是独立的商业性报纸。《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英文《南华早报》）及其集团报纸，态度亲港英政府，一般不卷入中国政治，态度中立。

右派报纸拥护蒋介石国民党，主要有国民党的机关报《香港时报》及老牌商办报纸《工商日报》、《星岛日报》，这3家报纸战后初期几成“三报鼎立”之势，读者数量颇多。这与当时的人口结构有关。50年代初，香港人中近一半来自内地，其中不少是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逃至香港的，亲蒋反共意识很强。《工商日报》对台湾国民党的重大政策措施均表示支持和拥护，其读者主要是商界的亲台人士，亲台的“自由工会”的职工。该报的社论也常被台湾国民党广播电台转播，50年代中该报发行约2万份，其中四分之一销往台湾。《工商日报》也一向拥护港英政府，它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等事件中站在港英政府一边，所以深得港英政府的信赖，港英政府屡屡称颂它以及《华侨日报》、《星岛日报》为中立报纸。

第八章 复刊至“文化大革命”前的香港《大公报》

能充分报道有关国际消息和本地新闻，港府的告示一度也仅在这三家中文报纸上刊载。^①

左右派报纸经常发生激烈的论战，60年代在中国内地的反美和台湾的亲美斗争中，火药味尤其浓重。1961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远东事件，曾引发左右报纸的大论战，双方交锋十分激烈。以后这类“战争”也时有发生。左右派报纸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新闻业务的角逐中各有建树。

二、复刊时的《大公报》业务

（一）复刊：终“在香港长期努力”

香港版《大公报》创刊于1938年，1941年12月14日因日军占领而停刊。抗战时期该报在香港就非常有影响，赢得了同行的赞誉，“言论主张，隐为舆论之领导”^②。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的发展战略是：巩固重庆版，恢复天津版和上海版，选择时机恢复香港版。1948年春，《大公报》总管理处总经理胡政之，偕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李宗瀛、王文耀等，从上海来到香港，筹备恢复香港《大公报》。

复刊时期非常艰难。胡政之在利源东街15号简陋的木楼中租用一间临街的房子（《新生晚报》所有），仅数百平方尺，与多家兄弟报纸、印刷所毗邻。利源东街虽然狭小，当年却是香港有名的报业一条街。《大公报》工作场地极其紧张，经理部和编辑部在一起办公。白天是编辑部的日班人员和经理部办公，夜间则编辑、译电、校对、资料人员换防，有时还要加上夜晚归来写稿的记者，室内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张桌子几个人轮流用，没有一个人有单独的写字台，总编辑、经理也不例外，桌子上抽屉里的东西都分不清是谁的。排字房、印刷厂在楼下，也是租用《新生晚报》的。^③

^① 参见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49—1969),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② 《香港年卷》(1947)，华侨日报编印。

^③ 参见唐振常：《香港〈大公报〉忆旧》，载《大公报》，1999-12-15。

住宿也非常拥挤，一套小公寓里，杨刚因为是女性可以独占里间，李侠文、马廷栋等几位只能一道住客厅。^①胡政之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作，住在宿舍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起居饮食都没有人特别照顾，往来报馆与宿舍之间都是坐公共汽车。一次李侠文在公共汽车上遇见胡政之，只见没有座位的他“站在车上，一手抓住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在车行中摇晃，悠然自得”。为了尽快复刊，胡政之全力以赴，已不知道什么是疲倦。^②

《大公报》总管理处任命费彝民为港馆经理，李侠文为编辑主任，他们就是港版最高负责人了。与各地方版一样，港版那时是没有总经理、总编辑的，社长一职则自1935年吴鼎昌因受聘官职辞职后就未再设，直到香港《大公报》改组。在港版第一次编辑会议上，胡政之、费彝民、马廷栋、李侠文、李宗瀛、刘克林、蔡锦荣、谭文瑞都为报纸的出版献计献策。胡政之说，港版复刊是自己“最后一次开创，今后青年同事担负”，“讲我事业成功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因为报业这事业太大，同人们一起努力成功了，这才是成功”^③。经过5次试版，香港《大公报》终于于1948年3月15日正式复刊。胡政之兴奋得一夜未眠，等到拂晓开机，取出第一张报纸在手上，如同怀抱着新生婴儿。同仁们也都欣喜不已。

复刊号报头下印有第15934号、督印人费彝民，发行2大张，报价为港币2毫。版面安排是：

第1版：广告；

第2版：社评《大公报港版复刊辞》及20多条要闻；

第3版：国际新闻和评论；

第4版：香港新闻。

① 参见陈昌凤访问李侠文先生《前《大公报》总编辑，现董事长》记录，2002-08-16，于香港中环陆羽茶馆。

② 参见凤凰卫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2002-07。

③ 蔡柏生：《往事知多少》，载《大公报》，2002-03-18。

第5版：经济新闻；

第6版：体育与教育新闻、交通指南；

第7版：地方通信和“文综”；

第8版：副刊《大公园》。

第2版的要闻分别来自中央社电、华盛顿电、合众社电、路透社电及本报电、本报专讯特讯等。《大公报港版复刊辞》。据载为胡政之撰写^①，文中阐述本报的性质，回顾本报的历程，慨谈本报对时局的看法，表明“在香港长期努力”的抱负：

……复版伊始，关于本报自身，有三点说明，希望读者注意：

第一，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现在总社在沪，天津、重庆均有分版，台湾以上海纸版航空递寄，至台印行，连同香港本版，一共虽有五个单位，事业却是整体的……言论方针是各版一致的……社论方针都是一贯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团体的，不是一个人或少数社员所能标新立异的。

第二，……我们在八年抗战中，事业由黄河流域而到长江流域，由长江流域而到珠江流域，一切都是团体行动，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这并不是司人有什么过人能，实在我们觉得，在历史上书生向来都有一股傻气……我们不敢妄自尊薄，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现在，国家的情形非常之乱，善良的老百姓夹在床上的战火中，真是痛苦不堪言状，我们是民间事业，其艰难困苦当为识者所共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书生以文章报国的本心，恢复港版，想要利用经济比较安定的环境，加强我们为民族服务。

第三，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的斗争着，相互的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按照现在的世界情势，实在需要以

① 参见王鹏：《香港《大公报》创办和发展》，载《大公报》，2002-05-01。

人类全体利益为理想的伟大人物，才可以求致世界的和平。不幸而世界上能掌握人类整个运命的政治家都免不了囿于旧世界的范畴，以眼前的利害为转移，以本国或本民族的发展为极旨，偏狭、自私、全世界都充满了猜疑、怨恨、恐惧和烦闷的心理。大家各有幻想，这样发展下去，除了酿成人类的浩劫、毁灭千百年积累而成的文化的大悲剧之外，恐怕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要照近年的倾向看起来，几乎让人怀疑到人类是万物中最愚蠢的了……我们愿意在祖国的国门边上与世界爱好和平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这也是我们在香港复刊的理由。

……这次复刊却是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只是限于人力物力，规模简陋，诸待改进，还望爱护本报诸君多多指教。

主张和平是《大公报》各地方版的主题之一，香港版也不例外。从这篇复刊辞还可以看出，对于时局该报存在着复杂而不明晰的看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于《大公报》来说，后来重新选择道路的确是一次艰难的蜕变。

《大公报》逐渐走到国民党的对立面，由于其逐渐鲜明的政治立场，自1948年10月中旬开始，广州国民党政府禁止香港《大公报》入口。解放后，1949年11月1日才在广州恢复发行香港《大公报》。

1948年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发表王芸生亲自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社评对未来表达了希望：

大局板荡，生民涂炭，身在水火，忧心曷极。但要知道，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违逆了人民群众的生存轨道，必无治，摧折人民群众的求生欲望，必乱……目前纵然和平无望，人民大众终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们徘徊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远！

这篇社评标志着香港《大公报》走上新的路程，找到新的方向。^①从此，该报更多采用各方面的电讯，更客观地报道局势发展。版面上仍称蒋介石为蒋总统，称国民党军队为国军，称解放军为共军（国民党则训令报纸称“匪”），只有采用中央社的原文时，才不可避免的称“匪”。

港版复刊后，新闻取舍、言论和副刊文字，已经逐渐与内地各版不同，所以，《大公报》后来的拥护新中国，与全体工作人员明里暗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该报于1949年元旦发表社论，欢呼“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即将诞生。针对某些人对香港命运的疑虑，香港《大公报》曾发表社论，透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言明香港并无危险，新政权并无盲目的排外情绪。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宣言：“当此重大时代，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公报是具有政治与文化两重机能的私营企业，它检讨过去，开拓未来，也正是扬弃旧污，开拓新生……今后的大公报……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

当时港英当局对进步报纸的管制非常严厉，《正报》、《华商报》等正面报纸都受到严格限制。香港政府还时常以“诽谤名誉”为由，控告《华商报》，每隔1个月，就要勒令该报到指定地点接受盘问或者罚款。^②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报刊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而《大公报》的活动空间显得相对很大，该报开始刊登憧憬新中国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大公报》公开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舆论倾向。1949年11月14日，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在香港通电宣告拥护中国共产党，得到党中央、毛主席复电嘉勉。《大公报》最先登载这一消息和通电全文，声震国内外。《大公报》并支持该所保护存在香港的大批钨、锡、锑等出口矿产品。对于

① 参见《大公报一百年》中册，香港，香港大公报出版，2002。

② 参见凤凰卫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2002-07。

《大公报》的“转向”，外界一时议论纷纷。中共党员记者李纯青曾约李侠文总编到山顶散步，谈他对报纸未来的担心。他担心内地有些老同事因反对香港《大公报》改变立场而跑到香港，按胡政之的老路办报，造成不利影响。曾有说法，要把少数同仁调回内地，关闭香港《大公报》，其余人员就地遣散。这一计划后来因朝鲜战争爆发，没有实现。^①

香港《大公报》规模逐渐扩大，人员也在增加，创刊后报上即刊登招聘启事。从1948年3月19日的启事上可以看出当时需要人员的素质情况：

本报招聘营业员（营业处外勤）：

1. 资格：中学大学或同等程度
2. 年龄：20~30岁
3. 性别：不限

4. 其他条件：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口才伶俐头脑清楚；能说粤语、英语、国语（能沪语更佳），熟悉港九路况，具殷实铺保或现金保证；能够具商业经验或各界有相当联系者。

一些《大公报》内地版的工作人员，因躲避国民党的搜捕也加入了香港版。1948年10月唐振常就是这样到港版工作的，当时他与多数同仁一样，感觉可以自由痛快地说话编报，不必再做违心的事了。^②虽然这里的工作条件较差，但工作环境却很自由，所以报纸也虎虎然有生气。1949年，《大公报》在香港、东南亚多个国家及欧美地区都已受欢迎，但仍不断革新版面，充实内容。这年1月17日，《大公报》增辟《思想与生活》、《文艺》、《青年群》、《经济生活》、《影剧》、《新美术》、《周末版》等7种周刊，同时增加《天下事》专栏，详尽分析当日新闻。8月23日，报头下刊登“欲读早报”，承诺每日早上8时前派送到订户手中，以此积极扩大发行，发展业务。

① 参见凤凰卫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2002-07。

② 参见唐振常：《香港〈大公报〉忆旧》，载《大公报》，1999-12-15。

1949年10月1日,《大公报》刊登重要启事:“自本日起,遵令正式实行公元。”原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改为公元1949年。同日随报送新国旗图样一面。

1950年7月1日,报社从利源东街迁入干诺道中123号,规模稍稍扩大,后扩展到124号。1962年8月再迁至轩尼诗道现址,面积逾二万平方尺。随着事业发展,报社人力也不断增多。到后来,还扩大了发行范围。1967年5月1日,增加发行中文《大公报》海外航空版。1967年5月31日,又创刊英文版。

(二)《大公报》的经济情况

1948年香港版复刊时,《大公报》总资本已超过了6亿元。但此时因为津版、沪版的恢复,耗尽了《大公报》的财力,香港版复刊时已经资金吃紧,因此胡政之接受了王宽诚2万美元的入股投资。

香港《大公报》收入不多,却开支浩繁。那时一批内地各馆的工作人员为避国民党迫害来到香港,港馆因此开支大增,财政一时陷入困境,当时经常连工资也发不出,许多同事自动减薪,甚至冻结薪金。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胡政之趁一次蒋介石约见的机会,要求按官价购20万美元外汇,以便向美国订购新型印报机,备复刊后使用。蒋介石批准了他的请求。1945年4月,胡政之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就顺道订购了一台新型卷筒式印报机,后来印报机成为香港复刊后最主要的资产。此事后来曾遭到一些人的议论。^①在定货时,因所带美元不够,胡政之又接受美国华侨李国钦的5万美元入股。事实上,这部卷筒机从未启用过,而是用以向银行作贷款抵押,以维持报纸的运转。据李侠文回忆,当初香港版的正常运转,多亏了这部卷筒机,靠这两台机器吃了几年饭。^②后来,卷筒机运到广州,转售给《南方日报》

① 参见《大公报一百年》中册,香港大公报出版,2002。

② 参见陈昌凤访问李侠文先生(前《大公报》总编辑,现董事长)记录,香港马会,2002-08-19。

用以偿还债务，这样的结局是胡政之所不曾想到的。

解放初期，内地的《大公报》实行了公私合营，实际上已是国有企业。^①但香港版则还保留个人持股的形式。由董事会领导报务，由经理、编辑部主任主持报纸的日常工作。

（三）新闻重中国和国际，轻香港本地

《大公报》从战后直到70年代，基本维持出纸2大张，《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等战后初期就出纸3~4大张，英文《南华早报》出张则在6大张以上，从版面数量来说，《大公报》并不具强势。

《大公报》重视国际新闻和中国内地新闻的报道。稿源方面，复刊之时，正值激烈的国内战争期间，关于中国军政的消息，该报主要采用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新闻，“中央社”的新闻占的比例颇大，但经过内容取舍和版面处理，所报道的消息力求真实。除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战报，也部分采用新华社电讯、外国通讯社电讯、本报专电及特约通讯。50年代初，国际新闻、中国内地新闻的主要稿件来源于新华社，其中中国华南、上海等地尚有部分本报特约稿。

50年代，《大公报》对香港本地新闻并不重视，刊载的比重远远少于中国内地新闻和国际新闻。出版2大张时期，前3版是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社评，第4版是香港本地新闻，该版通常还有半版的广告。香港本地新闻的不充分性，使报纸脱离本地现实，影响了其销路。当时销量最大的是《成报》，达6万以上，而《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加在一起，销量仅及发行量第二的《红绿日报》（三四万份）。廖承志曾说：“我们在香港办报，决不能脱离香港这个商业社会的实际，决不能脱离香港同胞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水准，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喜乐爱憎。特别是要适合所谓‘中间落后大多数’的人需要。我们是要争取团结中间大多数，这是一切工作的方针，也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这里随机抽取1951年3月的报纸为样本，按当时报纸编写的

① 参见：鹏：《大公报的资金与股份变动情况》，载《百年潮》，2001（8）。

目录进行统计，看看各类新闻的数量（参见表8—1）：

表8—1 1951年3月1日至31日《大公报》报道各类新闻统计

区域	类别	篇数	备注	总篇数	所占比例
中国新闻	政治	11		182	40%
	外交	8			
	军事	4			
	镇压反革命	8			
	民族	4			
	地方	7			
	土改	11			
	社会	7			
	劳动保险	7			
	经济	27	生产竞赛、公债、农、贸、海关、交通、地方经济		
	文教	7			
	卫生	13			
华南	38	公安、经济、贸易	51	11%	
广州市	30				
港九	28	未计入通讯快讯			
中国香港本地	香港经济	23	贸易、禁运等		
国际新闻	国际	37		175	39%
	和平理事会	13			
	联合国	6			
	朝鲜	37			
	亚非	39	其中包括伊朗5篇、越南11篇、日本20篇		
	欧美	20	其中包括英国2篇、法区6篇、德国5篇		
	美国	13			
	苏联	11			
其他	电影	25	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外国电影	39	8%
	华侨	7			
	人物	7			
总计				448	

从当时内容看，《大公报》非常注意配合国内宣传。1951年3月26日，该报第2版以整版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实施细则草案》。报社还举办相关活动，并配合报道。1951年3月9日至11日，《大公报》在干诺道中65号华商总会礼堂免费办《新中国图片展》，展出了400多幅照片。展览首日竟有1万多人参观，以至报纸呼吁市民不要造成过于拥挤的情况。参见表8—2。

表8—2 50年代初《大公报》、《华侨日报》版面比较^①

版面主题	大 公 报			华 侨 日 报		
	版面数	比例(%)	版面名称、备注	版面数	比例(%)	版面名称、备注
中国新闻	12.25	12~15	要闻、中国	1	8	国内电讯(以后几成台湾专版)
国际新闻	12.25	12~15	要闻、国际	1	8	国际电讯
中国华南新闻			刊于中国新闻版	1	8	华南新闻(后取消)
中国香港新闻	<1	<12	香港新闻	3	37	香港新闻(后增辟“新报版”)
体育新闻	0.5	6	与国际新闻共3版	1	8	华侨体育
文教新闻				1	8	教育与文化
经济新闻	0.5~1	6~12	中有半版行止表	1	8	华侨经济
交通新闻			后增加航讯内容	1	8	航讯
娱乐新闻	1	12	电影版、文综 港闻版有财经	1	8	娱乐圈、今乐府 后增加马经专栏
副刊	1	12	大公园	1	8	侨乐村
读者服务	0.5	6	与各地通信共7版	定期		读者
各地通信	0.5	6				
总计	8			12		

从所占比例可以看出，《大公报》重视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12%~15%，国际新闻方面，70年代曾开设东南亚版，1980年4月取消)。中国香港本地新闻版面比例较小(小于12%)，而《华侨日报》突出香港本地新闻(37%)，中国新闻(中国新闻版、华南新闻版共占16%)受到重视，其他新闻则比较均衡。对于“中国新闻”的界定，《大公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心，《华侨日

① 《华侨日报》版面情况，参见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

报》以国民党政府为中心。在经济新闻、体育新闻中也体现这种政治倾向性。

有时为了特别报道，《大公报》会增刊处理。1953年3月2日，《大公报》刊出“增刊启事”：“本报今日发表美俄俘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上校参谋长评威布尔及少校军械官布莱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战的全部供词原稿，增刊一张，不另收费。”此外，还偶赠以“精美画刊”。

尽管在内容比例上香港本地新闻未受十分重视，但还是比较讲求香港本地新闻质量的。据现任总编辑杨祖坤回忆，五六十年代，《大公报》跑港闻的记者中能手不少，跑突发新闻的有“三条烟”：黄子平、潘思勉、王津，跑静态和社团新闻的有“三王一后”：黄学尧、黄津、万民光和王宁，摄影的有张光亮，“在行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①。

香港报纸的内容风格，与文化传统深厚的内地非常不同。唐振常1948年底从沪版调任港版任职数月，负责编本市版（港闻版），他觉得“很乏味”，“充斥版面的新闻，无非是红门藏金走私被查获……而其文字，粤语加似通非通的文言，令人难解”。港闻版有一专栏“今日广播”，把当时仅有的电台“丽的呼声”的节目表刊出。唐振常曾自嘲，“港闻版编得最好的一栏是‘今日广播’”。也就是说港闻版整个的不足看。^②这是一个来自内地的编辑的观点，而当时其他各报港闻版的社会新闻，用文汇报负责人向陈毅、廖承志等人汇报时的话说，都是打打杀杀、偷偷抢抢、非礼强暴、卿卿我我，这才成为新闻，因为香港人喜欢看。

1953年3月头3日《大公报》香港版头条新闻标题摘录于此，以见一斑：

3月1日头条：狗展记趣：裁犬戴绿帽 周旋群狗中 品姿论毛色 验口香脚爪

① 杨祖坤：《四十年从头说》，载《大公报》，2001-12-04。

② 参见唐振常：《香港〈大公报〉忆旧》，载《大公报》，1999-12-15。

另有：寒风中少女坦胸 细佬歌入小洞天

3月2日头条：司机被诱赌败自杀 四龄女童离奇身死
另有5人自杀两人毙命3人获救

另有本报特写：一个女人的痛苦

3月3日头条：摩登男女同床服毒（此后曾追踪报道多日）

关于香港新闻，下文还会以几十年纵向比较的形式加以阐述，不赘。

（四）社评的使命感

历史上《大公报》非常重视社评，1941年9月张季鸾病危时，《大公报》管理机构方面组织了董监事联合办事处，言论方面正式组织了社评委员会，当时香港版的社评委员有金诚夫、徐铸成、杨历樵。港版复刊后保留社评委员会。王芸生时期，社评委员会开会交流情况、确定议题，分配任务。国内问题中，凡重要的多由王芸生亲自执笔，李侠文等分担一部分，国际问题由李纯青、萧乾、杨历樵撰写。^①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即热衷“剿共”，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大公报》经常针对时弊，发表言论。新中国建立之初，香港的政治斗争依然十分激烈，爱国力量不仅要受到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挑衅，还要面对港英政府的抑制。《大公报》的社评十分重视国际国内的斗争，战斗性很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受到过“左”的思想影响。

此处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以1951年3月1日至31日为样本，分析一下50年代初《大公报》社评、评论的内容分布。31天中，刊有本报社评27篇，转载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社论13篇，平均每天刊载评论1.25篇，可见其对评论的重视。本报社评中，关于国际问题、中国问题各占40%，只有11%是关于香港本地的，其他内容占7%，反美帝国主义的占总数的19%，占国际

^① 参见王鹏：《〈大公报〉的“社评委员会”》，载《大公报》，2001-06-26

问题的45%。这个样本印证了这样的立论：50年代初香港《大公报》重视国际问题和中国问题；香港本地问题未受重视；非常革命，所谓颜色很“红”；反美帝国主义是当时的中心斗争之一。

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中曾一再提醒香港左派报纸：不要在香港办党报！陈毅副总理也曾经指示说：若要你们在香港办党报，倒不如叫《人民日报》去搞个分社，干脆把《人民日报》拿到香港去印发。在一次中央外办港澳组会议上，廖承志提出，在香港的报纸要走社会化的道路，不要搞党报左报，老摆一张红面孔、一副“爱国主义”的架子。在香港要内外有别，不能照搬内地天天突出政治、板起面孔教训人，不能把报纸办成教科书。陈毅也曾要求他们不要搞资本主义五颜六色的东西。当时总编辑李侠文表示：多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内外有别、不照搬内地的做法，我们也努力去执行，但身在香港就摸不出如何能做到内外有别，今后会更加努力。资本主义那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同香港社会混在一起，有时很难区别。搞“社会化”，难免沾上五颜六色的东西。

关于转载《人民日报》社评的做法，在当时香港媒体间也颇有争议。《大公报》一方面借此宣传了中国内地解放后的成果、政策，同时也有点不看对象，不合地宜，如在香港宣传内地的春耕问题，等等。

下面逐日列出1951年3月份《大公报》香港版的社评的标题，从中可以看出其关注的内容和风格：

- 3月1日：略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 3月2日：暗杀之风不可长
- 3月3日：劳动保险条例是革命胜利的果实
- 3月4日：世界和平的途径
- 3月5日：办好救济福利事业
- 3月6日：美侵略军的新罪行
- 3月7日：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
- 3月8日：抗美援朝 纪念“三八”
- 3月9日：难留的梦境

- 3月10日：日本再武装与香港
3月11日：西方国家的经济病态
3月13日：两个预算两条道路
3月14日：土改对华侨有利
3月15日：四野战绩展览会开幕
3月16日：日本人民统一战线积极展开反战斗争
3月18日：德工商界迈进一步
3月20日：美国人民的和平进军
3月21日：单独媾和与日本经济
3月22日：南方学院应该存在
3月23日：推荐组织疗法
3月24日：“北京人”
3月25日：苏联通过保卫和平法
3月27日：订立、检查并实行爱国公约
3月28日：从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说起
3月29日：天主教会的自立革新
3月30日：越南人民的胜利保证
3月31日：欢呼汉江前线的胜利！

转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评论：

- 3月1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3月8日：对于反革命的宽大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3月12日：逮捕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
3月18日：必须使全国每一处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
3月19日：帝国主义分子破坏天主教自立爱国运动的铁证
3月23日：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发展而斗争
3月25日：大力搞好春耕工作 奠定全年丰收基础，书评是领导出版工作和报纸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3月28日：细菌战犯要受严厉制裁，处决反革命的首

恶分子

3月30日：斥侵略罪犯麦克阿瑟的无耻狂言

3月31日：普及爱国公约运动

一年以后的样本显示，上述立论仍然成立。1952年3月《大公报》共刊载社评31篇，并转载《人民日报》社论3篇。本报社评中，58%是关于国际问题的，29%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仅有12%是关于香港本地的。香港问题的社评都是负面的问题：《是谁不够朋友》（关于奸商造谣诬蔑共产党的）、《九龙冲突事件》、《美丽的言辞与残酷的现实》（对港督报告的批评）、《克尔比教授的香港经济》。当时《大公报》与港英政府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国际问题的社评中，有50%是揭露美帝国主义的，这也符合当时中国的斗争中心，那时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美帝”。

社评的斗争对象，有几个方面：台湾国民党及其残余势力，港英政府，美帝国主义。

下面这篇就是关于国民党及港英政府的，题为《谈谈香港的问题——乘李特斯顿先生来港》（1951年12月13日）：

谁都知道，香港向来是标榜法治的地方，居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要求合乎法律，相对的，香港当局也当然要负责保障居民们的合法权利。然而近来的事实却使人们发出一种疑问：是不是对于某一些特殊人物，香港当局并不严格要求他们的行动规规矩矩？是不是对于一般居民的合法权利，香港当局反而不大重视，甚至于加以不应有的限制？

所谓特殊人物，就是南华早报说的“在此滋事已不止一次的”“台湾的人”，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四个多月来，谋杀、抢劫、勒索等事件在香港层出不穷。不完整的统计指出，至少有50多起是他们干的好事！私藏炸弹、绑架幼童、杀警夺枪，都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除此以外，他们又到处行凶捣乱，威胁着居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种行径在今年10月以后，越来越猖獗，越来越使人无法容忍。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那一天，他们啸聚在

若干处，撕扯新中国庄严的国旗，并对悬挂国旗的居民叫嚣掷石。10月10日，他们当街拦阻正在行驶的电车，无故打伤电车工人多名……在这前后，他们还常常埋伏在渡轮码头，殴打爱国的青年学生……

承认新中国的英国政府，它在香港的负责当局居然会不承认中国人民有爱国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骇人听闻的，这样的举动不能不超出人们常识范围以外了。

就是这样，香港的中国居民一方面受到国民党残余分子的非法威胁，另一方面还要受到许许多多不近情理的限制……

1952年5月18日，是《大公报》因“三一事件”被迫停刊后的复刊日，发表了社评《献给读者》，以表示与港英斗争的决心：

在过去被迫停刊的12天中，我们虽然没有和读者见面，但我们与读者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这12天来，广大读者纷纷写信来，打电话来，慰问我们，勉励我们，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对我们关切的热情，令我们非常感奋……

作为中国人民的报纸，我们感觉我们的工作，应该依从人民群众的愿望与需要，为报道真实，为求促进共同的美好的理想而尽力。在港澳数百万同胞和海外千万侨胞之前，我们要报道新生祖国的真相，把国内同胞从事建设伟大祖国的无比的努力以及辉煌的成就，忠实地报道出来，加深大家对自己祖国的认识。同时，我们又感觉到，只有通过真实的认识，才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间的了解与友好关系……

作为一张中国人民的报纸，我们爱祖国、爱同胞、维护和平的立场与决心始终不变。在任何压力之下，也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坚决的信念……

1956年国民党分子发动九龙暴动之后，《大公报》的社评《〈九龙暴动事件报告书〉发表以后》（1957年1月20日），中肯地指出港府的报告中与事实相符的方面，但又认为报告书中“并无任何证供足以谓之事先有预谋”令人费解，并敦促政府“把乱源扫清，祸根拔除”，对港九居民负责。

针对港英政府“亲美容蒋（介石）反对中国的政策”，《大公报》在港督葛量洪离职去美之日，发表《十年来葛量洪所走的道路》（1957年12月31日），指出港英政府“执行了美国的‘禁运’与实施‘管制’，香港这个转口站无法发挥作用。工商各业连年叫苦连天……一般劳动居民生活的困苦，有增无减”，而政府税收一直在向上升，美蒋特务分子活动猖獗，港穗直通车恢复无期，中国人民出入要受限制。指出重提这些往事纵使无补于既往，却希望有裨于未来。

1958年6月，港府教育司干涉10所爱国学校悬挂中国国旗、禁止唱国歌和向毛主席致敬，为此，中国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大公报》发表社评《爱国权利不容侵犯》（1958年6月11日），指出：“中国人之爱中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爱中国的中国人要悬挂自己的国旗，唱自己的国歌，敬自己国家的领袖，又是事所必致，理所必然。凡此都是中国人的天然权利，不容侵犯！……香港英国当局应该立刻停止这种无理干涉。”

50年代初，与美帝国主义斗争是《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重要任务，该报针对美国在朝鲜的战争，发表过《美细菌战铁证如山》（1952年3月22日）等多篇社论，揭露美国的侵略行径。《大公报》还提醒亚非人民：“美国帝国主义者还想在整个亚洲复辟，它正在想以它的新殖民主义的枷锁重加于亚非两洲人民身上。为此，它正一方面在布置新的战争，并要教‘亚洲人打亚洲人’；另一方面，它正在积极布置和进行目的在颠覆亚非各国政府的罪恶阴谋。它不愿见到亚非人民的团结，千方百计在他们之间诬蔑中伤，挑拨离间。”“美国现在还在活动，想在停战之后把印度支那的南部地区拉进它正在拼凑中的东南亚军事集团，阻挠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政治解决的协议的实现，把停战变成下一次战争的喘息机会。同时，美国也正在加速支持李承晚及日本扩军，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的国上台湾，要和蒋介石订立所谓‘双边安全公约’；它公开地在中国的周围拼凑一系列的挑衅性的军事集团。”抗美援朝胜利后，《大公报》发表《中朝人民的胜利，全世界人民的胜利》（1953年7

月28日)等社评,鼓舞世界人民的斗志。在台湾问题上,《大公报》也立场鲜明,声明“决不许美国吞并台湾”。

《大公报》社论也不失时机地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长中国人的志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大公报》发表社评《中国有了原子弹》(1964年10月17日),欢呼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说明“中国的目的,只是要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从而促使核武器的消灭”,“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1970年7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大公报》以《我国人造卫星上天了》为题发表了社评,无比欢欣地盛赞中国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四人帮”垮台后,《大公报》发表了多篇报道和社评,如《人心大快形势大好》(1976年10月25日)、《历史性时刻到来了》(1980年11月20日)。

《大公报》的社评也论及经济等问题。如1949年1月1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本港商业的一线生机》,指出:华北的解放区中,由于建设的需要,不能不需要大量机器工具,同时土特产货品亦亟须出口,调节传输的责任,就是香港商人的课题……商人操奇计盈,重要的一着,在预见机先,一线光明已呈现了。这篇社评颇有见地,香港工商界后来纷纷朝北看,业务蓬勃发展,《大公报》逐渐受到政界、工商界、知识分子的重视。

(五) 一流的副刊

《大公报》历史上就一直非常重视副刊的经营,《小公园》、《文艺》、《大公园》成为各地方版的明珠。抗战时期港版办有《文艺》,由萧乾、杨刚先后主编,闻名一时。另一个历史最久的副刊,是综合性副刊《大公园》,港版复刊后,保留了这个副刊,刊载了不少文坛人物传记、笑话、影剧、译作、漫画、连载小说等。^①

1948年3月15日复刊号的《大公园》,占半版篇幅(另半版为广告),其上有洪深的《“忆江南”与“一江春水”欣赏录》、吴

① 参见陈昌凤:《蝶舞——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祖光的《为〈风雪夜归人〉写》、风人的《陶党下的鬼魅世界》及两篇连载：郑郁郎译《东京罗曼斯》、望口的《天堂路遥》。^①

复刊初期，《大公报》由萧乾、杨刚主编。梁羽生、查良镛都曾任该刊编辑。50年代末《大公报》由杨曼秋主编，杨曾亲自撰写连载小说。副刊开辟有哲学、经济、美术等周刊，由杜国庠、许涤新、黄新波等分别主编。

《大公报》的副刊拥有一支优秀的撰稿队伍，刊载过许多知名人士的作品，五六十年代有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查良镛等一批既能写又能编的人才，并拥有作家、书画家、学者，如章士钊、丁玲、林徽因、傅抱石、夏承焘、唐圭璋、洗玉清、郭绍虞、启功、钱仲联、沈尹默、陈垣等知名的国内一流学者作家为之写稿。1950年12月20日，《大公报》刊登了林徽因的《美国人生活是不是很苦？》及柳亚子的文章。12月31日，开始连载丁玲《一个人真实的一生——记胡也频》。“文化大革命”期间副刊萧条了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以后，一大批学者作家成为热心撰稿人，包括巴金、夏衍、冰心、萧乾、聂绀弩、黄裳、季羨林、袁可嘉、杨振宇、杨绛、吴调公、陈从周、黄秋耘、饶宗颐、王蒙、陆文夫、王元化、于光远、牛汉、秦牧、余光中、徐迟、谌容、汪曾祺、宗璞、柯灵、公刘、戴厚英、林斤澜、王安忆等一大批人士。60年代初，陈凡主编副刊《艺林》时，固定专栏作者达90多人，都是国内第一流学者，这是其他副刊难以相比的。^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艺林》一度停刊。

《大公报》的副刊很善于组织稿件。巴金偶然写了一篇《望乡》的散文寄给副刊《大公报》编辑潘际桐，潘际桐立即请上海的黄裳就近代他组稿，希望巴金继续赐稿，并定下一个专栏题目，巴金同意了。这就是《随想录》的由来。《随想录》第一篇刊于1978年12月1日，到1979年1月巴金写了8篇。当时黄裳还是不停地催、

① 收于香港大公报社资料室的这期复刊号有残损，似为“望云”。

② 参见陈左高：《我与〈大公报〉三十年》，载《大公报》，2001-11-12。

巴金示以《怀念萧珊》的底稿，表示要继续写下去，要当做遗嘱去写，黄裳这才放心。《随想录》一共写了8年，期间有各种风言风语，但巴金都顶住了，他毅然向各种丑恶、虚伪宣战，终于完成了5卷《随想录》。作为编者的潘际垌，也顶住了各种干扰，保护了作品完整面世，为中国文坛留下了划时代的鸿篇巨构。

在潘际垌的催索下，黄裳从1979年末开始，也在《大公报》上以特约稿名义发表了不少作品，有杂文，有山水记，也有怀念文章。

50年代一些爱国青年，视《大公报》为良伴，因为他们从报上认识祖国的建设成就，了解了许多世界大事，开阔了视野，增加了文化知识。^①更多年轻人青睐《大公报》的《大公园》和《小说天地》，有的深受连载武侠小说的吸引。^②著名作曲家、资深新闻人黄霑回忆他年轻时就喜欢上《大公报》副刊，因为它不似别的报“密密麻麻黑墨墨，看起来特别舒服，别有种优悠闲适的儒雅。而且，绝少错字”^③。

香港有“文化沙漠之称”，所以在香港倡导文化更显得难能可贵。除了《大公园》、《艺林》外，《大公报》还陆续辟有《文采》、《图书》等周刊，1951年3月20日起，在第3版每周二增添半版《新史学周刊》。现保留的副刊有《大公园》、《书话》、《文学》、《艺林》等。

（六）复刊时的功臣

《大公报》聚集了很多优秀人才，当年周恩来总理曾说，《大公报》是供给人才的兵工厂。^④同时，由于当时内地形势剧烈动荡，大批读书人到香港避乱，把内地先进的经验带进当年相对落后的香港，推动了香港繁荣，也充实了香港《大公报》的实力。

《大公报》的香港版，是胡政之偕同费彝民、李侠文、马廷栋到

① 参见陈海容：《我与〈大公报〉》，载《大公报》，2001-07-07。

② 参见孔岳文：《我与〈大公报〉》，载《大公报》，2001-09-01。

③ 黄霑：《〈大公报〉和我》，载《大公报》，2002-04-23。

④ 参见凤凰卫视访问在良记录，2002-07。

香港筹划复刊的，这几位人物就是报纸的顶梁柱。王芸生也曾主持过香港版。1948年10月30日，《大公报》中共地下党员记者李纯青向王芸生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他的口头通知，请他离开上海、经香港转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1月5日，王芸生到了《大公报》台湾分馆，3天之后又悄悄飞往香港，在香港停留3个月，期间他总理港版《大公报》的言论，并促使《大公报》转变立场。

《大公报》的主要编辑也是一时之选：刘克林编要闻版（第1版），曾敏之编次要闻版（第2版），谭文瑞编国际版（第3版），陈凡编港闻版（第4版），陈凡、曾敏之曾先后调任广州办事处主任，由唐振常先后接替港闻版、次要闻版，刘克林、谭文瑞、唐振常本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同学，毕业后分别进了《大公报》的重庆馆、天津馆、上海馆，后来竟一同来到香港。当时副刊是萧乾所编，他在副刊开了专栏“时间的无慈”。此后李纯青也从上海到香港，周太玄、杨东莼为顾问。这些人物，不仅新闻业务精通，思想也很进步，临解放时，《大公报》上上下下，学习干劲十足，自办学习会，请夏衍、周太玄、杨东莼等讲改造立场、讲哲学谈修身学历史，可以说是自觉改造思想的前奏。上海解放后，王芸生、刘克林、唐振常及方蒙、魏绍文、潘际垌、袁水柏等都回了上海。

当时《大公报》拥有很强的评论写作队伍。顾问周太玄、杨东莼撰写评论，王芸生曾亲自主持港版评论工作，主要撰评者还有李纯青、李侠文，先后曾参加撰述、编辑、翻译及采访等工作的还有杨刚、杨历樵、李宗瀛、陈凡、梁羽生、查良镛、吕德润、赵泽隆、杜运燮、潘际垌、潘剑农、廖公诚、高学逵、袁水柏、张学孔、罗承勋、曾敏之、蔡锦荣、黄克夫、易锡和等。^①

胡政之把此次香港复刊，当做“对事业的最后开创”，香港《大公报》复刊不久，他因病返回上海，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因肝硬化在上海寂然病逝，享年60岁。

胡政之离港前，任命费彝民为香港《大公报》经理，李侠文为

^① 参见《大公报在港复刊40周年纪念册》，香港，大公报社出版，1988。

编辑部主任（当时各地方版未设总编辑）。

费彝民（1908—1988），祖籍江苏苏州，生于上海，8岁随家人迁居北京。1925年毕业于北京高等法文学堂。他几乎一生致力于《大公报》的工作。1930年，他就进天津《大公报》任记者，“九一八”事变时，他任《大公报》驻沈阳通讯员，对日本侵占沈阳的经过作了及时报道。1932年起，历任《大公报》编辑部书记、文书课和经济课主任，创立报馆工体制，即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1933年，调任编辑，负责翻译法国哈瓦斯通讯社拍发的新闻稿。由于工作出色，得到胡政之器重，被提拔为报馆总稽核。^①

1936年，费彝民参加了《大公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次年任编辑以及社评委员会委员。“孤岛”时期上海版停刊，他留居上海保管大公报馆资财，并任哈瓦斯通讯社翻译和中文部主任。曾为《文汇报》、《正言报》、《译报》、《申报》、《中美日报》等抗日报纸撰写社评。曾因存放《大公报》财产于瑞士银行仓库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而遭日本宪兵队逮捕，获释后辗转到《大公报》重庆馆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大公报》副经理兼社评委员。1947年底他奉派自上海到香港参加《大公报》复刊工作。初任经理，胡政之去世后兼任上海版经理。1952年改组后，费彝民即任社长兼总经理、督印人，后专任社长，直到1988年6月22日逝世。^②他常为《大公报》亲自拍发专电，写见闻和评论文章，他热爱新闻事业，在新闻岗位52年如一日。费彝民是著名的爱国投人，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会见他，据统计，从1949年至1976年，会见次数竟达47次之多。^③周总理也因此从费彝民那里得到不少关于香港问题的

① 参见《历史的开拓者》，载《大公报历史人物》，香港：香港大公报出版，2002

② 新记《大公报》创办之初，吴达冷、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曾相约三年内不享受聘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专心办报。1935吴因受聘官职，辞去报社的职务。报社从此未再设置社长职务，直到香港《大公报》改组

③ 参见陆铿《我所认识的费彝民》，载《百姓（半月刊）》，1988-07-01

宝贵意见。1982年3月22日，法国驻香港总领事代表法国政府，授予费彝民先生“骑士荣誉勋章”，并致词称：

在生活还没有演变成革命的时候，生活本身也是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关键在于能够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亲人，忠于自己的祖国。而费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李侠文（1914— ），广东中山人，也是《大公报》的功臣。李侠文中学毕业后，入岭南大学，很快转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1937年毕业，1938年进香港大公报社任外电翻译、要闻编辑。1941年调任《大公报》桂林版社评委员。1943年转赴《大公报》重庆馆工作，专职撰写社评，并曾主编《大公晚报》。1948年赴香港，参与《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工作，并历任编辑部主任、副社长、总编辑。1988年任香港《大公报》董事长。曾任中国新闻社理事会理事。历任第5、6、7、8、9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界活跃，颇得当年领导港澳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廖承志主任的欣赏。李侠文精通中英文字，长于新闻业务，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生活争分夺秒，节奏急促多变，而能保持忙而不乱，少为外界纷扰，与其闲暇“游心艺事，广结墨缘”^①有关，他曾将名书画家、学者作家赠作和文物捐献给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DAGONGBAO BAWIANSU

第二节 这一时期《大公报》史上的著名事件

一、“三一事件”和“大公报案”^②

正如前文所述，战后20多年里，影响香港报业的布局与报道

① 陈方正：《翰墨缘——李侠文先生捐赠书画文物一序》，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2。

② 参见陈昌凤：《冲突，香港新闻史上两起重大事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2）。

内容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的政治局势。左派、右派报纸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火药味浓重。

港英政府对于左派、右派新闻力量有“打”有“拉”，实际倾向是抑左护右的。新中国成立后，爱国力量在香港不断发展，倾向左派的报刊更如雨后春笋，具有很强的宣传鼓动力量。从政治利益和统治权威来说，港英政府都想限制左派爱国力量的言论。新中国成立后，英国虽然率先承认了这个国家，却经常对中国抱着不友好的态度，中英之间时有摩擦。从国际形势来说，50年代是冷战的年代，资本主义的美国一心要扼堵社会主义的中国，香港是美国围堵中国的一个前哨。英国则是美国的盟友，港英当然想限制共产党在香港的势力。一方面港府希望通过右派力量，来削弱左派势力的影响；另一方面或许还希望左右力量在斗争中消耗能量，从而维持香港的社会安定。从当时英美国际关系考虑，港英政府自然也是亲美向台的。

除了通过左右力量的互相制衡来维护其统治，港英政府还制定了苛刻的报刊管制条例来对付新闻界。首当其冲受到管制的是左派爱国报纸。

1951年11月2日，九龙东头村发生一场大火，烧掉了山上山下木屋数万间，灾民达1.6万余人。香港政府的救灾动作十分缓慢，而且还宣布东头村灾民不得重建木屋，须分散到其他指定地区居住。港澳工作的有关组织和工会联合会怀疑这场大火是港英有计划有目的的纵火案，因为东头村木屋区绝大多数居民是爱国拥共的工会联合会会员，港英纵火大概是为了清除左派联合会会员集中的基地。（事后经工联会的调查，这场火灾是一住户生炉取暖不小心而造成的）港澳工作的有关组织和工联合会决定发动工联合会全体会员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运动，揭露港英阴谋，要求重建木屋区。斗争分五个方面：一是灾民在东头村一带露宿不走，抗拒警察的驱赶行动；二是由工联合会属下“五虎将”——电车工会、巴士工会、电灯工会、电话工会和自来水工会，提出罢工抗议的威胁；三是呼吁祖国亲人救济灾民、支援重建木屋区的斗争；

四是指示《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三报大造反英斗争的舆论，发起一个“吐苦水”的运动，痛诉英国殖民主义者割夺我国领土香港，一百多年来奴役、迫害、剥削我香港同胞之罪行，号召全港同胞起来斗争；五是指示几个著名的爱国学校，日日讲解鸦片战争历史，灌输仇英反英思想，并向家庭和社会传播。港澳工作组织的部署得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批准，于是，一场反英斗争运动就在香港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其规模与影响是1927年省港大罢工以来最大的一次。

运动铺开，中共华南分局决定1952年3月1日派出“广东省广州市各人民团体慰问九龙城东头村受灾同胞代表团”到香港支持灾民的斗争，捐赠救济物品，届时拟联合香港华商总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发放4亿元慰问金。慰问团共31人，带队领导有李朗如、郭翹然、张振南等。其中广东省总工会劳保部长张振南原为香港洋务工会主席，1950年被港英递解出境。按香港法律，被递解出境的人不得重回香港，让张振南当副团长，有人说是显示华南分局准备“硬碰硬”斗争的决心。港九工会联合会发动了东头村灾民和广大工人约万人于3月1日到尖沙咀火车站附近集合，热烈迎接慰问团，从尖沙咀到半岛酒店东边广场的大道旁站满了人，车站附近的树上、屋顶上、水塔上都是迎接的人们。正如《大公报》的标题所言：“港九到处红旗飘扬，同胞欢欣迎接亲人”，爱国的学校、报馆都悬旗欢迎，并准备当晚以茶会次日以宴会接待。港英政府如临大敌，3月1日上午调集上千名武装警察和便衣侦探在火车站附近一公里地区严加警戒，不断驱散集合的群众，双方已经发生冲突。^①同时警方明令禁止慰问团入境。

广东省慰问团乘上广州到香港的第一班火车，原定时间是12时半至下午1时左右抵达尖沙咀火车站。但在11时左右，广东有关部门打电话给香港新华分社社长黄作梅，转达周总理的命令，火速截住慰问团，不准广东慰问团去香港。（当时《大公报》和广州

① 陈昌凤访问方明光先生（前《新晚报》总经理）记录，香港大公报馆，2002-08-13

《南方日报》的公开报道是，慰问团行前已得到港英禁止进入香港及警察出动的消息，为观事态发展及慎重起见，决定延期出发。）于是，有关组织者立即通知工联会迅速疏散群众，停止集会游行，以免发生重大冲突；同时通知《新晚报》立即刊登慰问团不再来香港、群众应停止集会的消息。当《新晚报》于下午3时左右送往尖沙咀火车站时，港英警察已与工人群众发生了大规模冲突，群众误以为是港英阻拦慰问团访港，双方展开了混战。大批武装警察冲击人群，投掷大量催泪弹，并开枪射击，数人中弹，多人被打伤，冲突中有2辆警车、一辆电车被焚，2辆私家汽车被推翻。港方称此次事件为“暴乱”，冲突致使1人死亡，警方拘捕了约100人，其中18人被判刑，12人被递解出境。此即“三一事件”。^①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和警告，但港英政府仍不思悔改。3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措词严厉的短评，向港府提出抗议，全文如下：

英帝国主义在香港非法迫害我国居民的暴行是越来越严重了。香港英国当局继今年一月间非法连续逮捕和驱逐我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及九龙灾民代表司马文森、李文兴等人之后，竟在本月一日出动大批军警，有计划、有布置地屠杀当地我国居民；并在制造了这个血腥的暴行之后，大规模地逮捕我国在香港的爱国同胞。英帝国主义捕杀与迫害我国同胞和这种野蛮残暴的罪行，是我们所决不能容忍的，我们要向香港英国当局提出严重的抗议。

在今年一月间香港英国当局连续逮捕和驱逐我国居民的事件发生之后，我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曾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声明，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制止这类暴行；同时我国各人民团体也曾发表联合声明，严厉地斥

^① 参见《大公报》、《星岛日报》1951—1952年的有关报道，和《星岛日报》1995年5月至12月及《香港联合报》1994年1月至2月连载的当事人所写的回忆文章及专栏文章。

责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反动暴行，并表示誓为人民政府后盾，准备坚决打击美英帝国主义危害我国的毒辣阴谋。现在，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布置并演出了捕杀我国居民的血腥惨案。这充分表现了英帝国主义是在继续顺从美国的意旨，蓄意迫害香港的我国人民，以图实现其把香港变为帝国主义侵犯我们的基地的阴谋。香港的我国爱国同胞对于英帝国主义的这种迫害和阴谋，曾进行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们热爱祖国，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精神，得到了祖国人民的一致敬佩和全力支持。

中国人民的愤怒是不可遏止的；中国人民不能不警告英国政府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你们对于你们在香港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挑衅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定要担负全部的责任；你们要知道，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容任何人任意欺侮的，假如你们还要继续一意孤行，不停止迫害和捕杀香港中国居民的挑衅暴行，你们就一定会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新华社同日转发了这篇短评。3月5日，香港的《文汇报》、《新晚报》和《大公报》均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这篇评论，并配以醒目标题。《大公报》的标题如下：

关于三月一日九龙事件
北京人民日报发表评论
祖国人民支持香港爱国同胞
英方造成严重后果应负全责

《大公报》同版还刊登了当日广州《南方日报》上发表的粤穗慰问团的声明和抗议，其中出现的两处“屠杀”字样用“XX”代替，应当说《大公报》还是注意到新闻管制问题的。但是，三报因转载《人民日报》文章及相关报道，同被指控“刊载一项有煽动性的文字，违反《煽乱条例》（Sedition Ordinance）第4条（1）（C）款”，三报负责人（包括报主、督印人、承印人、编辑等）分别被捕，经香港中央裁判署提堂后转解高等法院审讯。

关于指控原因，一说是因为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评论^①；另一说法，指控是因为三报对3月1日的九龙暴动作了不真实的报道，煽起市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②。《大公报》首先被提审，经高等法院原讼庭初审15天，然后上诉至高等法院合议庭，审理6天。

4月30日开庭后，代表《大公报》的陈丕士、贝纳祺大律师出庭辩护，最后由陈君葆以专家身份作证。陈君葆1947年曾得OBE勋衔，时任香港大学副讲师兼冯平山图书馆主任，精通中英文。港英当局为了制造借口，说《大公报》有“煽动性文字”，将《大公报》转载《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中的“迫害”两字（应为oppression）硬译成persecution“杀害”。陈君葆作证时，引用了中外经典名著，将“迫害”与“杀害”两字的英译解释得清清楚楚，使得主控官无隙可钻。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不少亲友都曾劝阻陈君葆不要卷入，但他还是勇敢地走上了法庭。事后他从副讲师降为一般教员，不再有专家身份。^③

经过判决，《大公报》经理及出版人费彝民被判罚款4000元或囚禁9个月，编辑李宗瀛被判罚3000元或苦工监禁6个月。初审判决命令《大公报》停刊半年。上诉期间，合议庭中止执行初审的停刊令。然而在这以前，《大公报》已实际停刊了12天（1952年5月6日至17日）。

“大公报案”中，合议庭的上诉判决只维持原审的罚款项目，对于是否恢复执行停刊令，则未置可否。于是原审所颁布的停刊半年的命令，没有再度执行。这其中有一段特殊的背景。三报被指控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向美方发表声明，强烈

① 参见梁伟贤、陈文敏主编：《传播法新论》，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

② 据香港政府编辑出版的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2)：“……the Crown claimed to be untrue accounts of the disturbance which occurred in Kowloon on March 1st. It was the Crown's case that the articles were calculated to bring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to contempt and to raise discontent and disaffection amongst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lony.”

③ 参见陈云生：《陈君葆与《大公报》》，载《大公报》，2001-10-11。

责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反动暴行，并表示誓为人民政府后盾，准备坚决打击美英帝国主义危害我国的毒辣阴谋。现在，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布置并演出了捕杀我国居民的血腥惨案。这充分表现了英帝国主义是在继续顺从美国的意旨，蓄意迫害香港的我国人民，以图实现其把香港变为帝国主义侵犯我们的基地的阴谋。香港的我国爱国同胞对于英帝国主义的这种迫害和阴谋，曾进行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们热爱祖国、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斗争精神，得到了祖国人民的一致敬佩和全力支持。

中国人民的愤怒是不可遏止的；中国人民不能不警告英国政府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你们对于你们在香港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挑衅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定要担负全部的责任；你们要知道，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容任何人任意欺侮的，假如你们还要继续一意孤行，不停止迫害和捕杀香港中国居民的挑衅暴行，你们就一定会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新华社同日转发了这篇短评。3月5日，香港的《文汇报》、《新晚报》和《大公报》均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这篇评论，并配以醒目标题。《大公报》的标题如下：

关于三月一日九龙事件
北京人民日报发表评论
祖国人民支持香港爱国同胞
英方造成严重后果应负全责

《大公报》同版还刊登了当日广州《南方日报》上发表的粤穗慰问团的声明和抗议，其中出现的两处“屠杀”字样用“XX”代替，应当说《大公报》还是注意到新闻管制问题的。但是，三报因转载《人民日报》文章及相关报道，同被指控“刊载一项有煽动性的文字，违反《煽乱条例》（Sedition Ordinance）第4条（1）（C）款”，三报负责人（包括报主、督印人、承印人、编辑等）分别被捕，经香港中央裁判署提堂后转解高等法院审讯。

定香港同胞的爱国爱党之感情，另一方面也批评了有关事件的组织者犯了极大的“左”倾盲动错误，违反了当时的外交方针，同时此次事件也影响了爱国报纸的发展。12月30日，《大公报》刊登启事，自1953年1月1日起，售价由1角5分减为1角。而《新晚报》，因为是“中国人民的报纸”，从此色彩渐渐由“灰”变得太“红”，逐渐流失了一些读者。

此后使左派报章受到最大挫折的，是1967年发生的“反美抗暴”运动。

二、与《明报》的“核子之战”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第四个拥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此前一年，美苏英签订禁止在大气层、水底进行核试验条约，一副核霸权的气派。那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表示，美苏以为中国穷，科技不发达，造不起原子弹，但不管中国有多穷，就是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现在中国终于打破核垄断，可谓大振反帝反霸的志气，香港左派各报纷纷欢呼中国的伟大胜利。即使奉中华民国国历为正统的《华侨日报》等，也认为“核试提高中共的声威与地位”。

而这时，《明报》却发出了不和谐的音调。1964年10月20日，《明报》发表社评《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价》，认为：“核弹是一种罪恶……我们不赞成中共制造核弹，决不认为那是中国人的光荣。做一件有害人类的事，何光荣之有？”

10月23日，《明报》继续发表社评《核弹是一种罪恶》，声明3天前的社评，“没有改动的必要”。10月24日，又发表社评《造成全面毁灭核弹》：“我们还是赞成中共政府所发表的声明：核子武器为害人类，不论美苏英法中的，都应当全面、彻底、干净的予以消灭。”

《明报》社评发表后，新华社梁威林社长、祁峰副社长大为震怒，立即要求香港的左派新闻阵线全面出击，围剿《明报》，痛斥

查良镛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的谬论。

《大公报》首先上阵。10月25日，《大公报》以5栏的篇幅，炮轰《明报》。在《略揭最恶毒反华的〈明报〉的画皮》一文中，作者数说自1962年报道逃亡潮起《明报》的种种“反华行为”，其间列举了《明报》过去的社论，断章取义指责《明报》赞同“美机可以轰炸中国”，指责《明报》是在“吹捧老蒋有中兴气象”，最后该文指出：“装出中国人的口吻来讲话，一味淆乱是非，颠倒黑白。到了这种田地，人们从《明报》能够嗅到一点点中国人的人味吗？”

10月26日，《大公报》又刊出《明报主笔的罪恶》，驳斥《明报》主笔，文中说，《明报》的罪恶，“就在那笔上，就在那主笔的身上和脸上”。

紧接着，《文汇报》也在10月27日刊登文章《明报何以妖言惑众》，指责明报之主事人“为了政治目的和几文钱，便不择手段，妖言鬼话也被他们用来咒骂中国的原子弹，而完全不顾对《明报》读者的心理上的危害以及对广大社会人心之不良影响”。

10月28日、29日和11月1日，《大公报》共刊载了3篇署名张恨奴的系列长文《明报的妖言和妖术》，到第3篇，在服务版用8个横栏驳斥《明报》及查良镛。长文也罗列了《明报》自1962年以来的社评，揭露《明报》主笔的反华手法，强调：（1）祖国有困难，他幸灾乐祸，嬉笑怒骂，无所不为；（2）祖国有了不可否认的成就时，他立刻加以歪曲，企图造成错误的印象；（3）如果中国的成就为人人所共见，使他难以肆其摇惑，则不惜乱拉硬扯，凭空造谣。

张恨奴是著名记者、《大公报》社务委员会成员陈凡的笔名。陈凡主编《大公报》副刊时，是查良镛的老上司，并曾与查良镛、梁羽生并称“三剑侠”，合写专栏。由陈凡执笔炮轰查良镛，火力当然很猛。

《明报》自是不甘示弱。早在10月23日，《明报》的社评就点名应战了：“本港全体左报包括《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晶报》向本报群起而攻……我们读了这些左派报纸上的

文章，再去检查本报的那篇社评，觉得我们社评中的意见，没有需要改动的必要。”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从1964年11月26日起，《明报》连续刊出以“明报编辑部”为名的26篇文章，总题为：《敬请〈大公报〉指教和答复》，一气刊至1964年12月22日。文章每日向《大公报》讨教一个问题，包括“两个中国”问题、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关系等，最后一篇声明：“我们的辩解，我们提出来请你们答复的问题，只以贵报在攻击《明报》时所涉及的为限。”文中说：“你们辱骂《明报》的口气很恶毒，用的字眼很难听，我们完全没有回敬。”

不过，《明报》这一系列的反击，并没有引来《大公报》等的回应，因为此时陈毅、廖承志已经批评了左派报纸的过激行为，认为《明报》的社论，无非是反对中国花大钱制造原子弹，全世界反对自己国家制造原子弹的多的是，为这样的事，就将查良镛推到敌人那一边去，不合适。中国当前的敌人主要是美帝，连英国都排不上。我们应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向香港同胞说明为什么造原子弹。^①

与《明报》的这次论战，是当时左派报纸思想过于偏激的体现。新华社宣传部还提出，要在广告和发行业务两个方面打击和封锁《明报》，后来未能执行。

此后，左派报纸与《明报》最大的论战，发生在1967年“反英抗暴”中。查良镛的社评从一开始就与左派观点相左，反对左派采取过激行动，支持港府严厉镇压，被左派痛骂为“豺狼镛”、“汉奸”、“走狗”，《明报》与其他9份香港报纸被禁销澳门。运动中《明报》印刷机房的一名左派员工还撬换了《明报》的一块版面，将一篇署名“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的声明《敬告同业，行动起来》换上6月23日的《明报》，并印行发售。《明报》员工的人身安全也曾受到威胁，查良镛此时正滞留瑞士，据说是为了躲避风头。（当时，香港商业电台著名播音员林彬，因报道“暴动”和反对左派，而被淋油活活烧死，引起一些反对左派者的恐慌）从暴动

① 参见张兆阳：《金庸与报业》，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

以后直到70年代，查良镛受到香港警方暗中保护。

DAGONGBAO BAINIANSI

第三节 《新晚报》的变迁

《新晚报》是《大公报》的姊妹报。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的爱国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因当时新华社的消息来得较慢，左派报纸上就缺少了关于战争的及时报道。为了迅速报道战况，《大公报》分出一部分人力，于1950年10月5日下午4时，出版了这份比较“灰色”的晚报。创办之初，由李侠文总负责，罗孚编发要闻兼编副刊，李宗瀛负责写时事评论，陈凡主持香港新闻。后来实际主要负责人为罗承勋（罗孚），尹任先为经理。

《新晚报》诞生于飓风之中。创办之日，正挂10号风球，急风暴雨，海啸惊涛，朝着报社冲击而来。创办之初，日出对开一张，以后又改出两张及更多。当时香港的晚报竞争十分激烈，仅1950年晚报就达数十家，其中或生或灭的时有发生。3张有影响的大报所办的晚报颇有竞争力，它们是《星岛晚报》、《华侨晚报》、《工商晚报》，其他独立的晚报如《新生晚报》、《中英晚报》、《红绿晚报》等，都在角逐中。《新晚报》因为其“灰色”的风格，亦被华侨日报编辑出版的《香港年鉴》（1953）列名于“独立”的晚报之中。

50年代初晚报一般出纸1张，不久都向《星岛晚报》看齐，增至1.5张，50年代以后各大晚报又不断扩版增张。为了增强新闻的时效性，《工商晚报》、《华侨晚报》每日出版2次，后来出2次版一时成风。英文晚报《德臣西报》1960年3月1日起，甚至每日发行3次，分别于中午12时、下午2时、下午4时出版。《星岛晚报》、《华侨晚报》曾是销量最大的晚报，《南华晚报》、《新晚报》、《明报晚报》也是五六十年代竞争性很强的晚报。《新生晚报》

1953年首家启用传真机（时称自动电讯打字机），直接与美联社联络，电讯传送时间比一般要快约2小时。英文《星报》于1969年创办的中文版，也是一份有竞争力的晚报，《真报》在晚报中发行不算广，因其较强的亲台倾向，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夜报其实也在晚报的竞争之列，发行量较大的有《香港夜报》、《新闻夜报》、《世界夜报》、《大皇夜报》、《平安夜报》等。

《新晚报》创刊后，为了增强竞争实力，内容和版面不断改进，力求社会化。第一是大力加强香港社会新闻的采访报道，常在头版头条刊登重大社会新闻，甚至整版刊出。当时香港左派报纸因办得太“红”，而受到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的批评。香港新华社社和左派报纸经过多次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大公报》、《文汇报》办成正面宣传的报纸，不必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主要力戒党报模式，坚持爱国主义和团结大多数中间同胞，不与同行同业搞斗争，不四面树敌。而《新晚报》大有改革和发展的条件，可以大力加强香港社会新闻的采访报道，重大的社会新闻也放在一版头条，甚至可以大版杀出。1952年，香港发生一桩医生在妇科检查医疗时奸污女病人案，《新晚报》以及另一左派报纸《香港商报》都在头版整版刊出，详细报道，直到结案为止。由此两报销售量倍增，《新晚报》跃居晚报之首，超过许多日报的销量。下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年《新晚报》的风光：

……（报业是一行业），之间自然有竞争，“争新闻”自然亦是其中之一，平日相争都是静吼吼，很少有鸣锣击鼓，齐去争一件新闻的，但若说全没有，亦未可这样说，早年三间晚报就曾经有过，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仗仗都非常激烈，三家都赢。

当年的三间晚报，是星岛晚报、新晚报、中声晚报，齐争的是法庭新闻。那年代，资讯远不如今日发达，没有电视，电台新闻亦十分贫乏，每有大事，便靠报纸才有得看。

每遇有大新闻在法庭发生，三间晚报便有大比数的激增，不少人一放工第一件事便是买晚报，要看的便是那宗大案的审

讯过程。因为三间晚报的手法都一样，全部都以对话的形式写下来，非常生动，非常传神。

大案之中，最引人入胜的，以吴滔室的送奸案开始，架仔强奸舞女红眉也掀起过高潮，因为此中有很浓的色情味道。至于影响最大的，便是一名新进影星伍雅仪堕胎致死案，有女明星的号召，未审之前，不少人都以为无致胜之道，岂料峰回路转，如追武侠小说。

……三间晚报齐齐争，可说是难得的一战，而且全胜，更是难得……^①

第二是加强“波经”（ball，即球赛等体育消息和评论），开辟“马经”，使《新晚报》成为下午的球场和马场上多数人手上的报纸。当时香港一般商业性报纸，都十分重视体育报道，右派《香港时报》则以体育报道为特色。《新晚报》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力量。

第三是改革副刊。《大公报》、《新晚报》的副刊一直是讲求质量、知识性趣味性并重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般人不会想到，香港报纸登载武侠小说的风气，是由爱国报纸首开的。1953年，两位著名拳师——太极拳掌门吴公仪与白鹤拳师父陈克夫大师在澳门打插比武（香港法律禁止武师之间决斗，遂在澳门），想不到香港数万人乘船日夜过海观战，盛况空前。香港各报大版报道，在港澳两地抢购一空。这给了左派爱国报纸以启发，《新晚报》便在副刊上试辟武侠小说连载专栏，约请平日喜欢在报社神聊武侠的陈文统、查良镛出阵。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写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查良镛以笔名金庸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结果竟一炮打响，一时间洛阳纸贵，销路倍增，梁羽生、金庸因此声名大噪，《大公报》编辑部主任、著名记者陈凡也不禁技痒，以“百剑堂主”的笔名在《大公报》副刊上写起了武侠小说，并于1956年10月与梁羽生、金庸在《大公报》联合撰写《三剑楼随笔》专栏，他们三人又称“三剑侠”。《文汇报》的陈瘦鸥、吴羊璧也不甘

① 松风：《三间晚报争新闻》，载《星岛日报》，1995-11-02

示弱，都在副刊上登台比武了。香港其他报纸也都开始仿效。《新晚报》开了香港报纸刊载新派武侠小说之风气。

陈文统、严庆澍（唐人）、查良镛等，都是在《新晚报》崭露头角的。梁羽生曾在《新晚报》编副刊，他多才多艺，古文学根基扎实，擅诗词，喜围棋与象棋，所谓“琴棋书画”样样皆能。唐人的《金陵春梦》曾在《新晚报》连载。他是多产作家，笔走蛇龙，每日著述过万字，吸引了众多读者。^①查良镛的影评“姚嘉依专栏”也脍炙人口，他的影评吸引许多影迷。他比较分析《梁山泊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异同，写其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既抒情又富哲理。他兼任长城影业公司的编剧。他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所以想出去单独办报。《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和《新晚报》的负责人都尊重他的志愿。

主持人罗孚在报上辟有“羊朱专栏”，另外每日写两个专栏，即“夕夕谈”（后为“新语”）和“岛居随笔”。罗孚名罗承勋，1941年即入桂林《大公报》当练习生，以后又参加重庆《大公报》的工作，1948年加入香港《大公报》，并曾主编香港《文汇报》副刊等，主持《新晚报》，任总编辑达30余年。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笔名有石发、史复、羊朱、丝韦、柳苏、式微等。80年代初停职。

《新晚报》新闻翔实准确，刊用外电，新闻报道及时，评论短小活泼，副刊文章多姿多彩，走大众路线，创刊不久就立足了。有一个时期，编辑麦炜明创办有奖填字游戏，吸引成千上万读者参加，也让邮局赚了一大笔邮费。用90年代该报作者、知名人上黄霏的话说：“50年代，《新晚报》的有奖填字游戏，不知吸引了多少读者。”^②《新晚报》也举办过一些大型的读者活动。50年代曾在大埔办摄影游园会，吸引了好几千名市民到风光明媚的郊野参加。报纸与影界从此开展学术交流，报社编辑成为香港摄影界的活动家。两年以后，《新晚报》的出纸张数赶上了当时出纸量较大的

^① 参见保宗庆：《永恒的《大公报》》，载《大公报》，2002-05-26。

^② 黄霏：《《大公报》和我》，载《大公报》，2002-04-23。

《星岛晚报》(一张半)、此后发展很快,一度与《星岛晚报》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两家晚报。

《新晚报》在发展过程中也屡受冲击。在1952年“三一事件”中,《新晚报》是被港英指控的三报之一,后因周恩来总理声明三报“是中国人民的报纸”,控案才被撤。但这样也就暴露了《新晚报》实际上是倾向爱国拥共的,又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报纸”,便逐渐过多地代中国人民说话,报纸的色彩逐渐“红”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新晚报》较之日报,就更难办,因为晚报上“封、资、修”更多,这时就不能再登,尤其是副刊,编辑们只能挖空心思。比如1967年,《新晚报》上曾标新立异辟一“像章小记”专栏,每篇介绍一个或几个毛泽东主席的像章,一连写了好几个月。《新晚报》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销量下跌。70年代前后,销量在25 000~50 000份之间。

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晚报辉煌一时,在电视普及之前,香港晚报达到鼎盛时期。在70年代中期以前,晚报是大多数香港人晚饭后的消遣和享受,1970年香港销量在1万份以上的晚报达15份之多。但70年代中期以后,晚报逐渐沉寂,差不多被电视取代了。80年代末以后,香港的晚报仅剩下了《星岛晚报》和《新晚报》两家。

到90年代中期,《新晚报》坚持晚报阵地,作为“香港最后一份晚报”,记入香港政府《香港——迈进新纪元》(1997年大事纪要)。著名编辑记者万民光,是最后一任总经理。他从1952年进《大公报》当记者,后来当采访部主任,1986年开始任《新晚报》编辑主任,以后升任副总编,并兼任总经理,是左派报纸中为数不多的与各界交游甚广、人脉广通的人士,他那里经常会有独家新闻,他曾约请政见不同、思想相左的黄霑为副刊写稿,足足写了一年,对其300多篇文字,从没有更改增删,令黄霑“啧啧称奇”,因为这与以标榜开明的其他报纸完全不一样,“有极度宽松的言论自由”^①。

1997年8月,《新晚报》停刊,公司和牌子还保留。

① 黄霑:《〈大公报〉和我》,载《大公报》,2002-04-23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大公报》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香港左派传媒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灾难，香港深受这场灾难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初期，香港人口中占主导地位，还是以中国为根基的那一群，所以内地轰轰烈烈的运动，在香港也颇有轰轰烈烈的趋势，60年代末70年代初香港大学界还曾掀起中国热。若不是在“六七”事件中受挫及该事件对社会极大的负面影响，香港一定会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更大冲击。

香港左派报纸的兴衰始终与政治路线密切相关。50年代初，左派报纸与外界关系良好，所以发展势头也好。整个50年代左派报纸销量也不少，约占全港报纸的三分之一，但是有反复，凡是“左得厉害”时，销量就下跌。国内土改、二反五反时，香港工商阶层受到影响，有些人的内地土地家产被没收，对此，左派报纸一直大做宣传，结果广告和读者都减少。1954年至1956年，按照中央的领导思想，办报向“社会化”调整，报纸变得好看了、广告增加了，当时香港的社会矛盾也不那么尖锐，左右派报章互有往来。其后两年，《大公报》等左派报纸发展也不错。但1958年内地大跃进时期，《大公报》等左派报纸也学内地报纸“放卫星”。这以后《大公报》开始抓阶级斗争那个纲，骂国民党、骂美国，也骂日本、英国，四面树敌，什么人都骂，你与日本人做生意，报纸骂你是“新汉奸”，于是就没什么人看报了，其结果是报纸销量回减，渐趋孤立。

60年代初的逃亡潮中，港人对灾民提供了许多援助，对此《大公报》一个字不登，与社会相脱离，与读者渐行渐远。

不过，《大公报》调整也很快，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发展很好，苏联撤退的影响平息了，原子弹也研制成功了，报纸也有人看了。香港居民是很好的，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以前的事情。但是后来的事件又严重影响了左派报章。

70年代初，《大公报》与香港各界恢复了交往，报纸的政治环境也宽松一点了。港英政府很注意保持与左派报纸的关系。70年代初，恒生银行还突然来《大公报》登广告，一下子就登十几版，结果曾招致极左人士骂《大公报》向资产阶级投降。^①

一、“文化大革命”以前共产党对香港左派报刊的宏观管理

前文已经述及，出于中央对香港的宏观政策，50年代周恩来总

^① 陈吕凤访问万民光先生（前《大公报》记者编辑、《新晚报》总经理）记录，香港大公报馆，2000-08-13。

理曾批评太“红”的左派报纸：没让你们在香港办党报、办《人民日报》！香港左派报纸是以当地民营报纸的身份和面貌出现的，是爱国主义的报纸，拥护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并不代表党和国家。必须遵守香港政府的法令，做到“合法生存”，坚持长期斗争的原则。

1959年12月5日，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在会见香港新闻界参观团时，发表了《坚持爱国主义的办报方针》的讲话，公开、详细地阐述了中央对香港左派报纸的定位和办报方针：

我们办的报纸有两类。主要的一类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这就是国内的报纸，任务是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动员和号召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另一类报纸，是我们在香港和海外办的报纸。

……在华侨中办的报纸，是以爱国主义为方针的，教育侨胞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向企图颠覆祖国的反动派进攻。香港报纸就是这一类报纸。

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报纸，实质上就是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宣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引导读者爱社会主义祖国。

能不能在香港办一家社会主义的报纸呢？不可能，也不必……在香港办的报纸只能是爱国主义的……香港报纸的任务就是要对大多数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团结他们，调动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团结得越多越好，因为如果报纸所团结的只是少数分子，那么报纸所起的作用就很少了。

香港报纸必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爱看的报纸，这才真正能完成爱国主义宣传的任务。调子（包括标题）……要面对港澳大多数群众，为他们所爱看，为他们所看懂。^①

当时港澳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周恩来、陈毅、廖承志都一再强调

^① 《廖承志文集》，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0

不要在香港办党报，要因地制宜办当地化的报纸、社会化的报纸，要深入香港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和香港同胞打成一片。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极左风潮以前，中央对香港左派报纸的定位是比较清晰明确的。50年代新华分社与左派报纸之间，基本上还是共同协作的关系，后来则一度成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左派报纸的主要负责人不被新华分社领导信任，当时港澳领导小组的几位负责人也被“文化大革命”冲上“靠边站”，所以香港左派报纸一度被“瞎指挥”操控。

二、“文化大革命”对《大公报》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中香港《大公报》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照搬“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的做法，质量一落千丈，销量下降到“可耻的程度”，直到7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观。

北京的《大公报》也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6月11日，陈伯达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派遣3人工作小组进驻北京《大公报》，“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社长王芸生、副总编辑孔昭恺等党外人士立即靠边站，报社中共党组成员也被停职反省。他们被迫无休止地写检查、挨批斗。1966年9月10日，北京《大公报》宣告终刊。

“四人帮”垮台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封掉的报纸都纷纷复刊了，但《大公报》的北京版却没有。1978年，李先念副总理决定办一张以财贸为宣传重点的报纸时，曾调集了原北京《大公报》总编辑常芝青等8人进行筹备，他还说：“恢复《大公报》，登广告。”但因为种种原因，迄今尚未复刊。^①

三、香港传媒结构的改变和左派媒体与当地受众的疏离

香港的社会结构，自60年代末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使读者

^① 参见张颂田：《杂谈〈大公报〉》，载《大公报》1999-11-13。该文中与吴葆《北京〈大公报〉停刊》一文不一致处，从英文。

对报纸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香港报纸在60年代末以前，其关注焦点是中国政治，甚少报道本地消息。^①中立报或政治取向较低的报纸，较注意报道香港社会的变化和经济消息，但多是突发新闻，很少报道大众事务，而且这些报纸并未占整个报业的主流。60年代末渐渐有了改变。根据196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香港读者最喜欢阅读的是香港本地新闻。^②新生代的读者，提高了报纸传媒的本土化需求，本地新闻的比例在70年代不断增长。

战后的香港曾是以“移民”为主要构成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移民”社会慢慢演化成土生社会。据统计，1971年30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60%。^③也就是说，194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70年代成为报纸的主要读者群。1980年香港市场研究社（Survey Research HongKong Ltd）的调查显示，较有代表性的报纸读者，1940年以后出生的占了62%至76%，他们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新一代香港人。新一代读者对香港有较强的归属感，而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却比较漠然。老一代的移民虽然仍关中国的变迁，但不会再支持那些不关心本地事务的传媒。

60年代以前的报人，多是来自中国内地，或毕业于台湾的大学，他们关心内地的新闻甚于香港本地的新闻，在新闻路线上明显“北望神州”。60年代末，新生代报人成长起来，他们经历了香港从华南边陲的海港城市发展为重要的国际都市的历程，对香港有强烈的归属感，更关注香港本地的变迁和发展，新闻观念方面则更受西方的影响。不少年轻的报人在西方接受了教育，他们崇尚办中立的商业化报纸，热衷于传播西方的新闻观念。同时，中日、中美建交，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倾向反共的报纸、言论也逐渐转向中立。不仅新办报纸走中立的商业化路线，一些老报纸也因此削弱其政治色彩。《星岛日报》于1973年3月撤销了反共反内地的“乡情

① 参见关信基、刘兆伟：《香港的传媒与政治》，载《明报月刊》，1989（9）。

② 参见《香港年鉴》，华侨日报社编辑出版，1969。

③ 参见《香港经济年鉴·香港人口统计》，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1981。

版”。一批亲台人员在70年代初不得不离开了《星岛日报》，《快报》70年代初也逐渐中立，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上海公报》，《快报》当天即全文刊载，以前《快报》称“北京”为“北平”，后来改变了称呼。

香港的报业是与社会、经济同步繁荣的。香港经济的起飞，为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1971年香港有报纸67家，到1978年竟达到128家，竞争极其激烈。随着香港本土意识的增强，一批以本地意识为价值取向的商业化报纸脱颖而出，其中尤以走大众化路线的报纸影响最大。它们以赚钱为目的，奉行“在商言商”的宗旨，迎合读者的需要，迅速发展成为报业的主流。适应市场需要，各种专业报纸如“狗马报纸”、财经报纸也在不断发展，报业开始增加投资、拓展业务，并逐渐引进现代化管理方式，并开始多元化，开发其他非报业业务，如旅游业、印刷业、图片扩印业及房地产业等等。

报业在香港社会中，是一个经济活动的主体，它不仅融于整个市场机制中，而且香港大市场的兴旺，也成为70年代报业市场繁荣的前提和条件。报业正是以市场的要素——供求、价格、竞争等为指导，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多元化经济需要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大量的信息。提供多元化消息的报纸，便有了广阔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又需要向市民大众发散更大量的信息和广告，广告费大增，并已成为报业的主要经济来源。战后初期销量较大的《华侨日报》、《星岛日报》刊登的广告费，每平方英寸每天仅收1元左右。到1975年，销量较大的《星岛晚报》（每日约销61000份）每平方英寸的广告费已升至24元，全版（337平方英寸）要收8160元，比战后初期的价格升了24倍；不久，《星岛日报》广告费每平方英寸升到44元，全版价格达14960元。

对于未融入报业市场的左派报纸而言，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支持，是很难立足于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中，而且70年代初纸价上涨，公用事业的物价也在上涨，办报成本不断增加。1974—1975年，战后第二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对香港的经济冲击巨大，也影响了

报业。中文报面临的形势太严峻，1973年不得不将售价从1角提至2角。这是战后中文报纸第一次联合调价，此后中文报的加价基本上是采取一致行动。1974年，40家中文报纸联名宣布将报价增至3角。以后报价继续上升，到1981年11月1日，全港63家报纸联合调整售价至每份8角。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派报纸，在政治化逐渐淡化的香港报业发展形势下，却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手段附会于内地的政治，从理念到经营管理诸方面，都远远疏离于商业化报纸。当时的《大公报》和其他左派报纸一样似乎一直存在于“系统外”，报界的联合行动经常不参加，1974年中文报统一调价后，才开始加入了3角的行列。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二节 远离香港现实的报道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公报》很快仿照《人民日报》和国内其他报纸的做法，新闻版面与国内报纸几无任何区别。报头刊有“毛主席语录”，头版多是套红大字标题。

表9-1对1971年抽样出的30份报纸进行统计，大致反映出那一段时期《大公报》的版面内容。

表9-1 1971年30份《大公报》抽样的内容统计

版面	内容	说明
第1版	要闻	国际新闻60%，中国外交新闻，中国新闻40%
第2版	国际新闻	有时亦有中国新闻
第3版	中国新闻	有时是天下(国际)，专稿，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新闻
第4版	中国香港新闻	通常半版，减少了社会新闻
第5版	水银灯下，体育	抽样中有一半日期是图片，或半版图片
第6版	经济、船期	
第7版	小说林、船期	
第8版	大公园	多为配合时事的宣传

此时新闻比例与前 10 多年差别不大，但版面经常变动，给人以“居无定所”的感觉。为了显示其新闻的连续性，此处再随机选取 1971 年 3 月第一周的《大公报》，对其要闻版的内容加以介绍：

第 1 版（要闻版）：

- 3 月 1 日：朝外务省声明揭穿阴谋 美准备对朝挑起新战争
老挝军民又歼阮军一营 擒伞兵旅长击毁丹垣克
本报特稿：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印度支那局势
纵横谈之一
- 3 月 2 日：美苏炮制海底禁核条约 许多国抑制并斥为骗局
美直升机装甲战术破产 侵下寮阮军七营遭全歼
(转第 2 版)
- 3 月 3 日：中日贸易会谈公报发表 双方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美阮军上月歼兵二十营
- 3 月 4 日：全国争取农业全面丰收 发展油料生产支援建设
越南战事新闻
中国外交新闻
毛泽东思想哺育的钢铁战士——记空军某部飞行员
尚士义战胜伤残重返蓝天
我国北方降雪……有利春耕
- 3 月 5 日：印支三国解放军团结战斗 上月共歼美阮军一万余名
越外交部声明警告美帝 不要打错算盘搞新冒险
中国外交新闻
- 3 月 6 日：北京评尼克松对外政策报告 美内外交困迹退维谷
湖北江西浙江掀起备耕生产高潮
中国外交新闻
- 3 月 7 日：我最大万吨级油轮性能好
柬解放军磅湛奏捷
记辽宁省长海县獐子公社“三八”号渔船的女青年

第 3 版中国新闻此时虽然版面数量未减，但篇数明显较 50 年代少，都是很少新闻要素的口号式宣传。如《新针疗法治疗的新收获

——毛主席哲学思想引导进行新探索》(3月1日)、《华南四省发展甘蔗生产》、《通讯：内蒙古草原红色女钳工》(3月2日)、《保卫福建前线的女民兵》、《评田汉的一个反革命策略》(3月7日)。

第5版常常有半版至一版的图片，内容也是配合宣传的，如《内蒙古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3月3日，半版)，《美帝必败，老挝人民必胜》(3月5日，半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高潮中的中国妇女》(3月6日，整版)。偶尔亦有香港图片，介绍工人的悲惨境遇之类。

上文已经谈及，此时香港民众最关心的还是香港本地的新闻。香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状况下，市民就更关心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和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各种变化，对信息量的需要不断激增。他们需要经济消息、社会新闻，同时也希望从报纸上得到一些娱乐消遣的内容 and 知识。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在香港的报纸上发挥到了极致。60年代兴起的纯娱乐和赛马消闲的报纸，在经济更兴旺的70年代不断增加，几乎占报纸总数的50%至60%以上。70年代跑狗赛马风靡香港，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因外国赌马合法化，香港的投注站大大增加，还开设了场外电话投注。1977年投注站已超过120间，以后沙田新马场也建成使用，更助长了赌风。澳门的赛狗也吸引了香港的“狗迷”。众多的“狗迷”、“马迷”，使“狗马挂帅”的报纸更加盛行，各大报都增加了狗马经，而《大公报》和其他左派报纸这时却取消了马经版。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节 “反英抗暴”与“三报停刊案”^①

1967年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是在当时官民矛盾激化以

^① 除注明出处外，并参见：《英文地密档案曝光——六七暴动秘辛》，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太平洋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00；内藤勃、马蝶森：《周恩来与香港“六七暴动”》，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

及内外“气候”的影响下发生的，而到了后期，实质上已成为内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香港的延伸。没有“文化大革命”，香港根本不会发生这场动乱，整个事件的幕后真正指挥者，是“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香港新华分社的领导人站在前台，受到利用。当时中央港澳领导小组负责人陈毅、廖承志天天被斗。造反派起草的香港进行三轮大罢工的计划，周恩来不同意不批准，但其后造反派夺了周恩来外交大权，背着周恩来直接指挥香港发动罢工。这是香港战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群众运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爱国力量与港英政府进行的最大规模、最白热化的一次斗争，又可以称作极左路线在香港犯下的最大一次错误，这次运动一度使中英关系陷入空前恶化的状态。爱国报纸因受极左路线的影响而销量大跌。

60年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香港财富越来越集中，劳资矛盾、社会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城市居民运动风起云涌。1960—1970年的10多年间，仅香港工人罢工就达193次，最多一年47次，罢工原因主要是争取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如果港英当局能进行一些必要的疏导、调解，理顺劳资关系、健全劳工保护法律，事态当会好转。但港英当局对工人运动的主导方向缺乏正确的估计，害怕群众运动危及其殖民统治，于是动辄出动警察殴打抓捕群众。1967年春，香港渣华邮船厂、南丰纱厂、的士公司、人造花厂等单位工人又相继罢工。1967年5月6日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厂工人静坐罢工，反对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及撤消剥削工人的苛例，下午与资方人员发生冲突，港英政府出动200多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部队前往镇压，抓捕工人。据《大公报》报道，被抓走的工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口号。事后港英又扣押了前往香港警署抗议的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5月11日下午，胶花厂工人手持《毛主席语录》在工厂四周游行示威，然后静坐罢工，学习毛主席语录，港英当局再度出动大批军警，使用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调来军车和直升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

压，逮捕了許多人，并抢夺、践踏《毛主席语录》。

事发后，新华分社立即指示新闻战线全线出击，“舆论领先，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全面进攻”。

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5月15日，已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夺权的外交部发表声明，“最紧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大公报》5月16日的通栏红字标题是：

外交部召见英代办处就港英暴行提最紧急最强烈抗议
我政府宣告支持香港同胞斗争
英方须立即无条件接受五要求

当时外交部“革命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常务副部长姚登山表示坚决支持香港同胞的革命造反精神。于是香港新华分社立即发动爱国的新闻单位、工厂、学校、电影和各中资机构干部群众，从5月16日起到港督府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声讨港督戴麟趾迫害香港同胞、残暴镇压中国工人的行径，勒令他们立即释放被捕的中国工人和中国居民，并向全港中国同胞赔礼道歉。

5月16日至20日，每天都有几千学生、工人和干部到港督府前示威游行。港督府外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这样的斗争和规模，在香港是史无前例的。一些爱国报社的领导、爱国商会的会长、著名电影明星等，也纷纷到场示威，似有安营扎寨、日夜包围港督府之势。5月20日，港府调集军警、防暴部队数千人，大举包围群众，抓走数千人，打伤群众达几千人。这是香港历史上最大的镇压事件。当夜港英宣布戒严。港府的镇压更激怒了爱国群众，而受极左路线影响的有关领导小组，拒绝了港府通过中介人提出的谈判要求，进一步发动群众，全面出击，决心把港英殖民主义者“斗臭斗垮”。“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联合指挥部”、“香港各界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在香港进行全面斗争。香港的斗争由文斗发展成武斗。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声称：“一场反抗英帝国主义血腥迫害的伟大战

斗，在香港爆发了……英帝国主义以为靠几根警棍、几道法令、几条军舰，就可以把中国人民吓倒。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有压迫就有反抗……港英当局的暴行‘升级’，抗英斗争也就要‘升级’……这场斗争还刚刚开了个头，更加威武雄壮、更加气壮山河的斗争还在后边！我港英爱国同胞既然已经展开了反击，就一定要坚持斗争，抗顽敌，追穷寇，把英帝国主义斗垮、斗臭！……港九同胞展开一场仇视、鄙视、蔑视英帝国主义的运动，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向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发动强大的反击，一定要大张旗鼓，千军万马地揭发和宣传英帝国主义100多年来在香港犯下的滔天罪行，发动群众进行血泪的控诉，让香港的同胞家喻户晓，使他们彻底地认清侵略成性的英帝国主义的反动腐朽的本质。”社论最后号召“港九爱国同胞们，英勇地战斗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7亿中国人民，誓做香港爱国同胞的强大后盾”。

几天后，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海陆管理界限地区发生几起冲突事件。此后武斗不断升级，斗争委员会发动群众搞“菠萝战”，即制造真假炸弹安放在市区、街道和车轨上，破坏整个社会安定，以达到“震撼港英统治”的目的。同时从广州偷运枪支弹药到香港，武装工人，要使香港变成“臭港”、“死港”。

《大公报》、《文汇报》和《新晚报》等积极配合这场反英抗暴斗争。各报的新闻，除了有几日是抨击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及内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和指示，其余几乎都是反英抗暴的内容，常常占去所有版面的四分之三以上。头版头条一般都是通栏消息，配以红色通栏标题，如《大公报》5月17日至19日的头条通栏标题是：

高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战斗

港九各界反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

“你们不愧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好儿女”

全国总工会电全港中国工人

誓作香港同胞的坚强后盾 坚决支持把正义斗争进行到底
首都今天开大会声讨港英 群众昨续涌向英代办处前示威

周恩来陈伯达陈毅等出席
北京十万人集会
支持香港爱国同胞斗到底

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之后，6月4日，《大公报》的标题更具冲击力：

香港命运取决于爱国同胞七亿人民绝不取决于英帝
北京号召港九爱国同胞勇猛抗暴
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发动强大反击
随时响应祖国号召粉碎港英统治

各报都大力报道“首都40万群众示威”、“广东10万人大会”、“上海同胞声讨港英”等新闻，版面上充斥着“不获全胜不收兵”、“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不好惹”等豪言壮语及各种各样的用特别字体突出的毛主席语录。事件中后期出现“真假菠萝”式的武斗，是《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直接鼓动起来的。这篇社论由王力起草，陈伯达、林彪批发。

外围的爱国爱港的民营报纸，如《香港夜报》、《新午报》、《出丰日报》也积极奋战，其销路之广、煽动力之强，与左派报纸不相上下。它们在高涨的热情中，也刊登了某些不实的新闻，比如，《香港夜报》在运动中，曾刊登一条道听途说的新闻（一位读者电话中传来的谣言）：鲤鱼门（香港地名）外出现中国炮舰和兵船，目标驶向香港海域……外围报纸的言论正好给港英政府以口舌，同时使港英达到“打了头、着了小姐”的影响，外围爱国报纸便成为港府的制裁对象。8月9日，香港政府拘控《香港夜报》、《新午报》和《田卡日报》三报的督印人和两名承印人，被控罪名包括刊登、协助或教唆刊登虚构新闻和煽乱性新闻，违反《刊物管制综合条例》（1951年）等共20多项，三报案共被起诉罪名达99条。三报

后来又被控在审讯期间，继续刊登与控罪内容相同的报道；加上8月17日三报被令暂行停刊后，又私出《三报联合报》，“罪加一等”，三报被判停刊半年，成为继1952年“大公报案”后，又一起援引《刊物管制综合条例》的案件。三名被告《香港夜报》社长胡棣周、《田丰日报》社长潘怀伟、督印人陈艳娟各被判入狱三年，两家承印报纸的公司分别被判罚12 000元和18 000元。

“三报停刊案”使当时的斗争进一步升级，一直持续了数月。期间港英警察与罢工、罢市、游行示威的群众对垒，发展到街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港英当局颁布了一连串的镇压法令，封闭工会、学校，拘捕和殴打无辜群众。在围捕侨冠大厦和华丰国货公司时，还出动了英国航空母舰，用直升机运载大批军警，携带现代化武器，降落在大厦天台上。武装冲突也不断在深圳与“新界”之间的管理界限地区发生，港英警察开枪镇压示威的群众，深圳的民兵在掩护群众中与港英的武装力量发生了枪战。8月20日后，斗争升级为中英两国间的外交斗争。中国外交部愤怒谴责港英当局，要求英国政府在72小时之内撤销对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8月23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指挥下，北京红卫兵和下部群众一万多人，同时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并火烧了代办处，制造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事后周总理严厉批评有关肇事者，并向英国政府道歉，主动提出由中国政府为英国驻华代办处重建房屋、赔偿一切设备。此后，香港的斗争平息下来。“反英抗暴”运动中，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5 000多人遭到港英当局的逮捕。

运动中，香港主要报纸的销量大增。各报都加强了对动态新闻的采访。一些非左派报纸的记者，常常备带一本《毛主席语录》，以便前往现场深入到群众中去，顺利采访。《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及《香港商报》、《晶报》，都积极报道这场运动，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并一度“备战”，准备武装抵抗港英的镇压。各报馆都派人密切巡视，以防港英防暴队的突然袭击，必要时该撤走的撤走。有人甚至表示要与报纸同存亡。在那样特定的时代，新闻事业

很难超脱其时代背景。这场运动使不少新闻工作者遭受缙纆之灾。与《田丰日报》、《香港夜报》、《新午报》同案的除了上述三人被判刑外，《香港商报》督印人兼南昌印务公司董事长李少雄、经理翟暖晖亦被判入狱三年。另据华侨日报编印的《香港年鉴》（1968年），在运动中有十多名爱国记者，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文汇报》、《商报》、《晶报》等单位的记者被判入狱，多者刑期达5年之久，其中：新华社记者薛平因“非法集会”等罪被判入狱2年；“港共报纸记者”陈凤英、陈德穆、邝宝文、梁丽仪、周捷君、谭思俊、罗向英、罗贵声8月11日因“非法集会”罪被判罚款或入狱7天；新华社记者罗玉和、《文汇报》记者黄一溜、《香港商报》记者陈子峰、《晶报》记者吴东城、《大公报》记者王宁等五人，9月13日因“作恐吓性集会”及“煽动性言论”罪，各被判入狱3年；《大公报》记者黄泽因“使用煽动性言论非法集会”等，被判入狱5年；《香港商报》记者沈启林9月5日被判入狱2年；《大公报》职工邵干鏊9月19日被判入狱1年。

这场运动给左派新闻事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反英抗暴”时期，《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的新闻版上只刊载“两条新闻”（即两类新闻），国内版主要就是“反英”，香港版则是“反英抗暴”，数家报纸几无区别。由于错误路线的教导，报纸由反英而升为反资本主义，反“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报纸的副刊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某些领导要求几家报纸向当时的《澳门日报》等报纸学习，取消副刊。《文汇报》就曾经短期停办副刊，因而失去不少读者，后来报纸不得不恢复了副刊，但销量却很难再回升。《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被要求取消了宣扬腐朽资本主义的“马经”、“狗经”版，结果三报的老读者纷纷掉头而去，销量大落。“反英抗暴”之前，《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合起来销量10多万份，《香港商报》、《晶报》和《王午报》各约12万~13万份，六报总销量约占香港中文报纸总销量的一半。“反英抗暴”之初，报纸销量是急剧上升的，上述6报加上《田丰日报》、《新午报》，销量几达50万份。

(参见表 9-2)

表 9-2 1967 年左报销量统计 单位:份

报纸名称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文汇报	24 500	33 500	30 320	28 300	25 100	22 400
大公报	27 000	36 300	28 500	26 100	24 100	20 700
新晚报	44 000	81 300	73 200	70 400	62 200	60 300
晶报	74 000	87 400	79 600	63 800	51 400	46 300
香港商报	80 000	88 600	83 100	77 900	66 300	60 300
正午报	42 000	52 800	45 300	42 000	34 200	30 000
新午报	13 000	15 700	12 900	10 400	9 100	查封
信丰日报	10 000	12 300	9 300	8 400	8 000	查封
香港夜报	35 000	47 000	43 500	24 700	25 800	查封
小 计	349 500	454 900	403 720	352 000	307 200	240 000

资料来源 香港警方政治部 1967 年 10 月 26 日文件,存英国政府档案处绝密档案 (FC00/114),转引自《英方绝密档案曝光——六七暴动秘辛》,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但是运动后期,“反英抗暴”不仅破坏了中英关系,也极大地扰乱了香港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爱国工人因罢工而失业,罢市罢课也使群众受了损失,左报的言论便也失去人心,销量暴跌,《文汇报》、《大公报》跌至 1 万略多,《新晚报》2 万,而《商报》、《晶报》和《正午报》每家几乎失去 10 万,仅剩 3~4 万份。以后又由于停办副刊和马经、狗经版,改变了原来适合于香港读者口味的办报路线,左派报纸在 60 年代末以及 70 年代十分不景气。读左派报纸曾被视为“羞事”,一些人竟然躲在厕所里才敢阅读!^①

对于这场暴动,周恩来在 1967 年底做过总结,基本观点有三:第一,英国人用暴力镇压工人和左派群众,负有重要责任;香港群众反对英国人的暴力镇压,是合理的、正义的、英勇的;错误是在于领导人把事件扩大为一场动乱。第二,香港左派领导人的错误在

^① 参见陈吕凤访问李笑文先生(前《大公报》总编辑,现董事长)记录,李先生半山寓所,1995-05。

哪里？周恩来来说，“是受极左思潮所利用”。这句话说得含糊，因为当时林彪和“四人帮”还掌握权力，周恩来这句话，其实是说香港左派领导人受林彪和“四人帮”利用。第三，周恩来说，这次错误，“香港有责任，北京有责任，主要责任在北京”^①。

在事件中，港英政府也策划了种种办法对付左派。事件过去30年以后，英国政府按保密条例，解封了当年港英政府的69份保密文件，这些文件厚达6尺，其中很多是当时港督与英外交部和国防部往来的亲笔书信，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港英对付这场暴动的策略以及当权者的想法。就在1967年5月16日左派组成声势浩大的“反抗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第二日，港英政府连忙成立一个由副辅政司领导的宣传委员会，专责反共宣传，主要负责心理宣传战，即所谓“心战室”。这是一个秘密组织，成员来自警方、广播处、华民政务司、教育司署、工商署、经济司、大学资助委员会，统领新闻、文教、工商等各方，调动整个政府资源，其工作范围包括发布新闻、拍摄左派的暴力活动、制作宣传短片，电台广播，引导报纸舆论、海报攻势、单张宣传、撰写新闻稿、与华民政务司合作在地区内做组织工作，甚至在英国工作的香港人也被看成是心理宣传的对象。两个月后，为了达到全面抹黑左派的目的，英国决定在本土成立另一个“心战室”（Hong Kong Working Group），为香港提供必要的支援。（参见图9—1）

港英政府采取重点击破的办法对付左派。他们曾策划了一出分化造谣、打击《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宣传战。费彝民早已是港英政府的“眼中钉”，在“反英抗暴”中他又是“港九各界爱国同胞反对港英斗争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副主委。港英情报人员在收集核心成员的背景资料时，发现有机可乘，指责他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并散播谣言，说和其他左派人士向警方寻求庇护。不过，港英的目的并未得逞。

^① 黄文放：《历史的空白》，见《英方绝密档案曝光——六七暴动秘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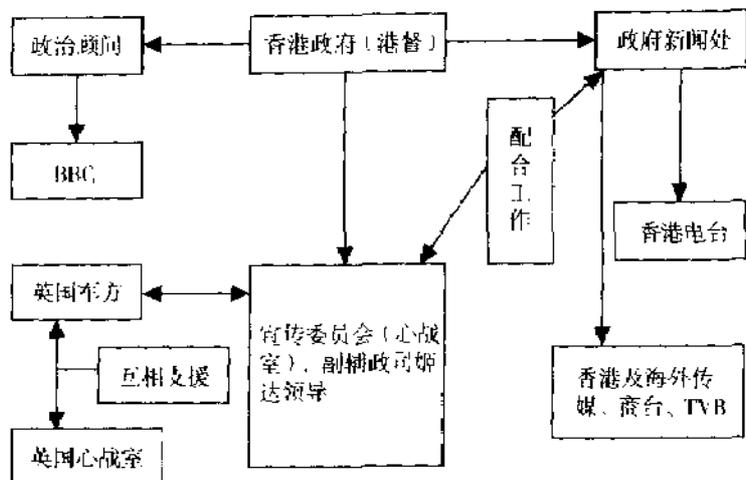


图 9-1 港英心理宣传战室运作架构

资料来源：英国政府档案处绝密文件（FX040/105），见《英方绝密档案曝光——六四暴动秘辛》。

从解密文件中还可知，港英政府还曾希冀以在港督府外被拘捕的《大公报》的谭思俊（37岁，经济版专栏编辑）、罗向荣（44岁，记者）、《文汇报》的刘柱平（29岁，港闻记者），以及《新晚报》两位港闻记者邝宝文（34岁）、梁丽仪（29岁）为筹码，逼迫中国释放当时在北京被拘捕的英国记者格雷。当时5名记者被判罚款，但是他们坚决不认罪，不交罚款，宁愿光荣入狱7天。文件中也显示，港府未决定对《大公报》、《文汇报》直接下手，而是打击几份小报，有特别的目：“对左派小报采取行动，可令那些大报有借口软化，也可以减低激怒北京的风险。如果这样都不能令主流左报收声，才采取一并的行动，以及拿出《紧急规例》来切实执行，到时印刷、出版、发行和藏有煽动性材料，都变成刑事罪行；此外，也可给警方较大权力，搜查和充公煽动性刊物或印刷材料与机器，取走零件令其无法操作，命令停止出版及印刷，及取消印刷报纸牌照。”这是姬达给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的信中说的。文件

显示，港英通过种种手段获取情报、计划对策打压此次暴动。

这次事件引来香港的重大变化。伦敦提出“政治家治港”的战略决策，不再任用殖民官员来治港，其后麦理浩在港推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源头其实都出于对此次事件的总结。

暴动之后，左派报纸与各派报纸联络减少。《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并退出了报业公会。退出报业公会的导火索，是其中两家报社的记者被出租车司机拆除胶卷一事。1967年4月20日，报业公会为此召开理事会议，决议是“维护本港报纸权益”，《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三报认为决议不当，于4月25日致信报业公会提出抗议，认为公会决议是“为美蒋分子的政治挑衅活动撑腰，诬衅的士工人及其正义斗争”，要求公会3天之内撤销决议，28日再次提出抗议，未果，三报认为“公会完全为美蒋匪帮分子所操纵，反共反华”，遂于5月4日宣布退出报业公会。在退出声明后面，《大公报》录毛主席语录一则：“人民靠我们去组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香港报纸受国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而受到了严重损失，教训是惨重的。

香港回归过渡时期 的《大公报》

第一节 新闻业务大有起色^①

一、加强报道力度，探索报道形式

(一) 充分报道香港“前途新闻”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公报》的办报思想也大大解放，新闻版面内容较从前充实生动得多。1984年9月26日中英草签了联合声明，并于同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从此香港开始了过渡时期。

^① 第一节、第二节主要参阅：《大公报一百年报庆丛书》（10种），香港，香港大公报出版，2002；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等书。

传媒在过渡时期的活跃情况和对前途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大公报》刊载了大量新闻，其中不乏独家新闻。

1982年初夏，邓小平在会见《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时，第一次向费提出了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但保持香港稳定，继续发挥自由港作用的想法。当时他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著名的八字方针：“恢复主权、保持繁荣”。《大公报》随即透露了邓小平的决定，引起港人关注，香港回归开始进入社会议程。以后在中英会谈、基本法起草的每一个阶段，《大公报》都力争在第一时间把消息报告给受众，同时力争对同一新闻事件，挖掘比别人更深入的新闻事实；提供新的独家观点，交待读者已知事实背后为读者所不知的事件成因、道理和走势。

“独家新闻”不仅仅意味着抢到了“第一落点”和“第一时间”，还意味着独家观念、独家视角、独家方法。根据第一印象效应，第一个发布消息的媒体可以较轻易地影响受众对事件的看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也因此，报纸都争发独家新闻，以树立大报良好可信的形象，更大限度地参与公众事务。《大公报》在香港回归前后的历史重大时刻每每在第一时间发布独家新闻。

1992年1月下旬，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深圳、珠海参观访问，在深圳还会见了广东省、广州军区和深圳的负责人，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表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主导，标志着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大公报》在香港报纸中首家披露了邓小平南下视察的新闻，22日、23日、24日连续三天报道邓小平南下视察的消息。22日头版头条发表《邓小平昨游民俗村 杨尚昆在深圳视察》，23日在要闻版头条发表《邓小平杨尚昆在深圳参观植物园动手植树》，24日又在要闻版头条发表《邓小平结束深圳行，称特区之路走对了》，三篇新闻稿及时向外界报道了邓小平在深圳地区的视察活动和重要指示，预示中国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热潮。26日头版又刊登《邓小平谈广东经济 称龙头要起好作用》；同日，《大公报》还发表了消息《邓小平论改

革新思路。办法要不同于前十年》，副题是《不能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关键进一步解放思想打得开局面》，对邓小平的讲话作了更详尽的报道，表现了记者充分的新闻敏感，见微知著，明确宣传了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及时地宣告了中国社会的又一个巨变即将来临。

过渡时期的“前途新闻”的另一个焦点是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从1985年7月1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到1990年2月基本法草案通过的4年8个月中，“基本法新闻”成为香港各报的重大主题，《大公报》利用和内地各部门和各方面人士的广泛联系，时有独家报道。基本法通过后，几家爱国报纸都积极宣传，《大公报》、《新晚报》还联合主办了“我说基本法”的征文比赛。

（二）重视内地新闻报道

《大公报》不仅是一张报纸，而且是一个窗口，一个联络站，一个联结内地和海外的纽带。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香港和内地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双方很少沟通，一般港报不重视内地新闻，即便有，也多是从二手渠道取得的，其中有不少还是歪曲的报道。在这一时期，《大公报》和其他左派报纸对内地新闻的报道，就成了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

70年代末，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后，逐步开放香港新闻工作者进入内地采访。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与内地联系日趋紧密，港人对内地新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娱乐、体育新闻的需求度越来越高。调查表明，内地新闻对港人的接近性和重视度，仅次于香港本地的新闻。对内地新闻的角逐，成为香港新闻竞争中重要的一环。各家媒体纷纷设立独立的“中国新闻部”，加大对内地新闻的报道。一般大报都设有中国要闻、社会、经济、专题等版面，将内地新闻置于仅次于香港新闻的地位来编发。表10—1刊列了从80年代中期至1996年香港主要报纸对内地新闻的报道情况，可以看出左派报纸是最重视内地新闻的，其中《文汇报》与《大公报》是报道内地新闻最充分的。

表 10—1 香港主要报纸刊载中国新闻的版面统计^①

报纸	版数	版面名称
文汇报	3-8	中国新闻 神州大地 中国经济等
大公报	2-5	中国新闻 图片专辑
香港商报	1-5	两岸经济
明报	2-4	中国要闻 中国经济 中国社会 中国风采(图片)
天天日报	2-4	中华两岸 彩色中华
华侨日报	3	中国 中国经济 (报纸已停)
星岛日报	2.5-3	中国政经 中国社会 中经新闻
经济日报	1-3	中国
信报	1-3	中国消息
东方日报	2	内地新闻 台湾新闻 两岸探射灯
苹果日报	2	两岸新闻 华南新闻
华南经济新闻	2	华南新闻 (报纸已停)
英文南华早报	2	中国新闻 (China)
英文壹报	2	中国新闻 (China)
英文东方快讯	2	中国新闻
成报	1	中国新闻
新报	1	中国新闻
香港联合报	1	内地新闻 (报纸已停)
星岛晚报	1	中国新闻
新晚报	1	

《大公报》较早地成立了报道内地新闻的专组。1985年4月，内地允许港澳各新闻机构在京设立办事处。为了获得来自内地的第一手新闻，《大公报》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济南、长春、深圳、南京、杭州、沈阳、大连开设了办事处。在哈尔滨、昆明、成都、武汉、拉萨、南宁、厦门、重庆、海口、汕头等地设有记者站。此外，在西安、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长沙等地设有特约记者。这些办事处、记者站和特约记者为《大公报》获得内地独家新闻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90年代初期，在东北设立了办事处，随即发布了不少像长春电影节、大连交易会、吉林雾凇节、黑河、绥芬河、珲春三个沿边城市开放等之类的独家

① 参见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第4章。

新闻。这些消息，港人都是通过《大公报》首次知道的。

同时，《大公报》还和内地一些主要省市建立信息交流联系，为它们定期刊出专版，向读者报道各地尤其是沿港经济开放地区的最新消息。

1989年后，在当时香港某些人“逢中必反”的逆流中，《大公报》坚持自己的立场，利用自己地处香港的优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为中国冲破国际反华舆论的包围，起到了舆论桥梁作用。在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内地新闻报道也顺应改革形势，作了改进，加大经济微观报道和软性新闻的比重。内地改革伊始，鉴于香港的一些读者对之持观望态度，《大公报》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内地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对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特区、股份制等，作了大量的报道。1990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基本确定，同时香港在内地设厂渐多，更渴望得到具体的经济信息。

《大公报》还通过各种活动，深入采访内地新闻。1980年3月，《大公报》举办《八十年代香港与内地贸易座谈会》，邀请香港多位知名外国银行家与贸易商参加。1985年7月、8月间，以《大公报》副总编陈彬为团长，由《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晶报》、《明报》、《商报》、《星岛日报》、《经济导报》、中新社香港办事处和《澳门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组成了港澳新闻界访问团12人，到吉林省参观访问。记者团以长春市为起点，一路采访了四平市、通化市、长白山、延吉市共5个地区的28个点，初步了解了吉林省改革开放的形势和经济建设的成果。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大公报》以通讯的形式发了6篇对吉林省的报道，还配了照片，向香港各界有效地宣传了吉林省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工农业、文教、科研、交通、旅游、投资环境。这些通讯配合其他报纸发回的各种形式的报道一起，在一定时间内形成了一股“吉林热”，颇有影响。

在1986年大亚湾核电站事件中，《大公报》立足香港，情系内地，对电站的建设，从科学的态度出发，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大亚湾距香港50公里，1986年3月中国有关部门与香港公司达成协议，签订了在此兴建核电站的合同。4月苏联切尔诺核电站发生核

泄漏事故，引起香港市民“恐核热”，掀起了一股反核热潮。媒体也分化为“主建派”、“逍遥派”、“反建派”。在这场风波中，《大公报》的报道和评论，强调了该工程在选址、建设指标、安全设施上都已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成为“主建派”的代表报纸，与“反建派”报纸进行了论辩。

这一时期，每逢内地发生严重灾情，《大公报》都会用大量篇幅予以报道。如河北地震、云南地震，1988年长江水灾、1994年华南水灾等，《大公报》都及时报道了灾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1991年长江水灾的报道。1991年7月长江出现特大洪峰。南京地区连降暴雨，长江上中游大量洪水下泄，加上正逢海水涨潮，海潮顶托江水上涨，致使下游江水决堤，淹没大片村庄农田，引发特大洪灾。从7月中旬起，《大公报》在多个版面上以大量篇幅报道灾情和赈灾活动，并在体育版和娱乐版报道义赛募捐，义演筹款。7月27日前后更重点宣传了当天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汇演的情况，并发动捐款。至7月30日，《大公报》读者共捐款1000多万元。1994年7月华南发生特大水灾，香港《大公报》又发起募捐，共募集灾款2400多万元，发往华南灾区。此外，对内地的公益事业，《大公报》也表示关注，像内地的希望工程，《大公报》不仅组织群众捐款，对围绕希望工程的一些流言进行批驳，而且出资在云南等地建立希望学校。

此外，《大公报》还注意探索新的新闻形式，对新闻材料进行深加工，在同一主题下，运用多种新闻形式进行组合式报道，以主体事件报道为核心，辅之以详细的资料、过程分析、图片和专家评点，向新闻事件的纵深拓展，派生出相关的报道。例如，1990年9月22日北京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共有36个国家和地区，5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参加，规模空前。这是中国首次主办大型国际赛事，《大公报》投入了大量力量报道该届亚运会。22日、23日报纸连续在头版报道开幕盛况，以后又在头版专门拨出版面报道赛事、比赛结果。报纸还专门开辟了亚运特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战果和亚运花絮，多角度、全方位地报道这一盛

会。这届运动会台湾也派出运动员参加,《大公报》抓住台湾第一次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亚运会这一事实进行详细报道并予以评论,最大限度地挖掘事件的社会价值,表达了希望海峡两岸统一的愿望。

二、重视社评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十分重视评论,十分关注国内外的大事,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中英会谈开始后,香港人人关心回归,《大公报》抓住这一时机,引导港人关注政事,在许多重大社会政治事务上及时发表言论引导舆论。除周日外,每日《大公报》均有社评,评析最近发生的重要新闻,另外在港闻版、国际版和经济版上也都有评论专栏,甚至娱乐版也有影视评论,更有刊登读者、作者来信的《大公论坛》。这些言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为祖国统一鼓与呼

80年代以来,《大公报》在宣传祖国和平统一方针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81年10月10日在北京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指出中国当前首要的三件大事是建设四化、保卫世界和平和完成祖国统一。《大公报》次日即发表社论《千秋伟业系于一转念之间》,批判了台湾当局反共反统一的立场,宣传了祖国大陆的对台政策,言辞恳切。1986年10月台湾通过了当地居民到祖国大陆探亲的方案,《大公报》立即发表社论《骨肉情谊深 探亲终实现》,对台湾当局的政策予以肯定,又对方案在原则、办法上仍存在诸多限制表示遗憾,呼吁开放探亲,化解仇怨,发扬亲情。1995年李登辉访美大搞台独,3月,第二次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取得初步成效,《大公报》发表社论《坚持磋商诚可贵》,对成果表示鼓舞,强调两岸保持接触才能消除误解,只有以大局为重,存异求同,寻求共识才是明智之举。社论《长存李登辉心中的是“台独”》则揭露李登辉访美搞台独的种种表现,指出:在外国势力支持下搞分裂,只会给台湾带来灾难。只有不断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统一,台湾的长期经济繁荣才有保障。这

些社论说理透彻，为祖国统一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二）关注中国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大公报》一直重视对祖国成就的宣传。1982年10月，中国潜艇在东海公海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大公报》及时发表社论《加强国防建设新成就》，指出中国是掌握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技术的五个国家中唯一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这表明中国工业和科技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中国能为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1986年中共中央开始整顿党风，集中对付中央机关的不正之风。《大公报》为此发表社论《打扫门庭 迎接“七五”》，表达了对党风建设的信心。1990年中国度过了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升、社会不安等困难，经济开始增长。《大公报》在1990年发表元旦社论《中国进入非常关键的十年》，展望未来，充满信心。文中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如：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外开放可以并行不悖，扩大开放须以稳定为前提，中国将会深化改革开放，等等。这些预言都已被事实所证明。1996年国家主席江泽民结束对欧亚六国的访问，《大公报》发表社论《中国全方位外交获重大进展》，对近期中国取得的一系列外交成就作了一个回顾，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表示欢欣鼓舞。这些社论宣传评述了中国在内政外交上取得的最新成就，让外界了解中国。

（三）保卫祖国领土完整

1989年3月，拉萨少数分裂分子煽动骚乱，《大公报》发表社论《拉萨骚乱有国外背景》，从种种迹象分析，指出拉萨骚乱是分裂分子与国外势力里应外合，利用中国改革中出现的暂时困难发动的分裂祖国的行动，义正词严地指出：分裂中国的阴谋决不会得逞。1990年，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设置航标灯，叫嚷要收回钓鱼岛，公然对中国主权提出挑衅。《大公报》10月24日的社论《钓鱼岛主权问题不容含糊》重申中国政府立场，强调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强烈督促日本立即停止挑衅行动，有力地表现了中国的决心。

(四)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造势

1995年联合国举办社会发展首脑会议，这是历史上首次全球合作试图解决贫困问题。《大公报》为此发表社论《全球合作向贫困宣战》，对会议表示欢欣鼓舞，指出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协商、互利互惠，才能促进国际社会发展，维护全球稳定。近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逐渐抬头，一些政客试图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行为粉饰，在军事上也积极扩充军力，对此，《大公报》于“九一八”六十周年之际，发表评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列举日本近年种种复活军国主义的现象，警告日本掌权者不要重蹈覆辙，提醒世人保持警惕。这一类的社论迎合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

(五) 思想评论

社论中还有一部分是从思想着手评论的，例如，1985年9月10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教师节，当日《大公报》的社论《教师万岁》，从尊师重教的传统谈起，肃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轻视教师轻视知识的“左”倾错误思想，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1994年9月，中国公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大公报》对此发表言论《爱国主义——中华民族之魂》，强调每个中国人都应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

三、增加各种专版专刊，拓宽报道面

(一) 《大江南北》和《大陆与香港》专版

这两个专版都是为了深入报道有关中国的新闻和加强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而设。

《大陆与香港》主要是报道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往来的，华南地区及沿海开放地区等经济特区由于和香港经贸往来密切，报道较多。

《大江南北》则主要是对内地社会风土人情、旅游见闻等进行报道，让读者在休闲中了解内地人情百态、社会风尚。该版的栏目“管见微言”，主要是就内地政事发表议论。“动向”则谈内地社会最新动态。该版还刊登了大量报道社会风气的文字，如《神风吹袭

神州大地》、《广东产品评比泛滥成灾》等文章，话题轻松中不乏严肃性。每版上更有一篇以上介绍内地风土人情旅行见闻的通讯或游记。例如《成都街头尝小吃》、《西安清流入里风光好》这一类的文章，让读者轻松愉快地神游内地。

（二）《环球特写》专版

香港媒体对世界新闻较为关注，《大公报》为拓展对国际时事的报道，在纽约、伦敦、悉尼设有或曾经设有办事处，此外还开设了记者站，将采访的触角伸向苏联、东欧、中东和世界各地，版面上国际新闻的独家报道也增多了。在加强世界新闻报道的同时，为了增加读者对世界大事更深的了解，80年代末，《大公报》又创办了新闻副刊式栏目——“环球特写”，最初是专题画页，大约半版大小，黑白印刷，以后逐步增加文字内容，变为图文并茂的专题栏目。1993年初扩为整版，全部采用彩印，形式固定下来，一直沿用到今日。《环球特写》充分发扬了《大公报》关注国际时事的传统，选题广泛，从社会生活到世界政局乃至名人逸事，均是世界热点话题，每周一篇，对这些热点话题追根溯源，探究种种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趣味性、知识性、可读性并重，推出后，大受欢迎。这些文章有的紧密联系现实问题，洞察先机。1993年的《纽约高楼危机四伏》，从当年世贸中心爆炸说起，揭示了高楼大厦背后的危机。《邪教启示录》、《天堂之门敞开之后》则引起人们对邪教组织的关注，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有的文章偏重趣味性、知识性，像《梦露，走在女权运动前头》，为人们提供了看待这位性感明星的一个新的角度；《恐龙新说》、《二千年前的冰美人出土》、《机械人时代》等则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身，给读者提供新知的同时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有的篇章结合社会政治大事深入挖掘，显示了对现实的敏感度和洞察力，例如《卢旺达大屠杀的背后》揭示了大屠杀的深层原因。在回归前夕发表的《暮寒》，则回顾了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表达了帝国终结、香港不死的信心。

（三）《学与教》专版

这一段时期以来，香港《大公报》注意适度面向大众，开辟教

育、社团、校园等版面面向年轻一代，收到了良好效果。1990年初，《大公报》开设《学与教》版，每周刊出6天，每期约四分之一版，以师生投稿为主，不时刊出一些教育短讯，每天还配一幅漫画，名为“吓画吓”，由香港中文大学两名学生轮流执笔，反映读书、考试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还有“斋 Talking”专栏、“知心话”专栏等。后者由两位在“突破”机构工作的女社工叶凝、李珑执笔，与师生谈心。

（四）“社团”版

这是《大公报》的特色之一。“社团”版报道各社团各自的事业。各种民间团体，如街坊福利会、同乡会等，团结各自的特定人群，合力为居民服务。《大公报》对社团的报道，激发了各社团的工作积极性，也让社会注意到他们的事业，对社会、对公众事业都有帮助。

（五）从《文化艺术》到《文化》专版

《大公报》一直重视文化艺术的报道。1988年10月前，文艺消息一般发在港闻版内，比较零碎。1988年10月16日首次在《星期日增刊》内开设《文化艺术》专版，从此《大公报》首次有了刊发文艺消息的专版。10月17日，该报又对日常版面进行了革新，将一些较有趣味的软性新闻集中在港闻版（第13版）内，每次都刊登一幅由本报记者拍摄的大幅彩色照片，在当时以黑白为主的版面中非常突出。日常文化消息也刊登在该版，其中专门辟有“文化活动精选”专栏，以简讯的形式介绍当天的音乐、展览节目。1990年10月7日，《星期日增刊》改名《星期日周刊》，文化艺术版停刊了。日常版面中第13版的文化消息越来越多，“文化活动精选”专栏也改名为“今日文化节目精选”，整个版面照片也变为彩色，不再只限于一幅照片了。渐渐地，第13版港闻版实际已成为文艺专版，内容主要是文艺方面的新闻、专访、评论、简讯四大类，位置也不再限于第13版，而是依当天版面编排调动而定。1992年7月31日，该版正式改名为《文化》版，每次以半版面貌出现。第二个月，该版拥有了自己的版头，初期位置不定，以后固定在左上角，一直保持到今日。

(六) 副刊

《大公报》的文化底蕴始终是这张报纸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面。报纸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副刊的建设上。作为一份闻名遐迩的报纸,《大公报》的副刊具有鲜明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内容充分满足广大读者精神的、文化的和实际生活的需要。现任社长王国华认为副刊是《大公报》具有重大吸引力的五大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副刊辟有《大公园》、《小公园》、《书话》、《文学》、《艺林》、《新园地》等几个专版。在此前后,香港报刊竞争激烈,时时改版,往往率先向文学版开刀,一家家报刊的文学版接连消失,剩下的已经不多。而《大公报》的文学版仍坚持每周出版,给香港广大文学爱好者一方发表和阅读的园地,对推动当地文学发展功不可没。《大公园》被誉为香港惟一保持传统文化特色的版面,《书话》则为读者推介了不少好书。副刊团结了一批高素质的作者。聂绀弩、秦牧、于光远、饶宗颐、夏衍、季羨林、王元化、巴金、王蒙、余光中、陈从周、袁可嘉、黄裳、舒婷等都曾为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副刊写稿。高质量的作者队伍保证了副刊的质量。在香港中文报纸中,《大公报》一向以文字严谨、用语准确规范著称。一项颇具权威性的调查报告指出,香港报刊中错别字最少的是《大公报》。

(七) 其他专版专栏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在资讯爆炸的年代里,《大公报》强化资讯特色,体现为重视“新知”的输入,随时把向受众介绍最新的科学知识,人文成果当做自己的使命,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事半功倍的神益,使之能跟上时代,不做“老饼”(落后于潮流者),时时处于“新地带”,日日都能“睇真D”。每周五《大公报》推出科学版,以适应读者的需要。

此外,为适应日益变化的市民生活结构,《大公报》注意从微观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开发家庭生活、择业就学、休闲娱乐、购物消费等生活空间使之转化为办报内容。像在报纸上开办医药版、摄影版、文化生活周刊,既丰富了办报内容,又满足了受众的需求。

四、利用高科技不断提高报道手段

在香港报业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转变中，《大公报》在计算机化的时间上、速度上都走在同行的前列。《大公报》在实现计算机化过程中率先采用计算机组版激光照排系统，率先采用彩色图文全版输出系统，率先使用新闻综合网络。1988年，《大公报》在香港第一家引进了北大方正精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推出了第一张整版由计算机输出的报纸。从此，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以后又进一步引入了方正中文电子出版系统，逐步实现报馆业务全面计算机化。1993年9月1日起，《大公报》全面使用网络管理系统软件排版，稿件录入、排版、分色等全面实现系统化。1994年便做到了深圳大公印刷厂和香港《大公报》同步印刷，凌晨即通过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运往全国各省。1995年，《大公报》采用“新闻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等软件，实行计算机管理，从此，《大公报》的新闻采编、广告、发行、财务和资料检索等实现了全面计算机化。这是《大公报》走向无纸作业、各项业务迈向全面计算机化的第二次技术革新。为保证出版发行速度，《大公报》安装了光纤通讯远距离传输先进系统，利用数码压缩技术，将四十多个版面传输至深圳蛇口大公印刷厂，异地同步印刷出版，为《大公报》扩大各地发行网络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1995年，《大公报》率先设立网页。

《大公报》一直讲求印刷质量。1988年，在柯达公司主办的环球彩色报纸印刷比赛中，《大公报》荣获亚非及大洋洲区首奖。

DAKONGBAO BANWANSU

第二节 重大事件中的《大公报》^①

一、使命感：中英会谈中的《大公报》

从1982年至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就如何解决香港前途问题

^① 部分参阅《大公报一百年报庆丛书》。

进行了两年慎重而艰苦的谈判。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了会谈；第二阶段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22轮马拉松式的会谈。

在会谈前后，中英双方开动舆论工具，香港媒体空前活跃，《大公报》充分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当时香港报纸对中英会谈大致持四种态度：一是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纸为首，赞同香港回归祖国，支持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一部分报纸如《星岛日报》、《信报》、《成报》对之持保留怀疑态度；第三类报纸则反对香港回归，甚至不承认中英联合声明的合法性，代表有《香港时报》、《工商日报》；第四类报纸是持中立立场的保守报纸，像《东方日报》，不谈政治，但常常撰文对香港前途表示疑虑。

（一）与“条约有效论”斗争

谈判的第一阶段，《大公报》站在爱国爱港的立场，支持中国政府，和英方的条约有效论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访华，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正式拉开了序幕。9月23日，赵紫阳同撒切尔夫人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中，撒切尔夫人说：“有关香港的一个条约仍然有效”，只可以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以单方面予以废除。赵紫阳总理拒绝了撒切尔夫人的上述主张，他声明：中国暂时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时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人管理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及生活方式不变等等，以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赵紫阳强调指出：国家主权与经济上的考虑相比，始终是第一位的问题。《大公报》当天发表社论《中英间历史问题处理准则》，对会谈表示了关注，支持中国政府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希望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次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继续前一日论调，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不仅收回新界，而且要收

回港岛和九龙。邓小平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不出现大的波动。”之后，邓小平又加上“制度不变、港人治港”，形成了系统的、完整的解决香港问题的16字方针。

9月27日撒切尔夫人飞抵香港，在记者招待会上仍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的顽固立场。10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指出：撒切尔夫人9月27日在香港的谈话“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香港是事关10亿中国人民（包括香港的中国居民）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有权力说，对香港的中国居民负有一个主权国家的责任。从此，拉开了中英政府就香港主权问题而争执的序幕。

就此问题，《星报》评论说：“中国重申对香港的主权，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乎意料的是英国的坚持条约，因为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又是大多数英国人认为不光彩的鸦片战争之结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英文《虎报》评论说：“仅仅基于过去年代发黄了的条约的英国立场，显得顽固，甚至是不合时宜的。”香港《中报》发表署名文章说：“香港人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在关键时刻，绝大多数人会表现出其中国人的风格。”

在众多的香港报纸中，也有一些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为其辩护的。英文《南华早报》发表《我们生存的基础》，认为香港生存的基础是三项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条约是在不平等基础上签订的，其法律效力却是事实，条约的达成方式应与其有效性、延续性分开。10月30日，《大公报》发表评论《休提不道德战争的不道德条约》，批驳了《南华早报》的观点不合国际法有关原则，指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对于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只会起极大的破坏作用。

在香港问题会谈开始后，由于局势一时不明朗，当时香港市民

对香港前途怀有疑虑，《大公报》在安抚市民、保持稳定方面做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工作。11月20日，当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会见香港工商联合会参观访问团时发表讲话，明确中国收回香港的时间在1997年前，届时将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社会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由港人治理香港。这是中国首次正式提出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大公报》及时予以报道，并发表言论《港人治港与社会制度不变》，指出廖承志的讲话为今后的香港勾画出了清楚的轮廓，澄清了社会对香港前途的疑惑，重申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政策，说明收回香港不会影响它的繁荣稳定，安定了人心。

1983年2月12日，《大公报》又发表言论《对香港的安排属中国主权》，再次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条约有效论进行批驳，支持中国的对港政策，指出这是充分照顾香港的现实情况和香港居民及各方人士意愿的结果，对香港的安排只能由中国政府决定。

（二）批驳“中国主权英国管理”的论调

1983年7月中英双方进入了第二阶段对具体实质性问题的会谈。这一时期，《大公报》继续重申中国政府主权治权不可分离的政策，充分发挥了报纸的舆论功用。

在这一阶段的会谈中，英方灵活运用媒体影响舆论，大打民意牌，以增加在谈判桌上的筹码。会谈伊始，英方一方面没有放弃“三个条约有效”论，另一方面又提出“过渡论”，和中国政府坚持治权不可分离的立场对峙。过渡论的主要内容是指英方撤出香港把治权交还港人，完全实现由港人治港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在过渡期还须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影响所及，香港社会也出现了代表英方立场的言论和方案。《大公报》对当时流行的言论及时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些论调的实质都是希望香港独立或成为某种变相的独立实体。

（三）揭露英方的经济牌

英方坚持“过渡论”，要“以主权换治权”，要求先谈香港主权问题，中国方面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割，要在1997年后一并

收回，先谈1997年后香港如何管治问题，双方僵持不下，未能达成协议。从第三轮谈判开始，会谈公报上“有益的”“建设性的”字眼就消失了，这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惶恐心理。整个香港都笼罩着愁云惨雾，民心浮荡。股市不振，港币节节贬值。香港经济处在危险状态，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大受影响。在币值失控时，港英政府不但不加控制，反而置香港市民利益于不顾，大打经济牌、民意牌，对中国政府施压。港府财政司彭励治公开发表讲话，称“港币贬值主因是政治前景，香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没有政府可以控制币值的趋向”。矛头直指中国。

1983年9月23日，就在中英第四轮会议结束前两天，撒切尔夫人在伦敦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前景不明朗，正面临重大的金融和政治方面的动荡。英方的谈判是出于为香港市民的利益考虑，不应该指责英国搞殖民主义，因为香港若不是地位特殊和有新界租约在，早已独立，成为了另一个新加坡。撒切尔夫人的讲话无疑是为香港岌岌可危的金融市场火上浇油，24日，就在中英第四轮会议会谈结束前一天，香港发生了港元疯狂下跌的历史性惨剧。是日的港元兑美元的汇价跌破至1美元兑港币9.5元，黄金狂涨至每两4705元。恐慌的市民涌到各间超级市场和银行，抢购食品，挤兑美元，造成香港历史上的所谓“九月风暴”，香港的美、金融市场陷入混乱。28日，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国务大臣卢斯在香港发表讲话，把港元风暴的责任推给中国政府，攻击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说如果会谈失败，香港会发生骚动，经济上会受冲击。

对于英方由打民意牌变为打经济牌，《大公报》在舆论上作了揭露，刊登了内地访港经济学家钱俊瑞、许涤新，外交及政治学家宦乡等对港币贬值的意见，批评了港府不负责任的态度。另一方面，《大公报》及时发表言论，报道香港经济恢复的消息，安定局势。9月26日，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与恒生银行同时宣布，限制存户购买美元，限额为2000—5000元。到10月15日，港府宣布稳定港元政策，固定汇率1美元兑港币7.8港元，并取消10%的

港元存款利息税。至10月17日，美汇下跌为8.03元，同时黄金价下降为每两3935元。对此，《大公报》都详加报道，对香港顺利度过危机起了一定作用。

（四）浓墨重彩，盛赞联合声明的签署

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草签《联合声明》全部文本，规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日，海内外舆论非常关注，就连对手撒切尔夫人也盛赞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当晚，《大公报》发行号外，报道这一盛事，发表了《中英协议准确文本》，发布中英联合声明全文。并于翌日发表了评论《世界近代史上一件大事——祝贺中英就香港问题达成圆满协议》，高度评价了这一成果。27日，《大公报》举行座谈会，邀请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中英两国草签联合声明。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正式签署《联合声明》，12月20日《大公报》又再次发表评论《世界文明外交的光辉典范》，指出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解决了两国关系中一个历史性障碍，标志着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在“一国两制”的大原则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二、《基本法》起草风波中的《大公报》

1985年5月27日，中英双方在北京互换经两国政府首脑签署并经双方按各自法律程序批准的联合声明批准书，联合声明自即日起生效。香港正式进入12年过渡期。为了使“五十年不变”得到法律的保证，为了香港回归的胜利成果和维持香港回归后的长期繁荣和稳定，过渡时期的首要大事就是制定香港特区基本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文件，也是香港未来的发展蓝图。

从1985年7月至1990年2月共4年又8个月的时间里，由全

人大常委会委任的59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经过9次全体会议、25次主任委员会议、73次专题小组会议，由征求意见稿、草案到定稿，最后于1990年春正式出台了这部“一字千金”的“一国两制大法典”。《基本法》的制定、通过和颁布，宣告了《英皇制诰》、《皇室训令》的寿终正寝，标志着“一国两制”的设想终于以法律形式确定其在香港实现。《基本法》起草过程可分为5个阶段。1985年7月1日草委会第一次会议到1986年4月为第一阶段，主要是确定基本法起草工作整体规划和基本法结构。1986年5月到1988年4月，按大纲起草出基本法草案第一稿。1988年5月到9月为广征意见、修订第一稿阶段。至1989年1月为讨论和投票，再征询意见修订。1990年2月《基本法》通过，最后一个阶段宣告结束。

在《基本法》起草阶段，港人对政制问题意见纷纷，主要争论焦点是围绕民主发展的速度，也就是立法机构中各阶层人士的议席比例，及直接议席的发展速度问题。另一个争议焦点是行政和司法的关系、行政长官应如何产生的问题。

1989年“北京风波”后，英方错误分析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改变了政策，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与中国政府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态度，从中英联合声明的立场上倒退。

《大公报》在《基本法》的起草、拟订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舆论的作用，为《基本法》起草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出色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宣传中国政府有关政策，支持草委会工作，在政制改革上，坚持循序渐进。

《大公报》当时的社长费彝民是草委会副主任委员，《大公报》在整个基本法讨论过程中，一直站在爱国爱港的立场，为制定出一部合乎香港实际的基本法而努力。为了香港1997年后平稳过渡，《大公报》和中国政府保持一致，在政制改革上，表示要结合香港具体情形，采取一步一步走，循序渐进的方式。风波后，部分港人对前途感到迷茫，希望《基本法》能提供更多保障，对《基本法》

内容、尤其政制的民主进程更为关注。部分激进民主派要求对基本法重新咨询，重新讨论，有的甚至喊出了“彻底否定基本法”的口号。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派别，包括中间派和一小部分左派在内，都要求加快民主进度，即直选制度。《大公报》从大局出发，坚持维护《基本法》，对市民做了不少解释和宣传工作。

(2) 向港人宣传《基本法》、介绍、解释《基本法》起草工作，引导舆论，释疑解惑。

《大公报》用了大量篇幅向港人介绍有关法律知识和政制知识，在“持平篇”、“政海微澜”、“城市座谈”等专栏中，以随笔的形式谈时局，谈政事，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1989年“北京风波”后，港人人心浮动，《大公报》一方面向广大市民宣传了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号召港人都来关心《基本法》制定，推动港人参政议政。1989年8月，《大公报》发表社论《“基本法”基本不行？评严家其关于香港前途的怪论》，批驳严家其，指出对《基本法》不能基本否定，所谓的普遍不接受毫无依据。社论《港人应更关心基本法》，指出《基本法》制定是保证香港未来稳定与发展的大事。

在《基本法》制定中，为避免香港被反动势力利用作为反华基地，保证香港社会稳定，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许多港人对此不能理解。《大公报》做了解释工作，还特别请有关草委会委员撰文释疑。委员廖瑞珠发表《关于“国家安全法”的探讨》，从法理的层面探讨了有关法例。这些文章客观上起到了安定人心，让市民了解、关切《基本法》的作用。

(3) 与英方做斗争，揭露英国阻碍《基本法》工作和违背联合声明的行径。

1989年后，英国单方面终止与中方的合作，为《基本法》起

草工作设置障碍。这一年港英政府常务司屈玗发表题为《收拾残局》的讲话，要求港人重新研究回归后的中国驻军问题，以及《基本法》草案中有关宣布特别行政局进入紧急状态的条文，并提出希望中国政府推迟颁布《基本法》，直接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13轮会议设置障碍。8月12日，《大公报》在头版发布消息《外交部批评屈玗讲话 起草基本法不容干预》，及时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19日，《大公报》发表言论指出，屈玗讲话的严重错误，是不顾港人利益，玩弄手法阻碍《基本法》工作的顺利进行。22日又发表文章，逐条批驳了香港不能驻军的荒谬性，指出在香港驻军事关主权，在联合声明中已明文规定，若太平盛世不驻军则盛世也将不保，对英方的粗暴干涉作了回击。

以后英方又推出居英权计划，提出给香港居民居英权，居民可以在1997年后根据情形决定是否留在香港。这个方案无疑对香港未来发展不利，一是香港回归后将面临人才大量流失的问题，一是即便留下来工作，也存在一个究竟是支持中国还是支持英国的问题。为了香港发展，《大公报》对居英权计划表示了反对，指出英国国籍法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

《大公报》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始终站在保持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的立场，坚持联合声明有关条款和改革要与《基本法》衔接，维护了《基本法》的地位。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使载入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有关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具体化，把“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这其中，也有《大公报》的一份功劳。

三、1989年多事之秋的《大公报》

1989年发生的北京风波不仅严重影响了内地的社会，而且也波及香港。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出现动荡，部分市民对香港前途产生疑虑。国际社会密切关注香港回归。在国家经历这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大公报》从各个角度、以多种形式报道局势逐渐稳定，

经济建设、贸易、外交等各个方面走上正轨的事实。

1989年7月，江泽民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7月7日，江泽民上任来首次会见外宾，强调政策不会改变。《大公报》立即予以报道。同月，江总书记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罗德丞、黄保欣等，重申了“一国两制”的政策。12日，《大公报》发了新闻《江泽民谈“一国两制” 强调井水不犯河水》。以后又发表《就井水不犯河水 江泽民近再解释 内地香港 互相尊重》等文章清楚阐明了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

四、做好准备迎接回归

(一) 与彭定康“三违反”政制改革方案做斗争，为维护香港稳定繁荣而奋斗

《基本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勾画了未来香港的明细蓝图，是具有创造性的一部杰作。《基本法》的颁布，意味着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应同《基本法》相衔接，以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在香港过渡时期前半段，中英双方按照联合声明的规定，遵循和《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在香港一些重大问题上彼此合作，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英土地委员会的工作也取得不少成果，对于维护香港稳定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92年，英方撤换卫奕信，由彭定康出任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就任港督以后，采取了一系列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违反中英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的行动，在许多涉及跨越1997的重大事务上，不同中方磋商，不与《基本法》衔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制造了重重障碍，使中英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像单方面决定兴建新机场，无意认真履行双方有关终审法院的协议，使终审法院的建立拖至3年后仍未得到落实；并为寻求世界对政改方案的支持，不惜将香港问题国际化。彭定康不断在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新闻自由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并于1992年10月单方面抛出了“政制改革方案”。

《大公报》支持中国政府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三违反”政

改方案，谴责英方背信弃义的行为。1992年12月10日发表《乱源不断 港人不宁》，指出港英抛出“三违反”制宪方案是乱源，要求港英收回方案。1993年发表《彭定康：错误的估计 危险的选择》，明确指出：“如果英方强行实施彭定康的‘三违反’方案，中方将在1997后将其推倒，另起炉灶。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中英双方进行了交涉，《大公报》在《大公报论坛》上也展开了辩论之战。

1994年4月13日，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报告书，表示全力支持英国政府和彭定康对香港的“政制改革”，鼓吹英方独立行动，单独对1997年前的选举做出安排，就主权移交前事项进行立法，同时大打国际牌，在对华问题上继续争取国际支持，与欧洲盟国和美国同步合作；又以人权为由，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促进港英政府在1997年前成立人权委员会，宣称要检讨台湾代表处在英国的地位，要对其放宽限制，要与台湾立法院接触等等。这无疑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大公报》在次日发表社论《又是一份挑战书——评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报告书》，揭露了英方破坏谈判、拒绝合作的行为，表示英国的挑衅必将随香港回归而徒劳无功。

1995年1月，彭定康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我们不愿见到1997年是一个政府，而1997年后又是一个政府”，“我们只愿见到1996年是一个政府，在1997年亦是一个政府”。对于彭定康不顾现实、不理睬联合声明的讲话，《大公报》做出反应，社论《是梦话，也是心里话——评彭定康愿见到香港97前后是同一个政府》，戳穿了彭定康妄想港续其殖民统治的真面目。

（二）设置回归议程

现代传媒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议程设置功能。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式，通过对新闻议题的选择、加工和强调，赋予受众各种议题以不同的重要性和显著性，影响人们对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在迎接回归的过程中，《大公报》充分利用了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把人们的注意力凝聚在回归上，关注回归，关注香港。早在1985年，该报就发表社论《迎接香港过渡期的第一

年》，以后，随着回归日近，《大公报》开始了回归倒计时，越来越经常地提起回归话题。每年“七一”，《大公报》都要提起回归。1994年7月1日，《大公报》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座谈，就今后三年香港可能出现的形势及港人如何回归进行了讨论。同日，《大公报》发表了评论《三年后的今天——香港回归祖国》，针对有人认为香港的发展主要是英国统治下的结果，对回归后香港前途没有信心的论调进行了驳斥。文章有破有立，用事实驳斥了“香港这颗明珠是英国政府赐予的”这一观点，指出它是港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满怀信心地表示，“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三年后，殖民枷锁解除，港人可以充分当家做主，香港明天只会更好。1996年7月1日，《大公报》又发表评论《香港沧桑 人间正道——喜迎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一年》，以后在回归100天又发表评论，通过对回归倒计时，加强了人们对回归的紧迫感与关注度。

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1996年1月香港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1996年底，在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选举产生了行政长官人选董建华，随后国务院依法任命其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与此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也已通过选举宣告成立。1996年12月11日，《大公报》发行号外，大字标题《特首：董建华》并配以大幅照片，当日的社评《祝贺董建华先生光荣当选》对董建华当选表示支持。

1997年是香港回归年，标志着英国在中国领土上的统治即将完全终止，也标志着“鸦片战争”的国耻即将正式结束。年初，《大公报》推出“回归话当年”专版，每周出刊1版，一直出到年底。该版以人物专访的形式向香港市民介绍了香港的兴衰过程和奋斗历史。采访记每篇约4500字，由叶中敏带头采访香港不同界

别、对香港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3月1日，离香港回归还有4个月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港澳委员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大公报》发表评论《江泽民对港人寄予厚望》，显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人实现“一国两制”、依靠港人、保障平稳过渡、稳定繁荣的决心，进一步统一港人思想，为实现政权顺利交接、保证香港稳定繁荣发挥了可贵的舆论导向作用。

6月中旬，距香港回归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大公报》发表言论《看末代总督还有什么花招》，对彭定康反对临时立法会上所作表演进行了揭露。紧接着半个月后，又发表《别了，不列颠尼亚》，从宏观的角度作理性思考，指出不列颠尼亚号必寿终，“日不落”帝国的统治必终结。

6月26号，《大公报》发表改版消息，宣布为迎接香港历史的新纪元，自7月起刷新版面，增添内容，以崭新面貌服务读者。

香港回归前夕，江泽民总书记给《大公报》题词：“发扬爱国爱港传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这既是对《大公报》的期望，也是对《大公报》工作的肯定。

（三）运用多种手段宣传回归，实现新闻联动

为了香港平稳过渡，《大公报》抓住一切机会宣传《基本法》。1995年，正值香港《基本法》颁布5周年，香港《大公报》、《新晚报》举办《我说基本法》征文比赛，凡香港、内地有兴趣者均可参加，在宣传《基本法》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中独树一帜。

1997年，《大公报》与《光明日报》合作举办《迎回归诗词大赛》，聘请知名人士安子介、马万祺、周南等任组委，分旧诗、新诗组，并将优秀者结集出版。活动反响热烈，征集到作品3万余份，颁奖过千。

在宣传回归上，《大公报》积极与电视等媒体联合，形成电视、出版和报纸之间的新闻联动。《大公报》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摄制了大型电视纪录片《香港沧桑》，回顾和剖析了香港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展示了香港的沧桑巨变。纪录片记述了香港

三个部分相继被割占、“租借”的历史，讴歌了香港同胞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为香港繁荣发展所做的贡献，全面介绍了香港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回归历程、政权交接、特区成立等重大事件，阐述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在香港的具体实践，表达了中国人民终雪国耻的喜悦和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江泽民主席对这部电视片给予极大关注和支持，1996年5月为这部电视片亲笔题写了片名。电视片作为回归倒数一周年的一项献礼，在距回归一周年之际，在香港和内地中央电视台播出，吸引了大量观众。许多大中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把它作为爱国教材，组织学生观看。电视片获得了当年的“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电视最高奖金鹰奖，在让人们了解香港历史、宣传香港回归上起了很大作用。

（四）全力打造回归版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万众瞩目。《大公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回归前几个月就陆续开始了筹备和策划工作。6月30日，报社打破所有课的界限，投入到回归新闻的采访、编辑工作中去。除了正常的版面工作外，当天还专门抽出人员组成一支号外突击队，从回归仪式的举行再到最后的全国欢庆，每一个阶段都安排了记者和有关人员的全方位、全时段的报道。

为了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大公报》策划出版了4次号外。从6月30日晚上7时至7月1日晚7时24小时内，《大公报》出版了1次正版，4次号外，共300版，印了百万份，时间之快，效率之高，在《大公报》历史上是第一次。第一次号外于6月30日下午7:30发出，报道《江泽民抵港》，刊出江主席首次踏足香港、向群众挥手的镜头。第二次号外于7月1日凌晨2点发出，大字标题《香港回归了》，报道零点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刊登了五星国旗和香港区旗升起的图片和江泽民保证“一国两制”施行的题词。第三次号外于7月1日下午1:30发出，报道《特区盛典》，刊登了江泽民祝贺特区成立和特首董建华就任后首次重要讲话：确保维持香港成功因素不变。内页是港人喜迎驻军和记者从深圳随军开拔的报道和图片。第四次号外于7月1日晚10时发出，报道京港两

地庆祝回归大型文艺演出。

当日的正版，采用跨版相连的形式，以首末两版相连刊载政权交接仪式的整顿照片，配以《回归了，开新篇》特大标题，6个字横跨两版，每个字三英寸半宽、四栏高。版面形式庄重、大方，颇有气势。此外，当日《大公报》用了16版报纸来报道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成立、特区政府就职仪式，以及香港、内地人民欢庆的情况，在内页第1版，用通版直题报道《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文内报道中英领导人在港参加盛典，五星国旗与特区紫荆花区旗同时升起。同版附以社评《中华壮举世纪盛事——热烈祝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指出“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得以彻底洗雪，香港进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崭新时代”。“香港回归，是中国在和平统一征途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将为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榜样”。“香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范例，大大增强了人们和平解决争端的信心”。内页第2版用横题跨页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政府宣誓就职》，报道了江泽民宣布特区正式成立的新闻。内页第3版头条是江泽民的署名文章《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第4版报道港九新界各界群众“倒数零秒，欢声震天”的场面，新闻标题是《全港居民迎接新纪元的到来》。此外还有特写和新闻图片。第5版报道了《解放军接掌香港防务》，第6版报道《特区法例今生效》，另有新闻传真栏报道外宾的感受。图片版则以新闻照片和少量文字描绘了港英当局冒雨撤出香港的情景，其中一幅抓住彭定康黯然低头接受降下的英国国旗的一刹那，可谓形神兼备。

特稿《余晖尽矣》则绘形绘色地描写了彭定康当女高音唱着“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正在孤独地开放”时，多次戴上又放下眼镜，三番四次掏出手帕揩抹的细节，记述了他上台发表告别演说词，承认对于上个世纪的一些事实，今天没有人会为之试图解说，写尽了这位末代总督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黯然心态。

这一天的《大公报》的分量，破该报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广告达222版，头版广告投标的港币额均数以10万计算。在报道方

式上也颇有创意。正版采用跨版相连的编排形式，以首尾两版相连刊载政权交接仪式的整幅图片，气魄宏大。一些特写、特稿于细微处见精神，寓意深刻。回归版成功的策划和实施，使《大公报》庆祝回归当天的报纸成为众多集报者的收藏对象。报社将回归当天报纸的头版铸成了金版97件，并作为历史记录，分送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香港厅留念。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节 90年代《大公报》的工作方针

香港《大公报》的工作方针，与“为什么要在香港办《大公报》”紧密相关。《大公报》在香港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否改变了？

关于办报思想，《大公报》领导观点都非常明确。如果说前50年《大公报》功在抵御外侮，那么后50年则功在收回香港。回归以前，《大公报》是为收回香港而办的，回归以后是为了“一国两制”而办的。回归以后，《大公报》承担的斗争任务和宣传任务更艰巨，《大公报》始终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

90年代初确定的工作方针是：以办好《大公报》、《新晚报》为中心，继续发扬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一手抓为收回香港而斗争，一手抓发行和多元化经营，要把《大公报》办成一份立足香港紧连祖国、面向世界的国际名报，这是《大公报》的奋斗方向。

实践方面，《大公报》、《新晚报》要“引导舆论，服务社会，贴近民众”。“大公报是人民的报纸”，所以要谋求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要把握的“舆论导向”是：“有理有据地阐明在当时情况下，香港人民和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哪里；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地肃清一些糊涂观念和错误倾向，提高人

民的思想觉悟水平；坚定不移地批判和揭露反人民、反国家的错误舆论和观点。”“服务社会”的宗旨，是要报纸多角度、多侧面、多形式地服务社会，决不能以教师爷的架势，板起面孔教训人，必须面向社会，了解社会。“贴近民众”，是要把工作重点放在“人”的工作上，要了解香港各阶层的市民的想法，要反映他们的心声，关心他们的疾苦。《大公报》领导认为，只有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充当舆论先导，同时又能深入社会、贴近民众，才能越办越兴旺”^①。

90年代初，报社领导提出，要在报纸的可读性、趣味性、战斗性方面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加强战斗性，配合收回香港主权而进行的斗争方面”，下大力气。90年代前几年的“头等大事”是保证完成报道任务，增强言论文章的战斗性和影响力，“紧密配合为收回香港面进行的各种舆论斗争，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坚定不移地为祖国说话，为中国人民说话，为洗雪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服务，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平稳过渡，为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做出贡献。在中英会谈、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等关键性时刻，组织了“重大战役性报道”，刊发了一批较有说服力的社评、言论，以期造成强大攻势，取得了宣传效果。

报纸进行了多次改版。1993年1月1日起，《大公报》开辟一个新专栏《百年正气歌》，以历史史实为主，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讲述中华民族的斗争史，进行民族大义的宣传。同时《新晚报》开辟《浩气长存》专栏，介绍中国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爱国壮举，也是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讴歌民族英雄，激发爱国热情。开辟这两个专栏的目的，“是配合后过渡期收回香港的斗争，激励爱国者，鞭挞民族败类”。同时还新辟了《华人实业家》版，该版成为报社联系上层工商界的一个重要桥梁，还重点介绍中国500家大企业。新辟《社团版》、《大公周末》（后改为《大公周刊》）、在贴近社会、

^① 以上引文及下一段引文内的文字，均据陈昌凤访问《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先生的记录（2002-08-09、2002-08-12），藏于香港大公报馆。

贴近民众方面做出了努力。1999年1月报纸全面改革内容结构,35个栏目逐步换掉21个,以期扩大读者面,培养年轻读者。

1993年《大公报》在改版中成立了社评委员会,增强社评的力量。90年代末,《大公报》又进行改版,指导思想是“坚持爱国爱港立场,面向特定读者对象,发挥强项刷新版面,群策群力上新台阶”,以及“精英办报,办精英报”。具体做法是,以提高报纸质量为中心,以增加信息量为重点,增强权威性,增加可读性,力争稳住老读者,开拓发展年轻和中年读者,适应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的要求。

《大公报》的业务方面,一直重视中国新闻与国际新闻,同时也加强香港本地新闻。表10—2对1951年至1991年50年间的“中国新闻”与“香港新闻”报道量作了抽样统计和对比,从中可以看出报道绝对量和相对比例上的轨迹。

表10—2 《大公报》“中国新闻”与“香港新闻”报道量的比较^①

年份	总版面情况			“香港新闻”		“中国新闻”	
	总版面 (一般)	较前10年 倍数	发行量较大中 文报版面数 ^②	版面数	百分比 (%)	版面数	百分比 (%)
1951	8	0	12	<1	<12	1~1.25	12~15
1961	8	0	16~24	<1	<12	1~1.25	12~15
1971	8	0	32	1~1.5	12~19	1~1.5	12~19
1981	14	1.75	48	2	14	1~2	7~14
1991	28	2.00	48~80	4	14	2	7
备注	各专刊内容未计算在内						

从统计情况来看,50年来“香港新闻”所占比例有略微上升,绝对版面数则有较大增长。关于“中国新闻”的比例,前40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90年代相对比例有所减少。《大公报》版面数量与同期其他中文报相比不具优势,但与其他中文报相对发展速度则基本一致。

^① 对1951年、1961年、1971年、1981年、1991年的报纸用等距离抽样方式,各抽取30份加以统计。

^② 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为主要参照,以平均版面数计算。70年代以后,多家报纸版面数超过这两家报纸。

同时,《大公报》数十年来的工作方针,是紧紧与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形势密切相关的,也因此注意在对港英政府的报道中调整态度。表 10—3 也以抽样调查的方式,对 50 年中《大公报》报道港英政府与中国政府的态度进行了比较,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报纸与政府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当时港英与中国政府、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变迁。

表 10—3 《大公报》报道港英政府与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①

年份	报道港英政府日均篇数 及占总报道之比例(%)						报道中国政府日均篇数 及占总报道之比例(%)						说明
	正面报道		中性报道		负面报道		正面报道		中性报道		负面报道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1951	—	—	1.25	62	0.75	38	0.5	100	—	—	—	—	日出 8 版 港闻 < 1 他报 12—16
1961	—	—	1.0	33	2.0	67	1.0	100	—	—	—	—	日出 8 版 港闻 1 版 他报 16—24
1971	—	—	0.5	12	3.75	88	1.5	86	9.25	14	—	—	日出 8 版 港闻 1 版 他报 48 版
1981	—	—	1.25	62	0.75	38	9.25	50	0.25	50	—	—	日出 14 版 港闻 1.5 他报 32
1991	0.25	4	4	67	1.75	29	0.25	100	—	—	—	—	日出 28 版 港闻 2—3 他报约 60
日均 篇数	0.05		1.6		1.8		0.5		0.1		0		—

50 年代初,左派爱国报纸的工作方针是“立足香港,热爱祖国”,所以态度比较中性,1951 年的关于港英政府的负面新闻比例较低。60 年代初工作方针偏红,特别是新办了《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几家比较中性的报纸,并与《大公报》有了分

① 采用等距离抽样的方式,抽取 1951、1961、1971、1981、1991 年报纸各 30 份加以统计。港英政府和中国人民政府的报道,是指关于政府部门的新闻。正面、中性、负面是指报道新闻的主观态度分别为赞扬、客观、批评或否定。

工,《大公报》左派立场比较明显,批评港英政府较多。“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深受影响,与港英政府严重对立,所以1971年关于港英政府的负面报道比例最高。改革开放以后,《大公报》思想比较解放,80年代更是有“港报港办”的思想,加上1981年至1991年是中英的“蜜月期”,所以1981年、1991年关于港英政府的报道较多持中性立场,负面报道比例较低。1992年彭定康就任港督后,传媒的政治生态有较大变化,《大公报》批评揭露港英政府的新闻也明显增加,上文的叙述中已有显示。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大公报》则是一以贯之,持拥护态度。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后《大公报》的基本工作方针是继承原先的传统,加强新闻业务,保留原有的新闻版面或版位如要闻版、中国新闻版、国际新闻版、经济新闻(或专刊)、体育新闻版块。同时仍然注重以副刊为特色,重视副刊的文化品位和质量,保留《大公园》、《小说林》、《各地通讯》及摄影版块,言论方面保留《大公报论坛》、《纵横谈》,服务版块、船期版也都一一保留。总体上80年代以后,报纸新闻较以前充实,版面有较大幅度增长,内容也比较丰富。80年代较过去新增或改革的专版包括视与听、科学、医药等。80年代初期以后,《大公报》上关于内地与香港工商交流方面的新闻明显增加,这是与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正相关的。《大公报》还恢复了赛马、艺林,到90年代初,新增加的版面包括环球特写、大江南北、生活园、学与教、新园地、交易广场、股市行情、文采、思潮等专版。90年代末,《大公报》为了精兵简政、增收节支,并考虑到读者定位,实行“减张定版”,取消“生活圈”、“彩色跨页旅游”、时代广场、当代珍闻、军事之窗等版面。

《大公报》一直注重文字质量。香港学者曾抽取1997年上半年香港各中文日报进行“语言表述差错”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13份报纸中,《大公报》的差错率最低。^①

^① 参见黄煜、卢丹怀、喻旭:《香港中文报章的语言与报道问题评析》,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四节 《大公报》的经营管理

一、管理机制

新记公司《大公报》时期是以总的“三驾马车”形式统领各分馆的（后来实际只有总经理和总编辑两驾车，社长未再设），津、沪、渝、桂、港等各分馆最高负责人就是经理和编辑部主任。50年代内地各分馆调整合并或停办，香港《大公报》进行了管理机制的调整。1952年起设社长，由费彝民担任并兼任总经理，总编辑是李侠文（原编辑部主任）。

1993年9月，《大公报》在改版中成立了社评委员会，由编辑部领导。1998年改革以后，社评委员会改由社委会直接领导。编辑部也改成了编辑工作委员会。同时，新成立报社经营管理委员会，在社委会领导下，统筹报社经营管理工作。三个委员会下再设若干个重点业务小组。参见图10-1。

《大公报》调整组织机制以后，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以强化经营管理。决策层还制定了各委员会的工作章程、议事规则，以期集思广益、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据研究，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随着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大公报》原有的编委会、社评委员会的运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社委会领导下的编辑部和总经理部两大部门，彼此缺乏有效的沟通，经营活动缺乏统一的指导和监控，所以成立经营管理委员会，负责整个报社经营管理工作的组织和策划工作，以期理顺报社的经营管理架构。

调整后的编委会遵照办报方针，负责组织策划报纸的宣传报道，负责版面的安排和改革、重大新闻的组织策划，协调采编、印刷、发行工作，负责编辑部日常运作的管理，包括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推荐评选新闻工作奖，对违反宣传纪律、造成不良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的事项提出处罚意见，协助社长办公室考察采编

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实绩，推荐晋升高级职称人选。不久，编委会进一步明确了助理总编辑以上领导的具体分工，把各课室及采编、撰写社评、审核签发大样、印刷等编辑部日常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落实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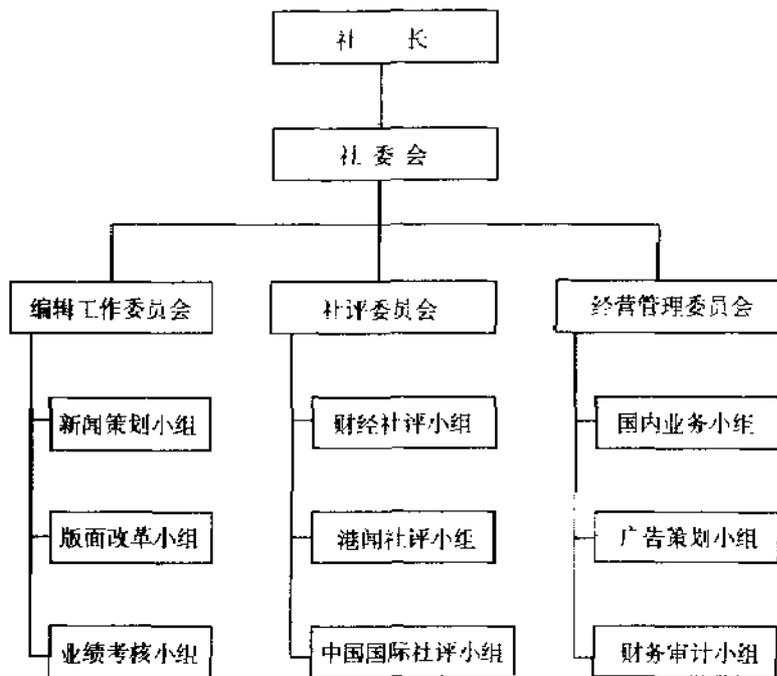


图 10—1 《大公报》的决策层架构图

社评委员会改由社长直接领导，负责社评的组织、策划、撰写和把关工作。社评委员会下设置几个社评小组，负责组织、策划、撰写各相关领域的社评。

《大公报》也紧跟技术发展形势，办了网络版，并成立了电脑网络管理委员会，与前 3 个委员会平级。除了图 10—1 中的决策层，90 年代末 4 个委员会下设各部门，如图 10—2：

第十章 香港回归过渡时期的《大公报》

THE HONG KONG FREE PRESS AND COMMUNICATIONS SERVICE AUTHO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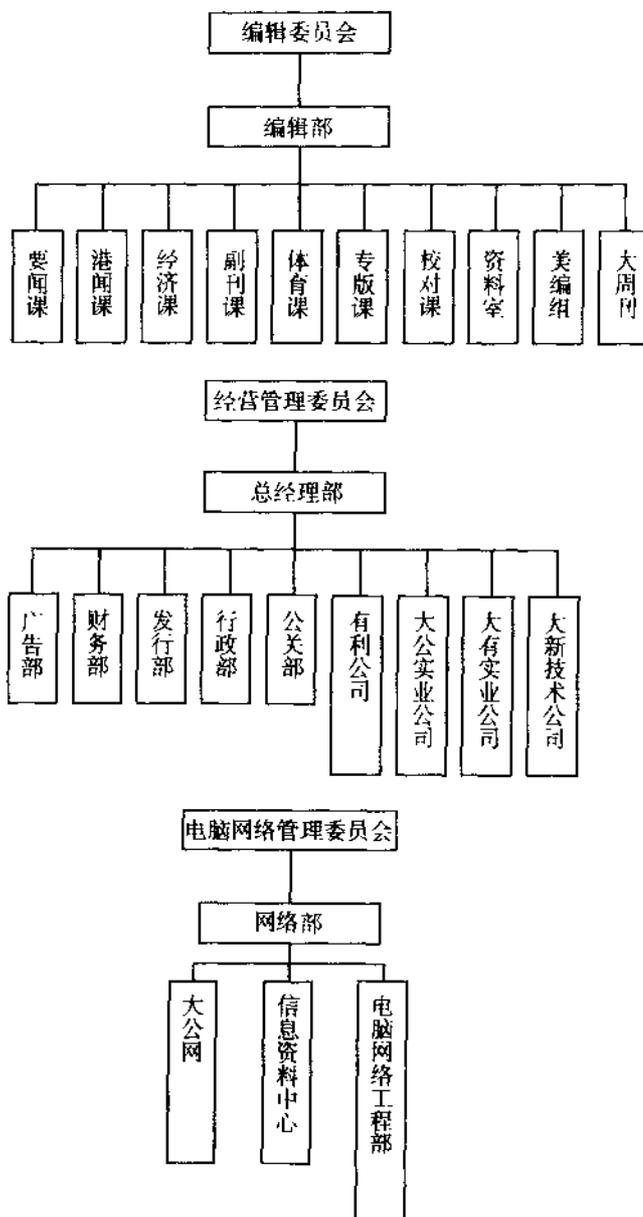


图 10—2 《大公报》主要委员会架构图

此外，还有一个合资控股公司“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直接由社长和社委会领导。总经理部目前也有所调整，架构如图10—3^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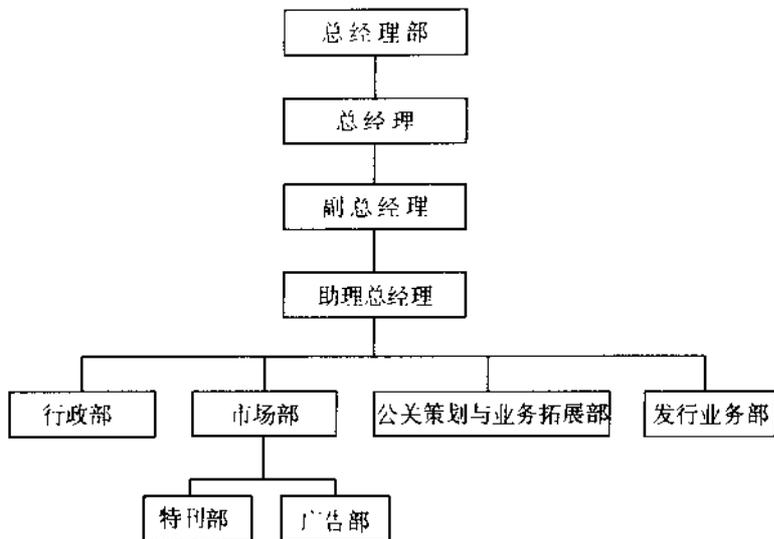


图 10—3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部组织架构图

除了馆内工作部门，90年代初，曾增强海外的人力，增派人员去美国、英国办事处，并要求这些办事处综合经营、报道、发行、服务并举，并一度提出办澳大利亚版。后来在90年代末精兵简政时，撤销了《大公报》驻澳大利亚办事处。目前航空版在香港印刷，发向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3年5月，《大公报》还创办了菲律宾版，目前该版已经成为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之一。

《大公报》也特别注重发挥和内地关系紧密的长处，1985年4月，内地允许港澳各新闻机构在京设立办事处，《大公报》在北京、

^① 资料来源：陈昌凤访问《大公报》总经理冯仲良先生记录，香港大公报馆，2002-08-17。

上海、广州、福州、济南、长春、深圳、南京、杭州、沈阳、大连开设了办事处，在哈尔滨、昆明、成都、武汉、拉萨、南宁、厦门、重庆、海口、汕头设有记者站。此外，在西安、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长沙等地设有特约记者。90年代初加强了内地办事处的建设，并逐步理顺内地办事处在工资福利、人事管理、业务管理3个方面的关系。

二、90年代的经营管理

(一) 经营

《大公报》自80年代已经开始关注经营问题，90年代正式提出一些经营理念。目前香港媒体的经营竞争越来越激烈，经营形态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行规被打破了。广告也是如此，过去广告折扣都约定俗成，通常打7折，即给30%的回扣，现在这种行规也没有了，都是根据市场来确定，根据客户的需求来确定。这些问题，90年代中期以前影响还不大，但亚洲金融风暴以后的这几年，是数十年来香港报业经营情况最困难的时期。

在香港，发行基本上是不赢利的。目前报纸张数较多的报纸，每份成本价已经高达13~14港元，而批给发行商每份只是3.9~4港元，远远低于成本。目前报纸张数在10张即40版以内的，若不计人力，发行还不算亏，但印数10张以上的，每份就会亏本。90年代末，《大公报》进行整改，“加强管理，精兵简政，增收节支，共渡时艰”，实行“减张定版”，每周压缩版面21个，一年可节约纸张、印刷、稿费等开支400多万元。但是，减张也带来了副作用，报纸容量小了，竞争力就下降了。2001年底报社总结经验教训，2002年又恢复到平均出纸11~12张。^①

《大公报》有“两个市场”，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内地。这些年，报纸在香港有所发展，与内地相关的香港广告有所增加。1993

^① 参见陈昌凤访问《大公报》总经理冯梓良先生记录，香港大公报馆，2002-08-17。

年6月12日，港英政府发表有关公告：《大公报》与《新晚报》可刊登法律效力广告。该报发挥与内地关系的优势，内地广告的份额不断增加，90年代初，内地广告占20%左右，目前内地广告已占50%左右，不过，与内地同行还没有形成竞争关系。

《大公报》从70年代起，就结合特刊部进行广告经营，是香港报纸中最早成立特刊部的报纸之一。以特刊形式，结合新闻和广告，效益比纯粹的广告版要好。为此，经理部从编辑部找来一部分记者做特刊，并于70年代末将原来下设于“港闻课”的特刊独立出来，于80年代成立“特刊课”，现已移到经理部。

《大公报》从“新记”开始，在经营方面有一个特点，即总编辑兼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副总编，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现在虽不是兼任，但经理部的主要人物都在编辑部做过记者，如现在的总经理冯仲良就是记者出身，后来做外事记者兼特刊组组长，然后做经理。这样的人事体制有几个方面的好处：第一是主管者对编辑业务和经理业务都了解，有助于互相配合；第二是编辑部出身，人脉关系多，公关能力强；第三，做广告不仅限于登报，还需要沟通的技巧和新闻采访的技巧等等。

作为一份政治色彩浓厚的报纸，在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双重的任务，所以经营方面非常不易，既不能完全市场化，又不能不市场化。另外，目前《大公报》拥有“两个市场”的优越性和在内地市场受保护的特权，中国加入WTO之后也会对之有一定的影响。

（二）管理

《大公报》多年来实行传统管理模式，并在其基础上逐步改革。1993年进一步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实行经营目标管理制，相对独立的10多个经营单位都制定自己的经营目标，部分还与报社签订了协议。要改变“经营无目标，花钱无预算，发展无规则”的状况。

人事方面，90年代初《大公报》提拔了一批业务骨干，仅1992年就提拔课主任以上干部11人，晋升高级职称12人，1993

年共提升课主任以上干部 28 名、高级职称者 89 名。另一方面，报社实行“减人定编”制，从 1994 年起，报社就开始控制职工人数，提出“只出不进”的口号，人员在四五年内从 538 人压缩到 359 人，撤销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压缩广告部内勤人员，遣散数十位编辑部人员和公司富余人员。

1993 年初，《大公报》调整了机构设置，合并了“中国业务部”和“发行课”，成立了“发行业务推广部”，较有成效，发行量有一定的增长。合并了“广告课”与“特刊课”，成立“广告特刊部”，制定了内部制度，广告业务有较快发展，特别是在国内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大公报》广告额上升较快。总经理部则推行岗位责任制，各司其职，并实行打卡工作制。人事管理方面，建立业绩考核机制，并建立职工业绩档案，把职工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记录在案，作为职工晋级、升迁的依据。

90 年代初还成立了职工联谊会，力所能及地开展一些提高职工凝聚力及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活动，并尽可能提高职工的人工和福利。表彰内部工龄在 10 年、20 年、30 年、40 年以上的老职工，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报社的凝聚力。

香港爱国报纸的老职工较多，他们不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所任职的媒体。老职工多，员工队伍相对稳定，有较强的归属感，工作认真勤勉，可以保证报纸水准，而且便于管理，但是不便于变革。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是在变动中发展的，平均年龄只有 30 岁，51% 在 30 岁以下，85% 不到 41 岁，只有 7% 的从业人员年龄在 50 岁以上。各媒体间的人才流动也非常普遍^①，这是比较符合香港的媒体市场的需要的，而“左派”报纸的人才队伍就不太一样。1993 年，《大公报》88 位课以上的干部、高级编辑记者中，有 56 位即 64% 的主管在本报工作 10 年以上。

^① 参见 Joseph Man Chan, Paul S. N. Lee, Chin-Chuan Lee: Hong Kong Journalist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报社认为，“九七之后香港交由港人管理，需要大批治港人才，我们报馆责无旁贷地担负着培养治港人才的任务”。

关于增收节支方面，这些年《大公报》也下了大力气，主要做法包括：

(1) 调整员工工作时间和工作量，清理取消不合理的加班费、兼职费、编辑费和勤工奖、发行奖、超指标广告奖以及各种津贴等非工资开支，期望通过此项清理年节省400万元。

(2) 清理压缩日常办公开支。过去港闻课记者既有手机，又有传呼机，后来取消了传呼机月租费的报销，仅此一项港闻课一年即可节约7万多元，此外还规定配备手机或传呼机人员范围和报销额度。并决定，一般部门保留一部长途直线电话和一部传真机，业务量大的部门适当放宽，多余设备拆除。

(3) 实行责权利挂钩的预算管理。对内地办事处、记者站实行经费预算定额包干，定期通告使用情况，年底结算。无特殊原因超过预算的办事处、记者站，扣发主任、站长的工资。1999年开始，全报馆实行财务预算定额包干。

(4) 严格工作纪律，对工作不负责任造成报社重大经济损失或不良社会影响的职工严肃处理。

(5) 加强内部开支的监控机制，实行高度垄断的财务管理。1999年起，全报馆实行收支统一管理，资金统筹调配，改变课室主任、部门经理审批报销的制度，开支实行“财务一枝笔”审批制度。日常开支编辑部、经理部由课主任或部门经理核准后报总编辑、总经理审批方可报销，超过一定的额度，要经社长或社委会研究审批，并冻结各部门固定资产的购置。

三、90年代的发行

发行方面，《大公报》也是有两个市场，即香港和内地。“文化大革命”时期，内地发行受到冲击，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恢复在内地的发行。1992年7月3日，《大公报》在哈尔滨举行首发式，同

年,《大公报》在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发行。目前大约在内地有4万份的销量。

对发行工作,90年代初曾经作过一次总结,认为过去发行政策卡得过死,开始时拒收人民币,后来发行折扣限得太严。于是解放思想,调整发行政策,在发行折扣上、照顾发行代理商的利益上、免费赠阅方面放开一些,并将发行与新闻、广告结合起来。有些事项是在实践中逐步调整的,90年代初认为关于赠阅问题上思想也偏于保守,后来有所放开,不过,90年代末在整顿发行工作、清理压缩赠报数量时,又压缩了海外赠报25份,年节约16万元,并同时清理内地赠阅,在保证有关领导和主要外宣单位用报的前提下,压缩赠报数量。公司员工业务用报由每人一份改为几人共一份,重新规划发行推广费。

多年以来,《大公报》一直争取早出报,90年代末基本解决了此问题,一般出报时间在凌晨3时15分左右,最早的2时53分就出来了。

四、多元化经营

在香港这样的商业社会,报业较之其他大的公司常常表现出一定的弱势,单靠广告发行来维持或赢利是有困难的,所以自70年代凡有条件的报社都纷纷开办多种经营,如经营印刷、影印、杂志、房地产等等。90年代初,《大公报》也开始了多元化经营,并颇有起色,“以丰补歉”,有利于发展报业。^①

《大公报》的多元化经营,围绕核心业务开展,主要是经营者熟悉的业务。一是成立了一些公司,如“大公出版有限公司”,以及一些广告公司、展览咨询服务公司等。二是在内地寻找合作,1994年在深圳的蛇口与内地合作成立了“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合资控股公司,承揽本报以外的印刷业务,承印内

^① 参见陈昌凤访问香港特区中联办副主任+凤超先生,香港中联办,2002-08-02。

地《证券时报》等10多份报纸、几十份杂志。同时通过电脑传版，印刷本报在内地发行的报纸，此前在内地发行的报纸是用大卡车从香港运到深圳、广州的机场，再发往全国各地的，现在在内地发行的4万份报纸，每天早晨3点以前就能印完，大大增强了时效性，7点就能到广州，中午以前就能到北京、南京、上海，也节省了成本。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第一次投入3600多万元，1994年投产后，除去折旧率，每年赢利达1000多万元。2002年5月28日，该公司搬迁新厂址，新址占地达2万多平方米，拥有9条大型进口印刷生产线，年产值可达2亿元人民币，印刷业务覆盖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现在有80%以上的业务是对外的。

此外，1993年《大公报》还与中国石油物资装备有限公司及宝鸡石油机械厂，在宝鸡合资成立“宝大新技术开发公司”，主要经营石油机械方面的产品开发，《大公报》投资不多，效益却不错，有赢利。

《大公报》还经常为内地在香港招商引资，合办各种洽谈会。报纸的经营部门与编辑部门在这方面配合较好，报纸经常在新闻中发现合作线索，如《大公报》经常报道黑龙江农业方面的新闻，从而于2002年8月与黑龙江农委合作办了黑龙江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大公报》每年都有很多与内地的合作项目。如2002年1月与全国工商联合作，在香港举办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有100多位内地民营企业家、100多位香港工商人士与会。同月还举办了“物流航运研讨会”，这也得益于《大公报》多年来版面上一直重视航运，2001年将航运版改为物流版。此外，还经常举办内地商品展销会，举办人才培训班等等。

《大公报》还办有杂志《大周刊》，90年代初刚办时名《大公报》，按香港周刊惯例，分为娱乐和综合两本，其中综合的那本随报赠送读者。1998年时《大公报》算过一笔账，仅此赠刊，除

去员工工资，每年需要费用近 400 万元。于是将刊物每期从 64 页压缩到 48 页。因为香港兴“单名”的周刊，所以《大公周刊》也改称《大周刊》，与市场接轨，简单响亮上口。该刊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获特许在内地发行，因其编排活泼、印刷精美，销量不菲，在内地一本售 3.8 元，两本合售 6 元。

1992 年《大公报》曾经组织房地产部，投资房地产。后来，报社总结有关经验教训，认为报社底子薄，经不起大的风险投资，又是文人经商，缺少经验，所以尽可能不搞风险投资，而是搞“短平快”的项目。

五、新一代的《大公报》人

香港《大公报》复刊时的主要负责人、在岗 40 年的社长费彝民去世后，1988 年由杨奇任社长。杨奇于 1992 年荣休后，王国华接任社长。李侠文任总编辑 40 多年（一度任前社长兼总编辑），1990 年荣休，由曾德成接任，曾德成 1998 年进入特区政府工作后，杨祖坤接任总编辑。总经理最初由费彝民兼任，实际经理马廷栋，80 年代中期由尹任先接任，现任总经理是冯仲良。参见图 10—4。



图 10—4 香港《大公报》复刊后负责人更迭图

杨奇出生于香港，40 年代初在香港从事爱国抗日和民主革命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1945 年香港光复后参加创办中共南方局的《华商报》，任经理，稍后协助乔冠华建立香港新华分社。广州解放后参与创办《南方日报》，任经理。在“三

反五反”运动中受过冲击，后被平反。以后借鉴香港晚报方式创办《羊城晚报》，一纸风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入牛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回香港新华分社工作，曾任宣传部长、秘书长。1988年，这位曾任7家报纸总编辑的著名报人，调任《大公报》社长。

曾德成1969年进入《新晚报》，时年仅18岁，80年代初调入《大公报》，任副总编，1990年任总编，随后并兼任副社长，^①

王国华，1992年起任《大公报》社长，在任期间，主持了《大公报》90周年、95周年、98周年、100周年报庆活动。

冯仲良，1967年入《大公报》任记者，70年代中期加入“特刊”工作，80年代特刊课成立后任负责人，80年代末任经理部副经理（即副总经理），1992年任总经理至今。

杨祖坤，1959年入《大公报》任港闻课记者，后历任经济课主任、副编辑主任、编辑主任、助理总编辑，1998年升任总编辑。^②

① 参见陈昌凤电话访问《大公报》前总编曾德成先生记录，2002-11。

② 参见陈昌凤访问《大公报》总编杨祖坤先生记录，香港大公报馆，2002-08-13。

1997年7月1日,《大公报》回归特刊的主题是“回归了,开新篇”。这六个字既是对香港未来的期望,也可以说是对《大公报》的未来的展望。

随着香港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大公报》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与特区政府同呼吸

2002年,在香港回归5周年之际,《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回归五年,经验千条万条,其中最

根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按照基本法有效施政，这就需要在政治上有一位方向明确、立场坚定的行政长官，领导特区和港人始终在‘一国两制’的轨道上前进。”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大公报》回归后的办报大方向的一个注解。

回归后的香港，在舆论形式方面应该说发生了根本变化，宣传爱国爱港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是，香港传媒界一些人的立场并没有变化，个别报纸“逢特必反”、“逢董必骂”，这也影响到业内风气，造成一种印象，即谁不反对政府、不骂特首，就是“擦鞋”，就是“自我约束”。在这样的局势下，《大公报》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特区政府，支持董建华。当然，它所面临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无论是舆论上的压力，还是由此带来的销量与广告等市场上的压力。

1997年10月，当回归的喜庆气氛还未散尽之时，一场灾难性的金融风暴席卷香港。早在这年的1月，投机金融家索罗斯便着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同年5月，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7月初泰铢沦陷，3个月后，金融风暴登陆香港。10月20日，香港股市开始下跌。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累积跌幅近1200点，大约9%，被当地市场人士形容为小股灾；23日，香港恒生指数最低曾落至9766.7点，跌幅高达1871点，下跌了10.4%，有人甚至认为这一天的跌幅可和1987年的美国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一相提并论。这一天也正是“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纪念日。全球各地股市也在此时形成恶性循环式的普遍狂跌，27日，纽约道琼斯指数狂跌近554.26点，是有史以来跌幅最惨的一天，因而导致中途自动停盘一个小时。东京股市开盘后即狂跌800多点。28日香港恒生指数狂跌1400多点，跌幅达13.7%，全日最低达8775.88点，以9059.89点收市，下跌点数创历史之最。

这种严峻的形式，对刚刚开始运作的特区政府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强调，香港股市的震荡只是暂时性的调整。之后，特区政府做出了五大举措：其一，特区政府打破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的所谓“常规”，动用1100多亿港元的外汇基

金，入市收购部分本地股票，捍卫香港股市，捍卫联系汇率制度。此举获得明显成效。其二，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如斥巨资 224 亿港元合作兴建香港迪斯尼乐园，积极修建、扩建地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其三，退还税收，冻结收费，纾解民困。特区政府退还了 1997 年至 1999 年度应缴纳的利得税、薪俸税及物业税的 10%，总额达 85 亿港元，惠及 125 万纳税人。同时还继续冻结了政府部门向市民提供的服务收费。其四，疏堵结合，推行金融改革。即提高效率，刺激投资，增强金融中心的魅力；堵塞漏洞，加强监管，防止过度投机炒作。其五，积极提升创新科技和高增值产业在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启动总投资 140 亿港元的数码港计划，同时启动富有特色的创业板市场，为成长性良好的新兴高科技企业开辟了融资渠道。

1999 年年底，香港经济终于走出谷底。2000 年，香港经济增幅高达 10.5%，是 13 年来香港的最高增长率，也是亚洲乃至全球的最大增幅。

在起伏动荡的局势面前，一些香港媒体对特区政府表示出不信任；但也有一些媒体给予了董建华政府强大的支持，《大公报》便是其中一员。例如，1998 年 8 月中旬，特区政府为了保卫港元、整顿市场，毅然决定入市。《大公报》于 8 月 15 日，以头版整版篇幅报道了政府入市的新闻。红色的《董建华誓言：痛击炒家》的头条标题，既表明了香港政府打击索罗斯等国际炒家的决心，也表明了《大公报》对于政府行动的支持。该版所发《经济研究员指出，政府入市可以理解》的文章，以及《港股昨劲升 564 点》的消息，也都给予政府入市行动以正面的支持。

除了以新闻报道的方式为政府与市民打气外，它还做出了更富有建设性的举措。

1997 年 11 月 21 日，《大公报》举办座谈会，主题为：“香港从金融风暴中吸取到的教训”，出席座谈会的有金融、工商与学术界的人士，与会者对香港金融风暴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并积极为金融业的复苏献计献策。

1999年7月，金融风暴即将过去，但其给人们心理留下的阴影尚未消散。如何认识金融风暴的影响，如何看待香港经济的前途？《大公报》及时发表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饶余庆的文章《亚洲金融危机与香港经济》，指出“有人慨叹香港的繁荣可能一去不返。然而如果我们深刻地反思的话，便会发觉亚洲风暴前香港的繁荣，其实含有很浓的泡沫色彩，这种畸形繁荣，隐藏着无穷的后患。现在乘亚洲风暴将泡沫消除，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和改革，长远而论，未始并非香港之福”。

1997年的香港不仅遭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还遭遇了一场不期而至的禽流感，几名香港市民染上此症，其中4人死亡。12月14日，位于长沙湾的临时家禽批发市场不得不自发停业三天，进行大规模清洗消毒，但仍无济于事，特区政府无奈只好下令将全部鸡只宰杀销毁，以避免更严重的后果，为此政府约需赔偿4000多万港币。这给金融风暴阴影下的香港又蒙上新的阴云。

这样的形势，动摇了一些人对特区政府的信心。但《大公报》一如既往地支持特区的工作。在1997年12月31日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大公报》发表了题为《理智的港人 负责的政府》的社评，分析了一年来港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信心大增的形势，同时指出：“总的说来，特区政府施政半年来，赢得了中央的信任和港人的信心。一个政府像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没有偏差，所以要经常接受监督和批评。但是又应当区分正当的批评与恶意的攻击。像东亚金融风暴和禽流感，都是人们事先所难以预见的，其发生与扩展有一个过程，要经过实际观察才可能完全掌握本质；而做出相应对策又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宁可慎重一些。例如，毁灭鸡只要使广大鸡农、鸡贩蒙受损失，但是到了认清楚这是关乎居民健康的重大问题，就不得不做出决定。对处事的方式方法，可以检讨和吸取经验教训，也应该充分肯定成绩。可喜的是，回归半年来，尽管一再发生了不可预计的横逆，港人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大家是理智对待，而特区政府正切实地履行责任。”

在动荡的局势里，媒体理智的态度，中允的评论，对于特区政

府和香港市民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大公报》便是以比为目标，并且是身体力行的。

2000年10月，董建华赴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一些香港传媒将之视为“挺董连任”、“钦点”，造成舆论上的混乱。《大公报》于10月31日针对此现象发表文章，以正视听：

董建华此行，是向中央述职。董特首要向中央汇报香港当前经济复苏、失业纾缓以及第四份施政报告受到广泛好评的情况，同时亦要就当前国家即将加入世贸、西部大开发对香港带来的商机多作了解，提出一些要求及设想。

作为中央领导人，对香港回归三年以来，在董建华领导下的特区政府，坚持依照基本法施政、全面落实“一国两制”，有效推动复苏，保持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中央对此是感到高兴和满意的。

在新华社发出的会面谈话报道中，江泽民主席高度评价了香港回归三年以来各方面的成绩，而且十分强调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对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呼吁港人要珍惜稳定的局面，要支持特首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充分反映了中央对香港、对港人一贯关怀、支持的一番善意和盛意。当然其中也包括了董特首政绩的肯定。

但是，一些传媒记者，述职不问，施政不问、“入世”不问，却只知在“连任”的问题上“穷追猛打”，而且设定“答案”，一个劲地呼喊“支持不支持”，最后还公然喊出了“钦点”这一歪曲、恶意的词句。作为港人一分子、作为负有大众传播社会职责的传媒记者，如此不知自爱、自重，不关心香港稳定大局，不关心国家发展前景，只想“套取”片言只语大做新闻、试想，怎能不令国家领导人着急、心痛以至火冒三丈？

2001年下半年，特区第一届政府任期将满，新的行政长官选举在即，但香港社会出现了“反董连任”的声音。

《大公报》在“大公论坛”上发表了《社会气氛期望共渡难关‘反董连任’与此格格不入》的文章，指出：“在经济低迷，市民期

望政府与民同艰，共渡难关的时候，以前线、社会民主论坛、民主党为首的一些极端民主派分子，欲组成一个反董连任大联盟，恶意贬低、诋毁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这种惟恐天下不乱，激化矛盾，制造社会分化，损害政府管治权威，有破坏、有建设的做法，同当前官民要和舟共济，走出困境的社会气氛格格不入，是极不得人心的。”^①

文章还指出“反董连任大联盟”不满意董建华，完全可以自己去报名，依法参选，挑战董建华，不能因为自己无胜算，就唱衰董建华。而八百名选委会成员都是公开由选举产生出来的，有广泛的代表性。文章还以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例子，说明目前的经济困难，同有否普选行政长官无关，更不是立即普选行政长官，问题就能即时解决。

2001年10月10日，董建华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香港报纸纷纷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公报》的社评说，在当前经济困境交迫、各方期盼殷切的情况下，行政长官董建华没有哗众取宠、大洒金钱，也没有因循守旧、谨小慎微，而是非常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针对当前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长短期的“宽减免”政策及巩固本港既有优势和实力的有效措施，既满足、回应了各阶层市民、行业所提减轻眼前困难的诉求，也引导大家朝向一个更长远、更广阔的方向思考和努力。

2002年2月28日，董建华获得714位香港选举委员的提名支持，自动当选第二任行政长官，而后又组成了新班子，公开了特区政府推行“高官问责制”的方案及构思。问责制设立三司十一局精简机构，明确了权责。市民与媒体对问责制抱有很高的期望，《成报》社论认为，董特首委任了新班子，贯彻他的理念，这个时刻更要发挥领袖才能，凝聚三司十一局对公务员系统的有效领导，新班子要利用好3个月的磨合期，满足市民耳目一新、求变进取的宿愿。《星岛日报》将问责制新班子比喻为“董教练”组成的球队，

^① 载《大公报》，2001-12-04。

认为今次组队成功，总算走好了第一步，未来的日子要解决新旧队员的磨合问题。可以说，舆论的希望也给新班子以很大压力。此时《大公报》发表社论呼吁：广大市民也必须给予问责局长们以充分的时间去改进、调适，要乐于支持政府的一切改革措施，以主人翁的心态来支持自己的政府，更好落实“港人治港”。

2001年6月13日，董建华在出席《大公报》百年报庆活动“世界报业发展论坛”的开幕礼致辞时说：“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大公报》扮演了重要而难以取代的角色：它使得我们在香港心向祖国，团结拥护和支持特区政府，与特区政府一起同心同力，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这番评价《大公报》在1997年之前作用的话，也同样适合于1997年以后的《大公报》。

二、为西部开发鼓与呼

在香港回归以前，《大公报》主要是扮演了香港与内地间的桥梁的作用，是一个沟通者。而1997年以后，《大公报》在内地的报道中，增加了更多的建设性。在这其中，关于西部的报道是《大公报》的一大特色。

《大公报》对于西部地区的关注，其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1年12月18日，面对“九一八”后的严峻局面，《大公报》指出：“中国对日必然举国一致为长期的抗争，此即努力一切准备之际，尤其应加紧努力开发西北之时也。”^①这篇社评还发出呼吁：“愿大声疾呼，请全国国民，从此一致注意西北之经营，有财者筹财，有力者输力。”

从这时开始，《大公报》为开发西北提出了各种有益的建议，如修建铁路公路，发展水利交通、禁止鸦片摊派，改革行政，废除苛捐、培养人才等。

1935年，作为《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范长江，历时10个月，对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内蒙等地进行考察，以系列通讯的方

^① 贾晓慧：《〈大公报〉的西北情结》，载《大公报》，2002-01-27。

式向《大公报》的读者介绍西部，特别向读者介绍了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的情况。“西北行”成就了范长江，《大公报》的西部情缘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00年初，中国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吸引了众多投资者与开发者的目光，《大公报》也以一个更积极的参与者的姿态投入了西部的开发宣传中。

2000年2月25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西部开发 意义重大》的社评，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关系到新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因此，加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意义重大。”

5月下旬，香港特别行政区派出了一个层次高、规模大的代表团去西部考察访问。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大公报》就发表社评《认识西部 考察西部 开发西部》，文章力陈香港参与西部开发的益处，说明促进西部开发当前正是大好时机。在代表团经过10多天的考察返港之际，《大公报》又以头条报道了西部访问团圆满成功返港的消息。

2000年7月初，《大公报》决定开辟《西部专刊》。8月25日，在《中国西部》专刊创刊的同时，《大公报》派出的一行20多人的采访队伍，从钱其琛副总理的手中接过了队旗，开始了新的西部行，标志着《大公报》与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西部民族地区纪行”拉开了序幕。

采访队分三路向西部进发。第一队的路线为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第二队的路线为内蒙古、陕西、重庆、贵州；第三队的路线为西藏、四川、云南、广西。在历时40多天的采访中，三队记者发回大量的文字与图片，《大公报》利用《中国西部》专刊和特辟的“西部民族地区纪行”专版刊登这些报道，平均每天发稿量约为一整版。

采访活动结束后，记者对采访中收集的材料进行了分析整理，从西部地区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观念转变、基础设施建设等多

方面，对西部开发的一些深层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撰写了《西部归来话西部》的系列专题文章。

2001年，在香港报业公会举办的2000年度评选中，《大公报》的《西部归来话西部》系列中的6篇专题报道，夺得了“2000年香港最佳新闻奖”，包括“最佳特写新闻”的冠军奖和“香港最佳新闻”的最高荣誉奖“写作与版面设计全年大奖”。这6篇新闻是《从遵义到延安，从封闭到开放》、《藏医药成西藏开发支柱产业》、《藏滇桂条件不同观念有异》、《山川秀美何时》、《要想富，先修路》及《最怀念私企业主的奋斗故事》。

担任写作与版面设计组评审委员会主席评判的查良镛（金庸）先生，在宣布得奖者时说：“我知道《大公报》派了21人去西部，历尽辛苦，写出的文章可以说代表香港新闻写作的最高水平。”

香港报业公会主席李祖泽在致辞中说，2000年香港最佳新闻奖的佳绩，再次显示香港新闻工作者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他还指出，香港报业的经营环境比较复杂，比较困难，竞争激烈。作为报业经营者，除了必须具备经济实力，还需要提高报业的公信力。只有不断提高报纸的质量，进一步取得读者的信任和支持，才能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最佳新闻评选不仅是业内自我提高与自我增值的需要，同时可以通过优秀的作品，让社会各界对报业有更深的认识。

这番话，是对业界的期望，也是对《大公报》的鼓励。“西部民族地区纪行”的成功，为《西部专版》的发展开了个好头。

三、为改革大潮推波助澜

在《大公报》的读者中，工商界人士占多数，经济报道毫无疑问是《大公报》的重头戏。回归以后，《大公报》在沟通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信息，促进两地的经济合作方面，也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在近年的经济报道中，《大公报》一方面顺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适应媒体的“专业化”、“窄播化”的趋势，推出了一

系列富有时代气息的专版、专栏，并积极组织与参与与专版相关的各种主题的研讨。

《中国民企》的推出，正是顺应形势发展的结果。私人企业或民营企业，在中国内地，过去一直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但是2001年7月1日江泽民主席的“七一”讲话，赋予了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堂堂正正的地位。这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的环境，由此，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也将日益增强。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大公报》敏感地意识到，民营企业的经营问题将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于是，在7月3日，推出了《中国民企》专版。《大公报》在这一专版的创刊辞中指出：“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在《中国民企》创刊号上，刊登了《大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的文章，文章从七个方面说明了民营企业发展的意义：其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其三，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建设投资增长的重要来源。其四，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安置就业的重要渠道；其五，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其六，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发展高新技术的重要主力军；其七，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西部大开发不可忽视的力量。经叔平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作用的条分缕析，为读者正确认识民营企业提供了有用的指导。

2002年1月8日，《大公报》又与全国工商联和香港五大商会联合主办“中国民营企业发展（香港）论坛”。港澳内地和东南亚地区的300多名人士参加了论坛。在论坛开幕式上，《大公报》社长王国华说，希望通过这次论坛，也通过《中国民企》专刊，为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宣传和交流的平台，为迅速成长的民营企业企业家走向国际市场架起一座桥梁。

“物流与航运版”也是《大公报》一个较有特色的专版，它是

在《大公报》原航运版基础上发展而来。

航运信息一直是香港报纸的一个特色。香港的第一家中文日报《中外新报》，其前身便是《香港船头货价纸》，改为日报后，仍随报附送一张货价船期的行情纸。可见，香港的报业与航运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物流业在香港经济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香港物流业刚处于萌芽阶段，整个组织结构、形态、格局离定型距离尚远，与日本、新加坡相比更是不可相提并论。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事实上，香港搞物流业，条件不差，甚至基础设施比邻近地区还要优越，之所以未能形成一种风气或成行成市，其中一大原因是企业很想知道政府对该行业的态度和意见，大家希望政府站出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如何去做。为了促进政府与物流企业之间的沟通，促进香港物流业迎头赶上，《大公报》在航运版基础上，开出“物流与航运”版，提供物流信息服务，并表示，作为媒体要为物流业敲锣打鼓。

专版推出后，一些协会和团体负责人给报社去电，肯定版而革新的成绩，并要求特别提供新版专辑，例如，香港物资流通协会索取200份专辑，以便邮寄该会会员阅读。

2002年1月，《大公报》又参与主办了“内地与香港物流及航运合作发展研讨会”。

“中华医药”专版的创办，同样具有战略意义上的考虑。

2001年6月22日开始正式创立的“中华医药”版，每周一至周五刊出彩色全版、图文并茂，主要报道中医药业发展的新动态、新消息，其主旨为内地、香港、台湾及世界各地中医药界、教育和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提供一个公开园地。

这个专版开办之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为它题词：“宏展国粹”。

对于“宏展国粹”的理解，《大公报》有它的经济视角。它曾经发表过一篇《中医药是经济转型的最佳选择》的社评，为香港“国际中医药中心”的设立呐喊助威，指出，发展国际中医药中心，对推动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莫大的裨益。首先，发展国际中医

药中心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本港经济急剧地进入调整期，过去本港过分偏重房地产业和金融服务业的经济结构弱点暴露无遗。在现实面前，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发展高科技和高增值产业，才是香港经济复甦和振兴的惟一出路。而“中医药中心”十分切合高科技和高增值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发挥两地各自优势，而且比较环保，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最佳选择。

这篇评论不仅指出了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也为《大公报》开办“中华医药”专版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2002年4月14日，香港《大公报》“中国汽车”专版隆重推出。这个专版，由《大公报》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共同主办，主要是向海内外介绍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状况和中国汽车生产企业的经营状况，以促进和增强汽车行业国际间的了解与合作，为中国汽车工业在国际市场创造有利的环境，建立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汽车工业状况的窗口。它以中国汽车行业纵深分析为主，作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宣传的惟一出口，对中国汽车行业的政策法规及行业动态做最准确、最及时的发布，针对中国汽车行业所发生和存在的事件或问题做深入的报道。

“中国汽车”专版的推出，其背景是人世后中国汽车业迅猛的发展态势。中国大型的汽车生产企业基本上正走向国际化合作的发展道路，国际上几乎所有的大型生产企业都进入了中国市场。汽车业在国际资本和高新技术、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国内国际市场等方面的信息需求也与日俱增。《大公报》的特殊地理优势，以及经济报道上的雄厚实力，为它充当这样一个重要窗口提供了基础。

1997年以来，《大公报》还创办了“消费新风”、“收藏天地”、“经济观察家”、“创业板”、“创新科技”等专版，增扩了“资讯科技”版而，经济大报的特色通过这些专版的开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与此同时，《大公报》还以报纸为桥梁，积极推进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往来，如招商引资。

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对于这件将对未来的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很多人认识并不清醒，有些人盲目乐观，也有人漠不关心。《大公报》在2000年6月21日的要闻专题版刊登了题为《中国“入世”引发的警醒》的文章，指出，中国“入世”的最大风险是既不熟悉WTO规则，又不做准备；在中国政府提出要做好中国人世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时候，不少人对WTO还是似懂非懂，不闻不问，对WTO规则的研究也有待走出误区。文章还指出，中国历经14年入世谈判，但在“大势所趋，大局已定”的现在，不少人对WTO仍停留在一个感性认识上，停留在政治口号、新闻炒作以及利弊分析上，不仅有着不少误区，而且骨子里还透着一股可怕的冷漠。WTO信息查询中心网[www.wtoinfo.net.cn,隶属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收到的在线咨询、来人来电的咨询不少，但大多数是研究机构、民营企业和洋买办。但是，正是最应该关注的、也是入世后面面对冲击最大的政府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却少之又少。“国企经营者至今还以为，届时企业生存如出了问题，会有国家顶着。而个体民营企业则自认为自己‘船小好调头’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冲击”。文章呼吁，谈“入世”不要停留在谈论得失的初级层面上，要加强对WTO基础知识的学习，要熟悉规则、掌握规则，熟练地运用规则，为我所用，趋利避害。6月27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陈锦华在《经济动态》第485期上批示：“请《企业报》阅《大公报》的文章，确实需要对麻木不仁的企业大声疾呼，要来点真正有相当刺激的报导和文章。”

2000年6月22日，《大公报》98周年纪念活动中，《大公报》与中山大学港澳与珠三角研究中心及岭南学院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中国人世贸粤港经贸合作关系前瞻研讨会”，总编辑杨祖坤与总经理冯仲良都参加了会议。参与研讨的代表一致认为，入世将为粤港的经贸合作提供更大的空间，而两地的合作，也能更好地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家对港澳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设想也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2001年11月10日，历时15年中国艰难的人世旅途终于画上

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大公报》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中，以《十五年努力终成功 中国人世》为标题，概括了中国人世的艰辛历程。《中国“入世”影响深远》的社评，对中国人世的意义做了如下总结：中国“入世”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需要，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需要。“入世”将大大增强中国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国际经济事务方面的发言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入世”后，中国可在世贸组织成员提供的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下进行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获得与其他成员一样的平等政策，并积极实施“走出去”策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但同时，《大公报》社评也指出，有权利必定有义务，凡事有利有弊。要化弊为利，把潜在的机遇变成现实，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

这种清醒的认识，对于提醒人们全面认识入世所带来的影响，是大有裨益的。

四、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

在《大公报》的台湾事务报道中，一个持之以恒的主题是反对台独。1997年以后，台湾领导人的台独言论日益猖獗，《大公报》也不断把握两岸关系问题上的新动向，特别是针对台湾当局的新花招，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主张。

1999年7月28日，针对李登辉改变策略，放出“‘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只是口头上的宣示，不会有行动的配合，台湾的大陆政策没有任何变化，仍要推动‘两岸关系以对等的关系进行对话与协商’”这样的言论烟雾弹，《大公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指出既然李登辉的狐狸尾巴已被抓住，人们绝不会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只要李登辉不停止分裂活动，彻底放弃“两国论”，明确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来，中国人民就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坚持同分裂活动做斗争，直至实现祖国统一。

2000年3月18日台湾领导人选举结果将于当晚揭晓,《大公报》未雨绸缪,发表社评,指出台海局势和两岸关系走向取决于这次选举的结果。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无论谁当选都必须尽快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来,展开两岸政治谈判,充分交换意见,最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如果有人执迷不悟搞“台独”、闹分裂,破坏祖国统一,那么,中国人民将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社论还指出,为顺应台湾人民求安定、期盼两岸关系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愿望,这次竞选的各组候选人都提出了改善两岸关系的主张,例如,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建立两岸和平与协商管道、加强双方互访和建立对话机制、实现“三通”扩大经贸往来等。但这些主张都缺少一个大前提,这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三组主要候选人依然没有与李登辉的“两国论”划清界线,真正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主张就变成了空中楼阁、水中月。陈水扁更是叫嚣“台湾未来的领导者,有义务、使命捍卫台湾主权,不能成为香港、澳门第二。”他要维持台湾“主权”永远确保,“不要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台独”主张只会将两岸拖向战争的深渊。

事实证明,陈水扁上台后,其台独立场与李登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大公报》又继续开始了讨伐陈水扁台独立场的斗争。

2000年3月22日,大公报社发表社评《“一个中国”有何可议》:

日前,陈水扁公开表示:“一个中国”作为一个“议题”,他愿意什么什么。言下之意,似乎在为两岸紧张关系缓和出力。

不,阿扁在玩文字游戏,仍然未改其“台独”立场。

2月22日,中国政府在对台《白皮书》中,已经郑重宣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在中国人民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不可动摇的事实和法理基础。并从

历史、从国际法中获得确认，绝不能有丝毫的变化。

原则，就是基本立场、观点，不存在议论的问题，更没有协商的余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基石，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能实现和平统一。

在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过程中，《大公报》也对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2002年2月25日，《大公报》发表伍源的《布什的承诺与扁当局的幻想》的评论即是一例。这篇评论既指出了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抱着死硬立场的背景之一是美国政府的撑腰，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决的，台湾当局寄希望于美国政府，不会有任何结果。文章援引台湾《中央日报》就布什访华发表的社论，指出，布什虽然只提两岸问题和平解决，而未提和平统一，但这并不表示美国支持“台独”。所以台湾绝不能因为布什一些讲话就“洋洋得意，甚至错估情势”。当局应把思考的重点摆在如何趁此机会，“去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上”。同时文章还援引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明，只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便表示美国的台海政策仍在“既有的框架中”。在大环境的局限下，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选项不多，以目前的局势来看，主动与对岸接触，似乎是一种积极的作为。

《大公报》不仅及时地抓住两岸关系的新动向做文章，也善于提出前瞻性的分析。2001年年初，它发表了《影响今年两岸关系的七件大事》的分析文章，预言了在新的一年里对两岸关系造成重大影响的几件大事，包括：核四之争冷置两岸关系、国民党主席直选将重画台政党版图、4月对台军售会议将预示美国台海政策定位、“申奥”成功将制约对台强硬战略空间、上海APEC会议是两岸官方接触的一次机会、加入WTO的考验近在眼前、年底系列选举结果将决定两岸关系走向。这样指导性很强的文章，对于读者把握时局的走向是十分有益的。而这种宏观的、深入的政治报道，正是《大公报》的强势所在。

总体来看，在反对台独的舆论斗争中，《大公报》的火力密集，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仅在2002年5月至9月，反台独的有关文

章就达 285 篇，这些文章既有社评，又有其他各种形式、各种来源的评论。它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台独分子的各种言行进行剖析批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较强的说明力。

五、是非分明地经论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问题是媒体国际报道的一个重心。香港回归以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几次大的冲突。这对于媒体的新闻报道与时事评论力量，是一个大的考验。而《大公报》的优势，在这样的重大报道面前，也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

1999 年 5 月 8 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在空袭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时，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 3 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暴行引起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强烈愤慨，中国媒体也加入到愤怒声讨的行列。《大公报》自然不例外。

5 月 8 日出版的《大公报》以 3 版多的篇幅，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除了刊登了被炸后大使馆的照片外，还刊登了中国政府最强烈的抗议，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地大学生的愤怒谴责，安理会成员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等各方面文章。同时，发表了专栏作家马玲的述评《中美之间下一步会怎么样》，就该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评论。

5 月 9 日，《大公报》发表《侵略暴行 令人发指》的社评，指出：“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国际关系准则，也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肆意践踏。”社评还指出，北约出兵南联盟的理由是“人权高于主权”，其要害是否定国家主权，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其首要恶果是破坏了现行的国际关系法准则，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

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发生后，美国和北约方面一再称这是“误炸”，一直不做出诚意的道歉。《大公报》于 5 月 12 日再次发表社评“不能接受没有诚意的‘道歉’”，驳斥了“误炸”等种种托辞。

2001 年 4 月 1 日，美国军用侦察机擅闯我国南海领空，我军军机升空进行侦察监视，竟被美机撞毁，飞行员王伟坠海失踪。事

后，美军机又未经许可闯入陵水机场降落。此事件再次给中美关系蒙上阴影，我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最严正的抗议与交涉。《大公报》在4月2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此事，此后的一连数天，又发表了一系列评论。

2001年4月6日发表的评论《美国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指出，美国军用侦察机在中国南海空域进行间谍活动，撞毁了中国战机并非法在中国领土降落，此事件责任完全在美方。但美国政府对此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意，反而推卸责任，强词夺理，摆出一副霸权主义嘴脸，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美方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并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否则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美国政府承担。国家主席江泽民昨日赴拉美六国访问前表示，他一直惦记着被美国军事侦察机撞毁的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手段继续搜救那位飞行员。这次撞机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美方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做一些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事情，而不是发表颠倒是非、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言论。

评论还说，中方一直采取冷静、克制和负责任的态度处理这一事件。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美方能否以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此事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才是关键。

2001年4月18日，中美在北京就撞机事件举行谈判，《大公报》发表题为《美必须停止侦察飞行》的社论，指出：此次事件完全是美方错误造成的，美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文章进一步指出，此次“撞机事件”，孰是孰非，世人都很清楚。美国侦察机在中国近海的侦察活动，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不仅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做出像样的交代，还应当认真思过，怎样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

在中美冲突中，《大公报》立场坚定，但是对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它又是持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

2000年9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83票对15票的压倒优势通过

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法案，《大公报》在第二天发表了《展望 PNTR 之后的中美关系》的述评，对美方此举进行了肯定。指出，此法案的通过为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结果同时也显示，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全力推行的经济外交政策在美国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面对中国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面对国际经济日益趋向全球化，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势力今后还将可能遇到更加严重的挫折。

但作者也尖锐地指出，80 多位参议员投票支持这一法案绝非出于对中国的好感，而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国会议员们赞成 PNTR 是因为它确保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使中美贸易得到更大发展，同时还可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迅速进入中国市场，防止别国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抢占商机。除了这个经济因素之外，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还希望透过贸易和其他民间往来促进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遵守“规则”、懂得“自律”。

文章还指出，中美贸易目前尽管落后于美国同加拿大、美国同南美洲的双边贸易，但中国输美的大量廉价产品对避免美国出现通货膨胀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会给美国带来新的出口市场，有利于美国企业保持较高的利润额，对美国的跨国公司和投资者至关重要。这些重要因素令很多国会议员认清了大局，对 PNTR 投下支持的一票。但围绕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同外国的军事交往，中国国防实力的增长以及潜藏危机的台湾问题，美国国会内的一部分议员还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下一届政府施加压力，给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制造新的障碍。

2002 年 2 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华，《大公报》发表题为《世界关注布什访华》的社评，认为，“9·11 事件”之后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发生微妙变化。美国政府看到，美中之间虽然存有矛盾和分歧，但双方同时存在超越分歧的重要的共同利益。布什今次访华，中美首脑将深入探讨和具体充实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框架的内容，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1年9月11日，几名恐怖分子在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后，分别对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和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进行了大规模袭击，造成几千名平民丧生、世贸大厦倒塌等极为严重的破坏。世界舆论纷纷谴责这一恐怖主义行为。

《大公报》在《强烈谴责国际恐怖主义》的社评中说，从昨晚连串袭击爆炸事件分析，相信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组织严密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动。这一事件将对美国和全世界造成全面、长久和深远的影响。社评同时指出，迹象显示恐怖袭击的制造者与中东海湾地区有关。这次事件表明，美国确需检讨其外交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

9月20日，《大公报》又发表评论，对中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立场表示赞赏，指出：“美国遭遇恐怖分子袭击，全球震撼；美国布什总统誓言要不惜一切代价擒拿凶手，人马紧急调动，准备大打一场‘报复之战’；一些西方国家纷纷附和，表示要站到美国一边；中东多个伊斯兰国家面临美国大军压境的威胁，一些政府愿效犬马之劳，而民众则反美情绪高涨，怒火中烧。一时间，全球陷入一片纷纷扰扰，紧张局势如箭在弦，人类世界正面临更大的分歧、对立和杀戮……就在此闹哄哄不可收拾的局面中，中国发出的声明和各项主张，仿如一声雄吼，又如一缕清音，在乱局中足以发聋振聩，令人霍然清醒、瞿然深思。中国立场、原则的坚定，处事态度的公正、宽宏，愿意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站在一起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人民利益的决心和诚意，中国不会对世界和平、别国安全构成威胁，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日趋成熟、稳定的表现以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于此都具见无遗。”

在之后的报道中，《大公报》没有像多数香港报纸那样，全盘转载美国媒体的报道，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特约专家、评论员力量，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在其中，既有军事专家的分析，又有政治学者的评说，既有国际关系分析员的阐述，也有国外媒体的报道，包括一些非主流媒体的报道。《大公报》的驻外记者、内地记者，也发挥各自的特长，进行采访，组织

报道。这种客观、平实的报道风格，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

在“9·11事件”过去之后，《大公报》仍然关注着它的长期影响。2002年1月24日，《大公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小律的文章《9·11事件对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预测了“9·11事件”的几个长远影响。文章指出：第一，弱势民族或其他类似的集团和势力，要在世界上通过“国际社会”不被允许的暴力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尤其是争取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等企图，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第二，冷战后格局由此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国际安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恐怖主义，而不是其他的意识形态；第三，美国成为世界准一超级大国后，又终于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在世界任何地区合法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第四，美国的单边主义越来越厉害，面临其强大压力的国家和集团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有效地制衡美国的力量；第五，“9·11事件”也表明，中美关系对我国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不仅在经贸方面对我国经济有重要影响，在整个外交的形势上也是如此，所以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也应该十分慎重，并且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这篇文章，由于有了几个月观察与思考的积淀，显得更加中肯，更有分量。

《大公报》在中美关系方面全面、深刻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也常常成为了媒体转载、援引的对象。

六、见证喜庆的历史时刻

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以来，中国又经历几次大的历史喜事。《大公报》与其他媒体一道，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把这些喜庆时刻收藏在报纸这部活的历史中。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大公报》热情洋溢地报道了这个与香港回归具有同样历史意义的事件。在《热烈祝贺回归 港澳共同繁荣》的社评中，作者说到：这一重要时刻，不仅象征着澳门新时代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彻底结束……澳门、香港的先后失落，是当年

中华民族走向衰颓的开始；今天，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正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有力见证。作者同时告诫人们，必须牢记，当年港澳是怎样失落，今天又是怎样回来的，更重要的是决不会再让一分一寸的土地失去……中国人民包括全体港人、澳人，都必须极其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局面，都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安定团结，努力发展四化、建设国家，以团结、振奋的精神面貌迈向 21 世纪。

2000 年 1 月 1 日，是新千年、新世纪的开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日子。在辞旧迎新之际，《大公报》特别策划了千禧年专刊。纪念专刊共 24 版，分别以《香江庆千禧》、《神州庆千禧》、《寰宇庆千禧》等专版，来展示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香江世纪回眸》专栏，还回顾了香港的百年大事，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在《十万人快活谷倒数迎千禧》的新闻中，作者在记录了香港特区政府在跑马地举行的盛大活动之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都说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经历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经历了一个新的世纪，跨越一个新的千年……600 万市民，在经历金融风暴的冲击，以及摆脱经济困境之后，终于展露笑颜。如今，在特区政府领导下，正朝着一个健康的轨道迈进。”

2001 年 7 月 13 日，中国成功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举办权。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内地与香港媒体都大张旗鼓地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事件。《大公报》也发表了数篇评论。

《热烈祝贺北京申奥成功》的社评，阐述了“体育精神压倒政治歧视”的主题：

北京申办成功，确实得来不易。国际上强调的是体育不涉政治，但事实是体育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政治。旧中国体育事业的落后、人民的被识为“东亚病夫”，都是政治、国力上长期积弱的后果；新中国成立，直到一九八零年才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一九八四年射击选手许海峰才拿到中国历史上第一面奥运金牌。直到此次申办，“中国人权纪录不良”一直挂在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口边，……这一切，使北京申奥比任何别的一个城市都要面对加倍的、更大的困难。但公道自在人心，中国这些年来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包括人权状况的事实得到了有目共睹的认可，中国已跃居奥运金牌第三强的事实更不容抹杀。结果，正义战胜邪恶，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压倒了出于私利偏见的政治歧视，北京成功获得了主办权。^①

专栏作家马玲在《申奥成功意味着中国大时代的到来》说道：“莫斯科的投票结果刚刚出来，纽约开盘的股市上中国概念便一路攀升。北京宣布，二零零五年前将投资1800亿元用于综合开发建设，境内境外的投资者都在蓄势待发。北京的一发自然会牵动全国，其牵动的意义不仅是向北京以外的人员开放投资和就业机会，更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影响……发展到今天这个关口的中国，正是最需要一个大题材助推之时。眼下的中国，有内忧也有外忧，亦有种种难解的社会矛盾存在，国家的重心和国人的心气都需要一个大方向的导引。就在此时，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成就了中國坚定不移、万众一心追求的大目标。”^②

《大公报》另一篇评论则说明了申奥成功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指出，北京主办奥运对经济、政治以及两岸人民的融合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文章从“‘一国两制’支持度大增”、“台商们看好庞大商机”、“台商支持北京办奥运”、“沉重打击‘台独’势力”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此观点。

2001年10月7日，中国足球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以一比零战胜阿曼队，获得了进军世界杯决赛圈的资格。这是中国足球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10月8日，《大公报》浓墨重彩地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名为“世纪梦圆”的专刊中，“世界杯，我们来了”几个大字表现了欢庆自豪的主题，一张表现欣喜若狂的球迷的照片占据了版面的三分之二，上面叠印着米卢与中国队球员的比赛照

① 载《大公报》，2001-07-14。

② 载《大公报》，2001-07-16。

片。专刊还以“历史上最好的中国队”为题，详细介绍了中国足球队阵容及主要球员与教练。在“中国足球梦终圆”的社评中，总结了中国队胜利的三大经验：即：团结拼搏的精神、开放政策的坚持落实、广大球迷的忠心和热情。

1997年以后的《大公报》，面临新的形势，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实现方式。但是，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百年《大公报》的传统。

HONGKONG BAINIANSHI

第二节 激流勇进 奋发图强

一、传媒生态，山重水复

香港虽然是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城市，但是却拥有70余种报纸，其中有10种以上的综合性报纸，每天的总发行量在200万份以上。香港报业的竞争局势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报业大战的烽烟一起再起，从经营方面看，《大公报》的压力是巨大的。

(一) 变数多多的传媒格局

1995年12月和1997年5月，香港爆发两场报业降价浪潮，减价战使香港报业形势发生巨变。几乎所有的香港中文报纸都被卷入这两场大混战中，各家报纸先是竞相降低零售价，接着又开始减低广告价。剧烈的动荡，造成不断的报纸倒闭。《电视日报》、《香港联合报》、《快报》、《华侨日报》先后被淘汰出局。

1997年的金融危机，不仅给香港的经济带来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也对香港的报业经营形成了一定冲击，广告、发行都面临了很大的困境。1998至1999财政年度，所有上市的中文印刷传媒都出现亏损，就连一向业绩不错的东方报业也不例外，截至1999年3月底全年亏损1.38亿元，是1987年以来的首次亏损。

1997年以后，第一个停刊的是《快报》，这家曾在1995年报业价格大战中不得不停刊的报纸，在1996年复出后，又遭遇金融

风暴，不得不在1998年3月15日的头版登出声明，宣布再度停刊。

1999年，创刊于1938年的《星岛日报》易主，由Lazard亚洲基金接管。

《星岛日报》是原“万金油大王”星岛集团老板胡文虎传媒王国的王牌。1953年，女儿胡仙接位。星岛报系从60年代开始，势力范围从亚洲扩展到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的华人社区。1995年，《星岛日报》还推出香港第一份电子日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两次价格大战引发香港报业市场的白热化竞争，与此同时，胡仙扩张过速，星岛集团背上沉重的债务，1999年初，胡仙面临破产，多家买主争购《星岛日报》控股权，最终，Lazard亚洲基金夺得《星岛日报》51%的股权。

2001年1月8日，香港烟草大王何柱国旗下的香港泛华科技以每股1.65港元的价格，收购由Lazard亚洲基金持有51%股份的《星岛日报》，后进一步增持到75%的股权，总花费约为7亿港元。《星岛日报》再次易主。

2000年12月1日，具有61年历史、一直由何文法家族掌控的《成报》宣布易手，香港中策集团和东方魅力公司收购其所有股权。香港舆论指出，昔日的报坛老大哥今日黯然转手，显示香港中文报业之间的竞争正趋于白热化。

《成报》在香港曾经有一段非常辉煌的日子。有老报人说：“在60年代，香港有一半市民看《成报》！”1939年5月1日，商人何文法在香港创办《成报》。面世之初，该报每天只出一大张，内容以副刊和娱乐资讯为主。创刊仅半年，《成报》销量便跃居全港第一，赢利可观。由于扎实的风格，《成报》创刊前36年，销量一路快速飙升，每年均稳占香港报纸销量榜首位。在其25周年纪念会上，《成报》宣称其每日销量超过13万份。

随着《东方日报》诞生，《成报》的地位开始受到威胁。1977年，《东方日报》销量明显超过《成报》。《成报》被迫进行革新，结果在80年代回光返照，继续保持着行内地位。但是，进入90年

代后，香港报业竞争加剧，《成报》地位开始受到威胁，特别是《苹果日报》掀起恶性减价风后，香港报业陷入混战，《成报》销路逐渐走下坡路。

一些关注香港报业发展的学者认为，由家族经营的香港报刊生意走下坡路，与家族生意运作“不够开放”的先天性弱点有关。就《成报》而言，80年代以来，基本没有什么转变，形象“老化”，不仅不能吸引青年读者，老读者也随着年月推移而“自然流失”。据熟悉《成报》内部运作的人士透露，《成报》的编采流程还没有全部电脑化。

《成报》新老板陈国强，时年只有45岁，他精于投资，收购之后再重新包装，高价推出上市是他惯用的手段，被称为香港商界的奇才。在“新经济”席卷而来的香港股市科技热潮中，陈国强是风云人物。被香港股民誉为股坛“金手指”。除了《成报》，他还经营着影视娱乐方面的公司“东方魅力”及“东魅网”，“东方魅力”有数百位签约艺人，实力、名气都与竞争对手香港“英皇娱乐”旗鼓相当，著名演员成龙是其执行董事。陈国强的意图很明显，他要建一个跨越印刷媒体、影视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新型“传媒王国”。这种跨媒体的传媒王国对一些单打独斗的报纸，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2001年2月20日，创刊仅5个月的《公正报》暂时停刊。《公正报》前身为香港报业史上著名的《天天日报》，有40年历史的《天天日报》于2000年9月因版权官司问题而停刊，它的主办者电宇集团于2000年9月创立《公正报》，在短短5个月的过程中，《公正报》两度裁员，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关张的命运。

在报业市场的动荡中，《大公报》也不能幸免。1997年7月27日，香港的最后一份晚报——《新晚报》出版其最后一期，宣布停刊，而这家晚报正属于《大公报》。1950年10月5日创刊的这家晚报，在其《停刊启事》中称：“近来，由于市场的变化及资讯手段的发展，晚报市场逐渐萎缩，本港晚报普遍经营困难，其他晚报先后停刊，《新晚报》成为仅存的一家晚报。在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本报采取多种措施，以改善经营，但经济上的困难短期内料难

根本解决。因此，董事会决定，自1997年7月27日停刊。”

《新晚报》在香港曾经盛极一时，这与人们的旧有生活习惯有关。旧时人们往来港九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轮渡，在坐轮渡的这20分钟里，看晚报是最合适的。《新晚报》曾经有过一幅宣传广告，描绘的是一只过海的小渡轮，轮船中的一百多人，人手一张《新晚报》。^①

《新晚报》的历史贡献，还可以从许多名人与它的关系中得到印证。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在《新晚报》副刊上开设“下午茶座”，主要是撰写影评。而梁羽生也是在《新晚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并由此声名大振。

但是，随着地铁取代过海轮渡，以及电视的冲击，晚报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作为香港最后一家晚报，《新晚报》也没能逃脱停刊的命运。从《大公报》方面看，停办《新晚报》也意味着可以将更多的力量放到《大公报》上。

（二）两极的碰撞与调和

香港的报纸历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大众化报纸与严肃报纸，或称大众报纸与精英报纸。也有人称为纯市场报纸和负有使命的报纸。^②

表11—1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苏钥机在2001年对香港传媒工作者进行的调查中“受众取向”指标调查结果，这一调查对象是20家新闻机构的员工，共收回722份问卷，回收率为62%，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受众取向指标体现了报纸的读者定位。受众取向得分高，则为精英报纸，反之为大众报纸。^③

^① 参见杨鲁：《新晚报何以停刊》，载《大公报小故事》，313页，香港，香港大公报出版有限公司，2002。

^② 参见余振鹏：《资讯娱乐化：蜕变中的香港读者》，<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mc9703/narr4.html>。

^③ 参见苏钥机：《2001香港传媒生态：由新闻工作者问卷说起》，<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mc110102.html>。

表 11—1 香港报纸的受众取向调查

报纸名称	受众取向
经济日报	7.03
信报	6.96
南华早报	6.61
大公报	6.43
文汇报	6.25
明报	6.15
香港商报	5.95
HkiMai	5.95
香港电台	5.85
星岛日报	5.84
新城电台	5.79
成报	5.75
无线电视	5.57
亚洲电视	5.48
有线电视	5.12
商业电台	5.09
太阳报	5.05
新报	5.04
苹果日报	4.78
东方日报	4.44

香港市场研究社副研究董事余振鹏指出，近年来香港报业的两极化分化正在加剧，两类报纸在各方面都有明显区别：大众化报纸侧重社会性新闻，并讲求事件的震撼性，而严肃报纸在选材方面以事件与民生的关系为前提，注重报道质量；在报道手法上，煽情、夸张、戏剧化的表达是大众化报纸的特色，而严肃报纸报道取向平实自然，毫无夸张失实；在标题上，大众化报刊喜用夸张渲染字眼，而严肃报纸采用平实直叙标题；在图片上，前者爱用近距而逼真的拍摄手法，且经常出现暴力与血腥镜头，后者图片以清晰作为标准，在选择上考虑读者及当事人的感受；在副刊方面，前者多提供实用的“小手册”等内容，用字极少而图片极多，而后者着重品味及启发性；在报纸包装上，大众化报纸抢眼鲜艳，趋向杂志化，严肃报纸则采用和谐的色调，给人以优雅之感。从功能上看，大众化报纸能充分满足读者的八卦心理，娱乐功能强，满足不同阶层读者，而严肃报纸担当着“精神食粮”的作用，其读者多为中产阶

级、专业或教育界，以及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士。两类报纸的读报习惯也有不同，大众化报纸的读者多利用余暇读报，是一种休闲活动，而严肃报纸的读者阅读时态度更为严肃，花的时间也更多。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台长、香港报业评议会执行委员张圭阳则认为^①，香港的报业，传统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小报，不讲理念的，读者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完全商业化、商品化，只讲赚钱，报纸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另一个极端是大报，是以政治为主体，有一个既定的目标。这两种极端的报纸，占了报业市场的绝大部分。在1995年《苹果日报》创刊之前，办报的人是很明确的，自己办的是大报还是小报，方向很清楚，立场不会混淆。办大报的，从新闻到副刊，都是大报的风格。小报，也同样如此，不会有大报的风格。可是，《苹果日报》创刊以后，打破了大报和小报的分界，模糊了分界线。《苹果日报》的做法，引来许多报纸的效仿，其中也不乏大报，也出现了“大报‘小报化’”的变化，一些报纸希望自己的每一版都会吸引不同的读者，所以可能出现“精神分裂”的现象：它的社论很正经，但是多数新闻却是黄色、暴力等，副刊更是乱七八糟，根本就看不下去。互相矛盾的东西，都混合在一起。因此，他认为，《苹果日报》恶化了香港的传媒环境。

虽然两极并存的现象仍然存在，但是《苹果日报》的加入，刺激了香港传媒业的低俗化发展。许多研究者称香港报纸为“煽、色、腥”，这个词是英文 Sensationalism（煽情主义）的音译，又贴切地反映了香港报纸的状态。1998年，香港报业的状况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有责任的香港报人的反思，4家新闻团体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讨之后，草拟了《新闻从业员专业操守守则》，强调了新闻从业人员应以求真、公平、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的态度处理新闻材料、确保报道正确无误，没有断章取义或曲解新闻材料的原意，不致误导大众。若报道失实、误导或歪曲原义，

^① 参见《反省：香港报纸的现状与将来》，<http://www.cc.org.cn/zhoubkan/ren-wuzhuanfang/0101/0102021009.htm>。

应当事人响应，尽快更正。其次，强调了新闻从业人员在处理新闻的时候，尤其是涉及暴力、性罪行、自杀等社会新闻时，应避免淫亵、不雅或煽情。同时要求新闻从业员应尊重个人名誉和私隐，在未经当事人同意，采访及报道其私生活时，应具合理理由，适当处理，避免侵扰个人私隐……

香港特区政府也于2000年5月19日公布多项政策建议，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布咨询，为制定合适的政策做准备。建议包括：引入“定期刊物令”制度，规定含有不雅内容的报章须在每一页印上识别标签（如红色对角线），并不发售给18岁以下青少年；加重条例的罚则，把发布及管有淫亵物品等罪行的最高刑罚增至200万元及监禁3年，而发布不雅物品的最高刑罚也提高至罚款160万元及监禁两年。

媒介自律与法规的改进，对于遏制香港传媒的低俗化趋向，应该是具有一定作用的。这也为严肃报纸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从政治取向上看，香港报纸传统上也有派别之分。在20世纪70年代前，有左派、右派、中立三派之分，80年代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有“亲中（中国政府）”与“亲港（港英政府）”之分，但回归后，政治上的对立的趋势在减少。前文提到的香港中文大学苏钥机在调查的同时还发现，对比1996年的同类调查，香港报章的政治倾向趋向模糊。以10分为最高分计，《苹果日报》被视为最“亲港”，得分6.51，亚洲电视被视为最“亲中”，得分为4.54，最“亲港”与最“亲中”之间相差1.97分。1996年调查的同类相差数字是4.65分。研究者苏钥机的结论为“亲港”与“亲中”之间差别愈来愈小，两种概念不一定互相排斥。

一些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急速下滑，内地经济却持续发展，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北京成功夺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中国足球队取得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资格，都改变了香港社会对内地的整体观感。不少香港人从主观和客观上都认同朱镕基总理所说的“中国经济好，香港经济坏不了”的说法，香港对内地的观感渐趋正面，这种转变充分

反映在香港传媒的报道上。^①

应该说，这样的趋向是一件好事，对于《大公报》来说，尤其如此。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香港传媒的生态环境有“山重水复”的一面，其形势错综复杂。但是，也并非“疑无路”。对于《大公报》来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最重要的还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二、发扬传统，再辟新径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公报》无疑是一份严肃的“大报”，走的是高质量高品位的道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公报》还要不要继承这种传统，保持这种优势和保证自己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2002年6月24日，《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在接受北京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把《大公报》的优势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②：

其一是权威性和真实性。《大公报》作为一份记录历史、见证时代的报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影响。她坚持爱国立场，言论报国，敢于直言，为大众说真话，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爱护，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和权威性。这份忘己无私、爱国爱港的百年老报，以权威性和真实性在报界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是副刊。《大公报》副刊历史由来已久，曾由萧乾等名家主持、发表的大量文学精品使它至今成为众口流传的佳话。今天，《大公报》的副刊仍然享誉海内外，著名的《大公园》专版吸引了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大量读者和作家。作家冯骥才先生曾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作品，首先使他受到了台湾读者的欢迎。

其三是言论。《大公报》的言论堪称办报特色之一。除周日外，

^① 参见杨键兴：《大气候转变下的香港传媒》，载《传媒透视》，2002-04。

^② 参见《大公报对公众有五点吸引力》，载《大公报》，2002-06-24。

《大公报》每天均有社评发表，及时地剖析、评论全球时事，申明立场、发表见解。此外，还有港闻版、经济版等各版言论，各有见地，思想深刻，发掘和开拓了报纸的深度。

其四是专栏作家。《大公报》拥有一大批专栏作家，他们在各地，针对所闻所闻，从各种新颖或深刻的角度，直抒己见，丰富了报纸内容，增强了可读性。

王国华社长还指出，以上四点决定了《大公报》的读者群主要为高层政界、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但是《大公报》不仅仅局限于阳春白雪，近年来适度面向大众。《大公报》开辟的教育、校园和社团等版面，面向中学生、高校学生等年轻一代，融社会教育意义于轻松活泼的版面之中。他把青少年读者的培养视作《大公报》的第五大优势。

王国华社长的概括，说明了《大公报》一贯的风格特色与优势，又指出了《大公报》的新发展思路。

从读者对象来看，《大公报》人称自己定位于金字塔的顶端的那些读者，主要是工商界和管理层人士和专业人士。这种定位的依据是《大公报》的读者调查。根据调查，在《大公报》的香港读者中，工商界人士占70%，政府部门决策阶层和专业人士占11%，大专以上学生占6%，一般市民为13%。^①

但是位于金字塔尖的人士毕竟是少数。从市场空间来看，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近年来，《大公报》也把眼光放在了青少年读者的身上。从报纸所制定的学生订报奖励办法，我们可以看到“长远投资”的意味：

以学校为单位计算，每天订阅《大公报》数量不足10份者，该校订报师生可享受以优惠价（3.00元/份·天）订阅；以学校为单位计算，每天订阅《大公报》数量在10份或以上者，该校订报师生可享受以特惠价（1.00元/份·天）订阅。集体订阅《大公报》的学校师生，凡全学年订报天数达160天或以上者，每人可获赠价

^① 参见《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纪念册》，189页。

值 150 港元的购书券一张；集体订阅《大公报》的学校师生，凡全学年订报天数达 120 天或以上但不足 160 天者，每人可获赠价值 100 港元的购书券一张；集体订阅《大公报》的学校师生，凡全学年订报天数达 80 天或以上但不足 120 天者，每人可获赠价值 50 港元的购书券一张；集体订阅《大公报》学校的中五级和中七级学生，凡全学年订报天数达 70 天者，每人也可获赠价值 50 港元的购书券一张……

为了吸引青少年读者，也为了开拓青少年学生的视野，增强他们对祖国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了解，《大公报》从 1997 年开始还举办了一系列寓教于乐的修学旅行活动，有 100 多所学校的 2 000 多名师生先后参加了这项活动。他们参观内地的工厂企业、体验“军事训练营”生活、与少数民族一起联欢、和内地学校师生交流。

应该说，《大公报》这种眼光是长远的。但是，如何能在报纸内容上更好地为这群读者服务？价格固然是吸引青少年读者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提供适合这个年龄段的读者的内容。《大公报》虽然开办了一些相关栏目，但是，相对来说，内容还显得薄弱，形式上也不够活泼。如果《大公报》把青少年读者的培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的话，那么，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公报》的阳春白雪路线，对于内地读者来说，也许同样有吸引力。《大公报》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所具有和政府关系优势、它的高质量的专家队伍，这些都使它成为了各省市政府部门及商业企业了解香港的一个窗口，也被许多内地读者视为了解海外政治经济动态的最佳媒体之一。这一点，可以在网络中得到印证。《大公报》的新闻与社评被内地网站转发的比例是很大的。

近年来，《大公报》在内地的发行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大公报》的统计数据表明，它的内地读者的分布为外贸机构 30%，政府机关 20%，酒店游客 19%，工厂企业 19%，一般市民 12%。虽然在总发行量中内地的发行只占 9.4%，但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订户的数量是可观的。由此可以看出，内地市场给《大公报》

所带来的机遇是值得重视的。

在《大公报》百年报庆的北京纪念会上，曾经有人呼吁，恢复《大公报》的北京版，使《大公报》这个中文报纸历史上含金量最高的品牌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更重大的作用。无论这个想法最终能否得以实施，《大公报》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内地这个市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公报》近年来的版面改革，也体现出这样一种思路。

服务内地的思想，虽然一直体现在《大公报》的编辑方针中，但是在具体的内容方面，却还有一些不足。例如，《大公报》与内地一些省市合办的专版，大多都带有过浓的广告色彩。虽然这样的专版有助于报纸经济效益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各省市的招商引资，但却拉开了与读者的距离，影响了报纸的长远效益。

处理好服务本港读者与服务内地读者的关系，更好地研究读者心理，提高传播效果，是《大公报》在坚持高雅路线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打造品牌，以人为本

1999年11月10日，《大公报》在北京举行了顾问、专栏作家和特约评论员的特聘仪式。

特聘顾问包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费孝通，北京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学者季羨林。专栏作家包括著名作家陈香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著名作家韩素音，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吴冷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礪，著名作家王蒙、冯骥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季崇威，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胡鞍钢。特约评论员包括：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万伯翱，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中国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

这些人都大名鼎鼎，且很多人称自己是《大公报》的忠实读

者，包括程思远、经叔平。也有一些人与《大公报》有过工作上的渊源，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季崇威 1936 年就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王蒙、冯骥才等作家，与《大公报》副刊有着长期的合作。更有陈香梅这样的《大公报》的老作者、老朋友。

《大公报》聘请这批顾问、专栏作家与特约评论员的目的很明显，希望继续保持自己在言论与副刊上的优势，特别是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利用这些权威力量，为读者提供更加具有指导性、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邀请专家学者评析新闻，也是近年来新闻媒介竞争的一个新手段。在信息过载的年代，新闻媒体的责任不仅是提供新闻或信息，还有责任帮助受众理解新闻与信息的内在含义，厘清事件之间的关系，认清复杂的形势。但是在这样的竞争中，专家资源是极为关键的。《大公报》能组织起这样一个层次颇高的队伍，这也说明了《大公报》独特的资源优势以及影响力。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与《大公报》的合作，已经证明了建设专家队伍的重要意义。1993 年，厉以宁教授应香港大公报社社长王国华先生之邀，在《大公报》上开设了“经济漫谈”专栏。从 1993 年 7 月 1 日到 1997 年 6 月底，一共发表 250 余篇文章，每篇大约 1500 字。这些文章涉及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改革、企业管理、财政、金融、证券市场、抑制通货膨胀、就业、私营经济、收入差别、消费、环境保护、教育、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厉以宁视野开阔、富于远见，文章深受欢迎。1998 年，就在香港正承受着金融危机的打击时，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厉以宁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经济漫谈录》。其中许多观点，对于当时的形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启发性。

除了充分发挥社外力量外，《大公报》还积极培养报社的骨干力量。《大公报》曾经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过一大批著名记者、编辑、评论员和经营管理人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设立了专门辞条的 108 位杰出新闻工作者中，《大公报》有 12 人。在《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目中，《大公

报》编辑记者有36人。可见，《大公报》曾是一个人才摇篮。《大公报》成就了各类新闻人才，这些人才也为《大公报》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今天的《大公报》，也在不断地涌现出新的明星，马玲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大公报》年轻的高级记者及评论员，马玲已经为很多《大公报》的读者所熟悉。《马玲专栏》也是如今《大公报》惟一的个人专栏。

作为采访内地的新闻记者，马玲采访的面很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无所不包：从中央会议到反腐败，从北京缺水问题到北京的“爷文化”，从刘晓庆被捕到巩俐的英语……但她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报道者，还是一个观察者与思考者。一些读者认为，马玲的作品里有着一般新闻和评论里少见的尖锐和辛辣，让人读过之后不禁要掩卷凝思：原来我们身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中还有如此多需要反思的东西。

例如，在《中国命运：关键的2010年》中，马玲对于宏观政治、经济形势的观察能力与分析把握能力，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二零一零年对中国而言，犹如国家命运中一个分水岭般关键的年份。如果中国顺利走过了二零一零年，以后的国家发展道路可能会较为平坦，‘赶英超美’的前景亦显灿烂；如果中国不能顺利跨过二零一零年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坎儿，以后的路走起来难免不起伏波折。”^①接着，马玲尖锐地指出，在中国“从没有像现在感觉这样好”时，国际上的舆论出现了一种从“看高中国”到“看衰中国”的颠覆性演变，这不能不令中国引起应有的警觉。这种警觉除了提防西方玩弄的战略伎俩外，当然也包括清醒的自省。有识之士们应该认真深思和洞察中国是否存在受多米诺骨牌冲击的危险因素这一命题。

从现实的角度入手，马玲分析了中国经济潜伏着的隐忧；从国际舆论以及经济理论的角度，马玲介绍国际上有关“中国即将崩

^① 载《大公报》，2002-06-12

溃”的言论以及鞭策意义，同时她还借中央党校对 100 多位领导干部所进行的主题调查，说明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舆论气候。最后，马玲特别提出了对 2010 年会产生决定性的两个事件：WTO 的冲击和奥运会，指出，如果这两个冲击和冲刺都顺利通过，那么中国的命运相信会在 2010 年之后更放异彩。

丰富的知识与信息积累，清醒的判断能力和独到深入的思考能力，使马玲在面对中国未来命运这样一个大题材进行分析评述时，能做到游刃有余。

有时，对于大题材，她不仅有宏观层面的分析，也会有很个人化的思考方式，在看似随意的笔墨中，同样可以透出作者的不凡洞察力。例如，在 2000 年初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合并案发生后，她所撰写的评论文章，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对于传统纸介媒体的依恋，另一方面又能正视现实，阐述网络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长远冲击与影响。感性与理性的很好结合，是她的过人之处。

马玲将她的新闻作品结集出版，先后出版了《红墙内外的独家报道》、《亮点》、《新闻“第三只眼”》等书。

马玲的新闻作品不仅为她个人赢得了“有思想的女人”的美誉，也让人们更了解了《大公报》记者的水平。事实上，马玲只是《大公报》这个优秀的新闻群体中的一个代表。仅是《大公报》的评论版块，就聚集了一批目光敏锐的评论高手。《大公报》的记者与编辑的整体水平也是相当高的。据介绍，《大公报》的人如果要跳槽，必定是其他媒体追逐的热门。

四、网络天地，大有可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逐渐在全球普及，媒介对互联网的关注与利用也日益升温。对于格局复杂、变数多多的香港传媒业来说，互联网和新经济也被看做了一支刺激业界发展的“强心针”。

1994 年 10 月，香港电台在香港传媒中率先成立自己的网站，1995 年 8 月 23 日，《星岛日报》在香港报纸中最早开设了电子版，

同年《明报》也推出了自己的网站。^①

表 11—2 显示了香港传媒在网上发展的基本情况^②：

表 11—2 香港传媒网站情况

网站名称	网站成立时间	使用手段
“香港电台” www.rthk.org.hk	1994年10月	文字、24小时视频直播
《星岛日报》 www.singtao.com	1995年8月23日	文字、照片及视频
《明报》 www.mingpao.com	1995年	文字、图片、音频及视频
《苹果日报》 www.appledaily.com.hk	1996年	文字、图片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华早报》 www.scmp.com	1996年	文字、图片
《商报》 www.hkcd.com.hk	1996年	文字、图片
《大公报》 www.takungpao.com	1996年	文字、图片
《文汇报》 www.wenweipo.com	1997年	文字、图片
《新报》 www.ehknews.com	1997年	文字、图片
《东方日报》 www.orientaldaily.com.hk	1998年	文字、图片
《太阳报》 www.the-sun.com.hk	1998年	文字、图片

① 参见苏狄嘉：《跨世纪走进香港——“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服务回顾及前瞻》，载《传媒透视》，第1期，2000。

② 参见王婉勤：《香港传媒网站经营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论文。

续前表

网站名称	网站成立时间	使用手段
“有线电视” www.t-cable.com	1999年3月	文字、24小时视频直播
“亚洲电视” www.atv.com.hk	1999年	文字、24小时视频直播
《HkiMail》 www.hk-inail.com	2000年	文字、图片
“商业电台” www.881903.com	2000年	文字、24小时视频直播
“新城电台” www.metroradio.com.hk	2000年	文字、24小时音频及 视频直播
“无线电视” www tvb.com	2000年6月	文字、图片及视频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在香港传媒中，《大公报》在上网方面起步是相当早的。1996年5月15日，《大公报》正式推出了“大公网”，走上了网络这条新路。

对于网络的重要性，从一开始，报社领导就有自己的清醒认识。2000年，《大公报》把自己1995年报庆与大公网成立5周年庆祝合二为一。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报社对网络的重视。

也在这一次纪念活动中，《大公报》在上海东方电视台主办了“创造双赢——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对话”电视论坛。《大公报》总编辑杨祖坤与总经理冯仲良一同出席在论坛里，与来自网站的经营者和网络媒体的研究者共同探讨了传统媒体与网络的发展问题。在讨论中，冯仲良指出，传统媒体应该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网络，而且网络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要跟上潮流，紧贴潮流。

可以说，《大公报》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态来迎接网络时代的挑战的。

2000年6月24日，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与《大公报》签订协议，协议合作建设中国新闻网直播系统和工作站，目标是面向全球

以视频及音频即时准确传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权威信息。

《大公报》认为，比起毫无经验的网络经营公司来，“大公网”有大公报的全球资讯网络作依托，又有百年老报的品牌作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己的优势。

《大公报》走上网络的好处之一是，有效地扩大了自己在香港之外的地区的影响。据《大公报》自己的统计，“大公网”的最高访问量达到每日50万人次，而且读者大部分来自海外。在网络版中最受关注的栏目是“海峡两岸”。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大公报》在香港地区之外发展的潜力。

但是，“大公网”在运作方面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很多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它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内容上看，虽然经过4次改版，“大公网”有了一定改进，但是，并没有充分发挥出网络的优势。早期的电子版只有纸介内容的翻版，在百年报庆前的第4次改版中增加了即时新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网络的时效性。但是，即时新闻的数量相当有限，与香港及内地的许多新闻网站相比，缺乏竞争力。

在2002年5月改版前，“大公网”只能存贮一个月的新闻。改版后，2002年5月前的新闻内容无法查询。而一般新闻网站都能将几年的新闻存贮于数据库中。从数据库的检索方式看，查询方式单一，效果并不理想。

从互动性看，“大公网”几乎不能提供有效的互动。这对于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遗憾。

总体来看，“大公网”还处于手段单一的内容传播阶段，离真正利用网络进行新闻传播还有一定距离。从技术支持上看，也显得力不从心。

进入2000年以来，网络经济的泡沫逐渐破灭，网络公司的减薪裁员以及倒闭此起彼伏。根据香港劳工处的资料，仅在2000年1月至10月底，香港就有8宗互联网公司破产、停业或者裁员的个案。传媒网站也不能逃脱此影响。“壹传媒”及“苹果网”就进

行了大幅度机构精简。在这样的整体形势之下，“大公网”的经营必然也受到冲击。然而“大公网”并不需要走综合网站的路子，以新闻为主导产品，以低成本方式维持网站的运营也是可行的。但是，这需要解决好一些基本的问题，例如，时效性问题、互动性问题和资料检索的问题，而背后是技术支持问题。只有这样，网站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力。

同时，“大公网”的赢利，也是经营者需要考虑的。“大公网”目前还只能采用免费的方式提供信息，除了有限的广告之外，似乎没有有效的赢利模式，免费的网络内容，还有可能对报纸的发行造成冲击。

尽管如此，《大公报》领导者的长远目光和对网络的一贯重视，还是为“大公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五、多种经营、海阔天空

1999年初，《大公报》与《深圳青年》合作，在原《大公报》随报附送副刊《大公周刊》的基础上，合作创办《大周刊》。这本新刊物完全按现代办刊模式运作。它在投入不大的情况下启动，创刊运作半年后就打开了市场，在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产生了影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深圳青年》退出了合作，但《大周刊》的品牌已经形成。

《大周刊》的成功，有以下几个因素：

原《大公周刊》开辟和营造多年的广告资源；

《大公报》和《深圳青年》多年形成的无形资产及品牌影响力，以及资源的重新配置共享和优势互补后的力量；

对市场需求的充分研究、编辑方针的改变和营销策划。

其中，最后一个方面对于《大周刊》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的《大公周刊》是随报附送的一本娱乐性周刊，性质上也局限为《大公报》的副刊，办刊思路是为《大公报》订户服务。在与《深圳青年》合作后，杂志的经营与编辑方针发生了转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不计成本、效益，到计成本讲效益转

变；从为《大公报》订户服务向为全体城市市民服务转变；从内容的“大杂烩”向城市市民生活、消闲、娱乐消费转变。

按照运作者的策刊，《大周刊》要达到以下目标：特色上，《大周刊》突出“五味”——港味、深味、国味、时尚味、商味；选题上突出“三个唯一”——惟我独有，惟我独优，惟我独创；在风格上坚持“四要四不要”——要通俗不要低俗，要明快高雅不要老气横秋，要卖点不要热点，要惊奇不要猎奇；在内容上实现“六个导”——导吃、导购、导游、导乐、导视、导学；从标准上达到“五个性”——新闻性、实用性、知识性、趣味性、前卫性。

《大周刊》的运作获得了很大成功。据《大周刊》2000年组织的调查，《大周刊》在深圳的发行量达5.21万，读者数量约为23万人。^①

《大周刊》的成功，是《大公报》转换报纸经营思路的一个有益探索。它说明了《大公报》品牌的力量，也说明了《大公报》在内地市场的广泛前景。但同时，也带来这样一个启示：如果能更好地进行市场调查与研究，用更加符合市场运作的方式来经营《大公报》的话，它的香港市场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大公印刷”是《大公报》的多种经营中另一个成功的个案。

1994年，大公报社投资成立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资产规模超过2.8亿元人民币，拥有员工350人，厂房面积3万平方米。8年间，大公印刷快速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迄今已跻身中国印刷业百强和广东报业6大印刷企业之一。在国内报业印刷企业中，大公印刷第一家实行公司化运作，第一家通过ISO9000国际质量认证，连续5年成为全国外商投资双优企业，连续3年在广东省书刊印刷质量评比中名列前茅，还被评为海关信得过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大公印刷”已成为中国印刷业的知名品牌。

经过多年的运作，大公印刷形成了设计创意、策划推介、制版印刷、装订等全方位服务的印刷格局，并辅以印刷物资采办、进出

^① <http://www.mtrnc2000.com/report60.htm>。

口权、运输等多元化生产、服务态势，业务范围涉及报纸、杂志、画册、书籍、挂历、年画、装饰画、产品样本、明信片、广告、商标、公司年报等多个领域。《参考消息》、《证券时报》、《南方体育》、《足球》、《球报》、《读者》、《计算机世界》、《深圳青年》、《大周刊》等一大批媒体都成了它的客户。它还先后承印了各种大型文化活动的纪念和宣传画册。

2002年5月28日，亦即《大公报》百年报庆前夕，大公印刷有限公司举行了大公印刷新址开业庆典。这标志着大公印刷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逐步开展多种经营的同时，近年来，《大公报》还进行了一些体制上的改革。2000年以前，《大公报》是“大锅饭”式的体制，从来没有炒过人。2000年后，报社开始实行聘任制。到2002年，这一制度逐渐成熟。同时，在内地的各办事处，也开始实行独立成本核算。办事处主任有了人财物管理和经营权，越来越灵活的体制，给内地办事处带来了活力。

DAGONGBAO BAINIANSHI

第三节 重塑形象 任重道远

一、借报庆东风，扬大公美名

1997年以来，《大公报》的品牌意识越来越强，重塑百年品牌，也成为最近的几次报庆的主题之一。

1997年以来，《大公报》共举行了三次报庆活动。

1997年，是《大公报》创刊95周年暨在香港复刊49周年。江泽民为它题写了“发扬爱国爱港传统 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题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都题词祝贺。《大公报》在香港举行了庆祝酒会。

与以往的报庆活动不同的是，这次的报庆不仅庆祝报纸在香港复刊，也庆祝报纸的创刊。这也表明，香港《大公报》已经确认了

自己和1902年创刊以来的各版《大公报》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

2000年,《大公报》举办了创刊98周年暨大公网创建5周年活动,纪念活动分别在香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展开。除了纪念酒会、座谈会外,还在上海举办了“创造双赢——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对话”的电视论坛,在广州主办了“中国人世贸粤港经贸合作关系前瞻研讨会”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不仅宣传了《大公报》的形象,也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2002年的百年报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大公报》品牌的宣传也达到高潮。

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分别为《大公报》百年报庆题词。江泽民主席的题词是:“发扬百年爱国传统,与时俱进开创未来。”李鹏委员长的题词为:“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爱国爱港做出新贡献。”

6月12日,《大公报》举行盛大酒会,庆祝创刊一百周年。百年华诞庆祝酒会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大会堂举行,出席的贵宾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姜恩柱,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等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地的官员,另外还有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财政司原司长梁锦松、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等。

成思危在纪念酒会上讲话说,一个世纪来,《大公报》目睹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记录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大公报》不仅忠实地记录了历史,也参与了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我们看《大公报》,是因为她报道翔实,不哗众取宠,不讲假话,忠实地为人民和广大读者服务。”

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姜恩柱也高度评价了《大公报》一个世纪以来的贡献。他表示,《大公报》1948年在香港复刊后,为香港的繁荣发展和顺利回归,为促进香港与祖国内地的交流合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说,香港回归后,《大公报》积极宣传报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特首董建华和特

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维护香港的稳定发展。同时，《大公报》锐意进取，改进报道和经营，面貌为之一新。他祝愿《大公报》同仁把百年华诞作为新的起点，在新世纪创造新的业绩。

6月12日，《大公报》杯赛马活动举行。名为“大显身手”的澳大利亚马获得了比赛的冠军，这匹获胜的马的名字，也许对于《大公报》来说，是一个好彩头。

6月13日，百年报庆活动之一的“世界报业论坛”也在香港举行。10多个国家的50位报业负责人聚集一堂，共同探讨未来的报业大计。

6月18日，庆祝活动移师北京。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纪念会。会上也是贵宾云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原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周南、《大公报》特聘顾问季羨林、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大公报》老报人方蒙等分别发表了讲话。

为了宣传《大公报》的光荣历史，弘扬大公精神，《大公报》还出版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包括《大公报一百年》、《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大公报一百年头条新闻选》等十种。这套丛书，不仅反映了《大公报》的成长历程，体现了《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与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作用，也生动折射出中国新闻史与现代史的变迁。著名学者季羨林曾称《大公报》是“百科式的中国现代史”，阅读《大公报》丛书，人们必定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理解。

《风云激荡一百年——〈大公报〉历史版面展》也先后在北京、深圳、重庆、杭州、济南等地巡展，所到之处，反响强烈。

作为《大公报》故乡的天津，更将《大公报》的百年华诞作为自己的节日，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我与大公报”征文活动、“《大公报》与天津主题座谈会”等。天津媒体大篇幅大密度地报道《大公报》百年历史与报庆活动。甚至天津的2000辆公共汽车，也陆续在挡风玻璃和车门上贴上《大公报》宣传品。一时间，《大公报》成为天津市民最热门的话题。

中国邮政总公司为这次报庆发行了纪念邮票与首日封，邮票一套两枚，主题分别是《大公报》1941年所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和2000年获香港最佳新闻奖全年大奖的奖杯。

香港凤凰卫视制作的12集电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也陆续播出。

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不仅引起了许多《大公报》老读者的关注与共鸣，也引起了许多年轻人对于这家报纸的好奇。一家报纸的报庆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引起如此大的轰动，足以说明《大公报》的品牌效应与历史长期积淀所形成的影响力。

二、厘清是非，还原历史

在《大公报》头上，一直罩着一团历史的阴云，那就是“小骂大帮忙”这个评价，即《大公报》对于国民党政府是“小骂大帮忙”。这个评价在解放以前就有了，20世纪60年代，当年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和总经理曹谷冰迫于政治压力，曾在回忆录中对《大公报》进行自我讨伐，承认有“小骂大帮忙”或“以小骂达到大帮忙的目的”这档子事，由此更动摇了人们对《大公报》立场的确认。

对于《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盲、不私”的“四不”方针，长期以来也有不少微词。

1997年以来的三次报庆活动和由此激发的有关《大公报》史研究的活动，不仅张扬了《大公报》的光荣历史，也澄清了一些历史的是非。

在《大公报》的98年报庆纪念会上，一位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就曾在名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的讲话中^①，引用周恩来总理1958年与费彝民的讲话，肯定了《大公报》的三个方面的：首先，《大公报》是爱国的；其次，是坚持抗日的；再次，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的人才。

^① 参见《与时代并进——庆祝大公报创刊九十八周年暨“大公网”创建五周年系列活动纪实》，大公报社出版。

这位学者还指出，要更正关于《大公报》历史的一些不正确的说法，澄清一些不实之词。他特别指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政学系的报纸”。《大公报》其实和政学系毫无关系。

“小骂大帮忙”。对国民党，《大公报》不光是小骂，也有大骂。而且不是假骂，是真骂。

“拥蒋”。抗战前基本不拥蒋，有时还骂蒋。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并非一味袒蒋。她对共产党有看法，但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的战乱，并不和国民党站在一起叫嚣反共，对共产党的报道一般说来较为客观。

“以不党、不卖、不盲、不私为标榜”。不是标榜，而是基本上做到。《大公报》在经济和言论上是独立的。她有自己的主张，不偏于任何党派，名副其实地做到“四不”。

“标榜文人论政”。不是标榜，而是确实有一批以他们为代表的文人在那里论政。这里面有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爱国忧民的思想 and 文章报国的思想，也有资产阶级民主和向国民党当局要求言论自由的思想。

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以事实为依据对《大公报》历史所作的公允评价，使《大公报》人深受鼓舞，也增加了他们澄清历史事实、洗清强加在《大公报》身上的莫须有罪名的信心。

2002年6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和此后不久在一些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一些学者再次对历史上加在《大公报》头上的不实之词进行了辩驳。他们指出，从骂的角度看，“《大公报》骂国民党时候更多，对国民党不光是小骂，也有大骂。有时甚至是怒骂、愤骂和痛骂”^①。他们认为曾经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拥护政治修明案》、《看重庆念中原》、《为国家求饶》、《疑错与马谩》等社评，都不是小骂，而是大骂。而且是出自肺腑的真骂，不是假骂。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他们还指出，《大公报》也骂过共产党。“这是因为《大公报》

^① 《方汉奇为〈大公报〉辩诬》，载《大公报》，2002-06-18。

是一群以文章报国自诩、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知识分子创办起来的报纸，他们以“四不”为办报的方针，对中国的各个党派，自然都会有所批评和指摘。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对共产党的骂，多数情况下，是骂错了、错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由于社评撰稿人阶级和认识的局限，有的是由于情况不明，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误导，此外还有张季鸾个人对蒋有感恩图报思想等原因。《大公报》不是共产党的机关报，也不是左派的报纸，这些社评的撰稿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要求他们完全接受共产党的观点。出点错误和偏差，正常的、认识了，改正了，就行了。应该给以宽容和谅解，不必死揪住不放。”^①

关于帮忙，他们认为，《大公报》确实给国民党帮过忙。西安事变的时候帮过，抗日战争时期帮过，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的一个阶段也帮过，但要具体分析。有的忙是帮错了，伤害了人民的利益，该认账，也该打板子；有的忙则是该帮的，不当视为罪状。例如，过去把《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倡的“国家中心论”和“拥蒋”的言论都视为为国民党帮忙，这就不妥了，当时提“国家中心论”和“拥蒋”，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为了抗日。《大公报》的这类帮忙，如果是为了坚持抗战到底，就不能说是帮国民党的忙，而是帮国家的忙。

他们还认为，《大公报》不仅帮过国民党的忙，也大大地帮过共产党的忙。第一个派记者去苏联采访、向中国读者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真实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向全国人民报道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真实情况和边区建设情况的是《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报道，《大公报》始终尊重事实，不抹杀，不歪曲，不捏造，采取了客观或比较客观的态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帮忙。不少读者由此获知共产党的政策和言论主张，了解了革命的形势。毛主席是因为看了《大公报》和某些地方报纸有关刘志丹的报道以后，才决心率领红军去陕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不少在

^① 《方汉奇为〈大公报〉解评》，载《大公报》，2002-06-18。

长征中掉队的红军，也是在看了《大公报》的有关报道以后，知道了部队的去向，赶上了队伍的。《大公报》始终以无党派为标榜，报社内部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一旦发现某人有国民党方面的背景，立即开除。但是报社里确实有不少地下的共产党员。报社的领导层，对有些党员的身份十分清楚，却故作痴聋，予以保护。新闻版面上，十分之六七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报道。在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强迫国统区内的各种媒体称共产党为“共匪”的时代，只有《大公报》公然抗命，仍然坚持称“中共”和“共军”。毛主席在接见《大公报》记者时说的“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当人看”，就是对《大公报》的以上言论行动的肯定。这也是一种帮忙。

上述这些观点，不仅使《大公报》人感到振奋，也促使新闻界重新审视《大公报》的过去。

在《大公报》内部，长期致力于还《大公报》以历史本来面目的人，是已故的《大公报》主笔李纯青。李纯青虽然是作为中共地下党为统战目的进入《大公报》工作，但是他一直自视为一个“大公报人”。多年来，他也在不断地以自己所掌握的事实，向世人说明一个真实的《大公报》：

对于《大公报》的性质，他说：“大公报是一个私营企业，除吴鼎昌以金城银行等名义，收购英敛之的旧大公报外，没有从任何地方拿过政府津贴，也没有得到其他资本家无偿的贷款。而且吴投资时只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并未做官，他本人也亲自参加新闻工作……”^①针对有批判者坚持“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一说，他也予以了批驳，并以他个人的实际经历补充道：“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所有一切宣传，几乎都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第二，大公报社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活动……大公报是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共产党组织”。第三，《大公报》的社评作为

^① 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305 - 307 页。

该报的灵魂，也是独立的，“不许极左极右的新闻言论漏过政治筛了”，“编辑权力由中间思想的人执掌”。他认为“大公报的中心思想”就是张、胡所说的“文人论政或文章报国”，“其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而且认为“四不社训”在抗战时期是“基本做到了的”，“社训包括政治立场、经营方针及新闻言论的文风作法”均一脉相承。

作为老大大公报人的李纯青，以其亲身经历为《大公报》所作的辩护，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芸生先生的儿子王芝琛，多年来也致力于整理《大公报》的历史，为《大公报》辩诬。

早在80年代初王芸生病重时，赵朴初先生就对王芝琛说：“大公报是一张很了不起的报纸。你父可能不行了，他的日记已烧尽，这我知道。你们兄弟姐妹是否抓紧时间，慢慢让他把身世、世事说下来，要知道这可能会很重要。”也许正是这些话，促使王芝琛放弃自己原来的军事科学专业，专心从事《大公报》历史的研究工作。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为人们认识《大公报》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在2001年出版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中，王芝琛也明确地对“小骂大帮忙”的观点进行了辩驳。他指出，《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帮忙只有两次：一次是“飞机洋狗事件”后，在陈布雷的再三请求下，王芸生发表了《青年与政治》的社论，劝学生不要闹事。另一次则是，在抗战的最艰难阶段的1943年春，《大公报》发起了著名的“爱悔恨”运动。与之相比，《大公报》对国民党的骂要多得多。王芝琛一一列举了相关事实。

与此同时，一些中青年的历史研究者也在极力探求《大公报》的历史真相。天津大学的贾晓慧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她在翻阅《大公报》的时候，发现那一篇篇切中时弊的热辣社评，呼唤改革、建设的激扬文字，无不洋溢着传统的士大夫式的社会责任感和经西方思想洗礼后的民主、革新精神。她觉得对《大公报》的历史评价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党派决定论”的“小骂大帮忙”，于是她决定把

《大公报》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她逐字逐页逐行翻阅了1931年至1938年的《大公报》，在经过如此详实的考证后，她指出，《大公报》有自己的独立性，对国民党有支持，也有批评，代表了知识界和工商界的愿望与主张。她的研究对于“小骂大帮忙”的观点也是一个反驳。在《大公报》百年报庆前夕，她的论文《大公报新论》出版，给人们研究《大公报》的历史提供了一份新的文献参考。

上面这样一些学者、研究者只是众多关心《大公报》历史的人的代表。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新记《大公报》那一段历史才得以拨云见日，还原其本来面目，得到它应有的公允评价。这不但有利于《大公报》百年品牌的宣传与大公精神的弘扬，也有利于人们重新正确认识与评价“文人办报”的作用。

三、阔步前进，再造辉煌

在《大公报》百年报庆的喜庆气氛渐渐淡出时，《大公报》的下一个百年成为了《大公报》读者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早在报庆前夕，作为《大公报》老作者也是老读者的黄枝连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千秋大业中的百年大报》一文，对《大公报》的下一个百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大公报》应该做一份“大报”，在这里，所谓“大报”，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定义^①：

——它的立场和编辑及内容，能同它所在的地区，它所属的国家，它所依托的文明，以及其国际社会的发展大势，不但能相互呼应，而且，要先知先觉，在社会发展、国际事务的处理上，起着前瞻性、促进性的打造作用；

——它当然对其国家社会的主体性的制度和主流性的政策，要起着支持、阐释、协调、推动的作用；但，它对差异性、歧异性的非常人物和非常事物，总是要起着一种宽广变通、求同存异

^① 参见《大公报》，2002-05-28

的作用；

——有成就的报刊，是社会之公器，天下之公器，因此，对于社会各层面的人物、族群、集体，虽然有其无可避免、无可厚非的倾斜性，但这种立场、取舍，不可以在取消、抹杀、丑化其他人物、族群、集团的前提下来展开；

——要做到这么几点，这家报馆，在制度、人事、设备、经营，即硬件和软件上，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它必须也拥有杰出的记者、评论员、编辑人员以及庞大的社会网络；当然，在市场经济体系里，它也必须是一盘成功的生意，对于它的员工的待遇、发展、福利提供当地社会中等水平以上的供应；

——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细致的专业性要求，比如说，“大报”的版面，用字、图片、字体、校对、美术，以至于编辑人员对一篇文章、一段新闻的处理，准确正确之外，还要推陈出新，总是不断地令读者有耳目一新、赏心悦目之感。

无独有偶，《大公报》百年报庆活动结束后不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施汉荣撰写了《历史光环下如何开创未来——一位老读者、老作者对《大公报》的殷切期盼》一文，也为《大公报》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指出：

《大公报》应更积极地促进粤港澳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努力推进早日建成以港、穗为中心的大珠江三角洲国际大都会群。

利用立足香港的有利条件，加强台海两岸关系、港台关系、澳台关系的研究，提高对台湾报道的质量以及有关言论的权威性。

改进各省市的新闻专版，减少其“广告味道”，增加引人入胜的通讯特写，使香港和其他地区的读者也乐于阅读。

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提高对国际大事评论的时效性和权威性。

进一步办好各具特色的各种专刊，如中国西部、中国民企等。

.....

这些读者的建议得到报社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也应该是

他们一直在思考的。《大公报》光荣的百年历史毕竟已经过去，如何在下一个百年继续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继承“文人论政”的传统，为中国的繁荣再做贡献？如何继续服务好现有读者，又如何进一步拓宽读者面？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搞好报业的经营，增强报纸的竞争力与长远发展的后劲？这些问题显得十分迫切。

在《大公报》百年华诞前夕，100年前英敛之对于“大公”的释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被王国华社长新释为：“为民服务、忘己为大，与时俱进，无私为公。”

《大公报》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在总结过去百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她也步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先辈们的奋斗，积淀下来的是一笔宝贵财富，但也是一个巨大压力。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大公报》过去的一百年是辉煌的，希望她在已经开始的一百年中，与时俱进，再造辉煌。这是大公报人和关注《大公报》的读者们共同的期待。

DAGONGBAO BAINIANSHI

后 记

《〈大公报〉百年史》是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应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先生之请，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组成编写班子，纳入2002年度的校科研计划，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突击完成的。借以祝贺和纪念这份在全世界华人华侨和全世界新闻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报纸的一百周年大庆。

这部书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教授担任主编。参加编写工作的绝大部分作者，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博士和在读博士。同时也吸收了个别的校外从事中国新闻史特别是《大公报》史研究的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加盟。是集体研究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全书各部分撰写工作的分工情况如下：前言，

方汉奇；第一、二章，史媛媛；第三章，陈彤旭；第四章，第五章第一、二、三、五节，第六章，吴廷俊；第五章第四节，涂光晋；第七章，王鹏、吴葆；第八、九、十章，陈昌凤；第十一章，彭兰。由方汉奇负责全书的定稿工作。

这部《〈大公报〉百年史》系统地介绍和评析了从1902年6月17日到2002年6月17日这家报纸津、沪、汉、港、渝、桂等六个版整整一百年的历史，是对这家报纸历史的一个全面的个案研究。希望她的出版，能对中国新闻事业史，香港、天津、重庆、桂林、汉口、上海等地区的新闻史，以及海内外华文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做一点贡献，起一点添砖加瓦的作用。不到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3年1月

附 本书主编和撰稿人简介

方汉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著有《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新闻史上的奇情壮彩》等书，主编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传播史》等书。曾被评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1984）、全国优秀教师（1987）、北京市优秀教师（1987、1997）。所编著各书，曾两次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一等奖，两次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次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以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吴廷俊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校

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新记大公报史稿》、《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新闻传播史稿》等书。曾获吴玉章奖、新闻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优秀新闻论著一等奖、中国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中南片二等奖。

涂光晋（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学院副院长、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秘书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史方向在读博士生。著有《广播电视评论学》、《学会用电视发言》、《从自己走路到走自己的路》、《新闻评论》（合著）、《新闻评论教程》（合著）等书。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新中国新闻事业50年”百篇优秀论文奖。

陈昌凤（女） 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著有《香港报业纵横》、《中国报纸副刊史》、《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当代新闻事业》（上下）、《报界档案》等书。

王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著有《大公报与北京》、《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吴胡张续办大公报》、《大公报派记者到苏联采访》、《“国闻通讯社”、“国闻周报”、“大公报”》等。

吴薇（女） 北京市政协《北京观察》杂志社社长、主编、主任编辑。中国新闻史出版史研究工作者。著有《大公报保存经过》、《北京“大公报”停刊与“前进报”夭折》等文。

彭兰（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史方向在读博士生。著有《点击美国在线》、《网络传播概论》、《试论网络报纸的编辑手段》、《走向第四媒体》、《网络带来的变革》等。曾获“新中国新闻事业50年”百篇优秀论文奖。

陈彤旭（女） 青年政治学院新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史方向在读博士生。

史媛媛（女） 原郑州大学新闻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史方向在读博士生。

宋晖（女）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史方向在读博士生。